英国史

III

1776 — 2000

帝国的命运

The Fate of Empire

A History of Britain

［英］西蒙·沙玛（Simon Schama）/ 著 刘巍 翁家若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英国史.III，帝国的命运：1776-2000

作者:[英]西蒙·沙玛

译者:刘巍 翁家若

ISBN:978750864930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终于把太阳抛在脑后，进入了东面的大海。加快速度划破油汪汪的水面，喧声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咕噜，咕噜——哗啦——咕噜，肯特的群山——我曾经翻过山去，逃避尼克迪摩斯·弗拉普（Nicodemus Frapp）叔叔的基督教教训——在右侧落远了，埃塞克斯（Essex）在左侧落远了。它们远去了，消失在蓝色的雾霭里，而拖船后面高大缓慢的船只，那些几乎不大移动的船只和吭哧吭哧向前拱着的结实的拖船，在你泛着泡沫经过时，都变成了金子铸造的模样。他们背负着生与死的奇异使命出航，驶向要置人于死地的异国他乡。而现在，在我们的身后，蓝色的秘密，看不见的灯火幽灵似的闪烁，不一会儿，就连这些也消失了。我和我的驱逐舰越过灰蒙蒙的广阔空间闯入未知的世界。我们闯入了未来的辽阔空间，涡轮机开始用陌生的语言交谈。我们驶向茫茫大海，驶向风一般的自由和渺无人迹的道路。灯一盏盏熄灭了。英格兰与国王，不列颠与帝国，昔日的荣光，古老的奉献，都擦身而过向后滑去，沉没到海平线以下，逝去了——逝去了。河流逝去了——伦敦逝去了，英国逝去了……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托诺–邦盖》

……乡下村舍会被改造成孩子们的假日野营地，伊顿–哈罗对抗赛会被人遗忘；但英国将仍是英国，一个贯穿过去未来的永恒生灵，并且如同所有的生命一般，它拥有改头换面的力量，却依旧保持着原貌……

乔治·奥威尔

《英国，您的英国》

---

1.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以其科幻小说闻名于世。20世纪以后，除了科幻小说以外，威尔斯还创作了一系列以《托诺–邦盖》为代表的反映英国中下层社会的写实小说。小说描写叔侄二人靠推销假药“托诺–邦盖”成为巨富，后来又在竞争中惨遭失败的故事，反映了19世纪末英国社会变革时期复杂的社会状况。——译者注

前言

想要借本书来了解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或雷金纳德·麦德宁（Reginald Maudling）详尽生涯的读者可以掩卷作罢了。因为在这本《英国史》的最后一卷中，无论是对现代英国史史料所做的直接的解释性举例，还是就这些议题来提供我本人最翔实的主观论断，比以往更多的将是我就本书议题所做的警示性、非定性阐述。正如我与BBC2合作的电视节目一样，我趋向专注于少量的史料和论据，并详细论述它们，而并非只是粗略地涵盖英国在工业帝国转型过程中的各方面。正如之前的两卷，这卷就多个主题进行了详尽阐述，这些都是电视节目有限的叙述容量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包罗万象的全面解读，这卷也不应被混淆成历史教科书。我审慎地选择了用一种散文般开阔又松散的笔调来描写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历史，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很难将自己所身处的当代看成真正的历史，毋庸置疑，这更像是一个幻觉，一个过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幻觉。然而，正如本书标题所指的一样，我试图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英国史中搜寻一些不常被研究的内容：尝试汇集帝国与本土的历史，特别是我一贯所关注的印度对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繁盛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也有责任检讨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及爱尔兰所造成的困境。

纽约，2002年

第一章　自然的力量：通往革命之路？

不列颠失去“帝国”身份的同时，却找到了它自己。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在马萨诸塞爆发。就在英军面对当地愤怒的人群、充满敌意的民兵时，却有一位佛林特郡（Flintshire）的绅士、博物学家托马斯·彭南特（Thomas Pennant）出门远行，踏遍阿尔比恩（Albion，英国旧称）的山山水水，去寻找一个几乎绝迹的物种——真正的英国土著。彭南特认为，自己在迈里奥尼德郡[注]，高地峭壁与冰冷的山湖之间，找到了这样的人——那就是英国土生土长的纯洁原始人，初民的后代；他们简单质朴的天性，多少避过了现代“文明”的摧残。在林恩·厄蒂恩[注]湖畔，彭南特绕着两座圆形巨石阵缓缓而行，他相信，这两座巨石阵，一定就是“德鲁伊教派[注]古物”的残迹。彭南特在近旁，还发现了同样质朴的人类居民。有一户人家，男主人名叫埃文·鲁维德（Evan Llwd）；他们用“古代英国人的风格”热情地招待了彭南特：有浓烈的啤酒，下酒菜则是风干羊肉（威尔士语叫Coch yr Wdre），还有牛羊奶制成的奶酪。主人还给我们看了一只家族的圣杯，用公牛的阴囊制成；这杯子曾经装过很多祭祀用的酒……他们世世代代居住于此，进项不增不减；没有喧闹的名利，也没有随名利而来的各种苦恼。

这严酷而多雨的乡间，却充满了旧日不列颠的奇迹；有人类的奇迹，也有地貌的奇迹。彭南特在彭林湖（Penllyn）边，找到了一间小屋，小屋的主人是年过九旬的老太太——玛格丽特·伊赫·伊万斯[注]，但这位当地无人不知的居民却正好出门在外，大概是猎取狐狸去了。彭南特无比失望。因为他先前听说，玛格丽特夫人堪称威尔士的黛安娜（Diana）女猎神、凯尔特的亚马逊（Amazon）女战士。她捕鱼打猎都是一把好手，而且九十多岁的时候，依然“是湖上的女王，孜孜不倦地划着船；小提琴的技艺堪称一绝，对一切古代音乐都很熟悉；对机械的艺术也没有忽略，是了不起的细木工匠”。玛格丽特还会打铁，修鞋，造船，做竖琴；年近八十，仍是“全国第一的摔跤手”。

彭南特成了专家，专门记录古老奇异、未经雕琢的不列颠遗迹：野猫、松鸡、苔痕斑驳的史前巨石，还有穷苦但强悍的民族，生活在这些风景之间。彭南特在北威尔士“远足”之后几年，恰好也是詹姆士·鲍斯韦尔[注]和约翰逊博士[注]访问威尔士的前一年，彭南特又坐船穿越了赫布里底群岛

（Hebrides），随行的有一位威尔士男仆摩西·格里菲思注，也是插画家。这一次旅程，彭南特看见的各种场景，让他时而忧郁，时而欢欣。此地的岛民，如同迈里奥尼德山间的牧羊人一般，也过着原始的生活。很多人住在没有窗子的茅舍里，食物只有麦片、牛奶，还有一点儿鱼。18世纪六七十年代，数以万计的岛民被迫告别了自家小小的农庄，让出来的土地，用来放牧利润丰厚的黑面羊与切维厄特绵羊。很多人难以忍受困苦，渡过大西洋，移民到了美洲。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神迹般的美景：在苏格兰西部的巴里斯戴尔湾（Barrisdale），彭南特看到了许多捕捞鲱鱼的小船，“在这片荒蛮而秀丽的地方，有一处繁忙的栖息地，有许多渔夫和渔船”。另外，赫布里底群岛，朱拉山脉（Paps of Jura）的山峰之一，盖尔语名叫贝恩–安–奥尔（Beinn-an-oir），意思是金山。这样的山峰，在山脉中一共有三座。彭南特登上峰顶，四处远眺，看到了英国边境的星星点点，备感兴奋：东北方是高地上的山峰，一路延伸到本洛蒙德山（Ben Lomond）；西方的大洋里，是科伦赛（Colonsay）和奥伦赛（Oronsay）诸岛；南方则是艾拉岛（Islay），以及北爱尔兰的安特里姆郡（Antrim）的遥远群山。

攀爬、行走、速写、笔记，这一切使得托马斯·彭南特成了不列颠第一位杰出的旅游向导。此时，这位旅人还远远没有将祖国探索完毕。彭南特的《苏格兰游记》（*A Tour in Scotland*）1772年出版。到1790年之前，已经再版了四次。然而，给英国以重新发现、重新定义，并以此在名望、金钱方面小有收获的作家，并非只有彭南特一人。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仍在进行，英军撤出了费城。就在这一年，彭南特的威尔士游记出版之后，英国又出版了一本英格兰著名风景区——湖区（Lake District）的导览，作者是托马斯·韦斯特（Thomas West），一名苏格兰耶稣会信徒（Jesuit），住在坎布里亚郡（Cumbria）的阿尔弗斯顿（Ulverston）。韦斯特跟彭南特一样，也是一位学者，走过欧洲很多地方。先前，韦斯特曾经拉着一些英国旧派绅士，穿过满是乞丐的广场。这次“壮阔的旅程”对这些绅士而言，只是不得已的义务，因此百无聊赖。韦斯特厌倦了这种事，回国发展了第二职业，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都是胆略过人、爱好旅行的男男女女，在湖泊、悬崖、山谷间穿行。韦斯特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导游著作当中，都会引领着游客，拜访一系列观光胜地，在不列颠的壮丽山河中举杯畅饮。

彭南特和韦斯特要向公众传达一句话，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带有革命性质：回家吧！从印度的迈索尔（Mysore）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英国人已经漫步得太久，这漫步太过杂乱，也太过贪婪。英国人着力要让祖国的自然景色同意大利相仿，要么到处修建神庙，树雕像，制造种种古怪东西来装点山河，要么，就是照着外国油画来改造自然景观，让自己哪怕出了美术馆去野餐，也不会发觉景色有所不同。这一措

施同乱搭乱建一样恶劣。这个过程中，英国人不知不觉丧失了本民族的精髓——那就是未经美化的自然。这种原生态，在英伦三岛某些边远地区，奇迹般得以保存；因为上流社会觉得这些地方太过遥远、景象丑陋、环境恶劣，即使远足也不会涉及。但如今，新建了收费公路，到切斯特（Chester）或爱丁堡（Edinburgh）可以节省一半时间。于是，爱冒险的旅人就能迅速抵达那个“壮丽的”不列颠边缘；再往更偏远的地方，当然就只能采用更简易、更原始的交通方式了，比如骑马、渡船。当然，还有一个情况令人不爽，那就是，要亲眼见到壮丽的景色，就必须淋很多雨，吹很多风。

然而，彭南特和韦斯特表示，一切辛苦都值得，因为去往“真正英国”的旅程，并非假日的休闲，而是为了“恢复自然美德”事业的尝试。英国人已经在邪恶的安乐中沉迷太久，需要艰苦的磨砺。当年，罗马帝国灭亡了，如今的英国人检视着那些帝国的遗迹，又走上了罗马声名狼藉的老路。这两位悲观的预言家说：英国人早在失掉美国以前，就已经失掉了自己。旧日的英国美德，输给了现今的丑恶。自由已经被滥用，自由的行为歪曲了，正义被无情的拜金主义蒙蔽了，乡村的纯真被都市的风尚污染了。“古老的宪法”（Ancient Constitution）曾一度保障过不列颠的自由，而今，用批评家的说法，却堕落成了“古老的腐败”，或者更辛辣一点——“那种问题”。有些人秉持着帝国必胜的信念，他们以为，只要有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加上新教的朴素正直，就能让英国免疫，不受那种帝国衰落的必然规律影响。然而，“贸易”已经变成了英军枪口下掠夺财富的遁词，变成了非洲野蛮的奴隶贸易。1777年，美国纽约州发生了萨拉托加战役。1781年，弗吉尼亚约克镇又发生了约克镇战役。英军两次战败投降。彭南特等人认为，这两次惨败，就是上帝和历史对英国的惩罚。

而腐化的解药是恐怖的。宣传旅游景点的浪漫主义旅行文学正在发展，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有一个就是“可怖”（horrid），其他的常用词还包括“怒发冲冠”（bristling）、“乱蓬蓬”（shaggy）、“险峻”（precipitous）等。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莱克兰（Lakeland）区，有一处风景区，名叫隼岩（Falcon-Crag）。韦斯特是这么向读者保证的：“你头顶上悬着一块巨岩，再往上面是破碎尖石的密林，呈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向内耸起，形成有史以来、人眼所目睹过的最可怖的半圆剧场，这就是动荡的自然的狂野形态。”苏格兰的南拉纳克郡（South Lanarkshire）克莱德河（River Clyde）上，有四座瀑布，组成了克莱德瀑布群。按照另一位旅行作家，绅士托马斯·纽特（Thomas Newte）的说法，克莱德瀑布群，也是漫游英国壮丽山河的必经之地。纽特是这么说的：“巨大的水体，带着可怖的愤怒不停奔涌，宛如要给坚硬的岩石带去毁灭一般；这些岩石的存在，激起了波涛的憎恶。波涛从一座座洞窟中翻腾而起，洞窟就是波涛塑造出来的，好似从地狱大口中呕吐而出。”然

而，这些可怕的经历，并非当作“地狱游记”而以猎奇夸大的手法编造出来，而是意在锻炼人的感官。对五感的刺激，目的在于给游客造成震撼，让他们脱离乏味的嗜好、麻木的状态，正是这些嗜好、麻木形成了恶疾，蚕食着民族的肌体。坎布里亚、威尔士、苏格兰这些地方清澈如镜的水面，能够治愈大英帝国道德与新陈代谢的疾病。英国人来到山地，远离大都市充满毒素的污秽、污染的空气，才能再度呼吸，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古罗马人、金雀花王朝的人，曾经被视为“进步”的力量，如今人们却谴责他们带来了贪欲和蛮力。各种文明衰败的考古学成果，让旅人沉思良久，从而与旧日的英国美德建立了联系，这“老古董”可能会成为将来的蓝图。这些古迹包括：巨石阵；铁器时代（Iron Age）的梯田，上面留下了不列颠被罗马扫荡的印迹；威尔士残破的要塞，曾被英王爱德华一世突袭；荒废的修道院，先被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霸占，又被托马斯的孙子、革命时期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焚烧——这些古迹，全都被旅行的写手们，做了口若悬河的悲情渲染。早在1740年，考古学家威廉·斯图克利（William Stukeley）就写了一本书《巨石阵：还给英国德鲁伊教徒的神庙》（*Stonehenge:A Temple Restor’d to the British Druids*），认为：罗马皇帝恺撒曾把德鲁伊人描绘成嗜血的野蛮人，但事实绝非如此。德鲁伊人是古代以色列失落部族的一支，迁移到英国，想要创造一片新的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后来生存了下来，如同教士一般，守护着一个成熟古老的文明。德鲁伊人的凯尔特语言，不仅是原始的不列颠语言，也是一切非拉丁的欧洲语言的源头。

突然，“英国人”的意思就跟“英格兰人”不一样了。威尔士北部的军事要地格温内思郡，有一座多巴达恩城堡（Dolbadarn Castle）。当年，威尔士在独立状态下，最后一位亲王罗埃林·格瑞福德（Llewellyn Gruffydd）之子欧文·戈赫（Owain Goch），曾在此抗击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大军。此时，城堡变成了人们朝圣的宝地。最早踏足此地的人——像彭南特这样的威尔士古董商，迫切想用“原始英国人”的身份，来拥有这些祖传的宝物。然而，一些坚持浪漫主义、同情英格兰的人，很快就尾随而至。这些化作废墟的石堆，映在黑暗的天幕之上，无论是亲眼看到，还是绘画所表现的，都远比金雀花王朝的城堡，如康威城（Conwy）、哈莱克城（Harlech）这些毫发无损的建筑要“有情”得多。彭南特把康威城、哈莱克城叫作“吾人降服的伟岸之徽章”。抒情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在1757年写过一首《吟游诗人》（*The Bard*），写的是金雀花国王爱德华一世率军在威尔士北部斯诺多尼亚（Snowdonian）山坡上行进，突然遇到了一位劫后幸存的吟游诗人。诗人对侵略者发出了愤怒的诅咒，最后从山巅一头扎进了深谷的滚滚波涛。如今，受彭南特等人影响，很多寻找刺激的游客，带着格雷的《吟游诗人》册子，造访了斯诺多尼亚

地区，一边背诵诗中主角最后对侵略者国王的诅咒，一边向着深谷俯瞰；一想到诗人以不屈的姿势，跳入深谷自尽，就感到不寒而栗。游客们若是幸运，还可能受到沃特金·威廉斯·韦恩爵士（Sir Watkin Williams Wynn）一类人的邀请，来到威尔士登比郡（Denbighshire）的怀恩斯泰（Wynnstay），光临爵士自己的乡村活动基地，参加威尔士艺术节（eisteddfod）。艺术节期间，会有合唱队，以及年迈的竖琴家，如约翰·帕里（John Parry）等人登台演出，演唱祖先的歌谣。倘若竖琴家是盲人就更好了。从18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伦敦有一群威尔士人聚在一起，自称“赛摩多里昂人”（Cymmrodorion），时常在酒馆碰面。在享用浓烈麦芽酒的间歇，这些人会孜孜不倦地抄写、出版威尔士的史诗与歌谣，免得这些作品坠入遗忘的国度。

崇尚原始不列颠的浪漫主义者，不论到哪里，都相信那里曾有过用“高贵”来打破“教化之平衡”的恶行，这些恶行必须当作教训来记取。在英国最古老的山河中心——距离腐化的风尚最远之处，这山河曾让著名园林设计师“万能”布朗［‘Capability’Brown，真名兰斯洛特·布朗（Lancelot Brown），设计风格尽量模仿自然］噩梦缠身；而今，这里又将出现一些真实不虚的当代奇迹。1746年，有一位建筑师，名叫威廉·爱德华兹（William Edwards），想要在塔夫河（Taff）上修建一座单孔石桥，全长140英尺。爱德华兹失败了两次，终于在1755年成功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建成的，而且石桥保存了很久。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有很多人写诗作文，称颂庞特浦里德（Pontypridd），说此地可与意大利威尼斯的里亚尔托（Rialto）相比，说它是“一处纪念碑，纪念着强力而自然的往日，是古代不列颠勇敢的尝试”。

威廉·爱德华兹本人，就是这古老又现代的不列颠的模范——既在残酷的世界中幸存下来，又是英国本土的“天才”（genius）。如今，“genius”一词既有古老意义，也有现代意义；既代表扎根于某地的人，也代表拥有极高技巧的人。天才一出，就必然会有英国人尽力去探索祖国的原始河山，正是这片河山当年保护、庇荫了英国的天性与本质。为此，英国人首先必须放下傲慢的架子，下马步行。只有靴子直接碰触不列颠的土地，浪漫主义的游客们才能显示出渗入骨髓的忠贞，感受那深刻而原始的含义。想做爱国者，必先做步行者。

当然，这时尚的风景区，也鼓励了这片土地的主人和家人，沿着蜿蜒的小路散步，要么路旁是弯弯曲曲的池塘，要么尽头是一座意大利风格的亭子；他们一边走，一边想着，走到亭子的时候，应当已陷入了一种诗性的沉思——这种状态，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奥维德（Ovid），以及英国诗人蒲柏（Pope）都提到过。但这种新式的徒步，不仅体力上要求精进，还要求道德甚至政治的意义。拿起一根长途跋涉的手杖，离开公

园，就是一种自我宣言。英国最有名的浪漫主义探险家，外号“行路者”的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曾在东印度公司从业20年，写书，服兵役，还担任印度土邦主的宰相。1783年，他离开了印度，不仅从地理概念上，也从思想上与帝国做了告别。他似乎成了一名印度–苏格兰的漫游苦行僧，一位“神圣的行路人”，穿过南亚次大陆，穿过阿拉伯沙漠，最终穿过法国、西班牙回到了英国。后来，他又重新启程，先去维也纳，后去了美国、加拿大。“行路者”变得小有名气，每次浪漫主义游客的晚餐会上他必然出现；他一去圣詹姆士公园（St James’s Park），就会被人认出来。有位作家，名叫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认识斯图尔特，对长途旅行的深刻意义也毫不怀疑。昆西估计，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一定走过了185,000英里，虽然这个数字有些可疑；但他算出这个数字，目的在于宣传这位诗人的道德凭证——说明诗人对普通人、普通的场所，有多么熟悉。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危机到了顶点，正值激进的雅各宾派掌权，开始了恐怖统治时期。英国有一个穷困的绸缎商的儿子，名叫约翰·塞沃尔（John Thelwall），成了一名激进的宣传家、雄辩家。塞沃尔在伦敦和肯特郡走了一遭，出版了一篇奇怪的记叙文章，诗歌体和散文体并用，名叫《逍遥学派》（*The Peripatetic*，1793），是关于“贫苦者和伟大者”的见闻，当然这见闻是以脚痛为代价的。

当时，还有许多人，很不习惯看到“有品位的人”参加徒步旅行。直到1792年，才出现了第一本专门为“漫步者”写的湖区导览。这本书既包括了各条徒步路线的信息，也传递了一种革命性的观点：游客穿越的这片风景，是一种国民共通的财富，而非乞丐和劫匪的渊薮。又过了大约十年，有一位德国牧师，名叫卡尔·莫里茨（Karl Moritz），徒步走过了英格兰南部和中部地区。迎接他的，始终是当地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莫里茨留宿在里士满（Richmond）的时候，房屋主人听说他决心要徒步走到牛津（Oxford）去，“还要走得更远”，便“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惊奇”；6月，有一天，莫里茨走累了，坐到路边树篱的阴影中，打开英国文豪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书，看了起来。他回忆道：“那些骑马、驾车从我身边经过的人，都震惊地看着我，做出很多显而易见的姿态，好像觉得我脑子发疯一般。”在牛津的米特雷（Mitre），房东一家人检查了莫里茨，确定他穿着干净的亚麻衣服，符合绅士的身份；但听说他决心徒步旅行，却困惑不已。房东一家承认，莫里茨倘若没有一些友好的朋友同行，他们绝不允许莫里茨跨过门槛，因为“只要徒步走过这么远的路程，无论是谁，都会被众人鄙视的；因为此人要么是乞丐，要么是流浪汉，要么……是恶棍”。

当时，全英国都在疯狂地追求速度，英国人都骑着马、驾着马车，在收费公路上疾驰。而莫里茨，就以一名纯朴的外国人的身份，现身在了这样的英国。但他也明白，即使徒步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也使得他公开而坚决地漠视社会等级，并因这种漠视而欣慰。徒步让他直接接触了英

国的民族精华——有一名清扫烟囱的女工；还有一名哲学马具商，马具商居然能背诵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的作品——他们是“路上的学术机构”。此外，徒步还让旅行家展现出了一种新人的姿态——有情之人。同年，也就是1782年，莫里茨终于拿到了一本书，法国政治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忏悔录》（*Confessions*,1782）；这本书很快便成了沉思徒步者的“圣经”。这本书还有一个附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收录了10篇探讨文章，每篇文章都用一次散步的形式表现。

卢梭看来，只要散步，就总是能远离某种事物，同时接近某种事物。卢梭的代表作《忏悔录》，多亏了卢梭的英国朋友兼崇拜者布鲁克·布思比（Brooke Boothby）协助奔走，方才与公众见面。《忏悔录》中写道，卢梭有一次从巴黎步行去樊尚市（Vincennes）看望好友——作家兼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其间有了一次决定性的领悟。卢梭离开城市，行至途中某地，突然想到，整个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完全是上下颠倒。一直以来，卢梭接受的教育，都让他认为，“人类的进步”就是从自然到文明的旅程；但这种转变实际上却成了一种可怕的堕落。自然要求的是平等，而文化却制造不平等。因此，自由和幸福，并非用文化取代自然，而是正好相反。城市用时尚、商业、智谋的铁腕，迫使所有人按一定规矩行事。可以说，城市就是一张邪恶的网，充满了罪恶的伪君子、掠夺者。城市令人成为奴隶，而乡村却令人自由，只要这乡村不被城市的罪恶感染；城市令居民饱受污染，罹患疾病，而乡村却为居民涤荡身心，增添活力。教育的目的，不是用文明的艺术、礼节筑成围栏，驯服儿童的自然天性，而是恰好相反：尽可能长久地保存这些天性的纯洁、质朴、率直、简单。因此至少在12岁之前，不要给孩子看书，而要让他们在田野中奔跑，在树下听故事，在大自然中尽量多走一走。

1766年冬，卢梭在伦敦短暂停留了一阵，但这次做客，因为之前的那些理念，而使得客人和主人都同样尴尬。卢梭来到英国，是受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盛情邀请，但主要原因则有二：一是卢梭已经从“疯人院”逃了出来；二是他听说乡村是自由的圣地。当初法国奉行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的时候，曾有刽子手公开焚烧卢梭的书。在卢梭的老家——奉行新教加尔文教派的瑞士日内瓦，他的待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因为他草率地决定，与本地的寡头政治家公开决裂，为此惹怒了当局。曾经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卢梭跟情人泰蕾兹·雷瓦索（Thérèse Levasseur）一起，找到了一个闲适的居处，在瑞士比尔市（Bienne）圣皮埃尔岛（St Pierre）上。卢梭经常出门散步，一路上研究植物；也经常划船。有一个归入英国籍的瑞士人，名叫鲁道夫·沃特拉韦尔（Rodolphe Vautravers），为卢梭提供了最新的避难所。但政府的手臂却伸得很长，伯尔尼主教（Bishop of Bern）发布的反宗教禁止令还是追上了卢梭。最

后，卢梭接受了休谟的邀请，跟休谟一起渡过了英吉利海峡。

这次旅程让卢梭十分难受。卢梭到了多佛尔（Dover）时，还受着晕船的折磨，而且又湿又冷，直掉眼泪。在伦敦，休谟想要把卢梭介绍给一帮同心同德的朋友，其中包括名演员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这些“有远见的有情男女”（Prospective Men and Women of Feeling）排队欢迎卢梭，热情地表达对他的敬仰，含着热泪表示同情和安慰，低调地为他喝彩。此时卢梭已经放下了精神防备，接受了这些人的盛情，还穿起了束腰外衣，戴着皮帽，模仿“亚美尼亚”农民的行头。然而，卢梭却天生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善于排斥那些对他有好意的人。这种本领立刻就表现出来了。大卫·休谟想要把卢梭推荐给英王乔治三世，让卢梭拿一份年金。卢梭却疑神疑鬼，觉得这是阴谋。休谟又想请卢梭到伦敦特鲁里街（Drury Lane）皇家歌剧院去见国王，却知道卢梭会找借口说，要照顾自己的狗“素丹”（Sultan），不能去。为了避免这种局面，休谟将狗锁在公寓里屋，他跟卢梭待在外屋，一定要请卢梭看戏。休谟本以为，让卢梭适当出一点儿名，并不算什么恶意的企图；卢梭却不吃这敬酒，以为这也是圈套，要让自己被奴役、受嘲讽。当时，还有一个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冒充普鲁士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给卢梭写了一封信，假装邀请卢梭去普鲁士。卢梭竟然以为这信是休谟写的，于是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公开争吵。休谟自己也悲伤地发现，这位贵客大概有点发疯了。

卢梭狂热地认定，逃到乡村去，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有人给他在威尔士找了一栋房子——还能在什么别的地方呢？但是，租房的事宜却耽搁了一阵。卢梭对各位主人本来已经大起疑心，这下子更加恶化了。于是他转而接受了一个慈善家理查德·达文波特（Richard Davenport）的邀请，达文波特把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伍顿村自己的乡间住宅腾了出来，这里挨着德比郡（Derbyshire）的边界，也就是紧挨着英格兰最美丽的风景之一。卢梭穿着那身“亚美尼亚”行头，走过多夫代尔（Dovedale）。当地人后来是这么回忆的：“老‘啰唆’[注]戴着那么个滑稽帽子，穿着又长又重的袍子，到处走来走去，采他那点儿草药。”有时候，卢梭也让人请他去凯威克修道院（Calwich Abbey），跟一群当地的崇拜者和弟子见面，其中就有布鲁克·布思比。这些人已经开始自称“有情男女”（Men and Women of Feeling）；后来，作家亨利·麦肯奇（Henry Mackenzie）1771年出版了一本小说——《有情男人》（*A Man of Feeling*），当年畅销一时。

不消说，没有多久，卢梭的疑心病就又发作了。卢梭本来就几乎听不懂英语，特别是听不懂当地仆人说的英语方言，于是相信仆人都在说情人泰蕾兹的坏话，还要往二人的饭食里掺煤渣。1767年春，卢梭回到了法国。但

他那“有情之人”的小团体已经在英格兰乡间，那叹息悲戚的贫穷社会阶层当中扎下了根。仅仅10年之后，卢梭的疯狂就被人忘掉了，他在英国的逗留，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有崇高和敬意，宛如使徒的传教任务一般。如同“德比郡启示”（Derbyshire Enlightenment）一般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激进政治和培养“有情”的混合。布鲁克·布思比和博物学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在小镇——利奇菲尔德（Lichfield）建立了一个植物学研究会。这两位杰出人物所在的圈子，其核心是一位诗人、散文家安娜·西沃德（Anna Seward），她在主教宫殿自己的住所举办一个沙龙。此外，与卢梭自己不一样，利奇菲尔德这个圈子，并不排斥将“科学引起的愉快”和“对自然的崇拜”混合起来。在德比郡，这个圈子似乎取得了二者的精华，因为德比郡的一座座山峰，既能让旅人在高地上欣赏壮丽的奇景，到深深的洞窟中探险，又能提供埋在地下的煤和铁，让人开采。这个郡，“有趣而神秘”的名声太大，乃至1779年，特鲁里街皇家歌剧院竟然毫不尴尬地上演了一出戏剧，名字就叫“德比郡的奇迹”（The Wonders of Derbyshire）。全剧布景一共21种，由景观画家菲利普·德·卢戴尔布格（Philippe de Loutherbourg）绘制，内容包括瀑布，马恩和马特洛克的巨石阵（Marn and Matlock Tors），卡尔斯顿村（Castleton）的洞穴，既有内部也有外部；还有一个“山峰的精灵”（Genius of the Peaks），用机械装置，从“深深的居处”托起来，负责把赏金发给本地居民。

与此类似，德比郡最有盛名的艺术家——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也同样在家乡，画着马特洛克周围山峰的悬崖和峡谷；在克罗姆福德（Cromford）的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磨坊画画，好像那磨坊是一座灯火通明的浪漫宫殿。也正是阿克赖特，在画布上塑造了“英国乡绅”布鲁克·布思比被人改造成“有情男人”的正式形象。这种新形象，并非画家庚斯博罗（Gainsborough）笔下那种傲慢的世袭地主，而是用詹姆士一世时期诗人那种沉思而深刻的笔法，融入了一片青翠的草木中。布思比一身打扮，堪称精心策划的新兴“随意风格”的广告：外穿双排扣长礼服，里面是短背心，扣子敞开，用来更好地展露自己“透明的真诚之心”；原先的丝绸领带换成了朴素的薄棉布领带。老一辈的绅士，可能会手拿一本《圣经》或者古典名著，来显示自己的美德；而布思比拿的却是（自己）这一代的福音，书脊上只有一个清晰可辨的字：卢梭。这幅油画作于1781年，不仅是一幅肖像画，而且是布思比身份的宣传——他在这个小团体的地位，就好像圣彼得在耶稣门徒中的地位一般。基督教中，圣彼得是天堂的守门人，因此相当于“形象代言人”。因为，布思比拿的那本书肯定是《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Rousseau,Juge de Jean-Jacques*），一本忏悔性质的自传体对话录，是卢梭在居留英国期间写的。五年前，也就是1776年，布思比去过一趟巴黎，亲手从卢梭手中接过了这份手稿。两年后，卢梭去世。他度过最后时光的阿蒙农维拉（Ermenonville）小镇的公园（受卢梭的思想启发而建立），成了崇拜者

朝圣、追思的圣地。布思比竭尽全力要传播卢梭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有情之人教会”的信徒们，都有一项自己赋予的使命。这使命，有一部分是“通过沉思的散步，将自己转化为全新的英国人，同情同胞的苦难，并能设计出各种精巧的办法，让同胞脱离苦海”。使命更重要的部分，则是通过文学、教育、慈善事业，还有以身作则，来养育一代新人，不受虚浮社会的残忍、腐败影响。他们将在现代的“阿尔比恩”（英国）中，重新创造古代不列颠人的纯洁品质。他们看到，这种品质，在乱世丛生的西部、北部依然保存得完好，尽管居民过着贫苦不堪的生活。实际上，在受过教育的城里人看来，这些贫苦社群最为鄙陋的一面——风吹雨打之下的恶劣生活，却正是未来一代需要逐渐灌输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让不列颠免受堕落的命运。信徒的目标，乃是在儿童长成大人的过程中，尽力保存这种原生态的自由、爱玩的天性、自然之子的真诚，不论这目标在表面上看来多么自相矛盾、不切实际。著名诗人华兹华斯认为，孩子应当是“大人的父亲”。信徒们若是成功了，就能创造出第一代真正自由的同胞，生于自然，也长于自然。

利奇菲尔德还有另外一个卢梭主义者（Lichfield Rousseauites）——托马斯·戴（Thomas Day），以上正是戴先生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他的任务是为英国更加纯洁的一代新人同时担起“父亲”和“教师”的责任，让新人尊敬自然的一切要素，因为戴先生此前已经当了一名生态学家，尽管生态学这门科学当时还没有成形；他相信，上帝创造的一切生命都有着内在联系，因此奉行素食主义，而且强烈反对斗鸡、纵狗咬牛等一些当时流行的娱乐活动。他相信，动物和人类一样，只要通过善良的手段加以调整，就能过上温馨而快乐的生活。他有个朋友，是个律师。一次，律师语带嘲讽地问他：“你是否想要用一视同仁的关心，来对待所有动物，包括蜘蛛？你为什么不想杀掉这些蜘蛛呢？”戴先生回答：“我不会这么想，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权利。假如有一个神灵对伙伴说：‘把那个律师杀掉！’你会有什么反应？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律师比蜘蛛还要可恶呢。”

戴先生想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完美的家庭，1769年，他亲自挑选了两个小女孩，作为将来的妻子、母亲的角色，其方式很像从一窝小狗当中挑选宠物。戴先生致力于按照卢梭的方式养育两个姑娘，养大了就挑一个比较合适的结婚，与此同时，资助另外一个去当学徒。他从英格兰西部萨洛普郡的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市孤儿院，挑了一个12岁的金发小姑娘，给她改名萨布丽娜（Sabrina），拉丁语意为“平静、耐心”；又从伦敦弃儿医院（London Foundling Hospital）挑了一个黑发小姑娘，给这个“童养媳”起名卢克丽霞（Lucretia）。这是古罗马一个贞洁妇女的名字，但这个古人最后却自杀了，戴先生显然忽略了这一点。这实验当然没有朝着计划

的方向发展，对此，除了戴先生自己，没有一个人觉得吃惊。戴先生担心，成年男子当了两个小女孩的教父，可能会引发人们疑心，让他名誉受损，于是急急忙忙把姑娘们送到了法国。两个小孩在法国，好像两只小野猫一样大打出手，也跟戴先生这个人生导师冲突不断；哪怕戴先生在孩子们出天花期间悉心照料，还在罗讷河（Rhône）一次船难中救了她们两条命，情况也没有好转。戴先生骂养女卢克丽霞“愚蠢天下无敌”，把她带回了英格兰，又按照先前的约定，送给一个女帽制造商当了学徒；萨布丽娜则送到利奇菲尔德，屡次被戴先生用来做实验，这些实验经常很残忍——比如把滚烫的蜡油倒在她胳膊上，用来测试她对痛苦的忍耐力；还有枪支装上空包弹，在她脑袋近旁打响。最后，戴先生终于绝望了，认定她永远不可能变成自己的梦中伴侣，只好把她送进了寄宿学校，萨布丽娜为此感激不尽。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大律师。

戴先生盛赞卢梭是“人类之第一人”，也相信自己完全了解卢梭的感受，因为他自己跟卢梭一样，受到过时尚界的鄙视。戴先生的出身也跟人生导师卢梭一样毫不显赫，生于小康之家，父亲是个收税员。然而，1770年，戴先生想要取悦一个陆军少校的女儿，努力毫无成效，大受打击。为了增进机会，他启程去了法国，想要彻底改变一番，请来了一群舞蹈教练、剑术教师、裁缝，用精致的假发打扮自己，甚至忍受了一种机械装置的折磨，用来矫正自己的膝外翻腿。但一切还是效果全无。那个戴先生想要取悦的姑娘，看了看这个努力改进的戴先生，笑得反倒比以前更厉害了。戴先生再次被拒，十分受伤，也就不理睬这些自己曾经关注的人了。“我这颗熊熊燃烧的跳动的真诚的心，他们知道些什么？！”戴先生终于找到了一名女继承人，当作合适的结婚对象，却又逼迫她接受卢梭的价值观，以缓和自己社会良心的折磨：他不让新建立的家庭拥有仆人，也不买大键琴（注），因为他觉得，“穷人还缺少面包的时候”，沉迷在这种奢侈当中是一种邪恶的行为。

不过，所有这些荒唐事和灾难，都没有能阻止戴先生发挥自己关于童年的才智，写下三卷本的小说《桑福德与默顿》（*The History of Sandford and Merton*，1783）。这本书可谓一部“自然教学”理念的长篇预言，在英国的地位，就如同卢梭的《爱弥儿》（*Emile*）一般。书里叙述了两个孩子的冲突：一个叫托米·默顿（Tommy Merton），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霸王；另一个叫哈里·桑福德（Harry Sandford），性格要更加安静，是“乡村美德”的缩影。桑福德发现自己伤害了一只金龟子，就会大哭。《桑福德与默顿》现在被人遗忘了，只有在大学研讨班专门研究这部感伤小说的时候才会提起。不过，当时这套书却轰动一时。自从1783年第一部初版以来，小说重印了45次。只要年轻父母想体会如何用“自然童年”战胜“不自然童年”，这本书就是他们的必读之物。戴先生自己不寻常的一生，在1789年9月也突然终结了。他有一种对待宠物的理论，认为可以用温柔而不是强力

去驯服马匹，于是做了一次实验。他骑了一匹没有驯服的小公马，公马没有回应他温柔的触碰，反倒让戴先生头朝下栽到了地上，不幸身亡，享年42岁。

戴先生实验最大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跟他说过——道德方面的调节，作用毕竟是有限的。或许，戴先生遇上萨布丽娜和卢克丽霞的时候，两个小姑娘的天性已经破坏了，这种破坏过程，是从母乳的污染开始的。当年卢梭还提出过一个公理：善良始于哺乳，乳汁提供的不仅是生理上的必需品，还有道德上的必需品。最损害儿童自然天性的做法，是把儿童送给乳母喂奶，而乳母哺育孩子只是一种生意。当时，普通人家的婴儿，送给农村妇女抚养的，有数以千计的死亡，这本来不足为奇。那些追求风尚的母亲，经济条件比较好，能给孩子提供高水平的照料，却也不知道，母乳当中究竟有些什么物质，一起喂给了孩子。谁也不知道，多少纯真的婴儿已经因母乳喂养而受到了毒害、腐化，失掉了自然的天性；那些妇女的乳汁里，染上了嗜酒的恶习，以及性病。当时的感伤小说里，母乳喂养被人说成是一种阴谋，特别是那些主张“男人和女人都能意识到自然天性的原始力量，以此获得救赎”的小说。一些男人倘若觉得，乳头带有挑逗和淫荡的意味，那么只要看到喂奶的举动，就可以“转化”过来。作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也有一部长篇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里面有一个邪恶的妻子，代表那些炫耀暴露服装的女人；她们若是能够亲自喂奶，便也能宣扬这种“改恶从善”了。“从来没有哪个男人这么狂喜过！”妻子叙述道，“他匍匐在我脚边，把我和小坏蛋（孩子）一齐拥入怀中。”妻子说：“你这野人！你想要把我的哈丽雅特闷死吗？”他说：“我最亲爱的、最亲爱的、最亲爱的G夫人……我从来、从来、从来没见过这么幸福的景象啊！”

倘若新生婴儿通过母乳，其生命已经有了一个极为健康的开始，那么下一步，明智父母的任务，就是确保孩子的自然天性，不被“父母的管束”或者“死记硬背”永久毁坏。这以前，道德读物给“动物精神”下的定义，是一种非基督教的、魔鬼一般的兽性。小孩子的身体柔软而善于接受各种影响，是撒旦最喜欢的“运动场”；而动物精神就是撒旦在运动场中嬉戏的表现。父母想要拯救后代的灵魂，头一项任务，就是把这种魔性从孩子身体中敲打出来；如果必要，还必须真正去“敲打”。然而，倘若动物与人之间的联系，像托马斯·戴一类人所说，是良性而非恶性，而且孩子那些同小猫小狗相类似的行为，表示的是纯洁，而非内在邪恶，那么就应当尽力保护、培养孩子玩耍的举动，这种举动是“学习”最温柔的路径；哪怕在老一辈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有时会显得反社会，那也要这样做。

现实中，提倡这种理念，造就了一代过度敏感而又不敢狠心打孩子的父母。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呼吁家长向自己学习，“永远不要与儿童抵触，要

听之任之，让他们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做的，为此而声名狼藉。就连霍兰勋爵（Lord Holland）——亨利·福克斯（Henry Fox）这样强硬的父亲，也对这些崇尚玩耍的人妥协了。福克斯在辉格党（Whig）政府中担任财政部的主计长，他是听了妻子卡洛琳·伦诺克斯夫人（Lady Caroline Lennox）灌输的一堆卢梭理论，才这么做的。福克斯家族成了“纵容孩子感性”的代表，虽然还说不上是对孩子感性的“顶礼膜拜”。福克斯的儿子，查尔斯·詹姆士（Charles James）是未来的辉格党领袖。小时候，有一次他把一块崭新的手表扔到了地上。无助的爸爸只是挤出一个痛苦的笑容，喃喃说道：“你要是非这样不可，我猜，你就只能这样了吧？”孩子头发的长度，也是经常引发两代人冲突的问题。有一次，福克斯相当于恳求长子斯蒂芬（Stephen）：“你给了我希望，让我觉得，我要是想让你剪头发，你就会剪的……亲爱的斯蒂芬，你如果剪了头发，我会非常感激！”

尽管还有很多书依然坚持，对小孩子要严格管教，而不是单单把规矩告知他们，这时却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作品，既供别人给孩子朗读，也供孩子自己阅读；这些书都是劝善惩恶的寓言故事，配有生动的插图，告诉孩子，走的道路正确或错误，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有一位天才童书出版商，名叫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y），他出版了《玛杰里夫人的故事》（*Dame Margery*）；玛杰里还有一个名字叫“古迪”（Goody），意思是“好人”。纽伯里还擅长出版一些六便士一本的绘本，强调寓教于乐和实用的学习。纽伯里最畅销的书，也是第一本儿童的科普书，名叫《望远镜汤姆》（*Tom Telescope*，1761）。这本书是一切“自己做实验”读物的先驱，力图让一切种类的知识，不论历史、地理还是机械，既有趣，也“有用”。

纽伯里有很多插画家，组成了一支大军。其中一人，并没有福气见到卢梭本人，却正好体验过这种期望培养高尚的不列颠爱国者的“自然教育”。此人名叫托马斯·比威克（Thomas Bewick），1753年生于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欧宁汉（Oringham）教区的切利伯恩农舍（Cherryburn House）。父亲是农场主，自己也在农场上开煤矿。比威克一家都是北方农村的自耕农，身体健壮，日子不好不坏，但这一家人，始终都与那些崇拜卢梭的德比郡贵族，在地理上相距甚远。尽管如此，比威克在19世纪20年代充满深情的回忆录中还是写道：小时候自己被姑妈汉娜（Hannah）宠坏了。她“把我变成了一只大‘宠物’，谁也不许‘冷落’（当初用的就是这个词）我，让我为所欲为；而这样的结果就是，我经常被开水烫着，被火烧着”。米克利岸（Mickley Bank）的煤矿附近，有一所米克利学校。托马斯父母把他委托给了校长。校长的天性可一点儿也不温和，从校长使用鞭子的“热情”程度来看，他显然一点儿也没有时间从事当时的“新式教育”。校长最喜欢的惩罚措施，叫作“搂一块儿”，让他骑在一

个“胖男孩”背上，模样很像一只交配的青蛙，屁股还要露出来等着挨揍。托马斯一被人放上去，就咬那个胖男孩的脖子。托马斯回忆说，校长揪住他的时候，“我拼命反抗，用我那双有铁环的木底鞋，踢折了他的胫骨，然后跑掉了”。

比威克没有因反抗而甘愿挨罚，而是火上浇油，干脆旷起课来。“每一天我都旷课，在一条小溪里筑堤坝，玩小船来取乐”，还跟“更驯服的校友们”一起回家。于是，“自然学校”就成了比威克真正的老师。20年之后，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在奔宁山脉（Pennines）另一边度过的童年，也与之类似。哪怕比威克最后被迫学了分数、小数、拉丁语，他还是设法逃脱了这些令人枯燥的学业，方法是把演算石板、课本等一切能找到的表面都画上图画；没有地方了，他就用粉笔去画家中的石头地砖、墓碑，乃至教堂走廊的地板。比威克贪婪地盯着各处的图案，特别是那些酒店的招牌，用俗气的笔法画着牛、马、鲑鱼。只要稍有眼光，都不难看出，托马斯是一个过早发育的天才。他把村子每一家的地板都用粉笔画了个遍之后，总算有个朋友给他买了钢笔、墨水、黑莓汁、骆驼毛笔，外加颜料。全英国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兼插画师，职业生涯就这么开始了。比威克也堪称英国的奥杜邦(注)。他画了当地的树林、沼地及里面栖息的鸟兽，还因为画了狩猎的场景而得到了不多的报酬。他邻居房子的墙上，每只猎犬都得到了“忠实而详尽的描绘”。

比威克童年有两个关键时刻，留下了特别鲜明的记忆；正是这两个时刻，把他从坚强而单纯的典型北方小伙子，变成了对上帝造物深感同情，为此还非常痛苦的人。第一个时刻，是他碰巧抓住了一只野兔，那时这野兔正被猎犬追赶。尽管他写道，他脑子里从未有哪怕一刻想到过，狩猎有什么不对，或是有什么残忍之处，但他站在那里，将这颤抖不停的温暖动物抱在怀中时，当“这可怜的、惊恐的生灵有如孩子一般哀叫起来……我愿付出一切，来拯救它的生命”。有个农民过来，让比威克把野兔给他。比威克照办了，结果农民却为了取乐，弄断了野兔一条腿，又把野兔放走了，让它一瘸一拐地奔跑，只为了让猎犬也同样取乐。比威克回忆道：“从那天开始，我一直盼望，那受人伤害的、无辜的可怜生物，能够逃走。”比威克毕竟是土生土长的英国农村孩子，不至于反对一切狩猎行为，特别是有些情况下，他觉得动物很可能不会轻易让猎人和鬣狗得逞。比如，獾就会非常凶猛地回击。不过，比威克还是憎恶那些不必要的残忍。第二个时刻，是有一次他扔石头从树上打下了一只红腹灰雀。他回忆道，自己把鸟儿捧在手中，鸟儿就“直直地、哀怨地看着我。我想，倘若鸟儿也能说话，一定会问我，为什么要剥夺它的生命”。比威克再次忍受了一回良心的折磨，盯着鸟儿的羽毛，把它翻来覆去。他写道：“那是我杀掉的最后一只鸟儿。”但他又加了一句，大概说的是那些他画美丽插图用来参照的鸟类标本：有很多鸟儿“确实是因为我的缘故才被杀的”。

比威克绝对不是感伤主义者。他观察动物王国成员的习性、栖息地，特别是剑拔弩张、熙熙攘攘的昆虫世界。比威克早在20世纪的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埃德蒙·O.威尔逊（Edmund O.Wilson）两个世纪之前，就在艾尔崔格汉姆（Eltringham）附近的小船山（Boat Hill）上观察到了蚂蚁的殖民地。蚂蚁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团体，“其忙碌拥挤，就如同人群去往或者离开繁忙集市一般”。而且，团体组织得极好，哪怕被棍子干扰，也会继续重新组队，继续忙忙碌碌。

这种社会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在比威克漫长的一生当中，一直是他最突出的品质之一。在他小时候，也使得他被普通人所吸引。这些普通人，拥有对周遭世界和运行规律的丰富常识，而且往往十分渊博，令人惊讶。其中有一名老矿工，就在比威克家族的矿上。之前煤矿出了事故，老矿工救了一名同事。老人坐在石凳上，给小托马斯讲解夜空中的各个星座。还有一个邻居，名叫安东尼·里德尔（Anthony Liddell）。比威克在回忆录中给他起名“乡村的汉普登”（Hampden），此人是乡村务实干练的自由民的代表。里德尔能背诵公元1世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斯（Josephus）的作品，还记得很多别的掌故。里德尔的穿着，好似一个野人：上穿男式紧身短上衣，“是什么动物的皮做成的”，下穿一条老式的鹿皮短裤。他口才很好，性格倔强，脾气火暴，这些特点，在谈到“自由”和“财产”，尤其是鸟类和鱼类，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坚持说，鸟和鱼都是上帝赐给大众的，所以他有权自由地偷猎；对他而言，“他在监狱里过得比家里更好，所以监狱没有什么可怕”。但还有一个父亲手下的矿工，名叫约翰尼·查普曼（Johnny Chapman），他认为，站在齐腰深的冰冷污水中劳作，“也没有什么艰苦的”。比威克心目中，查普曼就是劳工阶级理想的坚强英雄。查普曼吃的是牛奶、面包、土豆、燕麦；兴致上来，会在乡间原野散步，或者走到纽卡斯尔（Newcastle）去喝麦芽酒；他会用浓重的泰恩赛德口音（Geordie dialect）为别人唱歌，讲笑话，讲故事，换取在外留宿。然而，查普曼又老又病的时候，各个教区都不愿收纳这纯朴的老人，因为都想推卸救济穷人的责任。结果查普曼只得打零工糊口，最后“有人发现他死在了莫佩斯市（Morpeth）和纽卡斯尔之间的路上”。

比威克回忆童年，想到的就是这些场面，还有他在诺森伯兰郡的露天游乐场；比威克的鸟类、动物著作的开头和结尾，不时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木刻小插图，描绘了这些充满沙砾，黑乎乎、细节清晰的场景。比威克在鸻鸟和连雀之间，借着道德小故事的伪装，偷偷展现了一幅乡村世界的全景图卷——当时，帕拉迪奥（Palladian）风格的乡村别墅墙上，有不少经过美化粉饰的农夫、樵夫、牧羊人的形象。著名绘画世家——庚斯博罗家族（Gainsboroughs）的作品，充满了这些事物。而真实图卷的模样，与这些形象却相差甚远。比威克笔下的农村人，并不穿着破旧而动人的、田园牧歌一般的服装，他们臂弯中的婴儿，也并不都是脸如苹果，带着酒窝。

《英国鸟类史》（*History of British Birds*，1804）第一卷的序言末尾，有个穿着入时的乡村绅士，带着一把枪，给一个年迈的流浪汉指路，指向路上的一个方向。流浪汉靠着石墙缩成一团，想要避开诺森伯兰的寒风。绅士并没有指出真正有用的方向。黑琴鸡与红松鸡之间，有一群男人古怪地围成一个圈，背对着读者在看斗鸡，看着公鸡彼此撕成碎片。琵鹭与鹤的绘画之间，有个饥饿的老兵带着一条木腿，啃着一块骨头，旁边有一只同样饥饿的狗正在看他。老兵头上，勉强能看到一栋豪华的乡村别墅。比威克笔下的农村人，在路边砸石头，在破败的阁楼里喝粥，在路旁上吊自杀。这些人，记录了一种新的英国政治——当时的人称为“社会情感”（social affection），我们则称为同情心（sympathy）。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就慈善事业发表过一篇论述文章，以《圣经》中扶贫济困的“仁慈的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为背景。他说：“我们天性中有一种东西，让我们参与人类遭遇的一切祸事。”比威克无论走到哪里，都对18世纪英国穷人遭遇的很多“祸事”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比如，在穿越高地（Highlands）的时候，与大多数感伤主义的游客不一样，比威克马上就发现，连绵曲折的壮丽景色、空旷的高地，虽使得浪漫主义的漫步者喜悦非常，实则是大量小农场佃农被清理的结果；反映的是英国的总体转变——起初英国关心的是一户户人家，如今却关心羊群。

尽管，官方经典的自然史画册，与比威克的小插图完全不同（例如托马斯·彭南特的动物学，就十分细心地把内容限定在鸟兽的分类上），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快乐不列颠”的陈腐图画，一般画的是乡绅和家人在大大充实的财产之前，或散步，或休息。但还是经常有其他的图景出现，显示的事物，恰在这种陈腐图画之外，而且清晰得令人惊讶。比如1769年，就有一位退休的军官，名叫菲利普·西尼克斯（Philip Thicknesse）。他怀着不安的良心，写了一份可怕的材料，配上了一幅同样可怕的绘画——达茨沃斯救济院发现饿殍四人（*Four Persons Found Starved to Death,at Datchworth*）。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当时人称首都周围的“家乡界”（Home Circuits），按说这里是不应该发生这种事的。

然而，比起比威克的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来，南方，特别是穷困潦倒的英格兰西南部，大概还有同样多的贫困人口，就像这些达茨沃斯的牺牲品。因为，“农村发展”运动的社会结果，在英格兰南部表现得分外明显，特别是18世纪60年代那些荒年；这段时间，小麦连年歉收，价格飞涨，从伦敦到德比郡的大小城镇爆发了一系列“粮食暴动”。北方各郡主要吃的是燕麦，这时的情况稍微缓和一些。但也有很多人支持快速现代化的农村经济，比如英国农业经济学家阿瑟·杨格（Arthur Young），他在1769年发表了《英格兰与威尔士南部各郡六星期游记》（*Six Weeks Tour through the Southern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认为在18世纪最糟

糕的年景之后，绝无任何谢罪的必要："你不论将眼睛转到哪一边，都只会见到大量财富，以及更大量的资源，再无其他。"先前，英格兰真正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他经常用这个词——并非通过演讲、国会法案获得，除非演讲和法案碰巧是关于圈地的；而是通过芜菁甘蓝、谷物条播机、红豆草获得的。杨格因粪肥而狂喜，乃至用英语的名词dung（牲畜粪便）创造了一个同形动词"施粪"。约克郡有一个罗金汉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拥有2000英亩土地。杨格对土地的耕作情况做了"大量观察"，十分满意。同样，他能给予的最高赞扬，就是土地"充分施粪"（amply dunged）。他看到"一处堆肥，其他肥料和牲畜粪便混合在一起，腐败程度彻底到可以像黄油一般轻易划开；毫无疑问，这就是全世界最有效力的肥料"。杨格认为，就让那些浪漫主义者在穿越索尔兹伯里平原[注]的时候，自己思考德鲁伊教徒去吧！他能想到的只有太多土地没有圈起来，浪费了，而浪费就是犯罪；这些土地可以加上篱笆，分割成块，好好耕作来赚钱！

杨格认为，听到圈地就矫情、坐立不安，这样只会背离农村历史、经济的最基本事实。圈地，也就是占领公用地[注]，以及户外开阔地[注]的残余，这些土地，之前是大家一起耕作，或者分成条块耕作的；要想充分发挥农田生产力，圈地是一个必要条件。旧法耕作的条块、农田，虽然在诗人笔下渴望，却从来不可能养活缺乏资本及现代农业基本知识的一国农民。尤其是基本知识的缺乏，让杨格分外悔恨。这些基本知识包括：适当的施肥办法，一茬茬作物之间让土地休耕，条播机的使用法，等等。而且，尽管18世纪60年代的圈地行动肯定有所加速，但圈地运动本身则已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此外，新一轮圈地的政策——私人国会法案（private act of parliament），需要一处教区五分之四地主同意。

批评家则指出，这法案却没有提到，圈地也需要数以十万计的小农，还有佃册农（copyholder）的同意，甚至都不跟他们商量。而这些人，却一直凭着小块土地艰难度日，只要同时能够以公用牧场放牧牲畜，就可以过得下去，而现在，他们却变成了拿工资的工人，这是一种退步。杨格坚持说，市场变得繁荣，其实会给农村的穷人创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工作；在新环境之下，处境比过去好得多，过去他们一直想用本身就很贫瘠的土地谋生，根本不会成功。确实有很多人在当地的乡村工厂里找到了工作，当了看店的人，或者新学了钉鞋一类的手艺，但这些行当，有很多新的从业者进来，跟原有的人竞争，于是有些人不得不去找季节性的零活，比如挖水沟，从而让生活变差了。杨格悻悻地抱怨说，约克郡这些男工每天挣三四个先令，却"每周很少工作三天以上，余下的时间就喝酒度日"；还说，这些人的劳动价格大大上涨，工资也高了很多，乃至"冬天的劳工非常无礼，差不多要贿赂他们，才能勉强他们去打谷"。

批评“农村发展”的人，认为最令人难过、愤怒的，倒完全不是圈地运动。这可疑的荣誉，落到了另一种行动之上，那就是“垄断居奇”。原先佃农很多，改革之后变得很少了，其原因往往是“新的”资金闯入了高价、高租金的土地市场。杨格一帮人说，想要粮食产量提高，牲畜质量改善，从而养活迅速增长的英国城市人口，则投资必须满足另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规模经济”。这一点，他们或许没有错。但是，同样的批评家们坚持说，地产经理拼命追求租金最高、利益最大化，带来的恶果，不只是大批乡村人口涌入城市（英国、美国都是如此），还包括旧日生活方式的破坏，这种方式建立在公用土地基础之上。18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一本极为畅销的书，10年内再版了5次。书名——茱莉亚·曼德维尔夫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Lady Julia Mandeville*），作者弗朗西丝·布鲁克（Frances Brooke）。这本书里痛斥了一个“T勋爵”，是这么说的：

他着力实施的计划，招来成千上万的人谴责，而且他把自己的地产弄得一片荒凉：农场掌握在不多的几个人手里。至于佃农的儿子们，要么成了这几个头头的奴仆，要么到外国谋生去了。他所在的村子原先规模很大，人口很多，如今只剩下八户左右；荒废的田野上一片死寂；农场的屋子，原先有很多工位，工人们都安居乐业，如今则成了废墟，在其周围腐朽；现在的租客变成了商人和包买主，骄横、懒惰、腐化、粗野，对养活他们的人视而不见。

这些控诉、悲叹，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怀旧行为。那种田园牧歌一般的乌托邦，体贴的牧师、慈祥的乡绅、人道的地方法官，从来没有存在过，除非是为了反对严苛的乡村地产法规而想象出来的反例。这幻想中的昔日乡村，虽然一厢情愿，但并没有阻止那些写诗作文的怀旧者来“口吐莲花”表示抗议，也没有阻止他们给整整一代人施加一种几近催眠的影响，让他们努力回应自己对“社会情感”的呼唤。这些雄辩的诗作当中，最有力的，来自一位多产作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他生于爱尔兰的朗福德郡（County Longford），见多识广，经常手头拮据，困苦不堪。18世纪60年代，他终于名利双收，获准进入了“文学俱乐部”（Literary Club）的精英行列，与乔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约翰逊博士、詹姆士·鲍斯韦尔为伍。哥德史密斯的早期诗歌《旅行者》（*The Traveller*），已经用诗歌的方式控诉了那些为政策辩护的人。辩护者说，既然一切政策都合法，而且正大光明，那么英国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什么错误。《旅行者》是这么说的：

荒唐的法官，人人都制定新的刑罚。

律法碾压着穷人，富人则操纵律法。

1769年，那位菲利普·西尼克斯先生发布赫特福德郡救济院饿殍的可怕景

象之前一年，哥德史密斯出版了长诗《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这是一切哀悼梦幻村庄死去的诗歌当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村庄名叫“温柔的奥本”。

可爱的草地，

你的娱乐飞逝，全部魅力在消退；

看得见暴君之手伸入你的茅舍间，

凋敝颓败使你的青葱渐渐黯淡。

唯一的主宰控制了全部的领域，

你欢笑的平原上半数田园已荒芜。

哥德史密斯的双行体诗，写他在梦境中遨游，遇到一切组成社区的地方和组成社区的人，都停下来看一看。他拜访了“乡村牧师的简朴住房”：

乞丐是他的贵客，

走后他久久念叨，他下垂的长须在衰老的胸前拂飘；

这破落的挥霍者如今不再自尊，

要求当地的亲属供养，已获应允；

这个伤残士兵被好言相慰留下来……

拜访了乡村老师，最重要的，还拜访了小酒馆，这里能喝到“栗色的生啤酒”，但远不只是一家麦芽酒馆而已：

农夫不会再去将它掇弄修葺，

他喜滋滋地忘却了日常忧虑；

农场主和剃头匠不再讲述奇闻；

樵夫的谣曲不再众口传唱流行；

铁匠从此不再舒展黝黑的浓眉，

放松强劲的肌腱，倚身听得入迷；

那宴会的东道主如今不见了踪迹，

不再细心照料，让来客皆大欢喜；

不见忸怩少女半推半就被人抱紧，

她将亲吻过的酒杯递给他人啜饮。

最后，哥德史密斯结束了“奥本”鬼魅世界的孤独之旅，转而再次面对商业化的当代英格兰，正是当代社会营造了这种凄凉：

你们，这些坚持真理的朋友，你们这些政治家，

调查富人的快乐增长，穷人的衰落，

请度量一下“精彩”与“幸福”的国度之间距离究竟会有多么遥远！

骄傲推开波浪，是装满矿石的货船，

“愚蠢”从岸边把他们呼唤；

拥有财富与骄傲的人，凭着很多穷人的供养占据土地；

地上有自己的湖泊，广阔边界的公园，

还有自己的马匹、马车和猎犬；

丝袍慵懒地环住他的四肢，

四邻的庄稼有一半被他抢去。

歌德史密斯控诉的诗篇，不论观点正确与否，确实对18世纪晚期的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首诗影响了比威克这样的爱说教的批评家，也影响了约翰逊博士这样的怀旧托利党人。比威克和约翰逊，都对英格兰地主寡头手里集中的政经权力抱有怀疑态度。终于，“粮食暴动”、军队动员、绞刑处死的混乱年月过去了，乡村的政治机构总算没有毁坏，但乡村对家长式统治的信仰，甚至对贵族政治的道德原则、司法制度的信念也动摇了。只有英王乔治三世，全英国第一个农场主，号称简朴、真诚、直率美德的化身，免受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困扰。18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些意志坚定、口才高超的小册子作家，请愿者，假装虔诚的捣乱分子，掀起了一系

列社会运动。他们谴责的是某些特定的罪恶，总是着重将这些罪恶斥为“违反自然”：有些未婚母亲，之所以生下孩子，往往是被放荡的绅士勾引的结果，这些绅士有年轻的，也有不那么年轻的。结果，这些母亲却被抓去坐牢；未婚妈妈，还有欠债的人、一般的罪犯，服刑的条件都十分恶劣；司法部门对一些轻罪不加分辨地判处死刑；儿童处境十分困苦。这种惨景，往往最能触动一代浪漫主义者的心。而崇尚社会道德的人越来越多，儿童处境也必然激发他们的悲悯之情。这些处境，例如贫苦家庭的新生婴儿，一生下来就送到圣吉尔斯（St Giles）或圣克莱蒙教堂（St Clement Danes）的贫民区，委托给一个乳母，实际上等于判了死刑；非洲的儿童被带离了亲人、村子，装上贩奴船；还有一些“爬高的男孩”，被迫打扫烟尘结块的污秽烟囱，最后得了阴囊癌或是呼吸系统的疾病，长到12—14岁，身体钻不进烟囱，就被一脚踢开。

这些社会运动，无一例外都带有强烈的宗教热情。很多福音传道者，热情地期望能够消灭当代的邪恶；他们大部分人都相信，现有的教会已经太过富有，太过自满，太过贵族化，没有办法履行基督教牧师的任务，而且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于是，18世纪七八十年代，就见证了17世纪以来英国最不寻常的“精神重生”：各地涌现了很多叛逆思想和叛逆的教会，教会里宣读《圣经》，作为一种“共同人性法典”的公告，以及对贫穷者、受压迫者的同情。当初英国革命的时候，奥利弗·克伦威尔共和制下的一些激进派，也是这么做的。

这些非正统教会，并不一定个个都立场激进。毕竟，真正的福音派强调“神秘启示”（mystical revelation），也要求信徒服从“神秘启示”的力量。而著名的基督教派“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则非常厌恶那些“唯一神教派”（Unitarians），反对他们否认基督神性，将他们的教义斥为“毒药”。但是，卫斯理激烈的长篇演说，却成了一种反向的赞美，让“理性基督教”变得非常吸引人。这是“理性基督教”第一次不用矛盾修饰法来称呼，因为基督教的根基是对基督复活、神迹等教义的信仰，而不是理性。实际上，18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唯一神教派”演说家，都激烈抨击社会政治现状。例如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他虽然是宗教学者，但后人更记得他科学家的身份，他是氧气的发现者之一；还有威尔士人理查德·普莱斯博士（Dr Richard Price）。他们认为：不应把耶稣看作神之子，而应把他看作改革家的先驱，一个全面的好人，一个关心社会的公民；他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疾呼，在幸运者和不幸者之间，存在一种坚不可摧的责任纽带。

斯塔福德郡的伊特鲁里亚，有一座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开设的工厂，里面生产一种陶瓷大奖章，主题是反对奴隶制，非常有名。奖章上的铭文是：吾非人乎？吾非他者之兄弟乎？此外，信奉“基督使人

们团结”的新兴教派，用尽一切手段鼓吹他们“使内心清净的公民学”，手段包括：赞美诗；圣歌；充满激情的聚会，大家高呼自由精神口号；一系列培训班；小册子；向国会递交的请愿书。还包括图像这个有力的媒介，设计图画的都是些著名艺术家，包括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这些图画印到了所有能印的表面上，不仅印在纸上，还印在高脚酒杯上。每一种行动背后都有一个讲述恶行的故事，这些故事被人讲了又讲，当作战斗口号。比如，有一艘英国贩奴船桑格号（Zong），奴隶贩子将100多名生病的非洲人抛进大海，以骗取保险金。这个案例被反复渲染，以激发人们对所谓的“黑三角贸易”的愤慨。这贸易的情况是：货船从英国出发，把便宜的工业制成品运到西非，装上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又在第三站装上糖和朗姆酒，运回英国。刚刚加入这些新兴教派的人，来自差不多一切社会等级：有拥护改革的贵族，有牧师，有乡绅，有律师，有医生，有商人——与当年支持正义的“广教派”（broad church）情况类似，17世纪40年代正是广教派发动了革命，然而，这一次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科学家和工业人士也参加了。这些人很多都是名人的子女，例如托马斯·韦奇伍德（Thomas Wedgwood）。他们觉得，应当为自己贩奴带来的财富而赎罪，而且应当与贩卖黑人所得的钱财划清界限。愤愤不平的各派群众里，还有一些全新的阵营：中上层有文化的妇女，甚至还有家仆。据说，理查德·普莱斯博士在位于伦敦纽因顿格林（Newington Green）的会所开会的时候，这些人就坐在后排。

国会需要改革，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全体选民的人数，比内战之前还减少了3%；某些很差的自治区，例如老塞勒姆（Old Sarum），只有七个选民，但还有一个席位。当时还有一种买官的人，买席位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投票要跟政府立场一致；新兴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代表人数严重低于适当比例。不过，这个未经改革的国会，是否已经无药可救呢？首先一个遭到猛烈抨击的目标，是1689年生效的、允许天主教活动的《宽容法案》（Act of Toleration），其司法解释太过狭隘。异议人士不仅仅要求宗教活动的自由，还要求全面的公民权利平等——废除《宗教考查法》，该法案禁止天主教教徒担任官职。（托利党则认为，《宽容法案》通过的前提条件，就是再也不会有比法案本身更多的宽容。）但是，改革者也不得不承认，“古老的腐败”有时候也能回应他们最迫切的诉求，特别是当争议焦点是道德问题，不是政治问题的时候。扫烟囱男孩曾经给布莱克灵感，让他写下了1789年的著名诗歌《扫烟囱的孩子》（*The Chimney Sweeper*）。为了回应捍卫他们权利的运动，1788年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雇用8岁以下儿童清扫正在冒烟的烟囱。法案还明文规定，扫烟囱的儿童必须至少一周洗一次澡。但这项法案很少强制实施，而在那些最关心穷人命运的人看来，这法案也远远不够。有一些措施想要改革济贫体制，这些措施基于斯宾汉姆兰（Speenhamland）伯克郡郊区采取的体系，目的是让吃救济的穷人不至于进入条件恶劣的贫民习艺所；其手段是采取工资

补助，资助的目标从教区税费到面包价格，完全取决于本地社区的好心。批评家认为，这纯属把问题交给最可能忽视问题的人去考虑。

托马斯·比威克开始在纽卡斯尔一个雕刻师手下当学徒的时候，抽烟斗，喝麦芽酒，身边都是一些识文断字的年轻小伙子，心直口快，骂起“身居高位的人不顾穷人死活”，一点儿都不犹豫。其中最激进的是一个好斗的小个子，是一名教师，名叫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比威克说斯宾塞是“全世界心肠最热的慈善家之一。他的关注点似乎只有人类的幸福，这一点把其他的关注全都吸收了。斯宾塞是乐天性格，对朋友热心，爱国之心也同样火热。但他对那些认为性格相反的人，就会充满敌意”。17世纪50年代，英国曾经有一个清教徒掘土派（Diggers），斯宾塞也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坚信所有现代社会病的根源，都来自一种“原始的邪恶”：当前的土地所有制。当时，全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辩论协会，有些在伦敦，还有些专门是为妇女而成立的。斯宾塞在其中一个辩论协会上，慷慨陈词，宣扬他的共产思想。这个协会活动的场所，就是“宽阔中庭”（Broad Garth，纽卡斯尔一地名），斯宾塞的教室。斯宾塞的热情与对不幸者“真诚直率”的关心，显然鼓舞了比威克，但比威克也认定斯宾塞的理论太过虚幻，乃至危险。这理论对于某些“没有人居住的国家”还算实用，但想要“拿走人民自己的财产”，就大错特错了。有一天，两人吵了一架，越吵越凶，最后从动口到动手，拿棍子打了起来。比威克说：“他不知道我是棍击运动家，我很快发现，他的动作错漏百出。我把他的胳膊和大腿内侧都打得淤青，他发火，使出了不光彩的手段，我不得不痛打了他一顿。”

然而，尽管比威克认为私有财产非常神圣，但统治者还是有很多方面太过自满，让比威克愤怒不已。因为，纽卡斯尔“黑孩子”（Black Boy）酒馆的史瓦利酒馆（Swarley’s Club），经常举行会议和辩论，讨论英国现状和严重的社会问题；或者，听听可敬的约翰·霍恩·图克（John Horne Tooke）、理查德·普莱斯或者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如何谴责“古老的腐败”，会发现他们更加憎恨“不需改变现状”的自私谎言，而相对不太憎恨“老国会还存在”的客观情况。之前提到过，所谓秩序井然，一派祥和的田庄，佃农和劳工在土地上辛勤工作，这只是一个现代的幻想，遮掩了乡村贫困的丑陋现实。同样，那种没完没了的赞颂，说英国人能够生活在最自由、最贤明、最争议、最繁荣的国家怎样幸运，也激怒了那些最不幸、最无人代表的下层民众。

这种为权力涂脂抹粉的行为，有两个版本：一是辉格党，一是托利党。托利党的版本，直接声称，政府权力是天赋的，“人民”没有任何资格干预政府体制；而人民自然、适当的状态，就是臣服、效忠一个善良的君主、教会、国会；投票选出国会的人，都因自己的财产而有权跻身选民行列。辉

格党的版本是：只需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足以巩固“古老的宪法”，不受独裁暴政的威胁；而且，《革命稳固法》（*Revolution Settlement*）对宽容政策和国会的明确规定（国会只需每七年选举一次），也足以保护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自由权利。

但是，1788年，革命的百年纪念近了，人们必然会仔细审视这两种对现状的辩护。而且，英国政治家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82年22岁任国会议员，1785年25岁任首相的时候，两次试图推动国会以温和手段进行自我改革，结果都失败了。还有一个背景，1788—1789年，皮特努力反对废除《宗教考查法》。在这两个背景之下，重新评估现状，就显得更加紧迫了。大西洋的另一边，托马斯·潘恩（Tom Paine）的《常识》（*Common Sense*，1775）已经给大多数基于现状的推测带来了沉重一击。《常识》主张，美国人为了维护天赋权利（如纳税人必须得到政治上的代表，纳税人不应被迫为英军提供宿舍）而反抗，不仅是权利，而且是使命。美国人学到的一课，当然没有在大西洋这一边被人忽视，特别是没有被那些一直评论美国独立战争的人忽视。18世纪80年代，英国存在一些到处游说人们加入的团体，如“宪法资讯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威斯敏斯特协会”（Westminster Association）等。这些团体的成员，不仅有牧师、各种专业人士、工匠，还有辉格党的少数激进分子，如第三代里士满公爵（Duke of Richmond）、第三代格拉夫顿公爵（Duke of Grafton），还有剧作家兼政治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这些人在“霍兰屋”（Holland House）聚会。他们的领导人，口齿伶俐的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他小时候的托儿所，就采用了卢梭自由教育理论。这些团体开始接受一种潜在的民主政府的理据，这种理据一开始就允许民众选择或改变自己的统治者。而且这权利不仅是天赋的，在历史上也能寻找根源。这种观点认为，所有政府的起源，都是民众自愿商定，将自己的权利赋予一些民众代表（不论是国王还是国会），其明确目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自由和安全。这种商定，一直都被理解为一种双方都有义务的合同。民众暂时委托政府保护自己的权利，只有在政府尊重民众的情况下，民众才会效忠政府。同样，当局如果被判定为没有保护民众的这些自由权利，而是侵犯了权利，则“主权人民”（sovereign people）完全可以将其废除。

这种理论是匆忙拼凑出来的：一部分是17世纪那些激进派留下的，是陈旧的“共和国人”/“联邦人”（Commonwealthmen）的信条；另一部分则是美国的共和主义，加上卢梭的推波助澜。不过，18世纪80年代，这套理论却是一系列演说家必须对不满的民众宣讲的。他们包括：詹姆士·伯格（James Burgh）、普莱斯、约翰·霍恩·图克、约翰·卡特莱特少校（Major John Cartwright）。接受这种理论的人，绝不仅仅是极少数与主流不合的

煽动者，因为这些经常难以理解的严苛论点，在当时极受欢迎。比如，理查德·普莱斯令人生畏的《公民自由性质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1776），卖了6万本，只有潘恩的书的销量超过了这个数字。这些观点，很多以前都被人宣扬过，尤其是被约翰·弥尔顿宣扬过。有些现代史学家认为，“老调重弹”是虚弱的表现，其实绝非如此。老调重弹反而是这种观点大受欢迎的诀窍。因为，18世纪的人们非常迷恋英国的往日，尤其是“伪哥特式的”（Gothick）中世纪；不光迷恋中世纪的政治历史，还迷恋中世纪的建筑、服装、家具、盔甲，把这一切编成配有漂亮插图的简明历史书，到处出版。所以，英国历史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人称智者、强者、好人的英雄，又被格兰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等人抬出来，宣扬成明君典范，因为他与一切国会的前身，盎格鲁–撒克逊咨议院（Anglo-Saxon Witenagemot）进行了友好合作。此时，人们认为历史不是晦涩难解，与现实无关的东西，而是真正本土英国政府应该效仿的榜样。《大宪章》（Magna Carta）的签订，是另外一个“民众”经历的“神话”时刻。他们通过自己的男爵、议员，行使了向暴君问责的权利。这一事件也被视为对当下和将来有重大意义。而且，当时有一个激进分子，身份是素食者兼古董商兼运货员，名叫约瑟夫·里特森（Joseph Ritson），研究了罗宾汉这个任务，把传奇人物重塑成一个浪漫主义的大众英雄，出了书，还配上了托马斯·比威克的木刻插图。

自从16世纪开始，“88”这个年份，一直是英国和君主制命运的关键年份；每一代人都认为，上一个“88”年份的历史，就是下一个“88”年份的范例。1688年支持威廉三世的人，宣称自己在继续1588年伊丽莎白对天主教暴政的反抗。也是在1588年，英国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1688年，信仰天主教的英王詹姆士二世退位。1788年，英王乔治三世精神病恶化，无法执政。有些批评家谴责他试图建立斯图亚特王朝（Stuart）一般的专制政体。等到1789年他恢复神智，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震惊欧洲，改变了君主制的命运。那些庆祝光荣革命100周年的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次最新的革命，就是100年前光荣革命的圆满之举。他们觉得，上帝的日程安排很有意义。

乍一看，英吉利海峡两边这两个国王迥然不同。法王路易十六此时正被法国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呼来喝去，议会怀疑国王在策划军事政变，以夺回绝对权威，而且这种怀疑是正当的；英王乔治三世则正在恢复健康，也在恢复对英国的控制。路易十六遵命离开凡尔赛赶赴巴黎，一边尽量掩饰自己的窘境，一边至少假装在革命的三色旗下保持低调。与此同时，英王乔治三世正在英格兰西部诸郡（West Country）旅游，静养身体。每到一处，都有人高声合唱《上帝保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来取悦他；在韦茅斯（Weymouth），乔治三世来到矿泉圣地疗养的时候，还有一支忠心耿耿的小乐队藏在洗澡机器后面，给了他一个惊喜。

然而，这些大张旗鼓的效忠表现，完全没有阻止那些激进派的思考，这些人真正相信英国要有大变局。他们觉得：若是巴黎人民能攻入巴士底狱的高墙，那么，我们清算英国“古老的腐败”的日子，也就不远了。1785年，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把激进派的事业，比作“在谬误和迷信的陈腐建筑底下，一粒一粒铺上火药，只需单独一点火星，便可点燃，立刻发生爆炸”，因此得了个“火药阿约”（Gunpowder Joe）的外号。巴士底狱攻陷的时候，史瓦利俱乐部、利奇菲尔德的主教宫、贵族的霍兰屋，这些地方都有人举杯祝贺。激进派希望，这火星也许能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赞美法国大革命，说它是“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而且无疑是最好的事件”。只是，大革命的成功，让英国人有些尴尬：过去好几代人的时间里，辉格党和托利党一直异口同声嘲笑法国人，说法国人是专制走狗，毫无希望；如今，法国人却完成了1688年始于英国的革命事业。毕竟，美国人早就论述，自由的“真正”精神，虽然生于英国，却显然已经迁移到了别处（美洲）。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的拉法耶特将军（General Lafayette）曾经热心地帮助美军与英军作战，如今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将军又站在反对专制的一边，把自由精神从美洲带回了欧洲。这一点再次证实，受到民众拥护的自治政体，乃是一切人类的天赋权利。

但是，革命毕竟发生在法国这个外国，于是，英国辉格党最激进的派别“新辉格党人”（主张扩大选举权，实行无记名选举，资助国会议员等）赞颂外国革命，虽然是高尚的情操，却也引起了非议。1789年，新辉格党人觉得有必要主张，自己为法国大革命而欢呼，这种行动和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矛盾，反倒是爱国主义保持健康的标志。1789年11月4日，在伦敦“老犹太”区的“唯一神教派”会所，理查德·普莱斯博士面对“革命纪念学会”（Society for Commemorating the Revolution）的成员，高调发表了一篇演说《我们国家的爱》（*The Love of Our Country*），传达的也是这个信息。这一天差不多正好是1688年光荣革命中，威廉三世在英国托贝港（Torbay）登陆的101周年纪念日。普莱斯主张，“国家”适当的定义，“并不只是地球的土壤或某个地点，我们恰好在这里出生；也不只是森林和农田，而是一个团体，我们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或者是同伴、朋友、亲族的集合体，这些人在共同的宪法下，和我们联系在一起，受同样的法律保护，被同样的公民政体（civil polity）维系着”。换句话说，赋予我们真正的国家忠诚心的，并非国家的地形，而是国家的政治。余下部分，就都是自私的夸夸其谈了。他还说，伟大而光荣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毫无疑问，同英国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确实是英国革命事业的完工之作。1688年光荣革命的意义，正是在于“人民有权反抗独裁统治，驱逐非法的统治者，恢复自己不容置疑的自治权”。难道不是这样吗？而且，这不也正是法国人现在做的事吗？法国人给我们上的一课，非常及时，因为在英国，人民的代表工作已经变成了一个糟糕的笑话；这是一种“影子”的自由，其

背后真相是腐败的寡头政治，还有一个内阁制政府，操纵着国会中一群被收买的傀儡，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说，巴士底狱的陷落，法国从绝对专制到开明君主制的变迁令人震惊，这震惊也当然是健康的，对宪法有益的，就像韦茅斯的清凉游泳，或者莱克兰细雨中的郊游一般。有些人向乔治三世恢复神智表示祝贺，表现出怯生生的媚态。对此，普莱斯非常瞧不起。普莱斯说："他们更像一群牲畜匍匐在主人脚下，而不像有智慧、有尊严的公民与受人爱戴的君主同乐；与此同时，君主还明白，他之所以有今天的境遇，全依赖这些公民。"换句话说，公民才是真正的主人。普莱斯说，如果他有机会祝贺国王，他会这么说：

先生，得知您康复了，我非常高兴，感谢上帝对您的恩惠。我尊崇您，不仅将您视作我的国王，而且几乎将您视作全世界唯一合法的国王，因为只有您，才是因为人民的选择而得到王冠的。愿您享受一切可能的快乐。愿上帝向您显示，那些现在正对您盲目崇拜的行为是多么荒唐，并能保护您不受这种荒唐行为后果的伤害。愿您可以正确地认识到您目前地位的本质，并且拥有这样的智慧，从而在您回到这些王国[注]执政岗位上的时候，能够为国家带来福祉；而且努力将自己正确地视为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君主。

这已经够大胆的了。然而，在评论的结尾，普莱斯抛弃了所有敬重的伪装，发出了毁灭性的革命预言，宛如雷霆的疾呼："全世界的压迫者们，颤抖吧！支持奴隶政府、奴隶制度的人，接受警告吧！……如今，你们再也不能用黑暗笼罩世界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光明与自由精神，不要再继续反抗。把人类的权利还给人类，接受人们对恶行的纠正，免得恶行与你们一起毁灭！"

普莱斯的文章有两个主要假设。假设一：法国大革命是英国革命的延续。当时有一句祝酒词，概括了这个假设，说的是："敬英国国会，愿它变成法国的国民议会！"假设二：英国的君主制并非（或者不应该）属于世袭继承，而应当对至高无上的人民负责。这两个假设激怒了一个爱尔兰作家、演说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也是国会议员，代表一个口袋选区（被拥有土地的某个人或家族控制的选区）。伯克写下了尖酸刻薄、极有杀伤力的《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伯克之所以又惊又怒，有各种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普莱斯文章的时间问题。伯克一开始带着谨慎的乐观态度看待法国大革命，然而到了秋天，乐观就变成了惊惧的不信任。7月14日过后发生的一切——私刑肆虐；焚烧庄园；一片混乱中，贵族慌忙抛弃财产，表示赎罪；最严重的，还有"没收教堂财产抵偿国债"的行为……这些在伯克眼里，都

是国家自我解体的疯狂之举。在伯克看来，最荒谬绝伦的，是法国风传这样一种说法“路易十六热情支持这一切破坏活动”；实际上，路易十六不过是这种打砸抢团体的阶下囚。1789年11月，恰好是普莱斯认为应该教训乔治三世，让他明白自己的使命，将自己看作“人民公仆”的时候，路易十四的真正景况，以最为残忍的方式对外曝光了。要求面包的一些女商贩，领导巴黎市民向凡尔赛进军，这进军却变成了对宫殿的进攻，市民冲进了皇家成员的私宅。混乱中，两名瑞士卫兵被杀，但伯克写道，这两人都不是岗哨。国王和王后在拉法耶特催促下，先是紧张地在宫殿阳台上露了一面，接着就屈辱地被人塞进一辆长途马车，押回了巴黎。面对很多挑在矛尖上的头颅，两名阶下囚拼命装出勇敢的样子，假装与人民“团结在一起”。伯克用极尽渲染的笔法写道：“国王……与王后，还有他们幼小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本来应该是伟大而慷慨的民族的骄傲和希望；如今，一家人却被迫离开全世界最华美的宫殿，离开的时候，在大虐杀污染的血泊中游泳，一片血海洒满了残肢与四分五裂的尸骸。”

普莱斯博士成了伯克尖酸嘲讽的对象。伯克说，他怎么能够赞扬这样的事情，就好像这些事情流露了人类善行呢？而且，普莱斯怎么如此胆大妄为，竟敢宣称1688年光荣革命，与一个世纪之后，伯克眼里不折不扣的耻辱恶行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完全篡改英国革命的意义，方能把二者联系起来！

伯克说，普莱斯只有无视真正的历史，才能宣称，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体，有权利因为自己的意愿，或者因为觉得某些君主保护了个人自由的“天赋权利”，而扶植或者废黜这些君主。这么主张的人，不是1688年的人，而是1648年的人——约翰·弥尔顿，以及那一代主张杀掉国王的人。威廉三世之所以受到邀请来英国，并不是出于人民的选择，更不是要以任何抽象原则建立一种新型政府，而是为了捍卫一种自古以来的法律、教会、政府的形式；也就是詹姆士二世违背的“古老的宪法”。因此，光荣革命成了最保守的革命；所以才没有流血，所以才光荣。伯克还坚称，最重要的是：自从《大宪章》开始，甚至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开始，“古老的宪法”历经无数世代，一直保持着权威，保持着重量；它扎根在英国土地上，而非危险地浮在空中，挂在卢梭一类政治哲学家不切实际的猜想构成的热气球底下。政府不可能用想象出来的基本规则，以幻梦的方式建立。这种“几何式”或者“代数式”的建设，从定义上说，就是毫无生气的。伯克说：“编造一个新政府，这种想法……足够让我们感到恶心、恐怖。”一切政府，至少一切合法政府，其权威，都源于远古以来的实际运作的经验。至少，不列颠民族的行事方式就是如此。“这种自由后裔的理念，赋予我们一种习惯性的祖国的尊严”；因此，普莱斯所轻视的“地球的土壤或某个地点，我们恰好在这里出生”，乃是让我们具有社会感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英格兰，我们还没有被大自然的消化系统完全包围，

我们内心依然存有情感，我们也珍视、培养这些天生的情感，它们忠诚守卫、严密监视着我们的使命。”伯克认为，我们地域的血统，加上“盾牌上家徽的纹章”，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是我们的“政治宪法”。之所以说“盾牌上家徽的纹章”，是因为伯克痴迷纹章学。而我们却不顾危险，随意破坏政治体制。

就在鼓吹世界和平与理解的预言家们，为即将到来的天下大同唱赞歌的时候，伯克对他们发出了愤怒的回击：自然？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自然！你们以为它是天下一致的，雏菊花环、隔着海洋握在一起的手、大学兄弟会的合唱歌曲？但你们正在提到的，是一群知识分子的兄弟之情，他们从同样的巧克力饮料杯中啜饮，谈论着同样的陈词滥调，做着同样的天真幻梦。可是，朋友们！自然是生活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自然是“熟悉感”，是“对某地的感情”，是“爱国者”。

那些煽动家如此放肆地呼唤的“人民”，在法国已经暴露了本来面目。他们无知、轻信、嗜血！“民主”就是“暴民做主”。伯克坚持说：“一名理发师或是一名蜡烛制造者，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眼中的荣誉……这些人不应该受到国家的迫害，但如果这些人被允许进行统治……国家反而是受到了这些人的迫害。”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些本应更加明智的人，却愚蠢地给了他们幻想，让他们以为自己很重要，执掌大权。这种责任是不可原谅的。这些愚蠢的人，就是某些阶级叛徒、绅士、教士，将民主像玩乐一般对待，而且自己足够富有，能够避免滥用民主的致命后果；他们幻想着交出自己在政治秩序里分配好的地位，来换取更多“公民权利”。在英格兰，这些蠢人就是某些公爵、伯爵，诸如里士满公爵、格拉夫顿公爵、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以及伯克的老朋友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这些人竟然支持那些毁灭他们贵族地位的人，荒谬地砍断了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宝贵纽带。他们幻想，自己可以像拉法耶特将军一样，骑着暴民化身的猛虎，获得权力和荣耀，但他们反而最先被老虎吞噬！

伯克的《反思》就当时标准而言，堪称论战的杰作，而且商业上也很成功。出版后三个月，卖了17000本，当时小说初版印数最高也只有1500本。某些辉格党激进派看来，《反思》标志着“曾与美国人交好的”伯克变节了。（其实这个名声不太准确。在美英冲突之前，伯克曾经努力让双方讲和，但冲突一开始，伯克就对英国忠心耿耿了。）《反思》一出版，就把普莱斯的声音给淹没了。1791年，普莱斯郁郁而终。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反思》的地方主义，狭隘观念。伯克坚称，英国政治的传承，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英国人出生的时候，获得的并非“自然权利”，而是一种独特的本国政治遗产，与普世的自由理论毫不相容。伯克似乎认为，自然绝不可能是“四海一家”的。

法国大革命中曾有一次，民众冲进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房间，要把她杀掉，玛丽急忙逃跑，“几乎全裸地……匍匐在国王脚边，想要得到庇护”。伯克认为，这样的屈辱，标志法国骑士精神的死亡，对此哀痛不已。伯克从来没有想到过，“反转的骑士精神”，也就是男人被残忍虐待的时候，女人会挺身而出保护男人。这种事，他肯定会贴上“违反自然”的标签，但这种事却是的的确确发生了的。伯克《反思》出版还不到一个月，普莱斯的好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就出版了回击之作《男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1790）。当初，玛丽在纽因顿格林开了一所学校，离普莱斯的教堂很近，两个人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玛丽看到普莱斯受到伯克的尖酸嘲讽，显然感觉到了刺痛。玛丽从约克郡回伦敦的时候，还是个自学成才的女学者，默默无闻；普莱斯是她的第一任老师。普莱斯跟玛丽成了好友，经常鼓励她。普莱斯跟其他很多女作家也是这种关系，比如儿童文学作家安娜·利蒂希娅·巴鲍德（Anna Letitia Barbauld），也是个激进派。

玛丽当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因兄弟姐妹而烦恼不已，写的评论和文章也从来不足以糊口，急需别人的一切帮助。玛丽的父亲是斯皮塔佛德（Spitalfields）织布工人的儿子，一辈子到处尝试，在埃塞克斯开农场，在约克郡向人骄傲地宣传，但每一次冒风险创业都失败了。玛丽就自然而然负起了照顾姐妹们的责任，甚至在其中一个姐妹抛弃丈夫的时候，玛丽也去收拾烂摊子。抛弃的原因没有解释，但很容易猜得出来。思想上，她当然沉入了让–雅克·卢梭温情教育的团体当中，浑身浸透了“纯真情感”“永恒友情”的梦想，像进入水池一样又热又黏。但是，两性的本质——卢梭关于自然的老生常谈之一，却令她非常厌恶。卢梭在小说《爱弥儿》中表达了自己的设想：养育女孩子，必须为了完成一个最高目标——培养成安慰、照顾丈夫的助手，培养成孩子的母亲（自然还得是喂奶的母亲）。上帝已经让男人和女人有了不可逾越的不同，因此女人只要想在外表或行动上接近男人，从定义上说，她就成了生物学上、道德意义上的怪物，剥夺了将一处房子变成“家”的关键品质——温柔。

玛丽父亲花钱大手大脚，而且时常喝酒；玛丽母亲就在父亲身上浪费了这种温柔。玛丽眼见这种悲哀的尝试，觉得太过分了。当时，似乎以写作为生的女性越来越多，玛丽也受到这个情况，以及别的原因鼓舞，写了一篇短小的论文，论述女儿的教育问题。与《爱弥儿》的观点相反，她主张女孩子完全有潜力，接受跟男孩子一样的教育。她把论文寄给了约瑟夫·约翰逊（Joseph Johnson），当时全伦敦乃至全英格兰最激进的作家，大概也是一切自由灵魂、激进作家的核心。

约翰逊是利物浦人，单身汉，小个子，戴着整洁的假发，经常在72圣保罗教堂后院（72 St Paul’s Churchyard）自己商铺的楼上组织活动。这个地

方，几百年以来，一直是伦敦出版商中意的所在。对伦敦激进派而言，约翰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不仅在1788—1799年出版了《分析评论》期刊（*Analytical Review*），而且还资助、培养了一群弟子，组成了“破衣军团”（ragged rigement）。别人只要有报纸评论要写，有工作要找（约翰逊给玛丽在爱尔兰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但结果有好有坏），有短期贷款要借，甚至要寻求住处（他也帮玛丽找过住处），都可以找他。玛丽每周总要跟约翰逊一块吃几次饭，约翰逊有名的周日晚餐，玛丽也是常客。晚餐会上，光临的有趣宾客们，让朴实的“爱国者”菜肴（很多煮鳕鱼和豆子）增加了不少味道。这些人包括：有远见的艺术家，例如威廉·布莱克、亨利·福塞利（Henry Fuseli）；“宪法资讯促进会”的老会员、坚定分子，例如约翰·霍恩·图克、约翰·卡特莱特少校；著名民主主义者，例如黑色眼睛、赤红脸膛的托马斯·潘恩；当然还有一群口才出众、说话不脸红的知识妇女，例如安娜·利蒂提娅·巴鲍德、女演员萨拉·西登斯（Sarah Siddons）。关于玛丽出席约翰逊晚餐会的资料，描述的玛丽，是一个笨拙、坚定、十分活跃的女人。她长长的鬈发，倘若上面不戴海狸皮帽（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或者卢梭那样），就要往头发上擦粉。她知道自己不修边幅，而且经常打断别人说话。社会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是来听潘恩演讲的，玛丽却屡屡抢了潘恩的话头，戈德温因此很生气。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拥有暴风雨般的热情、顽强的辩论精神，心灵和头脑的配合就像拳击运动员的左右手，这已经成了她的经典特色。因此，她知道伯克对伟大而善良的普莱斯博士发起凶狠的进攻，就尤为义愤填膺。然而，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她把这种义愤填膺转化成了出版的行动。玛丽的《男权辩护》光彩被两年后出版的《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遮掩了，也同样被潘恩引起轰动的《人权》（*Rights of Man*，1791—1792）遮掩了，但《男权辩护》依然占有两个第一。最早针对伯克发起的反攻，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反攻之一。玛丽并没有做出一般人（尤其是伯克）预期一个女人要做出的事，没有用拘谨而假装高尚的风格写作，而是用伯克自己的尖酸嘲讽，来攻击他作为“传统体制卫兵”的资格。玛丽大声质问：伯克若是为世袭王位的神圣地位如此操心，那么，在乔治国王精神失常期间，伯克又为什么那样匆忙地想要把他废掉，用自己赞助人的赞助人——摄政王（Prince Regent）取而代之呢？玛丽说：“你如此渴望尝到权力的美味，竟然无法等到时间来决定，一次可怕的精神错乱，是否会变成长期的精神失常状态？窥探了全能上帝的天机，而后大喊大叫，上帝已经把他从宝座上赶了下去……这难道不是跟法国忠诚纽带的毁坏一样吗？而伯克先前，不是认为法国这样的情况极为恐怖吗？”玛丽的目标，让伯克不仅显得刚愎自用，而且荒唐可笑。她嘲讽了伯克的各种痴迷。他漫画式地咒骂玛丽的“勇气”（伯克曾说玛丽“不是最高等级的动物”）；他那痴迷纹章学的过去；他的目光短浅（伯克碰巧确实戴了一副

眼镜，非常出名，尽管玛丽自己也戴眼镜），看不到所谓“完美的自由”，只对那些有权享受的人才完美。更严重的是，“古老的宪法”若真是永远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滋润土地的融雪会引起临时的洪水泛滥”，而我们岂不要注定“永远冻结，无所作为”了？

如果说玛丽是狙击手，那托马斯·潘恩就是重炮兵。法国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潘恩曾经估计伯克作为“自由之友”，会同情革命，还在巴黎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但伯克的《反思》却使潘恩看清了此人何许人也。潘恩很是愤怒，又感觉事情紧迫，于是只花了三个月，就写下了《人权》（1791）第一部分，长达4万单词；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拆毁“专制主义的凄凉之屋”。《人权》的大部分主张，约翰·弥尔顿、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还有潘恩自己，之前都已经表达过了：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而平等、个人自由，都是出生时被上帝赋予的；因为这些权利超越一切形式的政府，当然也就不能被一切形式的政府所辖制。相反，政府之所以建立，还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的，并且要服从保护的要求。但是，潘恩还专门加了一段讽刺内容，嘲讽单纯的世袭政府——无论是贵族政治，还是君主政治。即使只是容忍这种观念，更别说尊重这种观念，其荒谬程度也不亚于相信有“世袭的数学家”。

不过，比起潘恩说话的内容，更重要的，还是潘恩说话的形式。潘恩的家庭，原本是诺福克（Norfolk）一家妇女胸衣和紧身内衣的制造商。他在一座名叫“荒山”的秃山上长大，房子对面就是当地的绞架；还一直有人带他去贵格会（Quaker）的礼拜堂。所以潘恩绝不是伯克轻蔑地提到的那些“激进的花花公子，腰包很满，良心和脑子却都很空”。潘恩在美国成名之前，已经体验了颠沛流离、贫苦不堪（差不多完全自学成才）是怎样一种生活。他真正的学习生涯，是在小酒馆政客抽着烟斗，互相大喊大叫中度过的。他手中已经有了一张比较粗糙，但十分坚硬的弓；美国政治大打出手的喧嚷，给这张弓又加了一根弓弦。他还长期接触小酒馆和街道上的语言，这使他明白，思想之战同样也必然是语言之战。这种精明，几乎称得上20世纪的水平。而平民语言的锤炼，让他与伯克的论战，十分得心应手。伯克有意选了声音最尖锐的英语词汇，在描述法国那些可怕场景（都是二手信息）的时候，就用哥特式的装腔作势；在教训“猪一般的大多数”的时候，就改用贵族般的豪言壮语。这种精心安排的表演，潘恩称之为“为剧场演出而仔细计算过，而舞台上的事实，是为了演出效果而加工的”。潘恩的文风，也经过深思熟虑。伯克最可怕的噩梦，就是让平民受到政治教育。潘恩好像刻意要让这噩梦成真，他的写作，用了极为简单的语言，简单到具有攻击性：“我的目的是让不识几个字的人也能理解……因此我要避免一切文字雕琢，把话说得像字母表一样清楚。”很多上层读者看了《人权》，他们最吃惊的，不是潘恩对君主制、贵族体系的必然嘲讽，而是潘恩的语言竟然这样粗糙，就好像盼着读者耸鼻子、摇扇子[注]

一样，潘恩几乎是对着读者的脸，把自己的思想喷射了出来。

“猪一般的大多数”则把思想照单全收了。约瑟夫·约翰逊同意加紧出版《人权》，为了赶上2月22日乔治·华盛顿的生日（华盛顿将军也专门拿到了一本《人权》，感谢了潘恩）。此前，约翰逊的商店已经出版了不止一本对伯克的攻击的书，还包括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书。但在22日当天，约翰逊却一反常态，突然发作了，歇斯底里。潘恩不得不到处去找别的出版商，找到之后，雇了一辆马车，把没有装订的书页拉到了新的地点。约翰逊很可能后悔自己当时的恐慌，因为《人权》第一次印刷供不应求，三天后就印了第二次。到了5月，《人权》已经出了六版，卖了5万本。而一本《人权》售价三个先令，在当时并不算便宜。《人权》还卖到了外国：很多本运到了美国波士顿、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法国巴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如此一来，潘恩的书就成了18世纪畅销书的头一名，把伯克的读者群远远甩在了后面。《人权》第二部，鼓吹更为激进的“福利国家”，这一点让改革派也出现了分歧。第二部还主张，国库收入应该通过累进税来重新分配，以满足政府帮助老弱病残的需要。第二部，按照潘恩自己的说法，卖得更好，十年内销售量为四五十万。有些现代史学家认为，如此激进的思想，在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接受，没有代表性。然而，就算剔除夸张的因素，这些数字也足以完全否定他们的观点。“宪法资讯促进会”突然重获新生了。会议上，大家把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国王》重新填词，唱了出来，对潘恩表示感谢：

上帝保佑人权/暴君若能把人权侵犯/就来试试看……

1791年夏，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想要逃出法国，两人在瓦雷纳（Varennes）被捕，十分狼狈地被押回了巴黎，关在两人自己的宫殿——蒂伊尔里宫（Palace of the Tuileries）。到这个时候，自称爱国的两派英国人士，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5月，埃德蒙·伯克与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这对老朋友，在英国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撕破脸皮大吵了一架，友谊从此断绝。福克斯受到小威廉·皮特的刺激，始终强硬地坚持：法国的新宪法，以及《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惊人的自由丰碑”。私下里，福克斯还将伯克指控为皮特的传声筒，想要用“共和主义者”的罪名，卑鄙地玷污自己的名声。5月6日，伯克在下议院发表演讲。福克斯手下有一些年轻的激进分子，伯克管他们叫“那群小狗”。伯克一演讲，“小狗”们立刻叫了起来。伯克公开表达了愤怒：“友情和亲密相处延续了22年多，如今，却从他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射来了人身攻击的冷箭！”伯克重复了二人其他的争执，这些争执，虽说让他和福克斯有所分歧，但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们的私交，也没有分裂过辉格党人。这次，他要说，这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对双方都有致命的伤害。福克斯打断了伯克：“友

情并没有损伤。”伯克回答：“我很遗憾地说，是有损伤的。我虽然失去了朋友，但总算完成了使命。”福克斯站起来，泣不成声，但还是毫不后悔地谈道，法国“可怕的专制”已经不见了。伯克再次回答，他希望谁也不会牺牲英国国体来换取一个“狂乱的、幻想的体制”。

这场交锋，虽然情绪化，但仍不失威严。它掩盖了当时英格兰各地方城镇正在迅速发生的严重分歧；更不祥的是，苏格兰也发生了这样的分歧。当然，伦敦也是激进派和保皇派斗争的风暴中心。不过，所谓的“新不列颠”——曼彻斯特（Manchester）、谢菲尔德（Sheffield）、贝尔法斯特（Belfast）、伯明翰（Birmingham）、格拉斯哥（Glasgow），还有一批让工商业改变面貌的老城，比如德比、诺丁汉（Nottingham）、比威克的纽卡斯尔——就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火焰洗礼。在这些地方，礼拜堂的“理性宗教”，辩论协会，印刷出版商、激进派的报纸，全都联系在一起。谢菲尔德有一位书商约翰·盖尔斯（John Gales），也是《谢菲尔德纪录报》（*Sheffield Register*）的编辑。他是该市“宪法协会”（Constitutional Society）的主心骨，协会自从建立，很快有了2000多名成员。这些组织的激进程度，经常影响组织成员的团结。有些人要追随“人民之友”（Friends of the People），也就是福克斯一派的人，主张推动国会改革的宪法一派；他们可能还主张，男公民选举权（manhood suffrage）是“英国自由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他人则很快迷上了托马斯·潘恩等人在“福音书”里勾画的将来社会的美好愿景。

英国政界最重要的日子，原本是11月4—5日，这一天既是1605年天主教极端分子企图炸毁英国国会的火药阴谋案（Gunpowder Plot）的纪念日，也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纪念日；让人吃惊的是，如今，法国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7月14日，却把前者取而代之了。1791年7月14日，贝尔法斯特举行了一场新教天主教的联合集会，很多人欢呼“自由的曙光”，主要是为了爱尔兰；与此同时，伯明翰另外一群人正在以教会、国王的名义，毁坏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宝贵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火药阿约”确实招来了“火星”，而这火星点燃的却是另外一群人。1794年春，普利斯特里移民到了美国，定居在宾夕法尼亚的诺森伯兰，建立了一个合作社，终于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他的社会理想主义。

而普利斯特里抛下的祖国，距离那个和平自由的人间福地，却似乎前所未有地远了。1793年5月6日，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提出的国会改革措施（想让国会议员的代表分配更加公平，选举更加频繁）以41票赞成、282票反对的结果惨遭否决，此时，任何“人民之友”想要从体制内实现奇迹般的宪法改革的希望都落空了。那41票，大概就是国会里福克斯一派“新辉格党人”的人数吧。于是，也是在5月，王室发布了一份公告，禁止煽动性的集会。政府期望得到辉格党人的支持，也果然得到了。福克斯

投了反对票，但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当然还有伯克，都投了赞成票。不过，既然此时国会改革的路似乎堵死了，潘恩的革命政策，人气上升而不是下降了。1792年1月，鞋匠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建立了“伦敦通信协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用伯克的话说，这个协会是“捣乱之母”。约翰·塞沃尔任协会的主要理论家、发言人。协会公开站在民主主义的潘恩派一边，要求男公民选举权，要求每年召开国会。政府当时极为担心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哈代偏偏又是苏格兰人，政府就更加警惕了。12月，苏格兰的“人民之友”，计划在爱丁堡举行“公会”（Convention），这一来火上浇油。之前，法国从君主制转向共和制的血腥冲突，产生的一个“国民公会”，法语也正好叫Convention（Convention Nationale）。虽然这个单词在英国和法国指代的事物相当不一样，英国政府依然将这个单词视为一种凶兆，以为这些人也要跟法国一样闹事了。爱丁堡公会共有160名代表，来自80个姐妹社团，至少35个城市。政府的探子汇报，参加大会的有爱尔兰人，还有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的苏格兰人。公会组织者之一，律师托马斯·缪尔（Thomas Muir）演讲，呼吁解放“奴隶制的英格兰”。缪尔原先是詹姆士二世党人（Jacobite），此刻的立场，却相当于拥护了法国最激进的雅各宾派（Jacobin）。这个转变，忽然就不那么引人入胜了。政府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反击手段，逮捕了公会的领导人，判了他们煽动罪，流放到澳大利亚14年；一部分原因，当然是害怕盎格鲁–苏格兰（Anglo-Scottish）的联盟会被人推翻，害怕在北方民主派的中心地带，从诺丁汉到邓迪（Dundee），国会被“不列颠大会”（British Convention）取代。

特工还注意到，这些社团里，很多人不仅吵闹，而且说话冗长啰唆。这些人是新一代傲慢的纺织工人、虔诚的钉子工人、共和主义的裁缝，最可怕的，还有谢菲尔德的刀匠。人们从报纸上看到巴黎的革命恐怖，就毛发倒竖；他们尤其害怕刀匠。当局偶尔会突击搜查，发现一些地方藏了长矛、斧头，更加剧了这种恐慌。伯克在下议院大谈恐慌气氛，把它称之为“革命”和“唯一神教派社团”的东西，比作某些虫子，说虫子可能会长成巨型蜘蛛，织起网来，吞噬拦路的一切。威廉·皮特则比较现实地警告说，若是允许潘恩的思想不加限制地在民众中间传播，“我们就会发生血腥的革命了”。

政府纵容之下，保守派先发制人，开始操纵民众，发动暴乱。10个郡都动员了民兵维持秩序，然而，他们一看到暴民的攻击目标是激进派，就掉头不顾了。很多出版社被砸了，煽动性的文献被抢走，烧掉了。保守派雇了天才詹姆士·吉尔雷（James Gillray）等漫画家，让他们画出英国一旦发生革命的情况，画得越恐怖越好。政治家约翰·里维斯（John Reeves）一度曾担任纽芬兰的首席法官，这时候回到了英国。他对激进派俱乐部的厚颜无耻感到十分不满，在1792年11月，成立了自己的团体“保护自由财产反

平权与共和主义协会”（Association for Preserving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Levellers and Republicans），其目的是“支持法律，打击煽动性出版物，保护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跟那些有武装的保皇派一样，协会也支持保皇派出版各种短文，用来专门转化那些轻信潘恩主张的工人。1793年2月，英法战争爆发。保皇派马上获得了丰富的论战素材——法国共和主义者的入侵，会有什么样的恶果。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个爱国的师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手下一个容易听信谣言的学徒解释，潘恩的思想有多么邪恶、多么危险。学徒十分感激，回答道：“师傅，您说得对！谢谢您跟我解释，我绝对不想看见法国人跟我媳妇睡觉，把面包从我孩子嘴里抠出来！我再也不去‘自由俱乐部’了，我这就上工！”基督教福音派作家汉娜·摩尔（Hannah More），因为致力于儿童文学事业，声望很高。如今，她开始利用这声望，向老老少少灌输急需的爱国定义了。她的《乡村政治》（*Village Politics*，1793）里，“铁砧杰克”（Jack Anvil）向“砖斗汤姆”（Tom Hod）解释，民主主义者“喜欢被一千个暴君统治，却受不了一个国王”。书里说，《人权》鼓吹的是“战争、谋杀、横死”；所谓“新爱国者”，就是“爱所有别的国家都胜过爱祖国的人，而且最爱的是法国”。

假如在1792—1793年，这些动荡的年月里，纵然有一切的威胁与险境，你还是一个坚定的“人民之友”，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为人精明，而且对潘恩一派过分的革命热情保持怀疑，最好还是做出托马斯·比威克那样的选择，紧紧闭嘴，韬光养晦，以待时机。与此同时，盼望着英国人的常识、公德、正义，最好很快能够得胜。为了安慰自己，比威克还阅读本地激进派的报纸《经济学人》（*Oeconomist*）。这报纸在伦敦印发，印发的人是约瑟夫·约翰逊。或是享受那些攻击威廉·皮特的刻薄之作，比如老朋友托马斯·斯宾塞的《猪肉——猪一般的人的教训》（*Pigs'Meat,or Lessons from the Swinish Multitude*，1793—1795）；继续画他的鸟兽，并在绘画之间暗暗插入残忍、痛苦、暴行、横死。这一点，想要探究画中深意的人，不难看出。又或者，坐在自己俱乐部里，相对安全的赫普怀特式（Hepplewhite）椅子上，你也许能为国会里“新辉格党人”有所减少而欢欣——福克斯、谢里丹、查尔斯·格雷、谢尔本，也就是那些坚持反对“侵犯出版自由”，或是“取消人身保护令”措施的人，那些对法国大革命抱持友善观点，并且拒绝公开放弃这种观点的人。又或者，你要是特别勇敢，特别愤怒，或是喝得大醉，革命乐观情绪飙升，你还可以一不做二不休，加入那些手工业者的俱乐部。在那儿，你可以举杯祝愿潘恩身体健康，祝愿英国共和制立刻实现，祝愿暴君立刻死亡。既然政府的探子无处不在，这么做也就十分危险了，哪怕祝酒时并没有政府的间谍在场。此时，约翰·塞沃尔当了“伦敦通信协会”的首席演说家。据一名探子报告，有一次，他把一瓶啤酒瓶口的泡沫猛地打飞了，还说：“我就要这么服侍那些国王！”这个笑话，后来在“老贝利”（Old Bailey，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给塞沃尔惹

了不小的麻烦。

当然还有另一个选择：彻底离开英国，一了百了。你可以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呼吸一些自由、平等，特别是博爱的空气，陶醉其中，为将来可能作为自由部队的先锋，杀回英国而奋斗。法国人似乎把英国激进派视为兄弟姐妹，托马斯·潘恩也当了法国的荣誉公民。来到自由的水源狂饮，这不仅仅是政治旅行的姿态，而是新生活的承诺。

但是，尽管很多人在尝试，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出这样的飞跃。约翰·塞沃尔在1792年夏天或者秋天，给自己放了个假，不再对着越来越多的听众讲解自由和正义的根源，而是出去旅游，横穿了肯特郡。他展现出文学上另一面自我的个性，装成逍遥学派的席尔维纳斯·泰奥弗拉斯托斯（Sylvanus Theophrastus），来到了多佛尔的白色悬崖（White Cliffs），眺望着“白沫四溅的怒涛”，这片海把他和自由的国度——法国分开了。这个地方，对他而言，当然是不列颠大好山河的精华所在，但是可看的地方太多了，他没有办法拿定主意，是海滩还是悬崖顶上的景色更加壮丽。他想尽收眼底，于是爬上爬下“超过十多次”。但后来，他燃起了雄心壮志，想要攀爬一面几乎垂直的峭壁，“只有一束接骨木，一丛百里香，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当扶手”。爬到四分之三的时候，逍遥学派的先生陷入了严重困境：既没有向上的路，也没有向下的路。这个局面，恰好反映了约翰·塞沃尔在政治上的两难处境。这个“伦敦通信协会”的西塞罗[注]，当局眼中极端的共和主义煽动家，确实既没有向上的路，也没有向下的路。于是，他暂时稳住身体，“尽管我的心脏惊悸不已，自己都能够听到……我尽可能冷静下来，在头顶的悬崖之下，眺望那宽阔大海的一片宁静”。他把“渴求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法国峭壁，不由得后悔了，因为我不能将目前的处境，变为光荣……危险，用正义之剑，去跟勇敢的法兰西民族一道，进行无畏的斗争，捍卫他们新生的自由”。

塞沃尔做不到。最终，他还是清楚，自己是一个不列颠的爱国者，要用自己的方式爱国。他的双脚必须站在不列颠的土地上。于是，“我设法爬了下来，从一个悬崖挪到另一个悬崖，终于毫发无损地落到了海滩上，带着一小片白垩土、一小支百里香……这些战利品的获得，比一切天下的掠夺者、破坏者的血腥荣耀，带有更多的纯洁。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们、恺撒们，英国的爱德华们、亨利们……因为他们，人类的和平一直在遭受劫难，而且还那么频繁”。可怜的塞沃尔！后来，他曾经试图在利斯文（Llyswen）的威尔士黑山（Black Mountains of Wales）当个农场主，最后还是回到了伦敦，教授雄辩术。他一辈子永远在接近幸福，却从未得到幸福！

---

1. 迈里奥尼德郡：拼写应为Meirionnydd，威尔士西北部一郡。——译者

注

2. 林恩·厄蒂恩：拼写应为Llyn Erddyn，威尔士北部格温内思郡（Gwynedd）湖泊。——译者注

3. 德鲁伊教派（Druid）：凯尔特人的古代宗教，教义神秘，崇尚自然。后来因罗马入侵和基督教打压而衰落。——译者注

4. 玛格丽特·伊赫·伊万斯（Margaret Uch Evans，1696—1793），威尔士摔跤手、竖琴家，是很多民间歌曲和传说的主人公。——译者注

5. 詹姆士·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英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代表作是《约翰逊传》。——译者注

6. 约翰逊博士即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文学巨匠。与鲍斯韦尔于1774年去威尔士北部旅行，写有游记。——译者注

7. 摩西·格里菲思（Moses Griffith，1724—1785），英国医生。——译者注

8. 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s，1154—1485），也称“安茹王朝”，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发起多次对外战争。——译者注

9. 啰唆（Ross Hall）是英国乡下人对法国名字Rousseau的错误发音，这里用来搞笑。中文做相应处理。本句为了模仿方言口音，用了一些不规范的拼写，中文仅在用词上加以口语化，拼写错误则不加以反映。——译者注

10. 大键琴（harpsichord），又称羽管键琴、拨弦古钢琴，一种15世纪至19世纪初使用的键盘乐器。

11. 美国有一位博物学家和画家，名叫约翰·詹姆士·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1851），才华横溢。——译者注

12. 索尔兹伯里平原（Salisbury Plain），英格兰南部的高原地带，史前巨大石柱的遗址。——译者注

13. 公用地（common land）指一群人共同拥有的土地。——译者注

14. 户外开阔地（open fields）指还没有圈起来的地。——译者注

15. 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Church），基督教新教的一个分支，关注社会下层群众，主张热情但严格的生活方式。——译者注

16. 乔治三世当时的头衔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因此是两个王国。爱尔兰1801年才并入英国。——译者注

17. 当时欧洲贵族妇女习惯在激动的时候摇扇子。——译者注

18.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古罗马政治家、著名演说家，擅长煽动听众的感情。——译者注

第二章　自然的力量：回家之路

上一章的结尾，说到了作家约翰·塞沃尔揪心的焦虑。不过，著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直到1792年春，还完全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情绪。他访问法国，是一场“希望与快乐的惬意修炼”。

强大的盟军站在我们一边，而我们因有爱而坚强。

幸福啊，活在那个黎明之中，年轻人更是如在天堂！

至少，这就是他12年之后的回忆，尽管这时候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远没有当时那么仁慈宽厚了。他参与革命，后来退出的编年史被他写成了长诗《序曲》（*The Prelude*）的一部分。《序曲》堪称是英语（或者任何其他欧洲语言中）最杰出的自传体诗歌。第一部分写于1798—1799年，正值华兹华斯的思想经历深刻转变的时候。

《序曲》的重要主题，是作者想要通过记忆，坚守童年时的那种本能生活，即使随着成长，他被不可避免地拉向了拥有个人自我意识的成人思想。他认为，沉浸在大自然当中，就极大地帮助了这场斗争，不让自己的纯真被时间和社会经验侵蚀，虽然这种侵蚀还是难免的。自然就是自由，而世事却是一所监狱。成熟的华兹华斯，通过大量而深切的回忆，做回了“自然之子”。他描写了自己在坎布里亚郡的童年。整个童年，他都在逃离，在对抗我们如今叫作“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东西：抵抗鹰岬小镇（Hawkshead）上，学校里死记硬背，充满“事实”的课程。他排斥这种学校，而将大自然变作自己的导师和运动场：

啊，我，一个五岁的孩子，

常在河边磨坊的水道里度过夏日；

时而沐浴阳光，时而跳入水中，反反复复。

或有时——当山野、树木，以及远方昂然翘首的斯吉多峰，都在最浓郁的辉光中染成古铜色——

我会独自站在天地间，似乎出生在印第安人的平原，

一时跑出母亲的茅舍，任性地纵足四面八方，尽情游玩，

像一个赤裸着身体的野蛮人，在忽至的雷雨中夸耀着勇敢。

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Cambridge），华兹华斯依然不愿意急着去满足父亲的期望——让他进入教会，或是法律界。他也不算特别痴迷学业：

不必多言校园中学业的辛苦，

讲座室里那些见缝插针的座椅和密密匝匝的学生……

这些由他人去津津乐道吧，

我很少获取也无意追求这类荣耀。

这个倔强、焦虑的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在等待他。这种心态之下，1790年夏，华兹华斯决定跟好友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徒步游览阿尔卑斯山。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这种旅游，是一种道德和政治品性上的宣言。两个大学生在7月13日，来到了法国北部的加来港（Calais），正是法国民众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的前一天。他们选择这个日子，当然不是巧合。二人一来，就目睹了鲜花与自由的狂欢节日。他们向着东南方穿越法国，看见：

到处都弥漫着亲切与幸福，

犹如春天惠顾八方时，

将花香洒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旅途中，还有一次，他们让一群载歌载舞的村民围住了："有的口若悬河，欢乐之情不能自制。"村民招呼他们吃晚饭，还跟他们围成一圈跳舞：

所有人都敞开心扉，所有的声音，都抒发着亲睦与欢乐。

我俩拥有在法兰西受尊重的名声——英国人的名声，

他们向我们致贺，充满友善，称我们是光荣之路的先行者。

过了两年，华兹华斯第二次法国之旅过后，他心目中，青涩的纯真或许已经消逝了，但政治理想主义还保留着。华兹华斯的家人对他的职业表示担心，诗人一边安慰家人，一边动身去了伦敦，在伦敦见到了约瑟夫·约翰逊，以及圣保罗大教堂的圈子。此时，正值伯克与潘恩辩论的高峰。他在下议院见到了伯克：

挺拔如橡树，累叶垂覆的额上伸出鹿角似的枝杈，

却更能震动林中的幼木……

当他……称习俗中结成的纽带,具有强劲的生命；

当他以蔑视的眼光否定时髦的理论，强调人们生来就有的忠顺。

可是，华兹华斯之所以为伯克写下这种回顾性的颂扬，把他比作英国大自然，说他像布满节疤的橡树，蔑视革命风暴带来的最坏打击，这说法，基本上是对旧日浪漫保守派的回忆。当时，华兹华斯依然采取潘恩式的激烈态度，写文章痛骂当权者，所以这时候他对伯克，实在不可能抱有这么热情的态度。

而且，过了很久，华兹华斯还坚称，他1791—1792年第二次去法国，只是为了学法语，是一趟学习之旅。然而，记忆就在这里变得不诚实了。当时，法国正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对手是奥地利皇帝（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兄弟）和普鲁士国王，二人都公开支持君主权利，要把路易十六，从那些以人民的名义篡位的人手中解救出来。华兹华斯的说法，就好像说“1920年去俄国只是为了研究普希金”一样。而且华兹华斯确实向一个朋友承认（尽管带着悲伤、悔恨）：“我在大革命的时候去了巴黎，大概是1792年或者1793年，而且很热心地参加了。”他的革命热情当时一定很高，因为他在法国的朋友全都是立场激进的英国流亡分子，比如罗伯特·瓦特（Robert Watt）、汤姆·韦奇伍德（Tom Wedgwood），还有诗人、小说家海伦·玛丽亚·威廉斯（Helen Maria Williams）。华兹华斯为海伦神魂颠倒，给她写了一首感伤的诗，写的是她掉眼泪的场景。

但这一切都不意味着他从到法国第一天开始，思想就毫无保留。他在漫游巴黎的时候，写下了忧喜参半的感受：

我睁大眼睛，以异国人的耳朵，

倾听小贩的叫卖和演说家的阔论——一片疯狂的喧噪！

还有频作嘘声的派别众人，都眼神炽热，

或三五成群，或成双结伴，或孑然一身……

拥有不容置疑的真理。

在巴士底，我坐在阳光下，看无声的微风逗弄着尘埃。

我从弃物中拾起一块石头，将这文物装入衣兜，

俨然一副狂热分子的气派；

然而，坦率地说，我表现出的情绪多于我的所感，

因为我未能找到我要寻找的东西。

华兹华斯本来约好要跟朋友在奥尔良（Orléans）见面，却没有找到，于是沿着卢瓦尔河（Loire）往下游去了布卢瓦（Blois）。此时，布卢瓦已经变成一座要塞，用来抵抗即将到来的国内外敌人。但真正爆发的战争，是在华兹华斯内心。在布卢瓦，他“成为共和派，我的心献给人民”，但他的忠心却被有生以来最为强烈的情感扰乱了，既包括友情，也包括爱情。他的恋爱经历，纯粹是卢梭小说《新爱洛漪丝》（*La Nouvelle Héloïse*）里的通俗闹剧，一场禁忌的师生恋，只不过卢梭笔下是男老师和女学生，这一次变成了女老师和男学生。华兹华斯的老师名叫安妮特·瓦隆（Annette Vallon），出身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家庭。她用家族势力保护了这个孤单的英国小伙子，给了华兹华斯渴求的一切感情，还想转化他，让他跟自己家人一道反对革命。而华兹华斯又跟一个年轻的法国军官交上了朋友，军官是佩里戈尔（Périgord）人，名叫米歇尔·波普（Michel Beaupuis），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的友情，把华兹华斯拉向了相反的方向。华兹华斯感叹，波普就是大公无私的爱国主义的象征，因为波普之前放弃了贵族出身和头衔，变成了人人平等的法国新公民，一位自由战士。

波普跟华兹华斯一样，打动他们的主要是人民的现实疾苦，而不是高尚的哲学思想。因此，华兹华斯可能也觉得波普是同道中人。华兹华斯在湖区的住处，见过一些愁眉苦脸、衣衫褴褛的老兵，这些老兵给他的震撼无法用语言表达；以及，他有一次在伦敦街上走，遇见了一个盲乞丐，昂首挺胸：

他靠墙站立，仰起脸庞，

胸前那张纸上写出他的身世，

他从哪里来，他是何人。

华兹华斯在布卢瓦，也恰好跟波普遇上了“自然”教授的一课：

一天，我们偶遇一名饱受饥饿摧残的少女，

她拖着疲惫的脚步，尽力与她的小母牛同行，

她用一根绳子将小牛拴在手臂上，任它舔食着小路上的食物。

只见她那无血色的双手不停地编织，无精打采地打发着孤寂。

看到这景象，波普情绪激动地说："我们就是为此而战！"华兹华斯也表示同意：

一个吉祥的幽灵在四处游荡，势不可当，

绝除如此赤贫指日可待……

永远取消允许各阶层相互排斥的法规，

废除虚华的仪式，推翻纸醉金迷的权势与暴政——

不管他一人独裁还是寡头政治，

终将看到人民，作为世界的主宰，

积极参与制定自己的法律，让全人类过上更好的日子。

"自由"和"平等"能够完美结合的梦想，想要实现，当然比空喊口号来得困难多了。法国的战争危机越来越深，疑心病代替了欣快病。1792年8月10日，共和制以流血的方式代替了君主制。巴黎市民攻占了路易十六所在的蒂伊尔里宫，杀了瑞士卫兵，囚禁了国王。那些对共和国还保留意见的人，以及生来享有特权的人，如今有义务来显示，他们比"纯洁者还要纯洁"了。波普也毫无悬念地，以"公民士兵"的身份死去了，成为千万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之一；而这种理想，天天在巴黎街道上被侵犯。华兹华斯哀悼这位共和主义的朋友，但与此同时，他却当了一名保皇党婴儿的父亲，从而陷入了危险当中。这是一个女孩，12月出生，起名卡洛琳，在巴黎登记的父亲是"公民威廉姆·华德华特"（Citoyen Williame Wordwort，威廉·华兹华斯的化名）。华兹华斯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1793年2月，英国对法国宣战。不列颠与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华兹华斯要么留在法国，照顾情人和女儿（此时当局的疑心加重了，她们更需要保护），要么跟其他一些英国流亡者一样，收拾行李，回到英国的多佛尔。这些流亡者当中，就包括之前提到的罗伯特·瓦特。瓦特已经感觉到事情不妙，对法国局势感到疑虑，担心自己可能回不了英国。最后，华兹华斯选择了第二条路，但他还是犹豫了一段时间，对自己说："我回伦敦是为了给自己效忠的两份事业筹款，一份给英国的革命，一份给反革命的情人和女儿。"然而，他一走就是十年，十年后方才与安妮特和卡洛琳重逢。

华兹华斯走的时候，其他坚定的"自由之友"依然陆续抵达法国，其中很多

人是“72圣保罗教堂餐会”的来客。1792年，托马斯·潘恩又出版了《人权》第二部，内容更加激进。英国气氛此时已经十分紧张，第二部一出版，潘恩就成了社会公敌。5月21日，司法部门传唤了潘恩，让他回答一项严厉指控，罪名是煽动性诽谤（seditious libel）。但是，政府很可能最后相信，与其让潘恩在法庭上当个烈士，倒不如前往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法国，这样他造成的损害要小一些。于是，潘恩又得到了充分的机会，逃跑了。8月以来，巴黎已经成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首都。潘恩在巴黎受到了热烈欢迎，法国人把他当成英雄，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选他为加来全国代表大会（Calais to the National Convention）代表。而且，尽管潘恩几乎一句法语也不会说，他还成了宪法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富有博爱精神的“英国人俱乐部”（British Club）成立了，全名是“人权之友巴黎分部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Rights of Man Meeting in Paris），聚会地点是巴黎皇家宫殿（Palais-Royal）的小神父广场（Passage des Petits-Pères）。成员除了英国人，还有共和主义的美国人、爱尔兰人。这些人忙着给国民公会写信，表达“不列颠人民”多么渴望摆脱专制主义和贵族统治，争得自身的解放。主要成员有：画家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年轻的商人兼写手托马斯·克里斯蒂（Thomas Christie），苏格兰诗人、退伍兵约翰·奥斯瓦尔德（John Oswald，曾为英国革命训练志愿者），民主派贵族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Lord Edward Fitzgerald，也是退伍兵，策划了爱尔兰革命），海伦·玛利亚·威廉斯跟情人，富商约翰·赫福德·斯通（John Hurford Stone），还有托马斯·潘恩自己。华兹华斯走后刚刚一个星期，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来加入组织了。

自从她写了《男权辩护》，给埃德蒙·伯克突然一击之后，她经历了很多变故。公众看到她发出的批评如此尖刻，很是吃惊，不论是敌是友，都传开了她的名声，叫她“亚马逊女战士”。之前戏弄过卢梭的保守派作家霍勒斯·沃波尔就没有这么客气了，骂她是“穿衬裙的鬣狗”。潘恩和约瑟夫·约翰逊却明白，他们找到了一个强硬的天才辩论家，她不会知难而退，哪怕在危险艰难的时局之下也不会。潘恩甚至在逃离法律追捕之前就在巴黎居住，很可能就是他建议玛丽，写点什么来回答。在自由平等的新时代，妇女会提出的一些问题。潘恩与社会政治哲学家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关系密切。侯爵是法国作家中，极少数能把进步思想扩展到女性社会政治民主领域的一员。

不管动机是什么事件或者什么人，总之，玛丽抓住了这个机会，发表了她对于妇女问题的看法。她拼命写了六个星期，完成了《女权辩护》。如果她花上六个月，可能会写得更好一些。尽管这本书结构混乱，经常离题，而且内容重复，但这些问题却都没有遮掩或损害书中锋芒毕露的勇气；书中对于两性关系的历史分析，从根本上说也是正确的。书中很多观点，比

如：女孩子被强迫塑造成男人喜欢的刻板类型，玩着娃娃，喜欢漂亮衣服的“微缩版风情女人”；放弃了身体与心灵的独立，陷入偶像化的奴役中；书中还批驳了一些错误观念，比如“女性生理条件决定了自己无法严肃思考”；现代的女性主义经常谈论这些，来显示男权世界对女性多么不公平；这些话题已经很平常了。但是，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时代，这些话题堪称惊世骇俗，就连那些觉得自己站在进步自由一边的人，也难免这种看法。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玛丽选了圣人一般的让–雅克·卢梭当作自己的头号敌人。玛丽相信，卢梭重申了一种古老的谬论——两性之间有着生物学的根本差异，用现代看法表达出来，因此成了伤害女性的罪魁祸首。玛丽的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她认为，卢梭的“荒唐故事”简直“不值得蔑视”，而且完全没有一手材料做基础。传统上的无稽之谈——所有的女孩都应该擅长做饭、打扮、闲聊，在卢梭笔下得到了恶劣的延续。卢梭还坚持说，女孩子的教育，就应该围绕着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卢梭还主张，“照教育男性那样来教育女性，她们和我们男性越相像，她们支配我们的力量就会越小”。玛丽对此回应：“这点也正是我的目的。我不希望她们有支配男人的力量，而是希望她们有力量支配自己。”难怪卢梭认为，他的同居伴侣，没有什么文化的泰蕾兹这个“愚人”如此“合乎时宜地恭顺”。既然卢梭不能把泰蕾兹擢升到理性之人的层次，他就下了决心，要把其他女人也都贬低到泰蕾兹的水平。玛丽宣称，女人不应该被人赞美“娇弱”，被困在这种束缚思想的陈词滥调当中，而是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男孩女孩在小时候就应该接受同样的教育，这样才能容易地熟悉异性的共同人性，熟悉对方推论的能力，而不是彼此隔离，也不是与父母的家隔离。因为这一点，玛丽也强烈反对寄宿学校。

卢梭另外一个错误，是盲目迷恋“浪漫爱情的传播”，这观念鼓励人们结婚（当这种婚姻不仅仅是财产交易的情况下）并且带有期望，而这种期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如果把爱看成一种兽欲，它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先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幻灭，紧随其后的，则是背叛、放荡、苦涩。而要好得多的教育方式，则是让女孩子拥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不是成长为大人模样的玩偶，而是成长为真正的伴侣，男人的朋友，用这样的友情来对抗欲望那不可避免的衰退。毕竟，“因为它（友情）是建立在原则之上的，并且是依靠时间巩固起来的，所以是一切感情中最崇高的感情……倘若妇女受的教育比较合理些，倘若她们对事物能有比较全面的看法的话，她们会满意于终身只恋爱一次，并且婚后安静地让热烈的爱情化为友情，化为亲密的体贴，这是避免忧虑的上策”。

但是，玛丽写下这些的同时，也逐渐迷上了约翰逊的常客之一：瑞士画家亨利·福塞利，此人正值中年，非常健谈。最适合福塞利的形容词是“古

怪”“奇妙”，他的作品包括了各种新古典主义的历史。有一幅《噩梦》，带有前弗洛伊德时期的风格，画的是肌肤惨白的少女，躺在松软的床上，身体拖到地上，腰上蹲着小恶魔一样的妖怪。这是欧洲民间对睡眠瘫痪症状，俗称“魇住了”一种传统上的描绘。其他的作品，有的画了莎士比亚笔下瑰丽的幻景，比如《麦克白》（*Macbeth*）中的女巫，还有《仲夏夜之梦》（*A Midnight Summer's Dream*）中演员巴腾（Bottom）的驴头；最重要的还有大量色情油画、素描，画了女人的各种发型，体现的都是不现实的生殖崇拜。1788年，福塞利放弃了单身主义，娶了索菲亚·洛林斯（Sophia Rawlins）。这些幻想，有很多都以索菲亚为模特。福塞利痴迷色情，这爱好在别人看来十分怪诞，而且这痴迷还带有强迫性，经常用露骨的方式表现出来，让他名声很坏。本来，玛丽不可能跟这种人做朋友，因为《女权辩护》专门提到性欲是男女关系腐化的根源，是浪漫主义自我欺骗的根源，能毁坏理性和友谊。但是，玛丽或许认为，福塞利与其说是色情的俘虏，倒不如说是一位超然的分析师。无论如何，不知是因为情急还是因为规则，玛丽向福塞利示好，让自己成了福塞利的亲密伙伴、灵魂伴侣，而不是情人。福塞利似乎一直因为她的坚持而心神不宁，不过，1792年夏，玛丽、福塞利、索菲亚，还有约翰逊（他绝对不是花花公子），这个奇怪的四人组，动身前往法国，准备花六个星期旅游。一行人到了多佛尔，这时，巴黎已经硝烟四起，这场争斗，终结了法国的君主制。听到的新闻，尽是一片血腥的混乱。众人只好打道回府。玛丽因法国的局面变得非常沮丧，冲动之下，她去敲索菲亚的门，向年轻的妻子宣称，玛丽、索菲亚、福塞利应该三人建立一个家庭。索菲亚理所当然大吃一惊。玛丽说：“我向来不会骗人，可以这么说——这个提议，有我对你丈夫真诚的感情做基础，因为我发现，要是不能天天看见他，跟他交流，缺了这种满足感，我就活不下去了！”玛丽并不想把福塞利抢过来做丈夫，这个名分，玛丽很慷慨地让给了索菲亚；但玛丽还是主张，她和福塞利“精神上”必须在一起。索菲亚大惊失色，严禁玛丽再踏进门槛一步，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玛丽大受打击，陷入了困惑与痛苦，决定一个人再去法国。她没有重视风险，说这次旅行是一次浪漫的冒险：“我还是飞来飞去的半老徐娘。在巴黎，我可能真的会找到一个临时丈夫，等到懒惰的心灵再次渴望与旧日朋友依偎在一起，再跟他离婚。”然而，哪怕在平日，她一个人去法国，也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甚至可以说有勇无谋。而现在偏偏又是非常时期。1792年12月初，玛丽终于穿过了英吉利海峡。此时，法国革命已经进入了饱经曲折、疑神疑鬼的阶段。之前，普鲁士入侵法国。雅各宾派领导人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口若悬河，号召各地动员了整个共和国的人力、物力，加上运气的眷顾，终于击退了普军，守住了巴黎。社会十分不安，欢欣与恐怖气氛并存，于是同一群人，今天是英雄，可能明天就成了叛徒。那些对共和国表忠心表得最热烈的人，可能发现，他们热情的事

业，被人当成了搞破坏的烟幕弹。巴黎的外国社团，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除非他们能表现为热情的激进分子，参与保卫国家，求得解放的战争，比共和主义者还要共和主义，否则极有可能被指控为“第五纵队”——间谍。华兹华斯就是因为遇到这种恐慌气氛而离开的，而玛丽发现，自己来到了这种气氛当中。怀特旅馆的同人，全都力图安慰玛丽。但玛丽操着一口不熟练的法语，与很多人一道发现，她在英格兰做的那些严肃认真的英法翻译，并不足以让她做好穿过巴黎街道的准备。玛丽认识一个女校长，是伦敦人，校长有一个女儿，刚刚结了婚，名叫阿莉娜·费列塔兹（Aline Fillietaz），玛丽就留宿在费列塔兹家。费列塔兹的宅子，在巴黎的玛莱区（Marais）穆勒街（Rue Melée）上。这一片，正好位于巴黎革命最兴盛的地区之一的中心，街上到处有人拿着棍棒长矛，气氛火热；而且，这条街还正好是革命派监狱到刑场经过的一条大路。

于是，不管玛丽的意愿如何，她就近距离观看了一场充满横死，冤冤相报的生活剧。她在巴黎住了几个星期，看见了法庭审判路易十六。国王沉着冷静，不失尊严，让玛丽吃惊不已。事后她给约翰逊写信坦白：“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心里百感交集，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可是，这封信也充满了恐惧。

不，不要微笑，可怜可怜我吧——有一两次，我把目光从纸上移开，就看到椅子对面的玻璃门外，有眼睛向我怒视，有染血的手向我挥舞。我连远处的脚步声都听不见……要是把那只猫带来有多好！——我想看到活物呀！那么多种可怖的死亡，把我的幻想牢牢困住了。我睡了——生平头一遭，我无法熄灭蜡烛！

这不是玛丽期望的革命，也不是玛丽期望的生活。1793年，英法战争爆发。法军在尼德兰被英军打败，多名将军倒戈投降，激发了不可避免的国内冲突，大家都要“把叛徒揪出来”。于是，建立了“革命的”简易程序裁判体制，告发，逮捕，砍头的死亡韵律响了起来。怀特旅馆的团体，跟一些相对保守的共和主义政治家有着最亲密的关系——孔多塞，以及温和的吉伦特派（Girondins），他们很多人投票反对判处路易十六死刑；如今，雅各宾派的革命政府把这些政治家指控成了“伪爱国者”，祖国（patrie）实际上的敌人。推而广之，托马斯·潘恩为首的英国人也受到了深深的怀疑，毕竟他们属于帝国，不论自己是否愿意。

最有名的反对处死国王的一票，确实是潘恩投的。很多人希望对国王从轻发落，实际上让潘恩成了一个仁慈的榜样；之前他说过，自己“共和主义者的信用”无可挑剔。尽管如此，潘恩还是表示，法兰西共和国应该彻底废除死刑，这大概是他不切实际的乐观精神的极致；于是，他口若悬河地雄辩，路易十六“作为个人”（而不是机构），“不值得共和国的关注”，潘恩还说，革命对敌人和朋友都同样欠缺慈悲之心。对雅各宾派而言，潘恩

这是变节，而且异常邪恶。乃至于雅各宾派最激进的代言人——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大叫起来，说译员一定把潘恩的话翻译错了。而当潘恩的意见证实之后，马拉决定，既然潘恩是基督教贵格派，按照贵格派宗教原则反对死刑，则应该禁止潘恩投票。

潘恩还是投了票，然而，到了1793年夏，革命政府和恐怖政策体系建立，潘恩发现，无论是在君主制的英国，还是共和制的法国，他都遭到了百般诋毁。这是多么诡异的事！审判国王之后没多久，“英国人俱乐部”就解散了。不过，法国国民公会里那些赞助、支持俱乐部的人遭到了清洗，监禁，审判，处决。这么一来，英国人步他们的后尘，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跟潘恩同在旅馆的朋友之一威廉·约翰逊，对局势感到极度恐慌，在旅馆台阶上企图自杀，先用刀扎了自己的胸，又像演戏一般，从台阶上滚了下来。8月底，英国海军攻占法国东南部港口土伦（Toulon），夺取了海军基地和城市。此后，任何跟英国的关联，都成了致人死命的罪证。潘恩、海伦·玛利亚·威廉斯和俱乐部一些其他成员一道被捕，关进了卢森堡宫，此地原先也是一所王宫。潘恩之所以没有落得上断头台的下场，只是因为一次奇迹般的好运。当时，第二天要处死的犯人，监牢的门上都要画一个标记。潘恩的门当时恰好是敞开的，画标记的人很匆忙，把标记画在了门内侧，于是，后来一关门，这个标记就看不见了。至少，这是潘恩自己的说法。

对玛丽而言，她也经历了同样的精神苦痛：《女权辩护》着力抨击的恶人——让–雅克·卢梭的形象变得到处都是。卢梭曾经提出过“美德共和国”（Republic of Virtue）的概念。如今，“美德共和国”守护神的画像，印到了招贴上、酒杯上、爱国小册子上。之前有过很多妇女俱乐部，强烈要求公民权与各种合法权利。雅各宾派关闭了一切妇女俱乐部，逮捕了负责人。要是她们胆敢张嘴抗议，还会在大街上遭到痛打。女人为祖国应尽的义务，跟卢梭开出的药方完全相同：接受“温柔贤淑”的思想教化，来安慰公民士兵（当时对法军士兵的称呼，因大革命时期主张人人平等，人们互称公民），为祖国儿女哺乳。

玛丽别无选择，只好顺应了敌人的规矩，聊以在恐惧不安中寻到一个避难之所。所谓避难之所，在现实中，就是一个帅气的男人，名叫吉尔伯特·伊姆莱（Gilbert Imlay），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也是个作家。伊姆莱此时正在销售“革命的快乐”，具体来说，就是村落和小城镇的房地产，只有在这里才能播种，收获快乐。伊姆莱的著作《北美西部地形概况》（*Top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Western Territory of North America*，1792）跟他本人一样，拥有多方面的吸引力：游记、土地测量记录、商业性的广告文学。伊姆莱深谙浪漫的威力。玛丽，这个时而生机勃勃，时而深感不安的女人，有某些品质逐渐吸引了他。两个人恋爱了，而且恋爱关

系很快变得更加正式。玛丽对外成了“伊姆莱夫人”，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这就保护她免受了针对英国人的敌意和疑心，毕竟，法国人还在跟英王作对，英王的子民在法国当然不会有什么良好待遇。6月，玛丽在巴黎西部郊区纳伊（Neuilly）的一处农舍安顿了下来，照料花园，跟伊姆莱轻声细语当天的双人晚餐。玛丽，这位《女权辩护》的作者，曾经如此坚决地反对浪漫主义热情那欺骗的，富有破坏性的本质，而今，她却陷入了浪漫主义狂热的痛苦。早在8月，玛丽就已经发现，伊姆莱并不想窒息在这么强烈的感情当中。带着她先前鄙视的言情小说里的感情，玛丽给伊姆莱写了一封绝望的哀求信：“是的，我会守规矩的，我也许应该得到快乐；只要你还爱我，我就不会再次坠入痛苦的深渊，这深渊把生活变成了重负，几乎让我无法忍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在思想上依赖起别人了。

1794年1月，玛丽有了身孕。伊姆莱一出差做生意，玛丽就心神不宁，以泪洗面。玛丽越是依赖丈夫，丈夫就消失得更加频繁，丢下玛丽一个人，只是有了婴儿的憧憬，才把她从病态的忧郁拯救了出来。玛丽决定采用现代的孕妇养生法，确保自己的运动量。5月，女儿范妮（Fanny）出生了。女儿出生第二天，玛丽就下了床，把接生婆吓了一大跳。法国传统观念认为产妇生育是不洁净的事，需要举行“净化仪式”，把产妇全身撒上灰烬。玛丽拒绝了这种仪式，而且几乎立刻恢复了锻炼，去乡间走路了。不消说，她也自己给范妮喂奶。只是她曾经写给朋友露丝·巴洛（Ruth Barlow）一封信，坦率地说自己“奶水泛滥”，有时候造成了生活不便。然而，伊姆莱却经常出门，只要他一在家就得病。玛丽得到的这个小生命，让她对法国各地的杀人狂潮产生了新的厌恶。她说：“我一想到革命流了那么多的血，那么多悲苦的眼泪，自己的血液就发冷，自己就觉得恶心。”

后来，雅各宾派恐怖统治遭到了温和派的强烈反弹，温和派联合起来，逮捕处决了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这下，全社会总算有了一点喘息的空间。潘恩等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场磨难，把他们永久改变了。此时，全国各地的旅行也容易了，伊姆莱抓住机会，去诺曼底视察自己的海运生意。玛丽的精神起伏不定，时而在坠入情网的欣快症影响下升到高峰，时而坠入阴郁的谷底想要自杀。这种情况之下，她跟着伊姆莱，带着孩子来到了勒阿弗尔（Le Havre，法国西北部海港），结果发现伊姆莱不止一次渡海去了英国。伊姆莱想要让她冷静下来，从伦敦写信给她，劝她回家。玛丽写道：“对我而言，英国不仅丧失了一切吸引力，还引发我的厌恶。”尽管如此，玛丽还是回到了英国，于是证实了她最大的恐惧。伊姆莱不想真正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而且这时他已经有了新欢。玛丽吞了过量的鸦片酊，想要自杀。伊姆莱虽然大惊失色，却并没有动摇，依然不想恢复两人过去的生活。他反而拟定了一个奇怪的计划，

好让玛丽分心。此前伊姆莱有一艘运输银子的船，在挪威丢了，伊姆莱就把玛丽送到挪威，让她去打听这条船的下落。

玛丽一生漂泊不定，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然而最古怪的一个，要数这一次的商业调查员。不过，她还是只带了小范妮跟一个女仆，动身去了北欧，先后走访了瑞典、挪威，想要找到丈夫的运银船。不出所料，并没有找到。玛丽住进了一家海边的小旅店。旅店的房子用圆木修建，漆成红黄两色，俯瞰着暗沉沉的海洋。在这儿，被政治与激情摧残得伤痕累累的她，终于找到了接近“自然恩典”的状态。她在海里游泳；她坐在石头上，沐浴着大风和北国的阳光；她飞快地写个不停。她写了一组“信”，打算作为沉思的笔记出版。她写道，挪威的渔民，才是她一直寻找的“自然之子”，这些人自由奔放，天真无邪，也不需要夸夸其谈的哲学论调，来指导自己的解放事业。

然而，玛丽清醒神智的恢复，只是暂时的。回到伦敦，玛丽又发现伊姆莱虽然不愿跟自己组织家庭，却愿意跟一名女演员——新的情妇成家。1795年10月的一个晚上，玛丽迎着暴风雨出了家门，决心一死。她一开始选定了贝特西（Battersea）桥，又觉得这个地方太显眼，很不舒服，于是花钱雇了一个船夫，请他逆流而上，把自己带到泰晤士河上的普特尼（Putney）桥。玛丽在瓢泼大雨当中来回走了半个小时，让衣服湿到足以沉在水底的程度，然后付了半便士，上了桥，翻过栏杆，一跃而下。之前她给伊姆莱写了一封遗书，说道：“让我的罪孽与我一道长眠吧！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燃烧着烈火的头颅已然冰冷……我渴望着死亡，我会投入泰晤士河，只有这里，才是别人最不可能把我带离死亡的地方！”

然而，玛丽并没有料想到，现代的慈善事业无处不在。此时，英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英国溺水者营救会”（Royal Humane Society），由公家出钱，专门奖励渔夫，从河里打捞自杀的人上岸。泰晤士河上到处都是船夫，专等着有人跳河。船夫们尽职尽责地救起了玛丽，把她送到了富勒姆区（Fulham）的酒馆“公爵之首”（Duke’s Head），让她静养身体。玛丽经历这么一场奇耻大辱，痛苦万分。她立刻跟伊姆莱提议，组成一个三角家庭，这样女儿至少认得爸爸是谁。有一阵子，伊姆莱犹豫了，把玛丽带去自己家做客，然后（极有可能）遭到了那女演员的坚决拒绝。

这一年，玛丽37岁。除了孩子，她似乎什么都失掉了：她失掉了解放人类的革命理想，失掉了用友情而不是激情维系的婚姻的信心，失掉了作为真正独立女性生活下去的可能。至于“自然的好生之德”，在她看来，实在是残忍的笑话。玛丽给福塞利写了一封信，想把她写给福塞利的信都要回来。她喊出了自己的伤痛：“只剩下了我一个。我遭受的不公平，直接把我一切萌生的希望都扼杀了。我胸口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心灵沉入了痛苦的猜测之海。我焦急地发问，真实究竟是什么？真实又在哪里？我一直负

着血创，却每天挣扎着做工，提醒自己还要尽母亲的义务。”

约翰逊此时也是困苦已久，他帮着玛丽出版了《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Norway and Denmark*，1794—1795）。以他为首，还有玛丽另外一些朋友，尽可能给玛丽提供了帮助。然而，除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己的命运，他们还有别的东西，不得不去关注。玛丽跳河的那个星期，至少十万人举行示威，反对首相皮特，反对英法战争，反对“饥荒”。英国有史以来，距离革命，似乎从未如此靠近。

1794年整个春天，英国政府一直在忙着起诉那些作家、出版商、服务商，政府认为他们是煽动文学的幕后黑手。英国中世纪有一个罪名“策划国王死亡罪”，这罪名相对模糊，因此正好为政府所用。政府把这个罪名变成一项法案，规定只要出版物和公众讨论共和概念，甚至讨论男公民选举权，就是现行叛国罪。（一名检察官主张，如果不推翻合法的国体，男公民选举权又怎么能实现呢？）曼彻斯特有一名激进派分子，名叫托马斯·沃克尔（Thomas Walker）。政府有人看到他说了一句话“该死的国王”，就作证控告了他。后来，法庭认为证人喝醉了，作的是伪证，没有采信。但在当时，这种证词，是被非常严肃地当作叛国罪证的。“英国自由”的拥护者——托马斯·厄斯金（Thomas Erskine），几乎为这类案件的所有被告提供了辩护，他的名字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厄斯金冒着身败名裂、一贫如洗的风险，坚持主张一个原则：单纯的言论或者出版物，若没有证据证明确实有现实的阴谋行动，去犯下“骚乱”（tumult），甚至弑君（regicide）的罪名，则不应视为犯罪；特别是，政府如果扩大了煽动罪、叛国罪的范围，则这种扩大不应该具有追溯效力。1794年5月，伦敦通信协会创始人托马斯·哈代、约翰·塞沃尔、约翰·霍恩·图克，以及伦敦通信协会其他11名成员被捕。也是在5月，规定“未经审判则不得关押”的人身保护权令（habeas corpus）暂停执行。到了下半年，已经有2000人没有正当程序就被抓了。伦敦西北市区的乔克农场区（Chalk Farm）举行了一次大会，宣称不列颠已经“失去了自由”。

塞沃尔、哈代、霍恩·图克等人，都被关进了伦敦塔。中世纪被指控叛国罪的人，就关在这里，这一回大概是为了恢复当时的惯例。哈代的妻子听说丈夫入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害怕他可能会因为“叛国罪”被杀，流产了，不幸去世。塞沃尔被单独关押了五个月，后来又关进了新门（Newgate）监狱的“死洞”（dead hole），这里几乎完全没有光线，也几乎没有空气，条件更加恶劣。10月25日，一行囚犯正式被控“图谋推翻政府，杀害国王”。过了三天，第一个受审的是托马斯·哈代。中央刑事法院外面，早已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检察总长（Attorney-General）、约翰·斯科特爵士（Sir John Scott）花了9个小时，拼命把各种碎片化的旁证编

织起来，证实哈代有叛国阴谋，想要废掉国王，将其杀害。爱德华·瑟洛（Edward Thurlow）曾任上议院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他一听，就喊道：“9个小时？那么，看在上帝分上，他根本就没有叛国嘛！”政府方面的指控，确实几乎完全依赖各种法国的对应事物，比如，“公会”这个词的法国含义。

审判到了周末，托马斯·厄斯金做了辩护发言，长度“仅有”7个小时。厄斯金的观点，与之前威廉·戈德温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相似，他坚持说，一切言论（比如，哈代的言论；而且哈代言论极多）必须证明为实际的图谋，要直接杀害国王本人；而仅仅是抱怨国会，或者抱怨君主制的言论，则不应视为犯罪，而应当作为“自由政治辩论”加以保护。如果不知不觉地，把叛国罪的定义加以延展，哈代就会因为既和平又合法的一些行动而被判死刑。针对检察官“不忠”的非难，厄斯金睿智地反击：“我希望，一切法庭上，再也不要听到这样的言辞——为了人民自己的权利而将他们集合到一起，能够导致国王被害；谁能说出这样的话，谁就是国王最可怕的敌人！”这英雄气魄的演讲末尾，他对陪审团嘶哑地说：“我要沉入一片劳累和虚弱中去了！”接着，就真的“沉了下去”，瘫倒在地。陪审团为他的慷慨激昂所震撼，鼓起掌来。最后，哈代无罪释放。他对着法院外面欢呼的人群说：“同胞们，我把感激之情，奉还给你们啦！”众人从被告的马车上将马解下来，拉着马匹通过了河岸街，走过了威斯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沿着蓓尔梅尔街（Pall Mall）一路前行。11月17日，霍恩·图克的案子开庭。12月1日，塞沃尔的案子开庭。早在开庭之前，判决似乎就没有什么悬念了。霍恩·图克小心翼翼，声称自己同其他被起诉的煽动者相比，立场一直比较温和——这话当然是背叛行为，但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塞沃尔却没有准备好，作为“英国自然权利”（British Rights of Nature）的化身来声辩；于是打算如往常一样滔滔不绝，直到厄斯金让他闭嘴。塞沃尔痛失了这次对子孙后代发表演说的良机，略微不快，于是在1796年写成一本书，出版了。[注]

1794年年末到1795年年初的冬天，苦痛难耐，让皮特政府更加狂热地戒备起来。战争局势恶化了。法军先是占了奥地利尼德兰，又占了莱茵兰（Rhineland），最后打下了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此地的英国老朋友——执政长官威廉五世被废，用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取而代之。庄稼也严重歉收，让小麦价格飙升了75%。与此同时，出口下滑，导致纺织业大量裁员。伦敦居民用暴力做出了回应。居民掀起骚乱，攻入了以蒸汽为动力的大阿尔比恩面粉碾磨厂（Great Albion Flour Mill）。夏天，圣乔治空地（St George’s Field）举行了多次大规模集会。1795年10月28日，伊斯灵顿（Islington）的“哥本哈根之屋”（Copenhagen House）酒馆旁边的空地，又聚集了好几万人。伦敦通信协会认为多达20万，不过其他记录一般都在4万到10万之间。他们是来

听一个22岁的爱尔兰小伙子约翰·宾斯（John Binns）的演讲，宣传反战，谴责皮特政府。人们喊的口号是：“和平！面包！不要皮特！打倒乔治！”

第二天，国会召开，乔治三世乘马车去参加。在“林荫街”（the Mall）上，乔治的马车遭到了愤怒的人群袭击。有些人用绉布裹着一块块的面包，大喊：“不要战争，不要饥荒！”到了国会街（Parliament Street），又有很多人向马车扔泥巴，扔石头，砸坏了车窗。路上还有一个飞来的东西，在马车上穿了一个小洞，国王觉得可能是子弹打的。据说，国王来到上议院（House of Lords）之后，结结巴巴地说：“勋爵们，有……有……有人朝我开枪了。”归途，国王经过圣詹姆士宫，一路上民众同样不友好，扔了更多东西，砸坏了更多窗户。到了蓓尔梅尔街，骚动更加厉害，国王不得不下了车，马车也被人们砸了。有一名皇家马夫被车轮碾过，轧断了两条大腿，伤势过重而死。国王想要坐私人马车去白金汉宫（Buckingham House），却被人认了出来。毕竟，再也没有第二号人，是乔治三世这副长相了。短兵相接之下，第二辆马车又无法前行。据说有人开了门，想要把国王揪出来。幸好有皇家马队前来救驾，才没有落得不可收拾的下场。与国王直接发生肢体接触，当局对这种威胁格外警惕。因为就在去年，传说有一场“气枪阴谋”，刺客打算用改造的气枪朝国王发射一枚毒飞镖。但这很可能是间谍编出来的故事。当时社会上还风传各种谣言，说有别的阴谋，有人要同时在伦敦、都柏林、爱丁堡发动革命政变，把地方官、法官全都关起来，把贵族软禁起来，向国会算总账。

当然，有人袭击国王的御驾，对皮特政府而言，可是天赐的良机。因为事件对皮特政府实在是太有利了，有些激进分子甚至起了疑心，怀疑皮特和内政大臣（Home Secretary）——波特兰公爵可能策划了这起骚乱，尽管皮特和公爵两人的车驾也被袭击得很惨。愤怒的保皇派到处演讲，忠于王室的热情有如怒涛一般高涨。12月，皮特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两个议案，要求对全国实施更有效的保护和监管。第一个议案，让50人以上的集会一律变成非法集会；与会者如接到命令解散而拒绝解散，则可能被控死罪。第二个议案，进一步扩大了煽动罪的范围，禁止鼓吹改变政府，除了国会法案要求之外。换句话说：不准出小册子，不准请愿，不准集会，不准改革。华兹华斯1793年回到英国，之后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等级制的文章，形式上是一封写给兰达夫主教（Bishop of Llandaff）的信，观点属于潘恩一派。如今，他却不得不三缄其口了。托马斯·比威克此时在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他本来不是潘恩一派主张革命的民主人士，如今却愤怒得咬牙切齿。后来比威克回忆说，当时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时期，“无赖和无赖的教唆犯似乎统治了整个国家，而且逢迎权贵到了这样的地步——我认为，皮特先生倘若提议制定一部法律，将所有狮子鼻的人流放，60岁以上的人一概绞死，这些人……也会作为睿智思想、明智举措而大肆宣传的”。

于是，政治宣传，黑帮恐吓，忠心的爱国志愿民兵，言论审查，政治间谍，无证逮捕——这一切混合起来，毫无悬念地阻止了高涨的民主主义势头。威廉·戈德温等批评家、改革家，之前曾经在叛国案审理当中，对被告施以援手，如今也不得不放弃了直接的政治行动，转而思考乌托邦社会，逃离公众的狂热。无论如何，对于一切想要让政府去“改进社会”的提议，戈德温现在都不相信了。他的小册子《政治正义论》（*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1793）正合那些幻灭者的需求，因为主要观点是，对于理性的个人而言，义务只有一项：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任何机构，只要妨碍这一目的，都必须废除；所以不要宗教，不要政府体系，不要刑事法律（戈德温相信，社会如果自己产生犯罪，自己再惩罚犯罪，就是伪善的表现）；也不要系统的教育，不要除了满足个人需求之外的财富积累，特别是不要婚姻，因为激情一闪即逝，婚姻制度却让夫妻作了激情的俘虏。

最后一种观点，可能就是戈德温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唯一的共识。当初，约翰逊举行餐会的时候，戈德温记得玛丽也在场，他想听潘恩演讲，但玛丽总是说个不停，对她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然而，戈德温看到玛丽在北欧写的信之后，说了一句：“世上如果哪一本书的目的，是专门让一个男人爱上作者，那依我看来，应该就是这本书了。”戈德温先生五短身材，性格严肃，一身学究气，理性得简直不是人类。他与爱情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太近。却有不少女人——女演员和女作家，他称作“美人”的，向他示好，其中一些人的浪漫热情还很高涨。然而，最终是玛丽融化了他冰冷的心。而他，也反过来让玛丽变得更加多思、沉静了。玛丽和伊姆莱相处多年，备受磨难。在她加诸自身的一切痛苦过后，戈德温那冷静与笨拙的混合，大概是特别能打动人的。戈德温对她的情感越发坚实起来，玛丽也因此越发自由舒展。那个曾经公开怀疑性爱的女人，如今却唤起戈德温的热情，平复了他“背离信念”的不安，找到了奔放的快意。她写信给戈德温：“昨夜的欢情，如果对你的健康、对我的气色有同样的作用，你就没有理由为自己‘决心’的失败而叹惋。因为就在我今天早上整理头发的时候，看到了生命的火焰，奔涌在我全身；火焰如此旺盛，是我平生少见的——那是多么温情的回忆，唤起的幸运的潮红！”

玛丽又怀孕了。1797年3月，威廉·戈德温，这个坚决反对婚姻、教堂的人，与“伊姆莱夫人”在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堂（St Pancras Church）举行了婚礼。她第一次结婚，被认为只是共和主义公民的权宜之计，因此没有约束力。玛丽很高兴，因为自己并没有“承诺服从丈夫，以此阻塞自己的灵魂”。两人公开宣称，不会一直住在一起，而是继续尊重对方的独立，尊重对方同异性的交往，有时候搬到一起住，但各自都有房子。这种宣告在当时非常大胆。可是，随着玛丽身体越发沉重，戈德温发现自己说不清道不明地喜欢上了家庭生活，喜欢陪在玛丽身边。这种陪伴，完全发展成了

亲密的、夫妻之间的友情。这恰好是玛丽先前为“婚后持续的幸福”开出的药方，尽管她先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类似的生活。

而这，让一切的结局，哀伤得难以承受。8月30日，玛丽的预产期到了，她请来一名本地接生婆。玛丽又一次顺利生下了一名女婴，就是将来《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作者玛丽·雪莱。然而，孩子出生之后，胎盘却没有能随之从产道中娩出，说明将来可能会有败血症。家人立刻从威斯敏斯特医院请来一位医生。医生尽了全力，可胎盘还是裂成了碎片。玛丽流血不止，痛苦万分。

血终于止住了。玛丽用惊人的毅力告诉戈德温，要是没有下决心与戈德温分享自己的生命，她绝对活不下来。第二天，玛丽感觉好多了，她最看重的老师约瑟夫·约翰逊也来看她，玛丽很高兴。第三天，她情况似乎有了进一步好转，戈德温觉得，没有什么大碍，自己可以外出散步了。而等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玛丽浑身颤抖，抽搐不停，很明显发着高烧。这一病，她就再也没有好起来。过了一个星期，1797年9月10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为败血症，死了。

那年她38岁。戈德温，这个超级理性的人，悲痛得几近疯癫。他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现在，我的妻子过世了……我绝对相信，世界上不会有像她一样的人了。亲身体验让我知道，我们诞生，就是为了让对方幸福。我对今后是否还能遇到幸福，已不抱一丝希望。”有一句话，可以成为她最合适，也最奇怪的墓志铭：她，承载了一个男人的幸福，这个男人曾经向婚姻宣战。思想家戈德温通过玛丽学会了感情。“感情动物”玛丽也通过戈德温，恢复了思考的力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名正言顺地被后人奉为现代女权主义的创始人，因为，她发出了明晰而有力的宣言——女人一切的自然本质，是不能与生物性混淆的。而自然本质和生物性，却把她杀害了。

1797年10月17日，奥地利帝国咬着牙，在卡波福米奥（Campo Formio）同这路远征军的首领，一个28岁的科西嘉人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签订了和平协议。几年之前，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至少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没有人听说过。拿破仑没有等到督政府的内政官员批准，就做出了这一举动。但是，大部分意大利地区（包括一些较大的城市，经济繁荣的地区）已经被法国控制，或者受法国影响，因此，想让督政府的各位督政官否认自己的军事才能，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奥战争结束，使得法国能够重新调动大批军队，登上另外一个战争舞台，去对付最后一个敌人。不到一个月，就有10万法军，驻扎在法国鲁昂市（Rouen）和英吉利海峡海岸之间。鲁昂曾经是征服者威廉的王城。英国的皮特政府，很清楚这支大军有什么目的。忽然，世界似乎变得更加危险了。

英法战争1793年爆发以来，英国议会一直坚信，法国的革命政府既然源于

革命，对外战争就必然失败。法军不过是乌合之众拼凑出来的，只要爆发过自我欺骗的激情力量，就会土崩瓦解。恐怖时期，法国很多将军被自己人斩首了，如果这些将军大意到连这种战争都输掉，那就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预言。可是，拿破仑却以闪电般的速度，彻底征服了意大利，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此外，法国还加紧控制了从尼德兰到莱茵兰的一大片土地，甚至威胁到了瑞士各州。这个“强盗国家”似乎做到了别人想不到的，而且真正创造了一架可怕的战争机器。法军并没有一哄而散。法国造出的大炮似乎越来越多了，而且显然很清楚，要怎样才能把征服所得变成有效的军事物资，一边扩张，一边席卷大量金钱、战马、马车、应征来的士兵。这时候，英国那个著名漫画家詹姆士·吉尔雷又画起了讽刺漫画，把这个拿破仑·波拿巴丑化成一个稻草人，瘦骨嶙峋，特大号的帽子上插着羽毛。但是，首相威廉·皮特，还有智慧过人、精力充沛的战争部长，苏格兰人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却知道，拿破仑并不是一个笑话。潘恩也相信，拿破仑就是人民期待已久的“英国解放者”（Liberator of Britain），催促拿破仑准备1000艘炮艇的庞大舰队，费尽口舌，要说服将来的法国皇帝，只要法国一入侵英国，英国就会爆发大规模暴动，因为“广大人民都是自由的朋友”。一开始，拿破仑多少认同了潘恩，乃至封他为英国革命政府（English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的领袖，只要命令一下，入侵的海军就会出发，潘恩会随军同行。可是，命令始终没有下。拿破仑为了对付英国在亚洲的势力，把目光转向了埃及。



1793—1815 年，英法之间的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

不过，此刻英国政府最关心的，倒不是潘恩能够杀回来。早在拿破仑在意

大利的胜仗规模被世人所知以前，1797年春，出了一件事，着实让人有天翻地覆的感觉：英国皇家海军发生了哗变。朴次茅斯（Portsmouth）海港之外，索伦特（Solent）海峡的斯皮特海德（Spithead）海军基地，是第一处哗变的所在；然后泰晤士河口的诺尔（Nore）岛也出事了。哗变的水兵，一度封锁了泰晤士河。水兵要求发放军饷，并将一些军官撤职，不算什么无法无天的主张。可是，当时流行一个说法，海军全体官兵114000人，有三分之一是爱尔兰人。而且，既然此前的爱尔兰已经变成了革命的策源地，也成了暴露的法国特务活动的基地。这些哗变，突然就有了阴谋色彩。其实，所谓“三分之一爱尔兰人”只是谣传。爱尔兰水兵最多不过15000人，大都是抓来的壮丁。可就算这么多人，也足够把各位海军大臣吓得够呛，因为他们去年刚刚遭遇了一次险情，差一点儿没了命。当时，英国科克郡（County Cork）西南角的班特里湾（Bantry Bay），开来了43艘法国军舰，有15000士兵，想在海湾登陆。统帅是路易–拉扎尔·奥什（Louis-Lazare Hoche）将军，当时人称世上最可怕的将军；还有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结果，因为天气恶劣，登陆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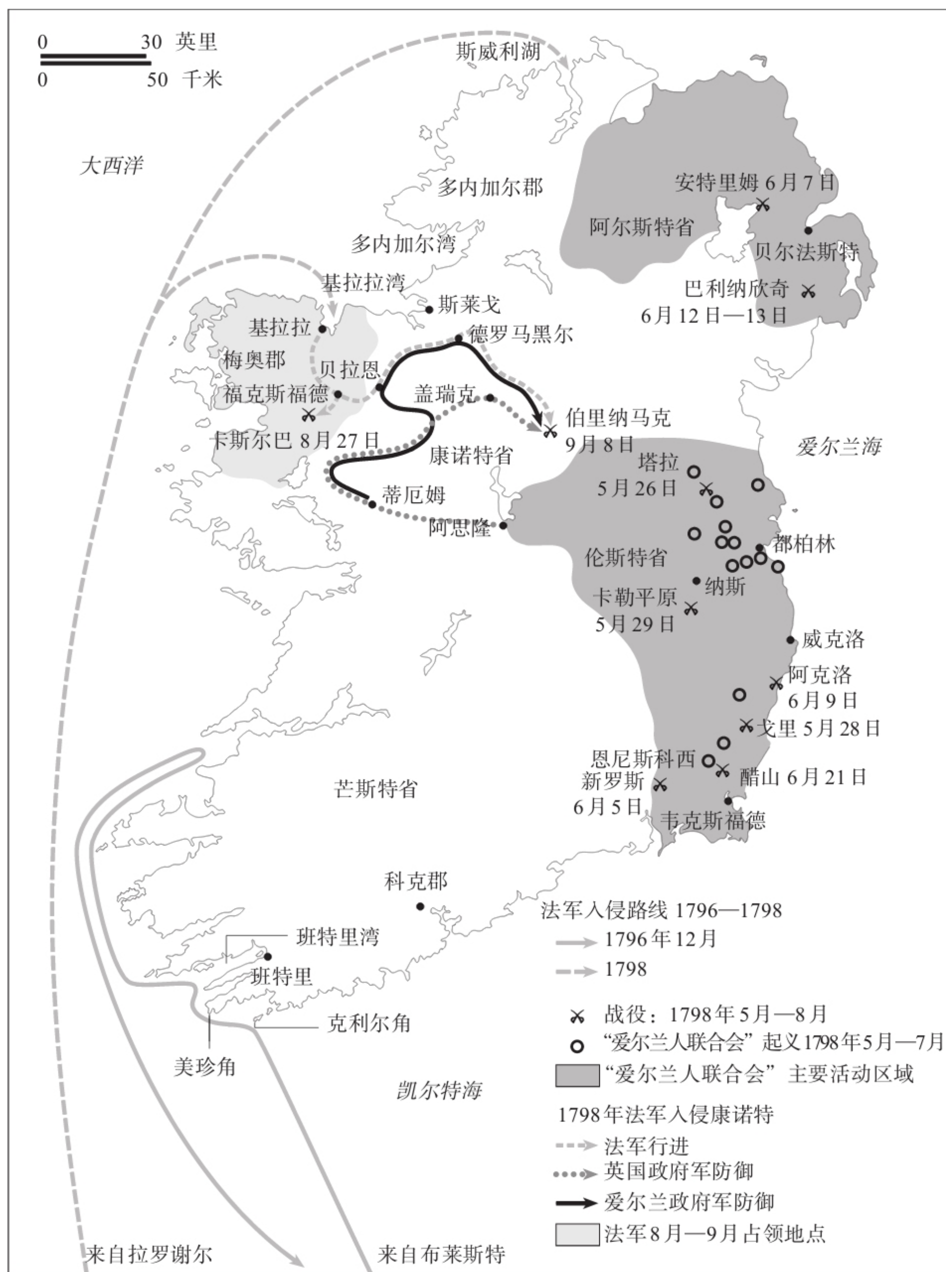
爱尔兰一直以来，都是英国摇摆不定的后门。奥什如果成功登陆，立刻能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当时法军和驻守的英军数目是6：1。沃尔夫·托恩向巴黎督政官做了正确的通报：一个当时如此脆弱的国家，军事上的防御却相当骄傲自满，很不充分。驻扎此地的常备军可能只有13000人左右，战时还能有60000民兵增援。就连这些守军的数目，也是当初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志愿者运动的产物；自从那时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爱尔兰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剧变。

而且，如果是向坏的一面转变，也大部分要归咎于皮特自己对情况处置不当；皮特拒绝按照自己的智慧本能采取行动。1782年，爱尔兰议会成立以来，就有一个充满精力、能言善辩的政治阶层（既有新教教徒也有天主教教徒），能够传播声音，强烈反对都柏林城堡当政者的新教寡头政治，英国在美国殖民地，曾经征税，但不给殖民者代表权。反对者提出一句口号——无代表，不纳税，掀起了暴动，在波士顿造成了流血事件。而在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教训似乎比波士顿更加合适。舆论要求政治权力适当下放，并改革选举制，特别是授予占有大多数的天主教徒以选举权。这项运动的领导人是一名律师，名叫亨利·格拉特（Henry Grattan）。他虽然能言善辩，但他并不主张发动革命，脱离英国。他认为，爱尔兰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权利，就会对英国更加忠心，而不是更加离心离德。他还希望，乔治在管理爱尔兰的问题上能够做得更多，而不是更少。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皮特第一个想法是爱尔兰天主教教徒原本较为保守，可以加以利用，让爱尔兰改革运动同英国联系更为紧密；还要确保爱尔兰天主教教徒，不会跟那些不尊国教的宗教异议分子勾结起

来，特别是在贝尔法斯特。异议分子对革命的同情实在太明显了，特别是巴士底狱陷落一周年的时候，他们欣喜万分，大肆庆祝。但是，天主教势力和英国政府搞好关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天主教教徒必须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注)，或者最起码也要废除天主教徒在法律和民事权利上的禁令，允许他们参加投票，允许当官。

18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场苦痛的戏剧，在接下来两个世纪中不断上演。因为新教徒此时占有优势地位，他们惧怕英国政府会取消自己的地位，可能做出激烈的反应。新教徒的领袖抓住机会，运用了法国大革命传播的社会恐慌；而且，武装民兵发起很多暴动，为恐慌提供了事实基础。例如，天主教的“护教派”（Defenders）和新教的“黎明小伙”（Peep o'Day Boys），在爱尔兰的乡镇地区闹事；于是领袖们就试图以此说服皮特，此时对自由主义要严厉处置。1795年，辉格党人费茨威廉伯爵（Earl Fitzwilliam）当上了爱尔兰总督。他采取的措施太过激进，皮特觉得很过分。伯爵断然解雇了都柏林城堡许多高官，而且宣扬自己的计划，说要将天主教教徒全面解放，给他们与新教教徒平等的权利。结果，伯爵只当了七个星期的总督，就被召回了。

不论费茨威廉伯爵的策略如何笨拙，他的下台都是一个悲剧，成了一个转折点。当初在1791年，爱尔兰人为了争取自己权益，成立了一个“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成员不光有天主教教徒，还有很多新教教徒。联合会本来认为，只要一直与英国政府合作，就能实现最基本的公平和改革事业。然而，这次伯爵一下台，最后一点和平改革的希望也破灭了。从此，爱尔兰的政治急转直下，陷入了宗派斗争、恐怖、战火的泥潭。战争局势越来越恶劣，于是，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爱尔兰与法国究竟有什么冲突？”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有一位表亲，名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他和阿瑟·奥康纳（Arthur O'Connor）等一些年轻的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已经在巴黎呼吁法国和爱尔兰建立联系，这联系可以追溯到1689年。他们想说服法国当局将革命的“解放”政策施与爱尔兰，帮助爱尔兰解放。但是，天主教委员会（Catholic Committee）的新教书记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之前是拥护宪法的主流改革家，后来却发生了转变，成了铁杆的民族主义者，坚持共和主义，而且打算穿上法国将军的军装。这就预示着，这些爱尔兰政治家已经准备越过禁忌的底线，实现爱尔兰全国自治的梦想了。就在不久之前，托恩还抱着希望，想要跟英国政府合作，逐渐达成自治。可是，政府强行解散“爱尔兰人联合会”之后（强行让成员并入英国，与苏格兰、英格兰的革命派激进分子取得联系），特别是召回费茨威廉之后，托恩的公开演讲，就把“英格兰”说成了压迫者、征服者。



1798年爱尔兰起义形势图

欧洲各国的军事情况越发恶化了，而且都柏林城堡当政者又清楚，爱尔兰

的资源有限，因此只得与新教民兵组织合作，例如1795年建立的橙带党（Orange Order），以对抗那些“护教派”的势力，从而立刻激化了矛盾。1798年年初，爱尔兰现代史的悲剧图景，就开始展现了：冲突不断，双方游击队互相烧杀抢掠，此时不列颠正在努力关上自己的后门，不让法国敌人入侵。

法军驻扎在诺曼底海岸的同时，爱尔兰已经把间谍派到了英格兰、苏格兰，探听这两个地方一旦发生外敌入侵，有多大可能发生暴动。间谍们带回的消息非常悲观，而对于爱尔兰本土的起义则乐观得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双方一直在玩“您先请”的游戏。18世纪上半叶，苏格兰的詹姆士二世党人曾经用过这种灾难性的策略，这时，历史似乎又重演了：法国等待爱尔兰起义的迹象，爱尔兰人联合会却在等待法军远征的消息。最后，1798年春，爱尔兰人首先发难，攻打都柏林城堡，让东南部大多数参加了起义。然而，北爱尔兰，旧称阿尔斯特（Ulster）的地方，是成功的关键，而这一片地方却毫无动静，令人有不祥的预感。冲突双方，烧杀抢掠都成了惯例。6月21日，英军在醋山（Vinegar Hill）大败爱尔兰起义军。当时的爱尔兰新总督，名叫康沃利斯（Cornwallis），年事已高却精神矍铄。他职业生涯最后一番成功的事业，也是最血腥的事业，就是收拾大英帝国造成的一片狼藉。

法国的援军的确来了，但来得实在太晚，而且登陆地点是西北部梅奥郡（Mayo）的基拉拉村（Killala），而冲突的焦点则是爱尔兰东部的伦斯特（Leinster）与西南部的芒斯特省（Munster），所以法军简直没有办法离战场更远了。不过，位于爱尔兰西部的康诺特省（Connacht）的确贫穷落后，民众非常不满，而且这里居民大部分是天主教教徒。康诺特省的农村、乡镇，“护教派”的势力很大，而且还有一支临时拼凑的军队，首领是一些教师、农场主、牧师，武器则是长矛和干草叉。康诺特的民兵与法军联合了起来。英军和支持英军的自耕农在重新部署之前，爱尔兰起义军已经在卡斯尔巴（Castlebar）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兵员和物资很快就供应不上了，投降在所难免。更糟糕的是，托恩搭乘法军一支小舰队，勉强通过了英军在法国西部港市布莱斯特布下的封锁线，最后在爱尔兰西北部多内加尔郡被英军俘获。托恩遭到审判，以叛国罪处以绞刑，在监狱里自杀了。

法国在1798年吞并了大量领土，因此有人将欧洲军事你争我夺的1798年，直白地称为“法国年”。然而，这个称呼，并没有记录下这一年苦难的巨大规模。至少有3万爱尔兰人惨遭杀害；这个原先经济政治都很有活力的地方，如今变得像停尸房一般阴森恐怖，充满了外敌入侵，政治迫害，宗派仇杀；只有一件事还不算太坏：直接的军事威胁过去之后，当局很明智地给一些起义分子减了刑。1801年，爱尔兰获得自由的梦想，被不列颠

吞并爱尔兰的冷酷事实，决定性地取代了。米字旗上最后的一画也宣告完成。英国后来认为都柏林议会是麻烦的根源，解散了议会，让爱尔兰议员们坐到了威斯敏斯特宫里面。然而，这一行动却完全不是平等交易。爱尔兰各自治市的数目，以及爱尔兰国会代表的数目，都遭到了大幅削减。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吞并苏格兰的时候，苏格兰的债务是一起并入英国而取消的；而这一次，爱尔兰的债务却依然是独立债务，形式换成了对爱尔兰人民的征税，从而让他们背上了沉重负担。爱尔兰独立运动领导人，那位律师亨利·格拉特，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他愤怒地宣称，这一联盟“将天主教排除在国会、国家政权之外，因此并不代表人民，也不是两个国家所承认的结果；而只是一国议会将另一国议会吞并而已。第一国，也就是英格兰，依然保有全部的席位；而另一国爱尔兰，却在吞并中被削减了三分之二。这个国家的感情，不是得到了承认，而是遭到了疏离”。诚哉斯言。

不过，1798年并不仅仅是“法国年”，也是“英国年”。因为，法军在爱尔兰登陆的时候，有些人最为信任“人类大同，四海一家”的观念，他们在哲学上认为，到了爱尔兰就是回家了。有很多“和平之友”主张，所谓“皮特战争”是压制自由的拙劣借口，当局以此为托词，来打击言论自由，关闭抗议途径，让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有一次，约瑟夫·约翰逊和潘恩的出版人J.S.乔丹（J.S.Jordan）被起诉了，当局指控二人出版了攻击兰达夫主教的书籍。当时，约翰逊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有很多人对拿破仑和督政府控制的法国，看法也几乎同样消极。他们认为，对于那些去过法国，听说过法国局势的人来说，法国也不过是一个有产阶级控制的暴君国家。当强大的“英格兰大军”在英吉利海峡这一边一字摆开，提防法国的时候，这些人也开始承认，伯克在《反思》中提出的公理的确有说服力——他主张，世界大同主义，有些“不合自然”的地方；他主张，如果能将情感进行公平分配，就可以证实，这些世界主义的一厢情愿有多么浅薄。他说过，自然就是“特殊性”和“地方性”。他说：“依恋我们的邻居，爱我们在社会上的小团体，是公共感情的首要规则，也是最宝贵的东西。这是链条的第一环，我们就是依靠这一环，实现爱国、爱人类的。”换句话说，除了通过爱国主义，没有其他路径，能够实现人道主义。

无论如何，26岁的年轻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火热的心和强力的头脑，萌生的也肯定是这种感情。1798年春，柯勒律治出版了一本诗集，收录了三首长诗。这三首诗既反映了他对法国的幻灭，也反映了他对英国命运的关切。这本书是约瑟夫·约翰逊出版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自然倡导者”的前进方向已经变了。在剑桥求学以及后来的日子，柯勒律治，就像跟他同一代人中的很多人，坚信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的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让人类按照自然法则生活。三首诗的第一首，《孤独的恐惧》（*Fears in Solitude*）创作的时候，正是英国

最恐惧拿破仑入侵的时候，所幸拿破仑后来没有入侵英国，而是远征埃及，从后方去对付英国的印度殖民地了。《孤独的恐惧》是关于苦痛与欢喜的冲突的一首杰作。当时，战争拖延很久，变得常态化，柯勒律治为此十分难过：

我们亲自下令，让成千上万的生命，径直去奔赴死亡！

男孩子、女孩子，以及女人们，见到有孩子拽掉昆虫的腿，都会痛苦呻吟；

而今，他们吃早餐的时候，却会把战争的消息，当成最佳的娱乐！

但他也逐渐承认，法军侵略成性，因此英国大概只有把战争打下去，别无选择。他的诗歌也升华成了爱国主义的挽歌：

啊，土生土长的不列颠！啊，岛国，我的母亲！

你对我的意义，除了亲切与神圣，还有什么呢？

从你的湖泊、山峦，你的云霞，寂静的山谷，岩石与海洋，

我吸取了一切智慧的生命，一切温柔的情感，一切高尚的神思……

圣洁美丽的岛国啊！你是我唯一的，也是最雄伟的神殿……

对祖国的热爱之后，是对侵略者伪善的谴责。《法兰西：一曲颂歌》（*France:An Ode*）的第二诗节，悲痛地回顾了1789年的狂热：

法兰西暴怒了，伸展开巨大的肢体，发下的誓言，能击毁天空、海洋和大地；

说着“我要自由”，她强壮的脚踏了下去，请看吧，我那时怀着怎样的希望和恐惧！

柯勒律治只有16岁的时候，在基督医学院（Christ’s Hospital）上学，当时他立场很激进，也的确写过诗，赞颂巴士底狱被攻陷。直到10年之后，他思想才开始有了转变。后来，柯勒律治上了剑桥大学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Cambridge），依然不断惹麻烦，声名狼藉。当时，“唯一神教派”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威廉·法恩德（William Frend），在大学任教，因为攻击教会和“煽动性”思想，校方要采取措施开除法恩德。法恩德的支持者当中，柯勒律治是最积极的一个。不过，柯勒律治放荡不羁的个性，让他用假名，短暂地参加了第15龙骑兵团（15th Dragoons），当了骑

兵。后来，他因为在政治与社会上都坚持理想主义，外加让马鞍磨出了伤口，令人尴尬，终于又脱下了军服。把他开除的军官说他“真是发了疯”。（柯勒律治一直演技高超。）他又打算重游彭南特的不列颠——凯尔特观光路线，这是民主派必须经历的夏日徒步旅游项目。路上，他在牛津遇到了同样热情高涨的年轻学生——理查德·骚塞（Richard Southey）。两个理想主义者计划在美洲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一个“大同世界”（Pantisocracy）。这个社会里，男人也必须打扫屋子。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如果地下有知，想必会很高兴。柯勒律治原定在美国纽约州的“萨斯奎哈纳河”（Susquehanna river）岸边建立这个乌托邦，然而他距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只是英国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1795—1796年，他在布里斯托尔住了10个月，教授公开课，还编辑自己的报纸《守望者》（*The Watchman*）。这个阶段，柯勒律治妙笔生花，对皮特首相和英国政府百般谴责，说首相是“妖魔”，首相的演讲是“用谜团包装的卑鄙，如同云雾笼罩着粪堆”。他参加了向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致敬而举行的宴会，去看了霍恩·图克、塞沃尔的审判，还跟“逍遥学派”塞沃尔交上了朋友，虽说柯勒律治看不惯塞沃尔坚持的无神论。最重要的是，这个退伍骑兵的课程和文章，都浸透了对英法战争的仇恨，说这场战争是权贵强加给穷人、不幸者的痛苦，而穷人、不幸者只得付出税款和鲜血为战争买单。

1798年，柯勒律治的论调忽然剧变。《守望者》不出意外地关门了，主编评论道：“我已经折断了吱呀作响的煽动的小喇叭，将喇叭的碎片挂在了赎罪室里。”因为这一年，法军消灭了瑞士各州的独立联邦（Confederation of Swiss Cantons），这样一来，不言自明：此时在威胁别国的法国，已经不再是解放者，而是军事侵略者，与其他侵略者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被推翻的瑞士政权，并不只是一个寻常的陈腐政权。1790年，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者在庆祝巴士底狱陷落之后，一直徒步到了瑞士。在他们看来，瑞士乃是自由的圣殿，最卓越的所在；自然的要塞保护了质朴、纯洁、自由的瑞士人民。卢梭自己就是在勃朗峰的影子当中出生的；瑞士的民间人物，神箭手威廉·退尔（William Tell），在当代被重新发现，作为蔑视暴君的经典英雄受到传颂；英国的罗宾汉（Robin Hood）也享受了同样待遇。当年，瑞士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曾在吕特利（Rütli）牧场上立下誓言，团结瑞士各州，一致对抗奥地利统治者。这幅场景，让画家亨利·福塞利变成了永恒。如今，法国侵犯了神圣的瑞士，撕下了假面具，变成了卑劣的压迫者。更可憎的是，他们还依然披着三色旗，伪善地鼓吹人权。柯勒律治因法国背叛自由主义而大怒，向他们倾泻了诅咒：

法兰西啊！你这肮脏的天堂，不伦、盲目的东西，

只有在恶毒的伟业中，才高举爱国的荣耀！

人类的冠军啊，这些是你的自吹自擂吗？

诱惑、背叛，抢掠自由民，用赃物来侮辱自由的圣殿？

柯勒律治对法国革命幻灭，但并没有走上反对革命的路。当时的社会，虽然有很多同情不幸者的声音，但这些声音要么故作姿态，只在意辩论技巧，要么故作愤怒，煽动闹事，让普通人去当炮灰。柯勒律治既要维持“社会情感”，又不能受这些不良倾向影响，因此处境很为难。他把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写在了一首诗当中，这首诗是一套组诗的第三首，也是最后一首，让约翰逊出版了——午夜霜（*Frost at Midnight*）。柯勒律治看着自己襁褓中的儿子，想象他远离城市的喧嚣，自由自在的样子：

可是，我的孩子！你本应如清风一般，

漫游在湖畔，在岸边的沙粒上，头上是古老山峰的断壁与朵朵白云。

自然会起到抚慰人心、教化民智的作用，然而，自然的“首席指导”，不应是卢梭，而是上帝。人倘若能用应有的诚实和严肃去看待自然，自然就确实有转化一切众生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并非是“可以让人起草政治计划”。如今，同自然质朴环境中应有的领悟相比，宪法与革命，无关紧要到了荒唐的程度。选票绝不能使人快乐。二月的雪花、云雀飞行的轨迹，婴儿爬行的喃喃自语，才有如此的魔力。

不消说，柯勒律治这些思想，绝不是在布里斯托尔忙乱的海港出现的。他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北部，内瑟斯托威村（Nether Stowey）找了一间农舍住下。先前，他曾经旅游来到这个村子，遇到了一个皮匠托马斯·普尔（Thomas Poole），热情的民主派分子。柯勒律治认为，普尔就是自己心目中“诚实纯朴”的代表。普尔帮柯勒律治找了这所房子，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柯勒律治一旦住到这里，就能走路去见华兹华斯，因为他觉得走上40英里不算什么。此时，华兹华斯跟妹妹多萝西（Dorothy）住在多塞特郡（Dorset）雷斯唐（Racedown）农庄。自从华兹华斯从法国回来，他在妹妹的鼓励之下，也不再论述抽象的“人类”，而是更加活跃地关心个人的疾苦，这些人往往是被社会遗弃的人：瘸腿的老兵、流浪的乞丐、破衣烂衫的流浪儿、孤儿、穷困的劳工等。多萝西这样描述英国西南部的“贫苦农民”：因赤贫而甚为痛苦，农舍用木材和黏土建成，几乎可以说，是些不成形的东西；这些人的生活，同野人可能的生活相比，实在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后来，华兹华斯搬到阿尔福克斯登（Alfoxden），离柯勒律治家更近了。1797年下半年到1798年春天，两个人计划要做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事业就是出版一本二人作品合集，使用英格兰西部诸郡工人、农夫的质朴语言，绝不含有一点“田园诗传统的装饰幻想”。这种“歌词性的叙事歌谣”，描述的事物一点也不美丽。面对残缺的尸体、毁

坏的小屋，这些作品用清醒的眼光注视，用敞开的心扉关注。这些作品往往听起来很粗野，韵律也很沉重，就仿佛穿着平头钉子的靴子，走在客厅地板上的声音。但是，忠于“自然的至高力量”，首先意味着，不把这种力量看作书本上的理论，更不是政治标语；而是要将它作为一种物理的现实，在其中生存。这，就是这些诗人的革命。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二人一些最杰出、最有同情心的作品，就是这次合作的产物。跟随着《康伯兰的老乞丐》（*The Old Cumberland Beggar*）从这座房子走到那座房子，步履沉重的路径，华兹华斯精确地关注了社会底层的人，这些人，权贵本来认为是最不足挂齿的：

但不要以为这老人无用！政治家们，你们拥有智慧，却如此不安，

你们手中紧紧抓着扫帚，想要扫尽世上一切讨厌之物……

为什么？因为这名乞丐在他多次“拜访”的过程中，用一种同情的“共同行为”，将男男女女联系了起来，让他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一个村庄。而且，他还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

这老人从一扇门爬到另一扇，村民们看到，他心中有一份档案，

将过去的种种慈善义举和职责编起，而它们在别处早已被人忘记……

在农场、孤立的小屋，星星点点散布的村庄之间，老乞丐到处轮转的所在，

有一点必要，要采用强求的方法，来促成爱的行动……

华兹华斯尽管可能还没有坦白，但他显然已经越来越喜欢慈善的个人行动，喜欢程度更甚于政策的集体行动；他的一种基督教的看法也开始萌芽，认为个人、面对面的接触十分重要，这种接触往往发生在偏远的乡村；他还逐渐意识到，传统有一种非强制的力量。这一切，都让他更接近伯克，而不是潘恩。不过，有些当地居民就很困惑，因为这些诗人与地位低下的人打得火热，尤其是柯勒律治决定为了表达他的社会同情心而穿起了萨默塞特郡的村民衣服。这些不一般的特征，看起来就古怪到了危险的地步。有谣言说，这些绅士彼此之间说法语。或许，在国难当头的这一年，奎恩托克山（Quantocks）果真在孕育某种阴谋？而约翰·塞沃尔来看华兹华斯，是按照崇尚自然的习惯，从伦敦步行150英里来拜访的，这就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当初，塞沃尔被控叛国罪，无罪释放之后，尽管有不少间谍如蛆附骨，他还是当了地方激进派圈子的“明星讲师”。光是1796年，他就讲了22堂课，足迹从德比郡一直延伸到诺威克（Norwich）。后

来，塞沃尔发现，正是因为自己，这些奎恩托克山的诗人才惹来了闲话，于是决定动身前往别处，把间谍们都引开。塞沃尔相信：尽管就无神论的问题，同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有过激烈争论，但三人的思想还是类似的。可惜啊！对方却并没有像他这样想。

有很多人慕名而来，造访内瑟斯托威村和阿尔福克斯登。其中敬畏之心最强的，莫过于一个19岁的小伙子——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哈兹里特父亲是爱尔兰人，在什罗浦郡（Shropshire）当“唯一神教派”牧师。他本人则是油画画家，看上去傻乎乎的，大睁着渴望的眼睛。在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两人看来，哈兹里特性格极度腼腆，而且还略为古怪，是个呆头呆脑的异类，只能当作笑料。但他的举止却一点没有预示，他将来会成为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散文家。1798年1月，哈兹里特在冰冻的泥沼当中走了10英里来到什鲁斯伯里市，专门听柯勒律治发表振聋发聩的“唯一神教派”布道演说。他后来非常兴奋地回忆道：“我浑身麻木，说不出话，感到绝望，好像路边被人碾过的虫子一般，鲜血直流，毫无生气。”柯勒律治张开嘴，声音“仿佛提纯过的香水蒸气”一般响起的一刻，哈兹里特就整个儿被带走了：柯勒律治身材高大，头发又长又黑，随风飘舞，嘴唇饱满，这形象，让哈兹里特想起了《新约全书》里的先知圣约翰（St John），在旷野中呼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吃的食物是蝗虫蜂蜜”。

就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伟大的先知”竟然登门拜访了哈兹里特的父亲，来商量教会的事情。小伙子威廉，一如既往坐着，眼睛盯着地板，沉默不语；只有在说到某个话题，他碰巧抱有强烈感情，而且觉得柯勒律治会有同感（柯勒律治确实有同感）的时候，才会突然迸发出一些言辞。这些话题包括：伯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威廉·戈德温。桌子上摆着威尔士羊腰肉，还有一盘大头菜。哈兹里特能跟柯勒律治对话，感到莫大的欢乐，于是觉得每一口都十分美味，仿佛从来没有吃过东西一般。后来，到了第二年春天，柯勒律治又请哈兹里特来到内瑟斯托威村做客。小伙子在崇拜的热情中，跟着诗人在路上走了6英里，超过了浪漫主义者“腿脚好”的标准。

在萨默塞特郡，哈兹里特还受邀拜访了华兹华斯的庄园，见到了多萝西。晚上，他就睡在一张蓝色吊床上，吊床放在英王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画像对面，他还看到华兹华斯从布里斯托尔回来，因为半块柴郡奶酪而大惊小怪。他和两位诗人早上一起散步，听着他们吟诵自己诗歌的草稿。他用逗弄人的语气说：“一首肯定无疑的圣歌！”柯勒律治总是更加戏剧化，而华兹华斯更安静一些，感情更丰富。有一次，柯勒律治马上要出发去德国学习哲学，顺便游玩哈尔兹（Harz）山。这时候，三个人沿着高出海岸的小路，做了一次很长的徒步。然后，又“徘徊在布满横纹的海沙之上”，检

视各种奇怪的海藻；哈兹里特认为，就是在这里，他终于明白了，过上自然的生活是什么含义。有个渔民告诉他们，前一天这儿有个男孩淹死了，渔民和同伴们冒着生命危险，想要救孩子，但还是失败了。哈兹里特后来说："渔民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冒险，但是说了一句'先生，我们天性就是互相照应'。"

互相照应！这就是将"社会感情"化为行动。哈兹里特认为，他在萨默塞特郡看到诗人们共享住宅，也是一种小社会，以相互同情为基础，自发形成，包括不被打扰的家庭生活，与村民交流十分顺畅，而且能重新发现，远离大都市狂热与戾气的、未经破坏的人性。

1802年，哈兹里特想要再次拜访两位诗人，这次他只得北上了，因为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都已经搬了家，在湖区定居下来；华兹华斯和妹妹多萝西、弟弟约翰住在格拉斯米尔村（Grasmere）的一幢小农舍里；柯勒律治住在附近的葛丽塔大厅（Greta Hall），相对豪华得多。但是，随着乡村的气候逐渐变冷，还有什么其他东西也变冷了。当下的自然，似乎并没有把他们和"距离身边稍远"的日常世界连接起来，反而让他们和这世界疏离了。两人的诗里开始频繁出现孤独（solitude）、孤寂（solitary）这样的词，特别是华兹华斯；而他写到诗中人物的时候，这些人也几乎像是从布满乱石的风景中劈砍下来的一部分，被看作一个个寂寞的幽灵，背景是荒凉的秃山。在哈兹里特看来，这个"团伙"唯一真正的联系，就是成员之间的联系了。格拉斯米尔村已经变成了一个亲友组成的小公社，人们互相读书给对方听，在石头树木上刻下名字，宣告自己对乡村的所有权；彼此分享食物。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哲学诗人"，但哈兹里特却发现，他们鼓吹的却不是任何一种社会改革，更不要说革命了；而是怎样改造个人生活，其方法是重塑那种小时候体验过的、与自然简单而密切的关系。柯勒律治心目中的"伟大变革"，就是暗中在树林里播种旱金莲，把整个湖区变成一片金黄。

这种自我陶醉，让哈兹里特十分厌倦。此时，小伙子已经25岁，正通过当一名下层记者，大量写稿来勉强维持生计。他十分清楚，这些诗人，虽然表面上宣扬自己在湖区的生活多么简朴，但若是缺了乔治·博蒙特爵士（Sir George Beaumont）这样的绅士资助，这样的生活，他们也定然负担不起。柯勒律治有一个朋友，名叫汤姆·韦奇伍德，之前曾经是巴黎英国人俱乐部的成员。有一次，韦奇伍德要出门旅行，柯勒律治竟然决定哈兹里特不能当韦奇伍德的旅伴，说他智力上很聪明，但性格上却是100号人当中最令人讨厌的那一号，平时总是扬着眉毛，沉思着，性情古怪，而且天性善妒、阴郁，骄傲得令人愤怒，又痴迷女色。韦奇伍德添油加醋把这些评价跟哈兹里特说了一通，哈兹里特十分惊恐，大受打击，便对柯勒律治彻底幻灭了。他毕竟是一个能写出《憎恶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Hating）这种名作的散文家。之后多年间，他几乎抓住了每一个机会，用小小的尖牙利爪，去损害柯勒律治被鸦片毁坏的痛苦名声。这不仅是个人的复仇，也是政治的复仇。哈兹里特从来没有宽恕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二人的变节，因为二人带着可鄙的热情，响应了埃德蒙·伯克的观点——“自然这东西，不是革命者，而是爱国者”。

1802年，英法签署了《亚眠和约》（*Peace of Amiens*），法国遭遇的海上封锁暂时打开，船只可以进出了。托马斯·潘恩在法国监狱里染上了斑疹伤寒，出狱后一直没有彻底痊愈。但让他更加痛苦的，是他对拿破仑的刻骨仇恨。他评价拿破仑是“屠杀自由的头号刽子手，自然有史以来生长出的最庞大的妖怪”。和约签订的时候，潘恩已经最终丧失了对法国的希望，不再将它视为自由和社会公平的庇护所。他从法国的勒阿弗尔港乘船去了美国，会见了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毫无悬念地与二人大吵一通，而后搬到纽约州新罗谢尔（New Rochelle）一处300英亩的农场，这里是1784年美国政府慷慨送给他的。潘恩养了几口猪、几头牛，差不多一直在这里住到寿终正寝。有不少崇拜者不远千里来看他，却发现他已经回归了“自然状态”的生活，从而非常不快。他节俭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茶叶泡过茶之后，再晾干了下回接着泡。最后，潘恩入不敷出，只得卖掉了农场。1809年他死于纽约市，临终的时候几乎身无分文。

但是，对于法国建立的专制主义，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潘恩这么憎恶。比如，威廉·哈兹里特，就被拿破仑的英雄业绩迷住了，一生都没有走出这种崇拜。后来，他还写了一本拿破仑传记，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枯燥的作品了。1802年，哈兹里特终于想办法凑足了路费，前往巴黎，站在卢浮宫里面，兴奋地欣赏着一件件艺术杰作，为了不影响心情，他很轻易地忽视了，这些馆藏艺术品都是第一执政（First Consul）从欧洲各处的教堂、美术馆掠夺来的。在卢浮宫的方形中庭，哈兹里特见到了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后者在这个短暂的和平时期，正在周游欧洲。福克斯此时已经发胖，头发也花白了，但他拒绝服从首相皮特的战时安全状态（wartime security state）命令，依然是哈兹里特心目中永不气馁的英雄。

华兹华斯尽管鄙视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却也跟妹妹多萝西一道，乘坐夏季定期邮轮，穿越海峡来到了法国。他无意重拾年轻的热情，而是打算给热情贴上封条。他先前已经打算结婚了，为了不昧良心，还得再次关注一回情人安妮特和女儿卡洛琳，大概他要确保二人不会阻挠自己。从安妮特角度来说，她与旧情人见面，也有自己的实际理由。华兹华斯一直在给安妮特寄来卡洛琳的养育费用，安妮特想要确认，华兹华斯在结婚之后，是否还是会继续支付这笔微薄的资金。而且，拿破仑有一种“厌女症”，歧视妇女。当时法国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的母亲，没有子女的抚养权。因此

安妮特也需要确认，华兹华斯不会把女儿抢走。这两个保证，华兹华斯都认真地做了。诗人发现他能为母女俩做的不太多了，便为母亲跟孩子写了一卷诗，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二人此时正在飞速转变，成为孜孜不倦替“约翰牛”[注]宣传的吹鼓手。1803年5月，英法再次开战，这一次，法国入侵英国的可能性，比1798年还要大了不少。柯勒律治奋笔疾书，宣称国家已陷入绝境，其风格与后世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文风颇为相似，大肆宣扬自己的僵化论点，说英国是抵抗欧洲暴政的最后一个堡垒：英国人必须为自己着想，为自己行动；让法国大肆贿赂，软硬兼施，把欧洲结成反英同盟吧！为了我的国家，我不会害怕的！以赛亚的话语，将成为确实的预言……“他践踏万国，像踩葡萄一样；他用不着人来帮他。”

当时，英国有一种“恐惧瘦弱、恐惧营养不良”的风气。那些年，跟绝大多数英国人观点一拍即合的，是柯勒律治，而不是哈兹里特。法国对英国的威胁，毕竟不是海市蜃楼。1803—1804年，至少有10万法国与其他国家的盟军，驻扎在布伦（法国北部港市）（Boulogne），还有2300艘战船（虽然大多数很小）等着起航的命令。法国有一件古物，名叫贝叶挂毯（Bayeux Tapestry），上面绣着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场面。拿破仑把这挂毯拿出来展示的时候，无论是英国陆军的各级官兵，还是窄窄的海峡对面20英里远处的海防部队，都领会了皇帝的意图。1804年年底，英国还与西班牙进入了战争状态。

但威廉·皮特首相已经扛过了10年残酷的国际战争，并没有“眼睛里带着箭倒下去”。1804年5月，他刚刚重新执政，就意识到了自己面对的威胁有多大。他和新任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亨利·邓达斯动员了空前的国家资源，其规模与彻底程度，50年前他父亲指挥战争的全盛期都没有出现过。更了不起的是，这次动员，基本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与普鲁士跟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尽管不止一次，塞沃尔讲课的时候，有些迫使人服役的军官，得到通报，去抓这个没办法压服的人。塞沃尔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带着一把手枪，子弹上膛。有一次，塞沃尔遇到人要抓他，还把手枪顶在了对方的太阳穴上。战争最初几年，表现爱国主义的人，大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与爱国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为政府的预备役而贡献士兵；但是，也有数目惊人的国民，自愿参军，抵抗拿破仑入侵，他们的行动要自发得多。近代史将这种现象，称为“国防爱国主义”，这种称呼并不算过时。有时候，当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参军的人太多，管理不过来；而且这些人基本全都没有训练，大部分人也没有纪律。《领土防务法案》（Defence of the Realm Act）要求17～55岁可服兵役的男子均应登记在册，这样一来，一旦法军入侵，就可以组织英国地方志愿军，投入战斗。1804年，威胁最严重的时候，登记的人超过40万，其中大概一半是

自愿要求的。政府先前估计，热情最高的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实际上，倒是有很多来自南部海港（开战时立即去前线），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城市，还有北方。而北方仅仅十年之前，还被视为不忠和煽动起义的策源地，政府从来没有想过这里也能补充兵源。1804年年底，整个英国，已经变成了“不列颠要塞”（Fortress Britannia）。当时英国总人口1500万，有大概375万人属于参军的适龄人口。其中有80万人以上——1/5——实际是国防力量的一部分；还有386000志愿兵，其中陆军266000人、海军120000人。

能动员这么多的人，苏格兰功不可没。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苏格兰贡献的高地苏格兰分遣队（Highland contingents）。对此，海军大臣邓达斯十分满意。他本人是低地苏格兰人（Lowlander Scot），但因为在高地的厄尔湖（Loch Earn）上有一栋度假宅邸，一直自诩为光荣的高地人。参军毕竟是移民之外的一种选择。拿破仑战争期间，苏格兰高地警卫团（Black Watch）、戈登高地人（Gordon Highlanders）、卡梅伦高地人（Cameron Highlanders）等，都获得了传奇般的名声。陆地战争当中，最早的著名烈士们——1801年在埃及牺牲的拉尔夫·阿贝克隆比爵士（Sir Ralph Abercromby）、1809年在西班牙牺牲的约翰·摩尔爵士（Sir John Moore），都是苏格兰人，这一点也被广泛宣扬。尽管此前，苏格兰士兵已经在美洲、印度服役，但苏格兰的自我意识，却通过“身为英国人”而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最大的强化。

这一切爱国的真情实感，其核心象征，当然是国王了。1803年10月，乔治三世在海德公园（Hyde Park）检阅27000名志愿者，大约有50万人观看了这场盛大的阅兵式。此刻，1795年10月御驾惨遭袭击的痛苦回忆，想必已经非常遥远了吧。国王现在可以享受在公众前面露脸的乐趣了。1797—1800年，他甚至看了55场戏，在观众的掌声中举杯痛饮。这些年，对这位国王来说，“上帝保佑国王”（而不是“上帝保佑人权”），的确成了英国的真正国歌。伯克的爱国感情，被他自己定义为“大众情感”的事物，似乎至少在这一刻得到了证实，而保家卫国的紧急需要，也确立成了最为自然的本能。

就在这个时刻，这个国王统治的岛屿的“快活英格兰”（Merrie England）的神话也诞生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莎士比亚历史故事的“复活”。跟英国史相关的一切都引起狂热的追捧，开辟了市场。如今，大概破天荒头一遭，“过去”变成了一种消遣，而且是一种严肃的消遣，一种发现英国人风格（Britishness）的途径。英国的浪漫主义时代，开始于激进派对地理的探索，而今来到了“爱国历史”的时期。童书大量出现，用插画和场景描绘，给英国小男孩小女孩讲述这个岛国的故事。兰尼米德（Runnymede）的约翰王、蒂尔伯里（Tilbury）的伊丽莎白女王、格伦芬南

（Glenfinnan）的邦尼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好像全都从书页上走下来，到了孩子中间。杜莎夫人新建的蜡像馆，也出现了这些身影，插画家托马斯·斯托瑟德（Thomas Stothard）等人，也创作了这种题材的著名油画。为了迎合这种“跟老祖宗联系”的热潮，社会上还出版了大量图书，介绍古代服装、家具、体育、武器、盔甲。当时有一位专家，是研究中世纪武器和盔甲的权威，名叫塞缪尔·拉什·梅里克（Samuel Rush Meyrick），被乔治三世的继承人乔治四世请去，整理温莎城堡的收藏品，好让那些古代的幽灵骑士，挺立在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的巨幅历史油画之下。整整一代乡村绅士，都来到自家谷仓里、阁楼上，将那些祖传的宝剑、头盔上的灰尘擦干净，摆放整齐，陈列在新布置的哥特式大厅里面。

跟这场自己战争的编年史一样，历史也变成了爱国主义的娱乐活动。对娱乐业贡献最大的，是当时人气最高的明星——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此人身高可能不超过5英尺太多，还失去了一眼一臂，头发很早就花白了，牙齿也掉光了，但无论从什么方面说，这个纳尔逊都堪称伟人。他是个天才的海军指挥官，这一点，没有人比纳尔逊自己更加自信了。纳尔逊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正是浪漫主义狂热追捧天才的开始。传统上，所谓“受到上帝眷顾的天才”，一般都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例如莎士比亚、弥尔顿、米开朗琪罗。然而，纳尔逊的职业生涯惊心动魄，他自己也同样善于宣传，所以，作为军事家，他也荣登了上帝眷顾的行列。打从一开始，爱国娱乐业的经理人，就把纳尔逊打造成了明星。1798年，英军在尼罗河战役中获胜。这场战役有着一切吸引公众的卖点：埃及的马木留克（Mameluke）士兵、骆驼、鳄鱼，还有无数葬身鱼腹的法军官兵。当时的经理人亨利·阿斯顿·巴克（Henry Aston Barker）开了一个360度全景式“尼罗河战役”的展览，收入创造了票房纪录。但是，还有一位画家，名叫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之前当过马车制造商。在他看来，哪怕这样把巨幅画像摆成一个圆圈，也没有充分表现这部史诗的雄伟壮观。舰队街（Fleet Street）之外修建了一座水上剧场，名叫“海战演习馆”（Naumachia），式样仿照古罗马那些被水淹没的竞技场。由特纳编排、纳尔逊担任主角的盛大好戏，吸引的观众队伍一直排过了街角。演出持续一个半小时，配有震耳欲聋的大炮，还有发烟机器。特纳要监督的另一个项目是“胜利号”（Victory）的残骸，他跟另外一名艺术家合作，名叫菲利普·德·卢戴尔布格（Philippe de Loutherbourg）。此人对于公众兴趣把握得丝毫不差，凭着这样的能力，从“德比郡的奇迹”来到了海战模拟的工作现场，最终，在1808年，完成了惊人的戏剧力作《从胜利号后桅右舷上目睹特拉法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as Seen from the Mizen Starboard Shrouds of the Victory*）。

然而这一切，都很难抢走小个子本人的风头。关于纳尔逊的一切，就连

（或者说“特别是”）他对艾玛·汉密尔顿（Emma Hamilton）女士的痴迷，都成了吸引崇拜者的卖点。艾玛是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的夫人。纳尔逊拒绝掩盖自己跟这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的关系，让首相皮特、国王、海军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十分难堪，但是，纳尔逊嗜好女色的名声，却丝毫没有损害他的人气，相反还可能让他人气大涨。对公众娱乐界，他此时已经是个魅力无限的“外人”（因为他本职工作是军人），而他一切爱慕虚荣、桀骜不驯、骄傲自大的品质，都化作了成功的宣传（特别是他自己策划的宣传），变成了英雄风采的一部分。纳尔逊因为过度招摇被法军击毙。纳尔逊就像玩弄竖琴一样，精确地操控那群崇拜者。不论是参加游行，还是站在甲板上，他都穿着招摇的军服，挂着一堆饰品，叮当作响。这一套闪闪发光的行头，让他成了法国军舰后桅杆上特等射手的目标，也就天经地义了。1805年10月21日，有一名法军特等射手击中了这个目标。先前，纳尔逊已经知道，这场战役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仅能够决定英国的海上优势，而且意味着岛国的独立能否保全。拿破仑若是能够将法国与西班牙的战舰全都集合起来，形成一支超大舰队，就极有可能入侵英国。拿破仑的陆上大军（Grande Armée）当时依然驻扎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所以，纳尔逊舍命救了大英帝国一命。

就如同上一辈的詹姆士·沃尔夫[注]一样，纳尔逊实际上也一手炮制了自己的个人崇拜，让自己升格成了神仙。1806年1月，纳尔逊的葬礼举行，其声势完全盖过了2月首相皮特的葬礼。因此，也可以说，纳尔逊葬礼一定程度上超过了皇家规模。跟一个半世纪之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葬礼相仿，葬礼所有元素都精心设计，专门用来唤起人们的爱国之情。纳尔逊的遗体从格林尼治（Greenwich）的“胜利号”残骸上运了出来，用酒精保存着，抬去参加了告别仪式。仪式上，普通的水兵，还有纳尔逊精心培养的崇拜者，都去瞻仰遗容。黑色平底船载着灵柩，顺流而下，好似传说中的英国英雄亚瑟王的遗体前往阿瓦隆（Avalon）的场面一般。灵柩运到圣保罗大教堂，葬礼持续了4个小时。皇室成员之前有一个不合时宜的协议，按照协议，只能作为个人出席葬礼。纳尔逊装在黑色大理石棺材里面，这棺材原本是为主教沃尔西（Cardinal Wolsey）预备的；纳尔逊就葬在教堂圆顶中心的地下，这一点跟丘吉尔不同。

政治上说，纳尔逊支持独裁的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Bourbons of Naples），而且亲自下令对政治犯用刑，还鼓吹绞刑，因此，这个海军副司令被视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遭到了人们的憎恶。不过，纳尔逊依然是街头、酒馆、海员、码头工人谈论的对象，毕竟他把这些平民煽动得热血沸腾，而其他有军衔的公爵，谁也没有拥有过这样的成功。

此时，国王乔治三世已经垂垂老矣，而且精神病十分严重。国民虽然爱戴他，却也急需一些英雄人物来崇拜。威尔士王子身材肥胖，经常醉酒，而

且好色；他的兄弟，比如约克公爵（Duke of York），纳尔逊葬礼上唯一的政府代表，也同样风流不羁。后来爆出丑闻，约克公爵为了讨好情妇玛丽·安·克拉克（Mary Ann Clarke），竟然把所有在她“心爱名单”上的人全部擢升了军衔。舆论得知此事，一点也不吃惊，只有愤怒。这般的丑事，对“古老的腐败”这一难题造成了威胁，也让批评家们重新找到了发声的机会，哪怕此时英国正在打仗。1807年，当初参加过纳尔逊葬礼的数十万伦敦民众，又开始为贵族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Sir Francis Burdett）欢呼；也为另一个更不像英雄的人欢呼，此人名叫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chrane），曾经当过私掠船的船长，闹出过与人私奔的丑事，还因为股票交易造假，进了监狱，后来逃跑了。这两个人，是新崛起的激进派候选人，正要竞选英国国会的两个席位。其中一个席位原先是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的，福克斯1806年死于任上。

无论政治还是宗教的反对势力，其实都没有消失不见。只是忙于道德事业，不让自己的名声玷污，因为有人指责他们通敌。1807年，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请愿活动。组织者是一支不尊国教的军队，他们动员起来的地方不是军营，而是小教堂和公共礼拜堂；这次请愿，成功让大英帝国立法禁止了奴隶贸易，虽然各个殖民地的奴隶还没有解放。又过了一年，伯德特与科克伦发起了一场宗教复兴运动，而且完全是在爱国名义下组织的，无可挑剔；这场运动，清除了辉格党候选人。他们说：把真正的英国、自由的英国、被公爵与花花公子窃取的英国还给我们！把我们天生的权利——每年召开国会，无记名投票，男公民选举权还给我们！先前不久，一些异议人士，比如卡特莱特少校，曾经遭到威胁，被迫保持沉默，如今再次发出了声音，而且比以前更大。他们高举的旗帜，则属于比较遥远的过去——侠盗罗宾汉、英国内战时期的国会，还有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这些人都是非官方的历史——人民历史的英雄，如今被重新发现了。

基督教士兵、《大宪章》武士组成的新军，一旦朝着目标进发，争取黑人与普通英国人的“自然权利”，就似乎所向披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各位公爵指挥的军队，却总是止步不前。英国有一支很有名的摇篮曲——《伟大的老约克公爵》（*Grand Old Duke of York*），说的就是约克公爵诸多丢脸败仗中的一次，也是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809年荷属瓦尔赫伦（Walcheren）岛上。他指挥的4万远征军，本应在拿破仑控制的欧洲大陆上建立滩头阵地，却因为热病而折了不少人马，只好屈辱地撤退。英国在西班牙、葡萄牙跟法军对抗的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头几年，似乎也同样充满了英勇的失败，以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胜利”。英军在西班牙塔拉韦拉（Talavera）战役惨胜之后，弗雷德里克·庞森比（Frederick Ponsonby）写信给母亲，贝斯伯勒伯爵夫人（Lady Bessborough），信中透着幻灭的自我嘲讽：“我们向法军的5个密集方阵发起冲锋，前面是一条

水沟，真是乐趣无穷。损失了180名骑兵、222匹马之后，我们才发现，这种打法并不愉快，而法国人看见英国骑兵，也不总是落荒而逃。于是，我们就扬长而去了，我的马这辈子都没有跑得这么快。”华兹华斯最辛辣的讽刺诗歌之一，就写在《辛特拉条约》（*Convention of Cintra*）签订的时候，此时，英国似乎已经不打算援助西班牙抵抗法军了。坏消息虽然这么多，却丝毫没有阻止威尔士亲王在伦敦的豪华宅邸——卡尔顿宫（Carlton House）大宴宾客。宴会的桌子长达200英尺，桌上用人工雕刻了一副凹槽，用来运送美酒；凹槽的边缘包着金银，葡萄酒的“河流”则用微型抽水机来推动。这堪称一次小型的工业革命，专门用来娱乐权贵。而普通人，只有在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打了胜仗的时候，才会成群涌上街头，兴致勃勃地参加游行，点篝火，组织乐队一路行进。

1810年，让拿破仑最后惨败的滑铁卢之战还没有一点迹象，法军只在印度和加勒比海遭到了失败。总体上，拿破仑似乎还是战无不胜。西班牙游击队顽强抵抗法军，确实精神可嘉，但在西班牙半岛上，法军却控制了所有大城市，从马德里到塞维利亚（Seville）。拿破仑的对手们，一个接一个向他求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西斯一世先前骂拿破仑是“科西嘉的吃人妖怪”，后来竟然把女儿嫁给了拿破仑。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King Frederick William）、俄国沙皇亚历山大（Tsar Alexander）也都与拿破仑签订了合约。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基本确立了霸权，但侵略英国的计划却屡次失败，而且皇家海军也未能给大英帝国造成任何明显的损害，于是，拿破仑对英国发动了另一种斗争，想要搞垮英国的经济。他封锁了欧洲大陆，禁止一切出口，在海峡对面创建了一个跨国共同市场的雏形。这个雏形，差一点就成功了。欧洲大陆的工业，因为封锁而得到了保护，而且因为法国的科技发展（例如，化学和工程学的发展）还得到了推动。而英国，出口需求降到了谷底，于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工业纺织的羊毛线，之前曾经一度出口激增，手工纺织的岗位也供不应求。如今，贸易骤减，纺织工人就首当其冲了。失业率和物价同时飙升。

1811—1812年，出现了一些组织严密的民间团伙，自称“卢德将军的部队”（General Ludd’s Army），领导人是一名工人，名叫内德·卢德（Ned Ludd）。这些团伙在英格兰中部地区捣毁了手工驱动的机器，在兰开郡（Lancashire）也捣毁了工厂里的机器。卢德分子捣毁机器，用的是长柄大锤，署名“以诺”[注]。他们还向很多工厂主，特别是那些因为降薪而臭名远扬的工厂主写信，说“卢德将军的战士就要来了”。当局连忙颁布法律，规定破坏机器是死罪，然而，卢德运动还是一直坚持到经济危机结束。

1812年，有个破产的商人，精神失常，在下议院的前厅，用枪近距离打死

了首相斯宾塞·珀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让统治阶级大为惊恐的是，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的酒肆里，人们竟然大声喧嚷，为刺客干杯。1813年，威灵顿终于在西班牙大胜法军，拿破仑远征俄国的大军也在雪地里遭到惨败。消息传来，的确有爱国者发出了醉醺醺的欢呼，但只要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不会感觉十分欣慰。此时，英国国内，示威游行、骚乱、机器破坏运动已经成了一种常态，驻扎在国内弹压地面的正规军大约有1.2万人，比威灵顿用来对付法军的人数还多。1815年，威灵顿终于在滑铁卢最后击败拿破仑，25万士兵被遣散，进入了已经十分低迷的劳动力市场，让局势更加严峻。此时，欧洲大陆的封锁解除，战时食品的高需求也没有了，按说，粮食价格应该下降了，应成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中唯一一道光明。可是，地主害怕自己的收入减少，发出了强烈抗议，当局为了回应，便通过了《谷物法》（*Corn Law*），规定只有在国内粮价达到一个设计好的天花板价格，才能进口粮食。其效果，确实像预计的那样，保护了英国农场主靠人工手段维持的高利润。于是，一个时期内面包价格居高不下，民众十分困扰。与此同时，权贵们却似乎开始了一场建筑房子的狂欢，破土动工了大量宅邸，一座比一座富丽堂皇。布莱顿穹顶宫（Brighton Pavilion），这是一座摄政王拥有的印度–中国–摩尔风格（Indo-Sino-Moorish）游乐厅，此时正在建设，炫耀一些华丽的设施，例如铁柱和一间煤气灯照明的舞厅。与此同时，4.5万贫民正在猛砸斯皮塔佛德济贫院的门，希望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个安身之地；其中不少人是印度、美洲、欧洲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身上还有伤疤。

对某些最恼怒、最能言善辩的激进分子来说，这些惊人的对比，是无论如何难以容忍的暴行。第一章提到过，博物学家托马斯·比威克有一个辩论的老对手，托马斯·斯宾塞。他此前已经开始给自己不高的身材，尽力赋予一种象征意义。西方神话里有一个“小伙子杰克用计谋战胜巨人”的故事，斯宾塞就自称杰克，将自己最新一本书命名为《巨人杀手》（*The Giant Killer*）。斯宾塞1814年去世，去世前不久，他作了一些革命性质的计算，算出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房屋和不动产，租赁价值大概是4000万英镑，储备还有1900万英镑；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是1050万人，所以每个纳税人，一年要付出6英镑，来支持那些“讲排场的阔气雄蜂”。

不过，就连斯宾塞的愤恨，比起威廉·哈兹里特的怒火，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哈兹里特终于放弃了当画家的梦想，转而拾起了笔杆子，只要哪家报纸愿意付钱，他就写稿子，什么内容都写。哈兹里特找了一份新工作——国会记者，当了实习生。不过，他也为戏剧、美术展，甚至拳击比赛写评论文章。他尝试每一种新闻媒体，都采取了新的写作形态。不过，这些凋敝的年头里，他最大的使命，还是谴责特权阶级。他认为，特权阶级已经把英国变成了不自然的残忍行为的社会，以及腐败充斥的污水槽。最让他怒火中烧的，是有人对他宣称，穷苦人的厄运，在战时经济到和平经济的

转型期是必然出现的，只是社会结构的混乱而已，实在犯不着为此而发怒。哈兹里特在《考察家报》（*Examiner*）上发表了一系列尖刻的讽刺文章，发出了不敢苟同的声音：官员和富人不是已经在一切方面为所欲为了吗？他们难道没有纵容自己的野心、傲慢、固执，以及破坏性的铺张浪费吗？他们难道没有随心所欲地挥霍英国的资源吗？而哈兹里特旧日的偶像——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对此说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说。这两个人已经变成了“托利党人”，让哈兹里特又惊又怒。

1816年，哈兹里特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深陷痛苦的英国画卷，其直白令读者十分难忘；其中，他特别提到了“现代托利党人”的特征：

他盲目崇拜古时候，崇拜久已确立的传统……托利党人从来不反对国王权力的扩大，不反对人民自由的削减，也从不质疑政府任何举措，是否有不公正、不明智的地方。托利党人坚持，政府闲职、官员的养老金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想削减或废除之，则是不公而危险的举措……（托利党人）只要对方政见与自己不合，就会指控对方是雅各宾派、革命派、国家敌人。托利党人非常崇拜延续已久的名门世系、古代的望族，而鄙视出身低微的人（除了新晋的贵族之外）。托利党人崇敬一切冠冕、星章、嘉德勋位、绶带、十字架，外加所有的头衔。托利党人……将军事管制，视为对不满者的最佳补偿。托利党人认为军队中的体罚，都是必要、温和、有益的行为，尽管陆海军的士兵常常自杀来逃避体罚……（托利党人）都认为，某人因鄙视平衡法院（Court of Chancery）而在舰队监狱中囚禁30年，每天只有六便士补贴，这种遭遇，并没有什么困苦的地方。托利党人……坚决反对教育穷人，以免穷人获得思考、推论的能力……托利党人阅读的唯一的诗歌，就是庆贺国王生日的颂歌，还有庆祝滑铁卢大捷的诗篇。托利党人……在凯旋柱上浪费无数的金钱，与此同时，获得凯旋的勇士们却贫苦不堪，等待救济。托利党人确信，国家目前的艰难处境，只是临时的小麻烦，哪怕监狱挤满了欠债破产的人，被逼无奈而偷窃的罪犯；哪怕报纸上充斥着破产、农业歉收、商业、制造业几乎停滞的消息；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去了国外，因为居住地已经杳无人烟，穷人的税费不堪忍受，而依然不够维持增长的穷人数目；又有数以百计拥有房子的人，曾经受人尊敬，如今却不得不凄惨地恳求当局，想要获得许可，进入贫民和流浪汉的收容所……

哈兹里特这些评价，大部分都既不准确，也不公平，因为比起托利党来，辉格党人的狭隘贵族立场，并没有更加温和，也许还更加恶劣。另外，确实也有不少托利党人，例如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为穷人的处境而唏嘘不已。但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在统治阶层当中，重新建立社会、道德的责任感，而不是挑战统治阶层的合法性。1808年，有两个小农场主在一场暴雪中不幸遇难。华兹华斯呼吁社会捐助二人的孩子们，还把其中一个女孩子

带回了鸽子农舍的家中抚养。然而，正是这种个人的传统慈善事业，让哈兹里特尤其反感，他认为这是多愁善感，以恩人自居的行为。柯勒律治有一次想要做演讲，讨论当下的社会问题，自称这次演讲名叫平信徒布道（*Lay Sermon*）；他的观点，是希望回到以前的“唯一神教派”时期，当时哈兹里特刚开始听到柯勒律治的雄辩，深深着迷。这次，哈兹里特还没有看到演讲稿，就怒不可遏，大骂这演讲自以为是。等他看了演讲稿，愤怒也没有减轻。哈兹里特最瞧不起的，是柯勒律治这一班人，曾经宣扬自己是平民的代言人，如今却同意权贵来窒息这些平民（而平民本来是想让柯勒律治加入他们一边的）；窒息这些因为表达不满而受迫害的人。比如哈兹里特有个朋友，名叫利·亨特（Leigh Hunt），只是因为写文章就被关进了监狱。亨特把摄政王写成“这可爱的阿多尼斯[注]……身材臃肿的50岁男人！说话不算数的浪荡子……”

哈兹里特依然尊敬华兹华斯，认为他是伟大的诗人。但华兹华斯也许是这些变节者当中罪恶最大的一个。因为华兹华斯接受了家乡一个商业大亨，朗斯代尔伯爵（Earl of Lonsdale）的聘请。哈兹里特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行政区约克街19号——约翰·弥尔顿的故居发愤著书，这里是英国共和主义者的圣地。与此同时，华兹华斯住在赖德尔山（Rydal Mount）的新居，受伯爵资助，而且挂了个闲职——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的印花税票发行官。甚至还有消息说，这名年迈的乡村流浪者，这名同乞丐、穷困老兵做朋友的好心人，已经背叛了信仰，穿上齐膝短裤和长筒丝袜，去伦敦与自己的上级贵族——印花税署署长推杯换盏。对此，哈兹里特做出了极为尖锐的嘲讽：难道华兹华斯先生就没办法挤出一首十四行诗，或者一曲颂歌，来赞颂这田园的、爱国的、精致的小摆设——刑具“夹指器”吗？依我的良心来看，他应该就这个主题写一点什么，不然他就再也不该写一个字，除了印花税票的收据之外。让他陪着自己的消费税去官运亨通吧！他在诗歌与政治上的天真，这世界已经拥有得够多了。

华兹华斯没有被嘲讽吓住。1818年，他在《肯德尔纪事报》（*Kendal Chronicle*）上，为伯爵的儿子们参加竞选而大力宣传，竞选的是威斯特摩兰郡两个议员的席位。这两个席位，好几代人以来，都一直是伯爵家族的私产。与此同时，激进派人士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也要竞选两个席位之一，却遭到了全面惨败。朗斯代尔伯爵，跟他的一家子——娄泽家族（Lowthers），让哈兹里特恨之入骨。这个家族，在北方拥有数十万英亩的土地，地产规模如此庞大。据说，伯爵横穿奔宁山脉，从坎布里亚郡走到诺森伯兰郡的海岸，都不会走出自己的地产。娄泽家族拥有不少煤矿，在当代人记忆中最可怕的经济衰退的时期，伯爵却在兴建一座巨大的哥特复兴式城堡，有雄伟的塔楼、木制的大厅；这是伯爵自己的“快活英格兰”的梦想，历史小说家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笔下的概念。

这种人造的传统，假装把旧日家长制的美德具体化，同时又以贪婪、凶狠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幻梦。鄙视这传统的人，并不只有哈兹里特一个人。此时，托马斯·比威克成了一位老绅士，他著作并插图的《英国鸟类史》（*History of British Birds*，1804）、《一般四足动物史》（*A General History of Quadrupeds*，1790）大获成功。比威克尽管还充满着创造的活力，但长年累月创作精细的木刻画，严重损害了他的视力，于是到了1818年，不得不借助儿子和学生们的帮助，来出版他长期重视的插图版《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1813）。他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并不是法国化的革命派。他也不尊敬拿破仑，这一点跟哈兹里特不同；后者听说拿破仑在滑铁卢惨败的消息，悲痛不已，酗酒整整四天。但是，比威克批评权贵却非常直截了当，令人惊讶。他说："这场最为邪恶的战争过后，人类遭到了严重毁坏，宝物也被浪费，这些恶行随战争而来，又支持了战争。"战争结束了，比威克认为，英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掠夺横行的国家，旧日的贵族头衔，与新兴的金钱剥削，勾结在了一起："海运事业沉迷于财富，上流人士绕着贵族的浮夸团团转。"比威克觉得，贵族的权力体系，首先是靠谎言维持的。贵族表面上亲近乡村的自然本质，但实际上却与自然本质相隔离，守在自己帕拉迪奥建筑风格或是哥特式大宅的豪华大门之后。例如，比威克有些地主客户，请比威克为他们的牛羊创作版画，要求这些牛羊，不要按照比威克实际速写的模样，而按照事先给比威克观看的油画来画，这些油画是其他画家创作的，他们为了酬金，很乐意讨好客户。比威克很不高兴，说道："……我的旅程，就这些爱画肥牛的人而言，实在是一无所获。我反对在我看不到脂肪的各个地方画上脂肪……在这种狂热追捧肥牛的风气当中，很多家畜，都被竭力喂养得膘肥体壮、身材硕大；然而，这还不够，在绘画上，必须肥胖得有如怪物，才能让主人满意。"

这种欺骗的反面——真实，则表现在比威克自己的《一般四足动物史》当中：有一种野牛，名叫奇林汉姆（Chillingham）野牛，生活在坦克维尔伯爵（Earl of Tankerville）拥有的林地上，比威克有个好朋友，名叫约翰·贝利（John Bailey），既是雕刻师，也是农业学家，就住在奇林汉姆城堡。这种野牛，毛皮是纯白色，口鼻部却是黑色，据说是一种未经驯化的古代品种的幸存者，早在1世纪罗马入侵英国之前，就在英国的丛林中漫游。在比威克、贝利看来，这些生灵，才是真正的英国"约翰牛"，既不可驯化，也没有被杂交污染血统，因此并不适合成为农庄表演的材料。比威克给这种野牛画了很多速写。他在记录里写道，为了不让野牛逃跑，或者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朝自己冲来，比威克必须天黑就带着伪装，耐心等候，然后在黎明时分接近，手脚并用地爬向野牛，带着一种尊敬、快乐又谨慎的态度。最后，他创作的木版画极有感染力，或许是英国自然史上最伟大的杰作，充满了道德、民族、历史的热情，以及纯粹动物学的迷恋。

在一个充斥谎言的年代，乡村的真实纯朴，对比威克这样的人极为重要。

比威克与其他人一起，响应了一个人，他周身上下都散发着纯朴的光辉，那就是两条腿的咆哮野牛，名叫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科贝特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但他的魅力一直延伸到城市。1762年科贝特生于萨里郡（Surrey）法纳姆市（Farnham），从小一直在父亲的农场上做工，19岁到伦敦，当了一名律师的办事员。但他真正的“学徒期”和教育完成是在加拿大的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他在英国陆军中服役，同他一起服役的还有很多别的农家男孩。1800年，科贝特回到英国，此时他已经成了一名文风简洁有力的记者，小有名气，写稿子用的是农村人的语言。让人吃惊的是，他居然成功见到了皮特首相，还有首相间谍组织的头领——威廉·温德汉姆（William Windham），二人都有兴趣资助一份亲政府的日报，科贝特管这份日报叫《豪猪报》（*The Porcupine*）。因为某些种类的豪猪，可以把棘刺射向敌人，这份日报也可以像豪猪一样攻击“和平之友”，以及任何有不忠嫌疑的人。有至少三年时间，科贝特一直忠心耿耿地敲着爱国主义的战鼓，催促政府多多出版面向大众、激励人心的通俗历史故事，叙述古代的英雄事迹，例如海盗德雷克（Drake）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马尔伯勒（Marlborough）公爵打败路易十四；科贝特还提倡一些暴力的运动项目，用于军事训练，比如“单棒赛”，参赛双方一只胳膊捆在背后，各持一根大头棍，猛击对方，直到“一名对手头上流出血迹长达一英寸”为止。这让基督教福音派大为恐慌。

1803—1804年，是英国爱国主义感情爆发的时期。就在这一时期，科贝特经历了一生中的重要转变。《新约全书》中的保罗，曾反对基督教，在前往大马士革（Damascus）的路上遇到了耶稣的神迹，终于受到感化，改宗成了耶稣的门徒。科贝特的转变，几乎可以说是保罗式的；而他的“大马士革之路”，是一个小村子，名叫霍顿希斯（Horton Heath）。此地依然保有未经圈地的公用地，在英国，这样的村子只剩下了不多几个。他发现，这里的村民集体使用绿地，容纳了100只蜂房、60口猪、15头牛、800只鸡。尽管第一章提到的农业学家阿瑟·杨格称这样的公用地是浪费资源，很不经济，但科贝特的观点却正好相反，认为公用地实际上非常适合乡村经济。然后，科贝特开始热心地统计起来。1803年，他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大约100万贫民，其中大部分当然在农村。威尔特郡（英格兰南部的一郡）（Wiltshire）的居民，七人中就有一人是贫民，在按照《济贫法》（Poor-Law）吃救济；在苏塞克斯郡（Sussex）则每四人就有一个贫民。科贝特用一种全新的愤怒声音，向读者转告了这可怕的消息：“不错！就在英国，有这样的英国男人、女人、孩子，整整超过100万，我们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奥利弗·哥德史密斯原来是对的，而我们却把他当成了没有希望的感伤主义者！”

更重要的是，科贝特还深深地感到，社会上流传着陈词滥调，吹嘘大英帝国怎样富有，而农村的一般民众，其生活条件，在过去的50年间却越来越

差了。在这个标准上，民众的疾苦，就是现代的！科贝特猛烈抨击那些暴发户、资本家、金融家，说他们迷惑了传统的乡绅、地主，地主就不再采用“烤牛肉”“葡萄干布丁”为特色的家长制的作风，而是让自己手下的工人在市场中自己养活自己。这些资本家如同“牛蛙”一般，把小佃农一口吞了下去。“自从农庄里多了钢琴、客厅铃铛，还有地毯，工人的运气就越来越差了。”

科贝特办了一份《每周政治记录报》（*Weekly Political Register*），这是一份大幅报纸[注]，专门列举这些恶行，立场相当激进，甚至可以说有革命色彩。报纸不光采用的语言十分通俗，通俗到了挑衅的地步，而且就好像是乡村压水机旁边、啤酒馆中的谈话，专门是为了大声朗读出来的。而报纸的核心，当然是威廉·科贝特。这一点，哈兹里特准确地观察到了：“我问他日子怎么样？他说糟糕得很。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光景不好。他说：‘什么时候有过这么好的夏天，这么好的收成呢？’他又说：‘啊，就算夏天收成都这么好，他们还是把穷人的日子弄得很差。’”科贝特的记者生涯持续了很久，此间，他也一直是活跃的农场主，开明的地主，把自己的宅子专门腾出一栋，给单身雇工当作宿舍；他给成年男工开的薪水，平均一周15先令，或者按他的说法，是当下市场价的20倍，但他还是可以盈利。

科贝特与平民百姓十分接近，因此也激烈反对那些权贵用来形容平民的语言，比如“庄稼汉”，或是伯克说的“猪一样的大多数”。科贝特认为，这种绰号，实际上是对猪的污蔑。他富有感情地声称，他和猪是多么有共同语言：“我给家养的猪，预备过冬的窝，仔仔细细打量这个地方，心里想着，我是不是很快就能自己住进去呢？”科贝特在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克里克莱德镇（Cricklade），亲眼看到了雇工的恶劣条件，认为他们的住处其实在猪圈的标准以下，“而且他们的饭食，比猪食还要差得远”。

国会面对这样的痛苦，似乎在装聋作哑，于是，科贝特就登上了激进派的政治舞台，开始对“古老的腐败”进行清算，呼吁清除那些为了私利而当官的蛀虫、政府里的闲职、各个腐败的自治区。他也同样呼吁，让穷人享有社会公正。他认为，自己的目标，不是加速社会解体，而是恰恰相反：要重建社会同情心的纽带；这种纽带，他认为，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存在过，正是这纽带；将农场主、小农场主、雇工联系起来。科贝特天才地主张，要把农村和城市的不满，放到一起。他知道，城乡双方能够相互理解，也一定会相互理解，原因只需这么一个就足够了——兰开郡、约克郡、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城市，全都挤满了第一代移民，这些移民，来自阿瑟·杨格鼓吹之下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型、商业化的乡村，因为劳动力过剩而出来打工了。如今，城市和乡村都在受苦。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失业了，修

剪树篱的人、农场工人、挖沟渠的人、牧羊人，现在找到的工作，工期更短了，有时候在冬天还找不到工作。

科贝特描述的风景，理所当然，完全不同于华兹华斯笔下田园诗一般的莱克兰——这片得到上帝庇荫的土地。而是一如既往地充满污秽、疾病，挣扎在饿死的边缘。之前，福音派教徒目击印度的穷困，大为震惊，写了一些报告；莱克兰的情况，也跟印度贫民区极为相似。无家可归而去占领空房子的盲流，和乞丐在路边挤在一处。科贝特还发现，北部、西北部有时候被认为更加落后，但实际上这里的雇工日子还要好一些。相反，在英国农业经济的核心地带，也就是伦敦周围各郡和东安格利亚[注]的农田上，为了利润最大化，曾经过度使用耕地，这种现象是全英国最严重的；这片土地上，雇工的生活条件却最为恶劣。科贝特准确地预言，英国若是再次掀起农民暴动，一定就在这个地方。

红脸、大嘴巴、“猪一样的”科贝特，骑着马穿过一个又一个郡，检视着一座座济贫院、一处处谷仓前的空地，记录下地方长官、缺席的地主那些最恶劣的事迹，把一切登在自家的报纸上。当局认为科贝特变节了，理所当然恼怒万分，不停骚扰报纸的编辑们。有一次，科贝特还写了一篇文章，抨击军队里的鞭笞体罚。虽然文章没有真正出版，科贝特还是在新门监狱里关了一阵子。尽管如此，他的《每周政治记录报》还是在巅峰时期每周销量达到了6万份，远远超过其他出版物。当然，科贝特不是圣人。他是个激烈的反犹主义者，还反感黑人，坚持说加勒比海那些“油腻的黑人”比英国的劳工阶层日子舒服得多，直到发现自己的劳工阶层选民阵营里，废奴主义占了上风，才改变了立场。不过，有一件事却肯定无疑：托马斯·潘恩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像科贝特一样，如此强烈地感染英国民众，煽动他们参与政治。

但另外一件事也肯定无疑，就是社会上掀起了新的运动，想要恢复“自然权利”和“旧日自由”。发起人是一些狂热的教徒，来自中产阶级和农村劳工。这种热情，有一部分是因为受到了统治阶级核心被曝光的丑闻。

1825年，有一个贵族情妇，号称“不净者”（Impure）的哈丽雅特·威尔逊（Harriette Wilson），出版了一本回忆录，立刻成了抢手货。哈丽雅特给自己的贵族客人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包括威灵顿公爵，此人还与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伍斯特侯爵（Marquis of Worcester）分享了哈丽雅特。威灵顿特别喜欢把自己军服的仿制品给她穿上，把她打扮成第十轻骑兵团的军官；然后让她穿着如此的奇装异服，陪她出去骑马。哈丽雅特说，只有这样，威灵顿才肯下床。《圣经·旧约》里有一座淫乱之城索多玛（Sodom），这些贵族的无耻劣迹，可以用“新索多玛”来形容。理所当然，公众极为恼怒。此外，人们还感觉，基督教的千禧年已经不远了，出

现了紧急的气氛。舆论觉得，将要有重大的变局发生，而变局的先锋，就应当是社会正义的力量。人们常常聚集到唯一神教派的礼拜堂，福音派的教堂、学校，起草请愿的稿子，组织游行集会。他们既要求政治改革，也要求道德运动，还要求，必须终结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垄断地位，废除奴隶制，改革破烂不堪的国会，这种广泛热情的边缘地带。也有些人努力遏制民众的愤怒，这些人是真正的革命派，例如，比威克在印刷厂的老对手，千禧年的“共产主义者”托马斯·斯宾塞。还有一些不太激进的人，比如托马斯·乔纳森·沃勒（Thomas Jonathan Wooler）这样的记者，他也是小说《黑侏儒》（*The Black Dwarf*）的编辑，总是因为煽动推翻政府，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当局再次派了很多间谍，打入最危险的监狱牢房，但这一次是作为卧底进去的。他们暗中策划阴谋，好让当局逮捕领头人，破坏激进组织。

1817年11月，英国的两起死亡事件，似乎成了这个国家两极分化的象征。英国王室里，除了国王之外，唯一真正受到民众拥戴的成员——夏洛特·奥古斯塔公主（Princess Charlotte Augusta），是摄政王的千金，不仅美貌，而且显然思想倾向于自由派；这一年，公主去世了，英国陷入一片悲哀。其景象，与1997年思想同样自由的戴安娜王妃去世之后的哀悼，有一种怪异的相似。据说，奥古斯塔真正理解平民百姓的疾苦，而且她父亲和叔父们年纪都很大了，她很有可能继承王位，还可能为整整一个朝代生下富有同情心和智慧的君主们。差不多与此同时，1817年春，当局派遣的秘密卧底中，有一个最活跃的成员，名叫威廉·奥利弗（William Oliver），此人欺骗三名激进分子，让他们在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的彭特里奇（Pentridge）领导数百名长袜纺织工人“起义”，于是三人都被控煽动罪，判处绞刑，而且要车裂；这种刑罚在现代的19世纪，算是很不合时宜了。所幸，三人最后只是绞死了事。

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是内政大臣西德默斯勋爵（Lord Sidmouth）安排的陷阱，为了引蛇出洞，让工匠中的革命分子暴露出来，不至于造成破坏。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站在了政府一边，为政治家说话，赞赏他们消灭了暴动的根源，没有让根源长成亵渎神灵的雅各宾派的妖怪。哈兹里特对此大为惊惧，此外，还有不少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两人的年轻崇拜者，包括诗人约翰·济慈、珀西·比希·雪莱，都愤怒地反击，写下了大量诗歌，谴责专制主义。

改革派的人，知道政府专门等待借口，进行强力的镇压，于是非常小心地行事，不让政府得到借口。1819年夏，科贝特遭到政府迫害，不得已逃到美国。此时，曼彻斯特郊区的圣彼得田野组织了一次大型集会，组织者是曼彻斯特爱国联盟协会（Manchester Patriotic Union Society），想尽了一切办法，确保集会和平进行。他们绝不能给“维护秩序”的力量任何机

会，把这次集会看成一群残忍的雅各宾派暴徒，决心抢劫财产，破坏基督教文明。一名纺织工人塞缪尔·班福德（Samuel Bamford）写道："当时决定了权宜之计，认为这次集会应该产生尽可能大的道德影响；而且应当展现一幅英国前所未有的壮观场面。"他回忆的事情，后来舆论很快称之为"彼得卢大屠杀"[注]。

集会的人群来自北方各郡，有五六万人，8月16日，他们有秩序地行进，打着"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的横幅，有些人唱着原卫理公会的圣歌，场面看上去更像复兴布道会，而不像革命。然而，当地的长官可没有兴趣为民众的良好行为记功，派出了军队，来驱散人群。发表演讲的人当中，有外号"演说家"的亨利·亨特（Henry Hunt），戴着白帽子，还有萨缪尔·班福德。当局下令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Salford）的自由民——商人、工厂主、出版商、店主——去逮捕亨特。命令很快执行了。众人把亨特痛打一顿，把他有名的白帽子扯了下来。但是，这些自由民在人群中推挤的时候，马匹踩到了一个挡在路上的小女孩，孩子不幸身亡。他们立刻就被狂怒的示威者包围了。示威者挡住了马匹，向着自由民大骂。自由民开始恐慌了，于是，正规军——轻骑兵出动来解围。他们解围的方式，是抽出军刀，在拥挤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人群立刻没命地四散奔逃。最后，11人死亡，421人重伤，152人被军刀砍伤。伤员当中，至少有100人是妇女儿童。

班福德用诗歌一般简洁的文字，描述了这场混战：

骑兵们不知所措，尽管人和马重量加在一起，却显然不能冲破这一片人山人海，于是军刀来回舞动，劈过了高举的手，毫无防备的头颅。之后便出现了砍断的肢体、带伤的脑袋。可怕的混乱一片喧嚣，与哭喊、呻吟融合在一起。人们大叫："啊！耻辱！耻辱！"然后是："散开！散开！他们在前面杀人，人跑不脱……"一瞬间，人群止步不前，好似时间凝固；然后又是一阵狂乱奔逃，沉重，无人反抗，宛如奔涌的潮水；还有声音，好像低沉的雷声，带着尖叫、祈求、诅咒，出自骚动的人群；这人群在军刀之下无处可逃！

西德默斯勋爵表扬了曼彻斯特当局，说他们立场坚定；威廉·华兹华斯的表现，似乎也大有同感。其他人则为这场事变感到恶心，将其与欧洲的专制君主虐杀人民相提并论。彼得卢事件中的某些邪恶之处，在很多人看来，嘲讽了政府"坚持不列颠传统，反对革新"的主张。批评家们相信，彼得卢事件的影响，并没有局限在英国本地。雪莱当时正在意大利，但还是奋笔疾书，写下了《无政府主义的面具》（*The Mask of Anarchy*），猛烈抨击英国当局，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在路上遇见了谋杀/他的面具宛如卡斯尔雷子爵[注]这首诗，标志着他与老一代诗人的决裂。

彼得卢事件之后，激进派大受震撼，分裂成了两派。一派以“演说家”亨特为代表，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合法斗争，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他成功发起了上诉听证会，前往会场的路上，30万伦敦市民夹道欢呼。另一派则忍无可忍，变得缺乏耐心了。比如，激进派有个落魄绅士，名叫阿瑟·西斯尔伍德（Arthur Thistlewood），策划了“加图街阴谋”（Cato Street conspiracy），想要刺杀内阁成员，袭击伦敦塔、英格兰银行、国会；这种人，对政府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宣传材料。此人被公开审判，然后处决，政府掀起了新一轮迫害狂潮。到1820年年底，民主运动大部分领导人——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演说家”亨特、托马斯·沃勒，都进了监狱。1819年，镇压反对派的“六项法案”（Six Acts）通过。之后，地方执法官就有权搜查私人住宅，寻找煽动性的出版物或者武器，还有权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另外，出版物还附加了六便士的印花税，于是工人阶层里识字的男男女女，也就接触不到大多数有名的书刊了。

就在这时，威廉·科贝特从美国回到了英国，还带着潘恩的尸骨，后来把尸骨放在了利物浦（Liverpool），但具体地点不详，于是潘恩最后的下葬地点也就成了一个谜。科贝特显然继承了潘恩的旗帜，当上了“人民之友”，他有能力吸引大量观众，也有能力唤起民众的愤怒。当时的激进派，无比需要科贝特。然而，科贝特却发生了某些奇怪的转变。他并没有动员人们反对“六项法案”，而是动员支持者去反对喝茶。他反复向支持者灌输“烤小麦或者美洲玉米对身体更好”这样的观点。他并没有攻击彼得卢事件的恶名，而是去攻击马铃薯的恶名了。他并没有着力纪念潘恩，而是发表了冗长的演说，论述自己的新货币政策，一边还抨击“犹太狗”（Jew dogs）把伦敦变成了“犹太肿瘤”（Jew Wen）。历史上，爱德华一世曾经迫害犹太人，强迫犹太人佩戴身份徽章。科贝特认为，英国没有办法恢复这种明智的政策，真是太遗憾了。

这些民权保卫者，要么远远躲开了迫害，要么像科贝特一样不再与当局对抗了。与此同时，经济有了可观的改善。政府终于可以庆祝，把英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了。不过，这种自鸣得意，既不应得，也不明智。如果将民众的愤怒比作一棵树，那么，这棵树的新芽剪掉了，但根系却扎得很深。例如，比威克就没有安静下来。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威灵顿和外务大臣卡斯尔雷的政策，让英国搭上了“泛欧洲警务”（pan-European policing）的便车，一辆沉重的马车。这一政策，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上，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制定的。英国既要听从外国专制君主的命令，又要无视国内人民的呼声，比威克认为，这样的政策不仅危险，而且应受道德上的谴责。比威克的预言色彩逐渐增加了。他警告说：

独裁者、贵族、主教们已经抛弃了一切羞耻感，罪孽深重。这个权贵组成

的方阵，迄今为止一直难以撼动，而且还将继续坚守，直到愤怒的人民有可能用暴力将他们摧毁，或者有一种理念，反对这种邪恶政策操纵国家，这种理念能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可；这些人的不满，或许能够让政府的爪牙们悬崖勒马，有了时间，还有聪明而诚实的举措，或许能够避免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

比威克是在19世纪20年代写下这些的，距离他1828年去世，不过几年时间。他一直在强调道德的紧迫，这种论调，在这个十年中很典型，从政治上来说较为内敛，因此比较能欺骗当局。这个十年，从爱尔兰西部到比威克所在的纽卡斯尔，市政厅、教堂、礼拜堂、酒馆，都挤满了热情的民众，聆听福音派牧师的演讲。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宗教和社会改革，而不再是明显的政治诉求。在爱尔兰，演讲还包含了1795年那位上台七个星期的费茨威廉伯爵在20年前作的许诺，说要取消天主教的禁令，允许天主教徒做官，竞选国会议员；这一直是各个天主教协会奋斗的目标，其领导人是富有魅力的律师克里（Kerry）和地主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这场运动，使得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不尊国教派，也跟爱尔兰联合了起来。大家都认为，要面对共同的敌人。工业城市当中，也掀起了新的国会改革运动，大部分参与者是中产阶级。这一运动，是伯明翰的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wood）发起的，充分利用了道德运动的热烈气氛。1824年，比威克长期重视的一项事业终于完成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成立了。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当了协会的赞助人，于是协会名字又加上了“皇家”二字。根据国会法令，如将牲畜运往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途中加以残忍虐待，则是非法行为。不过，同样的法令也禁止了传统的娱乐活动——纵狗咬牛戏，还有11月的奔牛节。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英格兰中部地区，奔牛节是一项重要的乡村活动。后来，林肯郡（Lincolnshire）斯坦福德（Stamford）举行奔牛节，此时虽然法案已经生效了，却还是出动了一个连的龙骑兵和警察，才制止了这场活动。

“正义大军”已经开始全速前进，而他们最大的胜利，莫过于彻底废除奴隶制。废奴运动原本是贵格派教徒的专长，但实际上，最大的运动却是福音派发起的，这运动打破了党派和教派的界限。尽管运动必须对抗某些劳动阶层的种族主义，但还是在约克郡和兰开郡得到了民众大力拥护。1832年，在奥尔丹（Oldham），威廉·科贝特也终于宣布，支持废奴运动。有一名废奴主义者，名叫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曾在美国冒着生命危险，宣扬废奴主义，据他声称，在利物浦，他的听众就多达70万人。

这些运动，都带有革命的开创性，使用的各种新手段，无论是托马斯·潘恩，还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无法想象。这些运动，催生了历史上最早

的、凭借舆论压力斗争的专业集团。在爱尔兰，运动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为了战胜新教地主选定的在职官员，专门雇了一批办事员，细心编定了选民的名册，还为必须到外地参选的人安排了行程。废奴主义者做好了准备，倘若需要，就会组织一次系统的抵制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抵制西印度群岛出产的食糖。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主要用甘蔗制糖。从拿破仑战争期间开始，英国广泛种植商业化的甜菜，用来制糖。有了这种新的食糖来源，加上准备参与抵制的成员极多，一旦实行抵制，极有可能给西印度群岛奴隶主带来巨大的损失。此外，这些运动还都采用了传统的请愿手段，并把请愿带入了“广泛动员群众的时代”。一旦请愿，就会募集数以十万计的签名，人名全都绣在一幅惊人的布匹上，这种设计，专门用来显示壮观的效果，然后让一名支持请愿的国会议员，指挥人送进下议院大门。组织者要是工作出色，请愿的布匹可能需要四个人才能抬进大楼，甚至可能需要八个人。1830—1832年，有4000份这样的请愿书送进了国会。目前水平最高的研究显示，英国成年男性中，每五人就有一人，在1787年、1814年或1833年的一份废奴请愿书上签了名。更加惊人的是，英国女性发起的一次请愿人数也达到了187000人，请愿书需要四人费力地搬进下议院，放在地板上。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倘若还活着，看到这样的场景，定然会欣慰的。

在重视社会事业的新派教会手中，政治变成了一座展现美德的舞台；这座舞台上，那种认为“当局都是吝啬的老色鬼，把持国会法庭”的观点，看起来越发奇怪了。以前，力量的象征是盾形徽章，是带有城垛的庄园宅邸；如今，这些东西都让位给废奴主义者组织的巡回展览，例如国会议员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作家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他们展示了鞭子、锁链、贩奴船的模型，还有各种用于奴隶贸易的工具。于是英国各地，公共场所和私人住宅里，出现的不是国王的画像，而是克拉克森创作的一幅油画，画的是一艘贩奴船，数百人就像沙丁鱼一般挤在甲板之间；此外，还有布莱克一些可怕的画像，画的是奴隶一旦反抗，遭受的残忍刑罚。

舆论普遍认为，比起党派的分歧，从道德上区分何为正确、何为糊涂，才是更加重要的事。废奴运动终于把威廉·哈兹里特与威廉·华兹华斯带到了同一个庞大阵营里面。华兹华斯属于体制内的特权阶层，哈兹里特则是体制外的批评者。就连那些发誓不会损害全世界最优秀国体的人，也被废奴运动改变了思想。此时威灵顿公爵当了首相，他感觉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同意对天主教采取宽容政策，以获得奥康奈尔领导的天主教协会（Catholic Association）的支持，协会的势力已经很大了。辉格党在国会改革问题上，多年以来一直不比托利党更积极，这时却面临一种“沦为多余人”的下场，除非他们能够想办法来约束这种道德上的激进主义，这种蒸汽驱动的力量，为他们的四轮马车所用。

1830年夏，这个机会突然来到了辉格党身边，但与此同时，也迫使辉格党不得不放弃了拖延症。画家康斯特布尔（Constable）笔下的乡村风景，改变的速度非常缓慢，人们依旧认为这是往日英国的核心地带，生活宁静安详，由乡绅和教区牧师管理；而今，这地方却腾起了硝烟，正如科贝特之前预言的那样，虽然科贝特自己也有所保留，觉得不一定会发生暴动。科贝特一点也没有隐藏自己的同情心：“无论会发生什么，这些人，永远不会躺下来，静静等着饿死的！”去年冬天，年景糟透了。一如既往，歉收导致粮食价格居高不下，雇工要么失业，要么只能打短工，而且很多地方给的工资根本不能糊口。不过，这一次，有个“施荣上尉”（Captain Swing）率领的“军队”却名声大噪，到处焚烧干草垛，砸毁脱粒机。施荣的破坏行动，波及了英国南部一大片区域，西到多塞特郡，东到东安格利亚和林肯郡。在汉普郡（Hampshire），亲政府的自由民和反政府的乱民爆发了多次激烈冲突。科贝特的家乡肯特郡，还有东苏塞克斯郡。1831年，科贝特曾在巴特尔镇面对500人演讲，结果被当局送上法庭，但理所当然宣判无罪。在巴特尔镇附近，有2000名施荣分子遭到审判，处决了19人，但还有200多个被判死刑的人，后来改成流放到澳大利亚。

1830年7月，法国又爆发了革命，英国主张提前改革的人获得了重要论据。拿破仑失败之后，波旁王朝复辟了。这一次，法国革命又推翻了波旁王朝，废掉了查理十世，新国王路易·菲利普登基。他是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的儿子，先前参与过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当时绰号“平等的菲利普”（Philippe Egalité）。历史回忆的力量，被辉格党的历史学家和演说家，清醒而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起来，比如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他这时还相当年轻。他们主张，只有及时改革，才能避免现代革命在英国爆发。然而，托利党人——首相威灵顿公爵，之前接受了天主教徒解禁措施，现在却竖起了改革的障碍。首相说目前国会的代表状态是最好的，他绝不可能发起国会改革，也一直会反对改革。威廉四世国王的看法也与之相仿，这看法被公众知道了，于是国王在民间的支持，瞬间消失了。

政治精英内部，也正在产生严重分歧，之前曾一度有过共识，一味镇压而拒绝改革就能安定国家；但此刻，这共识却土崩瓦解了。取而代之的观点是，大家要想都生存下来，应当使用各种最聪明的策略。1830年11月，威灵顿下台。英国在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之前，就一直是托利党执政，此时，辉格党终于上台，承诺一定要进行国会改革。新首相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是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的门生。差不多40年前，他就第一次提出过改革法案。这一次，“40年战争”终于有望结束拖延了。因为辉格党政府的成员，其出身至少跟托利党一样贵族化（查尔斯·格雷本人是伯爵），所以在1831年3月下议院公布改革细则的时候，极少有人对这一晴天霹雳做好了准备。麦考利带着可以理解的过度兴奋，描述了托利党人

第一排席位大惊失色的场面："皮尔的下巴掉了下去，特威斯（Twiss）的脸好像一个受到诅咒的灵魂，赫里斯（Herries）脸色仿佛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他们的惊愕，称不上什么罪过。因为改革措施包括：大约有140个选区，居民少于4000人的，要失去拥有的一个或两个议会席位（总共取消了60个选区的席位）。这些席位会重新分配给新兴的工业化城市，以及伦敦。

第一次改革法案在上议院被否决了。在第一次否决与第二次提出之间，发生了更有灾难性的事件，可谓是对辉格党更严厉的警告。德比郡、诺丁汉郡、布里斯托尔郡都发生了暴乱，这些地方的主教宫被烧成一片瓦砾。威尔士南部盛产煤铁的乡村，早在1816年已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罢工，此时，村民食不果腹，在政治上又感到不满，于是在梅瑟蒂德菲尔（Merthyr Tydfil），便有一群人袭击了法院，释放了支持改革的罪犯，占领了城镇。从斯旺西（Swansea）出发的一支骑兵分遣队遭到了伏击，当局从蒙茅斯郡（Monmouth）调来了数百军队镇压，方才勉强恢复了秩序。

在这一片愈发严重的混乱和暴力背景下，又发起了新的选举。选举运动一度遍及了全国所有大小城镇，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区分了参选各方。结果是辉格党获得了足够多数，可以要求窘迫的威廉四世立刻授予50人贵族头衔，从而凑足人数，将改革法案再次提交上议院。之前，法案已经在上议院两次被否决。最后，1832年6月，《改革法案》正式成为法律。很多历史学家强调，这一法律在社会意义上非常保守。例如，法律依然保存了贵族特色，以及贵族对英国的控制，而没有将其破坏。实际上，这正是辉格党人的本意。麦考利说："没有人希望把所有勋爵全都赶出宅邸，除了各地偶然看见的一个发疯的激进分子，他一走过来，街头的孩子就会朝他指指点点。"相反，改革法规定了一种"10英镑普选权"，规定只有财产超过10英镑的成年男性才有选举权。这一规定，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因此，辉格党的要员，例如约翰·拉塞尔勋爵（Lord John Russell）、格雷伯爵、达勒姆子爵（Viscount Durham）相信，改革法更有可能保存贵族阶层稳定社会的力量，不让社会受到全面"美式民主"的威胁。他们的目的是给一个潜在危险性更大的联盟造成分裂，这联盟一方是中产阶级强调道德的活动家，另一方是真正的要求普选的民主派。

这一策略果然有效。改革法创造了50万新选民，还成立了新的下议院，丹尼尔·奥康奈尔、"演说家"亨利·亨特、托马斯·阿特伍德、威廉·科贝特全都获得了席位。科贝特一直颂扬农村，这时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了工业城奥尔丹的代表。这个新国会，凭着以常识为基础的朦胧自由主义的意识，的确阻止了整体革命的势头（不过，农村地区还是会有一些骚乱，最严重的骚乱是1838年发生在肯特郡）。这些变化，的确大有意义。科贝特为了庆祝改革法案通过，办了一个"筷子节"（Chopstick Festivals），邀请

了7000名劳工，给他们70磅火腿，外加好几车的羊肉、牛肉。他知道，自己目睹了“古老的腐败”无疾而终，还见证了烧水壁炉自治市（potwallopers）注，敛财官吏，袖珍选区的消灭。

相反，威廉四世也为了一个理由气得发疯。他愤怒得无法亲自签署改革法案，而是让王室的高官代劳了。1829年，《天主教徒解禁法》（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通过，英国国教会就丧失了垄断地位。而且，因为立刻出现了容易受政治影响的大多数，所以上议院的独立性也受到了不可逆的损害。此外，托马斯·阿特伍德的组织——伯明翰政治联盟声望鹊起，选举也获得了胜利。如此一来，继奥康奈尔在爱尔兰得势之后，现代政党政治体制的运作，也消除了障碍（尽管没有立即运作起来）。现代体制采用一切动员策略——竞选演说、大规模请愿、报纸宣传战，来角逐英国的政治权力。这些策略，是废奴主义者、主张宽容天主教的人最先使用的。

1833年，下议院——此时已经改革，但还没有民主化——终于让英国在各个殖民国家中，首先在所有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最近有一些历史书，认为当时的奴隶生产的产品需求在减少；实际上，需求是在增加。因此，这个成就尤其来之不易。摧毁奴隶制的手段，绝大部分是道德论述；主张人类共同天性的观点，最终取得了胜利。1834年，国会大厦突然发生火灾，被烧毁了。这可并不预示“道德奇迹”的新纪元。改革派的胜利，依然只是部分领域。这时，英国的天主教徒终于能在政府任职了，但在爱尔兰，他们却失去了条件相对宽松的“40先令永久产业”选举权。不论在爱尔兰，还是在英国本土各郡，这一选举权都被严苛的规矩替代了，要求支付房屋年租金10英镑以上的人才能有选举权，这就非常有效地排除了大多数追随潘恩、科贝特、亨特的穷人。真正的男公民普选权，要等到1918年才全面实现。加勒比海上的奴隶种植园主，必须因为损失而得到补偿；一开始，建立了一种过渡式的“学徒制”，学徒是奴隶和自由民的中间状态。

英国的发展，与任何自然之力的想象都截然不同。英国人还没有走完民主和社会公正的漫漫长路。第一章开头，那些漫步者、逍遥学派的人，如今已经被蒸汽驱动的高速经济革命赶超了。这场革命，他们根本无力抵抗，更别说扭转了。而英国的工业化，这场欧洲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沧桑巨变，却还是发生了，而且迄今为止，并没有伴随着血腥的革命。这个时代，开始于马车奔驰的快速公路，而此刻，公路的领头地位，又被快到难以想象的铁路、火车取代。华兹华斯觉得，有些铁路破坏了湖区的神圣，为此很不愉快。这些火车，冒着黑烟，发出魔鬼般的声音，把工匠们一直送到了自己的家门口。还确实有成群的人步行而来，带着托马斯·韦斯特的导览，以及华兹华斯自己写的导览，匆匆忙忙在路线图上标记出未来的、必须建设的各个火车站。华兹华斯自己，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他可完全不想这样。华兹华斯跟卢梭一样，都相信英国乡村应该是治疗现代社会的良药，而不应成为现代社会的同谋。但是，对立的两极居然就走到了一起，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农村居民缺少城里的产品，而城市居民也希望体验农村生活。想体验，果真就体验到了。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同样是最为眷恋乡村记忆的国家。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城市，清一色都建绿地和公园，是乡村的微缩景观，作为丢失的田园风光的安慰剂，或者说纪念品。铁路公司把铁路沿线的土地分给了职工，职工可以在土地上种蔬菜、花，养猪、鸡，他们因为圈地运动而失去了耕地、公用地，这就是那些耕地、公用地的影子。这不是科贝特想象的“快活英格兰”，有着乡村的绿地、麦芽酒、烤牛肉；不过，人们有了这些分配的小块土地，总是聊胜于无。以及，多亏了“绿地运动”的先驱，比如约翰·克劳迪斯·劳登（John Claudius Loudon），公园（park）一词，以前的意思一直是贵族的私产，如今却破天荒第一遭，成了公共场所，打破了阶级、财产的壁垒；例如别根海特（位于英格兰西北部）（Birkenhead）的公园，1847年向公众开放，园内设计了散步的道路、板球场、池塘、牧场，可以让平民游览，把孩子带来，让孩子体验一点自然的乐趣。我觉得，这样的地方，或许并不崇高，但也绝不荒唐。

---

1. 图克与塞沃尔也同样无罪释放，此后英国政府不得不暂停了逮捕与审判。——译者注

2. 1829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解禁法案》（emancipation），满足了天主教教徒的需要。——译者注

3. 约翰牛，John Bull，英国代称，拟人化形象。——译者注

4. 詹姆士·沃尔夫（James Wolfe，1727—1759），英国名将。1756年英法七年战争爆发，1759年沃尔夫在加拿大的亚伯拉罕平原会战中战死，但那一战也让英军大获全胜，并最终在1760年击败法军，占领加拿大全境。——译者注

5. 以诺（Enoch），《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人物，传说与上帝同行三百年，最后被上帝接到天上去了。——译者注

6. 阿多尼斯（Adonis），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此处用作反语。——译者注

7. 英国传统，如报纸幅面较大，则一般内容相对严肃。——译者注

8. 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古代英格兰国家，今英格兰东部地区。——译者注

9. 彼得卢大屠杀（Massacre of Peterloo），这一名字模仿滑铁卢，为了

讽刺当局。——译者注

10. 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即罗伯特·斯图尔特（Robert Stewart），时任外务大臣，因支持当局镇压请愿活动而受到抨击。——译者注

11. 当时一个奇特的规定，这些地方合格选民的家里必须有能烧水的壁炉。——译者注

第三章　女王与蜂巢

总重24吨的超大煤块；拥有80片刀片的“斯波兹曼”（Sportsman）刀具；机械式的牡蛎开壳器，宣传海报名曰“牡蛎杀手”（The Ostracide）；古塔橡胶公司（the Gutta Percha Company）的蒸汽船家具（一旦发生船难，可以变化成救生筏，浮在水面上）；一群短尾鼬标本摆成一个茶话会的布景——这一切的远处，是一系列玻璃做成的蜂巢，设计师则是约翰·弥尔顿，号称“发明伦敦的人”（Inventor of London）。身材娇小的维多利亚女王，穿着波纹绸的粉红色礼服，戴着头冠，在展馆之前停下脚步，看着住在里面热热闹闹的蜜蜂。让她最为惊讶的是，这些住户颇为自得，一点也不在意众人的审视。它们还要忙着酿蜜，哪怕女王来了，也是自顾自地工作。“女王陛下与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经常注意这些天才的小昆虫杰出的工作。虽有各种景色与声音环顾四周，它们却始终如一，专注于自己，可谓给我们上了令人崇敬的一课。”这一课，并不需要花大力气灌输。有时候，维多利亚确实会觉得，被人看到是不体面的事。十年之后，丈夫那保护她的颀长身影从她身边被夺走之后，她拉起所有的窗帘，熄了煤气灯，把自己埋入黑暗。

然而，在这一个光芒四射的日子，1851年5月1日，她却并不如此。后来，维多利亚给叔叔——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写信，说道：“我们历史上，这是最伟大、最美丽、最壮观的一天。”这一天，在水晶宫（Crystal Palace）里面，维多利亚正如她参观的蜂王一般，也是水晶宫里的女王；为此，她非常满意。有3万名观众持有参观的长期票，在这3万人注视之下，维多利亚能与他们坦然对视，而且心头涌上一种神圣的愉悦感。此前，天空一直飘着雾霭般的细雨，女王和阿尔伯特骑着马，沿着皇家大道前行。然而，女王注意到，就好像为了尊重这个场合的神圣庄严，细雨却停了，阳光洒了下来。这在春天的海德公园，是非常罕见的事。两人穿过科尔布鲁克戴尔（Coalbrookdale）的铁门，走进了水晶宫，迎接他们的，是众多喇叭的齐鸣、放有大量棕榈叶的空间，还有成堆的鲜花。有一段时间，维多利亚女王还被30万块玻璃砖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睛。这些玻璃砖，每一块长49英寸、宽10英寸，一同让耀眼的光明洒满了室内空间。这确实是上帝的光，上帝就跟女王一般，也注意到了女王丈夫杰作的伟大。如今，丈夫就站在女王身边；还有小公主维姬（Vicky），维姬穿着诺丁汉郡蕾丝与白色缎子衣服，头发上插着野玫瑰；还有小王子伯蒂（Bertie），穿着苏格兰高地短裙。一家人都笼罩在水晶宫的光明中。室内有一个水晶喷泉，高达20英尺，喷溅着古龙水，维多利亚嗅着香水的芬芳，耳中灌满了600人合唱团和5架管风琴的动听旋律。这音乐是精心安排的，充分利用了水晶宫令人赞叹的回响效果。维多

利亚感觉自己仿佛飘了起来，升到了无比壮丽的伟大之中。有这种感觉的，并不只有她一个人。《每日新闻》（*Daily News*）的记者一般是麻木不仁的，而此刻，他却进入了宗教虔诚的境地，因为听到了一种声音，仿佛是“在大天灾的异象中听到的，许多河流的声音一般，谁听到，谁的心就会震颤，如同身处其中的大厦玻璃”。

女王的王夫（Prince Consort）头脑中则浮现起未来的种种图景——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协调，和平，团结，这些理想，有时候会通过一次冗长的讲演而穷尽地列举出来，崇拜他的女王，就会在他演讲时，充满爱意地看着他。而在这一个五朔节（May Day），这些理想，看起来并没有伪善到不真实的地步。伦敦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确实堪称当时的一个奇迹。水晶宫长度超过了三分之一英里，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室内空间，这样巨型的建筑，在海德公园里从无到有，只花了六个多月就成了（主要工程只花了17周）。两家玻璃和钢材制造公司——福克斯（Fox）与亨德森（Henderson），在收到设计草图之后，花了一周来准备建筑的所有数据，而建筑师从最早构思，到画出全部施工图纸，仅仅用了8天。

一开始，国会对阿尔伯特亲王的计划反应冷淡，甚至有所抵触；媒体也故意挑剔。但亲王的热情，终于获得了慈善界的支持，他们迅速行动起来，对自己的任务，如同设计师、建造者一般清楚。资助博览会的私人捐款，在初期达到了大约7万英镑；而后，确定的款项就源源不断涌进来了。不过，从传统观念来看，这次博览会确实整体上令人费解。浪漫主义者，原本对于工业社会大加抨击，说工业社会阴森可怖，如同地狱一般；然而，水晶宫用预制部件组装，而且能无限延展。这样的建筑形式，优雅大方、亲切友好，同浪漫主义者的宣传截然相反。坚硬的钢材被折弯，变成了形状优美的曲线，带着花边；展馆内部，画着中世纪的纹章色彩——红、黄、蓝三色；水晶宫内部既有一处哥特复兴式样的“中世纪宫廷”，也有活塞驱动的一列重型机器，似乎在宣告，“过去”和“当下”的幸福联姻。尽管按道理说，有了工业制造，工匠手艺就该寿终正寝了，但水晶宫的展品，却既有工程师的杰作，也有艺术家的杰作。其实，每块玻璃砖都是手工吹制的。钢材与玻璃，织成一张繁复的网，这张网并没有挡住水晶宫土地上的露天空间，而似乎是用一张精致的膜，将空间包裹了起来。（有些人怀疑，水晶宫是否防水防风，这怀疑不无道理。）

有些人批评机械时代的态度最为激进，他们也例行公事，把水晶宫描绘成“自然的敌人”。他们说，真正的“快活英格兰”，还得是“青翠的村庄、舒适的农舍、善良的乡绅”。不过，为了组织博览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由阿尔伯特亲王主持。委员会挑选五月一日——西方的“五朔节”作为开幕式的日子，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委员会选定的那名建筑师，此时还没有为招募设计师的比赛提交自己的设

计方案。这是一个小伙子，年纪轻轻，人脉却很广，名叫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是一名景观设计师。他自己的职业，是米德兰铁路公司（Midland Railway）的温室设计师，也是董事会成员之一。他的职业，完美结合了园艺学和工业主义的元素。第一张水晶宫的草图，是他在一次董事会的会议上，一时无聊而乱画的。后来，水晶宫选址在海德公园的提议遭到一些人反对，为首的是林肯郡国会议员——查尔斯·西布索普上校（Colonel Charles Sibthorp）。此人强烈反对一切现代事物，称水晶宫是伦敦肺上的一个“小瘤子”。有个重要原因是，水晶宫所在的地方，有两棵高达90英尺的古老榆树，按照原先的设计，两棵树本来要被砍掉。这时，帕克斯顿挺身而出，迎接了挑战。他站起来，把横跨水晶宫的“教堂耳堂”部分的框架弯过来，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屋顶，围住了这两棵树。西布索普本来要把砍树的事情，当成这次“欺诈博览会”破坏行动的例证而大肆宣扬；这一下，他的企图落空了。于是，两棵古树就没有成为博览会的牺牲品，而当了博览会的绿色卫兵。水晶宫内部因为玻璃墙隔热而变得潮湿，观众汗流不止。除了织物搭建的凉棚，榆树的树荫也为观众提供了额外的阴凉。此外，这次改动还是一种承诺：工业社会的未来，并不需要破坏英国的自然风光。

如果自然与工业，蜜蜂与玻璃蜂巢，都能够和谐相处，那么，其他互相敌对的势力，也能做到这一点——科学与宗教、贵族政治与企业、技术与基督教传统。阿尔伯特亲王主持的皇家委员会，其成员经过精心挑选，除了贸易保护者以外，还有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有贵族中的企业家，如埃尔斯米尔伯爵弗朗西斯·埃杰顿（Francis Egerton,the Earl of Ellesmere）、巴克鲁奇和昆斯伯里公爵[注]；支持自由贸易的政治家，如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哥特复兴派建筑师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曾设计新的威斯敏斯特宫；还有一个自学成才的开发商，威廉·古比特爵士（Sir William Cubitt）。委员会的席位，既给了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建立者——查尔斯·洛克·伊斯特莱克（Charles Lock Eastlake），也给了伦敦地质学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查尔斯·莱尔爵士（Sir Charles Lyell）。莱尔的著作，强烈怀疑《圣经·旧约·创世纪》内容的准确性。博览会的核心推动者，先前曾经说服阿尔伯特亲王进行赞助的，则是了不起的亨利·柯尔（Henry Cole）。柯尔1849—1852年担任《设计与制造杂志》（*Journal of Design and Manufactures*）的编辑，曾经生产了最早作为商品的圣诞卡，还有第一批幼儿建筑积木。柯尔一开始的计划，是让博览会成为英国最佳设计的展示舞台，他自己也设计了英国驰名的“明顿”（Minton）牌纯白茶具。然而，计划完成的时候，他和亲王却都想象出了更加类似救世主降临的画面。博览会不光是国内外商品的集市，还会是和平的未来的模板。亲王对自己的任务非常投入，又被科布登鼓励，于是在1850年10月25日，约克郡为伦敦市长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了一篇不寻常的演说，公开

了自己的想法，说在博览会之后，世界应该成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社会，既有种植者，也有制造者，更重要的，还有幸福的购买者。这样的世界里，国与国的战争就会变成荒唐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而被和平的商业竞争取代。像博览会这样的展览，就会成为独裁政权阅兵式之外的一种替代方案。

一些恐惧或无知的人，一直把机械比作腓尼基人信仰的火神莫洛克（Moloch），将人类吞入大口，又作为“盈利微积分”的劳力单元而吐出来；丝毫不尊重自己吞没的社区、家庭、个人的生命。如今，人们转而认为，机械无论在社会还是道德意义上，都是良性的存在了。就在这一刻，英语增加了新的形容词“Victorian”——维多利亚的；还让另一个词“industry”的意义乾坤大挪移，不再传达“开销”的含义，而传达“劳力节省”的含义。这两个词合在一起，“Victorian industry”（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业），就拼出了这个年代最受欢迎的准则的三分之一——“进步”。巨大的机器，擦得锃亮，喷吐着没有味道的蒸汽，让人群深深入迷，在红绳子后面盯着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还有一些宽轨火车头，如“大西部铁路公司”（Great Western）的绿色巨人，名叫“诸岛之王”（The Lord of the Isles），能够发出1000马力；众人都围着它看，将它视为友好的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泰坦族，尤其因为在此之前，为了达成博览会公开宣扬的目标，铁路已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目标就是，将这些被阶级和地理分开的英国人聚到一起。博览会从5月开到10月，共有600多万观众前来观看，其中至少有75万人是坐火车来的。这种规模的人员运输，迄今为止，仅仅在军事动员的时候有过，要么是行军的士兵，要么是逃离士兵的平民。然而这次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却是以完全和平的方式；迁移的成功，不是国家权力的功劳，而是好奇心和商业的功劳。这些人的旅程，包括寄宿，由旅行商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负责总体规划。家境不太好的观众，“可尊敬的劳工阶层”，还可以享受门票特别折扣。有数十万人买了打折票。

先前，还有过一些其他的工业展览。尴尬的是，发明这类展览的，却是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不过，伦敦博览会是有史以来头一遭，整个国家被一次贸易展重新定义。英国人说：就让那些廉价的暴君，继续检阅轻骑兵和野战加农炮吧。我们“世界工厂”展示的，是内史密斯（Nasmyth）的蒸汽锤！作家萨克雷（Thackeray）写了一篇五一颂词，赞扬1850年博览会，说：“这些英格兰的胜利，乃是不流血战争的丰碑！”

由此可见，博览会的目的，是消除英国19世纪中期面临的几乎一切社会政治方面的噩梦，用“商业关系”代替“孤立”。然而，英国国内的各个阶级，是否会如此和谐地团结起来？威灵顿公爵这时已经年过八旬，依然担任伦敦卫戍部队司令。他认为，这些诗歌一般的虔诚，当然很美妙，问题在

于，感情不能代替枪炮与骑兵，只有武力才能控制住危险的暴民。威灵顿认为，想要确保首都安全，最少需要1.5万人的兵力，此外，还要展示拥有压倒性优势的警察力量。伦敦此前一直都是宪章运动游行示威的舞台，宪章运动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威胁说，要将革命的传染病散布到英国；这些革命，从巴黎蔓延到罗马和维也纳，推翻了一个个政权。[注]然而，三年之后，并没有血迹斑斑的街垒，只有在十字转门前耐心排起的长队。

像威灵顿这样的“秩序守护者”，一想到在这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伦敦人口已达200万人），众多“泥腿子”们会与权贵毫无障碍地融合在一起，就感到忧心忡忡。别说那种“对世界和平的虔诚呼吁”了，单是“鼓励外国人到伦敦参加博览会”的行为，看起来就非常不负责任，到了犯罪的程度。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留着络腮胡子，就是政治上的异常行为，就是革命者；这些留胡子的危险分子，将会装扮成善良的游客，在肯辛顿的街道上游逛。监视和限制的团队将会不堪重负。阿尔伯特半认真地讽刺道：

反对博览会的人，竭尽全力让全国的老太太惊恐，把我逼得发疯。他们说，那些陌生人绝对会掀起一场全面革命，杀掉我和维多利亚，宣告英格兰成立“红色共和国”（Red Republic）；这瘟疫肯定会从这些群众的集合之地继续蔓延，把那些承受住所有物品涨价的人，彻底吞噬掉。我要为这一切而负责。

然而，阿尔伯特和帕克斯顿并没有退让。19世纪40年代，维多利亚女王遭遇了四次暗杀。因此，大家都觉得，亲王的展览开幕当天，女王应该先封闭游览一番，再让公众进入。但是，阿尔伯特却认为，若是想让展览能够宣传立宪君主制的独特美德，就必须让女王来到忠实的臣民之间。虽然反对者认为，居心不良的团体可能混在德高望重的行列中，但阿尔伯特大胆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5月1日，很多权贵来参加了当天的日程，还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告的祝福。这祝福，给“中殿”（nave）和“耳堂”（transept）这样的用于水晶宫的术语，赋予了一种圣洁色彩。不过，维多利亚在展品周围（包括弥尔顿先生的玻璃蜂房）来回走动，就表明了一种立场。博览会闭幕之前，女王还带着家人，参观了13次之多。

帕克斯顿关于博览会的平民主义的观点，更加狂放大胆。他竟然提出，要在5月底之后免去门票。对此，贵族们又惧怕又怀疑。但帕克斯顿坚持己见，亨利·柯尔和阿尔伯特亲王也始终支持，都认为，博览会是英国展现“第三条道路”的最佳方式，既非共和制，也非贵族专制。帕克斯顿还进一步主张，让劳工阶层走近水晶宫，会减弱他们与统治阶级的疏离感，而不会增强这种疏离感。水晶宫会向劳工展示一种轻松的布置好的未来，迎

接那些节俭而勤劳的人——“世界工厂”的“工蜂”们。劳工阶层看到这样的壮观景象，会受到安抚，进而从煽动者变成消费者。商议结果，采取了折中方案：5月26日以后，每周二到周四，门票价格降到1先令。妇女还能买到更便宜的长期票。第一个“1先令日”，有37000人参观了水晶宫。之后，平均每天参观者都维持在45000～65000，并没有什么革命大军形成。实际上，博览会的六个月期间，竟然没有一起损害公共财产的事件发生。到1851年10月，每天的参观人数在9万至10万人。《泰晤士报》（*The Times*）准确地报道说：“如今，人民已经变成了博览会。”

19世纪，英国第一次伟大的展览，其概念首先是一次家庭出游；以王室的家庭为首。毫无疑问，博览会若不是阿尔伯特亲王的心爱计划，就没办法激发维多利亚如此之高的热情。但她相信，博览会首先是亲王的作品（可怜的亨利·柯尔一直被这个杜撰说法的阴影笼罩，始终没有走出来）；1851年5月1日，对女王来说，也首先是阿尔伯特那坚强不屈的善行的产物。对亲王的坚定信念，她也给出了回应；认为博览会就应该是英国国内的愿景，英国的工业化给博览会提供了支持，而不是压力。博览会展示了不计其数的家纺产品、家具、碗碟、幼儿玩具、钢琴、铸铁的公园长椅，这一切似乎都在把英国的经济力量“翻译”成中产阶级的田园牧歌。博览会上，皇家个人的纪念品，并非像画家弗朗兹·克萨韦尔·温德尔哈尔特（Franz Xaver Winterhalter）的油画《五月第一天》（*The First of May*）描述的那样庄重。这幅作品，画了老公爵威灵顿，在自己82岁生日当天，给自己的教子，年仅一岁的小王子阿瑟送来一份礼物，阿瑟也正巧是这一天生日。基督教有一个传统的绘画题材《三博士朝圣》（*Adoration of the Magus*），画的是东方三博士将礼物送给刚出生的小耶稣。《五月第一天》也是一幅现代题材的三博士朝圣，这幅画的背景当中，神圣的日光，正笼罩着水晶宫。

不言而喻，这幅布尔乔亚风格的、阳光灿烂的未来，也会让英国的劳工阶级减少对未来的恐惧。至少，阿尔伯特亲王是这么希望的。还有一个人鼓励了亲王，那就是托马斯·贝兹利（Thomas Bazley），一位曼彻斯特商人，对手下的工人照顾有加，因而备感自豪。贝兹利还可能发明了“周五发薪日”的制度。亲王在他的鼓励之下，开始思考，博览会怎样才能促使人们重新设计劳工阶级的居家生活，以增进健康与舒适度。亲王有一个头衔是“改善工人阶级住宅协会”主席，他就以这个身份，委任亨利·罗伯茨（Henry Roberts）修建一座工人住宅模型，有三角山墙，两层，四个单元。建材选用空心砖，以降低成本。这些住宅采用增高的窗户，达到最佳采光效果，还设计了一个中央楼梯，来增进空气流通；此外，还能在横向和纵向添加模块，从而不断延伸。样板房就建在海德公园里，展馆旁边；博览会闭幕之后，房子又拆除，在肯宁顿公用地重建了起来，此地经常用于宪章运动的示威活动。这些房子一直到现在还矗立着，尽管已经破败不

堪了。

19世纪80年代，维多利亚女王也会从寡居的退隐生活中向外一瞥，关注穷人的居住条件。当时发表了一些伦敦贫民窟的报道，女王看了非常震惊，而且，显然也坚信“好人阿尔伯特”会采取行动，于是她给首相威廉·格莱斯顿领导的政府写了一封信，催促他们关注这个问题；她充满善意的唠叨起了作用，又一个皇家委员会成立了。这问题对女王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女王同意了那种当代的老生常谈：工业化的英国，倘能在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中保持独有的稳定，其原因并不只有良好的政治体制，还有良好的社会体制。这体制的根本，乃是家庭生活的道德基石，以女王为主要代表；女王先是妻子，后是孀妇，还一直是一位母亲。她是英国第一位身兼君主和母亲二职的人，尽管在她64年在位期间，这一矛盾现象经常给她带来痛苦——她总是担心，自己的责任之一，做个“脾气和善，擅长理家”的好女人，会跟自己另外一面的性格与责任——女王相冲突，特别是在大英帝国这样一个如此强调基督教风格男子气概的国家。

但女王也相信，这个两难处境，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她性别的命运。她感觉，全英国一定有无数的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正经受这种矛盾的困扰，一方面有义务做一个“壁炉边的天使”——这句话选自诗人考文垂·巴特摩尔（Coventry Patmore）著名的感伤诗歌《房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1854）；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日常生活的严酷要求而奔波，要养育孩子，做工，摆桌子，做祷告……这位母亲兼女王，在中年以后，丈夫去世了，她经常隐居在温莎城堡、奥斯本宫，或是苏格兰高地的巴尔莫勒尔堡（Balmorality）那个凉爽的世界，很少外出；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她也仍旧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很清楚英国妇女的现状，了解她们责任的重担与不屈不挠的勇气。

然而，女王果真了解吗？

时间倒回1832年秋天，13岁的维多利亚公主，在前往威尔士的路上，第一次见到了工业化的英国。她访问了贝尔珀（Belper）一家棉纺织厂；还有班戈（Bangor）一所学校，给学校举行了奠基仪式。这两次访问，都经过精心安排，确保能够消除“劳工阶级”的敌对情绪，能够体现未来君主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团结。毕竟，有谁能憎恨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呢？然而，在伯明翰附近的某地，维多利亚的马车驶过煤矿所在的乡村，她看到了一种非常不像英国的事物——黑色的草。她在日记中写道：

男人、女人、小孩、村庄、房屋，都是黑色的。可是，凭着文字的说明，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描述清楚，这是怎样一幅怪诞而不寻常的图画。所有的村庄都一片荒凉，到处是煤炭，连青草都枯萎变黑了。刚才，我又见到一栋特别的建筑，火光熊熊。乡村所见，到处都是黑色，蒸汽机燃烧的煤

块，难以胜数；冒烟着火的煤炭，跟破败的棚屋、衣衫褴褛的孩子们混合在一起。

这幅令人大开眼界的“英国地狱图”，震惊了天真烂漫的维多利亚，是理所当然的。维多利亚出生13年，一直让人刻意安排着孤寂的生活。维多利亚的父亲是肯特公爵，乔治三世第四个儿子。维多利亚生于1819年5月24日，八个月之后，1820年1月23日，肯特公爵去世。她从小到大，身边几乎没有一个男人，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小世界，首领是自己的母亲——公爵夫人，还有她的家庭教师——列岑女男爵（Baroness Lehzen）。维多利亚就睡在母亲房间里。这个世界，还充满了猥琐的奉承、家庭的钩心斗角。维多利亚居住的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尽一切努力，避免她接触卑劣与邪恶；所谓卑劣与邪恶，就是她的两个叔叔，国王乔治四世和继承者威廉四世。当时的年代，社会上普遍确立了基督教福音派的宗教热情，不只是中产阶级，贵族阶级也有不少人是这样。英国王室正深受丑闻困扰，急需让推定的女继承人维多利亚有一个纯洁、虔敬的好名声，来改善王室的形象。人们原来希望，让乔治四世的女儿——夏洛特·奥古斯塔公主来做这个女王兼救世主，她品德高尚，性格奔放又富有智慧，大家认为，她能够为这个昏乱的王朝带来一个崭新的开端。然而，她却在生孩子的时候去世了，全国自发地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夏洛特的丈夫也是维多利亚母亲的兄弟，因此是维多利亚的双重叔叔；称号是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利奥波德（Leopold of Saxe-Coburg-Gotha），之后成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显然看中了小公主，认为她是夏洛特的继承人；于是送来了不止一本咨询类书籍，并开始辅导她；夏洛特在世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辅导妻子的。维多利亚13岁的时候，利奥波德给她写信说：“对王室成员来说，我们眼下很困难。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如此不顾一切地需要身居高位的人拥有真正的优良品质！”

的确如此。乔治三世1820年去世，国民把他视为纯朴可亲的人，对噩耗深感悲痛。尽管他晚年成了盲人，举止也似乎是个疯子，但人们还是一直认为，他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其理解程度，不亚于对上层浮夸的理解，而且可能还要超越后者。乔治四世1830年去世，葬在温莎市圣乔治教堂的地下墓穴。他的棺材，是被喝醉酒的殡葬承办人放入墓穴中的。与此同时，他的兄弟——新王威廉，却在整个葬礼期间高声谈笑，让自己当众出丑。这次王权的让渡，不但没有悲痛，甚至缺乏应有的哀悼之情，因此十分扎眼，引发人们的议论。乔治四世严重肥胖，而且道德非常败坏，他和他的种种恶行，对于哈兹里特与科贝特这样的道德批评家来说，显得尤其可憎；因为正当此时，无论是乡村还是工业化的城市当中，都有很多人穷困潦倒。当初乔治四世加冕的时候，与妻子卡洛琳王后感情冷淡，他命人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门全都上了锁，不让妻子进来。后来，乔治四世还将妻子以通奸罪送上法庭，引发了支持者的强烈抗议，还发生了暴力冲突。

威廉四世对王室的名声，也没有做出什么积极的贡献。威廉在皇家海军中服役数十年，自吹自擂，说自己是纯朴的“水手国王”。他这个名声倒是被人接受了，人气很高，与哥哥形成了对比。然而，新国王却把自己的人气挥霍了大半，因为他坚持反对国会改革，而且公然声明了自己的立场。更有甚者，民众还发现，他没有存活合法子女，但非婚生子女却至少有15个，创造了英国王室的最高纪录。当时有一位女演员，名叫乔丹夫人（Mrs Jordan），是威廉的现任情妇，威廉执意要她陪伴在自己身边。这一丑闻，也影响了肯特公爵夫人的名声，于是，公爵夫人采取了非常措施，严禁维多利亚与叔叔威廉待在一起（尽管小女孩本人似乎非常喜欢这位叔叔）。公爵夫人走投无路，必须保护她无价的政治资本，那就是维多利亚的贞洁（既是道德上的，也是身体上的）。不过，一想到自己本应拿到王室年俸的应有份额，但国王却很吝啬，拒绝发给她，她还是恨得咬牙切齿。

然而，我们也能说“需要是政治之母”。以及，公爵夫人尽管不满意这种财政上的严格措施，这措施却给她带来了节俭的好名声，也算因祸得福。因为手头太过拮据，母女俩和家庭教师不得不搬出了肯辛顿宫，来到了更为简朴的住宅，位于拉姆斯盖特（Ramsgate）和锡德茅斯（Sidmouth），这些地方几乎可以说是郊区了。跟王宫里索然无味的奢侈比起来，肯特郡的家庭生活，可以称为严格的自治楷模。维多利亚记得，小时候的晚餐非常简单，最简单的时候只有面包和牛奶，用一个小银盆子盛着。维多利亚不管走到哪儿，都被严格的基督教福音派管理体制约束着，必须经常做祷告，还必须每天自我检查有什么污点。有一本禁令手册，作者是组极端的福音派成员汉娜·摩尔（Hannah More），是当初给夏洛特公主写的——《年轻公主品性培养指南》（*Hints Towards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a Young Princess*，1805）。她还带着一本表现记录（Behaviour Book），也可能是别人逼迫她带着的；记录了维多利亚犯的一切错误，还严格规定了她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1832年8月21日的自我净化日记，画了很多下划线，写着：“非常非常（下划线）极其（下划线）淘气！”

结果，公爵夫人和列岑女男爵，大概是把小姑娘教育得太完美了，太符合基督教的伦理和家庭内部的举止要求。因为，她在长大的过程中，越来越严肃地意识到，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与此同时，她还越来越为一个情况感到不安：母亲似乎有些太过依赖一位爱尔兰冒险家——约翰·康罗伊爵士（Sir John Conroy）；这种依赖，简直是战战兢兢的。康罗伊表面上是公爵夫人的家庭秘书，但哪怕小姑娘年纪不大，却也看得出来，二人的关系显然不止这一层。尽管她还跟母亲公爵夫人一起睡，但也开始独处，而且开始大量阅读历史书。她给利奥波德的信里写道：“我特别喜欢给国王和女王列表……而且我最近还看完了一本书，是关于英国君主和配偶的，因为我国的历史，是我有义务了解的重要事物之一。”她说，亨利

八世王后安妮·博林（Anne Boleyn）“惊人的美丽，但缺乏为他人的考虑”；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是“伟大的女王，但也是个坏女人”。

而当维多利亚纤细的体型变得丰满起来，她也尴尬地发现，她已经成了欧洲最受欢迎的女人。公爵夫人，就如同一切为女儿寻找夫婿的母亲一般，也举办了很多宴会、舞会来炫耀女儿；邀请名单上，最重要的自然是那些合意的单身王子，有荷兰人，有葡萄牙人，有德国人。萨克森–科堡–哥达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非常热情地宣传自己的两个王子，欧内斯特（Ernest）与阿尔伯特；维多利亚17岁生日舞会上，也跟阿尔伯特见了第一面，然而这第一面并没有显出什么希望来。阿尔伯特尽管长相英俊，身板挺直，表情严肃，却不爱说话，言行拘谨；跳舞的时候，竟然脸色变得灰白，只好匆匆离场，否则别人非怀疑他要晕倒不可。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对宫廷和贵族社交圈子之外的世界，兴趣也逐渐增加。她看了很多报纸，开始积极参加王室慈善事业的各种仪式；这慈善事业，会变成现代英国王室的支柱之一。1836年，她参观了一家“流浪女童收容所”；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她童年居住的克莱蒙特邸宅（Claremont House）大门附近，她还遇见了暂住的吉卜赛人“库珀”一家（Coopers），就把他们收养了下来。库珀一家虽穷，但女王却宣告，他们在逆境中的美德堪称典范；女王向公众表明，这些吉卜赛人是善良的英国基督教徒。女王说：“他们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都十分和睦，对体弱多病、年老的吉卜赛人也十分关心，经常加以照顾。”

女王向着外面的世界，迈出了更远的步伐，与此同时，她越来越不愿意老老实实地执行母亲的命令了。她越发痛苦地发现，公爵夫人和那个粘人的康罗伊，正在无耻地拼命利用她身为君主的未来，用以中饱私囊。她如果在成为女王的时候还没有成年，两人就可以建立摄政体制了。不过，1837年6月20日夜间，威廉四世撒手人寰，此时，维多利亚已经满18岁了。公爵夫人注意到，新女皇一登基，就把自己的床从母亲房间里挪了出去，还坚持要一个人吃饭。公爵夫人很清楚，这样的举动有什么意义。维多利亚从此之后，就要自己主宰命运了。威廉四世从病重到死亡的过程拖得比较长，有时候还会把大臣们叫来吃饭，保证每个人一定喝下两瓶酒；这时宫中就会重新出现欢笑声，把人们吓一跳。这种情况，给了维多利亚足够的时间，让她思考自己马上到来的身份变化。她带着惊人的沉着冷静，面对自己的将来。她写信给利奥波德，字里行间，有一种谦虚和勇气的混合：“我从容又安静地期盼，那可能即将到来的事情。我并不害怕，虽然我也并不认为自己能同所有人比肩，但我相信，有了善良、诚实、勇气，我就会无往不胜。”她目标惊人，明确的行事风格，在威廉四世死去的那个著名的夜晚，仍在延续。当夜，维多利亚首先被母亲叫醒，王室宫务大臣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跪在面前，膝盖吱呀作响。她说：“既然天意如此，让我坐上了这个位置，我将会尽心竭力，履行义务，报效国家；我年纪还

轻，对很多事情还缺乏经验，所幸不是凡事都如此；但我确信，不会有多少人有比我更多真正的善意和热情，来做这件应当做的事。”

第二天，维多利亚和首相威廉·兰姆（William Lamb）、墨尔本勋爵共进早餐，后来，首相成了维多利亚的守护人，老谋深算，而且对她忠心耿耿。女王在这一方面可谓十分幸运。继维多利亚叔叔利奥波德之后，首相是她的第二位“代理父亲”。两人从第一次会见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相互关心的关系，几乎近似“强迫的爱”。年龄的差距并没有阻碍二人的亲密，反倒是互敬互爱的必要条件。墨尔本勋爵是辉格党的贵族，他过的生活也十分堕落，维多利亚对这种生活可能会相当反感。但从维多利亚看问题的角度而言，墨尔本勋爵的罪恶，更多是别人的原因，而非自己的原因。这种观点，也有一些道理。他的妻子卡洛琳被情人拜伦勋爵（Lord Byron）抛弃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尽可能照顾妻子。卡洛琳·诺顿女士的丈夫曾发起离婚诉讼，把勋爵告上了法庭，勋爵也承认了自己不光彩的角色，尽管勋爵和诺顿女士的关系更可能是精神恋爱。勋爵遇到维多利亚之前一年，他的独生子奥古斯都（Augustus）不幸去世了。于是，勋爵就带着一种“受伤的勇敢”的魅力，来到了女王面前，完全做好了准备，来适应自己慈祥的长辈角色。

报纸给维多利亚起了一个美名“英国玫瑰”（England’s Rose）。她也需要一个人来教导她，帮她树立公众形象，逐渐培养她的自信，让她走上英国历史那宏大而令人生畏的舞台。维多利亚肤色红润，小脸儿圆圆的，配上碧蓝的眼睛，的确很像玫瑰花一般美丽；但墨尔本勋爵很快就明白了，玫瑰除了美丽，还需要刺来补充。这个身高只有大约1.5米，洋娃娃一般的小女孩，将来会长成一个冲动而刚愎自用的可怕女人；这一点，勋爵已经有所发现。所以，勋爵始终不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她说话，也不将她作为不谙世事的孩子看待；而是默认她足够成熟，能够明白自己提供的精明的政治资讯与自己晦涩的幽默感，甚至也能理解他对英国历史的滑稽看法。比如他会说：“亨利八世？那些女人，实在把他烦得够呛。”维多利亚的日记，叙述了她和勋爵的不止一次见面，每次见面都充满了会心的笑声。

这些会见，一直伴随着年轻女王的生活。勋爵会报告政治局势，包括经济情况、国际关系；会跟维多利亚下象棋，陪她骑马，跟她吃饭（座位一直在她左边）；两人一起研究皇家收藏的油画和素描；墨尔本勋爵每天都会跟女王相处四五个小时。她看着这位“体弱的孔雀”整理羽毛，蹒跚地昂首阔步，感到十分有趣；她在吃饭的时候探身靠近勋爵，告诉他一件趣闻；或是自己狼吞虎咽。她还会调侃勋爵的饭量：“他已经吃了三块排骨、一只松鸡，这还只是早餐！”她还仔细地写下了勋爵的连珠妙语，尽管这些话，很少称得上真知灼见，例如：“经常谈论铁路、桥梁的人，一般都是自由主义者。”两人的亲密交往，也有一定的代价。在阿斯科特

（Ascot），偶然会有嘲弄的声音传到女王耳朵里，说她是“墨尔本夫人”。但这些代价，完全被好处掩盖了。维多利亚有了一个养父一般的人物，他不经常回比利时，不在她面前消失；而且，在勋爵的鼓励之下，女王还最终脱离了不幸的公爵夫人和康罗伊的掌控。1837年9月，女王继位两个月之后，在温莎大公园检阅了卫队和枪骑兵，以一种惊人的自信和冲劲主持了整场活动。她的样子，同伊丽莎白一世这个“伟大的女王、坏女人”惊人的相似。她回忆道：“我骑着马，慢跑到那些绅士的行列跟前，与他们一道前行。利奥波德（马的名字，不是国王的名字）的表现最为优雅、最为安静；乐队简直就是在它跟前演奏的。然后，我又慢跑着回到了之前的位置，留在那里没有动，与此同时，士兵们就迈着或慢或快的步子，从我身边整齐地走过……整场检阅都很漂亮，我第一次感觉像个男人，好像我能够领兵打仗一般。”

此时的维多利亚，确实不能出一点差错。英国经济局势已经突然恶化，宪章运动之类的激进派，开始吸引了大批拥护者，英国毕竟不是人人都被“英国玫瑰”迷得神魂颠倒。不过，维多利亚至少不是对此直接负责的人，而且，在有产阶级当中，她还赢得了信赖和尊敬，因为她的善良完全不是刻意而为，而且又带着令人不设防的坦诚，这坦诚一半出于天性，一半出于智慧。她也很快确信了，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1837年，她把犹太人出身的摩西·蒙蒂菲奥内（Moses Montefiore）加冕成了骑士，这一举动，在宫廷里引发了大量争议。她写道：“他是个优秀的人……我很高兴去做我自己认定为正确的事，这也应该是正确的事。”

至于王室的排场，维多利亚意识到，对君主制的存亡也至关重要，这一点可能也是墨尔本勋爵提示的。乔治四世当年决心导演一场极尽奢华的加冕礼，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在苏格兰的荷里路德宫（Holyroodhouse），都安排了模仿中世纪的宴会，宴会上要演一场戏，会有一个忠于国王的挑战者穿着锁子甲出场，声称有谁要质疑这次继位，他就要跟谁决斗。然而，乔治四世越是精心布置（他甚至披上了鸵鸟毛，打扮得有如鬼怪一般），他就越显得离奇古怪。锁子甲的“挑战者”骑马小跑过来要亲国王的手，国王却从马上摔了下来——这似乎也不足为奇。他的继任者威廉四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接受这种恭维。不过，维多利亚登基，对宫廷的剧团导演来说，却是一个天赐的良机，他们知道怎样吸引公众的注意，因此为加冕仪式安排了一场舞台剧。英国16世纪—17世纪盛行一种假面剧，这次演出也几乎是假面剧的现代版，显示“不列颠尼亚”的纯洁和美德终于重生了。到处都是纯洁和美丽的画面：维多利亚的裙裾，由八名侍女托着，侍女身穿白色丝缎，衣服前面挂着银色玉米穗编成的花环，后面挂着粉红色玫瑰的花环——粉红玫瑰是新王朝的象征；而且，尽管长袍与徽章很沉重，维多利亚却应付自如，令人十分满意。87岁的约翰·罗尔男爵（Baron John Rolle）要登上台阶，来到王座之前，向女

王致敬，不小心绊了一跤。女王立刻本能地从宝座上站起，走下台阶去扶老人，这一关心别人的举动，得到了广泛的注意。等到墨尔本勋爵上来致敬的时候，女王发现他眼里满含泪水。几年之后，她更加壮观的婚礼，还会进一步吸引民众的想象。

她坚定的责任心，虽然毫无疑问是一笔财富，但有时候对世俗上很精明的首相来说，却可能变成头痛的因素。她告诉首相，自己不喜欢约翰·林德赫斯特男爵（Baron John Lyndhurst），因为他是个坏男人。首相戏谑地问道："你讨厌所有坏男人吗？因为坏男人可是男人中很大一部分啊。"尽管她对墨尔本勋爵名声不佳的过去采取了纵容，甚至喜欢的态度，她还是很快对他人做出了一些挑剔的判断。勋爵并没有成功地教给她，要容忍他人的缺点。女王母亲有一名侍女，名叫弗洛拉·黑斯廷斯女士（Flora Hastings），她的身材开始奇怪地发胖了。维多利亚以为她怀孕了，要求惩罚她的背德之举，把她驱逐出宫廷。这又跟历史上的伊丽莎白一世极为相像，伊丽莎白有个外号"童贞女王"（Virgin Queen）。不幸的姑娘黑斯廷斯接受了医生检查，这才发现，她肝脏生了肿瘤，并没有怀孕。一开始，女王不相信侍女真的生病了，引发了宫廷里的一些批评，说女王缺乏同情心。但墨尔本勋爵一旦让女王信服了真相，女王就立刻端正了态度，去探望垂死的侍女了。这也是勋爵极力建议的。维多利亚握住她的手，临走时还喊着："可怜的弗洛拉女士啊！"

后来，墨尔本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托利党的政府，首相换成了罗伯特·皮尔爵士。维多利亚认为这次变更是对她个人的公开侮辱，于是流着眼泪，强烈抗议她的老朋友和导师下台，表示对皮尔粗野而冰冷的仪态非常恶心。皮尔毕竟只是一个制造商，缺乏贵族气质。当时的规矩是，首相换了，女王的贴身侍女也要换一批，女王对此坚决反对。尽管墨尔本尽力解释，说女王实在是别无选择，维多利亚还是拒绝明白，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君主制能够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君主跟政治党派保持距离，不偏袒任何一方；女王自己可能会将侍女看成自己的仆人，但实际上，她们一直都是辉格党的势力，从下一届政府的角度看，保留这些侍女，就等于容忍宫廷里的间谍。最后，维多利亚终于同意了，但还是带着强烈的屈辱感。

1839年，墨尔本下台的时候，已经有不止一个计划，要给维多利亚另找一个能依靠的人——配偶。策划人是利奥波德国王，以及她的老家庭教师列岑，还有萨克森–科堡的克里斯蒂娜·冯·斯托克马男爵（Baron Christian von Stockmar of Saxe-Coburg）。1839年夏，他们建议维多利亚，或许能再次考虑一下表亲阿尔伯特。她一开始强烈反对，说这是哄骗，哪怕被自己最相信的两个人——墨尔本和利奥波德哄骗，她也不愿意。她说："整件事都极为可憎，我讨厌做决定。"但最后她还是让步了。10月，阿尔伯

特来到英国。维多利亚立刻就被这人的“美貌”惊呆了，特别是在舞池当中，几年前在这里，阿尔伯特曾经给人以了无生气的印象。他“精致的脖颈”最让维多利亚着迷，她评论道：“一张嘴如此漂亮，有着精致的小胡子；身材也非常挺拔，宽肩膀，腰的形状也好。”还说：“我的心充满了喜悦。看着阿尔伯特跳起快步舞跟华尔兹，何等快意！”出众的容貌，与他道德上的严谨、显而易见的智慧、无可指摘的品德联系起来，就促使维多利亚很快下定了决心。是女王向阿尔伯特求婚的，这一点很明显，让漫画家们也觉得很好笑。女王回忆道：“大约12点半，我派人去叫阿尔伯特，他来到了我独处的密室，几分钟后，我告诉他，我觉得他一定知道，我为什么希望他来到这儿；以及，他若是能满足我的愿望（娶我），我会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几次三番拥抱在一起，舍不得分开。”

整个过程快如闪电。维多利亚拿来了戒指，跟阿尔伯特要了一绺头发，沉迷在久久的亲吻当中；她还下令说，度蜜月两三天就足够了。“最亲爱的，你难道忘记了？我是一国之君，一切都不能妨碍国家大事。”更让人惊讶的是，阿尔伯特发现女王还会专门制定法令，规定谁可以当丈夫的私人秘书。当时，国会的激进派要求在王室年俸中削减阿尔伯特的津贴，为了确保丈夫的津贴不减少，女王就像母老虎一样坚持斗争（特别是跟皮尔并肩作战）。然而，阿尔伯特也沮丧地发现，打从一开始，妻子就希望自己的功能是装饰她，支持她，还有跟她合作生孩子；大概三者是这么一个顺序。阿尔伯特反倒成了妻子的“房中天使”！维多利亚就这样通过强硬的态度，禁止阿尔伯特参与国家大事，让两人感情面临了考验。阿尔伯特觉得自己的处境很糟，而且有违基督教精神；不能发挥才干，尊严受了侮辱。不过，在新婚的日子里，也有些时候，维多利亚完全沉醉在夫妻恩爱当中。第一夜过去之后，她写道：

当清晨降临时（我们也没睡多久），我看到身边那张英俊的、天使般的面孔，那种感觉难以言表！只穿衬衫的他，如此美丽，他那无瑕的颈部近在咫尺……

我们结婚的第二天，他的爱与温柔就已经超越一切，亲吻他柔软的脸颊，轻触他的嘴唇，一切都像天堂一般美好。有生以来，从没有过这样纯洁，这样天国一般的感觉！啊！是否曾经有哪个女人，像我一般幸福呢……

最亲爱的阿尔伯特帮我穿上丝袜，我走进去看他刮胡子，幸福已将我包围……

当然，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对彼此的激情，是件非常私密的事。只在很久以后，这日记才由女王的女儿比阿特丽斯公主（Princess Beatrice）编辑出版了。不过，日记很快就变成了王室的公共资产，其中一半是出于女王的纯洁天性，一半是出于精心策划；特别是在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时

候。1842年5月12日，王室举行了一次金雀花舞会。舞会上，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双双出现，扮演14世纪金雀花王朝的国王爱德华三世和王后埃诺的菲利帕（Philippa of Hainault）。这是传说中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舞会的礼服和装饰，由中世纪古董商詹姆士·普朗什（James Planché）设计，极尽奢华，看上去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奢侈浪费。而且，这一年的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因此舞会就显得不合时宜到了可怕的程度。女王的三角胸衣由锦缎织成，镶着宝石，被人揭露说成本高达6万英镑。与此同时，机械化导致失业率变得很高；兰开郡和约克郡的工厂主，抓住这个机会，肆意欺压工人，减薪达25%之多。工人的回应是一波巨大的罢工浪潮。有很多工人队伍专门去拔蒸汽机的塞子，切断工厂的动力供应。也无怪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总结说，英国将会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一次重大阶级斗争的舞台。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未来的译者跟合作伙伴，不过此时，他还在曼彻斯特一处棉纺家族企业做工。同一年，女王又遭遇了两次暗杀。

不过，组织舞会的人，并没有愚蠢到自杀的程度。这场舞会的收入，用来救济斯皮塔佛德贫困的纺织工人。组织者宣称，这场舞会是一个范例，说明王室专注于慈善事业，说明维多利亚对贫困者与失业者充满了同情。确实多亏了这次舞会，组织者的辩解得到了传播，斯皮塔佛德纺织工人得到了一些零工，那里的慈善组织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款项。中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王爱德华三世围困了法国重镇加来，要求城内六个高尚的市民出城受死，方可饶恕其他市民。六个加来义民答应了要求，来到爱德华面前准备就义。此时，爱德华的王后菲利帕出面恳求国王不要杀掉他们，国王最后同意了。这个煽情的故事，有一段时间，英国的小学生无人不知。如今，英国的宣传，让这个典故加上了一层现代光彩，成了19世纪慈善业的通俗闹剧。维多利亚女王跟菲利帕一样，也是一个善良的君主，让她感动的，不是充当人质的义民，而是没有工作的工匠。《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有些过于乐观地宣称："我们确信，目前有成千上万的人，都为这应急的救济措施而感激；正义的皇家娱乐，担负起了这次救济。"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了。特别是媒体又披露，舞会的一半收益，是用来抵偿开销的。一家报纸登出了一些工人名单，据说是1842年5月饿死的；名单旁边，就是金雀花舞会的开支列表。有个牧师，在一次布道中警告说："慈善业一旦变成舞会，就不再是慈善业，而充满了恶意。"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住在艾喀尔菲亨（Ecclefechan）、克雷干帕托（Craigenputtock）、切尔西（Chelsea）等地，被称为这些地方的预言家。在他看来，这次舞会，是对中世纪的附庸风雅，性质极为恶劣。因为他觉得中世纪并不是应当作为风尚而赏玩的东西，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能用来反抗机械时代的专制主义。

1843年，金雀花舞会一年之后，卡莱尔写了《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说中世纪基督教精神的英国，留下的神圣遗产，并不只是用来打扮和跳舞的素材，更不是“快活英格兰”的田园梦幻，而是一种谴责，指向当今时代非人道的堕落，因为眼下，一切都被物质的计算所决定了。创造幸福的人们，润滑了“权力和利润”的齿轮，而人们自己却困在了机器的飞轮中间。当年，年轻的维多利亚曾经访问东安格利亚地区，在大头菜和抱子甘蓝之间，看到了那些非人处境之下的工人。她感到很难受，表情都扭曲了。如今，卡莱尔也走访了这个地方，开始研究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时候，参观了圣埃德蒙兹伯里（Bury St Edmunds）的西多会（Cistercian）教堂废墟，他感觉到，另一个古老世界的伟大力量；古老世界与当今世界，相隔的并不是几个世纪的光阴，而是一种普世的道德观。这种感觉，促使他写下了《过去和现在》。这本书，一半是纪实，一半是历史小说，主要情节来自中世纪僧侣——布雷克隆德的约瑟林（Jocelin of Brakelond）为伯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写的编年史。旅途中，卡莱尔还访问了圣艾夫斯（St Ives）的济贫院，对法律系统的非人道情况深感愤恨；这种系统之下，人们要么是无事可做，要么就在新济贫法（New Poor Law）规定下，被关在类似监狱的地方。

于是，卡莱尔的文章，矛头直指金雀花舞会。他激动地写道：

老伯里这些灰暗的老城墙，不是附庸风雅，也不是可疑之物，而是热切的事实。修建城墙的目的，是最真切、最严肃的；不错，这灰黑的废墟，当初却是另一个洁白的世界，当很久以前，这城墙的崭新砂浆和凿工，第一次得见天日的时候。不要用你们浅薄的圆规，或是带着温驯浅薄的傻笑，来度量我们父辈建起的天国守望塔……

这遗迹的什么元素至关重要呢？建筑、钟塔、丈量土地的单位？的确，但这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难道它没有让你停下来沉思另一个奇怪的方面？当初的人，是拥有灵魂的！不是单凭道听途说，也不是修辞上的比喻，而是他们实际了解，实际身体力行的真相！它确乎曾经是另一个世界……真实的另一个世界。而目前这个可怜又痛苦的世界，倘能够用聪慧的眼光，而非愚蠢的眼光去看那个老世界，或许能从中受益！

当然，“老世界”已经寿终正寝，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卡莱尔还是想从古董商，从虚假的中世纪崇拜者手中，拯救老世界的道德力，拯救它那给予现代人的启示；当代文化，原本已经屈服在“不敬上帝”的机械脚下，卡莱尔是想在这种文化当中，恢复老世界的精神力量。卡莱尔在苏格兰西南部长大，这里是全英国加尔文教派（Calvinist）最兴盛的角落之一。他从小到大，一直在听牧师满怀激情地呼唤，让上帝的愤怒，降临在自负者、放荡者身上。卡莱尔又自己为这种雄辩的“夏日惊雷”，添加了形而上学的德

国哲学理论，特别是哲学对历史的时代精神的沉思。这两者加在一起，构成了卡莱尔的基本主张。这主张，乃是一个现代“摩西”的声音。摩西大怒，敦促这些异端分子立刻匍匐在上帝的真理之光面前，免得他们遭遇“邪恶的自我毁灭”。1829年，卡莱尔住在克雷干帕托一个叫“鹰崖”（Hawk’s Crag）的地方，这一年，他在唯理主义温和派报纸《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了激烈的长篇演讲，声讨“机械的暴政”，以及暴政对手工业的破坏。当时，英国一些工业巨头，如布鲁奈尔（Brunels）、丘比特（Cubitts）、斯蒂芬森（Stephensons），为机械的胜利而大肆欢呼；卡莱尔的文章，可以说有力地反击了他们，也反击了那种催生伦敦博览会的理念。

如今，人类直接去做，或是凭着双手去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了。一切都凭着规矩，凭着精心计算的谋略。哪怕是最简单的操作，也会有帮助和伴随之物侍奉左右，也会有一些狡诈的“简化策略”准备停当，等着派上用场……每一行手艺，活着的匠人都从作坊里被赶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更快速的、毫无生气的机械匠人。织布的梭子从手指间落了下去，落在了钢铁的手指当中，穿梭得更加迅捷；水手将船帆收拢，将船桨放下，买进了一名强壮的、不会疲倦的仆人，让蒸汽的翅膀（汽船）承载着，渡过江河湖海。凭着汽船，人类跨越了大洋，“伯明翰的火神”（Birmingham Fire-King）也造访了神奇的东方……机械化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有了机械，有了机械化的进步手段，来切碎卷心菜，来把我们送入磁力的梦乡。我们会移走高山，把大海变成平坦的大路；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们。我们与凶狠的自然搏斗，用无坚不摧的蒸汽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获得了车载斗量的战利品。

卡莱尔，以及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机械并不只是一堆活动的金属零件，而是一种思想状态；即一种功利主义的心态，相信有“经过校准的幸福科学”存在。一旦发生了社会上或是经济上的不幸事件，偏离了人类快乐的轨道，那么，科学家首先会探测到问题，然后统计问题的规模，设计出必要的解决方案，起草一个报告，再游说国会，将其制定为法令，并创造出必要的行政机器（这个词无法避免）来监督执行的过程，确保执行的效率。卡莱尔在《时兆》（*Signs of the Times*，1882）一文中，无情地解剖了现代社会的慈善体系。他说：“是否曾经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人组成的社会，要说出某个真理之前，首先要召集大会，指定委员会，发布介绍文件，举办公开宴会——总而言之，要么制造机器，要么借来机器，才能用机器来说出真理，实践真理呢？”

本来，人们很容易不理会卡莱尔的批评，把他看成那种耸人听闻的、“在旷野里呼喊世界末日”的先知，但是，他对功利主义和世界政府（当时一种思潮，认为对外部表现进行计算，以及物质上的满足，就能够建立一个

天下大同的政府）的批评，在发疯一般追求速度、商品、权力的维多利亚世界内部，却引起了超乎寻常的反响。其中一些在维多利亚世界最有势力的声音，例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后来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也加入了。这些人物，当了一组“接力宣传者”，每个人都宣传卡莱尔的学说。他们的主张包括：反对破坏劳动分工，反对将人类矮化为自动机器，反对让人从事无聊的重复工作。这些都能让工厂主削减单位成本。他们的反对言论，就像救世的福音一般，而且是幸存下来的福音。如今，约翰·拉斯金的读者不太多了，但是，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支持工业革命的）超人气大作《自助》（*Self-Help*，1859），以及他对工业工程师们造就的英雄时代的赞歌，却已经完全丧失了读者。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虽有种种缺点，却不能指责他们自鸣得意；这一点，跟之后夸耀物质成就的各个帝国可都大不相同。卡莱尔一直在愤怒斥责他们，罪名包括：重视物质，轻视精神；重视轻松的安逸，忽视艰苦奋斗的美；重视社会工程，轻视个人赎罪；重视实际利益，忽视深刻意义。结果，卡莱尔越斥责，他们就越表示接受，并且铭记不忘。至于他们是否在大步前进中坦然接受责难，星期日在教堂低头做出赎罪的样子，然后继续奋斗挣钱，则是另一码事了。

不过，至少有一种变化，让卡莱尔和拉斯金勉强得到了慰藉：他们都喜欢“哥特复兴”式建筑，而今，这种建筑流行了起来，对“失落的”中世纪道德、优雅、手工艺的保存，做了一次致敬。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建筑大兴复古之风，其面貌与狂热追求利润的社会风潮格格不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出了一个天才建筑师，名叫奥古斯都·威尔比·诺斯摩尔·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他是哥特复兴主义者当中最伟大的一个，曾经极力宣传哥特建筑。普金的父亲是法国移民，担任舞台设计，副业是建筑师。普金小时候就显出了天分，才15岁，就被乔治四世宣召，给国王的哥特复兴式寝宫设计家具。他也跟拉斯金一样，擅长使用设问的修辞。后来他说：“我们看着一栋建筑，想要判断它真正的价值，不应该问它造价和售价的高低，而应该问一个相当不同的问题：工人在修建的时候，是否快乐？”普金虔诚地相信，14世纪的建筑师和工匠，在创造教堂、行会会馆的时候，在用壁毯、彩色玻璃的色彩布满这些建筑的时候，在让扶壁飞跃、尖顶升起的时候，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一定存在一种热烈的交流，有基督教精神的共同纽带。这种观点，写在他的著作《英国建筑最后的辉煌》里面。这些建筑，只有很少存留了下来，但全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连续的社会”，而非贵族的乡间豪宅，或是富豪的居所展示出的愚蠢的富丽堂皇。

他另一篇著作《对比》（*Contrasts*，1836），则是一系列厚此薄彼的比

较。一方面是中世纪的城市，充满了英国式的垂直风格，和谐优美；另一方面是变种希腊、变种罗马，甚至变种埃及的当代城市大厅、墓地、工厂、监狱，一片混乱。这本书，可以说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在视觉艺术上的体现。不过，普金和卡莱尔有一点不同，卡莱尔认为，失落的基督教时代已经不可挽回了，普金却相信，这种精神，至少有一部分在英国幸存了下来，等待着复兴的机会，脱离古典主义的死亡之手——那种毫无生气的几何原则，制造出的“憔悴的孩子”。也许，上帝总要赐给复兴运动一个机会。机会终于在1834年出现了。这一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国会大楼。人们争论不休：新楼应该是哥特式，还是新古典式？最后，查尔斯·巴里爵士胜出。他已经画好了一系列草图，画的是一所几近幻想的中世纪哥特式宫殿。这宫殿并非真正的中世纪建筑，而是一座装饰华丽的哥特式尖顶“模块”，沿着泰晤士河无限延伸，政府的需求程度，有多少资金，宫殿就能修建多长。这个计划，跟普金主张的“形式与功能的优美平衡”，其实迥然不同。

不过，这种力挺哥特复兴式大楼的论点，肯定是得到了普金的心中那个“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形象的回应。因为最重要的论点在于，要理解“古代”的英国制度的基本特征——自由，以及习惯法的统治——是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古典主义的特征，是三角楣饰、圆柱、总体结构比较低矮。这些特征，不仅是“异国”的，也是一种权威性的表达，而哥特式的尖顶和圆拱却并非如此。古典主义是自上而下，哥特式则是自下而上。在拉斯金看来，古典主义的建筑，是等级社会的具象化，是奴隶建起来的；哥特式则代表了工匠的社会，是自由民建起来的。古典主义的立法机构，是让统治者制定法律的；而哥特式的国会里面，统治者必须对人民解释这一法律。这种建筑，不应该只为制定法律的人提供尊严和便利，而还要在直觉上，把这些人同那个催生出《大宪章》的世界联系起来，还要确保他们制定法律，是依照自由、正义、道德精神。

普金如果确实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工作，那么也就确实能为此感到光荣。1836年，他24岁那一年，也就是出版《对比》的一年，普金参与了巴里设计参议院内部装饰的工作，还有大本钟（Big Ben）大量结构的工作。在这些地方，他对颜色的痴迷，对丰富装饰物的痴迷，在设计和监督制作各种上釉瓷砖、壁纸、壁挂、木工、家具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且，普金已经意识到单纯模仿的危险，于是避免单纯复制那些中世纪的设计风格，例如对花朵的处理，而是重点放在非写实、扁平化、颜色艳丽的结构，几乎让人眼花缭乱的图案。普金再现的，是他思想里的中世纪装饰的精髓，而不是呆板的100%复制品。

普金在世俗建筑当中想要体现的东西，在英国教堂中体现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1819年，有一个委员会响应了基督教福音派的号召，开始着手应付

急剧增长的城市人口——为他们设计教堂重建项目。此时，这类项目已停止了几十年。但普金和其他哥特复兴主义者，却下定了决心，新的教堂绝不会重复那种没完没了的帕拉斯雅典娜风格（新古典主义风格）。他们觉得，新古典风格，将民众对上帝的信仰全都抽空了。它的光线和比例，让自己成了世俗建筑。普金则希望，他的建筑要让光线变暗，光照最好透过彩色玻璃进来，这样信徒就能找到与救世主交流的感觉，这种品质，自从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就丧失掉了。而这一点，却正好是宗教的问题所在。普金想要热切恢复旧日装饰的行动，在神学上，并不是完全无罪的。宗教界马上就看出来，这行动是一场宗教运动，想要把新教徒的信仰，硬拉回到16世纪已经被改革抛弃的偶像崇拜；而“天主教的胡言乱语”，是新教徒非常厌恶的。1834年，普金改宗天主教，证实了这些怀疑。

这种变节行为，本来应该扼杀普金那刚刚萌芽的事业，实际上也确实限制了他的事业，但普金才华横溢，世人实在难以彻底抛弃他。普金肆无忌惮起来，干脆住在了索尔兹伯里，以便尽可能接近索尔兹伯里大教堂这所古迹。当然，大教堂在康斯特布尔的油画布上被美化了。但在普金看来，这所教堂却是他理想中的纯洁、完美的基督精神的最佳具象。后来，他又搬到了拉姆斯盖特，维多利亚小时候在这里住过几年。在此地，他的客户，是高尚而富裕的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的赞助人。他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发表各种宣言，反对“当代艺术风格的低俗化”。《基督教建筑的真实原则》（*The True Principles of Pointed or Christian Architecture*，1841）卷首插图中，普金自己打扮成一个中世纪宗教建筑师，周围都是圣坛装饰画、诵经台、精心制作的耶稣受难像，自己则拿着圆规在画图。他才40岁就英年早逝了，最后一份杰作，乃是伦敦博览会的中世纪宫廷。他把自己作坊和自己欣赏的艺术家产出的一些精品组装了起来，拿到了“敌人的阵地上”。不过，一切报纸的报道都明确说明：观众尽管对中世纪宫廷报以尊崇和景仰，但比起匆匆走过，去看火车头、蒸汽锤的人，这里的观众还是少很多。

然而，对“影响这个工业不列颠”的任务，普金并没有完全失望。斯塔福德郡的奇德尔（Cheadle）是矿工和纺织工人聚居的地方，在这里，什鲁斯伯里伯爵委托普金，重修并装饰本地教区的教堂——圣吉尔斯（St Giles）教堂。结果可以说是他最伟大的作品，用他的话说，也是一件他没有遗憾的作品：一座光芒四射的穹顶，色彩艳丽无比。

不过，距离曼彻斯特不远的地方，普金的“地上天国”，已经被“现实中的地狱入口”取代了。这是查尔斯·纳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的评论。纳皮尔更习惯战斗在印度西北的前线，而不是战斗在英国西北的前线；但他1839年接受了委任，任务就是确保这一片地方的秩序。这时候，曼彻斯特的暴力与犯罪，已经开始全国闻名了。这里没有高达天堂的尖顶，只有

一大片烟囱。这些烟囱联合在一起，让整个城市化作一个巨大的世界烟囱，富贵不仁者、贫穷无赖、褴褛醉汉、烟花女子，全都让煤烟覆盖；煤烟又让雨水变成了泥浆……唯一可见的，就只有一座极长的烟囱。这是个什么样的所在啊！这段时间，出版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第一篇作者是詹姆士·菲利普斯·凯–沙特尔沃思爵士（Sir James Phillips Kay-Shuttleworth）所写的《曼彻斯特棉纺织业中的工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状况》（*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Manchester*，1832）。这些报告全面记录了曼彻斯特在工业世纪获得的“惊悚之城”的名声。巨富和赤贫，全都拥挤在这座拥有15万灵魂的“棉都”。英国人口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而这种增加的景象，在曼彻斯特最为壮观（也可以说最为恐怖）。不到60年间，城市人口增长了600%；绝大多数是农村进城的移民。

毫无疑问，他们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1842年，化装舞会举办的同一年，政府发布了《关于大英帝国劳动人口的卫生情况报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s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此时，曼彻斯特男性居民中约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失业。而且索尔福德郡一份报纸说：“面容憔悴、衣不蔽体的男男女女，蹒跚在街道上，向人讨要面包。”此时，政府的卫生报告也描述了市区一家典型的工人宿舍的面貌：

六到八张床……挤在同一个房间里……似乎人们一直在努力，把尽可能多的床铺塞进每一个房间……这些地方，夜间的样子，最为悲惨。挤在一起的床铺上，胡乱地睡满了男人、女人、小孩子，地板盖满了他们脱下来的又脏又破的衣服，还有各式各样的包裹箱子，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这表示，他们的感觉已经堕落而迟钝了……令人窒息的恶臭，与空气的燥热，几乎不能忍受。

这种过度拥挤，以及过于原始的卫生条件，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各种传染病传播的速度快如闪电，诸如斑疹伤寒、伤寒、霍乱。这份报告说，统计显示，1842年的“技工和劳工”，平均寿命只有17岁。曼彻斯特市的“专业人员”则有38岁。

眼光比较长远的乐观主义者，可能会认为，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之后，迎接的新时代，对于棉纺工人和手工织布工人的苦难，会更加同情；尤其是后者更加困苦，因为蒸汽织布机正在取代手工织布机。但如果这么想，就会引起巨大的失望，因为“新”的政治阶层，可以说，从《改革法案》获得权力之后，反而对失业工人的苦难更加无情了。法案颁布的同一年，凯–沙特尔沃思爵士关于曼彻斯特的报告，或许确实记录了苦难，但也讲了很多挣扎在泥泞里的贫民，有多么“道德败坏”，特别是“小爱尔兰”的那些人口。1834年，辉格党政府颁布的《新济贫法》，制订的目的

很明确：威慑那些懒散成性的人，不让他们拉低物价（当局的看法就是这样），方法则是让济贫院里的管理体制非常接近监狱的体制，从而让人们只要能找到一切合法工作，都不会到济贫院讨生活。济贫院从而得了个“巴士底狱”的外号。这儿的住客，全都必须把头发剃得一干二净，穿上灰色的“囚服”，这样在“外面”就能一眼被认出来。丈夫必须跟妻子分开，夫妻必须跟孩子分开，这是济贫院里最反人性的一面。英国社会把家庭作为“社会道德”的学校，因此，这种家人之间的分隔措施，就是厄运的第一道惩罚。不过，大多数赞成济贫法的人，还是坚信，总是有了某种道德败坏，才会带来厄运。因此，济贫院里的“瘪三”们，一定都有软骨头的毛病。若是把济贫院变得欢乐祥和，对这些人就没有益处了。

曼彻斯特的商业寡头们，也就是棉花大亨、银行家，例如格雷格家族（Gregs）、海伍德家族（Heywoods）、波特家族（Potters），控制了这座城市，把市中心的房屋拆除干净，修建起了神气活现的新古典主义仓库。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首要义务，也是最重要的义务，就是赚得商业利润。盈利是增加工人福利的途径，也是唯一途径。商业周期变幻莫测，比如，维多利亚登基第一年到第五年，出口需求飞速减少。企业不得不降薪裁员，方可屹立不倒。可是，资本主义毕竟不是游乐场，也不是慈善机构！那些不满的人，以为现状很严酷？那么，倘若工厂在要求高薪、缩短工时的“勒索”之下倒闭，就让他们看看，未来还会糟糕得多！在工厂主的眼里看来，所谓“工会”，只不过是一群敲诈勒索、蓄意破坏的阴谋家，宁可见到合法的商业公司破产，也不愿意放松控制那些容易上当的人！此外，他们还说，如果面包价格太高了，肯定要归咎于邪恶的《谷物法》。当初，《谷物法》的实施，就是为了保护“地主利益”不受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影响，如果没有这部恶法，市场本来可以进口便宜的外国粮食的。工人倘若想要提高赚钱的能力，最好是能够参加中产阶级反对《谷物法》的斗争；斗争的神殿，就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

在工业化的英国，有几个工人领袖相信，通过教育、禁酒、宗教事业，人们就能够实现自我进步。与此同时，领袖们还在尝试，是否可能建立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广泛联盟。不过，大多数领袖还持怀疑态度，他们认定，一旦废除《谷物法》，谷物、面粉、面包的价格降低，工人的工资也会随之更低。只有大多数男工获得了选举权，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制，“改革”才不会成为剥削手段，让男人更残酷地压榨穷人（虽然女工参加宪章运动很活跃，特别是在苏格兰和兰开郡，但很少有人考虑女工的政治权利）。当时有一份《穷人卫报》（*Poor Man’s Guardian*），编辑是詹姆士·布隆泰尔·奥布莱恩（James Bronterre O’Brien）。他简明扼要地总结说：“有些无赖告诉你，因为你没有财产，所以不被代表。我却告诉你，正好相反，因为你不被代表，所以没有财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一部当代的《大宪章》，也就是《人民宪章》，要求六点：普遍的男公

民选举权；废除针对选民的财产限制；任何人的一票都算一票，彼此完全平等；国会每年改选一次；当选的议员应当支给薪金；秘密投票。当然，这些要求，大部分都在当年的“激进派福音书”里提出过，也就是约翰·卡特莱特少校、威廉·科贝特、“演说家”亨特等人提出的。他们现在都已经去世了。不过，正是这种控诉的“传统主义”，在活动家与很多民众的眼里，才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无可辩驳的合法权利。1838年，参加火炬集会、游行的活动家，1839年、1842年、1848年签署《人民宪章》请愿的数百万民众，都这么认为。

这些请愿书，虽然用出租马车或是装饰华丽的农场马车，庄严地运到国会，拖到了下议院的地板上，却无一例外遭遇了冷落，甚至嘲讽。英国中部、北部地区经济恶化的同时，官员们反复的怠慢态度，引起了宪章主义者内部的分裂。一派只能接受和平请愿，另一派则把这些拒绝看作武装暴动的导火线。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有约翰·弗罗斯特（John Frost）、南威尔士纽波特（Newport）的布匹商人，还有伦敦记者乔治·哈尼（George Harney）。此外，索尔福德有一个激进派，名叫雷金纳德·理查森（Reginald Richardson），之前已经放弃了木匠的职业，变成了反济贫法的活动家，后来又当了宪章运动记者，他的妻子则用自营的印刷厂来印刷宪章运动文章和小册子，到处发行。理查森总结说：“英国人民的唯一希望，就是在壁炉台上挂一把军刀，或是其他进攻型武器。”即便如此，主张暴动的宪章主义者，也经常喜欢引用英国法学权威——法官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来证明自己拥有反抗“暴君”的权力。根据惶恐不安的地方政府记载，1839年4月，伦敦宪章主义者亨利·文森特（Henry Vincent）在纽波特对一群人发表演说：“反抗暴政的时候一来，你们就高呼——以色列人啊，走向帐篷吧！注然后，团结成一颗心、一个声音、一次猛击，把特权阶级的秩序打碎吧！让贵族统治灭亡吧！支持人们，支持人民建立的政府！”事实证明，这并不仅是煽动民众的大话。到了秋天，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正在谈情说爱，打得火热的时候，南威尔士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武装叛乱，纽波特和埃布韦尔（Ebbw Vale）都有一些小规模的宪章主义武装分子在行军。11月3日，纽波特的宪章主义者与政府军发生激战，至少有15人死亡、50人重伤。这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英国政府导致民众死伤最多的一次。

约克郡和威尔士都发生了不止一次叛乱，都被镇压了，然而抵抗运动却显然没有结束。经济的严重萧条继续着，兰开郡和约克郡的荒野中，夜晚的会议和集会也在继续；全国各个宪章主义组织代表组成的“公会”也在继续；最重要的，是地方性、地区性的罢工也在继续。叛乱的领导人是约翰·弗罗斯特，他被捕之后，民众发起了一次大型请愿活动，希望不要判弗罗斯特的死刑。人们高唱国歌的修改版，这一版当年也为潘恩唱过：

天佑爱国者弗罗斯特！

愿他事业永存！

上帝保佑约翰·弗罗斯特！

当局也比较审慎，觉得与其让他殉难，不如把他赶走，于是改判弗罗斯特流放到澳大利亚。然而，政府不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都开始把宪章主义者看作工人武装暴动的先锋了。理查森与其他很多人被捕。理查森坐了九个月的牢，在此期间，他还是想办法写了一些文章让人偷偷带了出去，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罪名是“煽动骚动和叛乱，并用武力企图反抗国家法律”。

1842年，宪章主义者有了一位充满魅力、能力出众的领袖。他名叫费格斯·奥康纳（Feargus O’Connor），是一名律师；也是先前的“爱尔兰人联合会”阿瑟·奥康纳的侄子。阿瑟现在已经年纪大了，还健在，但被流放到了法国。科贝特死后，他代表奥尔丹市的国会席位，由奥康纳继承。奥康纳创办了《北极星报》（*Northern Star*）。当年，奥康纳的叔叔阿瑟在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创建的大幅报纸，也是这个名字。奥康纳办的这份新的《北极星报》，一开始的立场是反对《济贫法》，但后来就变成了宪章运动的机关报，编辑是立场非常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乔治·哈尼。奥康纳想要把温和派和激进派调和在一起，但这任务十分困难，也许最终还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需要采取谨慎路线，既不能让“道德力量”一派的宪章主义者离心离德，让他们发现激进派在储备武器之后吓跑，又不能放弃1842年的激进罢工者。他们当年在工厂主削减工资之后，发起了“拔掉蒸汽机塞子”的罢工来对抗。不过，奥康纳还是成功把各地零星的武装叛乱组织了起来，变成了一种类似现代政治压力集团的力量，由一家全国性的协调机构来组织地方机构，地方又响应中央。之前，中产阶级反对《谷物法》的运动胜利了，运动还经常引用《圣经》；如今，奥康纳的策略，也有一部分借鉴了这次运动。新策略在1842年再次发起了大规模请愿，签名人数超过300万。不用说，请愿在下议院里又一次遭到立刻否决。

1842年之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宪章运动也失去了一些动力。不过，1847—1848年，贸易周期又走到了低谷。此时，民众的抱怨没有消失，他们对请愿被否决的悲哀记忆也没有消失。这种奇耻大辱，最鲜明的记忆，要数曼彻斯特一个宪章主义者的叙述了。此人名叫约翰·巴顿，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的主人公，是一个鳏夫，一个悲剧英雄，努力挣扎，想要养活自己和女儿玛丽，但还是失败了。失业、赤贫、绝望，把他推上了政治道路，去了伦敦，参加了1842年的宪章运动请愿。约翰回到家里，对女儿和朋友们讲起了经过：请愿者踩着木屐，穿着破衣烂衫，在布满时髦车马的街道上缓缓

而行；后来，警察挥舞着警棍，对着请愿者又戳又打。警察对约翰说：

“这是我们的事情，请不要惊扰老爷太太去觐见女王。”

“我们为什么就该让人惊扰呢？”约翰问他，“我们好好地在干着我们的事，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我们兰开郡有许多小孩子快要饿死了。你想一想，究竟哪件事在上帝面前来得重要？我们的事呢，还是那班你另眼相看的老爷太太们的事？”但是约翰这话等于白说，警察只是笑了一笑。

别人问他，请愿的人到了国会之后怎么样？约翰实在生气，只说了一些非常不祥的话；这话对他自己很不祥，而且在《玛丽·巴顿》出版的1848年，对英国也同样不祥。

“我真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我们许多人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宽恕；我不能把我们这种事当作新闻来讲。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把那天受到的气忘掉；只要我活着，就永远要诅咒那帮横暴地拒绝我们请愿的人。”

卡莱尔和查尔斯·狄更斯，都非常景仰盖斯凯尔夫人，也非常喜欢小说《玛丽·巴顿》。因为，尽管此前也有过一些“社会现实”小说，但跟这本小说却非常不同。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也写过小说《西比尔》（*Sibyl*），想要让英国面对自己“两个国家”的问题，但故事主要是以“工业巨头”（millocracy）的视角来观察和叙述的。尽管盖斯凯尔夫人是曼彻斯特“唯一神教派”牧师的妻子，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但她却追随丈夫，见过了市区和布满小屋的郊区里，一些最可憎、最痛苦的地方。她来到了迈尔斯布兰町地区（Miles Platting）等地，孩子们在黑暗、脏污的小巷里玩耍，与大老鼠为伴。什么都逃不过她坚定的注意力：小酒馆、敞开的阴沟，甚至还有煤烟中小块泥土上坚持生长的野花。而且，赫尔尼山地区（Herne Hill）或者巴斯市（Bath）温文尔雅的中产阶级读者，在《玛丽·巴顿》中，还第一次听到了曼彻斯特劳工阶级的声音，包括他们的歌声，例如《奥尔丹织工歌》（*The Oldham Weaver*）：

我是个贫苦的织工，大家都知晓，我没有东西吃，衣服也完全破了。

我全身所有的，不值两个便士，木屐有了裂缝，脚上也没有袜子。

生到世界上来，真是活活受罪，饿着肚子还得拼了命做事。

“饿”这个字，在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像锤子的重击一般出现，既是控诉，也是战斗的呐喊：“他们把我们的血汗脂膏搜刮得一干二净，积起了偌大的家财，盖起了偌大的住宅，我们许多许多人却在挨饥受饿。你能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毛病吗？”约翰·巴顿来到一所经济公寓的地下室，看望自己的一

个工友，“两人走进地下室来，几乎被一阵臭气冲倒了”。他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这才看见，“三四个小孩伏在潮砖地上玩耍，那砖地简直是湿透的，因为街上积下的脏水慢慢地都从底下渗出来了”。爸爸告诉孩子们，不要作声，“伙伴”带了面包来给他们吃。在微弱的光线里，好大的一块面包被小孩们夺了去，一眨眼就连一粒屑子也不剩了。

盖斯凯尔会写出这样的东西，难怪她发现，曼彻斯特的棉花大亨跟银行家，都对她横眉冷对起来。

他们觉得，盖斯凯尔的书，用一种太不客观的视角，描述了老板和雇员的关系；而且刻意丑化老板的生活方式，关于他们对慈善业、市政建设的参与，并不置一词。其实，这些大亨，说得确实有道理。然而，盖斯凯尔还是坚定立场，继续战斗。她冒着社会声誉受损的风险，也要去做某些更加重要的事。她给表亲爱德华写信说：“我可怜的《玛丽·巴顿》，在曼彻斯特，引发了各种针对我的愤怒之情，但那些最熟悉穷人思想感情的人，则会承认书中的真相。这种承认，是我最渴求的，因为，罪恶一旦被人意识到，就完成了一半赎罪的旅程。”

1848年2月，法国再次爆发二月革命，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同年，欧洲各国也爆发了一系列革命。曼彻斯特的棉花巨头，定然会觉得，一个“唯一神教派”的妻子，在这种紧要关头，不采取措施稳定社会，反而推卸责任，堪称罪大恶极。不过，盖斯凯尔正是因为英国正处在另一场危机边缘，才感觉有义务，说出真相，暴露“幸运者”和“不幸者”阶级之间的巨大鸿沟。只有让那些有选举权、分享英国权力和财产的人完全意识到，数百万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权力财产的人，有多么痛苦、多么愤怒，她才或许能够预先阻止第二次英国内战。

在保守派事后看来，1848年，给英国政治与社会的民主运动，最终画上了一个虎头蛇尾的句号。这种有惊无险的感觉，在水晶宫博览会的那些沾沾自喜的年月里被大肆宣扬，就好像英国不可能发生革命，“英国革命”是一个矛盾修辞法一样。不过，当时人们却完全不这么看，不论是《人民宪章》团体的基层民众，还是决心要保卫首都不被他们占领的保守派。乔治·哈尼对即将到来的事情，完全没有一丝怀疑。他说：“从兰开郡的小山顶上，数十万人的呼声，已经上达天听——联盟的誓言、战斗的呐喊……英国人已经发誓要保卫宪章，废除新济贫法，否则就要……为共和国高呼万岁。”

费格斯·奥康纳被释放之后，回到国会，任诺丁汉郡的议员。他费尽口舌，向激进派保证，对国会做出最后一次劝说努力，这才阻挡了激进派采取进一步行动。4月初，宪章派“公会”在伦敦集合，把最新的一份巨大请愿书装到一辆农场马车上，准备让四匹拉大板车的马运到国会。请愿书装成一

个个大捆，据说有500万个签名。支持请愿的人，其中包括一大批爱尔兰民族主义“同谋”，这些人会从中部、北部、威尔士，甚至苏格兰汇集到首都，在拉塞尔广场（Russell Square）、贝斯纳绿地（Bethnal Green）、克勒肯维尔绿地（Clerkenwell Green）、斯特普尼绿地（Stepney Green）参加集会；还要南下，一路越聚越多，向着泰晤士河上的各大桥梁进发，最后来到肯宁顿公用地参加大集会。发表演说之后，把请愿书运到国会。而人群是否要跟着请愿书走，是否让公众感觉到集会的压力，自然是最关键的问题。这究竟会成为和平请愿的终幕，还是革命的序幕呢？大家都很清楚，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正是开始于一部“宪章”；宪章最终推翻了波旁王朝。1848年，法国又刚刚出现了新的革命；这次革命，中产阶级激进派、工匠、工人似乎团结了起来。在英国，两年之前，皮尔废除了《谷物法》，引起了托利党内部的分裂；奥康纳一定认为，目前是最好的机会，可以争取当局让步。

4月10日，星期一的春日，异乎寻常的温暖。这一天，宪章主义者，集合到了伦敦四个集结地。气氛很热烈，好像过节一样，而不那么紧张。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人群戴上了绿色、红色、白色的彩带和玫瑰花饰，就是他们搬运了那些巨大的纸卷。贝斯纳绿地的游行队伍是粉色、白色；伦敦东区的队伍是白色旗子。围观的人看着游行的人，也看着大车、载客马车上的宪章运动标语——“给人活路，自有活路”（Live and Let Live）；“自由值得为之而生，为之而死”（Liberty is Worth Living and Dying For）；围观者还看到一船人，都是沃尔威奇（Woolwich）来的、领取养老金的退伍兵，他们也加入了各座大桥上的游行队伍，看起来很安静又鼓舞人心。尽管当局已经相信，英国雅各宾派的嗜血分子，已经上了街。

约翰·拉塞尔勋爵的政府当然不愿冒一点风险。他们的准备措施，是用来对付外敌入侵的措施，而不是对付叛乱的措施。上个月，欧洲各国的政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下，于是英国也非常恐惧法国、意大利、德国的共和主义者，认为他们既然发誓要执行革命的国际主义，就也会利用伦敦的集会人群，来传播“颠覆”信条。乘着恐慌，国会匆忙通过了《驱逐外侨法案》，要求外国人在政府部门登记，提醒爱国者要警惕那些留着“可疑的、煽动性的胡子”的人。

而且，倘若海峡那边会有新的危险蔓延过来，最适合的消除危机的人选，除了威灵顿公爵还有谁呢？公爵这时住在海德公园的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房子已经用木板封了起来。满头白发的老战士，身子骨依然硬朗，只是关节有些不灵便；他接受了命令，动员自己最后一支军队，来对付英国的工人阶级。传说这些工人有五门大炮！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伦敦警察厅有4000名警员，此外还有8000正规军。为了增援他们，有

大概85000人宣誓成为特别治安官。各政府部门都用板条箱建起了路障，板条箱里装的是政府文件和国会议事录。重要场所——英格兰银行与伦敦塔，还架上了枪和加农炮。伦敦证券交易所有300名员工，作为“特别行动组”，志愿保卫资本主义的堡垒。林荫路上建起了多个防御阵地，配备了轻炮兵，防止敌人杀到白金汉宫。此时，王室已经在政府建议之下，去怀特岛（Isle of Wight）避难了。政府下令，允许人们在严格控制的情况下，穿过各大桥梁，去往肯宁顿；但如果需要，则不许人们从肯宁顿返回。

有个官员名叫约翰·卡姆·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先前当过激进派，此时担任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的部长。这时候，伦敦已经化为一座鬼城，大部分地方空无一人，只有佩戴绿丝带的示威者。霍布豪斯在这紧要关头，非常害怕与家人分开。他在伦敦的住所，被宪章派用粉笔画上了记号，表明他成了人民公敌。他说：“我坐下来办公，并不是确认，而是觉得，我应该不可能听见河对岸有火枪或是大炮响起。结果没有枪炮声，倒是关门声有两次把我吓了一跳。”

他其实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奥康纳见到政府军的压倒性实力，他也要做出一个决定。欧洲1848年春，组织一切游行示威的领导人，都面临这个决定。究竟是要推动事态发展，与军队正面冲突，盼着军队倒戈，还是促成战术上的胶着状态，甚至撤退。这儿，他或许知道，一旦发生暴动，宪章派在地理上并不占优势。在欧洲大陆，巴黎、柏林、布达佩斯、布拉格、维也纳的自由战士，都是本地的工匠和工人，躲在自家住宅里，设立了路障，升起了革命旗帜，跟前来抓人的政府军抗衡；这些人，可以表现出合法地保护家园的样子。而伦敦集合的人群，并没有那么一致地痛恨政府，对“玫瑰一般的女王”的恨意就更缺乏了。这些人都是各郡参加宪章运动的普通老百姓，有些团体的领导人是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这些人被迫担任了“占领军”的角色。此外，奥康纳权衡了一旦爆发冲突的胜算，结论是：宪章派绝不可能获胜。在肯宁顿公用地上，奥康纳头上悬着一面巨大的绿色旗帜，装饰着竖琴的图案；身边围绕着一群爱尔兰禁卫士兵。人群当中遍布着一些平台，上面站着传令兵。奥康纳就用这些人，一个传一个，口头传达了命令：无论受到怎样的煽动，也不能与军人和警察发生冲突。当局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冲突，以便展开虐杀。麻烦在于，他自己跟哈尼都把风险抬升得很高。请愿马车上挂的旗子，写着一些过激的标语：“决不投降”（No Surrender）、“决不回头”（No Way Back）。当然，有些年轻人也并不喜欢听到呼吁和平的声音。到处都有些人狂喊，还有些混战发生。游行队伍回来的路上，经过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遇上了一堵人墙，都是挥着警棍的警察。双方发生了推搡，冲锋与反冲锋，示威者向警察扔石头。警察抓了一些人，被抓起来的人后来又被人群救走了。很多人满头鲜血，内心失望无比。

不过，奥康纳实在别无选择。1848年6月下旬，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又面临了工人的“六月起义”，临时政府调转枪口，去对付工人的街垒。当局用行动告诉世人，一旦面临持续的民众罢工和叛乱，“秩序的力量”能有多么坚决果断。那么，英国倘若发生了同样无益而悲惨的剧情，对民主事业又会有什么影响呢？肯宁顿公用地的集会，留下了一张照片，这是最早的英国政治事件的照片。只需看一看，就可以明白，17世纪—18世纪延续至今的宪章运动传统。照片展现的是一次秩序井然的抗议，工人都穿着最好的衣服；因为当局把他们妖魔化成一群醉酒的、接近罪犯的暴民，他们一直迫切地想要拆穿这个谎言。

直接的威胁过去之后，很多人因为一种说法而幸灾乐祸，哈哈大笑：当局发现，请愿书上充满了各种假名字，诸如“潘趣先生”和“维多利亚女王”。这些谣言，我在小时候用的教科书里还在重复。谣言将19世纪的英国革命，说成仿佛是“生物学上的不可能”，这种说法，还有其他各种自鸣得意的说法，充斥在统治阶级内部。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觉得这很滑稽。在当时，很多人的意见要清醒得多，也不确定得多。《伦敦新闻画报》因示威虎头蛇尾而感到欣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里的典故来讽刺宪章运动：“一座大山要生孩子，大声呻吟，结果最后只生出来一只小老鼠。”但画报也同样告诫那些轻视国会请愿的人，那些“哈哈大笑”来对待它的人：若是“签名有百分之一，甚至五百分之一是真实的……那么，英国的司法系统也应当严肃对待”；否则，“从民众那里获取到唯一真正权力”的人，将会面临危机。

费格斯·奥康纳在4月10日战战兢兢的表现，终结了他作为大规模运动政治领袖的生涯；然而，宪章运动作为一项工人阶级的暴力斗争，却显然没有停止。有些拥护者变成了早期工会领袖；其余的人，例如小说里深受迫害的约翰·巴顿，则铤而走险，去搞恐怖主义了。肯宁顿集会之后才三个月，对宪章运动的嘲笑就突然消失了。这时，又有5万名示威者，来到了新建的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圣灵降临节后的第一个周一，伦敦的柏诺思田野（Bonners’Fields）上，又聚集了一大群人，扛着共和主义的三色旗，喊着“猪要多，牧师要少”，以及“英国要自由，不然变沙漠”的口号，与警察的人墙发生了激烈冲突。兰开郡、柴郡、约克郡等地，依然有零星的暴乱发生。14世纪，英国有一个起义领袖名叫瓦特·泰勒。如今，约克郡西部城市布拉福也有一个宪章派领袖，真名叫艾萨克·杰弗森（Isaac Jefferson），外号“布拉德福德的瓦特·泰勒”（Wat Tyler of Bradford），组织了多起小规模战斗，后来被捕，但他的手腕太粗大，没法戴手铐。杰弗森想办法逃脱，让数千名士兵忙乱了好一阵子，直到年底，城市才恢复了秩序。

倘若武装斗争不能把面包放到桌子上，或许不那么激烈的和平手段，效果

会好一些吧？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多特福德（Great Dodford）有一座小农舍，这是“宪章运动土地公司”的旧址，是工人阶级自我进步的各种和平计划里，唯一幸存的东西。1845年，奥康纳成立了这家公司，为了实现17世纪以来人们的“公社”梦想，也是为了实现当代爱尔兰改革家的梦想。公司成立的目的，是要回工人和工人前辈们曾经拥有的乡村。这些人有很多是手工织机工人，还有织袜工人。蒸汽机普及之后，这些工人就成了多余的人，失业了，不得不困在了工业化英国的贫民窟中。工厂工人的大多数，实际上也是来自农村的第一代移民。有点钱财的人，能买到几英亩的土地，在土地上种庄稼，养几头家畜。这算是一种重新得到土地的方式。之前的土地，已经在圈地运动和垄断居奇中失掉了。

土地公司，用富有英国特色的方式，将“梦幻一般的乌托邦”与“脚踏实地的商业思维”来了一次古典主义的结合。公司正好迎合了工人，尤其是女工的重要本能——存钱。公司筹到了足够的款项，在多特福德购买各种财产，包括土地。各个出钱的人，按照自己的投资数额，分到了相应的股份。最早的定居者，是抽签决定的。后来，当局规定抽签非法，定居者的资格，又让拍卖或者“直接存入的保证金多少”决定了。

来到多特福德的人，有一句座右铭“劳动或死亡”（Do or die）。他们的工作，当然也非常辛苦，绝不是过家家。他们清理掉田野上的卵石，铺路，种植树篱，这一切工作，前景都难以预料。然而，还是有些定居者成功了。比如安·伍德，原来是爱丁堡的打杂女佣。她以苏格兰人的节俭精神，存下了150英镑，足以让她挑选多特福德任一处小块土地。她带着两个女儿，在36号土地上定居下来；很善于持家；也很长寿，86岁去世。

土地公司所在的村子，出现了一些引人注意的妇女。这可能也是一个征兆，预示着最艰难的时日已经过去，工人家庭应该为“定居下来建设家业”而奋斗，不应该为革命而奋斗；当今世界，指出未来方向的，不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1848），而是伦敦博览会。此外，掌权的有产阶级没有被宪章运动赶下台，尽管他们肯定不会在下一代人中普及程度更高的民主，但若是把“建设国内安全”的意愿，简单地斥之为失败主义者的安慰剂，却是一种自鸣得意的错误。可以说，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的各种更为安静的建设手段——合作企业，互助会，和平的联合主义，对“能自我改进、认真负责、工作努力的寄宿阶层”的描述——让托利党人和自由派，能够联合支持“家庭男公民选举权”（household male suffrage）。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通过。整个过程中，大部分人，都没有担心后门会引来新的革命。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人曾经狂热地崇拜家庭。但1848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15年左右，经济一直繁荣，确实让19世纪工业革命第一阶段被严重破坏的家庭生活有所恢复，直到60年代中期发生棉花荒歉为止。

1840—1849年，史称“饥荒的40年代”。这一时期的激进分子，主要是过剩的手工艺人和技工，特别是纺纱工和手工织机工人。这些人失业了，与此同时，妇女儿童，当时称作“工厂的帮手”，被雇佣做一些琐碎的杂活，但这些杂活却非常危险，比如钻到活动机械的下面清理棉絮；这些妇女儿童占了工厂劳动力的很大一部分，大得不成比例。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在《玛丽·巴顿》中描述的画面——失望、堕落，最后铤而走险，寻找途径表达愤怒的人们——有着大量的社会现实作基础。例如，1851年，棉纺织厂里就有255000男工、272000女工挣扎度日。但是，19世纪50年代，曼彻斯特、索尔福德、布拉德福德、哈利法克斯的制造商和银行家，确实兑现了自己很多承诺。出口需求增加，也刺激了机器织布的增加，从而几乎实现了全民就业，工资的购买力上升了，储蓄成了可能的事情。而且，历史上第一次，人们大批量集合起来，进入了机器工厂，成为劳动力。他们操作起了蒸汽的“骡机”（mules），当上了工头，有权雇用、组织男女工（有时还有童工），因此在家中恢复了一部分失去的自信，这对重建国民的士气至关重要。纺织业各部门中，织布是最晚机械化的。这时候，织布的部门也开发了新的技术，让整台机器只需一名男工或女工操作即可。另外，某些其他行业，特别是采煤行业，从法律上禁止了妇女儿童在矿井里工作，因为矿井中极度闷热，让矿工必须几近全裸，或者直接全裸，而且工作也极端劳累。新法规的出台，虽然给国内经济带来了税务负担，妨碍了经济发展，但也让煤矿恢复了一种类似母系氏族的秩序。

19世纪中期的繁荣，降低了工人阶级与权贵的对抗性。操作蒸汽织机的女工，在兰开郡与克莱德塞德（Clydeside）成立了自己的工会。不过，这些女工倒是几乎用不着罢工。19世纪60年代，合法的工会组织，更接近福利组织，而不那么像阶级斗争的训练营了。工会领袖自己都强调说，只有迫不得已，才会罢工。工人对雇主的敌意减少了，雇主也终于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家长制主义的利弊。以前，雇主降低工资的时候，也为工人提供一点补偿，比如免费伙食；如今，除了纯粹的物质补偿，雇主还容许工会、友好的社团与合作组织联合建设自己的独立文化了。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工人自己的管乐队；有时候，管乐队还是企业老板最早投资的。也是在这个十年之间，出现了有组织的工人旅行：去乡下，去海边，去伦敦南部的西德纳姆（Sydenham）；博览会闭幕之后，水晶宫在这里重建了。当然，这些活动，有很多是专门安排的，用来宣传新的工业化的“地主政治”多么有益。夏天，雇主会在小山上，带有角楼的玫红色哥特复兴式邸宅举行茶会，一支完整的仆人队伍（很多是工厂工人的家人）给工人们端上蛋糕和柠檬汁；还会举行工厂主和工人的板球比赛；球童是马尔堡（Marlborough）和汤布里奇（Tonbridge）这些地方“新建的”公立学校学生。

雷金纳德·理查森，索尔福德郡人，以前当过激进的宪章派，也是监狱里的

常客。他曾经是那些工人之一：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不那么激烈的对抗中，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去进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斗争。19世纪50年代中期，他干了一阵“偷偷摸摸的”买卖，后来被人指控，把有病的牛杀掉，再把牛肉美化一番，当成好肉卖。理查森在乡下的奇德尔和奥特林厄姆（Altrincham）之间，沿着古人走过的路，宣传公共权利。1854年，他在《索尔福德每周晚报》（*Salford Evening Weekly*）发表文章，悲叹工业污染的后果：“何止成千上万的人，都还记得，从奥尔丹小巷，到阿德尔菲（Adelphi），穿越班克米尔院子（Bank Mill Yard），沿着河流南岸散步是多么惬意，碧绿的河岸一直延伸着清澈的流水，被高高白杨的阴影遮盖……沿着河岸，一直到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这片风景的每一寸，用一个相对温和的字眼，都被‘吸收’了，被那些沿着河岸兴建工厂的人的贪婪毁掉了。”这为了工人民主而斗争的老战士，成了一名生态学家，尽管当时还没有生态学家这个词。英国革命，就这样被放逐到了草地上。

---

1. 巴克鲁奇和昆斯伯里公爵（Duke of Buccleuch and Queensberry）是同一个人，拥有两处封地。——译者注

2. 这里指遍及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译者注

3. 《圣经·旧约》中，以色列人在到达迦南之前，度过了40年的旷野生活，在旷野里住的是帐篷，经常面临战斗。这里应是借用这一典故，说明宪章主义者也要有那些游击战士的精神。——译者注

第四章　妻子、女儿和寡妇

给维多利亚女王拍照的结果很清楚，一般那种“阳光微笑”是不会出现的。不过，对于大多数19世纪摄影师和被拍摄的人来说，微笑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事。他们追求的东西，要宏伟得多。具体到拍摄皇室成员的问题上，是要追求威严和亲密之间的一种微妙平衡。当时英国最有名的摄影师，包括罗杰·芬顿（Roger Fenton）、约翰·埃德温·梅奥（John Edwin Mayall）等人。他们受命去拍阿尔伯特、维多利亚，王子公主等人，这工作，想必一定会令人生畏；但或许也会令人愉快吧？毕竟，有谁能命令一位君主坐着一动不动，哪怕是以最礼貌的口吻？还有一位女摄影师，名叫戴夫人（Lady Day），她的生平没有多少资料流传下来。1859年夏，她去了怀特岛上的奥斯本宫，设法用镜头抓住了女王和亲王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点随意：他们戴着乡村的软帽，轻松地倚靠在奶油色的墙壁上。当然，皇室成员都热衷于新时期的艺术，这一点也帮了大忙。温莎市建起了一所暗房，储藏了必要的设备。只要有画家来给皇室成员画油画，维多利亚就首先强迫他们拍照，作为一种表示自己期望的方式。这一来，他们可就觉得危险了。难道他们真的应该用拍照完全忠实地记录实情？把肥胖的脸颊、令人生畏的双眼、特别矮小结实的“千金玉体”全都拍下来？

老实说，女王并不自负，但也绝不愚蠢。她和阿尔伯特在下令别人给自己拍照的时候，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19世纪50年代末期，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根据照片印刷了数千张画像。自从英国内战以来，这些画像，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君主和臣民的关系。戴夫人在奥斯本宫度过的那个夏天，拍下的照片，都经过照相制版，公开发行了。不过，一年之后，梅奥拍摄的一系列照片中的14张底片，专门被选为肖像名片（cartes-de-visite）出版了。肖像名片是法国摄影师安德烈·迪斯德里（AndréDisdéri）发明的，一张感光片可以制作多张底片，一般是8张。“肖像名片”，顾名思义，可以在专业或者业余摄影师之间作为商品或者艺术广告来交换。研究皇家摄影的权威，史学家海尔穆特·格恩斯海姆（Helmut Gernsheim）宣称，在英国，流通的肖像名片数以十万计。这些名片，脱离了高高在上的摄影圈子，进入了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中产阶级对它们视若珍宝，热衷于定价、收集、交易。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家庭相册，专门为肖像名片设计，不用胶粘，就能把名片放进“小窗户”。这种相册，让英国中产阶级客厅桌子上，第一次出现了王室的照片。

这种照片，是阿尔伯特跟维多利亚亲自精心设计的，大大偏离了传统。1858年，女王写信给叔叔利奥波德国王，狂热地表达了良好的自我感觉：“他们说，（我大胆说一句）从来没有哪个君主，像我这么受爱

戴！”当然，这种表达是情有可原的。至于原因，她也非常肯定，就是因为“我们为英国家庭树立了一个最像家庭的榜样”。梅奥、戴夫人、芬顿拍下的这些王室夫妇的照片，没有一张显示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有一丁点儿接近“仪式化”的角色；也没有一张显示他们穿着军队的华服，衣服上缀着一层层的奖章，还有肩章的金线。这些都是欧洲贵族喜欢的打扮。当然，想让维多利亚穿军装，本身就是不可想象的。1850年，阿尔伯特还专门拒绝了威灵顿公爵请他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请求。于是，亲王就用尽可能威严、勇武的气概，穿起了双排扣长礼服；娇小的维多利亚则挺着布丁一般的身材，裹在缎子衬布当中，圆得像个气球，这就是她长久存续的形象。按照布尔乔亚风格的日历，那些重要的日子，也是拍照最多的日子——怀特岛上、苏格兰高地上的假日；带着狗在公园里散步；在圣诞树周围唱圣歌；阿尔伯特用管风琴弹奏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乐曲；维多利亚绣着十字绣，模样十分可爱。为了让画面更匀称，还有一位白头发老奶奶，戴着女式软帽；这就是女王的母亲肯特公爵夫人，她已经被迫远离了当年的冒险主义，被女王夫妇迎接，回到了家庭的核心圈子。不必说另一些事实——假日的行宫，十分壮丽；公园是温莎公园，大多数情况下不让平民进入；而且，这些活动，与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 Wells）的律师每年一次的假日旅行，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跟索利哈尔（Solihull）的杂货商的旅行就更不用说了。用艺术手段传达的这种印象，朴实谦逊，令人安心；最重要的，还是传递的生活，符合基督教和爱国主义精神。1855年，法皇拿破仑三世、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访问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也回访了巴黎。这次相互访问，增强了女王一种比较审慎的形象，那就是缺乏魅力（尽管不是缺乏艳丽）。众人之所以暗讽她的时尚品位（或者暗讽她缺乏时尚品位），主要原因是女王不幸穿得过于艳丽，而不是因为她穿得太不时髦。巴黎人讽刺女王，是典型的布尔乔亚风格：想展现自己的快乐，展现的力度却过了头。19世纪50年代的黑白珂罗版制版术，基本没有凸显出维多利亚喜欢的、鲜艳的条纹与格子，也没有凸显出各种颜色尖锐冲突的遮阳伞。女王特别喜欢的一种颜色是鹦鹉绿。

1859年、1860年、1861年的影集，在一个方面，看起来出奇地坦诚，那就是彰显一种关系的紧张和多义性：夫妻二人，既要保存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又要对女王和亲王的高下关系让步。与当代的王室照片比起来，当时照片的坦诚，显得更为突出。阿尔伯特巍然屹立，一派家长作风；但不至于巍然到不让女王站在台阶上增高的程度——台阶被女王环形的衬裙遮掩住了。维多利亚的样子，也是她必然显出的样子：为了让王室人丁兴旺，维多利亚变成了“婴儿工厂”，为此十分劳累。他们一共生了9个幸存的孩子，最大的1840年生，名叫维姬（Vicky）；最小的1857年出生，名叫宝宝比阿特丽斯（Baby Beatrice）。

一连串的怀孕生子，显然把维多利亚新婚时的浪漫，消磨了不少。后来，

大女儿维姬长到18岁，嫁给了年长10岁的普鲁士王储，生平第一次怀孕，让维多利亚还没到35岁就当上了祖母。维姬给妈妈写信，热情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悦。然而，女王的回信却十分粗鄙，完全不会说话：“亲爱的，你说要生出一个不朽的灵魂，十分骄傲，这当然很好。不过，我自己却无法沐浴这种骄傲。我想得更多的，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更像一头牛，或是一条狗；我们可怜的天性，变得如此接近动物，如此无法令人着迷。”此外，有些王子公主难免会得病，有时候病情还很凶险。这时候，两口子双重角色的矛盾就显出来了，而且变得最为尖锐。角色一是丈夫和妻子；角色二是君主和臣下。一次，维姬大病一场，阿尔伯特出奇地心烦意乱，告诉维多利亚：“克拉克大夫的治疗不对，让孩子氧化亚汞中毒了；你又让她饿得要死！我再也不管这种事了！把孩子带走，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她要是死了，你就良心受谴责吧！”女王像歌剧风格般回击：“你要是想把孩子杀掉就请便！”难怪阿尔伯特会想：“维多利亚做事太匆忙，也太热情，我经常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难处。她一下子就会大光其火，用怀疑、渴求信任、野心、嫉妒的责难把我淹没。”

不过，这些短暂的隔膜，恰好说明了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都很热切地参与家庭的福利事业。阿尔伯特为孩子制订了一个精细而全面的教育计划，而且，尽管有各类教师执行，阿尔伯特还是亲自监督授课细节。后来，阿尔伯特发现威尔士王子伯蒂一点儿也不愿意学习（而且还想办法逃学），就越来越焦虑、恼怒，对伯蒂开始了多次无情的审问，想弄明白，究竟是智力上的问题，还是道德上的问题。不过，也同样有些时候，女王和亲王都让自己享受舒适生活的奢侈。维多利亚的日记，写下了她很多居家的快乐：“阿尔伯特把最亲爱的小猫咪（维姬）带了进来，她穿着那样漂亮的白色美利奴裙子，缝着蓝色的边儿，这是妈妈先前给她的；还有一顶好看的帽子。阿尔伯特把她放到我床上，自己坐在她旁边。小猫咪真好，真可爱！我最珍贵的无价的阿尔伯特坐在那儿，我们的小可爱坐在我俩中间，我十分感动，心里充满了深深的喜悦和对上帝的感激。”

这幸福，或许并不是完全对称的。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19世纪50年代，有很多年，阿尔伯特因他参与公共事务有很多限制而非常愤怒。而且他是自愿给自己设定限制的，这就让他更加沮丧。阿尔伯特的出生地是德国科堡（Coburg），他之所以对国体有复杂的感情，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德国背景。19世纪中期，德国分裂的各州，正位于风口浪尖，要做出重要的决定，怎样才能避免卡尔·马克思自信地预言的“红色共和主义”的命运。马克思不仅预言德国会如此，还预言英国也会如此。最好的避免革命的方法，究竟是自由主义，还是独裁主义？阿尔伯特毕竟不傻，他认为，英国对于独裁主义，连考虑都不会考虑。实际上，在一段时间的无知以后，他宁可沉醉于英格兰（不是整个不列颠）宪政的历史，苦读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on the Laws of England*，

1723—1780）；此外，阿尔伯特还过于乐观，觉得维多利亚自己非常渴望获得身为君主的智慧，因此给她大声朗读亨利·哈勒姆（Henry Hallam）的著作《从亨利七世继位到乔治二世死亡的英国宪政史》（*The Constitution from the Accession of Henry VII to the Death of George II*，1827）选段。不过，阿尔伯特的导师斯托克马男爵，之前警告过他，不列颠很可能凭着政治上的既成事实建立一个部长制政府（ministerial government），这是很危险的事，因为这种情况下，君主会沦为国会和政党的“橡皮图章”。而且，当时阿尔伯特还分享了维多利亚缺乏教育的本能，他认为，君主应当至少保留一项权力——若是君主对部长的人选，或部长的政策不满，则君主应当有权将其否决。直到罗伯特·皮尔爵士耐心而坚决地劝说了阿尔伯特，他才放弃了这种想法。斯托克马想要的是这样一种君主的状态，接近“终身首相”，凌驾于党争之上；因此，君主应当有权同时享有政治家和人民的信任和尊敬。

万幸，阿尔伯特很快就明白了，这个计划野心太大，不可能实现。他转而采取了更加低调的策略。1843年他草拟了一份自身职责列表，1850年又修订增补了一次。同年，他还拒绝了威灵顿公爵让他出任陆军总司令的邀请。这些都是低调策略的体现。他说“会将自己个人的存在，融入妻子的存在当中……在公众面前不会负责自己的事情，而会让自己的位置，成为妻子位置的一部分”。这话听起来，就像一种变态的自我抹杀，而且也不符合阿尔伯特的性格。直到别人读到亲王职责描述的原文，才会发现，阿尔伯特也让自己“持续而紧张地观察公共事务的每一部分，这样才能够随时给她提出建议，协助她的工作……作为她家庭的一家之主，王室的监督人”。在这个岗位上，阿尔伯特很快采取了厉行节约的方针，在温莎城堡的“红楼”（Red Chamber）禁止喝酒了。阿尔伯特还列举了自己的职责：她内务的管理员、唯一政治上的秘密顾问、唯一负责她与政府官员交流的助手；此外，他（阿尔伯特自己）还是女王的丈夫、王子公主们的教师、君主的私人秘书、终身大臣。

这个列表最不寻常的，不在于它有多么详尽，而在于它把家庭权威转换成了一种实质的政治对应物。前一位“王夫”——18世纪初期，丹麦的乔治王子，妻子是安妮女王（Queen Anne）；王子在这段关系中，是一种被动的伴侣角色；阿尔伯特的角色却不是这样。16世纪中期，西班牙的费利佩二世（King Philip of Spain），妻子是英国女王玛丽·都铎（Mary Tudor）；费利佩二世作为一种“紧张的试探性角色”出现。这跟阿尔伯特的角色就相差更远了。阿尔伯特给自己规定的角色，是无所不在，而又全知全能；总是在办公桌椅的背后出现；哪怕别人不问问题，也要在场履行顾问的职责。古代英国国王有一种贴身侍从，名叫厕所侍从官，职责是照顾国王起居，包括搬运马桶，因而得名。这样一来，政治家想要见国王，非得通过厕所侍从官不可，让侍从官成了不可逾越的中间人。如今，阿尔

伯特起草的这份规定，某种程度上也是向着厕所侍从官特权的回归。只要大臣们觐见女王，阿尔伯特肯定在场。

阿尔伯特想通过表面上不实施权威，来实际上实施权威；想通过把自己限制在丈夫、父亲、秘书的角色当中，来发挥政治力量。这想法在理论上非常好，但实际上经常遇到困难。这样的计划，虽然对国体没有什么影响，但却造成了一种悖论，让王室的联盟出现了紧张。阿尔伯特刚结婚的时候，就抱怨过，他这个“丈夫不能当一家之主”；他还一直为政治上必要的屈居人下而感到烦恼，这种屈居人下的角色，有时削弱了他在家庭里的“族长角色”，维多利亚强烈反对这种看法，说情况刚好相反，阿尔伯特的族长地位没有被削弱。但阿尔伯特不以为然。夫妻二人都应该会赞成卡莱尔经常重弹的老调，说“男人来做一家之主，而不是女人来做，是永恒的公理，也是自然的法则”。实际上，女王很清楚，她在公众场合露面，就应该同时传递“妇道的礼仪”和“君王的威严”，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她也为此而痛苦。她会尽职尽责地阅读国营报纸，而且对报道固执己见；不过，阿尔伯特给自己的政治责任感找到了更多出口，与此同时，维多利亚也感觉到，丈夫可能对这份工作，比自己有更多的热情。有一些情况，特别是1846年皮尔首相去职以后的几年，非常混乱，政府像走马灯一样轮换；维多利亚在政治上如坠雾里。这几年，维多利亚就很依赖阿尔伯特的意见，对皮尔的看法也改变了。一开始，她觉得皮尔只不过是个一般的制造商，篡夺了亲爱的墨尔本勋爵的正当职位；不过，从阿尔伯特眼里看来，皮尔变成了一个公正清廉，甚至带有悲剧性的人物。性格就像梗犬一样的约翰·拉塞尔勋爵，她不得不忍受。外交大臣巴麦尊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亨利·约翰·坦普尔（Lord Henry Temple）被人开玩笑，起了绰号“朝圣斯坦因”（Pilgerstein）［这是朝圣者（palmer）或者朝圣（pilgrim）德语化的单词］；巴麦尊的络腮胡子染了色，举止倦怠无力，还主张一种愤世嫉俗的侵略主义。别人很难容忍他，只是把他当作一名可疑的冒险家。然而，这却是大大低估了外交大臣那危险的才华。这一切都十分累人。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写道：“我爱和平跟宁静，其实我讨厌政治和纷扰……阿尔伯特一天天变得更喜欢政治和商业，而且无比适合这两份工作；他拥有如此的洞察力和勇气。而我，却一天天越来越讨厌这些。我们女人天生就不是为了统治别人——若是好女人，就必须反感这些男人的职业；但有时候，时势逼迫人必须感兴趣。”

在奥斯本宫，一家人的关系最接近理想状态。奥斯本宫位于怀特岛的一端，另一端是阿伯丁郡（Aberdeenshire）的巴尔莫勒尔堡。在这两个地方，上午是政务时间，下午是家庭时间。而且，也就在这里，维多利亚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姿态，给了阿尔伯特一张自己的书桌，放在她自己书桌旁边，这样，来觐见的大臣，就会看到夫妻俩并排坐着，从而明白，这种君主制，的确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式的。皮尔建议之下，阿尔伯特1845

年在怀特岛上买了1000英亩地产，作为女王度假之用；有了这块地方，国家大事的操劳，就能有家庭生活的乐趣来平衡了。亲王说，松林沿着舒缓的山坡一路下行，蔓延到海湾；这就让他想起了那不勒斯附近的海岸，以及他出生的地方——罗西瑙（Rosenau）附近的森林。为了怀念故乡，他还修建了一栋颜色鲜艳的意大利风格宅邸，有黄色、白色的塔楼，精美的花园和喷泉。每一个细节都亲自设计或者监督。到了宅邸完工的时候，已经花费了20万英镑，在19世纪中叶堪称天文数字；这个“度假场所”，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个政府，总有大臣前来，总有公文箱运到，惹得女王很是不快。不过，奥斯本宫和巴尔莫勒尔堡的工作流程，确实起了作用。早餐之前先要散步；早餐之中或之后读报，接着是热烈的讨论；女王批文件，文件都是阿尔伯特已经筛选过、准备好的（以他作为女王私人秘书的身份），签字；如果有必要，还要跟大臣们举行联合会议。午餐会之后，还会就上午的事务进一步非正式讨论。

不过，下午也是能够充分享受家庭浪漫的时间，有野餐、钓鱼、骑马等活动。在苏格兰还有猎鹿的活动；王室成员会看望当地的小农场佃农，而且经常不打招呼，突然拜访；晚上，会举行苏格兰的里尔舞和高地舞舞会；女王也会穿上最近刚设计出来的巴尔莫勒尔的、红灰相间的格子呢衣服跳舞。在奥斯本宫和巴尔莫勒尔堡，阿尔伯特都仔细研究各种各样的训练计划；这些计划，同时提供身体锻炼、道德教育，还有毫无害处的儿童游戏。儿童游戏的地方主要是奥斯本宫的“瑞士小屋”，有自己的厨房、花园。这地方修建在公园里，修建的领班是阿尔伯特，工人是4个较大的孩子：维姬、伯蒂、艾菲、爱丽丝。“瑞士小屋”有家具，还有能生火的炉子，全都按照孩子的尺寸制造，让孩子玩过家家。

设计理念是，王室的孩子也应该从父母那里继承快乐家庭的“田园生活”。自然，男孩子们，特别是名声不好的威尔士王子伯蒂，只要年纪一大，不用干这种活儿，就把它一脚踢开了。伯蒂深感自己受了父亲的压迫。不过，尽管维多利亚一直相信，自己的婚姻特别受到上帝眷顾，而且（在两次发火之间）会在日记中倾诉自己的爱意，但她也会发出令人惊恐的幻灭宣言，特别是在女儿们再三考虑自己的政治联姻的时候。她主张，婚姻只要快乐，就都是好的。然而，很多婚姻却一点也不快乐，于是天堂也就变成地狱了。她认为，与其每天忍受无情的痛苦，跟不适合的伴侣过活，倒不如单身要好得多。而且，快乐的概率，对那些可怜的天真女孩来说，还要小得多。女孩子们在雄心勃勃的父母影响之下，相信自己婚姻能够幸福，精心打扮，为了走入教堂，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维多利亚深深感到持续生育的沉重负担，于是宣称：“一切婚姻都是买彩票，幸福总是一种交换，尽管可能是吃亏的交换。可怜的女人在身体上、道德上，依然都是丈夫的奴隶。这一点让我如鲠在喉。”

维多利亚当然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在这种时候，她的发言却很像女权主义者。有可能她知道很多名声很坏的宫廷案例，全都彰显了女性走入不幸福的婚姻有多么痛苦。最有名的例子，是墨尔本勋爵的好朋友卡洛琳·诺顿，卡洛琳的丈夫乔治，残忍地将卡洛琳抛弃了，不让她有孩子的监护权，甚至不让她见孩子，还不给她任何资助。理由是先前布莱克斯通所主张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都是布莱克斯通的好学生，因此也当然知道）："丈夫和妻子通过婚姻，在法律上成为一体，因此女人的存在，就在婚姻中停止了，或至少合并到丈夫的角色之中去了。妻子要做什么事，都要在丈夫的羽翼之下、保护之下、荫蔽之下进行。"现实中，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妇女婚后不能拥有任何财产，也不能成为合同中的一方，更不要说起诉离婚了。这种情况，到19世纪最后25年才有所改变。比如，上文提到的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就不能从自己写的小说挣到一分钱，只能从丈夫那里拿一点零用钱，聊以自慰。乔治·诺顿十分恶毒，他用二人的婚姻作为屏障，在二人分开之后，还不让卡洛琳获得收入。案件在社会上公开，引起了强烈反响。最后，1839年，国会通过法案，允许被抛弃的母亲监护7岁以下的孩子；但孩子长到7岁，母亲就没有监护权了。

诺顿把墨尔本勋爵指控为离婚案的共同被告。墨尔本勋爵辩解说，自己跟卡洛琳的关系完全光明正大。维多利亚对墨尔本勋爵一直有"疑罪从无"的态度，这时候，她也很可能接受了墨尔本勋爵的说法。于是，维多利亚就能把卡洛琳看成一个受害者，而把她争取监护权和资助的举措看成英雄之举，事实上也是如此。不过，20年之后，维多利亚出版社（Victoria Press）推出的《英国妇女杂志》（*Englishwoman's Journal*），女王是否还能读下去呢？这杂志的文章，强硬地主张，已婚妇女也有自己的财产权，而且跟女王一样，总是把糟糕的婚姻比作买彩票，或者奴隶制。女王或许曾经注意到芭芭拉·李·史密斯（Barbara Leigh Smith）的《有关妇女主要法律通俗简明读本》（*Brief Summary in Plain Languag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ws Concerning Women*，1854），阅读过这个读本，甚至还支持读本的使命——要对年轻女性进行婚姻教育。

维多利亚对早期女权主义著作可能很熟悉，这一点看似惊人，实际上却不那么惊人。维多利亚出版社（这家出版社雇用女性的排字工人）的创始人，名叫艾米丽·费思富尔（Emily Faithfull），此人本事非常了得，女王在1862年，竟把她任命为"印刷与出版常务负责人"。这个职位，女王绝对不可能送给她不满意的人。费思富尔是芭芭拉·李·史密斯的朋友和同事，也是朗豪坊交际圈的成员之一。这个交际圈是一群作家、社会活动家、评论家，在伦敦摄政街（Regent Street）附近的朗豪坊19号（19 Langham Place）聚会，因此得名。这些人受到活动家杰西·布切里特（Jessie Boucherett）创办的促进妇女就业协会鼓励，建立了一个登记处，如果有妇女要找教师、女家庭教师的工作，就可以到这里来登记；实际上是一个

就业机构。他们的目标，跟布里斯托尔的项目一样，把就业的列表扩展到所有家政服务。布里斯托尔也设立了一个类似的办公室，派出巡视员去各地确保用人单位体制健全，不做违反道德的事，而且工作条件和报酬都令人满意。朗豪坊交际圈的办公机构，有一个图书室，可以让妇女在找工作的同时，阅读各种报刊（包括《英国妇女杂志》）；可以签名参加争取已婚妇女权益的请愿；还可以阅读芭芭拉·李·史密斯、艾莎·克雷格（Isa Craig）、贝西·雷纳·帕克斯（Bessie Rayner Parkes）的文章。贝西从1858年起担任《英国妇女评论》（*Englishwoman’s Review*）的编辑。这些作家都主张，妇女的工作十分重要，也都相信，妇女的工作领域，应该扩展到钟表制造、新闻、医学、监狱管理、工厂监督、监护工作、艺术，当然，还有女子中学、大学的教学工作。

这些女人堪称一支不寻常的中产阶级先锋队。当初，在1825年，有一个激进组织“爱丁堡女仆工会”，鲁莽地威胁要罢工。如今的这些妇女机构，跟那个工会并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相反，如今这些机构依赖的是130万名家政女工，这些女工给了他们宣传鼓动的自由。芭芭拉·李·史密斯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女士的表亲，也是一个私生女，她的父亲是激进主义“唯一神教派”诺威克郡国会议员本杰明·史密斯。本杰明刻意拒绝跟芭芭拉的母亲结婚，而且专门给他的金发女儿安排了一笔年金，好让她自己独立生活。不过，1855年，芭芭拉跟同事发起了一次请愿，推动国会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权法案》（*Married Women’s Property Bill*），争取到了26000个签名；这足以说明，朗豪坊交际圈的人，数量不少，影响也不小。参加请愿的人，有一些是维多利亚时期最有名、作品最畅销，也最受尊敬的女作家——当然有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还有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笔名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和哈丽雅特·泰勒（Harriet Taylor）。很讽刺的是，后人铭记的，哈丽雅特·泰勒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权斗争里的主要贡献，一般都是“把丈夫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拉了进来”。维多利亚女权运动本身，也不如后来更激进的“妇女参政权论者”运动有名，这其实是不应该的。密尔号称“理性主义的圣人”，也是维多利亚中期自由主义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支持女权主义方面。密尔一直坚持说，是妻子泰勒教育了他，让他明白了妇女在婚姻、工人运动、政治体制方面的极端不平等。特别是在《自传》（*Autobiography*，1873）一书中，他更是强调这一点，为此而痛苦不已。妻子一直是他真正的搭档，跟他一起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等著作。这些社科类著作并不是讨论妇女问题的，但这本书却第一次专门说明了泰勒起的巨大作用；密尔最重要的作品《论自由》（*On Liberty*，1859），则是正式献给妻子的，署名也是夫妻二人合署的。

密尔的写作风格，既不充满焦虑，也不充满热情。他作品中体现的焦虑和热情，完全是因为妻子哈丽雅特的角色被舆论矮化为“贤内助”，他对此感到不满。约翰·拉斯金的《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1865），大致论述，理想的合作者，也就是妻子，只应当允许钻研丈夫已经知道的知识，也只应该永远当一个审稿编辑、助理，在评论出现的时候为丈夫欢呼；密尔坚称，他与哈丽雅特绝对不是这种关系。他们在身体的亲密之前，早就“神交已久”。密尔可能在技术方面，特别是经济理论方面更强一些，但泰勒却了解并传授了两方面的知识，这两方面都绝对胜过密尔：一是形而上学的宏大理念；二是自己作为人类的实践（包括精神上的，也包括社会方面的）。密尔本人拥有的只是“媒介”功能，他在《自传》一书中不诚实地暗示说，任何一个老学究，都能把这种功能掌握得跟他自己一样好。这种专门弄得很正式的辩解，有一种心理潜台词，实际上很有力，也很轰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真正的意思是，他当初见到哈丽雅特的时候，就找到了解放自己的人，让自己从父亲的束缚里挣脱了出来。

1830年，密尔24岁，哈丽雅特比密尔小一岁。当时哈丽雅特已经结婚了，丈夫叫约翰·泰勒（John Taylor），是个城市里的药商，来自一个苏格兰家族。密尔家原先也是苏格兰人，很了解泰勒的家族。当时，哈丽雅特已经出版了不少诗歌、书评、散文。密尔在东印度公司的审查官办公室工作，起草各种急件，送给公司的法律和财政顾问。密尔的父亲詹姆士·密尔也在东印度公司，是他给儿子找了这份工作。家里一共九个孩子，密尔是老大。不过，老密尔却用尽一切手段，想让小密尔成为自己的翻版。老密尔的朋友兼导师，是著名学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老密尔拼命要推行边沁的功利主义信条，其目的是增进人类“最大数目的最大快乐”。一开始，这位大彻大悟的立法者就有一个假定：人是一组感觉接收器的集合，不是对快乐做出反应，就是对痛苦做出反应。因此，他的目标就是，尽可能扩大快乐，减小痛苦。他主张，各种给人类带来痛苦的物质和道德问题，都要系统而科学地分析；量度问题的规模，诊断问题的原因，开出问题的药方。然后，发表一份报告，提出立法的建议；再招募一个有工资的视察团，监督法律的实施与执行。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帝国，都是靠着权力统治的；而大英帝国却要用知识来统治。约翰·密尔曾经出版一部巨著《英属印度史》（*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1817），详尽得令人看不下去。出版之后，他成了东印度公司审查办公室的主任候选人。

父亲的代表作——*Magnum Opus*面世的时候，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只有11岁。不过，他却在此前很久，就开始了训练，目标是把他培养成一名“宣传幸福的人”。父亲认为，孩子的心灵就像一张平滑柔软的蜡纸，空无一物，但非常善于接受；因此，教育的影响越早越好。老密尔决定，从三岁就开始教孩子希腊语。入门教材是《伊索寓言》，很快就出现了柏拉图

（Plato）、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全部著作），还有经济学家色诺芬（Xenophon）。算术比起希腊语来无聊得多。到了8岁，就开始了不间断的拉丁语课程，有纳撒尼尔·虎克（Nathaniel Hooke）的《罗马史：从开始建设到共和时期》（*The Roman History from the Building of Rome to the Commonwealth*，1738—1771），课外书则是约翰·米勒（John Millar）的《英国史观：从撒克逊人定居到斯图亚特王朝建立》（*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from the Settlement of the Saxons to the Accession of the House of Stewart*，1787）。密尔一家住在伦敦郊区的斯托克纽因顿格林，这是当年普莱斯博士居住的地方，住着激进的改良主义者，以及女权主义者。一家人觉得这个地方很好。老密尔绕着绿地散步，朝着更远的乡村远足；与此同时，训练自己10岁的孩子微积分，教给他罗马农业法律、希腊雄辩术的分析。老密尔去东印度公司走马上任之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又担负起了教育弟弟妹妹的重任。闲暇时间，在阅读爸爸《英属印度史》校样，以及政治经济学、逻辑学的课程之间，小密尔也想办法偷着看了点文艺作品，主要是莎士比亚的。14岁那年，爸爸允许他去了一趟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附近的蓬皮尼昂宫旅游；但他回来之后，无情的严格训练又重新开始。

老密尔成功把约翰·斯图尔特打造成了一架思想机器，填满了一切人类想得到的知识，计算和运算能力也校准得非常精确。但与此同时，小密尔也被这个“了解一切重要事物”的负担吓坏了，他恐惧严厉的父亲，害怕自己不够优秀，为此痛苦不堪。不过，小密尔至少相信，他拥有了智慧的基础和道德的使命感。19世纪20年代中后期，各种评论报纸上，有一些最聪明、最尖刻的作家，对杰里米·边沁、詹姆士·密尔发起了一系列攻击，深刻动摇了小密尔的这个想法。这些作家当中，最重要的是托马斯·卡莱尔，以及（理念有区别的）年轻的托马斯·贝宾顿·麦考利。卡莱尔抨击功利主义，说它的罪名是“误以为人类与将人类聚集在一起的文化，都类似机器，一旦显出故障的迹象，就可以重新装备”。卡莱尔说，只有最天真的人，才能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无动于衷：造成一些社会快乐，另一些社会痛苦的，不是基础物质，而是精神。麦考利则抨击功利主义的另一个罪过：用科学手段优化社会改革，强加在公众身上，会与保护自由的任务发生冲突，而功利主义拒绝承认可能有这样的冲突。

密尔的余生，一直都在试图解决这些冲突——自由与社会改革的冲突，以及逻辑和感情相互竞争的主张的冲突。一天，老密尔的“唯一神教派”牧师——威廉·约翰逊·福克斯（William Johnson Fox），带着泰勒夫妇来密尔家做客。泰勒夫人长着一双大眼睛，有着天鹅一般优雅的脖颈，口才很好，说话也很自信。密尔马上就被她迷住了，本能告诉他，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教育”。没多久，密尔就知道，哈丽雅特·泰勒年纪轻轻就嫁了人，现在非常不开心。倒不是她丈夫对她有什么暴行，用当时的标准衡

量，这个丈夫甚至还可能非常称职。只是哈丽雅特自己对理想婚姻有一种提高了的标准，按这样的标准衡量，她就发现了二人之间有着深深的不兼容。泰勒先生对哈丽雅特珍视的——艺术、诗歌、哲学无动于衷。身陷这样的婚姻关系，哈丽雅特只能当一个尽职的“合作者”，再没有其他能力可以发挥。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却相反，极为敬仰哈丽雅特的精神品质和独立思想。这种品质和思想，让哈丽雅特感觉，自己的婚姻就好像监狱。又过了几个星期，两人之间的通信，称呼就变成了“最亲爱的”。1833年夏，密尔给哈丽雅特写信：“啊，我爱，我们的相识，已经如此巨大地增加了快乐，而绝不可能增加罪恶。不论在你看来，这关系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你永远都不应该为它而有片刻的后悔……我在照料你的知更鸟（哈丽雅特的宠物），就仿佛它是亲爱的你一般。”

尽管接下来20年艰难的感情长跑中，哈丽雅特·泰勒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尽可能多地相伴一起，而且亲密程度超乎寻常，但密尔在《自传》里的说法，应该还是真的——他坚持说，身体上的礼节从来没有打破；只有在他们结婚之后，才会享受性爱的极乐。不过，他们面临的尴尬局面，也确实让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离婚的各种困难。

朗豪坊的女权主义者当中，有一位名叫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的，她说，在法律上，有一些人不能提起离婚诉讼，这些人包括“罪犯、智力低下者、未成年人”，而已婚妇女也被放进了这一类人当中，不能提起离婚诉讼，但她们自己则可以因为通奸被丈夫休掉。1857年，国会通过《离婚和婚姻诉讼议案》（*Divorce and Matrimonial Causes Bill*），然而这法案并非为了方便女性离婚。法案的实施，是为了预先制止一种能给予已婚女性财产权的措施，于是，这个法案并没有纠正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反而让这种不平等状态永久化了。丈夫可以因为妻子通奸而休妻；但妻子若因为丈夫通奸而离婚，则这种通奸必须是强奸、肛交、兽交，或者某种不确定的残忍行为。以及，不言而喻，只要受害的妻子依然没有自己的财产或者收入，提起诉讼的高额费用，首先就杜绝了妻子提起诉讼的可能。只是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就离婚（哈丽雅特就会这么做），这个愿望，依然是最不切实际的幻想。

到了离婚法案最后通过的时候，哈丽雅特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已经结婚6年了。之前的20年中，大部分时间，哈丽雅特都跟丈夫泰勒分居。有一次，哈丽雅特跟密尔一道去了巴黎半年之后，泰勒终于受不了屈辱，提出离婚。但是，三人这种奇怪的关系，却还是因为某些原因而保持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泰勒夫妇暂时又住在一起了；密尔会请泰勒夫妇来自己的俱乐部共进晚餐，而泰勒就很知趣地缺席。约翰跟哈丽雅特，似乎被他们坚贞的爱情披上了铠甲，能够抵御两个人引发的各种不适和别人的厌恶，即使这种厌恶来自朋友也不例外，例如卡莱尔一家。有一天晚上，约翰跟

哈丽雅特两口子突然乘马车前来拜访卡莱尔。卡莱尔声称，约翰·密尔当时心烦意乱，来跟自己坦白说，他家里有个女仆，把卡莱尔《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整部手稿烧毁了。卡莱尔虽然听到这么一个极坏的消息，却还是很欣慰，因为之前有人传谣说，泰勒夫人和密尔两人私奔了。卡莱尔夫人简·威尔士·卡莱尔（Jane Welsh Carlyle）一直不喜欢哈丽雅特。她坚持怀疑，手稿的毁坏，是哈丽雅特的责任。

这些烦恼，约翰跟哈丽雅特都为了“互敬互爱基础上的理想结合”而忍下了。这明确而坚定的信念，让两个人猛烈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规则，大部分观点后来写成了一本书《妇女的屈服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由密尔在1869年出版了。他们主张，整个婚姻系统，完全是用虚假、伪善的包装纸包裹起来的“礼物”。年轻的女孩子被灌输一种谬论，说什么“婚姻才是女人真正的事业”，还说婚姻是女人完美幸福的居所。在“沉默”和“权宜之计”二者的共同阴谋之下，这体制的牺牲品，也就完全不知道，一旦为人妻，会有什么样的家庭现实、社会现实等着她们。有产阶级之间的婚姻，几乎全都是商业交易，经过理性的计算，其目的是为了积累财富、地位、权力。签订合同的各方，都做了种种谈判，实现共同获利。如果一个家庭地位很高，但缺少财富，就会跟有钱却没权的家庭联姻。而这一切的驱动力，永远是坚硬的利益，而非柔软的感情。婚姻表面上是用来抑制欲望的，然而，那些虚假的浪漫言辞一旦无可避免地幻灭，他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多多少少走向这个目标的反面。于是，女性就发现自己因一场可怕的交易而变得堕落，进入了陷阱——女性保留华丽的衣服、精致的马车、众多的仆人、孩子、社会地位（如果足够谨慎的话，还能保留情人）；丈夫则可以保留情妇。密尔与哈丽雅特认为，这确实是一种同居生活，但是，“如果对女人来说，这就是人类生活的一切，那么这种生活就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女人只要能感到自己可以追求更大的快乐，自己的志向没有被人为阻碍，就会发出宣言，摆脱这样的生活，去寻求更多幸福”。

最后，让哈丽雅特摆脱婚姻的，还是1849年约翰·泰勒的死。两年后，密尔跟哈丽雅特在梅尔科姆雷吉斯（Melcombe Regis）市的登记处结了婚，距离伦敦博览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此时，他们已经跟密尔的家人，还有很多老朋友断绝了往来。他们永结同心之前，密尔坚持要签署一份正式声明，放弃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丈夫拥有的、常规的合法权利。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高尚的婚前宣言：

我已获得她的同意，与我迄今为止所知唯一愿意成婚之女子缔结婚姻关系，至为幸福；且现有法律构建之婚姻关系，我与她均完全否定……我因不能以合法手段放弃这些可憎之权力（若能合法缔结可让我放弃权力之婚约，则我必将如此行动），遂深感责任重大，有必要将针对现行婚姻法律

的抗议，正式记录在案……在泰勒与我的婚姻中，我宣布，出于自己的意志和意愿，在我们之间存在任何契约的条件下，她在所有方面，均保留同样的绝对行动自由权利，以及掌控自身、掌控目前和任何时期可能属于自己的一切财产的权利，如同并未有婚姻发生一般；关于“我凭借婚姻获得任何权利”的一切主张，我均表示绝对否定并放弃。

然而，两人的家居快乐，又很短暂。两人此时患上的病，后来都发展成了致命的肺结核。哈丽雅特病得更重，而且日甚一日。她选择住在瑞士的休养所，或者法国东南的普罗旺斯。普罗旺斯的气候更暖，空气也比较干燥；她想要这样来延缓病情。这时候，两个人就会分开几个月的时间。密尔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就拼命将哈丽雅特关于两性平等的思想整理成文，他称之为“神圣的使命”。医生们对两个人隐瞒了一些情况，尤其是哈丽雅特的病情急速恶化。他们坚持要两个人分开休养，尽管密尔会因两个人分开而极为痛苦。密尔本来在法国坐火车，要回英国看望哈丽雅特。这时候，突然又下了一场大雪，火车被困，无路可通。密尔在车厢里痛苦地沉思着两人共同的灾难，回忆着“意识到自己被爱，意识到自己陪伴在最爱的人身边”，会有怎样的温暖和安心。他又说：“此刻，我拥有了以上两种体验，因为只要有她的关怀，我就感觉，好像没有任何真正危险的疾病，会降临在我身上……而当远离她的时候，我又会感觉，和护身符分开了，没有护身符，我就会更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

1858年11月，哈丽雅特在前往地中海的路上，在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Avignon）病逝。密尔在哈丽雅特的坟墓附近，买了一栋房子，余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完成了专著《论自由》，这本书让他成了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中流砥柱。他把这本书献给了妻子（密尔在1873年去世）。密尔尽管忠实地重述了哈丽雅特的观点，却没有百分百同意。他正大光明地论述了女性有权利在家门之外寻找、获取“有用的”工作；却完全不相信，这样做一定能给女性带来快乐。然而，如果她们自愿或者有必要选择如此，密尔就相信，她们有同工同酬的权利。1851年普查显示，英国600万名成年妇女，有一半在工作。当时有一种论调，以精神病学家亨利·莫兹利博士（Dr Henry Maudsley）为代表，说女性的“生理”（月经周期的委婉说法）让她们一个月不能工作8天以上。对此，密尔毫不留情地回应：“现在叫作所谓‘女人天性’的东西，很明显是人工制造出来的……我相信，女人的这种情况，只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从属地位，因为大部分男性还不能容忍同地位平等的人生活在一起。”

1865年，密尔已经全国闻名了。这一年，有一个威斯敏斯特选举人团体登门拜访，问密尔是否会参加国会竞选。这个时间很关键。约翰·拉塞尔勋爵、威廉·格莱斯顿等自由党派的领导人，受了激进派的刺激，决定设法启动国会改革。这是一次慎重细心的行动，但仍然可以扩大几乎所有“拥有

住房者”的公民权。密尔的支持将至关重要。而且他反对普选权和秘密投票，这一点，不仅没有影响他言语的分量，反而增加了他言语的分量。密尔认为，最关键的选举资格是教育程度。他希望选票更能够反映选民教育水平的高低，而不是选民应纳税财产的多少。密尔很清楚，自己的观点非常怪异。他说：“我相信，不会有很多选民，也不会有任何选民团体中的大部分，真心希望被有我这样观点的政治家所代表。”更有甚者，密尔竟然不当任何政党的候选人，不发起竞选运动，不拉票，也不为自己的竞选花费一分钱。

还有另一个问题，密尔认为，这问题让他更不可能当选。1851年，哈丽雅特在《英国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之后，密尔坚持说，各自治区如果能获得“拥有住房者普选权”，则选民必须包括女性。因为，尽管已婚妇女不能拥有房产，但未婚妇女或寡妇却可以拥有房产；而未婚妇女和寡妇当然数以万计。此外，在1866年，“拥有住房者”除了实际拥有房产的人，还包括交纳租金的房客，而这样一来，合格的女性选民就更多了。

哈丽雅特去世以后，密尔的余生，大部分时间都跟过继的女儿海伦·泰勒（Helen Taylor）度过。海伦下决心要让这抗争的火焰燃烧下去。芭芭拉·李·史密斯这时候已经结婚了，嫁给了一个法国裔阿尔及利亚雕刻家，但一年有半年时间分居。她在法律上改名芭芭拉·博迪肯夫人（Madame Bodichon）。海伦鼓励芭芭拉，让她跟密尔商议发起国会请愿。大概有1200名妇女签了名，希望争得选举权。密尔天性不爱发起吵吵嚷嚷的街头运动，然而，不论他希望与否，他还是获得了朗豪坊社交圈的发声支持。社交圈的成员之一艾米丽·戴维斯（Emily Davies），后来成立了剑桥格顿学院。这是伦敦最早一批学院——女王学院和贝德福德学院。在1874年设立的，之后大约25年，成了第一所牛津剑桥系统的女子大学。艾米丽回忆说，在请愿当中，“芭芭拉·博迪肯夫人雇了一辆马车，车上坐了她、艾莎·克雷格、贝西·帕克斯，还有我，车身上挂了招贴，在威斯敏斯特到处走。我们管这次行动叫‘把道德支持献给密尔先生’，不过也有人怀疑，我们可能给密尔带来损害。我们有个男性朋友说，他听见有人管密尔先生叫‘那个想让女孩儿进国会的人’。”

密尔当然并没有主张女性参选国会议员，不过，他也相信，这种事将来一定会发生。密尔觉得，有一半选民，仅仅因为性别就无法实行选举的权利，这种事既荒唐，也明显不公平。他们的斗争本来就艰苦卓绝，1866年8月，英国自由党下台，就更艰难了。1867年2月，保守党执政时，迪斯雷利提出了自己的法案。密尔固执己见，坚持主张一切妇女（不只是未婚妇女）都应该有选举权，立场比朗豪坊的活动家更为坚定。3月，密尔又发起了一次请愿（他成功把请愿书送进下议院一共三次，这是其中一次），有3000多个曼彻斯特人签名。1867年5月20日，密尔发表了一篇精

彩而动人的演讲，正式将《人民代表议案》（*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Bill*）修正案提交国会，主张在关于将选举权扩展至英国各郡拥有住房者的条款中，用“person”（泛指各种性别的人）代替“man”（男性）。这个目标，直到1884年才实现。这次事件的惊人之处，不在于修正案没有通过，而在于密尔成功说服了至少73名国会议员投票。英国国会有一种制度，互相反对的两党的两名议员，会因为共同利益而约定对某个议案放弃投票，俗称“对子”（pair）；如果连这种“对子”议员也算上，密尔一共说服了81人。密尔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地位显赫的曼彻斯特人：激进派的托马斯·贝莱·波特（Thomas Bayley Potter）和托马斯·贝兹利爵士，后者是工厂主，自称“工人之友”。

1867年11月，曼彻斯特进行补选。此时，著名激进派政治家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有一个立场更激进的兄弟雅各布，雅各布的纲领就包括“拥有住房者的普选权应该包括女性在内”。这次补选中，一个开店的寡妇莉莉·麦克斯韦（Lily Maxwell），成了有史以来英国投出第一张选票的妇女。因为登记错误，莉莉才被列入了选民的名单。不过，雅各布·布莱特和普选权活动家莉迪亚·贝克尔（Lydia Becker）发现这个错误之后，决定让莉莉参加投票。众人把莉莉护送到投票点，莉莉投了选票，周围掌声雷动。莉莉成了先锋人物，很明显惊慌失措。尽管如此，她还是很有英雄气概，而且很同情这些普选权活动家（他们自从1866年以来，一直在和平请愿）；于是，她高高兴兴地参加了这次精心安排的活动。现在还能见到一张莉莉的照片，看得出，她是个意志坚定的女子。布莱特与贝克尔认为，莉莉是上天赐给这场运动的礼物。莉莉·麦克斯韦也像宪章运动土地公司的开拓者安·伍德一样，有着苏格兰人的节俭之风。她以前当过别人家的女仆，攒够了钱，开了一家商店；地址在鲁德洛街（Ludlow Street）上，每周租金不低，是6先令2便士；这条街上住的是工匠和中产阶级的下层，房屋都是两层小砖楼，上下两层各有两个主要房间。莉莉名声大噪，对保守派的媒体来说，这名声十分恐怖。她出名之后，1867年12月3日，莉迪亚·贝克尔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信中把莉莉写成一个模范选民，那种希望通过《改革法案》获得解放的人。莉迪亚说，莉莉是“这样一位孀妇，她在曼彻斯特一条安静的街道上开着一家小店，自力更生，用自己的收入来支付各种税费。她没有哪个男人要影响，也没有哪个男人来影响她。此外，她的政治原则也十分坚定，因此下定决心，在最近的选举中，投了雅各布·布莱特先生一票”。莉莉·麦克斯韦投票出名，使得莉迪亚·贝克尔成功开设了一个登记处，来登记符合条件的“拥有住房的女性”。到1868年年底，登记人数已达13000人。

这一切，让维多利亚女王十分惊骇。先前，温情的幻梦与冷酷的婚姻现实距离遥远，对此，她确实偶尔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至少私下里提出了）；而且，有些措施用来约束家暴丈夫、约束恶名昭彰的放荡丈夫，用

来照顾一些被残忍抛弃的妻子；对这些措施，女王甚至还表示过赞许。然而，女王却坚决主张：各种不公平现象和残忍行为得到处理，并不等于对一切政治解放大开绿灯，不论这种解放程度有多么微小。1867年10月，女王发出了惊人的自由主义观点，主张有必要将普选权扩大到“下层民众”，因为下层民众已经变得“消息十分灵通，十分智慧，而且极为正当地获得了自己的面包和财富”；这与“可憎又无知，活着只是打发时间的身居高位者”形成了强烈对比。但是，只要一有人讨论“妇女适合行使政治权利”，女王就会勃然大怒。她的文章一般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于是她这么写道：“这种话题，使得女王气愤不已，无法自控。”她还破口大骂：“这种疯狂、邪恶的所谓女权的闹剧，带着各种附属的恐怖，使得她（自己）可怜而脆弱的性别扭曲了，忘记了一切女性感情和礼仪的意识。”

那么，女王对另外一个重要的女权主义话题——中产阶级女性的工作又怎么看呢？女王确实还在继续勤勤恳恳阅读各种急件和文件，但她在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一直觉得政务只是国家强加给她的恼人的义务，而丈夫阿尔伯特在一切方面，都更加适合从政；直到政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之前。女王也基本同意中产阶级主张的“婚姻是女人的事业”这种陈词滥调。1851年的人口普查还揭露了一个事实：在英国，婚龄妇女的人数，比婚龄男子多50万至75万；根据人口统计学家的数据，这一数量差，似乎已经维持很久了。而女王则几乎不可能太过考虑这种情况。曼彻斯特有一名工厂主，也是政治经济学家，名叫威廉·拉思伯恩·格雷格（William Rathbone Greg）。他认为，这种“过剩女子”（spinster surplus）的现象，可以通过移民到殖民地来缓解。不过，这依然会让大概50万名未婚女性落入可怕的命运，要么永远感觉自己是“多余的人”，要么被困在工资极低、名誉也很差的职业当中，例如女家庭教师。19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妇女杂志》和杂志编辑贝西·雷纳·帕克斯已经开始响应中产阶级女性的呼吁：她们希望的工作身份，是拿工资的专业人士，而非上流社会的志愿者。此外，她们希望从事的工作范围也更加广阔：在女子中小学、女子大学教书；去监狱、少年教养所；救济城乡贫民；还有一种职业，被官方正式列为女性的“高尚”职业——护士。

女王觉得，护士最完美，符合女性“温柔”“慰藉”“疗愈”这些品质。英法同俄国争夺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战争，死伤无数，全是因为战争才有了如此的观念。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史诗般的传奇，震动了整个英国，尤其是女王。南丁格尔为了更高尚的召唤而放弃了婚姻，带着38位年轻女性组成的队伍，前往斯库台湖（Scutari）战地医院。她应付了长着络腮胡子的医疗队和军中的官僚，从他们那里想尽办法，拿到了最基础的必需品——绷带、夹板、肥皂。她把洗衣盆变成了自己个人的纹章。女王多次表示，自己生错了性别，不能跟士兵们一道吃

苦、一道作战，为此十分遗憾。女王亲手织了长围巾、袜子、连指手套，给前线写了不止一封信，看望了从前线回来住院的士兵，这样军人们就应该知道，因他们的痛苦最为悲伤、因他们的牺牲最为感动的就是女王陛下。英军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和英克曼（Inkerman）两个地方死伤惨重，消息让女王和阿尔伯特整夜睡不好觉。《泰晤士报》有一位战地记者，名叫托马斯·切纳利（Thomas Chenery）。他在1854年10月报道，负责管理和下命令的人十分无能，基本军需物资也十分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女王的母性关怀意识也越发敏锐。

斯库台湖的护士们，就是代替女王而出现的。1856年，战争结束。南丁格尔回到英国，在巴尔莫勒尔堡受到女王接见。女王听取了她对战争苦难的描述。不过，在克里米亚半岛上，还有一位女英雄，被士兵们奉为“众人的妈妈”，但女王并不认识；后来，女王过继的侄子，上尉伯爵维克多·葛雷晨（Captain Count Victor Gleichen）把这位女英雄的事迹告诉了女王。南丁格尔觐见女王的同一年，伦敦郊区的皇家萨里花园举行了一场大型宴会和音乐会，来了11支军乐队，为了给这位女英雄玛丽·西科尔（Mary Seacole）筹款；玛丽刚刚宣告破产了。回国的士兵之所以这么敬仰玛丽，有着很充分的理由。士兵若是生病或受伤，能被人送到玛丽开的“英国旅馆”（British Hotel），就能有很大的机会幸存下来。在斯库台湖，可并非如此。

然而，玛丽要想成为正统的维多利亚时期女英雄，却有一个障碍：她的肤色。玛丽出嫁之前叫玛丽·格兰特（Mary Grant），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牙买加人，她是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后来她结婚了，丈夫是之前提到的海军名将霍雷肖·纳尔逊的教子之一。婚后，她在牙买加开设一家半旅馆半康复中心的机构。1831年，当地霍乱流行；1853年，更为严重的黄热病疫情暴发。这两次瘟疫当中，她创造了很多奇迹，挽救了很多死亡边缘的生命，为此而声名鹊起。痢疾和脱水并发症的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她治疗这些疾病的疫苗方案，全都来源于加勒比地区植物药典。这种来源，让这些药方一概被医院斥之为“野人”的魔法药水；而玛丽申请前往克里米亚治疗霍乱和伤寒（当时死亡人数最多的两种疾病），也被立刻驳回，特别是被南丁格尔亲自驳回。

当初，南丁格尔年轻的时候，护士一行被人视为低贱的职业，多亏有在战争部任职的一位贵族西德尼·赫伯特男爵（Baron Sidney Herbert）为南丁格尔说情，才没有断送她的事业。玛丽·西科尔却没有赫伯特男爵为自己说情。不过，她动用自己的财产，还是想办法带上两个最为信任的牙买加厨师，去了地中海东岸。她一到此地，就去了克里米亚——最惨烈的战争舞台，而没有去土耳其的战地医院，因为显然那儿不欢迎她。玛丽在离巴拉克拉瓦大概两英里的地方，花了800英镑，建起了“英国旅馆”，可能是模

仿她在牙买加的医疗机构。这是一所军需物资补给站、一家要开赴前线的士兵食堂，也是治疗伤病员的护理康复中心。斯库台湖的病房又湿又冷，“英国旅馆”始终都有人打理得温暖而干燥。士兵如果得了霍乱或者伤寒，病倒了，最好的待遇是就地护理，而不是穿过黑海，住进斯库台湖的战地医院；这一过程可能要花费三个星期，极为痛苦，而且那里的医院也是死亡陷阱。

当然，“英国旅馆”也有大老鼠；“西科尔阿姨”的灭鼠队一大清早就看见了很多。老鼠消灭之后，西科尔就会开始早上的例行公事。早上7点是咖啡和茶，然后给鸡拔毛，做熟；做火腿和牛舌；炖肉汤；炖大黄药汤；烤馅饼和威尔士干酪面包；最重要的则是她申请专利的大米布丁，没有牛奶，所以运输起来很方便，不会变坏。哪怕没有牛奶，这布丁也蕴含着某些非常母性的东西：这是一种安慰人心的食物，舀出来送给士兵们，能消除他们在战争中的一切恐怖，让他们再次变回小孩子，让黑白混血的阿姨喂饭。一位归国的士兵写道：“你要是足够幸运，能在供应大米布丁的日子来英国旅店，我保证你骑马回到小屋的时候，一定会特别感动，因为西科尔妈妈给了你一点回家的感觉。”

阿里克希思·索耶（Alexis Soyer），是改革俱乐部有名的厨师，他在1855年也为士兵们做了自己设计的炖菜。玛丽曾经看着他，用戴着珠宝的胖手，把炖菜舀出来。索耶赞赏说，西科尔的菜肴有益健康，她的英雄气概也非常可嘉。住院的士兵照料好了，西科尔就给两匹骡子装上鞍辔，拉着一辆马车出发。马车上装了热食冷食，还有基本的急救器械——绷带、毯子、夹板、针线、酒精。马车会一直开到炮火纷飞的围城战场中，然后有一名希腊犹太人带路，他熟悉那些壕沟、军营的位置，带着西科尔走进硝烟，寻找伤员，既有英法联军的人，也有敌军俄国人；他们不仅需要急救，也需要一杯热茶，一句安慰的话语。西科尔明白，他们还需要一块干净手绢的擦拭。骡子在炮火中艰难前行，迫击炮弹从老太太身边呼啸而过。不止一次西科尔听见：“快趴下！妈妈！快趴下！”她回忆道：“我就带着狼狈不堪，一点也不淑女的焦急，去拥抱大地。”她已经习惯了恐怖。有一次，她发现的一个伤兵，下巴中了一枪。玛丽把一根手指塞进伤兵嘴里，想要撑开嘴，把汤灌一些进去。伤兵却咬紧了牙关，咬伤了她的手指，她不得不让别人把伤兵的嘴巴撬开。

在恶心与虐杀的噩梦中幸存下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忘掉玛丽·西科尔。战争结束了，她从克里米亚回到伦敦，没有人请她去巴尔莫勒尔堡，却有一堆债主上门逼债。不过，在之前提到的皇家萨里花园，以及科芬园（Covent Garden）、女王剧院（Her Majesty’s Theatre）举行了一系列筹款活动，终于让西科尔免于破产。阿里克希思·索耶和威廉·拉塞尔两人都想尽办法，确保西科尔的事迹广为人知。女王过继的侄子——霍恩洛厄–

兰根堡的维克多王子（Prince Victor of Hohenlohe-Langenburg）参与了战争，也是一位业余雕刻师。他为绰号叫“妈咪”（Mami）的西科尔塑了一尊半身像。也许是通过维克多王子，女王终于知道了西科尔，在1857年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她，赞扬她的功绩。西科尔1881年去世，留下一栋价值2000英镑的宅子；这全都是她护理过的伤员的捐赠。然而，战争的伤亡依然笼罩她余生的记忆：冻僵的破碎尸体；本来应该快活地玩板球的小伙子们，却死在了泥淖之中，眼睛“半睁着，带着安静的微笑”，或是“在炽热的激情中突然倒下，苍白的面孔凝固了，蔑视与仇恨的目光，让你的热血变冷”。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特别是玛丽·西科尔这样坚韧的老护士，内心应该很强大了。死亡无处不在。在伤寒肆虐的兵营里；在霍乱肆虐的贫民窟；在患上结核病的中产阶级的手帕上。各种高尚的沙龙活动，只要一有人突然控制不住地咳嗽起来，让飞沫溅到合身的衣服上，众人就会突然沉默，在同情和自保之间左右为难。

这一代人轻松愉快地成长起来，他们改造周边环境的事业，比前人都要来得宏伟，因此拥有了部分应得的自信；对他们而言，无处不在的死亡，似乎是一种过于严苛的矫正措施。毕竟，他们造出了蒸汽船越过大洋，在大河两岸架上了钢铁的大桥，还用电报缩小了世界。这样的文明，也一定能很快征服各种疾病。确实，这一时期，显微镜技术的发展，第一次揭示了病原体的存在和生长；然而，人们却不知道怎样才能遏制病原体的分裂，除了用板刷去刷洗之外。

在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折磨中，死神就乘虚而入，冷冷地嘲笑着维多利亚人控制生命的梦想。人们活着的时候，力量似乎无所不能；而一旦死亡，却会完全静止下来。这种转变十分惊人，催生了人们对死亡的强烈不满，也正因如此，哀悼仪式才会具有极端特殊性；代表了人们让死者在生者中展现尊严的愿望。维多利亚时期的陵墓，规模巨大，设计豪华，石雕风格热情而夸张；这种待遇，活人是远远享受不到的。这些全都是为了推迟“遗忘”和“虚无”。每一吨用作建材的雪花石膏和斑岩，每一个悲泣的小天使，每一幅挂有绉布的肖像，都是为了让逝者音容宛在，等着即将到来的复活世界。

这个复活世界，是维多利亚女王最为期盼的。因为她先前相信过，上帝向她保证，永远不会让阿尔伯特抛弃她，留她一人承受国务的重担，而上帝却背信弃义了[注]。为此她愤怒不已，说道：“我们纯粹、快乐、安静的家居生活，是让我忍受憎恶至极的职位的唯一支柱。而它却在42岁的时候被拦腰斩断了！我先前曾经如此热切地期盼，上帝永远不会让我们分开，会让我们一起老去。而这生活的毁灭，实在是太可怕，太残忍了。”女王之

所以这么痛苦，有一部分是因为，阿尔伯特亲王的疾病和死亡，似乎证实了两人同伴关系的必要性。只有同伴关系，才能让家事与国事同时得到支持。阿尔伯特为家庭、国家，也为人类（女王说出“为人类”不会犹豫）所做的，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职责，于是就在劳累焦虑之下撒手人寰了。英国舆论并未给予阿尔伯特应得的地位，这一点，让维多利亚更加不满。女王想让阿尔伯特享有“配王”（King Consort）的头衔，但1857年阿尔伯特不得不接受了较为低级的“王夫”（Prince Consort）称号。此外，威灵顿和托利党人担心外国甚至罗马教皇干涉，从而禁止阿尔伯特使用“阿尔伯特国王”（King Albert）的称号。更有甚者，“好人与伟人阿尔伯特”（Albert the Good and Great）尽管视察了很多市政厅和模范工厂，也为无数医院举行了奠基仪式，舆论却还是仅仅将他视为一个外国人；英国贵族阶层说话做事都普遍慢吞吞，有气无力；他们将阿尔伯特履行职责的认真态度，视为“外国人”的更确实的证据。如今，贵族阶层依然在败坏社会风气，女王对此十分憎恶。

这一切，不仅仅是这位寡妇的幻想。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的奥斯曼帝国，从17世纪开始衰落，欧洲列强都在争夺奥斯曼的控制权，由此产生了“东方问题”。阿尔伯特对东方问题十分关注，而且，克里米亚战争似乎确实让他衰老了很多。战争之前好几年，英国流行一种恐俄气氛，统治阶层怀疑阿尔伯特对沙皇的政策太软弱。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阿尔伯特发疯一般进行统计调查，制订计划，做出了有些过分的弥补。他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了评论：陆军的现状（很不好）；有必要建设一所优质训练营；军医面临的各种恐怖；后勤的各种隐患；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现状；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的海军问题……写满了50卷对开的本子。每天早上，女王坐到办公桌前的时候，已经有一摞文件排列整齐，让阿尔伯特事先分类、筛选停当，让她细读、同意、签字。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阿尔伯特注意力转向了《巴黎和约》（*Peace of Paris*）的各种复杂因素，以及英法联军的关系；极有可能发生的美国南北战争[注]对英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发展本国畜牧业的计划；用城市下水道的废物供应农村肥料的方案；还有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工作。阿尔伯特本来一直起床很早，现在更是深夜就起来，借着书桌的绿色灯光来工作。哪怕在比较轻松的时候，按照一个宫廷评论者的说法，他也“热衷于安排日程”；在巴尔莫勒尔宫和奥斯本宫，只有午饭的时候，才让人说一些非常滑稽的俏皮话。19世纪50年代后期，尽管阿尔伯特也热衷于在巴尔莫勒尔猎鹿，但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就连乏味的玩笑，也越开越少了。他独处的时间、被焦虑淹没的时间则越来越多。英国歌谣里有一个人物杰克·斯普拉特（Jack Spratt），他不能吃肥肉，他的妻子则不能吃瘦肉；如今，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也变成了杰克夫妻的宫廷版。阿尔伯特脸色蜡黄而憔悴，脾气暴躁；维多利亚不断生孩子，身体完全走了形，胳膊上的赘肉甚至淹没了手腕，僵硬地坐在丈夫身边。阿尔伯特为英国担心，维多利亚则为丈夫担

心。

与此同时，两口子都为了威尔士王子伯蒂担心。长女维姬温柔聪慧，17岁嫁到了普鲁士宫廷，成了皇太子妃（Crown Princess）。其间，母亲一直相当没有意义地哭天抹泪，说自己把“小羊羔”送到条顿人（Teutonic，典型德国人）的婚床上去当“祭品”了。阿尔伯特也很想念女儿维姬。维姬一走，大弟弟伯蒂不按照父母意愿发展的问题就更突出了。阿尔伯特愤愤地说：“伯蒂的癖好，就是没法形容的懒惰！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彻底、这么狡猾的懒骨头！”其实，伯蒂只要离开了让人窒息的宫廷环境，他就成了一个欢乐而开朗的小伙子，对自己的职责，也不像爸爸以为的那么敏感了。学习上，他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也没有让自己丢脸；有一次他去加拿大旅行，则是一次彻底的个人的胜利。不过，他去爱尔兰卡勒地区的兵营，服过一次轮值的兵役，这场活动就不那么成功了。因为在那儿，以及其他一切地方，都无法逃避一个事实，就是伯蒂嗜好女色，尤其在女人穿上紧身胸衣的时候。父母眼中，如此的好色，能够最精准地损害家族的名誉；这样一来，对家族道德的重视也增加了。英国王室为了重新获得尊敬，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而伯蒂的不负责任，却有可能让这些成就毁于一旦。

于是，两口子抓紧制订计划，要让伯蒂快点娶到丹麦公主亚历山德拉（Princess Alexandra）。丹麦公主容貌秀丽，身材窈窕，性格也确实温柔娴静，肯定能够满足伯蒂在床笫之间的渴望。不过，哪怕与丹麦王室的商议正在进行，到了1861年下半年，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还是发现，伯蒂跟一个名声很坏的“女演员”纠缠不清。这种最新的破坏行为，简直称得上叛国。两口子大惊失色，赶紧写信给伯蒂，用非常直白的言语，警告他这种风流事将会导致的自我毁灭——疾病、妊娠、勒索和闺房的共和主义，与此同时，阿尔伯特还在苦苦挣扎，要处理一场外交危机。1861年10月，美国南方政权“邦联”（Confederate）的特使，乘坐英国蒸汽邮轮“特伦特”号（Trent）前往欧洲购买武器，结果邮轮被美国北方的军舰“圣哈辛托”号（USS San Jacinto）的舰长查尔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下令扣留，特使被抓。当时，英国在美国内战中宣布中立，美国扣押中立国军舰，违反了中立法。英国首相巴麦尊控制的辉格党政府，同情美国南方，准备好了采取一切措施，对抗华盛顿的林肯政府。阿尔伯特竭尽一切政治手段，缓和英国做出的反应，避免另一场无谓的战争。

11月底，亲王已经在视察桑赫斯特（Sandhurst）时患上“风寒”而“感到不适”，却还是到剑桥去看伯蒂，向他宣读了暴乱法案。当时的天气，是东安格利亚地区在过“米迦勒节”（Michaelmas）时的典型天气，狂风呼啸，大雨滂沱。阿尔伯特回到温莎城堡，感冒加重了，而且一直好不起来。当初，阿尔伯特在奥斯本宫种下了一棵小树苗，不祥地沉思道，他可能见不

到树苗长大了。而今，女王惊恐地发现，他似乎在给自己量尺寸，好做寿衣。他说："我确定，自己若是得了重病，就会马上放弃生命，不会挣扎求生。我没有求生的意志。"御医詹姆斯·克拉克大夫，多年以前，给阿尔伯特的孩子们诊断、治疗，就曾经让阿尔伯特又愤怒又绝望；此时，克拉克又一次"不负众望"，没有发现，王夫阿尔伯特其实得了伤寒。等到巴麦尊首相把另一位大夫请来，已经太迟了。

阿尔伯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从温莎城堡的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最后终于在蓝厅里住下，不再挪动了。爱丽丝公主在隔壁房间里弹奏了一些赞美诗。女王前来给他朗读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的《山峰上的贝弗利尔》（*Peveril of the Peak*，1823）。这本书现在还保存在皇家图书馆中，扉页上有维多利亚的亲笔题字：为我亲爱的丈夫读到此书81页的记号处，此时他已重病缠身，三天后他就不幸辞世了。极为惊人的是，81页上的那一段是：他听见了说话的声音，但对他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声响。几分钟后，他便沉沉睡去了，比他生命中……任何一次睡得都要安详。

这真的是巧合？还是女王先前看过这一段，此时选了来当作文学上的告别之语？特别是因为，这一段在情节里说的其实并不是死亡，而是一次用来恢复健康的深深睡眠？12月14日下午，阿尔伯特醒过来了，似乎精神很好。他理了理头发，好像是要穿好衣服去赴宴。他喃喃地说："Es ist nichts,kleines Frauchen."（德语：没事的，小妻子。）维多利亚稍微离开了床边一会儿，等她回来的时候，阿尔伯特已经去世了。女王那张圆圆的胖脸，发出了一声极为痛苦的惨叫。

全世界最伟大帝国的君主，被世间谁也无法抵御的力量击倒了。她伏下身体，哭了很久很久，声音或高或低，咳嗽不断，乃至秘书和大臣以为她要发疯了。维姬也跟妈妈差不多一样难过。她接到妈妈一封信："亲爱的孩子，你说得没错，我不想让感觉好起来。眼泪的慰藉作用太大了，尽管从上周三开始，我就没有号啕大哭过，可每天眼泪还是止不住一次次涌出来，极大安慰了我伤痕累累的心灵。"1862年，维姬来看妈妈，发现女王哭着睡着了，身上盖着阿尔伯特的外衣，臂弯里抱着阿尔伯特的红色睡袍。维多利亚的日记写道："睡觉是多么可怕的事！与爱人的温情比起来，是何等的对比！孤身一人！"

维多利亚倘若认真地考虑过自杀，她也被使命和记忆阻遏住了。她的日记坦白："若我继续活着……今后我会为丧父的孩子们和我不幸的国家而活，国家因阿尔伯特的离去而失去太多。我生命的意义，只在于做那些阿尔伯特一定想让我做的事，因为他就在我身边，他的精神会引导我，激励我。"女王有了强烈的冲动，不想承认死神让他们分开的胜利，想要维持阿尔伯特还在身边的幻想。她花了20万英镑，在弗罗格莫尔（Frogmore）庄园修建了一所精致的陵墓，这个价钱与修建整个奥斯本宫

的价钱相当；陵墓里除了夫妻二人的墓穴，还有女王母亲——肯特公爵夫人的墓穴。公爵夫人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去世了。陵墓设计者是意大利出生的法国雕刻家卡罗·马洛切蒂（Carlo Marochetti），还有一座夫妻二人的塑像，是威廉·希德第三创作的。塑像身穿盎格鲁–撒克逊的衣服，显示萨克森–科堡王朝的联合；古老的神话相信，这就是“古老的英国宪法”。然而，冰冷的大理石，却并没有得到允许，宣告一切的结局。维多利亚世界里的一切，除了她余生一直佩戴的黑白两色帽子之外，全都用来维持阿尔伯特依然陪着她的神话，于是把宫廷生活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降神会。阿尔伯特去世的蓝厅，并没有按照德国灵堂——Sterbezimmer的样式布置，而是永远布置成了他在世的样子。椅子的座套如果旧了，必须用完全一样的复制品代替。每天，屋里都摆上热水、剃刀、刮脸的肥皂，还有新衣服。阿尔伯特的其他衣服谁也不准碰，只有少数衣服，女王心烦意乱的时候，用来垫着睡觉。她后来冷静了一些，但晚上睡觉还是披着阿尔伯特的长睡衣，外加一只他手的石膏模型。阿尔伯特睡的那一边，放了一张大幅照片，还有一根常绿树的小树枝。按照德国的基督教传统，这小树枝不仅象征不朽，还象征复活。

孀居生活，成了女王的全职工作。维多利亚余生（这余生还很长）致力于一项至高无上的事业：让阿尔伯特的记忆，在那些不够肯定他的臣民当中保持下去。如果必须有欢乐的事情，那么最好不要让她看见；就算伯蒂后来娶了爱丽克斯（Alix，亚历山德拉的爱称），爱丽丝公主嫁了路德维希四世，称号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Grand Duke of Hesse-Darmstadt）。这两次婚礼，宾客眼里看来更像葬礼，而且对女王来说显然是折磨。爱丽丝婚礼之后，女王在日记里倾诉：“我说了，愿上帝保佑她；但我听到她说自己嫁给路德维希很骄傲、很高兴的时候，荒凉而滴血的心中还是插上了一把匕首。”而女王唯一能接受的文学作品是各种安魂曲，桂冠诗人丁尼生（Tennyson）的《悼念集》（*In Memoriam*，1850）。这本诗集出了一个新版，当然，是献给已故的亲王的。为了纪念阿尔伯特，女王决心制作一个书架，下令编辑一套阿尔伯特讲话的选集，写一本他早年的传记，此外还有一套五卷本的传记，包含了他所有的职业生涯和著作。到处都立起了亲王的纪念碑。在苏格兰，沿着阿尔伯特当初猎鹿的途径，树起了一个个花岗岩的石堆纪念碑。最高大的一座刻上了碑文：“伟大的好人阿尔伯特，他心碎的未亡人泣立。”英国国内和殖民地，有25个城市，为阿尔伯特建了雕像。1866年11月，女王终于从独居生活中走了出来，乘火车去伍尔弗汉普登给一座新雕像揭幕。她带着“沉重的心，颤抖的双膝”下了火车，被军乐队的音乐，以及挥舞小旗的群众欢呼声包围。女王看到这么热烈的场景，感动不已，竟然让人送了一把剑来，把市长大人加冕成了骑士。市长一时吓得要死，以为女王要砍他的脑袋。城市里兴起了一股修建纪念碑的热潮，其狂热程度，反映在狄更斯1864年写给朋友的信中：“你若是能在某处，遇到一处难以到达的洞穴，能让隐士躲避到此，离开阿尔

伯特亲王的纪念活动和追思会，请一定告知我。在英格兰这一片地方，完全没有如此荒凉、深邃的所在。”

还有其他难以控制的因素开始显现了。女王筹资打算在肯辛顿修建一所纪念馆，尽可能靠近阿尔伯特的伟业——伦敦博览会的旧址，还有另一座纪念雕像，面对着纪念馆。然而，最初计划筹集12万英镑，却只筹到了6万英镑。纪念馆委员会不得已，只能在肯辛顿公园修建单独的纪念雕像了。阿尔伯特坐在王位上的巨型塑像，由卡罗·马洛切蒂雕刻；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负责设计塑像所在的哥特复兴式纪念亭。塑像在纪念亭正中，阿尔伯特的遗骨放在一个有尖顶的镀金圣骨箱里，箱子又放在一个基座上。这个造型，不幸被批评家比作了一个巨型调味瓶，或者糖筛子。神龛有一个天棚，周围是四尊巨大的雕像，象征四种基督教的美德；还有另外四尊雕像，象征四种道德品质。基座上还有一些标志，象征着亚、非、欧、美四大洲；上面还有一条200英尺长的横饰带，雕刻了170位欧洲文明史上的天才，这样，阿尔伯特就可以陪伴着同样不朽的大人物，诸如亚里士多德、但丁、莎士比亚、荷加斯、莫扎特。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在《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1921)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这种神化亲王的大规模运动，对这位思维复杂而开放的天才而言，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损害。他实际的身份，是现代英国社会的第一位首脑。

可是，对于维多利亚而言，阿尔伯特的身份，主要是“完美的基督教勇士”，而不是现代知识的倡导者。“像他那样生活”的观念，让女王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起床，像阿尔伯特生前那样，埋头处理政治文件和急件。德比勋爵、拉塞尔勋爵担任首相的时候，都曾经劝说女王，结束正式的哀悼期；或者退一步，说女王或许应该考虑一下，行使国家职责，召开国会。然而，他们只要这么一说，女王就一半自怜、一半愤怒地回应道：怎么会有人这样没有心肝，竟然会往“被哀伤与焦虑击碎的可怜而柔弱的女人”身上继续捅刀子呢？阿尔伯特死后，维多利亚从公众面前完全消失了。一开始公众还能理解，但是过了一段正常的哀悼期之后，就引发了媒体一些不尊敬的评论，而且培养了17世纪英国内战以来持续最久的、民众对共和主义的偏爱。1866年和1867年，《改革法案》通过的时候，问题尤其严重，因为当时激进主义风头再起，而托利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尤其需要君主地位稳固，否则他自己的前途将难以预料。1866年，首相拉塞尔勋爵再次提议召开国会。女王强烈反对，觉得自己被迫出席这个场合，让人们都来围观“一个心碎的可怜寡妇，紧张不已，缩成一团，从深深的哀悼中被拖了出来”。但最后她还是同意召开国会，尽管态度十分怨恨，使得她因为召开国会而赢得的国民支持，可能还不如因为态度不好而失去的支持多。女王提出了一个条件：想让她出席国会，决不能安排政府的马车，没有游行队伍，不穿长袍，特别是不发表讲话。由上议院大法官代替女王宣

读致辞，与此同时，女王面带愁容，戴着寡妇的帽子，穿着哀悼的黑衣，坐在大厅里面。她连重复一下这个姿态都不愿意。次年6月，女王再次拒绝召开国会。6月8日，讽刺杂志《印第安战斧》（*The Tomahawk*）刊登了一幅有名的漫画，画的是一件巨大的斗篷罩在空无一人的王座上，说明文字是：不列颠尼亚哪儿去了？更早的时候，还有人在白金汉宫的栏杆上贴了一张讽刺海报，写的是："此处房屋……因新主人经营不善，故招租或出售。"

有很多人试图说服女王出山，结束这种损害政治的隐居生活。但是，却有一个男人，坚定地"保护"女王，把这些说客一概打发走了，而女王在挥之不去的哀痛当中，也似乎能够依赖这个男人——巴尔莫勒尔宫的苏格兰男仆约翰·布朗（John Brown）。布朗以前深受阿尔伯特赏识，于是众人很自然地把布朗推荐给了女王。对女王来说，布朗变成了一个不可或缺、无处不在的存在，女王给布朗的权限之大，难以想象，是她的秘书、子女、大臣远不能及的。而让他们又惊恐又尴尬的是，布朗竟然会管女王叫"婆娘"。布朗还会对女王的穿着评头品足，给女王推荐当天最好的日程安排，而且一直保护她不受外界"纠缠不休的各种请求"的影响。女王则创建了一个特别的头衔"女王内侍"作为回报。布朗会给女王安排每天乘坐的双轮轻便马车，安排巴尔莫勒尔宫的苏格兰舞会，而且有时，安排的时候还喝醉了酒。

直到1871年，威尔士王子伯蒂生了一场大病，险些去世；加上1872年2月，女王又遭遇了一次暗杀，死里逃生（布朗亲手抓住了罪犯），她才终于从一厢情愿的自我封闭中解脱了出来。迪斯雷利首相跟女王建议，为了庆祝伯蒂康复，组织一次全国范围的感恩礼拜活动，礼拜仪式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特别是因为当时的共和主义运动正在高潮期）。女王同意了。感恩礼拜在1872年2月27日举行。女王受到了大批民众的热烈欢迎。1872年7月，阿尔伯特纪念亭在肯辛顿花园举行了揭幕仪式。之前，由一家合资公司负责，修建了对面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两年后，即1874年，迪斯雷利终于让国会通过了《皇家头衔法案》（*Royal Titles Bill*），让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Queen–Empress of India），给了她一种全新的独立权威的感觉。

不过，女王自己看来，她从来没有背离阿尔伯特死后的誓言："他的意愿，他的计划，他对一切的看法，就是我的法律。"当时普遍的价值观，确实认为这是寡妇正确而得当的职责；同样，人们也认为，在婚姻存续期间，妻子的全部职责，就是把自己的意志，融入家庭生活的意志。当时有一位寡妇作家，与盖斯凯尔齐名，名叫玛格丽特·欧丽梵（Margaret Oliphant）。出于需要，她写起了通俗小说，一生写了一百本。然而，舆论对她的态度，更多是同情而不是敬仰。因为，她本应恪守女人的本分，

保护家庭的尊严，不受男性主导的丛林——资本主义市场的侵犯；相反，她竟然做起了赚钱的事业。这怎么能跟女人的天职兼容呢？维多利亚忍受丧亲之痛的一段时间，英国出版了三本论述“妇人命运”的书，被人奉为神明。以上观点，正是这三本书所主张的：第一本是考文垂·巴特摩尔的抒情长诗《房中天使》（1854）；第二本是约翰·拉斯金的《论女王的花园》（*Of Queen's Gardens*），这是他1865年在曼彻斯特讲的两门课程中的一门，后来出版，改名《芝麻与百合》；第三本最重要，是伊莎贝拉·比特恩（Isabella Beeton）夫人的《家庭管理全书》（*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1861）。这三本书都极为畅销。《芝麻与百合》第一版卖了160000册，主要在于，当时的所有女子学校一发奖品，肯定就发这本书。不过，跟《家庭管理全书》一比，《芝麻与百合》就小巫见大巫了；《家庭管理全书》1870年之前卖了200万册。不过，这三本书，并没有把家庭妇女描写成只能永远服从的角色。拉斯金尤其反对那种认为女人只是“主人的影子和侍从形象”的“愚蠢的谬误”。实际上，这些书籍之所以畅销，一大原因就是书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女人有着巨大的力量，这力量并非浪漫主义的吸引力，而是更加具体实际的力量。

考文垂·巴特摩尔和比特恩夫人，在崇拜“壁炉与家庭”的组织当中，作用堪称一对互补的“书立”。诗人巴特摩尔歌唱着“妻子”身份的卓越之谜，《家庭管理全书》则提供了1000多页的指导，告诉妇女应当怎样确保“圣殿”——家庭能够打理得一尘不染。巴特摩尔的作品是供高层女祭司所用的祈祷文，比特恩夫人的作品则是家庭控制管理的详尽手册。比特恩夫人的巨著，开篇第一段就明白地表达了这个含义：“家庭的女主人的职责，就如同军队指挥官、企业领导人的职责一般。”拉斯金的立场则更加复杂。他的课程标题就暗示了，这些用散文形式呈现的课程，给“女王”加上了“女祭司”和“将军”的隐喻。女王的职责，不光是确保臣民的枕头蓬松，让人睡得舒服；也不光是确保烤肉能够及时做熟。女王还有更加高尚的责任，保护社会免受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的侵蚀。家庭的反自由主义，就是一种屏障，保护社会免遭市场凶猛的冲撞。应当保证家庭大门里面，还有其他的基本原则能够实施，而不是互相竞争的个人主义——家庭是“和平之地，保护人不受伤害、恐怖、疑虑、分裂困扰的避难所”。

然而，倘若拉斯金的个人品质被公众所知，他开药方的信用就不会这么好了。他28岁时，娶了18岁的艾菲·格雷（Effie Gray），但艾菲当时正迷恋一个画家，这场婚姻彻底失败，两人连夫妻之实都没有。拉斯金写下《芝麻与百合》的时候，正在为了他自己的百合而神魂颠倒。这是一位青春期少女，名叫露丝·拉图什（Rose La Touche），拉斯金是她的辅导教师和人生导师。后来，拉斯金自我欺骗，觉得露丝应该做他的妻子。拉斯金一求婚，露丝惊恐万状，赶紧逃开了。露丝在先，被拒绝的拉斯金在后，两人都发生了精神崩溃，症状差不多一样严重。危机的爆发，完全是因为拉斯

金的角色转换得太突然了。开头是受人尊敬的教师，道德和智慧的守护者，现在摇身一变，突然要当恋人和丈夫。拉斯金之所以没有看到越来越大的灾难，正是因为《论女王的花园》明确表示的观点：他想象着女人通过大量阅读，就能够从索然乏味的、对丈夫的服从中解放出来，也从关于时尚的无用唠叨中解放出来，转而让自己的身份，变为与男子平等的存在。就着早餐的橘子果酱，女人应当发表艺术、哲学、道德的观点。

然而，不同于维多利亚时期那些更加传统的家庭美德的立法者，拉斯金其实并没有坚称，女人仅仅属于家庭。他说："男人有一种个人的职务，或曰使命，那就是扩展另一半的领域，这领域包括自己的家庭、公众的职位，或是与国家相关的使命。所以，女人也就有一种个人的职务，或曰使命，同自己的家庭、公众职位、国家使命相关，这也是那种事物的扩展。"拉斯金说的"那种事物"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任何事物，能在世间帮助他人，特别是外面的穷人，建立自己的家庭。他又说："女人在家门之内的任务，是秩序的中心，痛苦的镇痛膏，美的镜子；她也同样有在家门之外的任务，而在家门之外，维持秩序要更加困难，痛苦要更加切近，美好也更加难以寻找。"《芝麻与百合》赚了很多钱，使得拉斯金能够帮助多名年轻的女慈善家和改革家，例如奥克塔维亚·希尔（Octavia Hill），用这种方式成为"房外天使"。希尔的祖父是著名社会改革家罗兰·希尔（Rowland Hill）。拉斯金跟女孩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才只有15岁。尽管她还单身，而且显然投入的事业并非做妻子和母亲（至少在她40岁之前），但拉斯金还是把她视为给其他众人创造家庭的人，就算不是为自己创造家庭。拉斯金资助奥克塔维亚，建立了"慈善组织协会"，买下了第一批伦敦公寓大楼，改造成了"改进型"工人家庭的居所。然而，奥克塔维亚的目标，不仅是改造建筑，还要改造租客。她的志愿者去收租金的时候，都带着一堆表格，让租客们填写，写出他们这一星期都做了些什么。他们说："酗酒、道德败坏、游手好闲的人，不要指望得到慈善零花钱的救助，除非他们能够向委员会证明自己确实要努力改造。"积习难改的行为不良者和惯犯，会作为道德疾病的传染源而被赶出公寓。在拉斯金看来，这是"女王式"力量发挥良性作用的最佳范例，能够让先前充满尘土和喧闹的家庭变得一片和谐，让野兽的巢穴变成一个美和信仰的所在。

但是，假设有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妇女，快活地嫁了人，那么她果真会有勇气，给家庭引入某种更适合外在世界的业务吗？这种业务，尤其是"外部装饰"性质的业务，能否与家庭的性质相容？或者，它会不会无可避免地污染拉斯金称为"纯洁圣殿"的神圣性？为了测试这一点，维多利亚只需要做一件事：赶着马车，在怀特岛的弗雷什沃特（Freshwater）路上走上几英里，路过她颁奖的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的住处"蒂姆勃拉"（Dimbola）。这所宅邸是两座放大版的农舍，从1863年起，这里成了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摄影师——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的照相馆兼住宅。

19世纪60年代的摄影界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上流社会的业余人士，把摄影当作艺术；另一派是专业人士，拍摄的主要是旅行、文学、军事领域的名人、警察和医学档案照片。还有一个更加隐秘也更加有利可图的市场——色情业。摄影器材和照片处理的过程，花费十分可观，尤其是用化学方法还原的硝酸银，需要涂在玻璃板上形成感光层，还需要用金质的调色剂来调色。这就让这种爱好只能局限在中产阶级上层和贵族中间，他们经常在自家的摄影棚和暗房里工作。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的前辈当中，最伟大的一位，要数克莱门蒂娜·霍瓦登女士（Clementina,Lady Hawarden），出身爱尔兰贵族家庭。可惜，她42岁英年早逝，她那独具特色而又充满情欲的天分也戛然而止。她的宅邸位于爱尔兰的邓德拉姆，这儿是她最早的摄影棚之一。后来，她和丈夫搬到了南肯辛顿，距离博览会只有一箭之地。在这儿，她给自己的公寓加盖了一栋附属建筑，专供摄影之用，还用自己两个正值青春期或者已过青春期的女儿当模特。尽管她的风格独树一帜，但却没有对摄影界的权威造成什么困扰或挑战，顺理成章得到了英国皇家摄影学会颁发的奖项。她在伦敦办了三次影展：第一次是1865—1866年，在P.D.科尔纳吉画廊（P.&D.Colnaghi）；第二次是1866—1867年，在法国画廊；第三次是1867—1868年，在德国画廊。因为自己的贡献，她获得了一枚银质奖章，还得到了应得的热烈赞扬。

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的故事则完全不同。她的家庭来自殖民地，这一点不仅令人尊敬，而且令人安心。她原名茱莉亚·帕特尔（Julia Pattle），爸爸是英裔印度人，妈妈是法国人，她兄弟姐妹一共七个。然而，帕特尔家的女孩子们，却在印度出了名，人称“古怪美人”。然而，这些姑娘却喜欢艳丽的印度丝绸和披肩，而不喜欢太太们应有的、端庄严肃的维多利亚式衣服。理所当然，这些姑娘拥有了很多倾慕者。有个倾慕者写道：“看到这些姐妹花中的一位，飘然走进房间，身穿的袍子从眼前横扫而过，衣褶落下，几乎可称作奇观，令人难忘。她们一丁点儿也不在意，自己在公众眼中的形象。”1838年，23岁的茱莉亚走进了一场很认真的婚姻，嫁给了查尔斯·黑·卡梅隆（Charles Hay Cameron）。他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古典主义学者，立志要在伦敦大学当一名道德哲学教授，却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担任基督教的圣职。但卡梅隆此时已经事业有成，加入了总督顾问委员会（Governor-General’s Council）和锡兰[注]的法律专员，在锡兰拥有大片种植园。

1848年，查尔斯·卡梅隆忽然放弃了全部家产，辞职跟茱莉亚回了英国。在英国，他显然想再次把自己贡献给“更加崇高的事物”，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论述崇高与美的概念。当时有一个家族名叫普林塞普（Prinsep），是在印度研究东方学的世家，在伦敦则是画家和诗人。卡梅隆一家，经过普

林塞普家族的介绍，进入了上流的沙龙社会，这里的参与者有诗人丁尼生，还有伟大的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爵士（Sir John Herschel）。茱莉亚在弗雷什沃特拜访丁尼生的时候，看见那两间农舍改造过了，变成了“蒂姆勃拉”。一家人就带着孩子定居在这里，而查尔斯·卡梅隆呢？他即使没有变成书海遨游的隐士，也变成了一个即将遁世的哲学家。丁尼生有一次看见卡梅隆在卧室里睡着了，“胡子浸透了月光”。

可能在1863年年初，茱莉亚48岁的时候，别人送给她一架照相机。当时的照相机都是一个沉重的大木匣。没多久，茱莉亚就把“蒂姆勃拉”一间盛放煤的仓库改造成了暗房，把鸡舍改造成了“我的玻璃屋”——摄影棚。有很多关于她事业的文献，都把这个开端看作“热情的产物”，觉得她这个业余分子，需要一种爱好来填补“怀特岛上中产阶级彬彬有礼的仪式”与“前拉斐尔派一批又一批来访者”之间的时间空白。其实，显然从最初的家族文件开始，茱莉亚打算从事的工作，就要严肃得多，无论从艺术上还是从商业上。锡兰的咖啡一次次歉收，卡梅隆家族的光景也越来越差。然而，查尔斯却越来越沉迷书斋，一点儿也没有打算或者有能力去恢复失去的财产。1866年9月，茱莉亚的女婿查尔斯·诺曼（Charles Norman），写信给茱莉亚的赞助人之一，请求1000英镑贷款。信上说：“最近两个月，我的岳父身无分文，债务也随着各种生活必需品的账单而迅速增加。”所以，不论茱莉亚是否始终希望做一位专业摄影师，她如今都感到，为了家庭，必须成功不可。克莱门蒂娜·霍瓦登女士比较有钱，可以在一次义卖集会上出售自己的作品，供“女子艺术学校”（Female School of Art）用钱；而茱莉亚却不得不出售作品自己挣钱。不过，她虽然把摄影当作挣钱的正式工作，却不会损害她的美学标准。她的一位模特相信，卡梅隆夫人“有一种信念，她一定要让摄影出现革命性的进步，挣到大钱”。挣大钱需要花大钱。查尔斯显然既担心岳父，也担心岳母，他向一位债权人报告说，“上次我明确告知了母亲，这一方面的任何帮助都可以给她，而且，她未来是快乐还是困顿或痛苦，完全取决于她本人”。

然而，自己开拓道路，正是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寻找的机会。而且，她足够坚强，可以坚持下去。她一些丁尼生风格的、光彩照人的圣母像，以及蒙着轻纱的少女像，非但没有削弱女人当时更为梦幻的刻板印象——“纯洁与热情的化身”，反而增强了这种印象。不过，茱莉亚自己可没有这么天使般超凡脱俗。她雇不起帮手，只得一切脏活都自己干：加工湿润的火棉胶，污秽了手指，涂上硝酸银感光剂，确保玻璃板在湿润的条件下暴露出来，显影、定影、冲印照片。她的肖像照片和“诗意的”实验作品，主要特征，是一种极有表现力的特殊光影效果；这种效果，需要自然光才能充分表现。而弗雷什沃特的天气阴晴不定，不总是晴天，所以她摄影的曝光时间就格外漫长，有时候需要10分钟以上。不论她自己的孩子，还是家里的仆人，还是那些名人，例如画家、雕塑家乔治·费德里科·沃茨

（George Frederic Watts），前拉斐尔派创始人之一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托马斯·卡莱尔，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爵士，丁尼生——全都被迫摆成一动不动的姿势，一直摆到难以忍受。赫歇尔是当时全英国最有名的人物之一。茱莉亚命令他必须洗过头发，这样她就能用自己乌黑的手指，让赫歇尔的头发变蓬松，得到满意的天才肖像：背光照亮，一脸震惊。卡莱尔一些最有名的照片，堪称艺术史上最为捉摸不定的头像照片，看得出来，他非常不安。然而，摄影师却把这种不安变成了优势。她认为，卡莱尔的头，就是“米开朗琪罗雕塑的粗糙版”。不过，卡莱尔的性格也是有名的不安和善变。所以，茱莉亚拍的卡莱尔的头，就同时具有“不朽”和“精力旺盛”两种品质，宛如“卡莱尔火山”的猛烈震动，宛如“黑灯笼里面火光”的燃烧。

可以想见，茱莉亚操纵对焦与曝光，到了极端的程度，于是摄影协会就不赞成了，嘲讽她拍摄的一系列“失焦的名人肖像”是“俗气的下流之物”，明明技术不过关，却伪装成了诗意的感觉。《摄影杂志》刊登了一篇典型的讽刺评论，说道：“我们必须赞赏这位女士的创新勇气可嘉，然而，这种勇气的代价，则是其他一切摄影质量的丧失。”茱莉亚名气越大，评论就越恶毒：“委员会非常遗憾地表示，无法认同非摄影专业给予她作品的盛赞。委员会确信，她在设法具备基本的艺术修养之后，将会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表现她那些诗意的理念。”这种讽刺的潜台词当然是，女人当中，除了极少数克莱门蒂娜·霍瓦登女士那样高尚的业余人士，其他人都必须掌握一种必要的摄影技巧——清晰度，否则就没有理由炫耀自己的作品。当然，清晰度就如同“举重”，以及那些“浸透了化学反应的摄影加工步骤”，是一种内敛的机制，一种含而不露的艺术。而茱莉亚拍出来的那些模糊的、梦幻一般的东西，同主流的理念格格不入。

然而，茱莉亚就是跟“清晰”不对付。她完全无意给大自然制作呆板的、分毫不差的复制品。她的目的，是用这带着镜头的机器写诗。浪漫主义时期，文艺界有一种探索行动，探索的是内部感情，如愤怒、悲伤、喜悦、狂热的幻觉，如何表现在外部。茱莉亚的作品——让摄影协会如此惊慌失措的这些“人头”，目的在于把这种探索再向前推进一步，创造出身为“英雄”的思想家、艺术家富有表现力的影像。茱莉亚喜欢拍古装照片，同样赋予这些照片一种诗意的感觉。尽管她让镜头中的孩子、仆人、愿意配合她的朋友，沐浴在散射光中，但她偶尔也能故意操纵模特的自我意识，让她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有时候，这种操纵还显得不近人情。她给一个16岁的女演员爱伦·特里（Ellen Terry）拍过一张极美的照片，特里9岁登台演出。这张照片题为“悲伤”（Sadness），恰如其分，因为当时特里嫁给了已经46岁的艺术家乔治·沃茨，早在俩人到弗雷什沃特度蜜月的时候，这场婚姻就分崩离析了。注 另外一组佳作，是卡梅隆养女库勒涅·威尔逊（Cyllene Wilson）的照片。库勒涅的生父是一位严格的基督教福音派牧

师，主张“人们要么忏悔，要么受诅咒”。威尔逊是绝望，特里是悲伤，在感情上呈现不同的两极。茱莉亚为了获得库勒涅脸上的绝望表情，把她锁在一个柜橱里几个小时，直到库勒涅自然而然显出这么一张脸。最后，库勒涅也许觉得这种折磨难以忍受，结果离开家庭，奔向大海，嫁给了一个大西洋轮船公司的工程师，30多岁的时候在阿根廷死于黄热病。

茱莉亚的事业很成功，但似乎还是不够成功。摄影协会对她敬而远之，她就从另一条渠道拿到了赞助，来自丈夫的一个伊顿老朋友——银行家塞缪尔·琼斯·劳埃德（Samuel Jones Loyd），爵位是奥弗斯通男爵（Baron Overstone）。她把自己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分配给了劳埃德，用以换取投资。她在意大利出版商保罗·科尔纳吉（Paul Colnaghi）的画廊办了摄影展，卖了作品，又跟单色版印公司签了合同，让公司出版她摄影的碳复制品。为了不受盗版所害，茱莉亚按照当时刚通过的《版权法》（Copyright Act，1869），给自己的505张照片做了登记，公众因此认为，她想尽可能利用自己的特色和名声来挣钱。在交易商和出版商的努力之下，她的作品终于出了名。然而，家庭的败落还是发生了。1875年，家庭的财富如同蒸发一般，变得无影无踪。茱莉亚和丈夫回到锡兰，1879年她在锡兰去世。尽管当时印度一带的摄影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但他们热衷拍摄的是寺庙和茶会，并非茱莉亚的兴趣所在。她拍的照片越来越少，最后干脆不拍了。不过，她一生的成就，足以消除那些歧视“女艺术家”的人脸上的轻蔑。

卡梅隆给丁尼生的《国王的田园诗》（*Idylls of the King*，1874—1875）拍了一组照片当作插图，女王因为怀念阿尔伯特而非常喜欢这首诗。几乎可以肯定，女王也通过她的作品而知道了她，不会排斥女人当摄影师。然而，女人当医生就要可怕多了。哪怕是想一想，女孩子竟然会熟悉人体各种恶心的细节，女王也会认为这是骇人的下流行为，不要说女孩子跟男人一起解剖尸体了。而那些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的勇敢先驱，只能借着假装学习护理的机会，学习医学。矛盾的是，护士尽管对活着的人体同样熟悉，舆论却认为护士的工作不那么吓人。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去世的同一年，米德尔赛克斯医院（Middlesex Hospital）发生了一件大事，让考官们大吃一惊。有个25岁的女孩子，名叫伊丽莎白·加勒特（Elizabeth Garrett），参加了教学医院的资格考试，而且拿了第一名。她的名字是缩写，写成了“E.Garrett”；考官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女人。加勒特的父亲，是萨福克郡（Suffolk）一名富商。加勒特15岁就不上学了。她本来应该按部就班，准备嫁人当家庭主妇，还可能会通过拉斯金式的教育学习读书绘画；然而，她脑子里却打着别的主意。有个美国女医生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Elizabeth Blackwell），做了一番演讲，改变了加勒特的一生。布莱克威尔生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后来移居美国。1849年，她28岁的时候，当了全美第一名被正式任命的女医生。后来她在欧洲继续钻研医学。同

年，她在巴黎的妇科医院工作时，不幸左眼受到感染而失明。据她叙述，这所医院确实欢迎女性雇员，但身份只是“男医生的半文盲的补充”。之后布莱克威尔又回到美国。1853年，她在纽约的公寓楼里建起了一所只有一个房间的药房。1857年，她终于成立了“纽约女子医学院”（New York Infirmary and College for Women）。简而言之，她是一个活着的传奇。

伊丽莎白·加勒特也下了决心，要在英国做出一番事业，就像布莱克威尔在美国的事业一样。加勒特的富翁爸爸一开始看到女儿这么鲁莽固执，非常担心。但后来还是被女儿说服了，资助她表面上的护士学习，包括她在一所医学院的课程。尽管男生排斥她，学院也不让她参与全程解剖，她还是不屈不挠，买来尸体碎块，在自己卧室里解剖。

1861年考试事件之后，米德尔赛克斯医院恳求加勒特，不要把考试结果公布出去。然而，此时《英国妇女杂志》登了很多文章，呼吁成立一支女医生大军，专门研究妇科与儿科医学。大概是得到这些文章的鼓励，加勒特还是决定公开结果，当时的舆论把这件事当成医疗业的丑闻。加勒特还申请就读伦敦大学，得到了一位倾慕者——自由党政治家格莱斯顿的推荐。为此，大学评议会专门举行投票，投票结果是10票赞成，10票反对。伦敦大学名誉校长，第二代格兰维尔伯爵是格莱斯顿的同事，他公开声明反对格莱斯顿的推荐，结果加勒特被拒。1865年，加勒特又参加英国药剂师协会（Society of Apothecaries）的考试，合格了。协会发现自己的疏忽，大为恐慌，赶紧通过了一个章程，不让女人当药剂师，而且有追溯效力。1870年，在巴黎，加勒特成功做了两台手术，而且通过了法语的笔试和口试，巴黎大学终于给她颁发了医学学位。然而，女性立志追求医学的战役，还远远没有结束。也是在1870年，有五位女性，为首的是索菲亚·杰克斯–布莱克（Sophia Jex-Blake），想要参加爱丁堡大学的医学考试，结果有人几乎掀起暴乱，对五人进行人身威胁。考场门口围了一堆人，百般嘲讽这五个女人。她们好不容易才挤到门口，刚进去，紧接着就有人赶进去一群绵羊。不管当时的女性是否讨厌婚姻，在这条路上，却经常是支持她们的丈夫给了她们力量。加勒特也嫁给了蒸汽船的船主安德森，名字改成了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她终于能开设自己的“新女子医院”（New Hospital for Women）了。

加勒特一直拒绝承认社会给女性安排的工作范围。19世纪70年代，像她一样叛逆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十年之间，伦敦博览会鼓吹的口号“和平、繁荣、自由贸易”（Peace,Prosperity,Free Trade），听起来越发不和谐。19世纪60年代后期，银行业发生了很多变故与合并，商业的擎天巨柱动摇了。在欧洲，“不列颠治世”似乎也无力阻止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有些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与帝国，在战乱中形成了。此时，大众传媒也逐渐兴盛起来，急需各种耸人听闻的材料。爱尔兰的暴力冲突、巴尔干半岛的虐

杀事件，给传媒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大字标题。然而，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图书馆和辩论团体当中，已经产生了更有颠覆性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的《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1871）。

伊莎贝拉·比特恩规定的职责之外，这一辈的母亲一代和祖母一代人，虽然也在渴求更多的事业，但这些事业至少能被基督教疗愈和慈善的工作填满。现在，局势不一样了。达尔文自己常常抗议说，他的理论的各种影响，并非能对信仰造成威胁。若是如此，这种抗议，还是至少有一点不真诚。实际情况是，信仰的一大保护伞，乃是信仰的权威；而这权威的基础，是上帝的直接启示。如今，达尔文却给世人看了一个道德上漠然无情、正在自行进化的宇宙。这种理论一旦被人看过了，消化了，相信了，就会至少有一些博览会前后出生的女孩子，觉得很难再屈服于男权的宗教王国。这时的女性，不再需要旧日的福音"教堂和家庭"，而需要新福音"教育和工作"。而且，既然竞争，适者生存的斗争已经变成了世界运行的真理，那么女性为什么还要在斗争面前退缩呢？拉斯金恳求"女王们"采取超脱的态度，反对那些尘世中喧扰而疯狂的推搡、忙乱。但是，却有一批女中豪杰，她们是女子高等教育的佼佼者，也是一些更加有野心的女性工作的成功者。这些豪杰提出了相反的主张：女人正是需要接触更宽广的世界，才能成为更好的妻子、母亲，至少也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女王"需要从花园走出来，走进都市的丛林。

当然，拉斯金本人不反对女子教育，还一直在资助女子教育事业。但是，他也明确主张，教育的内容，决不能超过男子所认为适当的科目；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让年轻女子成为更有趣的妻子和伴侣。换句话说，"房中天使"如果能在饭桌上谈论意大利画家丁托列托和丁尼生，就比单纯谈论裙衬（19世纪一种女子服装）和窗帘长度好得多。伊丽莎白·加勒特有一个朋友和同龄人，名叫艾米丽·戴维斯，是之前提到的朗豪坊成员之一。戴维斯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女性受过教育，则婚姻确实比不受教育的女性要来得幸福。但是，她要求的教育，不止是为了训练出可爱的妻子。戴维斯曾经呼吁，伦敦大学应该授予女生学位，结果失败了。她写道："我们所主张的只有一点，即女子的智慧……应该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了这一目的，不仅要让女性接受基础教育，还要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有一些男人坚持说，女人在生理上就不适合研究数学或者科学。戴维斯质问他们：有很多男人也毫无疑问有着同样的问题，那么他们怎么知道女人在生理上不适合这些工作呢？戴维斯最为憎恨的是，很多女人自己也接受了所谓女人"精神空白"（mental blankness）这种侮辱性的假设。

伦敦大学显然不支持贝德福德学院和女王学院授予女生完整的学位（直到1878年），因此戴维斯本人，这个福音派牧师的女儿，在1866年开始筹

款，想要建立一所女子大学。1869年，剑桥市北方几英里远处的希钦学院（Hitchin College）敞开大门，招收了六名本科生。四年后，学院重新开放，改名“格顿学院”。戴维斯长期为了证明女性的智力不输给男子而奋斗。她也从奋斗中获得了动力，坚持让学院的课程与剑桥教务部门的课程完全相同。戴维斯有一个同事，是道德哲学家，名叫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在大学教授经济学。亨利1871年建立了一处女生宿舍，1880年又扩展成了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关于“什么样的教育对女生的学习和专业技能最有利”，亨利和戴维斯意见不一致。亨利认为，可以让古老的规矩在男性的“神学院”里腐朽，与此同时，女人将会成为拥抱各种新科学的急先锋：经济学、历史、现代哲学、政治学。这就会让她们更适合成为全面发展的世界公民。不过，戴维斯却不同意只有“非正规的”教育才适合女人。如果“证明她们的智力与男人相等”，就必须让女生强制参加希腊语考试，那就参加吧！

至少，同样重要，而且对女人命运同样有革命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格顿学院等地方，给女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另外的家，一个志同道合的社团。每一位格顿人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是每天一桶煤，用来烧火，这样她就能在自己的书房里获得全面自由了。不过，有时候，孩子的兴高采烈，也会变成父母毫无掩饰的不快。从女子学院出现开始，所有的父母，只要有了上大学的孩子，都会明白这一点。格顿学院有个女孩子名叫海伦娜·斯旺威克（Helena Swanwick），后来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妇女运动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Women's Movement*，1913）。她这样回忆自己刚刚上学的生活：

我的书房门一开，我看见了自己的炉子、自己的书桌、自己的安乐椅，还有阅读灯——啊，还有我自己的大水壶！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可是，妈妈却转向我，张开双臂，含着眼泪说：“奈儿（Nell，海伦娜的爱称），你只要愿意，现在就可以跟我回家！”想想这时候我该多难受！太可怕了……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才能好好地掩饰真正的感情。我竟然能有自己的书房，还有人告诉我，我只要在门上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就绝对不会有人来敲门！这么好的条件，让我高兴得睡不着觉！

大学的意义，不管是为了婚姻市场而作的一种闲散的准备，还是培养新的专业人才的过程，都代表了自由、自我发现、独立的开始。格顿学院另一名女生，康斯坦斯·梅纳德（Constance Maynard）回忆说，当初在家里，自己和妹妹都“被关起来了，好像鹰被关在鸡窝里一样”。而今可好了：“终于，终于，我们漂在了一条小溪上，溪水有了一个真正的目的地，哪怕我们还很不清楚是什么！”这些女孩子，有一些可能会进入别的学校或者大学学院教书，这样就能培养出未来的同道中人——志向远大、思想独立的年轻女性。比如，康斯坦斯·梅纳德后来就上了伦敦大学西菲尔德学院

（Westfield College）。其他人，例如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的妹妹——米利森特·加勒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则结了婚，重新创造当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与哈丽雅特·泰勒那样平等而智慧的婚姻关系。米利森特嫁给了政治经济学家、激进派政治家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福西特是格莱斯顿第二届政府的邮政大臣，1884年去世。米利森特没有专心守寡，不问世事，而是从事了一份直言不讳的工作——宣传公共事业。牛津剑桥系统的女子学院，包括萨默维尔（Somerville）、圣休斯、纽纳姆、格顿。这些学员的第一届女毕业生当中，有将近30%一直没有结婚。这些女生，看到了大量证据，证明伦敦的贫富差距极大，而且还在增加。于是，有很多人决定，不仅要抛弃家庭主妇的生活，还要抛弃整个维多利亚式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独立，扩散到工厂和贫民区。1887年，妇女大学睦邻中心在伦敦自治市萨瑟克（Southwark）区开设了第一批宿舍。牛津剑桥系统各个学院的女孩子们，就在这里，跟伦敦一些最贫穷的人生活在一起。

19世纪80年代，很多刚成年的女性，如果有幸成为中产阶级，四下一看，确实会看见很多好事。到1882年，已婚妇女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权。9年之后，又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丈夫因为妻子拒绝发生性关系而拘禁妻子，禁止丈夫用粗细超过本人拇指的棍棒殴打妻子。19世纪80年代中期，女性还有可能参加某些地方选举投票，以及学校董事会投票。1885年，至少有50名妇女被选为伦敦学校董事会成员，其中包括哈丽雅特的女儿海伦·泰勒。此外还有一些“媒介事物”，虽然不起眼，颠覆性却不小——弹簧锁钥匙、支票簿、自行车。这些东西，都会让《房中天使》作者考文垂·巴特摩尔幻想的那种生活成为历史：女性应该稳稳当当住在家庭的圣殿里，当个女祭司，与外界彻底隔绝。

然而，你如果碰巧是伦敦东区的15岁女孩子，为了不挨饿，需要挣得一两个英镑，那就顾不得“守贞”的大道理了。中产阶级的女性改革家，最早介入流浪女孩的生活，是在19世纪50年代。在改革家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领导之下，改革家们加大力度反对《接触传染病法案》（Contagious Diseases Act，1864）的双重标准，该法案要求对妓女进行不留情面的身体检查，而对染有性病的男性嫖客却没有任何规定。终于，法案在1883年被废止。同年，性行为自愿年龄从13岁提升到了16岁。这要归功于《蓓尔梅尔街公报》（*Pall Mall Gazette*）编辑威廉·托马斯·斯戴德（William Thomas Stead）。当时他揭露伦敦东区有“买卖处女”的嫖娼现象，有人说这纯粹是他臆想出来的，是造谣。为了证明自己说了真话，斯戴德亲自赶赴东区，自己买下了一名女孩子，写了她的遭遇，然后把她交给了基督教慈善组织“救世军”（Salvation Army）。

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有整整一代人致力于揭露自鸣得意的言论，反对英

国妄自尊大，斯戴德是其中最能言善辩的人之一。与此同时，时间就接近了1887年，英女王登基50周年（Queen’s Golden Jubilee）。1868年，女王把去苏格兰的见闻摘选了一些，编成《日记留影——我们的苏格兰高地生活》（*Leaves from a Journal of Our Life in the Highlands*），配有她和生前的阿尔伯特，与佃农一起喝茶的照片，佃农们都满怀敬仰地看着夫妻二人。这本日记第一版就卖了2万册，后来还出了一本续集。然而，斯戴德并不想让中产阶级去看这本续集，而是想让他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伦敦郊区的贫穷现状，去阅读乔治·西姆斯（George Sims）的《贫民生活》（*How the Poor Live*，1883）。斯戴德深感忧虑的是，大英帝国还在不停地自吹自擂。1885年，苏丹总督查尔斯·戈登将军（General Charles Gordon）在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被杀，英国国内把他当成烈士，一片呼天抢地，悲痛万分，但斯戴德却觉得这种悲痛非常做作。他还反对各种吹捧女王的炫耀举动，说这些只不过是大量的粉饰，想掩盖一个巨富和赤贫严重分裂的社会。斯戴德的悲观主义到处传播。一次，年轻的萧伯纳警告说，单纯的人口膨胀，就一定会带来报应：“你的奴隶们像兔子一样，不停地繁衍后代，而他们的贫困带来了肮脏、丑陋、欺骗、疾病、低俗、酗酒、谋杀。他们为你把财富堆积起来，而在财富中间，他们的痛苦却在加剧，正要把你窒息。你感到恶心，想要躲避到城市另一端去，而他们依然把你团团围住。”

“繁殖”与贫穷之间的联系太明显了，从而促使一位当时最勇敢的女性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努力采取了措施。她是林肯郡一个牧师的妻子，但是夫妻没有什么感情。1877年，安妮·贝赞特跟一名无神论者兼共和主义者、国会议员查尔斯.布拉德劳（MP Charles Bradlaugh）一起被人送上法庭，罪名是淫秽。两人的罪过在于重印了——《诺尔顿手册》（*Knowlton Pamphlet*）。它最早是1830年发表的，起了个隐晦的书名《哲学的果实》（*The Fruits of Philosophy*），但内容全都是关于避孕的实际建议。贝赞特与布拉德劳都相信，追求时尚的阶层若是掌握了这样的知识，而且应用得越来越多，是非常好的事。然而，对工人阶层而言，这样的知识，则是保命的必需品；没了它，别说存钱，糊口都不可能，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经济困难的时候。贫困的家庭如不能设法控制人口，之前那些高尚的慈善家，如拉斯金资助的奥克塔维亚·希尔，对租客的高尚的教诲，就会变成无意义的伪善。贝赞特与布拉德劳在市政厅向地方长官的办事员分发小册子，故意把事情弄得很大，好让司法机关起诉他们，这样就能吸引必要的舆论注意。

副检察长负责起诉二人。诉讼期间，他们肆无忌惮地利用了开庭的机会，在法庭上宣传性教育和节育思想。两人口若悬河，说得连法官都承认，自己觉得这案子很荒唐。陪审团不甚开明，但也发现，尽管这本书确实淫秽，但被告并无意破坏社会公德。最后法庭判决被告停止出版这本书。这

个判决当然正是他们想要的。两人毫无悬念地拒绝服从。布拉德劳进了监狱。然而，《哲学的果实》，带着对阴道栓剂、安全套、避孕棉的直白描写，还是在伪装之下畅销了几个月之久。

安妮·贝赞特因为百无禁忌而受到的惩罚，比监狱生活来得更为可怕。她的丈夫，先前已经拥有了儿子的监护权，现在又告到法院，要把小女儿梅布尔（Mabel）的监护权夺过来，理由是妻子同无神论者和传播歪理邪说的人为伍，因此毫无疑问，已经丧失了做母亲的资格。法院把女儿判给了父亲。失去了女儿，安妮曾一度陷入深深的抑郁。之后，社会主义运动把她救了出来。她在1883年写道："现代文明，是一座刷白的坟墓……外壳是亲王、勋爵、银行家、乡绅，里面充满了人的尸骨，正是这些穷人把坟墓建起来的。"2年后，她加入了费边社[注]，致力于和平、民主方式的革命。

安妮这一代人，有很多主张利他思想的年轻女性，被社会主义吸引。有趣的是，这反倒是她们接受的多年灌输——"女性应该是资本主义更加人性化、更加温和的一面"，无心插柳的结果。就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都认为，支配哈丽雅特·泰勒的冲动，是社会性的、人性化的；而他自己的理念则更加理论化、机械化。如今，自由资本主义受到了损害，而社会希望女性能扮演护士的角色，护理自由资本主义；虽然这种任务，女性并不想要，却可以借机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努力改变资本主义。这样的理念，激励了费边社另外一名年轻的创立者比阿特丽斯·波特（Beatrice Potter），她后来结了婚，改姓韦伯（Webb）。她原先在奥克塔维亚·希尔的组织，后来离开了这些慈善事业的"窥探者"，来到兰开郡巴卡普镇（Bacup），与工厂女工住在一起。最后，她编辑了社会学家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1892—1897)，一部17卷的巨著。

安妮·贝赞特也借着一个契机，开创了自己的工人运动事业。在伦敦东区，有一所费尔菲尔德工厂（Fairfield Works），隶属于布莱恩特与梅公司。这里有一群十几岁的火柴女工，处境十分悲惨。火柴女工们向来不缺参与公众运动的精神：1871年，她们在维多利亚公园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示威，反对格莱斯顿政府给火柴增税的提议。运动影响极大，连女王都愤怒地给格莱斯顿写信说，火柴税带给穷人的损失，要比带给富人的损失多得多，还会"严重影响火柴的制造与销售，而据说有大量最贫困的人口，全都靠着火柴业为生"。大会和里尾路（Mile End Road）的游行，全都被布莱恩特与梅公司无耻地利用了，他们可一点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产品被征收惩罚性的税款。后来，提议被否决。公司出钱召开了一次庆祝大会，还在堡路（Bow Road）建了一个自动饮水器。

这次示威，是公司组织的一次封建制的工厂动员。然而，17年之后，公司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年轻的劳工们把矛头指向了公司本身。1888年，斯戴德与贝赞特出版了报纸《链接报》（*The Link*），这是一家不屈不挠调查劳工现状的周报，售价半便士。报纸登了一篇文章，揭露了火柴女孩们的工作现状。每周工资只有4~12先令，至少一半要付单间的租金，这单间还一般用来和兄弟姐妹同住。女孩子们的管理制度极为残酷。如果被发现双脚不干净（没几个人买得起鞋），还要从本来微薄的工资里扣掉罚款。很多人得了一种叫作“磷毒性颌骨坏死”的疾病，这种病会让人毁容，病因是吸入了白磷蒸汽；当时很多火柴公司已经禁用白磷而改用安全但价格更高的红磷。公司对外声称，利润太过微薄，无法更加慷慨；但与此同时，公司却向股东支付丰厚的红利，股东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的神职人员。对探听丑闻的活动家而言，这可是天赐良机！安妮在《链接报》的文章里，用夸张的手法渲染了痛苦和讽刺。她问道：“你们知道吗？这些女孩子以前用头顶着箱子，一直顶到头发磨掉了，15岁就秃头了。那些在布莱恩特与梅享有股份的乡村牧师们，让你们15岁的女儿坐到膝头吧，轻轻抚摸她一簇簇的丝滑卷发，欣赏这光彩而浓厚的娇柔之美！”

为了进一步发动舆论机器，贝赞特干脆站到费尔菲尔德工厂外面，跟社会主义同事赫伯特·巴罗斯（Herbert Burrows）一起，向人分发额外印刷的火柴女孩文章。几天后，女孩子们组成一个代表团，来到《链接报》位于舰队街的办公室，告诉贝赞特和巴罗斯，公司逼迫她们在一篇否认揭露报道的协议上签名，说不签就要开除。女孩们不仅没有签名，还纷纷向《链接报》倾诉她们的故事。有个女孩告诉安妮：“你为我们说了话，我们不会反对你的。”为了反抗公司的威胁，成立了一个罢工委员会。立场最坚定，勇敢又上相的女孩子们拍了一些照片。贝赞特和巴罗斯还庄严地承诺，如果哪个女孩因抗议而被开除，工资就由他们支付。这又是一着妙棋，极大地侮辱了敌人。萧伯纳自愿出任会计和收银员，管理罢工基金。大概有1400个女孩子不再去公司上班了。布莱恩特与梅公司的声誉一落千丈，罢工又让公司蒙受了严重损失，不得不与工人谈妥了条件。1888年7月，火柴女孩们实现了加薪。安妮·贝赞特受到广泛拥戴，被称为伦敦女工的领袖。立刻就有很多其他需要工人运动的支持者前来求助，例如制靴工人和剥兔皮的工人。在毛毡工业领域，他们的工作条件，比火柴女孩更加恶劣。1888年，安妮开始从政，途径是参选伦敦东部自治市陶尔·哈姆莱茨（Tower Hamlets）的学校董事会。当时很多妇女都用这种方法当作活动平台，进入政界。她坐着一辆轻便双轮马车，车上披着红丝带，到处宣传。结果她竟然争取了15,296张选票，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刚到古稀之年的女王，是否能理解这一切，甚至同情这一切呢？答案或许不那么明确。既然女王现在已经恢复了一些公众活动，她选择的角色，就

是一位“女家长”的角色；她的母性，或曰祖母性，扩展到了那些“因富豪权势越来越大而沦为牺牲品”的英国人。女王会为他们说话，甚至会为他们采取行动。当然，富人和穷人都有道德败坏、游手好闲、对社会无用的行为，可是女王对富人的这些恶行大发雷霆的可能性，要比对穷人大得多。此外，女王还会反对那些诋毁英国工人家庭的人，专门画了一幅画，把他们画得浑身浸透了啤酒和兽性。基督教有一个教派名叫公理会，成员叫公理会教友。有一位公理会牧师，名叫安德鲁·迈恩斯（Andrew Mearns），出版了《伦敦郊外的悲泣》（*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1883），揭露东区有100万人口，生活环境非常拥挤，卫生条件极差。女王看了这本书，大为吃惊，开始向格莱斯顿政府施压，要求他们花费更多时间，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女王怒气冲冲的干预起了作用，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

女王一生扮演了许多角色：英国玫瑰、模范妻子、悲痛的寡妇。最后一个角色是帝国的女家长。此时，她真心感觉到，自己就是一切臣民的母亲，或是祖母。然而，在大英帝国越来越多的家庭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孤儿，还有数百万人在屋子门口颤抖不停。此外，为了让女王不至于因为大街上的悲惨景象而过度伤心，总是有精明的仆人，帮她合上马车的百叶窗，直到确保她能看到大批高兴的忠诚子民，才会重新打开。比如，1887年3月19日，女王五十年登基大典的时候，举行了一次调查，询问29000名男工，他们的上一份工作是什么；结果足有27%的工人回答“失业”。但女王很可能不知道。这些人里面，有三分之一，失业已经三个多月了。不过上一年，1886年2月，女王肯定注意到了某些动荡不安的迹象。失业的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有些激进派和社会主义演说家发言，谴责富人的铁石心肠，资本家的不择手段。工人前往国会广场的途中，蓓尔梅尔街的俱乐部里面，富人们对工人大肆嘲讽，从临街的窗户朝他们扔各种东西。于是游行演变成了骚乱。有人聚众抢劫商店，砸毁窗户，掀翻马车。

维多利亚认为格莱斯顿不知道怎么维持秩序，就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女王无法表达自己对前日伦敦发生的、威胁人民生命的可怕骚乱有多么愤怒。这骚乱是社会主义的临时胜利，也是首都的耻辱。女王自我安慰：英国工人的绝大多数，本性还是反对革命的。她这么想倒也不算完全错误。

为了五十年大典，女王先去了利物浦和伯明翰举行预热活动。这两个地方，她看见的全是热烈欢迎的人群，全都喊哑了嗓子；只是在伯明翰，有人提醒她，她是在“最粗野的”人群当中穿行。伦敦中心区的公园，原先睡着数以万计的失业者。夏季各种庆典期间，这些人全都被赶走了，被迫搬到更加偏远的荒地去，不让女王看到。有些人竟然把殡葬承办人院子里的空棺材，当成临时住房。不过，女王来到海德公园，只看见30000名穷苦

的小学生，脸都洗得干干净净，每人拿到了一块肉饼、一块蛋糕、一个橘子，来庆祝这伟大的日子。女王写道：“孩子们齐唱《上帝保佑女王》，还有点儿走音。”

女王真心关怀的所有人，都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她自己的大家庭，此时已经扩展成了一支小军队。自从18岁的维多利亚在那天晚上穿着睡衣被叫醒，告诉她“你就是女王”开始，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年。这一天，她坐着敞篷马车，从白金汉宫到威斯敏斯特宫，没有穿上大臣恳求她穿的朝服，而依然是平时那样，一身黑衣，戴着寡妇的帽子。马车前面安排了12名印度军官，军官前面是她的子子孙孙：“我的三个儿子，五个女婿，九个孙子、孙媳妇。后面的马车上坐着我另外三个女儿，三个女婿，孙女、孙婿。”前一天晚上，她就被这支皇家大军围住了，“王子们都身穿军服，公主们……也都服装艳丽”。过了两天，“英格兰妇女”代表团前来，代表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妇女，送给女王一件礼物。女王前往温莎城堡的路上，在伊顿公学，又接受了男孩子们的礼物。女王回忆：“有一个漂亮的凯旋拱门，造成了旧日公学的样子；男孩们也穿得像旧日的法学生，站在拱门上。夏日黄昏的太阳照在上面，漂亮极了。”怀特岛上，欢呼声如此温暖人心，女王的胖脸上居然出现了露齿的微笑。女王私人秘书庞森比的妻子——庞森比夫人说，女王笑的次数，其实比人们想象的更多。“突然，脸上笼罩了一层淡淡的光辉，嘴唇的线条向上扬起，让表情更加柔和，眼中也闪过一道慈祥的光芒。”

女王的余生也会如此——在十年之后又一场六十年庆典：整个英国沐浴在夏日的余晖中，街上人山人海，很多人挥舞着小旗；军营和煤矿的铜管乐队在演出；巨大的圆形阿尔伯特音乐厅正式开放。开幕当晚，演奏了音乐家乔治·亨德尔（George Handel）原作，指挥家汉密尔顿·哈蒂（Hanmilton Harty）改编的音乐结尾乐段。然而，这一点却提醒她，全家福当中还缺了一个人。1887年6月，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她忽然感觉一阵心痛，写道：“我独坐于此，啊，挚爱的丈夫不在身边，对他来说这该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一天！”维多利亚要再等14年，也就是1901年，才能与丈夫团聚。“国家和我都很感激他。”女王的私人秘书亨利·弗雷德里克·庞森比爵士说，女王最喜欢的就是安排葬礼，她自己的葬礼也不例外。在这个场合，为了期待二人的团聚，她会脱下寡妇的黑衣。温莎城堡旁边有一所弗罗格莫尔公园。一次，女王把丁尼生带去，让他参观那里为自己建好的陵墓：“我觉得（陵墓的设计）轻盈而明亮，他也觉得很好。”于是，女王下令给自己安排一个白色基调的葬礼。1901年1月22日，女王去世。葬礼上，女王穿着白袍，身上盖着春天的花束，有如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一位终身未嫁、80岁去世的新娘。女王随身的纪念品当然很多，有头发、戒指等，都是她自己生前安排放进去的。不过，也有一些不甚得体。她左手中握着一张约翰·布朗的照片，小心翼翼地盖在百合花、小苍兰的下面。

女王留给葬礼组织者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1862年，女王命令雕塑家卡罗·马洛切蒂制作阿尔伯特的雕像，还坚持要他制作自己的雕像，她的模样要跟阿尔伯特去世的时候完全相同。马洛切蒂把命令执行得太好了，女王的面孔更像两人刚结婚时候的样子。这样，夫妻就至少能以大理石的方式，在两人最好的年华团聚了。问题是，雕像制作的时间太早，过了将近40年，谁也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后来，终于有人在温莎城堡一间翻修过的房子的墙壁后面找到了雕像。年轻的中世纪公主，躺在自己勇敢的骑士身边，就好像钟表也和王夫的心脏一般停止了活动。

然而，阿尔伯特却比谁都清楚，英国并没有停止前进。19世纪，英国的总体趋向一直是进步的。到了1900年，进步已经把英国带到了他生前无法想象的地方。不仅是科学、技术、商业的进步，还有英国妇女们生活的进步。教育和政治，开始赋予这些“房中天使”一套更为脚踏实地的理想。而那些微小却有力的革命事物——弹簧锁的钥匙、支票、自行车，将在女性实现理想的过程中，陪伴她们很久。

英国的年轻姑娘，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当初，护送女王灵柩从伦敦前往温莎的贵族们，有一位利顿夫人，她是印度总督之一——利顿伯爵的孀妇。七年之后，利顿夫人的女儿康斯坦斯女士，成了一位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战士，绝食抗议者，曾先后被捕四次。她很爱干净，在监狱里也把牢房擦得干干净净。关于英国妇女的未来，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方式则是亵渎“纯洁的圣殿”，被狂热崇拜家居生活的人盲目敬仰的“身体”。她想要把运动的口号刻满整个上半身，一直刻到脸上。她从发夹上挑了一片碎裂的瓷釉，当作工具，花了整整20分钟，在胸口上刻下了一个大“V”字，之后才被狱警发现制止了。但无所谓了。她的外号是“阿康”（Con），阿康已经做出了宣言。这个V并不代表维多利亚（Victoria），而是代表选举权（Votes）。

---

1. 1861年12月14日，阿尔伯特因积劳成疾而病逝。——译者注
2. 战争实际上发生在1861—1865年。——译者注
3. 锡兰（Ceylon），斯里兰卡的旧称。——译者注
4. 两人结婚10个月之后离婚。——译者注
5. 费边社（Fabians），1884年成立，名字取自古罗马将军费边（Fabius），效法他渐进求胜的策略，其思想被称为费边主义（Fabianism），主张各阶层互助，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费边社曾直接推动英国工党（Labour Party）成立，至今仍作为智库而存在。——译者注

第五章　“好心”帝国的投资

“大英帝国，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积极力量！”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Lord Curzon）有信心这么宣布，而且不怕别人反对。而勋爵本人，大概就是这种积极力量的最纯粹的化身。寇松勋爵的肤色非常白，白得几乎不自然。他当印度总督最风光的日子里，看见他的人说，他有着“挤奶女工的肤色，太阳神阿波罗的身材”。（多年之后，寇松见到英国大兵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洗礼，他也会惊讶，工人阶级一旦洗清了尘垢，以及可能会有的血污，皮肤会有多么白。）总督的身板很直，那笔挺的站姿，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十几岁开始就被迫穿上一种用铁和皮革做成的后撑，而另一部分则是个人的习惯。他每天都显露出一种对自己痛苦的冷漠，类似古希腊斯多葛派（苦修派）的风格。这才是完美的元首风范，身负重担而不被压垮。

英国有不少擅长吹嘘的人，例如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西利爵士（J.R.Seeley），这些人经常大谈英国教化别人的“宿命任务”。但寇松勋爵并不需要别人给他上课。他从心底知道，他是受到召唤而登上官位的。有个朋友，出于善意，可能劝过他不必那么固执己见。寇松把他顶了回去：“我生来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我！”1859年，寇松出生在加尔各答（Calcutta）的一所宅邸，也在这里长大。这房子至少在建筑结构上，完全是他另一处房产——德比郡，肯德莱斯顿（Kedleston）庄园的翻版。1887年，寇松第一次看见了加尔各答大厦，此刻，离他当上总督还有11年。当时他就宣称，不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建筑层面，这都是“家外面的家”。18世纪，由建筑师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在肯德莱斯顿建起的这所建筑的正面，包含了一个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只不过原来的凯旋门是拱门，加尔各答大厦则把凯旋门的空缺处填充上了。于是，乔治·纳撒尼尔·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从小时候开始，就跟所有沉浸在古典主义当中的英国官二代一样，为帝国的胜利前景而激动不已。这个少年天才应该明白，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就应该生在不列颠尼亚的北部。伊顿公学、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万灵学院等名校的教育，也只会增强这种早熟的使命感，而不会减弱这种使命感。后来，他当上了英国前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的私人秘书，而索尔兹伯里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最骄傲的帝国主义者。这么一来，他的信念就更强了。寇松才32岁，就当上了印度事务部的副大臣（under-secretary），然而他并不满足。机会刚出现，他就提名自己当印度总督，引得别人大惊；等到他获得了这份工作，别人反倒不那么吃惊了。于是，这个早有征兆的机会落到了寇松头上。1899年，他入住了属于自己的肯德莱斯顿庄园。英国王室专门为他授予了新的爱尔兰贵族头衔，身边还陪着富有而迷人的总督夫人——

美国人玛丽（Mary）。这么一来，他似乎理所当然，应当被奥古斯都·恺撒的半身像所迎接了。

寇松对这些东方帝国十分了解。他走过丝绸之路（Silk Road），还写了三本关于俄国在中亚、波斯扩张野心的书，文辞优美。所以他也知道，亚洲有些帝国喜欢用建造雄伟的纪念碑，来表现自己的尊严。修建这些大厦，不只是一种俗气的炫耀。统治者有义务对臣民宣告，成为我们这样强大、恒久的帝国臣民，是非常幸运的事。而且不必说，大英帝国在第四个世纪（20世纪）的开端，好像自己的强大也会永远持续，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什么变化。寇松又为什么不该这么想呢？米字旗飘扬在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上，管辖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世纪之交，这个数字达到了3.72亿左右。1897年6月，一支5万人大军耀武扬威地行进在伦敦街道上，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这支军队来自大英帝国的四面八方：有骆驼队和廓尔喀人（Camel Corps and Gurkhas）；有加拿大轻骑兵；有穿着白色长护腿的牙买加人；统领游行队伍的，是英国陆军个子最高的人——骑兵队长艾姆斯，足有两米高。各家支持帝国主义的小报，特别是《每日邮报》（*Daily Mail*），一片狂喜；人群也都洋洋得意，喝得醉醺醺。6月22日（女王登基是1837年6月20日），全国小学生放假一天，被组织到公园里，一人发了两个面包、一个橘子，当作女王的恩典。大家高唱国歌，还有一首新的“帝国进行曲”，是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专门为六十年大庆创作的。女王这时候身体很差，面对一片狂热，只是答应在常穿的黑缎子衣服外面加上鸵鸟毛披肩的装饰。

当时也有一些清醒的人，例如英国作家吉卜林（Kipling），提醒人们，这一切有朝一日都会过去。帝国主义者们，哪怕是头脑最热的，也自然明白这一点，用不着他们专门提醒。不过，这一天毫无疑问，距离现在还很远很远嘛……寇松在加尔各答就任总督的当晚，举行了宴会和舞会。乔治穿着一件天蓝色丝绸斗篷。他后来写道：“我们传递的信息，刻在花岗岩上，刻在‘劫数的岩石’（希腊神话典故）上——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且将永远继续！”

1901年1月，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寇松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马上开始筹备女王的纪念碑。他命令设计委员会，纪念碑必须是“我们伟大历史的永恒记录，一个代表印度光荣的、可见的纪念物，比任何演说、书籍都要动人的画面，一堂关于爱国主义和公民职责的课程”。纪念碑要成为英国的泰姬陵。寇松之前曾经整修泰姬陵，之后一直念念不忘。泰姬陵前面原先有一些市场，寇松把市场迁走了，恢复了沙贾汗（Shah Jehan）精美的清澈水池。加尔各答维多利亚纪念堂也会有一些水上花园，正面还可能用马克拉纳采石场（Makrana quarries）运来的大理石。这个采石场位于拉贾斯坦（Rajasthan），之前泰姬陵的石头也是他们提供的。不过，二者的相

似也就到此为止了。泰姬陵常被人叫作“石头的诗”，是皇帝为了纪念爱妃而写下的一首挽歌。而寇松却不想用建筑来表达悲伤。他的纪念堂，更多意义在于一种宣示。纪念堂也会有一些值得借用的莫卧儿建筑风格，还会约略涉及印度教神庙的风格。但纪念堂主要还是为了用圆顶和列柱来造成一种主要的印象——这是一座现代罗马人修建的大厦；文明的传承者，这文明由智慧承载，为了正义和进步而设计。因此，把主要设计工作交给建筑师文森特·埃施（Vincent Esch），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埃施曾担任孟加拉和那格浦尔铁路（Bengal and Nagpur Railway）的副总工程师。

1904年，纪念堂破土动工。两年后，这个最坚定、最聪明、最固执的印度总督下台了，在总督府留下一部价值5万英镑的豪华电梯（如今依然可以使用），以及这样一个政府——在孟加拉地区几乎完全被骚乱、罢工、抵制运动所破坏的政府。1905年，寇松颐指气使，想要把孟加拉分割为两个省，结果引发了当地人强烈不满，让局势变得十分棘手。面对愤怒的抗议，寇松不屑一顾，说这是“数百名可怜又无知的加尔各答当地人，被人雇来张贴布告，布告上印着英语，还经常贴得上下颠倒”。然而，布告却依然毁掉了寇松的权威。上任的总督堪称一个“温和专制”的缩影，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因为通晓一切印度社会的知识而备感骄傲。这些知识从马德拉斯（Madras）大米价格，到国宴订购的鸡的数量（数量总是太多），不一而足。最后，寇松筋疲力尽，失望透顶地离开了，背后是抗议者在大喊：“祖国万岁！”（Bande mataram！）这是独立（swaraj）运动的第一个伟大口号。大英帝国的尾声，也就是这么展开的：光荣被混乱嘲讽了。英国曾设想在德里（Delhi）修建一座新的首都，后来到了1921年，这个计划被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和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实现了。同年，维多利亚纪念堂竣工。而这时，“祖国万岁”的口号，已经写到了英国总督府的墙上。新任印度总督欧文勋爵（Lord Irwin）以及后来的明托勋爵（Lord Minto）、哈丁勋爵（Lord Hardinge），都遇到了炸弹的“款待”。欧文侥幸活了下来，但“温和的帝国国运”就不那么走运了。

早在1901年，就有人怀疑，英国的统治是否是印度财富花费的最好方式。寇松宣布要修纪念馆的同一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沉痛地指出，过去10年当中，印度饥荒和疾病导致的额外死亡（印度死亡率当时一直很高，这里特指比通常死亡率还高的那些事件）至少有1900万人。或者，就像论文做的比较：相当于全英国人口的一半。而《柳叶刀》并不登载煽动性的文章。1899—1900年，可怕的饥荒席卷了印度中部和西部。据一位可靠的现代历史学家伯顿·斯坦因（Burton Stein）考证，死亡人数最少650万人，而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的数据更接近1000万人。仅在1901年，印度就有25万人死于腺鼠疫，大部分是孟买及周边的人。1903年，爱德华七世（维多利亚

女皇之子伯蒂）加冕为印度皇帝（Emperor of India）。加冕礼上，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主席拉尔默罕·戈什（Lalmohan Ghosh）用华丽的辞藻讽刺道：“要是英国、法国、美国有饥荒和鼠疫横行，死亡天使拍打翅膀的声音，连这些轻松的狂欢者都听得见了，那么你们觉得这些国家可能有任何政府，敢于浪费巨额资金去办空洞的盛会吗？”

到寇松下台的1905年，已经有300万人死于瘟疫。霍乱引发的死亡，比鼠疫还要多。19世纪80年代，印度平均死亡率已经高达41.3‰，然而到了1921年纪念馆完工，居然又升到了48.6‰！于是，吹鼓手们为英国带给南亚次大陆的物质和医疗进步，而拼命歌功颂德的时代，也恰好是整个印度现代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时代。世纪之交的干旱和疫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例如奥里萨邦（Orissa）、古吉拉特邦（Gujarat）、拉贾斯坦邦，以及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死亡率高达90‰，也就是每11个人就有一人死去。先前在1865—1866年，奥里萨邦还有一次饥荒，政府统计死亡人口有四分之一。至于牺牲者，当然没有纪念馆。不过，要是仔细看看维多利亚纪念馆前面的雕塑群，却会看见“拉贾母亲”（Mother Raj，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拟人化）的胸口，有些本地人得到了救助，感激不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些白人欧洲先生和欧洲太太，穿着高帮马靴出游，在俱乐部里跳舞喝酒，在宫廷里作威作福，拥有进账，修建铁路，赞颂他们给印度带来的幸福；这些人并不是铁石心肠、麻木不仁的怪物。他们大多数的意愿是极好的；他们也有寇松那样的自信，相信大英帝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吹鼓手们相信，帝国的伟大之处，并不能用国土有多少平方英里、国民有多少万人来衡量；更不能用军舰和加特林机枪（Gatling guns）来衡量，而要用无可争议的利他主义来衡量。的确，英国需要赚钱，也需要阻止俄国这头北极熊伸出毛茸茸的爪子来抢钱。然而，大英帝国真正的任务，是消灭贫穷、疾病、愚昧，为此需要有高贵的献身精神。让这些社会弊病折磨很久（英国认为很久，然而，实际的时间总是比英国认为的要短得多）的各个亚洲民族，将会得到治疗，恢复健康。有朝一日，印度会重新站起来，凭着自己的两条腿走路；并且让英国人判定为能够重新自治了。到了英国在印度统治结束的那一天，印度文官机构会安静地离开，留下一个感恩、勤勉、和平、安宁而自由的印度自由，就会是英国留给未来的现代化世界的特别赠礼。就算大英帝国没有了，很久以后，历史学家还会说，英国曾经让世界变得更好。

这就是所谓的托管制度（trusteeship）：经常有人引用这种展望，来给维多利亚帝国后期，军事、收税、经济上的极度扩张辩护。这些理念，确实被虔诚地遵守了；哪怕理念的实现屡遭挫败，最后被无限期推迟。英国的统治者也无疑很少发觉（虽然英国的一众对手肯定发觉了），英国的军事

和经济力量，在印度造成了很多问题，甚至是大多数问题；而他们明明声称，自己来印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英国为印度介绍“进步”“文明”理念的时候，所在的背景，也就是这些理念注定失败的背景。寇松当总督期间，全印度收入有4%用在了公共事业，例如水利事业上；却有35%流向了军队和警察。但这些糟糕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事情背后的理念从一开始就只是经济和军事独裁的遮羞布。自由派承诺用和平方式达到全社会的渐进改良，通过发展公民教育逐渐演进为自治政府（这理念的提倡者认为，它对英国的命运和殖民地的命运都很重要），时至今日，这些承诺都可以说是西方乐观主义的“高尚”的诸多失败之一。如果把西方乐观主义比作一条大船的话，那么这艘大船现在已经化为一堆沉没的废墟，深埋在现代意识的海洋中。但它仍会送出骄傲或惭愧的波浪，在当代英国生活的表面产生涟漪。于是，一切英国史的文献，就都会潜入深水，透过一片阴沉，看到实际发生的事情，不论这方面的叙述有多么短暂：宏伟的大船“维多利亚号”，究竟是怎样搁浅的？

大船的首航，洋溢着一片热情：1834年，托马斯·贝宾顿·麦考利，这位于19世纪出生的人，还处在训练阶段，要训练自己成为一名史学家。他此时的头衔包括：《爱丁堡评论》的人气散文家；追求时尚的伦敦辉格党社交圈的“雄狮”；早熟的国会演说家和议员，代表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工业自治市——利兹（Leeds）。麦考利决定，既然他银行账户上只有700英镑了，就需要挣更多的钱。挣钱的地方，傻瓜也明白，正是印度。不过，他并不是打算自己做生意，尽管利兹市倒是有很多正派人在做生意。他的目的是，通过给愚昧的亚洲带来进步，挣到一万英镑。

1833年，国会通过法案，剥夺了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职能。之前盈利的途径包括，交易靛蓝染料、糖、棉花，以及唯一稳赚大钱的营生——致幻毒品（也就是卖给中国鸦片，换回茶叶）；如今，这些途径都让私人贸易商抢走了。东印度公司彻底成了一台收税与战争的机器；或者也能说，它更愿意自认为是一个政府。当然，很多世代以来，东印度公司实质一直如此，只是披着“公司”的外衣而已。麦考利是公司“控制委员会”的一员，委员会对英国国会负责；他也是“董事委员会”的成员。于是，麦考利就有了一个任务，要在下议院为辉格党政府的政策辩护。麦考利外号是“当代伯克”，享有盛名。然而他这番演说，却并没有让听众爆满。（当然，伯克自己外号“开饭钟”，也就是他一来，大家就全都走了。）1833年6月10日，麦考利面对只有三分之一坐满的大厅演讲，主题是“英国在印度责任的展望”。这场演说口若悬河，煽动性十足，然而内容却塞满了无知与傲慢，二者相互竞争。但它仍旧是“良好动机”的自由主义帝国的宣言。麦考利甚至在绘制这番事业的开始，就在期盼它光荣的、公正无私的未来：

也许，印度的公众舆论会在我们的体系之下发展，最后超越我们的体系；

通过优秀的政府，我们大概能够教育臣民，让他们有能力明白什么是更好的政府；而印度人具备了欧洲人的知识，他们就可能在未来要求建立欧洲的制度。这一天是否真能到来，我不知道。但我绝不会企图防止这一天，或者推迟这一天到来。那一天也将是英国历史上最为骄傲的一天。若能在奴役和迷信的深渊中，发现一个伟大的民族；而对他们的统治，能让他们渴望一切公民权利，并获得这样的权利，则必然是我们的光荣。权杖或许会从我们手中让给别人；也可能会有很多突发事件，扰乱我们最基础的政治计划。胜利或许不会永远站在我们一边。然而，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追求必然存在的胜利。有一个帝国，能够免除一切自然因素导致的腐朽。这些胜利，是理性与和平战胜了野蛮；而那个帝国，也就是我们艺术、道德、文学、法律构成的，永恒不灭的帝国。

英国自从《大宪章》以来，一直在进行公民教育的长征；1832年的《改革法案》，是长征的一个里程碑。长征还要走下去，一直到所有英国人民全部变成现代公民为止。这样的长征，如果天意允许，也可以在亚洲重复，而且应当在亚洲重复。大英帝国，就如同古罗马帝国一样，做的或许是“筑路”的事业；然而，天底下最优质、最笔直（也可以说最漫长）的路，就是通往议会政治的独立国家之路。此外，帝国经济实力展现出来的美，在于它各个部件的完美组合，就如同工业机械一般，让麦考利觉得引人入胜。将“懒惰”而“迷信”的东方控制起来，用英国法律、教育、轻徭薄赋、诚实的政治管理震撼它，就能为“进步”的信仰提供必要的稳定。在这样的政府保护下，就能享有立即的幸福，城市的市场也会繁荣。只要“耕种者”们不再受到武装强盗的勒索，不受到腐败的税吏掠夺，他们就能有一些动机，为这些市场制造产品。而随着城市需求的增加，他们的收入也会增加，他们“改进”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加自己的生产力。这样就会步步高升，接近繁荣，就像他们在英国诺福克郡的同行一般。经济作物会有剩余，剩余的可以出口，特别是出口母国。作为回报，英国会送来纺织品和机械，布满钉子的沙发，粉红色的锦缎窗帘；印度的新兴商人和“萝卜贵族”非常欢迎这些商品。如果“轻松”（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很喜欢这么评论）程度增加了，那么就会有更大的文化产品需求、文化服务需求——大学、报纸，将来还会有议会；最大胆的设想之下，还会有基督教。麦考利在他充满智慧推断的想象中，描绘了一幅完整的画卷：将“懒惰的”亚洲注入“进步”的活力。这幅画卷，实在让他愉快极了。印度人使用着英国布拉德福德郡的阔幅棉布、谢菲尔德郡的餐具；孟买读者看着英国报纸《爱丁堡评论》——麦考利相信，这幅和谐画面已经指日可待了。

1834年2月，麦考利要开始四个月印度之旅的两周以前，一个个箱子塞满了他认为在热带地区不可或缺的物品：300个橘子；还有一堆名著：荷马、贺拉斯、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伏尔泰的全集。这一天，麦考利对利兹的选民们发表了一篇告别演说。这篇讲话，一

半是道别，一半是祝福。这祝福是麦考利代表“不可取消的进步”的信徒们发出的，也是一副以“校长”风范发出的安慰：虽然开始不好，结果一定很好。

要有勇气，看清大趋势，你们并不会失去我这个国会议员，而是在得到整个世界。祝你们的工厂兴旺发达，贸易范围扩大，财富与日俱增！祝你们能力的成果，你们繁荣的预兆，在东方最偏远的地方也一样与我同在，而且让我有全新的理由，能够为了我选民的智慧、事业和精神而骄傲！

麦考利相信自己能做出一番事业，这是真正的“时代精神”（最近才流行起来的说法，主要是威廉·哈兹里特普及的）。巴麦尊子爵是英国全球影响的重要吹鼓手，他有一个提法叫“让世界更好”（world bettering）。可以说，麦考利这一代人，最有决心实现巴麦尊的这句话。麦考利外号“聪明的汤姆”，他小时候在伦敦南部克拉珀姆（Clapham）地区长大，父母都是新教福音派，父亲叫扎卡里（Zachary），母亲叫塞琳娜（Selina），都是积极的废奴主义者。麦考利小时候也伴随这种“让世界更好”的冲动成长起来。他平时的时间，很多用来不停祷告，还有很多被强迫来汇报自己的日程。这两者中间，他和兄弟姐妹就被反复灌输，要具备强烈的“自己证实自己正义”的需要。不论麦考利会变得多么活泼（他父亲扎卡里注重教育，麦考利变得活泼让他很失望），他都没有真正丧失早年的这种焦虑。

而且，扎卡里还有更大的担心。麦考利可能已经变成了边沁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只不过是一个行走的感应器。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麦考利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功利主义者，尽管他在印度发现，功利主义者的各种改进计划，最后反过来被大量的现实所改进了。麦考利还攻击过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士·密尔，说他把人矮化成了机器。但是，麦考利确实明白，“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激进派”都认为，让欢乐最大化而让痛苦最小化，并没有什么错误之处，因而觉得这种学说很有吸引力。杰里米·边沁自己关心的是，如果大多数人类能够自行找到这个最佳方案，就再好不过了。然而，显然大多数人类自己找不到，需要别人帮助。而这帮助必须来自政府，来自知识渊博的人，来自公正无私的人，来自准备好调查某种社会丑恶现象并努力纠正的人。这些人应该足够热心，能调查该问题的方方面面；能起草报告，迫使那些有能力解决问题的高官重视起来；能不停督促自己，直到解决问题的措施变成法律；然后还能出动专业的督察员，确保有法必依。这个理想化的图景，尽管从来没有完全实现，但却是英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转折点，标志着由贵族、教会统治的，基于社会情感的旧社会，已经无力适应19世纪的现代化工业帝国世界。乡绅、地方治安官、牧师这些职业，都应该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公务员，带着政府蓝皮书的统计学家，还有卫生检察官。

这可不是说，“哲学激进派”想要给社会加上一个专横、昂贵的政府来增加

社会负担。他们实际的主张，是要投入足够“初始”的，调查研究的热情和智慧，好让社会能够自我纠正。财政与社会方面会有短期的痛苦，但能换来长期的、性价比很高的好处。然而，边沁主义社会改良运动的各种最重要实践，尤其是1834年的《新济贫法》，却引来了激烈反对：痛苦似乎比好处明显得多。需要资金才能修建济贫院，而济贫院的惩罚措施却非常骇人，导致哪怕穷人走投无路也不愿意进去。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而且，经济危机最严重的年月，比如19世纪40年代，就连最“残忍功利主义”(注)的体制，也好过饿死。批评功利主义的人说：济贫院人数多少，并不反映真正的社会痛苦程度，只反映那些走进高墙又走出高墙的人的痛苦程度。这一点说得没错。而且，各种改革事业都经常引发人们的极大憎恶，却几乎完全没有减轻公共管理的负担。社会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是政府里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他资助功利主义改革家做了一些显然有益的事业，例如给大小城市安装更洁净的上下水道，降低死亡率。然而，各个阶层都存在一些政治上的好事者，哪怕是这些事业，都引起了好事者们根深蒂固的怀疑和仇恨。

因此，英国的各殖民地，虽然充满了混乱、疾病、暴力，但对于边沁的理想主义来说，仍不失为更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地方。进步，对印度而言，是一种大剂量的猛药；印度没有那种存心刁难人的“自由”传统来阻碍进步，这一点真是太好了。相反，改革主义者还相信，莫卧儿帝国在18—19世纪崩溃之后，它旧日的臣民极为渴求权威的铁腕治理。这一代人的主要理想是：“先要快乐，后要自由”，或者“强力但公平的专制主义”。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成立了一所大学，名叫黑利伯瑞（Haileybury）学院，专门用来教育印度的全新一代公务员；19世纪30年代，这些公务员还只有900人左右。这所学院的教学，确实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第四任印度总督是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麦考利是总督的委员会成员之一。虽然功利主义对印度的统治有了影响，但委员会也已经意识到，印度政治并非杰里米·边沁的理想移植到热带的产物。

边沁定律假定，有一套普遍原则制约着人类行为。然而，英国总督在19世纪的前20年中已经熟悉了本地政治，他们较早地明白，成功和失败的不同，正是在于，哪些普遍原则必须按照地方特色，做出适当的修改。有一些印度出生的英国年轻人，脑子里装满了马可·奥里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学说和印度宗教经典《梨俱吠陀》（*Rig Veda*），还有种小米的田地的算术。他们是第一批真正的“军人学者”，既熟悉军刀，也熟悉经纬仪。很多这样的年轻人，都因为一个精力旺盛而顽固的扩张主义者韦尔斯利侯爵（Marquis of Wellesley），成了根据治外法权受外国保护者。这些人，有的从加尔各答威廉堡的韦尔斯利大学毕业了，有的曾经在这里教书。这所大学，建立的目的，就是成为知识帝国的军营，为了增强军事

统治的力量。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当了印度总督。他是威灵顿公爵的哥哥，很多方面比威灵顿复杂得多，但名气远不如弟弟。他是一个“热心的总司令”，但远远不止这个身份。之前，他的大军击败了法国支持的印度联军，占领了广袤的土地。他相信，为了治理这片土地，需要很多熟悉地形学、历史、语言、印度文化的人才。而他的大学就应该通过婆罗门教师——当地叫书记员（munshis）的，来教授他们梵文、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波斯语（当时波斯语还是印度法庭的语言）、阿拉伯语，还有一些本地口语。

于是，19世纪前25年，就创造了一代优秀人才，组成了一个非英格兰人的英属印度政府，或许是英国在亚洲建立的最优秀的政府。这些成员几乎都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他们当中最出名，也是文化包容心最强的人物，是一些苏格兰人，集中在印度西北各省：托马斯·门罗爵士（Sir Thomas Munro）、约翰·马尔科姆爵士（Sir John Malcolm）、芒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稍后詹姆士·托马森（James Thomason）也加入了。这些人都把老家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带到了印度，特别是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约翰·米勒普及的、刚刚萌芽的社会学；基本理论是，睿智的公共措施，必须有深刻的本地知识做基础。实际上，正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觉得英国政府对自己的国民有很深的误解和残忍行为，他们才下决心，不让英国人在亚洲重复这样的错误。他们有很多人变成了学术权威，精通自己统治的土地上，历史、法律、农业经济的各种细枝末节。要让行动有效，必须深入了解印度的国家与社会。因此，马尔科姆爵士写了很多有关印度锡克教徒（Sikhs）的著作，还出版了《波斯史》（*The History of Persia*，1815）。芒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曾经与马拉塔王公们作战，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关于从佩什瓦获得领土的报告》（*Report on the Territories Conquered from the Paishwa*，1821）。维多利亚后期，有很多书籍把印度写成“无政府状态，一片混乱”。然而，19世纪早期的这些著作描绘的印度却经常完全相反。埃尔芬斯通的《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1841）极力描绘莫卧儿黄金时代的统治，以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和平共处的关系。

本地知识改变了苏格兰的“军人学者”。不过，本地知识也强迫他们面对自己角色的各种冲突。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已经承诺，它血腥而带有破坏性的各次战争，是建立稳定的“重生印度”的前提，至少在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是这样的；然而，每次战争都好像会引起下一次战争。英国曾把占领范围扩大到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Punjab），目的是先发制人，遏制俄帝国的扩张主义。然而，这么做却引发了英军同当地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的冲突。他的王国是此地各个政权中，少数真正有凝聚力的政权之一。英国不但没有能建立稳定的前线，反而制造了一个不稳定的前线，不稳定又使得英国必须打更多的仗。战争从来没有停止，局势总

是一片混乱。拉贾斯坦邦与南部德干（Deccan）地区的游牧骑兵，被英国人称为“土匪”；他们当中也确实有不少土匪。但是，他们先前并不是土匪，只是被他们的保护国马拉塔（确切地说，被那些控制马拉塔的英国人）用无情的破坏行动变成了罪行累累的强盗。每一次军事干预，都让“局势稳定”更加遥远，而不是更加切近。与此同时，军人还必须发给军饷——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有25万军人，于是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就成了全亚洲人数最多的军队，在世界上也能排到前列。这些人当中，绝大部分是印度士兵，也就是“土兵”（sepoys）。既然要发军饷，就必须征税。征税让人民更加困苦，于是产生了更多不满情绪。

阳光灿烂的乐观情绪，曾认为，自由主义的监护指导会给印度带来幸福。如今，这种情绪被本地的知识蒙上了阴云。不过，本地知识至少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的苦难。之前，孟加拉地区的政府采用农业收税制度——柴明达尔制（zemindar）。这种制度规定，政府通过中间人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农民告知中间人自己的收入，然后交税。政府宣称，这种制度在印度东南部（也就是孟加拉地区）是一个传统。托马斯·门罗却发现，柴明达尔制在这里不仅不是传统，而且基本没有什么人听说过。詹姆士·托马森认为，旁遮普地区也有这种现象。这些所谓有用的中间人，只不过是硬插了进来，充当敲诈勒索的人。于是，最后实行的税制，换成了莱特瓦尔制（ryot-wari），由农民各自直接与政府接洽。不过莱特瓦尔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要求对每一户人家进行全面土地测量，包括税务年度中土地的肥沃程度，以及天气条件。这是一项里程碑式的任务，而只有通过一些当地被人批评为“家长主义”的工作人员帮助，这任务才可能完成。不过，门罗、托马森和其他“收获知识的人”都认为，要是再做其他的事情，就违背了自己的“托管职责”。

麦考利在伦敦，本应勤勤恳恳研究那些大部头的书，把自己的脑子塞满古吉拉特邦晒盐生产的细节，或是印度种姓（caste）的精密制度。他学到的知识，肯定记住了；但他的心思，却不在自己的作业上。他想，如果某人单纯掌握印度太多的书本知识，就可能让他健康理性、自由自在、有意进步的思想，受到外国文化中一些“胡言乱语”的损害。詹姆士·密尔写过一本《英属印度史》。不少人批评他，说他从来没到过印度，不了解实际情况。麦考利也一直批评密尔，但是肯定读过密尔的这本书，而且肯定会赞同密尔的如下观点：“印度值得看到、听到的一切，都能在写作中表达出来……合格的人在英国密室里待一年学到的知识，就能超过他在印度待一辈子学到的知识。”而且，麦考利还有一个忠告：有些道德高尚的聪明人，去了印度，结果只是迷恋上了神庙里的色情雕塑，或者沉迷于编纂那些无益的印度教法典，不可自拔。任何19世纪的官员，只要有一点基本常识，都会明白，这不是印度所真正需要的。印度需要的是来自欧洲的清醒的理性！寇松的看法更极端，有一次他在加尔各答大学演讲，对观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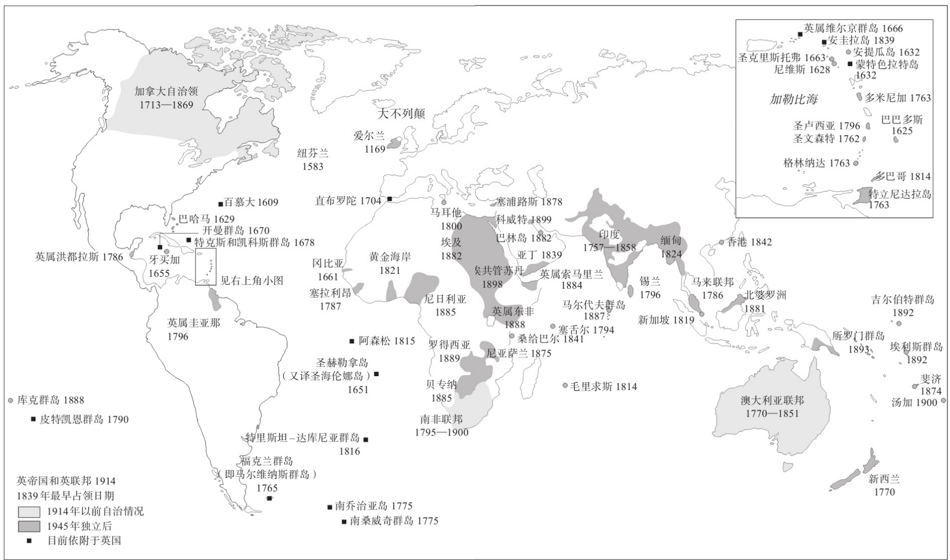
吼：“真理，是西方的概念！”他经常这么发脾气。也许麦考利不会像寇松那么极端，但麦考利也不会强烈反对寇松的观点。

麦考利的偏见，有不少也是总督威廉·本廷克的偏见。本廷克外号“第一流的荷兰人”，把他个人的福音主义思想，也带了一些到加尔各答。有位客人拜访了本廷克，认为他说起话来像一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贵格会教徒；本廷克的衣着也确实像贵格会教徒，穿着绒面呢的双排扣长礼服，而他的上一代人则更加华丽，喜欢印度围巾和锦缎西装马甲。本廷克显然不喜欢这种打扮，故意穿得简朴来抗议。此前，在基督教福音派的压力之下，公司已经同意在势力范围内有“西方观念”渗透；所谓“西方观念”常常是一种暗语，说明正式传教工作开始了。本廷克行事比较谨慎，不会动用权力去做一些注定引起麻烦的事，但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指出一些“可憎之事”；只有消灭了这些事物，才可能让民众接受“智慧之光”。而且，为了避免自己刚愎自用，本廷克还有一位政治秘书查尔斯·屈维廉（Charles Trevelyan），来随时提醒自己的使命何在。屈维廉是汤顿副主教（Archdeacon of Taunton）的儿子，从小带着一种不协调的热情长大。屈维廉在黑利伯瑞的东印度公司学院上学时，有一位老师，是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Reverend Thomas Malthus）。马尔萨斯的传授，将来会给他的职业带来深刻而严重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这时马尔萨斯确实给屈维廉的“公民焦虑”指明了方向和目的。1827年，屈维廉20岁的时候来到了德里，此时他满心热情，这种热情是他这一代人特有的，例如关注关税改革等。过了几年，他追求麦考利妹妹汉娜。托马斯·麦考利的占有欲很强，不愿妹妹让人抢走。他不无讽刺地评价屈维廉，说：“他的求爱话语包括蒸汽船航海、本地居民教育、蔗糖关税均摊、罗马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的过程。他追求女士的本领，远不如他在金融方面的本领……而且，我相信，他这辈子一本小说也没看过。”然而，汉娜还是接受了屈维廉。

屈维廉是个道学家，但毕竟是属于大英帝国的道学家。他看到腐败现象就会怒不可遏。他21岁那年，在德里才住了几个月，就亲自揭露了总裁判司爱德华·科尔布鲁克爵士（Sir Edward Colebrooke）受贿的行为。当时，科尔布鲁克还是老一辈印度、穆斯林法律的著名权威。当时事出有因，科尔布鲁克爵士如果不收礼，可能会让送礼的人们更加难过、更加气恼。然而，即使屈维廉知道这一点，他也仍旧会为公司首脑参与如此邪恶的行为而愤怒。科尔布鲁克被揭露之后，威胁屈维廉这个傲慢的清教徒，结果屈维廉毫不示弱。最后，科尔布鲁克名誉受到了严重损害，财政也破产了，带着屈辱被送回了英国。屈维廉被证明无罪，还得到了提升，感到十分欣慰。他当上了本廷克的代理政治秘书，搬到了加尔各答。

屈维廉并不是个顽固的人，他还是珀勒德布尔王侯（Raja of Bhurtpore）

儿子的家庭教师，非常关心他人。他鼓励那些喜欢西方文化的年轻婆罗门，如果学习遇到困难，可以向他寻求帮助。屈维廉一直在学习印度语言，包括经典语言和白话，学得非常好。这一点跟麦考利完全不同。然而，屈维廉并不是文化多元论者。他并不认为传统必然正确。他相信，某种名声很坏的传统，就算持续了很久，也一样应当受到谴责。印度有一种殉葬陋习，名叫“娑提”（sati）：丈夫死了火化，妻子要跟着自焚。屈维廉和本廷克都认为，这绝对是恶劣至极的行为。还有其他一些可憎之物：杀婴罪、童婚、强迫圆房；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丑恶。印度全境每年只有不超过500起“娑提”发生，但是，“娑提”的废除，还是一种考验——“文明”价值观能否应用在印度本土？



1914年大英帝国的扩张形势

西方文献一般都表示，废除运动是英国人自己发起的。然而，它实际上是印度改革家发起的轰动一时的事件；代表人物如王侯拉姆·莫汉·罗易（Rajah Ram Mohan Roy）。早在19世纪20年代，罗易就猛烈抨击“娑提”，说它并非印度教经典的、吠陀哲学（Vedanta）所允许的行为，而且带了很多同样博学的印度改革家，来到总督府，敦促总督废除这种陋习。本廷克显然重视了这项事业。1829年，国会进行了一系列热情的演说，出版了很多调查报告之后，本廷克颁布法令，禁止了“娑提”。这样一来，寡妇们走向火葬柴堆的路上，警察就有权拦截了。没多久，后来建起维多利亚纪念馆的场所旁边的一个公园里，树立了一组雕像。雕像建在一个基座上，内容是总督命人把一些印度妇女救出火海。总督面容慈祥，和蔼可

亲。那些印度寡妇的模样，则变得西方化了，很像早期维多利亚艺术当中痛苦的少女形象；有些戴着头巾的坏女人要把她们朝火葬堆拉去。

“娑提”的废除，本来是一项更大的东方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纯洁印度教的宗教活动，改革婆罗门种姓权威。拉姆·莫汉·罗易认为，婆罗门种姓权威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是不合理的。尽管实际情况是这样，然而那些主张西化的人还是把“娑提”的废除当成了自我颂扬的咒语，认为这是英国给印度的恩惠。他们坚信，西方价值观将会成为印度无上的福音。他们的主张，就好像他们的英国殖民政府第一个了解了印度，而他们行动的自由，又没有受到知识的损害。实际上，他们的知识，远远少于前辈们的知识，也远远少于自己应有的知识。“娑提”被视为印度教残忍的蒙昧主义的象征，实际上，印度教并没有主张这么做。而且这种错误观念，总是跟另外一种错误观念成双成对，为英国霸权辩护；那就是针对“萨吉”注的观念。这些强盗经常用围巾勒死抢劫的人，声称这是迦梨注女神的信徒应当做的事。维多利亚人只要一听迦梨的名字，就会毛骨悚然。作家菲利普·梅多斯·泰勒（Philip Meadows Taylor）写了一本小说——《一个恶棍（萨吉）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a Thug*，1839），书中的背景来自一名罪犯的亲口讲述，刚一出版立刻畅销。维多利亚女王也追着想看，甚至命人取来了“作者刚刚改完的”小说排版的校样，在床上一直看到很晚，为书里的揭秘情节兴奋不已。印度有一位追捕“萨吉”的英军军官，名叫威廉·斯利曼少校（Major William Sleeman），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英雄。在“线人”的帮助下，他成功深入这个“泛印度”邪教组织，了解了他们的语言和秘密世界。很多旅居印度的英国先生、英国太太们，一回到家里度假，就被周围的人当成权威，老是缠着他们，要看强盗勒死人用的围巾，或者耸人听闻的谋杀案。比如，有个军官的妻子名叫哈丽雅特·泰勒，她就相信，萨吉组织的新成员，需要对迦梨女神发誓，每年要犯下一定数量的谋杀案（一般是三起）。不过，他要杀人的时候，如果突然有蝙蝠或者猫头鹰出现，就是一个不祥之兆，他必须立刻停手。19世纪30年代，英国和印度都流行一种“萨吉恐惧症”。虽然没有显著提升主要公路的安全系数，但却大大扩张了警察机构，也当然使得政府的道德优越感膨胀了，从而让警方能够预先逮捕那些涉嫌参与邪教的犯罪嫌疑人，哪怕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犯罪。当时印度地方政府正在崩溃，英军大大加快了它们的崩溃速度，于是公路上的暴力犯罪确实很多。这种歇斯底里，大部分是现状基础上的故意想象。斯利曼少校自称破译的“秘密语言”，据说同这些勒死人的犯人的秘密兄弟会相关，实际上极有可能只是本地黑帮的俚语。

麦考利来到加尔各答的时候，正好赶上“萨吉恐惧症”的高峰期。恐惧症显然支持了英国自己宣传的形象，说自己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尽管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主要是军事占领。麦考利是总督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开会十分沉闷，麦考利干脆在开会的时候写信给英国的朋友。不过，他毕

竟负有责任，要给刑法系统的改革起草报告；尽管他的敌人后来指出，麦考利对传统印度基本一无所知。然而，麦考利认为，就算熟悉印度法律的细节，他也同样坚持自己的信念：若有了单一而统一的刑法典（penal code），对印度人、英国人一视同仁，而且有了英语而非波斯语的文本，就能成为一切司法系统的基础。

不过，麦考利1835年2月发表的《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Education*），让他卷入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主题是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全部意义和方向何在。辩论的表面问题是，东印度公司应当支持印度高等教育使用英语，还是印度本地语言。对麦考利这一代人来说，在所有社会进步助推器当中，教育当然是最有力的一个。麦考利和屈维廉都认为，全人类都有权利接受理性的、科学的启蒙。屈维廉自己还投入了普及英语的事业。他们认为，良性的变革，就好像一辆巨大的蒸汽火车头，印度人完全有权搭上火车。可是，却有些人主张，要保护印度人本土的语言和文献，不想给他们上车的机会。这是一种用错了的敏感，不会给印度人带来好处。麦考利就此发表过一个最“精辟”的观点，导致他至今在印度声名狼藉：“我从来没发现任何一个人，精通东方语言的，能够否认，一家优秀的欧洲图书馆，只需要一书架的书，其价值就等同于印度和阿拉伯所有本土文化的价值！”“聪明的汤姆”显然对阿育吠陀（Ayurvedic）的药物、梵语文学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麦考利说，印度的学问都是这样的：“医学信条会让英国兽医觉得丢脸，天文学会让英国寄宿学校的女生哈哈大笑，历史充斥着30英尺高的国王，三万年的王朝，地理都是些糖蜜海、黄油海。”有谁会赞助这样的学术研究呢？麦考利的记忆有如百科全书一般丰富，他肯定会记得，《圣经·旧约》也有各种各样的奇迹说法（巨人、全球大洪水、几百岁的人类祖先等），现在，只要对自己有利，他就把这些记忆删除了——而且删除得何等容易啊！

在麦考利和屈维廉看来，这问题不仅是要启发“愚昧的亚洲人”。帝国在印度的事业，是否可行，完全取决于能不能培养出一支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的队伍。印度人口太多，而能够教育他们的聪明又正派的人却太少了。这些正派人十分容易受到印度一大堆传染病的感染。而且，负有教育责任的人并没有时间学习所有的种姓细则、宗教仪式，更别提印度18种主要语言了。因此文化中介就成了必要：这个阶层，血统、肤色是印度人的，而品位、观点、道德、智力却是英国人的。这些人，接受了牛顿、莎士比亚的思想，又能传授“有用”而“高尚”的知识，就能成为人类的渠道，传输重大的文化改革。这个体系，类似一种对民众的监督体系，上层人物指导下层人物，直到文明事业遍布印度全境为止。这一变革，将产生极为重要的结果。不只是让印度人能够引用弥尔顿、布莱克斯通的作品，虽然这样也

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印度人通过英语，会对“适当的”正义概念采取开放态度，并对“野蛮的”习俗、服饰、礼节产生一种“健康的”厌恶。简而言之，他们会变成公民的中坚力量，继而渴望购买各种英国产品，从普通法到宽幅绒面呢，不一而足。他们更有可能有朝一日信仰基督教。

改革者认为，“负有指导作用的媒介”这个话题，并非不切实际的大话，而是几何学一般精确的方向，帝国将来就要走这个方向。印度有了西化的人口，统治者与臣民就自然能意气相投，从而不必采用强制措施；此外，军队可以减少，供养军队的税负也能减轻。民众收入会提高，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还会有盈余，这样民众就分享了不列颠尼亚的慷慨。屈维廉说：“我们应该把能让我们赚钱的臣民，换成能让我们赚更多钱的盟友。”毕竟，对印度来说，英语应当是一种变革的“电流”，能给亚洲的“惰性”带来刺激，带来动力。这电流将会产生光与力量。

但是，这种对英语教育的痴迷，牛津大学梵文波顿教授（Boden Professor of Sanskrit）、H.H.威尔逊（H.H.Wilson）却不屑一顾，认为它是又一种“幻影般的荒唐”。威尔逊在印度多年，他和周围的朋友、同事都了解印度语言、法律、宗教，他们钻研的深度，屈维廉和麦考利都远远不及。威尔逊和东印度公司的公务员亨利·索比·普林塞普（Henry Thoby Prinsep）猛烈抨击麦考利等人，说他们所知的一切，都只是加尔各答西方人俱乐部里的世界，同印度广大乡村生活，同“难以改变的现实”彻底隔绝。这些东方学者坚持说，英语应用的范围，永远只会局限在城镇商业和法律圈子的最顶层；而这些说英语的人，英国统治者早已认识了。英语不会造成一个能往下层传播西方知识的群体，只会造成一个小圈子，同整个印度社会隔离。即使麦考利、屈维廉等人成功了，他们造就的也不过是一种混血文化，而且这些西化的印度人，只愿意奉承英国老爷，不会跟英国老爷推心置腹。

此外，东方学者还认为，英国的任务绝不是把印度变成某种西方的文化总管，甚至也不应当用欧洲智慧来打扮印度。18世纪七八十年代，华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担任印度总督以来，东印度公司就认为，自己有义务修复、重建印度的习俗，不论印度习俗有多么多样化、多么彼此冲突。因此，黑斯廷斯才自学了波斯语；法官兼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还有伟大的梵语权威亨利·科尔布鲁克（Henry Colebrooke）花了很多年时间整理、编纂印度法典。拉姆·莫汉·罗易这样的吠陀经学者才能够对西方文化有积极反应，因为西方文化并没有打算强加在印度人身上。然而，统治者提出了一个教学语言的选择：是用印度古典语言，还是现代英语？于是，东方学者就担心了：倘若只提供这两种语言，岂不是没有机会用印度斯坦语这样的本地现代语言，教授现代课程了？

19世纪30年代，主张西化的人和东方学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普林塞普、威尔逊等东方学者猛烈抨击西化派的无知和臆测行为。过了大约20年，到19世纪50年代，威尔逊又在上议院作证，尖刻地评论说："麦考利对人民的情况一无所知，只能看见身边最近的地方；而这，正是主张推广英语的人各种错误的主要来源。这些错误，也只有这些主张推广英语的人才会犯。"但是，无论如何，未来还是按照麦考利和屈维廉的方向发展了。他们告诉总督本廷克，绝大部分对英语教育的渴求，来自印度人自己，这些印度人并不渴望接受传统教育。而他们这么说，也不全错。当时，印度比较重要的当地文化学院，有伊斯兰宗教学校、印度梵语学院，是在黑斯廷斯、韦尔斯利当总督的时代建起来的。总督很支持他们，废除了针对这两所学校的政府补助金，以及针对威廉堡学院的补助金。威廉堡学院在最终倒闭、清偿债务之前，一直为英国学生提供六种印度语言的教学，而且质量很高。这么一来，本地文化项目，就只剩下了黑利伯瑞学院的一些梵语课程。这所学院口碑很差，之后很多届的学生都把它当成一个痛苦而乏味的笑话。东方学者们失败了。尽管他们之后背负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恶名，但有一个事实不容争辩——这些东方学者是南亚唯一的一代既有能力，又有情怀了解当地传统文化的英国人。威尔逊谈到麦考利和屈维廉，做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他们的天才无可置疑，他们缺乏经验也板上钉钉……他们奋斗的理想就是，将一切能力与他们相同、经验胜过他们的人所实行的传统文化体制统统消除掉。他们对改善印度本地人的道德和宗教品质，抱着最热切的期望，永远不会有人比他们还热切。"

西化派的观点当中，有一个观点让东方学者觉得尤其幼稚，或者说伪善。西化派认为，印度的数百万人口，语言和方言很多，宗教很多，也有各类的种姓，彼此隔绝。而有了英语，就能超越一切语言、宗教、种姓障碍，让各民族互相交流；同一个民族，百姓也能跟统治者交流。实际上，这个"英语将成为官方通用语，成为英印双方统治阶层的正式语言"的预言实在是太准确了；然而，英语在上层的普及，却让百姓跟统治者疏远了，因为下层百姓不会说英语。这就好像莫卧儿宫廷采用的波斯语的作用一样。英国人一直承诺不会重复莫卧儿王朝以前的错误，结果却把错误原封不动回收利用了，只不过换了一种语言。查尔斯·屈维廉雇用了德里英语学院的印度毕业生，分派给邻国使馆的英国使者当口译和私人秘书。这些印度人为自己西化的过程写了认真而详尽的笔记。有些人，例如沙哈马特·拉尔（Shahamat Lal），1837年跟随克劳德·瓦德少校（Major Claude Wade）去了旁遮普。1839—1842年爆发了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拉尔在1839年又参加了远征阿富汗的战争，英军损失惨重。这些西化的印度人很快开始抱怨本国的"迷信"和"专制主义"，尖酸刻薄地嘲讽这些现象，其论调与英国殖民者——他们的主人十分相似。

当然，有些人被选择性地擢升了，这一现象，并不同于真正的文化融合。

殖民者宣扬的论调是“接触”，但现实情况却是“分离”。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英国老爷太太，也就是屈维廉和本廷克的“东印度公司领地”（Company Raj）的继承人们，回顾那些痴迷东方学的前辈时，带着不加掩饰的厌恶。那些前辈在18世纪晚期的油画中，躺在印度长沙发椅上休息，或是抽着印度水烟。这些老爷太太们觉得，前辈们过于接近印度风俗习惯，变得软弱、腐化、无能；对早期维多利亚人来说，这几个词的道德批判最为激烈。这些前辈穿着脆弱的印度棉布，戴着俗气的头巾，热衷于斗鸡、赛马，痴迷于东方烈酒，向印度舞女抛媚眼，在妓院中游逛。有些人甚至包养了印度情妇，还抚养了混血儿。更有一些怪人，竟然跟印度人结了婚！然而，倘若英国人要严肃对待帝国事业，那么这一切都必将成为过去。印度难道不是等级社会吗？那么，“权威”的先决条件，就必然是“冷漠超然”。这样既能保证道德的清洁，也能保证现实中的清洁。英国在印度要防范各种疾病，而最需要防范的，就是“融合”的妄想症。

诚然，因为气候和具体情况的缘故，英国人也必须做出一些让步。英国的小孩子必须托付给印度仆人照料，甚至还要请印度奶妈，哪怕冒着让孩子染上多雾的孟加拉地区的“懒惰病”。这种病只有严加监视方能避免。《加尔各答评论报》（*Calcutta Review*）上有一篇文章《孩子的赞美诗花环》（*Child’s Wreath of Hymns*），警告说：“在印度养育的英国儿童，将很有可能在长大后变成贪食又沉溺于肉欲享乐的人……是的，就连小女孩都托付给了当地男人照料！”然后，还有食品问题。当时蒸汽船还没有普及，苏伊士运河也还没有开通，从英国前往印度还没有那么方便，因此，运到印度的英国食品数量确实很惊人。印度餐桌上出现了英国的果酱、罐头肉、罐头调味酱；然而，还是少不了印度本地的秋葵、木豆。这些菜含油量比较多，本地人用这些菜的特点来称呼它们，比如“滑菜”（slippery）、“黏菜”（slimy），英国人也这么称呼。

这一时期，英语词汇中，出现了“bungalow”（平房）、“verandah”（游廊）这样的词，而且，还出现了一些为“尊贵先生”们修建的房屋，天花板很高，还配着凉爽黑暗的地下室，尽可能多地提供了阴凉，改善了通风。不过，19世纪40年代的bungalow，跟印度北方城市中更有钱的商人、当地贵族的住房，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只有一层；其余方面则完全不同。英式印度平房，屋前屋后都铺着草坪，就像绿色地毯一样，在正门和街道之间有一条马车道。传统印度房屋，名为“haveli”或“manzil”，却没有这些特征。它们的墙壁直接面对街道，墙上开出一个大门入口。四方形的院子，一角是大门入口，另外三个角，都是有专门用途的房间，一般分别是食品仓库、厨房、厕所。其余的房间，都按居民性别划分；“zenana”是妇女、孩子的房间，“mardana”是男人的房间。院子之外，最大的公共空间是一个平的屋顶，用来养鸽子，晾晒衣服和香料。屋顶和地面有通道相连，能让朋友和邻居在屋顶上聚会，炎热的夜晚还能睡

在屋顶上。

这是传统印度住房的特点。而bungalow里面的白人老爷、白人太太，过的却不是这样的生活。bungalow的屋顶一般是人字形，房屋本身是一些坚固的亭子，按照功能区分房间，例如客厅、餐厅、书房、吸烟室、卧室；这些房间的窗户都面对着外面的走廊，走廊在整栋房子周围绕一圈。大门有一名男仆严密看守，当地语言名叫“chokidar”，他负责决定哪些访客能够进入庭院。其中，商人或许可以进入走廊，还可能进入主人的私人房间。进了屋子，里面的布置就跟英国本土完全一样了。只不过建筑房子的材料都是热带材料，例如竹子、柚木；英国本土的房子墙上挂着主人祖先的画像，这里却挂着狩猎野猪的长矛。不过，这里还是跟英国一样：有装着厚厚软垫的沙发、长沙发（settee）；韦奇伍德工厂和利兹市生产的米色陶器（Creamware）；还有画满图画的窗帘，这些都是英国进口的。屋子里印度特色最为显著的陈设，则是印度蒲葵扇，布扇叶悬在天花板上，由专门打扇的仆人来回拉动。厨房免不了各种气味，因此跟主要的建筑是分开的，有仆人专门住在那儿。主人谈到这些仆人，经常说他们是一种“刺鼻的，但无法躲开的讨厌之人”。

印度的白人老爷在征服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创造就是本国文化的标志——花园。他们为了建设、维护花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英国人在设计bungalow的花园时，引进了各种热带植物，例如芦荟。芦荟长满了刺，经常用来建造令人生畏的树篱。但英国人用热带植物修建花园，栽种的格局也类似英国汉普郡的风格，前后有草坪，有装饰性的鱼塘，有草本植物构成的边框，有藤架，当然还有玫瑰。印度有一名身材娇小的英国女摄影师，名叫哈丽雅特·厄尔（Harriet Earle），后来嫁给了孟加拉步兵38团的罗伯特·泰特勒上尉（Captain Robert Tytler）。有一次，有人邀请她去了巴勒克布尔宫（Barrackpore House），这是当时的总督府，距离加尔各答16英里。哈丽雅特为总督府的花园惊叹不已。当时的印度老城，人口激增，负担很重。英国的兵营，都距离老城有一段距离，绿化得非常好，远近闻名。当然，肯定有人把兵营跟伦敦周围各郡相比较。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有一个象征性的荣誉高峰：有人在巴勒克布尔宫里成功种下了两株草莓，本来要把果子献给当时的印度总督、第一代奥克兰伯爵。可是，哈丽雅特见到草莓，垂涎欲滴，实在忍不住，把这柔软的果子塞进了贪婪的嘴。20年之后，1857年3月，距离草莓花床还不到一箭之地，巴勒克布尔宫的练兵场上，又发生了一起非常不同的事件。当时英军招募了很多印度当地人，称作“土兵”。第34步兵团有一名“土兵”，名叫曼加尔·潘迪（Mangal Pande），上半身穿着军服，下半身只围着一条腰布。潘迪向步兵团的副官，以及副官的军士长胡乱开枪，又险些打掉自己的脑袋。最后，潘迪被判绞刑，步兵团被解散，以儆效尤。土兵们听到这个消息，愤怒地摘下帽子，在地上践踏。

此前，在巴勒克布尔宫已经有过麻烦——1824年也发生过一场兵变。然而，到1838年，麦考利和妹夫屈维廉回国的时候，麦考利还是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麦考利只在加尔各答住了四年，从1834年到1838年。这四年让他把自己幻想成了一个掌握印度过去和现在的权威，而且很快写了一本文集出版了，文集中提到了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一些关键人物，例如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和华伦·黑斯廷斯。文集充斥着一望便知的陈词滥调，例如，说英国殖民体制如何温柔可亲；说孟加拉人如何慵懒，平日的状态就好像“活在蒸汽浴中”一般。也许，麦考利当时并没有想到，那些给他抬轿子的脚夫，那些给货船撑船，沿着胡格利河（Hooghly）前行的船夫，那些槐蓝（indigo）田地里面朝黄土的农民，这些人有多么慵懒吧？不过，他认为，这些人“无论从天性上，还是从习惯上，都完全适合被外族统治”，而且比古往今来的一切民族都更加适合被外族统治。

屈维廉不论经验、语言学的知识、洞察力，都比大舅子麦考利高明几个层次；而且也比麦考利悲观得多。屈维廉回到伦敦，在财政部找了一份助理秘书的工作，后来整整在财政部待了19年。屈维廉对于帝国命运的看法要黑暗不少。麦考利尽全力鼓吹，在印度引入自由的媒体；因为他要普及那些“有用的知识”，自由媒体将成为普及事业的必备工具。然而，屈维廉和其他很多人却都注意到，印度的白话报刊，很快就用来发表民众的悲叹，而不是对英国统治者的感激。屈维廉写道：“尽管有了我们为人民的福祉所做的一切努力，恐怕我们依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统治阶层。”

毕竟，印度可抱怨的事情多得很。西化派在拼命吹捧英国给印度带来的各种好处的那些年，也正好是印度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那些年。东印度公司曾经垄断靛青染料贸易，当时有很多本地大企业负责供应染料。后来，东印度公司丧失了垄断权，这些大企业也就倒闭了，而英国人在“自由梦”当中设想的印度经济的现代产业，也就因此遭到了毁坏。一切出口货物都发生了锐减，除了鸦片之外；与此同时，来自英国的进口货物却如潮水一般涌了进来。传统的印度手工业，例如印花绸、棉花产业，在英国兰开郡纺织品对印度市场飞速而全面的入侵之下，几乎已经完全毁灭了。而当初，正是这些手工业品把英国人吸引到印度来的。偶尔也会有一些英国企业家试图振兴印度制造业，例如英国印染专家托马斯·瓦尔德（Thomas Wardle）；可是，印度各大纺织重镇，例如阿拉哈巴德（Allahabad）、苏拉特（Surat）、达卡（Dacca），它们的事业还是停滞不前，甚至衰退了。原先在莫卧儿王朝晚期，有些半独立的大地主，名叫“纳瓦布”（nawab）的，拥有繁荣的“小朝廷”（little court），这些大地主支撑着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但英国人却采用了一种权利丧失的制度，规定：这些小朝廷如果没有直接的男性继承人，其财产就会并入东印度公司。于是，随着小朝廷的灭亡，基础设施建设也就不复存在了。西方有些现代化

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健康的更新换代，是国际市场的现代化现实，取代了陈腐的制度。然而，这种转变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必然性。早在几代人之前，代表新式生产关系的工业和贸易，就已经在印度自行发展起来了，虽然当时还没有机械化。而英国造成的破坏，却让大量的纺织工人、染布工人、印刷工人、珠宝商、银匠、裁缝、家具制造商、厨师、音乐家、宫廷侍卫、高级妓女、店主，都失去了赞助人；其中有很多人，还不得不去了乡下，而这时乡下的经济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了。

19世纪30年代晚期到19世纪40年代，有些英国访客，来到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这样的港口城市。他们与严重的经济衰退相隔绝，很少看到破坏的真正惨状，除非到农村去走一遭。1837年年末到1838年年初，麦考利和屈维廉夫妇准备回国。他们认为已经为印度的建设尽了力，总体上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就在这时，肯特郡贝肯汉姆市的女作家艾米丽·伊登（Emily Eden），与哥哥乔治·伊登开始了一次漫长的印度西北之旅，前往兰吉特·辛格的锡克教王宫。伊登是奥克兰勋爵，现在接任本廷克，当上了印度总督。他们在胡格利河上，用艾米丽的话说，做了一次“简朴的旅行”：总督的平底船“索纳穆基”号（Sonamukhi，意为“黄金面孔”），漆成了金色、绿色、白色；船上有大理石的浴盆，让人划着桨，沿着河流行驶；后面还有一队小船，载着400名仆人，专门服侍奥克兰勋爵与随从。陆地上的队伍更讲排场：有四轮马车、双轮单座轻马车、轻便双轮马车、本地人抬的四人轿，还有马匹、大象，沿着恒河谷慢慢向上游走去。队伍后面还有850匹骆驼，140头大象，数百匹马、牛、运货马车，整整绵延10英里。平心而论，乔治·伊登真心算不得什么好猎手。可是，大家都觉得，身为印度总督，就必须精通打猎，所以他偶尔还是会在东倒西歪的象轿上，朝野兔、鹌鹑开上一枪。艾米丽是一位很有天分的艺术家，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资助。她在旅途中画过素描、油画，还写了不少日记。她的心情好坏交织，一面是沿途的喧嚷、奇异风光让她兴奋不已，另一面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恶心的感觉，侵袭着她的五感。这种感想，后来旅行印度的作家，还会一再重复；直到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Forster）、保罗·斯科特（Paul Scott）的作品。1837年圣诞节当天，艾米丽显然没有能遇到一些英国特色的事物——地上的白霜和餐桌上的葡萄干布丁。为此，她十分沮丧，写信给姐妹说，她今天“在异国他乡的印度，尤其情绪低落”。她还写道：“为了庆祝圣诞节，各种景象与声音混在一起，可怕极了。仆人们在我们的帐篷门口挂上了巨大的花环；他们还聚在一起，用土语祝贺我们圣诞快乐，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他们说话时，我的心就猛地一缩，虽然这样很不对。身边围绕着印度斯坦语；对这种语言的憎恨，以一种难以理解的方式，把我淹没了。”

艾米丽心中，同情心和嫌恶感相互竞争。一行人继续往东，穿过了阿瓦德

（Awadh，旧称Oudh），朝着坎普尔（Kanpur，旧称Cawnpore）进发。

艾米丽被迫直接面对了严酷的现实：印度正在遭遇一场肆虐的饥荒。(注)宿营的马厩当中，艾米丽发现了一个小婴儿，饿得快要死了："这东西像一只老猴子，眼光呆滞而愚蠢；还有一个六岁的可怜孩子照料他。"艾米丽就把婴儿收留下了，征得婴儿母亲同意之后，还天天在帐篷里给婴儿喂奶，就好像喂一只宠物。然而，因季风气候异常而起的饥荒的恐怖，还是从四面八方，无情地朝这支队伍围了上来；车队穿越受灾的乡村时，有无数乞丐、行尸一般的穷苦人，聚在了车队四周。艾米丽写道："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可怕景象，特别是那些孩子；很多孩子都完全就是一具骷髅，骨头穿过了皮肤，浑身一丝不挂，已经完全不像人了。"奥克兰勋爵每天都为上百人提供食物，但护卫马队和当地治安法官还是汇报说，每天都有三五个村民饿死。艾米丽写道："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再也做不了什么了……这场面实在太恐怖了。女人们的样子，就如同被人埋在土里又挖出来一样，头颅看上去那么可怕！"这时，她离开巴勒克布尔宫"新鲜而翠绿"的草坪和花境(注)已经很远了。当初，艾米丽曾亲手重新设计花园，还给花园另起了"伊甸花园"（Eden Gardens）的名字。

艾米丽见到饥荒的惨景而痛心疾首，这的确是真实的感情，却也是一种相对的感情。艾米莉的宠物是一只鼯鼠。1839年8月，这只鼯鼠吃了一个感染霍乱菌的梨子，生病死掉了，让艾米丽悲痛不已。艾米丽自己也承认："我认为，印度的人出奇地愚昧，然而原本应该分给他们的智慧份额却分给了野兽，于是野兽就变得出奇地聪明了。"19世纪40年代，西化派对印度大规模饿死人的可怕现象反应不一。有些人热衷于团结起来改良印度的现状，例如旁遮普的詹姆士·托马森，或者新总督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1842年，达尔豪西接替奥克兰勋爵，就任印度总督。此前，1839—1842年的第一次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这次战争给英军带来了惨重损失：一支4000人的英军在1842年年初的严寒中，翻过兴都库什山脉撤回印度，最终回来的只有一个军医。这些主张建设印度的人，面对饥荒，强化了自己的信念——西方带来的礼物，比如新修的公路、铁路、水利工程，将成为改善印度现状的长远手段。于是，建成了一条宏伟的恒河运河，建设者宣称，运河的目的在于避免1837—1838年的饥荒重演。但还有其他观点，认为这些饥荒，都是印度朝着现代国际经济而艰难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痛苦；尽管这些痛苦令人惋惜。他们主张，印度有太多人要吃饭，而耕作的一块块小面积土地却不足以供应现货市场；所以在合理化改革的进程中，必然要有一些人牺牲。有朝一日，印度的劳动力也将被繁荣的城市工业吸收，就像英国本土工业化的情况一样。然而，这样大规模的巨变，肯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此外，现代化不仅面临巨大的结构障碍，也同样面临巨大的社会、文化障碍。工业化之前，印度的农民已经习惯了不慌不忙、无所追求的工作模式：每年大部

分时间懒懒散散，只在中间穿插几次农忙时节，周而复始。如果他们要成为盈利的生产者，就必须有人让他们变得独立自主，坚持不懈，而且要执行严格的工作计划。只要稍微看看自然界中的蚂蚁山，看看那些忙碌而有序的小昆虫，他们就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以上就是查尔斯·屈维廉的信念。这信念不仅适用于印度，也适用于爱尔兰。1846—1850年，爱尔兰发生了现代西欧国家当中最严重的饥荒。这几年，爱尔兰丧失了整整四分之一的人口。一百万人死于饥饿，或者饥荒带来的疾病；还有一百万人移民去了外国，这是他们活下来的唯一手段。在西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例如梅奥郡，将近30%人口死于非命。此时，查尔斯·屈维廉正在财政部工作，直接的救济行动就是由他负责；但屈维廉却相信，爱尔兰的灾祸是上天带来的，要用痛苦的方式，让居民将来过上更好的日子。这种想法，主观上并非出于恶意，也不属于故作多情。屈维廉冷酷地下了结论：爱尔兰饥荒完全是“上帝对懒惰、不自立的民族下的判决；上帝给爱尔兰降灾，让它受到教训的时候，灾祸不应该由我们缓和得太多。自私而懒惰的人，一定要吸取教训，这样整个爱尔兰才能出现全新的兴旺面貌”。《泰晤士报》的观点更加残忍，坚持说，饥荒是一种伪装起来的赐福。他们主张：人类的力量和智慧都已经无法帮助爱尔兰摆脱贫困和依赖他人的恶性循环，因此全能全知的上天就送来了一种“自然的限制措施”。报纸就像古希腊先知一般鼓吹：“社会总是从灾难当中重建起来的！”

尽管印度和爱尔兰远隔千山万水，但在维多利亚人的思维和作品当中，这两个地方却紧密相连。他们提到“人口过剩”和“生产不足”的棘手问题时，就会把印度跟爱尔兰相提并论。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曾在东印度公司的学院——黑利伯瑞学院任教，查尔斯·屈维廉是他的得意门生。屈维廉一辈子坚持马尔萨斯的教条理论，对印度和爱尔兰的饥荒，都采取了十分无情的立场。马尔萨斯有一个弟子，名叫威廉·托马斯·桑顿（William Thomas Thornton）。1846年，桑顿出版了《人口过剩与救济方法》（*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ies*）。此时，爱尔兰的巨大灾难正在变得非常明显。而桑顿主张，灾难是因为人口太多，为了减灾，应当减少人口密度，方法有二：一是自愿节育；二是向海外移民。他的主张对当时的社会辩论产生了直接影响。还有一些反对马尔萨斯主义，或者非马尔萨斯主义的自由派，他们抨击英国政府，说政府容忍“在外地主”（absentee landlords）的各种胡作非为，这些地主拼命想要从最广大的贫农土地上搜刮租金，攫取最后一个铜板。这些自由派也习惯于将印度和爱尔兰放在同一范畴谈论。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1846—1848年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述爱尔兰土地问题。其中一篇文章断言：“那些对印度有些了解的英国人，其实也就是那些最了解爱尔兰的人。”印度中部各省的地区委员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也写了一本关于爱尔兰的书。这本书最终激励威廉·

格莱斯顿在19世纪70年代着手处理了极为困难的土地改革问题。在格莱斯顿看到的所有文献当中，这本书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坎贝尔写道：爱尔兰梅奥郡或者科克郡的贫困和动荡报告，“每一个字都可以视为印度某省的行政长官的报告”。

密尔认为，印度和爱尔兰主要的不同在于，印度从事德政改革的官员们，并不一定需要担心政治，也没有因为几百年前的外族征服、定居运动而继承祖先的邪恶。当然，密尔会这么想，主要是因为他自己对印度的情况缺乏了解。他认为，一个温和而博学的政治家，可以在比哈尔邦（Bihar）和古吉拉特邦推行耕作条件的改善运动，而这种运动也一定会发生。确实，在达尔豪西勋爵治下，密尔认为，改善运动真正发生了——也就是恒河运河（Ganges canal）的修建。

有人认为，那些对爱尔兰土豆饥荒富有管理责任的人——上至两位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和约翰·拉塞尔勋爵，下至英国商务部历任部长、历任财政大臣，以及屈维廉这样的财政部官员，他们的任何决策，都必须仔细考虑会产生的政治影响。这种情况，当然是真实的。然而，另外一种情况也同样真实：大多数政治家、公务员，都受到一系列道德信念的制约，让他们相信，自己不管做出什么，结果都会被一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者的神秘意志左右，这位学者就是上帝。因此他们觉得，用《泰晤士报》的话说，上帝不想让“凯尔特人”继续当“吃土豆的人”了。他们觉得，上帝想要让爱尔兰那些软弱的“在外地主”为他们先前一直保持的邪恶体制而负起责任。他们觉得，上帝想要让西部爱尔兰大片土地减少人口，让爱尔兰人大批移民国外。然而，也还有另外一些人主张，这些灾难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或者至少被人为加剧了。这种“人祸”说，是否是异端邪说呢？这些“异教徒”之一，就是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他负责处理了最早的饥荒。1846年2月，皮尔爵士在下议院发表演说，呼吁废除《谷物法》。该法案限制进口多种美国谷物，包括玉米。演说的最后，皮尔建议各位议员们：

你们如果再要劝告一个受苦的民族，在贫困状态下保持勇气；你们如果再要告诉他们，饥荒是全能而慈悲的上帝降下的惩罚，是为了某种神秘而公正仁义的目的采取的措施——你们对受苦的臣民这样说的时候，愿上帝能让你们凭着今晚的决定，为自己准备好将来的思考带来的安慰。你们要思考的就是：这样的灾难，的确是上帝的措施；的确不是因为人类的法律而发生，也没有因为人类的法律而恶化；这法律，恰恰在食物供应缺乏的时候，采取了限制食物的措施！

那么，究竟什么措施才能让爱尔兰人的痛苦减轻一些呢？这样的措施是否存在？比如，人们是否能事先预测这场灾难的规模？19世纪下半叶，有一批学者著书立说，讨论他们认为的预示灾难的征兆；灾难发生在大英帝国另一属地——印度。征兆主要包括：气象周期（了解得还不是很透彻）；

物价指标，这是短缺的早期警告信号；还有对谷物储备耗尽情况的评估。他们尽管已经累积了大量经验，依然没有成功预报。所以，尽管19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出现了马铃薯歉收现象，这些早期的危机却依然不可能让中央或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应对1845年即将发生的一切。美国的作物遭遇了“致病疫霉”（Phytophthoera infestans）的真菌感染，于是，这种疾病有了一个可怕的绰号——美国马铃薯虎烈拉（the American potato cholera）。这种疾病的现代名称是“马铃薯晚疫病”。病变首先在叶子背面发生，最后将马铃薯变成黑紫色的糊状物。这种疾病，欧洲人确实从来没有见过。比利时、尼德兰，还有爱尔兰，是疾病首先侵害的欧洲国家。直到这个时候，人们（尤其是很多受邀发表意见的植物专家）还认为这种枯萎不是病因，而只是一种症状；他们以为真正的病因只是天气的异常寒冷加上大雨持续了一段时间。1845年，作物减产只有四分之一了。都柏林的官员们极力避免成为“杞人忧天”的人，于是轻描淡写地把这种短缺称为“一种缺陷”。乐观的估计是这样的：只要天气转好，收成就能恢复相对正常。实际上，1846年夏天也确实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温暖而干燥。结果，人们先是误解了晚疫病，后来又雪上加霜，提出了错误的指导意见。尽管自耕农担心，来年可能没有足够的马铃薯做种，但官员们还是命令他们（或者至少没有阻止他们）只管挖掉块茎腐烂的部分，把剩下来的部分留起来，第二年再下种。微小的孢子安然越冬，藏在被感染的块茎里，播种到了地下。于是注定了第二年的毁灭。

先前，哪怕遇上好年景，爱尔兰的居民也有很大一部分挣扎在饥饿边缘。18世纪中期，爱尔兰有260万这样的居民；到1845年，变成了850万。其中三分之二靠着土地吃饭，绝大多数人占有的土地面积实在太少，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作“农场”。爱尔兰的经济，传统上以牧业为主，北部和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此时依然生产奶制品，出口到英国本土。然而，英国本土的工业化让农产品需求剧增，于是，爱尔兰就开始大量出口谷物，特别是燕麦和大麦。那些拥有资本，又拥有肥沃土地的农场主，就抓住了机会，发达起来。然而，爱尔兰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增速最快，这里的地主（经常是“在外地主”）就充分利用人多地少的不平衡局面，提高租金，压低薪水。到19世纪40年代，农民收入与耕地都严重减少，从而造成了大量半贫困状态的人口。当地共有135000块土地面积小于1英亩；770000块土地面积小于10英亩。爱尔兰的土地肥沃湿润，唯一能保证最高产量的作物就是马铃薯。每个爱尔兰人，不论男女，每天都要吃掉10～12磅马铃薯。而且，马铃薯几乎是爱尔兰人唯一的食物，如果幸运，才能喝到一点牛奶补充蛋白质；如果靠海，还能吃到一点鱼或者巨藻。



爱尔兰大饥荒，1845—1849年

皮尔政府中有些官员，早在1845年年末，就认为自己发现了某些农作物病害的征兆，类似埃及的遭遇。1845年10月，海军部大臣詹姆士·格拉汉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写信给首相说："看到上帝如何让各国的骄傲化为乌有，是非常悲惨的事情……上帝的天军，就是导致溃疡的病原体，

还有蝗虫；上帝一声令下，一种作物染了疾病，我们就看到一个国家垮了下来，伸出双手，讨要面包。”到12月，马铃薯和其他食物的价格翻了一番。皮尔当初1841年重新当上首相，是有人想让他采取措施，保留《谷物法》；但皮尔的态度却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如今，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利用爱尔兰危机来说服国会（特别是他自己所在的托利党）废除《谷物法》。皮尔秘密购买了价值10万英镑的美国玉米，派人碾碎，按照成本价运输到爱尔兰全国各个地方委员会管理的特别仓库。皮尔计划，这些储备粮，如果情况好，可以稳定价格；如果情况坏，也可以充当穷人的救命粮。此外，皮尔还期待着一个次要的成果：玉米糊可以改变爱尔兰人的饮食结构，让他们不至于太过依赖马铃薯。爱尔兰人一开始不习惯玉米糊，又害怕又怀疑，给这东西起了个外号：“皮尔的硫黄”（Peel’s brimstone）。

到1846年8月，第二茬庄稼也染了瘟疫。显然，爱尔兰已经深陷饥荒了。有一位著名人士——西奥博尔德·马修牧师（Reverend Theobald Mathew），目睹了惨状，写信给屈维廉请求更多的直接免费援助：“上个月27日，我从科克到都柏林去，一路上看到的尽是这毁灭的作物，在丰年中蓬勃生长。本月3日，我踏上归途，立即悲哀地看到了一片腐烂植被覆盖的荒原。很多地方都有可怜人，坐在腐朽菜园旁边的篱笆上，绞着双手，为了这毁灭了口粮的灾难而失声痛哭。”

皮尔的政治方向受到自己的托利党反对，却被辉格党大力支持。终于在1846年6月，皮尔成功废除了《谷物法》，几天后辞职。然而，新上台的辉格党政府，以约翰·拉塞尔勋爵为首，却对迅速增长的灾难无动于衷。有几年时间，拉塞尔实际上对爱尔兰地主的残酷剥削行为，采取了最激烈的批判态度。然而，正是因为他那样憎恨爱尔兰地主，才非常不愿动用伦敦的国家援助手段。他认为，一旦援助爱尔兰，就会让爱尔兰的地主免除责任，逃脱因自己的自私、贪婪带来的后果。如果上帝果真要鞭笞这些地主（当然，假定爱尔兰的富人不会让自己的同胞饿死），他拉塞尔又算什么，岂能阻挡上帝的手呢？这么想、这么发言的人，除了首相拉塞尔自己，还有他手下的财政大臣查尔斯·伍德爵士（Sir Charles Wood）。而且，这种论调，在查尔斯·屈维廉听来无异于动听的音乐。屈维廉一直怀疑皮尔太软弱；屈维廉还用尽一切机会反对任何人干预谷物市场的“自然”商业操作。屈维廉相信，政府的职责，绝不是出手干预全面收购谷物。只要价格适当（而且肯定适当），私人商业就自然会把谷物送到最需要的市场去。如果有谁出于一种错误的善意而操纵这些市场，那就是对上帝的自然经济秩序的放肆干涉！比如，要制止燕麦出口，是想都不能想的。[注]有一次，赈灾委员会主席伦道夫·劳斯（Randolph Routh）写信给屈维廉说：“我知道有人严肃而强烈地反对干预这些出口行为，但这样是一种最大的罪恶。”屈维廉回信说：“我们恳请您不要以任何方式来支持禁止出口

的想法。这样的措施，会引发严重的失望与不安，乃至无法产生任何正面结果，就连马上的正面结果也不会有……一定会有间接而永久的好处，在爱尔兰产生，使它告别短缺……爱尔兰能够发生的一切进步当中，最大的进步，就是爱尔兰人民能够学会自力更生，开发自己国家的资源。”

然而，在等待这个奇迹发生的时候，民众却越来越活不下去了。原先，皮特政府开始了一种贫民习艺所之外的救济措施，简称户外救济（outdoor relief）。现在面对爱尔兰民众的强烈不满，拉塞尔也继续了这种户外救济措施，但却采用修建公共设施的方式，来“考验人们的品质”。劳动的酬金（平均一天9便士）严格按照劳动量发放，而且劳动强度也故意设定得极高，好筛选掉懒汉。因为公共建设工程委员会主席哈里·大卫·琼斯（Harry David Jones）曾写报告给屈维廉说：“我相信大家都认为，政府尽量多地利用劳力，是一种公平的机制。”工人必须挖掘并砸碎大量岩石，累得精疲力竭，才能获得一点少得可怜的报酬。克莱尔郡（County Clare）伯仁高原（High Burren）的工地上，监工用一个黄铜环来鉴定工人是否把石头砸得足够碎，只有符合标准，才能领到一小时3便士的报酬。而且，这些修筑的公路，似乎并不能通往什么真正的地方。克莱尔郡有一个亨利·奥布莱恩上尉（Captain Henry O’Brien），写信报告：“工人确实是为了薪水而工作，然而他们看得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价值，于是就说，自己的心思不在工作上了。”

这些招工的团体，尽管非常残忍，却是走投无路者的唯一活路。伦敦政府接到一个坏消息：爱尔兰赈灾部门先前一直拒绝妇女儿童来工作，而现在却感觉，乞求工作的妇女儿童越来越多，再也不能拒绝他们了。1846年的冬天格外严酷。12月，招工团体的雇工已经有441000人之多；1847年3月，又增加到了714000人。灾情最严重的爱尔兰西部各郡，例如克莱尔郡，全部人口的20%以上都凭着此类重体力劳动勉强糊口。至于劳动的艰辛是否让一些人死于非命，在灾难的记录者眼里看来，只是一个统计学上的脚注而已。

此时，还有一些更加令人发指的惨景，被英国报纸报道了出来。1846年10月到1847年1月，有一所济贫院里的住客死了266人。报纸不仅报道了死者和濒死者，还发表了死者的验尸报告。死者在生前吃过各种烂菜叶来延缓死亡，这种菜叶平时只会当成垃圾处理。1847年1月，都柏林的《国家报》（*The Nation*）重印了梅奥宪法报的一份验尸报告，说：“格列尼达（Gleneadagh）一小块农田中有一个羊圈，一名妇女布里奇特·乔伊斯（Bridget Joyce）和四名儿童就死在这里……显然，死者与家人已经贫困到了极点，其中一名儿童只有一滴水、一点雪，来润湿临死的母亲嘴唇。尸体在那里躺了八天，才有人设法弄来几块板子，做成一个棺材，因为本地给了结论——饥饿致死。”

有很多小女孩卖掉头发，来救自己一命。多内加尔郡的母亲走上数英里路，卖掉一点羊毛，才能买上一点食物给家人糊口；尽管那些灾民最喜欢抢劫的目标，就是带着食物的女人。田芥菜，一种野生的卷心菜，几乎成了灾民的一类主食，家家户户走到种着田芥菜的水田里去，把嫩菜叶撕下来，带回家里煮。然而还是不够。死人太多，公共墓地都填满了；有些家庭死了人也不敢报告，这样他们收到的救济就不会减少。而且，乡村牧师也大量饿死，导致新生婴儿经常在临死前无法接受洗礼，因而无法埋到那些被祝圣的墓地中。有人看到，不少母亲背着死孩子，走到很远的墓地去埋掉。在大西洋岸边的康尼马拉（Connemara），似乎是由父亲背着死孩子来到海边，来到大海、陆地，天空的古老边界线上，挖出浅浅的坟墓，摆一块粗糙的石头当作标记，这石头是从悬崖上凿下来的。于是出现了很多风吹雨打、长满青苔的石头，三四十块摆成一个圆圈，石头灰色的锯齿边缘，指向各个方向，立在咆哮的拍岸浪涛旁边。这些圆圈就形成了爱尔兰有史以来最哀伤的小坟墓。

屈维廉虽然还是相信，这一切都是带着伪装的好事，但毕竟害怕舆论的反应，这才全面启动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慈善业的机器。当时不仅爱尔兰，苏格兰也发生了土豆饥荒。于是，1847年1月，成立了“爱尔兰及苏格兰严重灾害赈灾协会”女王捐出了第一笔款——1000英镑；后来，协会创始人斯蒂芬·斯普林–赖斯（Stephen Spring-Rice）勇敢地邀请女王继续捐助，女王又捐了1000英镑，一共捐了2000英镑。巴林家族（Barings）、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伦敦主教、达尔豪斯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威廉·格莱斯顿，甚至连奥斯曼帝国素丹（Ottoman Sultan）也凑了钱，基金总额达到了470000英镑。屈维廉、皮尔、财政大臣查尔斯·伍德爵士都慷慨地捐了钱，基金用来在各地设立施粥棚。

维多利亚的慈善事业尽管蓬勃开展，但辉格党政府对赈灾的态度，却可以说更加严厉了。来参加筑路、港口工作的人实在太多，让原先“以工代赈”的虚伪借口再也不能持续了，这就让屈维廉和查尔斯·伍德爵士都为自己的行动感到十分忧虑。大批居民前来工地，形成流动人口，屈维廉等人也认为，这种情况让农村人口锐减。这是非常不祥的事。于是他们决定关闭了工地，取而代之的是慈善业支持的施粥棚。这项事业是贵格会教徒们发起的，也符合他们的一贯风格。根据1838年的《爱尔兰济贫法》（*Irish Poor Law*），建立了130家济贫院。当然，人们面临的选择，不是饿死，就是进入济贫院，忍受监狱一般的生活（济贫院里的劳工要穿号衣，跟家人分开，吃牢饭）。因此济贫院也跟先前的工地一样人满为患了。面对这种情况，都柏林的托利党议员威廉·格里高利（William Gregory）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规定只有土地拥有量在四分之一英亩或以下的贫农，才可以进入济贫院。格里高利修正案在现实中引发了悲剧的一个全新阶段，而且是一个极为残忍的阶段。即使最穷的贫农，绝大多数也需要多于四分之

一英亩的土地，才能给家人建起最原始的石头屋子，得到足以糊口的食物。现在，这些穷人既没有马铃薯，也没有钱，不得不把土地让给地主，换取济贫院的准入资格，否则就只能原地不动，活活饿死，还极有可能因为交不起租金而遭到强制驱逐。他们一点选择也没有。

这种情况，正是屈维廉盼望的“社会革命”的形态：最贫困的小农自愿，或者被迫来到港口或济贫院。不论自愿还是被迫，这种变化都能使得绝大多数经济上不可能成功的小块耕地，转化为佃耕农场；至少在屈维廉看来，佃耕农场将会拥有光明的未来。当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却是分娩的阵痛；产生的将会是一个爱尔兰自耕农的阶层。

查尔斯·屈维廉，以及伍德、拉塞尔等大多数政府官员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认为，这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给所有人都带来了教训。自私的地主们原先以为，英国财政部会采取措施，从地主多年的无知和剥削行径中拯救他们；而现在英国政府却告知——地主要自己负责济贫院的救济费用。这是为了让地主“自立”；就好比济贫院里度过的一段时间，好比坐客轮统舱前往新西兰，好比没了土地的劳工为新的“自耕农”工作；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贫农放弃旧日的私酒生意和土豆，参与经济变革。但实际发生的却几乎是一场动物般的生存竞争，最弱的最先失败。地主们向政府高呼救命，却徒劳无功。1847年年底，济贫院劳工已经达到10万人。这些地主不光确实要被迫承担济贫院的费用，他们还必须确保贫农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就不再回来。于是地主们采取行动，拆毁了很多农舍，砸毁了房子的屋顶。直到今天，克莱尔郡、梅奥郡、戈耳韦郡还散布着一些这样的废墟。1849年，克莱尔郡的基尔拉什（Kirush），有1200名居民亲眼看着自己的住处在短短两周时间里被强拆了。这些人很多还患有霍乱。梅奥郡的艾瑞斯（Erris）镇，有一位贵格教派活动家，名叫詹姆士·哈克·杜克（James Hack Tuke）。他看到警察在士兵的配合下，将家具碎片和厨房的坛坛罐罐从民居里面往外扔。他写道：

佃农们的茅舍，是他们的先祖修建起来的，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代又一代；如今，面对警察的刺刀，他们愤怒地争辩起来。他们很清楚，一旦茅舍被强拆，就只好住到最近的水沟里去，日晒雨淋。妻子与孩子当中，有些人注定要死掉……六七百人被赶走了，男女老少，母亲和婴儿都被赶走了，完全没有谋生的活路！有几户跟当局关系比较好的人家，当局允许他们暂时住下去，条件是他们答应自愿离开……当晚的餐会上，有位客人告诉我，地主夸口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田地，第一次走访佃农。

最顽固的幸存者们，在农舍的废墟上建起了一种名为“scalpeen”的棚子，蹲在一堆破烂当中。这个词来自盖尔语的“scailp”，意思是窝棚。

而那些被迫放弃土地，来到济贫院的人，也没有得救的保证。大部分爱尔

兰人都对济贫院冷眼旁观，表示厌恶。不论这些贫民看起来怎样穷困饥饿，一旦家庭的主要劳力，即所谓“挣面包的人”被证实一天收入达到9便士（完全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则他的妻子与孩子也可能无法进入济贫院。这倒有可能是一个恩典，因为济贫院人满为患，是霍乱、伤寒、肺结核的温床。济贫院的食物一般是汤或者爱尔兰麦片粥，作为“户外救济”而供应。然而，前来领取的贫民却经常不得不拖着营养不良的身体长途跋涉，从而经常只能得到美国玉米面；就连这种玉米面也会断供。

有一段时间，无情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竟然让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都听得厌烦了。到了1848—1849年，这些地方就开始流行一种“怜悯疲劳症”。尽管爱尔兰的赈灾负担，大部分是爱尔兰人自己承担了，但英格兰报纸还是怨气冲天，抱怨说，不得不为那些爱尔兰佬（Paddies）的绝望状态而埋单。爱尔兰人在这些报纸上，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半人半猿的、狡猾而不可救药的败家子，而且非常危险，富有革命性，他们乞求资金是为了购买武器，而非食物。1846年12月，《笨拙》杂志发表的一幅有代表性的漫画，画了一个爱尔兰人，向“约翰牛”（英国人代称）乞讨一点钱，说：“大人，求您给我一点零钱，让一个可怜的爱尔兰小伙子买一点……散弹枪吧！”约翰牛不为所动。

灾民还有最后一个逃离绝望的选择：移民。1845—1851年，将近150万爱尔兰人移民去了海外。1846年，有10万人离开，特别是爱尔兰西部、西南部各郡；1847年，20万人离开；而在1851年，饥荒已经过去之后，还有25万人一走了之，再也不回来了。至少30万人去了英国本土，不是聚集在利物浦这样的港口城市，就是聚集在伯明翰、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中心。这些地方，他们最容易找到工作；而且，1851年的一次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移民在英格兰找到了熟练工的工作。有些地主发现移民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从而下大力气，送人出去。典型的例子如罗斯科门郡（County Roscommon）斯特罗克镇（Strokestown）的梅杰·丹尼斯·马洪（Major Denis Mahon），花费4000英镑，让1000名佃农坐船去了加拿大。他们是坐统舱去的，这次旅程当然没有假日游轮那么惬意，条件非常恶劣，乃至这些客船得了个外号“棺材船”。马洪送出去的移民，还没到加拿大，就有四分之一在船上病死了。最后，1847年，有个佃农将马洪暗杀了。爱尔兰赈灾委员会有一位政府指定的领导——蒙蒂格尔勋爵（Lord Monteagle）。勋爵有一位侄子，就是年轻的爱尔兰诗人奥布里·德尔威（Aubrey de Vere）。他为了亲眼观察爱尔兰移民的贫苦境况，自己坐统舱去了加拿大。他写道，船上几乎完全没有卫生条件，水和床铺都很污浊，食物“质量很差，而且总是半生不熟……淡水做饭都很困难，无法洗澡；很多船上，肮脏的床铺，染上了一切令人可憎的污物，却从来没有制度，要求把床单拿到甲板上晾晒。”在爱尔兰新教贵族看来，还有一件更糟糕的事：船上没有祈祷仪式；而且，船长自己就贩卖格罗格酒发财，因

此也没有措施控制醉酒或“凶恶的堕落行为”。移民们到了目的地，进了收容站，例如魁北克圣劳伦斯河下游的格罗斯岛收容站。这里又马上开始了很久的隔离检疫期。检疫本来是为了避免乘客造成新的死亡，结果却恰恰造成了新的大批死亡。

当然，经历这一切磨难而幸存的人们，无论旅途的长短，都没有忘记磨难。有一位律师兼记者，名叫约翰·米歇尔，他并非自愿移民。1848年5月，米歇尔因为在《团结爱尔兰人报》上发表煽动性评论而被判处14年流放，流放地是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4年之后，米歇尔设法逃跑，来到了美国，变成了爱尔兰大饥荒回忆书写者当中最激进、最愤慨的一员。他坚持说，这场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来自英国的人祸。他说，全欧洲都有歉收，荷兰死了几百万人（这是夸张，实际上只死了几千人），但只有爱尔兰才有饥荒。“上帝确实送来了马铃薯的歉收，但英国人却制造了饥荒……150万男人、女人、孩子，被英国政府小心翼翼、蓄谋已久、无声无息地杀害了。他们在自己创造的丰富物资当中饿死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特别是美国，饥荒的真实悲剧，通过记忆的神秘转换，变成了一次爱尔兰版的“出埃及记”（Irish Exodus），铭刻了瘟疫、哀伤、家园的毁灭。悲剧还在继续：爱尔兰移民在美国各个城市，如波士顿、纽约、纽约州的波基普西（Poughkeepsie），都受到了排斥。他们遭受了“原住民”——扬基佬[注]精英的疏离和剥削，工作岗位也都是薪水最低、危险性最高的。这种情况，让爱尔兰人聚居的贫民区，有了更强的凝聚力；而且让他们有了一种类似原始部落的决心，要“为斯基伯林复仇”[注]。

在他们炮轰的残忍而无情的英国人中间，有一个人被妖魔化得最厉害，那就是查尔斯·屈维廉。爱尔兰作家说，屈维廉是罪魁祸首，引发了这场不为人知又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米歇尔作品的基调，把屈维廉描绘成了爱尔兰未来的毁灭者，不论有意无意：“我见到屈维廉鲜红的魔爪，插入了那些孩子的心脏；他的官样文章，将孩子们驱向了死亡。”这种对屈维廉的愤怒声讨，持续了一代又一代，最有名的作品是塞西尔·伍德汉–史密斯（Cecil Woodham-Smith）的纪实《大饥荒》（*The Great Hunger*，1962），书中几乎是在控诉英国政府有意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屈维廉和一些政府官员确实存在偏见，认为爱尔兰必须经历巨大痛苦，才会向现代化转型，为此做出了悲观而偏重道德解释的结论；然而，面对饥荒的痛苦，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喜悦。不过，这种冷眼旁观也可能过了头，变成了强烈的反感，将实际的悲剧看作一场通俗闹剧。有一个流行的谚语：不要把洗澡水跟孩子一起泼出去，而英国政府在倒掉不良的民族主义政策的同时，也似乎确实把那些惨死的孩子们倒掉了。死去的孩子们并非编造的故事。有可能，屈维廉和英国政府既想脱罪，也想迫害。因为，倘若屈维廉并未想故意杀掉、除掉大批爱尔兰人，他也没有

因为这些爱尔兰人的消失而痛苦万分。如果屈维廉可以免除“恶意企图”的罪名，那至少可以判处他“愚昧迟钝”（obtuseness）的罪名。屈维廉既有着荒唐的信心、盲目相信上帝的意志，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懒惰”而“不自立”的爱尔兰人，必须经过痛苦，才能学会自立。有了这荒唐的信心和偏见，愚昧迟钝就在实际上产生了致命的结果。

而且，英国也并非所有人都是屈维廉这样高高挂起的姿态。罗伯特·皮尔爵士也同屈维廉一样，是坚定的自由贸易支持者，然而在危机面前，皮尔愿意把教条放到一边。之前提到，皮尔秘密购买了价值10万英镑的美国玉米运到爱尔兰，毫无疑问，这些玉米在1846年救了很多人。等到屈维廉和拉塞尔发现还需要增加进口，已经太迟了。屈维廉坚持盲目的乐观主义，认为爱尔兰通过收取社会转型的“自然”利益，长此以往，就会贴近英国。然而，很多人的结论却正好相反，认为这一措施会撕开联盟的伤口，而且会让联盟流血至死。《泰晤士报》一名记者写道，无论发生了什么，一代又一代的爱尔兰人都会记得：“在可怕的痛苦中，面对上天降下的临时的灾难，他们只有放弃财产，才能得到救济。英国还制定了驱逐爱尔兰人的法律，给制裁他们、从法律上消灭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尽管我们高兴地断定，这些政党没有任何恶意，但他们（英国政府）却理性、安静而极为无知地犯下了极大的失误，不可收拾的大错；从法律的角度上说，比有意犯罪还要严重。”

屈维廉本人，则是要么完全不知这种公愤，要么置之不理，认为自己坚持那种“非情绪化的经济现实主义”是正确的，而坚持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反对和憎恶。这种情况，就好比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校长，虽然校长会鞭笞学生，却是为了学生好；校长辞职的时候，学生也会带着爱恨交织的心情记住他。屈维廉因为赈灾工作出色而被加冕为骑士，声望在英格兰达到了顶峰。19世纪50年代，屈维廉的大舅哥麦考利正在发起英格兰议会自由化的壮阔旅程，与此同时，屈维廉的职务，只是一个财政部的助理常务次官，但他却成了帝国命运的象征，帝国“无形之手”最有力、最权威的人物。屈维廉和斯塔福德·诺斯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调查了英国的文官队伍（Civil Service）。后来，他们在1854年发表了《诺斯科特–屈维廉的报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将英国政府从“贵族资助（aristocratic patronage）的牧场”变成了真正的“精英领导体制”（meritocracy）。当然，这种变革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大英帝国需要的最优秀的殖民地总督，也将通过专业技能的考试来选拔，而不是通过家族关系，或者土地、财富的势力来选拔。

19世纪50年代，屈维廉还决定，这种纯洁化的新型政府，需要新的办公场所，各部门集中化，但空间会更加宽敞。他设想的，不只是更大的办公室，而是一座“政府之城”。这样做要花费巨额资金，而英国财政大臣十分

吝啬，就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为了克服障碍，屈维廉辩解说，他的远景规划其实性价比很高：把临近的各部门连接起来，就省去了相互来往的出租马车费用。然而，他真正的意图却很明显，就是为了大英帝国服务。1856年，屈维廉发表意见：

我们有一项重要的国家使命要完成……这座城市（将来的政府之城），不仅是艺术和雄辩学的母亲，还是各个国家的母亲；我们让帝国的人口充满两个大陆——亚洲和非洲……我们还要把两个大陆的大量人口组织在一起，让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变得文明起来；而这些国家的居民，来到（伦敦）大都会的时候，他们应当看到一些符合大都会古老声望的东西。我认为，我所勾画的这幅蓝图……会把应得的荣誉，献给我们致力实现的各种合法权利，献给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传遍世界的、那种有组织的自由。

在委员会的说明中，仅仅外交大臣一人，就应该有一套接待室，一共五个房间，能同时接待1500名来访者；此外，大臣还应该拥有容纳50人的国宴厅，一座宽敞的图书馆。这样的设施已经不亚于帝国宫殿的设施了。

伦敦世博会的水晶宫，就体现了帝国科技和财政的力量；之前提到的建筑师查尔斯·巴里和奥古斯都·普金建造的国会大楼将要完工，使用新哥特主义的建筑风格，代表了英国“古老宪法”的延续。如今，英国的白厅街道上，一组威风凛凛的建筑耸立着，选址故意接近威斯敏斯特宫，中心是新建的外交部；这组新楼，将会使得“工业、自由、贤明政治”这三驾马车功德圆满。1857年5月，为了预先消除舆论对“铺张浪费”的指责，政府还采取了聪明的公关措施，专门举办了一次设计展，展出了218套建筑设计图，共有2000张图纸。展出的地方，特别选在威斯敏斯特大厅，这地方一般是国王发表讲话，或者遗体接受瞻仰的地方。

5月5日，就在设计展的同一个星期，印度德里的一个文官写信给伦敦的联络人：“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新闻。一切都安静、无趣。我们当然觉得天气很好，这个季节的天气太棒了。一早一晚十分凉爽，令人惬意……天花板上的蒲葵扇也基本用不到。”六天之后，第54孟加拉步兵团军官们血肉模糊的尸体，就被扔到了克什米尔门（Kashmir Gate）前面的一辆牛车上。当地学校的老师们，在教室里被杀害了。德里公报的主编，在校样旁边死掉了；他的妻子、母亲、孩子一同毙命。德里银行经理贝雷斯福德（Beresford）先生，也在钱柜旁边跟家人一起被害。亚洲反抗欧洲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爆发了。

---

1. 残忍功利主义（brutilitarian），brutal和utilitarian两个词的组合，对功利主义的讽刺。——译者注

2. 从现代眼光看，只要有一起，都是极为丑恶的事情，但当时印度却认

为完全正常，而且有些妇女还自愿殉葬。这可能掺杂了当时的传统观念。——译者注

3. 萨吉（Thagi），常见拼写为Thuggee，印度的一种强盗。——译者注

4. 迦梨（Kali），印度教的一种神灵，面貌十分凶恶。——译者注

5. 这次饥荒的名字是1837—1838年阿格拉饥荒，原因可能是1837年夏季的季风未能带来足够降水而导致的干旱。——译者注

6. 花境（flower border），指园林里一种用作边界线的花床。——译者注

7. 当时英国控制爱尔兰粮食出口，绝大部分燕麦等谷物都必须提供给英国。——译者注

8. 扬基佬（Yankee），英国人对美国人的蔑称。——译者注

9. 为斯基伯林复仇（Revenge for Skibbereen），这是一首爱尔兰民歌，作者是爱尔兰科克郡斯基伯林镇的一位诗人。歌词的最后表达了复仇的意愿。——译者注

第六章 “好心”帝国的红利

1857年5月9日，印度德里东北部密鲁特（Meerut）。孟加拉部队第3轻骑兵团有85名印度士兵被押到练兵场上，接受公开的惩罚。他们的罪名是拒绝使用新的李–恩菲尔德步枪（Lee-Enfield rifle）子弹操练，因为他们听说这种子弹上涂了牛脂和猪油。牛脂是印度教徒的禁忌，猪油是穆斯林的禁忌。暗沉沉的天空下，这85名不服管束的士兵被人剥下制服，脱下军靴，上了脚镣。他们戴着叮当作响的脚镣，被押送前往军事监狱去服刑10年。有一名年轻的骑兵掌旗官名叫约翰·麦克纳布（John McNabb），他觉得刑罚实在过于严厉了：“这比死刑还要糟糕。他们再也不会跟妻子、家人团聚了，还有一位可怜的老人，已经在步兵团服役了40年，本来能够拿到养老金，现在他一切的辛苦却都白费了。”

第二天，第3团的骑兵，还有第11、第20本地步兵团的军人闯入监狱，把囚犯们救了出来。军人们放火烧毁了泥土垒成的军营，杀了50个英国军官、平民，包括妇女在内，还把电报线剪断了。叛乱的骑兵们连夜赶往德里，第二天早上到了德里，宣布莫卧儿帝国光复。当时号称“德里之王”的巴哈杜尔·沙（Bahadur Shah），帝国最后的苗裔，已经年过八旬。兵变一发生，老人就陷入了窘境。他深居简出，独自创作华丽的波斯语宫廷诗歌。特别是，他对帝国光复的最终结果，从来没有抱着什么幻想。然而，被愤怒的叛军逼迫，又被首领们一半难堪一半动人的热情感染，巴哈杜尔·沙毫无办法，只好听任起义军用了自己的名义。起义军发表了多个宣言，号召人们铲除“外国人”（feringhi）的统治：“全体人民，不论男女老少，男仆女仆，现在均已负有道德上的责任，挺身而出，将英国人置于死地……方式包括发射枪、卡宾枪、手枪……射箭，用砖头和石块砸死他们……和其他一切双手能找到的武器……士兵、贵族、店主，与所有市民均应同仇敌忾，同时对敌发起进攻……有人负责用计谋或蛮力将敌人分散，有人负责用棍棒猛击敌人，有人负责打敌人耳光，有人负责向敌人眼里扬尘土……”

早在起义的士兵冲到德里之前，第38孟加拉步兵团的罗伯特·泰特勒上尉，就知道祸事已经发生了。11日清早，军方下令，将巴勒克布尔兵变第一名领导者处以绞刑。命令向本地军人公开宣读，以儆效尤。然而，这种惩戒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罗伯特用生硬的口气向军队宣读命令，与此同时，他听见了队伍中的回应。一排排军人窃窃私语。罗伯特说得一口流利的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准确地说是印度斯坦语中的一类——乌尔都语Urdu），把这些话的意思听了个一清二楚。后来，罗伯特又看见一群一群的人站在太阳地里，就让他们到阴凉的地方避一避。当时的气温高达

138华氏度。这些人却站着不动，回答说：“我们喜欢晒太阳。”过了一会儿，罗伯特告诉妻子哈丽雅特：“哈丽雅特，我手下的人今天表现实在太差了。我宣读命令的时候，他们就嘿嘿地笑，还用脚在地上拖来拖去。这样明显就是他们在同情那个被判死刑的士兵。”哈丽雅特此时已经怀孕八个月了。没过多久，她丈夫就跑来跑去收集弹匣，预防最坏的情况；不时也忽然走进平房，看一眼妻子是否安全。哈丽雅特觉察了非常不祥的兆头。仆人们慌张地到处乱跑，还有人拼命赶着拉车的牛，拉着轻型野战加农炮，在大街上小跑向前。法官的妻子，哈钦森（Hutchinson）夫人，没有戴帽子，头发松松垮垮披在肩上，抱着一个孩子，脚夫抱着另一个孩子，向着加农炮行进的反方向匆匆忙忙走过去。这是怎么回事呢？哈丽雅特的女仆是法国人，名叫玛丽。玛丽一定是1848年在巴黎待过，她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夫人，这是革命！”有人命令妇女和儿童，赶紧到“旗杆塔”（Flagstaff Tower）去集合，这是德里一座类似城堡的塔楼。尽管罗伯特之前让她留在家里，她还是服从了新命令，去了旗杆塔，救了一家人的命。旗杆塔里面楼梯上，有一群打扮过于华丽的维多利亚妇女、孩子、女仆，或站或坐，一言不发，战战兢兢，裙衬都让汗水湿透了。因为哪怕在阴凉的地方，气温也高达100华氏度。消息有如潮水一般涌进来：54团一名上校被自己的部下在克什米尔门用刺刀捅死。克什米尔门就在几百米之外。哈丽雅特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名叫弗兰克（Frank）。弗兰克问：“妈妈，那些不听话的士兵会杀我爸爸吗？会把我也杀了吗？”哈丽雅特后来写道：“他的眼睛特别蓝，是个很漂亮的孩子。我看着他雪白的小脖子，自言自语：‘可怜的孩子，这个小脖子很快就要被人割开，我却一点也没有办法救你！’这一瞬间非常怕人，但我还是鼓起勇气说：‘不会的，宝宝，别害怕。没人会伤害你，紧紧挨着妈妈！’”哈丽雅特又听说了更多坏消息：又有很多军官被害；有40名妇女儿童被人从避难所拉出来杀掉了；军火库被人炸毁，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德里全市，白色的烟云笼罩上空。全城都有人高呼：“统治全世界的君主必将得胜！”

罗伯特很熟悉士兵的语言，有了这个条件，或许能够说动一些同情他的士兵，护送家人从德里前往西北方向将近120英里的翁巴拉（Umballa），那里有一所大型兵站。罗伯特让士兵们跟他开诚布公，表明态度。有些人上来摸了他的前额，这是个好兆头。当晚月光很亮，行动十分危险。但他们还是冒险启程了，一开始跟另外一家人——加德纳一家（Gardners）挤在同一辆轻便马车上。加德纳的妻子也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后来，马车的车轮掉了下来，一行人又步行前进。哈丽雅特负着两个孩子，拖着自己沉重的身体，沿着公路、铁轨一路前行。哈丽雅特回忆说，她回头看着兵营那些火光熊熊的平房，“真是一个揪心的场面。我知道我们一切的贵重之物都已经永远失去了，那是金钱永远买不到的东西：一绺我死去的孩子的头发，很多手稿、油画，都是为了丈夫将来要出版的一本书；还有我自己的一切油画、图书、衣服”。众人终于来到翁巴拉，住在一辆牛车上，还

要时刻提防9英寸长的黑蜈蚣，咬到什么人的腿；一旦咬上，哪怕用刀子把蜈蚣除掉，也会让血液中毒。众人的头脑里，都是血腥一片的场景。为了转移两岁的小女儿伊迪丝的注意力，哈丽雅特扎破了自己的脚，脚上一流血，小女儿就可以“扮护士”，用自己的手帕帮妈妈止血。等伤好了再扎破，让女儿接着玩耍。后来，哈丽雅特在牛车的稻草上生下了一个男孩。为了纪念这场灾难，泰特勒一家给这个孩子强加了一个名字：斯坦利·德里–福斯（Stanley Delhi-Force）。因为孩子生下来就患有痢疾，众人都觉得这孩子根本长不大，不会为自己这个奇怪的名字“德里”而感到羞愧（或者骄傲）。哈丽雅特连一家人是否能活下来都不抱什么希望，身边随时带着两大瓶鸦片酊，一旦情况变成最坏，就用来让自己跟孩子同归于尽。然而，斯坦利·德里–福斯竟然真的活下来了。而且，对一些忠于英军的兵士来说，这还是一个吉兆。兵士们告诉哈丽雅特：如果有孩子降生了，他就是军队的第一人，后面的援军马上就到。第二天，援军就抵达了翁巴拉。

德里、密鲁特叛军瞄准的最早的目标之一，就是当时刚刚发明的电报线路。叛军剪断了电报线，杀掉了电报员，作为起义的开始，不可谓不恰当。这不仅仅是一种精明的战术，还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象征叛军对西方各种礼物的排斥：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科学，西方“文明”的一揽子措施。当初，麦考利、屈维廉曾经如此坚信，这些措施，会将印度和英国联系在一起，让双方拥有紧密而互惠的帝国关系。无论在印度或英国，都有人反复指责印度人“忘恩负义，臭名远扬”。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给这个懒惰而落后的国家带来了无数赠礼，乍一看，印度人竟然还忘恩负义，真是太邪恶了。这些年，印度有了最早的铁路，引进了西方的医药，也有了平版印刷厂，有了用通俗语言出版的书报；此外，当时的历任总督，采取了全新的施政风格，其中以年轻的达尔豪西侯爵最为激进。总督们批评司法部门和政府“堕落”，“沉迷在懒惰和奢侈中”，对体制改革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在一种财产兼并行为发生之前，被兼并者也要受到这样的指责，已经成了例行公事。这种兼并行为的前提，就是所谓的“无嗣失权政策”，规定：若某贵族没有男性继承人，则其财产即可被他人兼并。然而，印度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本土的贵族们，若没有男性继承人，则可以收养后代来继承家产，而且传统实际上鼓励贵族这么做。本土的贵族承认英国的权威，是同英国人达成共识的。这样的继承传统受到了粗暴践踏，违反了双方的共识。印度拉贾斯坦东北部地区，有一个拉杰普特统治的马拉塔（Rajput Marathan，拉杰普特是印度军人阶级，马拉塔表示该地受马拉塔政府管辖）邦，名叫詹西土邦（Jhansi）。土邦主（rajah）1853年去世，没有孩子。按照规定，他的遗产将会受到兼并。土邦主的妻子，拉克希米·芭伊王妃（Rani Lakshmi Bhai）向达尔豪西总督以个人名义提出抗议，却被轻蔑地无视了。四年后，印度兵变，起义随之爆发。拉克希米·芭伊成了印度中部骑兵游击队最强悍的领袖之一。

遭到冷落的土邦主们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这些兼并，大部分是源于英国的战略和财政利益，而不是源于建设“更好的政府”的高尚情操。英国主持的一些大规模调查，例如“英属印度版图三角测量大工程”，其首要目的也是为了提供军事情报。铁路和干线公路的建设，不仅会打开印度市场，还会让军队部署更加方便快捷。

同时，英国人发起的新的传教工作，也带来了新的麻烦。达尔豪西总督任期是1848—1856年。其间，因为他对传教过于自信，印度新建的平版印刷厂、印刷的传教书籍达到了空前的数目。英国在饥荒中制定了一项政策，规定英国人可以收养来自穆斯林、印度教家庭的孤儿，把他们培养成基督徒。印度本来就怀疑英国要发起一场新的改宗运动。不论这种怀疑是否被媒体夸大了，这一政策，都加深了原本的怀疑。锡达普尔（Sitapur）有一个平民，不幸被人们称作“基督徒先生”（Mr Christian）。兵变一爆发，他就首当其冲，跟妻子一同被枪杀了。这绝不是巧合。阿瓦德地区有一个领袖，是伊斯兰教女王，名叫哈兹拉特·马哈尔（Hazrat Mahal）。1858年12月，马哈尔为了鼓动叛乱者反对英国，宣称这场起义首先应该是一场伊斯兰吉哈德（jihad），即圣战，并列出了这个主张的一切理由。她说，英国人不光在子弹上涂了猪油牛脂，侮辱了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士兵，还有意让印度人在执行特定任务的时候，同欧洲人一起吃饭，这样就抹杀了印度人的种姓。她还说，英国人傲慢无礼地毁坏了神庙和清真寺，借口是需要拓宽公路；英国人准许基督教牧师走上大街，走进小巷、集市去传教；还建起了英国学校，让印度教和穆斯林儿童偏离信仰的正路。

1858年，德里的土邦主费罗兹·沙（Feroze Shah）为了给起义辩护，也发表了一系列宣言警告公众，说英国人要在产妇生产时，禁止印度传统医生在场，规定必须有西医参与；说英国人要规定婚礼必须有基督教牧师见证才算合法；说英国人要烧掉穆斯林和印度教的经书。这一个长长的指控列表当然纯属虚构，然而，近年来印度传教士的活动确实增多了，基督教文献也更普及了，对印度古代医药著作《阿育吠陀》为代表的传统医学，也开始了系统的嘲讽和贬低。这么一来，费罗兹·沙的指控也就显得真实可信了。此外，西方人在印度推广天花疫苗——牛痘，这是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发明的。而印度医生却回答说，早在琴纳出生以前，他们自己就在农村的穷人中间普及了牛痘药签。他们说得没错。

印度的通俗文献，将起义的吉哈德性质说得不容置疑。伊斯兰有一种保守教派，名叫瓦哈比（Wahabi），掀起了一种宗教复兴运动，在19世纪中期多个地区流行，从非洲苏丹西部到印度北部。文献认为，这次起义也是宗教复兴运动的一部分。早在1856年11月，一位大毛拉（Maulvi，伊斯

兰律法教师），名叫阿赫马杜拉·沙（Ahmadullah Shah）的，就在勒克瑙（Lucknow）到处宣传吉哈德。因为他的轿子前面有一面大鼓，得了个外号达乌卡·沙（Dauka shah），意思是“带着鼓的大毛拉”。这个圣人坐着轿在街上走，有一千名弟子唱着圣歌前呼后拥，有些人还吞下了燃烧的炭块。注 与此同时，圣战的信息传遍了成千上万的人。1857年2月，在法扎巴德市（Faizabad），有一名瓦哈比激进派代表人物，名叫阿赫马杜拉（Ahmadullah）的，因为言行极具煽动性，而被当局逮捕，进了监狱。6月8日，兵变者将他释放。他刚一出狱，就领着一群武装起来的追随者，去了勒克瑙。阿赫马杜拉并非孤单一人。在阿拉哈巴德，有一个利雅格特·阿里（Liaqat Ali）；在德里，有一个法扎尔·胡克·卡伊拉巴迪（Fazal Huq Khairabadi）。这两个人也在分别鼓吹同样有煽动性的言论。另外还有一个人，名叫卡迪尔·阿里·沙（Qadir Ali Shah），自称伊玛目（imam，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名字），据说追随者多达11000人。他信誓旦旦地发出预言，说起义的日期就定在伊斯兰历的一月，穆哈兰姆月（Muharram）的10日，这是这个月最神圣的一天。这一天，正是西历的9月11日！之前那位阿瓦德的伊斯兰教女王哈兹拉特·马哈尔公开宣称，这场战争“因宗教而起，而且为了宗教，已经有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实际上，历史上宗教战争死了那么多人，她也应该知道这次印度兵变是因为宗教原因而爆发的。然而，因为某些原因，对于1856年秋天到1857年春天穆斯林聚居区的宗教动乱因素，英国当局却似乎完全没有重视，或发生了严重的误解。当局唯一注意的，是因为子弹油脂引起的问题。

受到伤害的不只宗教感情。那些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化印度居民，审视了英国现代化建设者应该带来的经济利益，却发现这个体制好像更加重视统治者的利益，而忽视被统治者的利益。比如，印度铁路建设开始了，让谷物更容易出口（不论丰年还是荒年），来稳定英国本土的谷物价格。英国“工程建设”在印度的胜利之一，是修建了所谓的“印度长篱障”（Great Hedge），这是一道长达1500英里的篱笆，由荆棘和刺槐组成，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度东部奥里萨邦的盐被人偷运到孟加拉，同当地从英国柴郡进口的外国盐竞争。如有成功走私进来的盐，则要被征收惩罚性关税。为了强制执行这一歧视性措施，海关警方雇用的人手，多达13000人；而与此同时，在英国本土，伦敦和曼彻斯特的舆论正在假惺惺地宣扬自由贸易原则。

1851年伦敦博览会，展示了帝国贸易的成就，目的在于普及“互惠”的理念。然而，这些成就的受益者却大都是白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部非洲开普殖民地，殖民地生产者同英国本土制造者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确实初步建立了，殖民地也实现了有限的自治权。但从体制当中受益的“本地人”，却并非本地居民，而是白人定居者，不论是自由移民还是被迫流放到这里的罪犯。本地居民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财产被剥夺，人

口被毁灭。不论哪一本叙述这段历史的著作，只要提到这些国家自由贸易的殖民主义如何成功，就必须承认，殖民主义给当地文化造成的巨大混乱，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不幸的小事”，而是殖民主义成功的前提条件。殖民者认为，如果为了给澳大利亚美利奴绵羊提供大面积的牧场，必须迁移甚至杀光某个倒霉的本地居民部落，那么也必须把这些人迁移甚至杀光。在南非开普省，英国要开辟多个牲畜牧场，引起当地科萨人（Xhosa）强烈反对，于是双方进行了一次血腥而漫长的“开菲尔战争”。当初，巴麦尊首相宣称，和平与繁荣将手牵手踏上征途。莫非这就是他所说的征途吗？

此外，还有大英帝国的势力边缘范围（peripheries），那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拉丁美洲的政府。这些地方不是旧日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这些政府被说服实施现代化，理由是对自己的国家有利。而一旦这些政府被说服了之后，资本就会从英国的巴林、罗斯柴尔德家族等人开设的银行涌进这些国家，会兴建或者改建港口，从母国开来的崭新铁壳蒸汽船，在这里的港口和母国之间来来往往；铁路也铺设完毕，上面会有英格兰中部地区制造的各种火车奔驰起来；仓库和处理中心建了起来；商务领事、商务代办被安插到战略要地，为生产者提供运货商，向当地政府施压，要求降低关税壁垒，而且让贸易商不受地方法院管辖。没过多久，殖民地就会跟英国本土一样，出现贵族女子学院、歌剧院、赛马场；大家习惯下午五点喝茶，七点喝雪莉葡萄酒；大型的黄铜布丁模具，也会在殖民地的厨房里出现，从土耳其的西部港口士麦那（Smyrna）到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

巴麦尊在1830—1851年担任外交大臣。1855年开始，他又任英国首相，其风格一贯强硬蛮横，绝不道歉。他一直相信，只要凭着商业的计谋和能量，全球市场都应该被英国随心所欲地控制，这用一句英国谚语说，就是“变成英国的牡蛎”。然而，现实却是，巴麦尊与格雷勋爵注在英国陆军部（War Office）任职，倘若有必要的时候，他们却会毫不犹豫地用刀子撬开牡蛎，拿到珍珠。英国无论是在西非还是在下缅甸（Lower Burma，缅甸一地区名），都是这么干的。1852年，英国与缅甸第二次战争爆发，下缅甸被占领，缅甸丧失大量主权。又例如，中国当时无视全球经济的逻辑，拒绝向英国贸易开放通商口岸，也不给英国贸易商免除关税、治外法权，贸易商宣称这两样是保护自己安全有效做生意的必要条件，甚至当贸易清单几乎完全是麻醉毒品的时候也是如此——或者不如说，当贸易清单几乎完全是麻醉毒品的时候更是如此。这实在是无法理解的事！渣甸洋行（今名怡和洋行）（Jardine and Matheson）是英国的苏格兰贵族把持的。老贵族们可以愤怒地捶打《圣经》，义愤填膺地谴责异教徒的中国司法系统，裹脚、叩头的陋习；他们却也无耻地将“英国司法”和“公平自由贸易”这样的宣传，用于毒品帝国主义（narcoimperialism）。英国贸易商正在忙着将数百万人变为鸦片烟鬼。

这时，倘若清政府因为某种原因，要关闭内河，禁止贸易商进入，那么就必须给他们上一堂商业道德课，其方法就是用炮艇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袭击。于是，英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教训”了中国：第一次在1839—1842年；第二次跟法国一起，在1856—1861年。第二次的英法联军在北京烧毁了圆明园，理由之一是明白地告诫清政府，如果排斥“经济合作的欢乐”，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是英国占了香港地区，并强迫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岸通商，建立自己的行政和司法机构，不受中国法律限制；就好像这是天底下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一般。殖民者的托词一直是这样的：鸦片只是楔子的一个尖，这个楔子将要撬开这些反启蒙主义的“满大人”（mandarin）统治的中国，让中国拥抱西方现代化。今天让中国人抽上鸦片，明天就能给中国人灌输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样的自由主义学说。转眼间，就会有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穿上英国绒面呢的衣服，用英国谢菲尔德出产的刀叉来吃饭。这些人多么幸运啊！然而，英国与其他欧洲列强，却当然没有阻止古老帝国的毁坏，而是加速了这种毁坏；随着19世纪的流逝，中国越来越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这又给了殖民者进一步军事、政治干预的口实。就好像某些医生让病人得病，然后又大发慈悲，开价治病一样。

而印度，正是鸦片的最大供应商。到了英国世博会开幕那一年，鸦片已经占到了印度出口的40%，而且按照每磅货物的利润来算，鸦片远远超过了英国其他一切货物。20年前，屈维廉和麦考利曾经设想，良性的西方文化可以通过和平传播的方式，扩散到整个印度。结果20年后，英国势力却变成了一个积重难返的军事巨人，而且特别是在达尔豪西总督治理下，完全无法停止扩张的势头。当然，此时英国统治者有一种神经过敏的“恐俄症”，生怕大队哥萨克骑兵席卷中亚高加索地区各个汗国，占领阿富汗，沿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交通要地“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冲进毫不设防的印度河–恒河谷（Indus-Ganges valley）。19世纪40年代，英国在印度西北前线进行了两次侵略战争。1843年，打下了信德地区[注]；1849年，又占领了旁遮普地区的锡克王国。这些行动，本来属于赤裸裸的帝国冒险主义，然而，英国人却用“担心缓冲政权过于脆弱”之类的借口，以及“承诺这些地区并入英属印度之后将会更加安全”等措施，为自己的行为做了成功的辩护，而且通常都是侵略完了才辩护。

英军占领旁遮普地区锡克王国的事件尤其恶名昭彰。1839年，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去世。在他生前，英国人本来把他视为可靠的当地统治者，能够用来构筑坚实的屏障，防范受到俄国影响的波斯和阿富汗。但他一死，英国人的希望暂时落空了。达尔豪西总督的前任是哈丁子爵，即亨利·哈丁（Henry Hardinge），1844—1848年任印度总督。哈丁采取了惯常的措施，要在锡克王国安插一个傀儡大君（maharajah）。然而，国王的军队掀起了叛乱，于是英军展开了全面的军事行动。达尔豪西开战的目的，原

本只是给锡克王国一点惩罚，后来却改成了将王国彻底毁灭。英军一开始作战不顺，较为狼狈，之后调来了强大的孟加拉陆军，重拳出击，结局也就不用说了。战后，整个旁遮普大片多山地带全部受到英国人的直接统治；此外，旁遮普地区首府拉合尔（Lahore）原本有着很多传奇式的财宝，如今这些财宝也被一抢而空。达尔豪西本人则抢到了最有名的宝物——巨大的“光之山”钻石（Koh-inoor），还定做了一条带子，自己将钻石挎在身上，安全带回了孟买。后来，钻石从孟买用船运到英国，作为个人礼物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兰吉特·辛格家族的小王子，名叫达立普·辛格（Duleep Singh）。战后，他理所当然被罢免，他的家谱也被人刻意证伪，这么一来，就不会有人指责英国人篡位了。达立普·辛格发现“自己”的钻石被没收了，略为恼怒。其实这颗钻石也是锡克王国在之前跟波斯的战争当中抢来的。英国人允许达立普保管这颗钻石，条件是他必须在之后将钻石作为个人礼物送给英国女王。达立普点头同意，于是成了英国的宫廷宠物。他戴着头巾，穿着华丽的服饰，让一位德国肖像画家弗朗兹·克萨韦尔·温德尔哈尔特（Franz Xaver Winterhalter）给他画像；英国人承诺会让他享有绅士的生活与收入，还鼓励他改宗成基督徒，最后他也照办了。

于是，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达尔豪西，也自然地将贪婪的目光转向了阿瓦德地区。此地位于恒河与喜马拉雅山之间，幅员辽阔，资源丰富。1819年，阿瓦德地区受到英国挑动，宣告为独立王国。18世纪，此地被穆斯林“纳瓦布”大地主统治。这是一些守旧的财主，依附于莫卧儿帝国。当时的阿瓦德是印度各地区当中最繁华、发达的地区，河谷土地肥沃，城市人口众多。阿瓦德地区的首府是勒克瑙，人口约为650000，因葱郁的花园、鸣叫的孔雀、奢华的宫殿而著称；此外，还有清真寺的金色屋顶和宣礼塔，风味浓郁的豪华菜肴，加工精细的银器和珠宝，经过训练的强悍斗羊，充满肉欲的诗作，为帝国而建设的高级妓女团队。早期来到这里的英国旅行家、官员，即所谓的“定居者”曾经沉迷于此；有时候还有一些丑闻，如一个名叫詹姆士·阿基里斯·克尔帕特里克（James Achilles Kirkpatrick）的官员，爱上了一个贵族穆斯林女子，后来还娶了她。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东印度公司“谨慎得体”的形象。而且，阿瓦德的兵士几乎占了孟加拉陆军的四分之三，1850年，孟加拉陆军已经多达240000人，其中只有40000英国人。英国人称阿瓦德人“男子气概十足”而给予支持，觉得阿瓦德人是本地军人中最坚强、最可靠的，特别是在信德、旁遮普两地的作战当中；相反，孟加拉男人则是作风懈怠。表面上，阿瓦德仍是一个独立王国，按照协议，东印度公司借调阿瓦德士兵，进入公司的陆军。因此，从法律上说，阿瓦德士兵就是在“外国”服役，从而可以拿到双份津贴。更重要的是，这些阿瓦德兵士，一旦荣归故里，回到法扎巴德、萨隆（Salon）、锡达普尔、勒克瑙等地，就能穿着深红色的外衣，昂首阔步，以“高等人”自居，而且对人炫耀，自己不会受到阿瓦德一般的官僚作风的伤害。

勒克瑙原先是全印度各阶层、各种族最为混杂的城市。到了达尔豪西执政时期，本地人和西方人的居住区分隔变得更加明显了。不过，在种族隔离的方面，勒克瑙比起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地，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加尔各答“黑色之城”与河边带有花园的“白色别墅”泾渭分明。勒克瑙的旧城十分拥挤，从戈默蒂（Gomti）河向南延伸，其中心是甘吉（ganj）市场；每个地区都分别居住一种工匠，有银匠区、磨坊主区、面包师傅区、皮匠区等。这种区分一直延续到今天。大臣、贵族的宅邸，清真寺，花园等高档建筑，大都集中在这个“城镇集合”的西部、南部边缘。北部边缘地区，一块高地上，坐落着占地34英亩的英国总督府，美丽的凯塞尔班（Kaiserbagh）花园和一小块空地，将其与城区分开。总督府位于高地中心，由色调偏灰的玫瑰色砖块建成，带有古希腊多里安式的柱子、一道外廊、一座小型旗杆塔，还有一个凉爽的地下泳池。花园周围散落着教堂、邮局、金库，金融专员的住处，还有“夫人院落”，是行政长官“纳瓦布”的欧洲妻子住的地方。兵站的本体建筑，包括营房、平房、赛马场，在戈默蒂河与法扎巴德路以北数英里处。更远的西方，则是著名的贵族学校——马丁内耶学校（La Martinière），建筑是新巴洛克式，由法国雇佣兵、热气球冒险家、博学的克劳德·马丁（Claude Martin）设计并出资修建。马丁曾效劳“纳瓦布”大人们，后来又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如今，学校已经成了麦考利鼓吹的教育使命的象征。招收的精英学生们，学习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弥尔顿的著作，操练步枪射击。

勒克瑙的各个分区，尽管十分明显，却依然将总督府这样的英式生活中心，放在城市内部，而不是外部。这有一个历史上的原因：历任总督都说，在本地人社区当中生活，会带来非常舒适的体验。19世纪50年代早期，此地的总督是威廉·斯利曼爵士。这时，英国与殖民地温和的传统合作方式，似乎应用在阿瓦德并没有问题，而且英国在阿瓦德招募了很多士兵。这种合作的实施，似乎让一切剧烈变革都没有必要了。同时，理查德·科布登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正在猛烈抨击辉格党政府，说政府在多个地区鼓吹的帝国冒险主义，要花费巨资，残忍而没有必要；自由主义者还说，目前英国正在南部非洲、中国、缅甸、克里米亚进行多场战争，决不能在印度再挑起新的战争了。

不过，达尔豪西却几乎没有察觉即将到来的危险，把不久之后的灾难，扔给了他的下一任总督查尔斯·坎宁（Charles Canning）。达尔豪西认为，阿瓦德只有表面上的独立地位，实际上在他看来，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时的阿瓦德统治者是一个荒唐可笑的纳瓦布，名叫瓦济德·阿里·沙（Wajid Ali Shah）。据说他自吹最骄傲的事，就是成功培育出一只鸽子，两只翅膀一白一黑。此外，瓦济德还会花费多日穿戴珠宝，写诗，与他挑选的高级妓女厮混。这样的国家不仅奢侈腐化，而且危险。总督顾问委员会有一位外交秘书，名叫H.M.艾略特（H.M.Elliot），去世后，别人

出版了他的遗稿《印度史——印度本地史学家的讲述》（*The History of India,As Told by Its Own Historians*，1867）。艾略特生前曾经指出，容忍这种邪恶的不良体制，也是一种邪恶。对此，达尔豪西深表赞同。艾略特写道：“我们看见很多国王，甚至我们自己创造的国王，变得堕落，不问政事，纵情酒色。”怎么办呢？当然要立即把他们除掉了。达尔豪西也写道：“倘若英国政府继续容许这样的政权带着巨大风险统治下去，继续荼毒成千上万的人，那么，英国政府就会成为人神共愤的罪人！”而且，达尔豪西也盼着军事占领阿瓦德会得到大笔财富。当初自己冒险攻打旁遮普，造成了800万英镑赤字。若是有了阿瓦德的收入，就能让赤字大大减少。达尔豪西听说纳瓦布和大臣们“很狂妄”，私下里就跟朋友说希望那些人真的很狂妄，因为“在我卸任之前把他们一口吞掉，会让我非常满意”。于是英国殖民者开始吞并阿瓦德。尽管瓦济德·阿里·沙和心腹大臣们专程向总督求情，吞并还是在1856年2月完成了。达尔豪西带着不加掩饰的狂喜写道：作为合并的结果，“我们亲切仁厚的女王，又多了500万名臣民，还比昨天多拥有了130万英镑的收入”。在孟加拉做出的一个几乎是官僚主义的决定，立刻在阿瓦德城市和乡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夜之间，这个国家所有服务宫廷和贵族的子民，不仅被降级了，还被羞辱了；而这种降级和羞辱，欧洲老爷几乎是看不见的。

老百姓们大量返回农村地区，却发现还有另一个势力很大的阿瓦德人阶层，名叫“塔鲁克达尔”（taluqdar），有时候也说成土邦主。他们是一个层级贵族，拥有土地税的征税权。这样的制度在阿瓦德与印度北部其他地区，都赋予了这个阶层一套庄园的权利和义务，即刻让他们失去了很多村庄、土地、头衔。英国殖民者的官方理念是，像土地税这么重要的东西，应当直接管理，不能留给乡村贵族；他们还把这些乡村贵族，无一例外地称作“中间商”。这一称呼并不准确。英国官员的官僚主义思想，认为这些“中间商”是村子的外来人，而实际上，他们的头衔、地位、权威，都是从莫卧儿帝国时期延续至今，传承了很多代人。当年拉杰普特的武士们曾经支持过这些乡绅的祖先，作为回报，乡绅的祖先赠予了武士某些地区和村子。某些情况下，所谓的“土邦主”基本上就是农场主，而且通过家族和种姓关系，与农民联系十分密切。

英国人设想的是：改革之后，英国人的收入，在很多场合要少于在旧日“塔鲁克达尔”体系之下的收入，这是很慷慨的表现，因此农场主应该对英国人抱有强烈的感激之情。然而他们想错了。这次改革是“功利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救济措施”的实验，但阿瓦德实际上并不适合做这种实验。英国人觉得塔鲁克达尔和土邦主不过是一群收税的人，其实远不止如此。这些人扮演的角色，是庄园体制下的“保护人”，如同教父一般；周围簇拥着私人民兵，当时的居民还以加入这些民兵为荣。民兵驻扎在丛林深处的要塞中，要塞一般用泥或者碎石与水泥筑成，环绕着壕沟，武器有来复枪和

轻型野战炮。这样一来，乡村贵族们就拥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力。英国人做过一些浮光掠影的调查，结论是这种权力只是上层对下层的单方面剥削，实际也完全不是这样。乡村贵族在收税的同时，还负责照看村子的生计，在荒年救济灾民，安排婚姻，解决纠纷；此外，还资助当地的清真寺和神庙。有时候更是亲自参与收割庄稼。因此，英国人将他们的权力总体剥夺，这就不仅是除掉一个陈腐的统治阶级，而是一次严重的文化冲击，其影响波及了当地的市场、清真寺、乡村，使得入侵的东印度公司总督的形象，变得愚蠢、凶残，与本地人格格不入。1857年大起义的硝烟散去之后，很多英国人都表示，看到数以万计普通农民没有效忠英国人，甚至没有保持中立，而是坚定跟随塔鲁克达尔和土邦主参加起义，感到无比惊讶。而对于阿瓦德两大团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民众来说，这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很多“塔鲁克达尔”和农民家庭都有兄弟、儿子参加了士兵。阿瓦德被英国吞并之后，这些士兵依然继续享受“借调兵士”的身份，还能继续拿到双份津贴，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足以弥补大量错误政策带来的损害。早在“子弹涂油”事件之前，军方就有许多愚蠢行径，严重损害了普通军人的忠诚心。例如，达尔豪西总督在缅甸征战不断，有些高种姓军人受命渡海前往缅甸前线。可是按照宗教原则，高种姓的人禁止在海上旅行，否则会丢掉种姓。有人以此威胁这些军人，军人就向总督反映，虽然愿意去缅甸作战，但不希望渡海。总督听了回答：“啊，他们喜欢走路，是不是？那就让他们走路去达卡，在达卡像狗一样死掉吧！”（这些兵士的下场也果然如此。）此外，印度军人很注重个人荣誉，视当众受辱为最可怕的灾难。之前的几十年中，军方曾着力采取措施，避免公开侮辱军人。而此时却常有公开体罚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公开鞭笞，让局势变得十分紧张。对此，达尔豪西故意忽视，但新任的总督坎宁子爵比较警惕，觉得有灾难将要发生了。就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出现了一种谣言，说在坎普尔东印度公司新建的面粉厂，往面粉做的军粮当中，掺入了从恒河岸上收集的死人尸骨的粉末，专门用来玷污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信仰的纯洁；这样的阴谋诡计还有很多。这些可怕的传言，并非全都无根无据。印度人把牛看作圣物，然而当初，詹西地区被英国吞并之后，当局杀掉了很多牛，在瓜廖尔（Gwalior）要塞附近直接引发了不止一次暴乱。

印度兵变之前，发给士兵的新式李–恩菲尔德步枪，子弹上涂了油脂，需要用嘴干脆利落地咬开子弹底部，才能装进枪膛。油脂事件并非当局刻意挑起的宗教冲突，而是在达尔豪西时代十分典型的做法，是无心之举。其实好像没有人知道引发冲突的油脂是否是猪油、牛油，或二者的混合，结果同时激怒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军方一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立刻采取措施，改为发放植物油润滑的子弹。然而损害已经造成，无可挽回。在5月9日的密鲁特，士兵们怀疑的“问题子弹”并没有涂上动物油脂，但他们没有

任何方法确认，所以绝不愿冒着玷污信仰的危险。这标志军官和普通军人之间的信任已经彻底崩溃了。英国人当初设立电报，是为了传递确实的情报，而不是为了传递谣言和预言，自己也经常忽视谣言和预言，从而付出了惨重代价。如今，在勒克瑙和德里的集市上流传着一个预言，说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绝不会超过1857年6月23日，也就是从普拉西战役开始的整整一个世纪！兵站里各团的士兵之间，通过撕开的薄煎饼和莲花花瓣，传递着各种加了密码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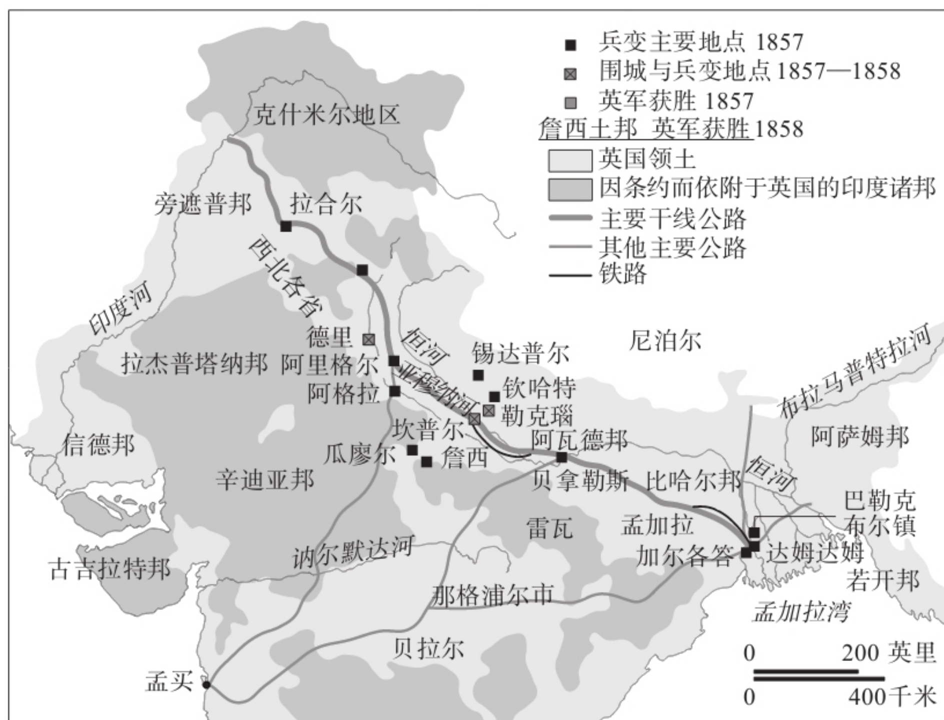
密鲁特、德里的起义爆发之后，才几个星期的时间，英国在恒河河谷的军力似乎就崩溃了。“英国统治就要结束了”这样的消息远近散布，从孟加拉陆军到印度西北的阿瓦德、拉贾斯坦北部，都被起义的火花点燃了。5月30日，勒克瑙士兵发动起义。勒克瑙北部80英里，有一座贡达（Gonda）兵站。这里住着一位23岁的女士，名叫凯瑟琳·巴特拉姆（Katherine Bartrum）。她是英格兰巴斯市（Bath）一位银匠的女儿，过着“印度平房式”的生活，丈夫名叫罗伯特，是陆军的助理外科医生，夫妻有一个15个月的儿子名叫博比。凯瑟琳发现他们的仆人态度发生了变化，让她嗅到了不祥的气息。很快，蒲葵扇、花匠、管家、厨师、看守人，以及女仆，全都一个一个消失了。这些仆人一消失，凯瑟琳所熟悉的、以为她在印度会永远持续的那种生活也消失了。她忧虑地写信给父亲说：“我觉得我们都变得极为紧张，这紧张使得我们恐惧。只要一有不寻常的声音，我们就会吓一跳；因为现在当地人似乎在渴望欧洲人的鲜血，谁又能相信他们呢？……已经有很多个夜晚，我们几乎完全不敢合上眼睛。我在枕头下面放了一把刀，亲爱的罗伯特则准备了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一有风吹草动就握着枪一跃而起；尽管若是真有人来袭击，我们逃跑的机会必然渺茫……”

局势突然恶化，一家人又听说了勒克瑙兵变，以及密鲁特、德里大屠杀的消息，还知道英国援军不太可能迅速赶来。罗伯特知道，想要凯瑟琳活下来，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带上她和小孩，前往相对安全、易守难攻的总督府一带。他们还得知，距勒克瑙65英里的西科罗拉（Secrora）会有一支军方的小型分遣队，将护送他们和其他被困的农村地区的妇女儿童前往总督府，但他们必须先抵达西科罗拉才行。于是，一家三口与另一位克拉克太太、克拉克的丈夫和小孩，都骑着大象出发了。然而，等他们到了西科罗拉，那支分遣队担心耽误时间，已经离开了。两家的丈夫都是军人，军方战事正紧，也都归队了。于是两名女士经过痛苦的思索，自己带着一小队忠实的士兵启程，顶着远高于100华氏度的高温，穿过贡达地区，前往“黄金城”（Golden City，总督府别称）的圆拱和宣礼塔。后来证实，贡达地区的土邦主，是最坚决的叛军首领之一。

6月9日，一行人安全抵达总督府。饶是如此，众人也心知肚明，救赎并不

容易到来。到6月底，8000～10000名士兵就把总督府团团围住，其中有700～800名骑兵。很快，起义军的所有2磅大炮就全部吼叫起来，此外还部署了12门野战炮，让总督府始终笼罩在炮火中。大炮就位之后，起义军立刻在炮位后面挖出很浅的战壕，使得炮手能以卧姿操纵加农炮，而自身几乎完全没有暴露，让守军的反击炮火无能为力。总督府内部仅有1700名男性充当守军，其中英军800人，忠于英军的士兵700人，余下的人则是从平民和商业殖民地征召的，还包括50名马丁内耶学校的军队实习生。阿瓦德行政长官是退役的准将亨利·劳伦斯爵士（Sir Henry Lawrence），此时已经身染重病，还与财政长官马丁·格宾斯（Martin Gubbins）争吵。因为格宾斯比较悲观，主张赶走总督府里的士兵，不给他们武器，而劳伦斯则主张继续让士兵留在总督府里面。

6月30日，亨利·劳伦斯爵士指挥守军，对敌人发起了一次试探性的反击。然而，守军却在钦哈特（Chinhat）遭遇伏兵而大败，狼狈撤退。伏兵的领导之一，就是先前那位宣传吉哈德的大毛拉阿赫马杜拉·沙。他尽管一只脚受了伤，却仍然带人追击撤退的英军。英军冒着枪林弹雨回到总督府，显然，接下来将会有一场严酷而漫长的围城，因为援军至少要过两个星期才能到达，而实际上整整87天之后才到达。总督府西方有一座要塞，名叫马奇·巴万（Machi Bhawan）。此前，阿赫马杜拉下令炮兵猛轰要塞，迫使要塞中的人员撤离。要塞中的英军死了118人，另有54名伤员被送回总督府，躺在垃圾上，用鸦片酊和酒精来麻醉，与此同时，别人再把他们炸碎的肢体截掉。绷带用光了，只能撕破衣物临时充当绷带。亨利·劳伦斯爵士本人则在自己的住处被炮弹炸伤，不治身亡。



1857—1858年印度兵变

到7月2日，叛军已经控制了勒克瑙的老城区。神圣的预言家阿赫马杜拉·沙在一位婆罗门教师的平房设立了司令部，深受穷人拥戴，而且挑战了阿瓦德地区伊斯兰教女王哈兹拉特·马哈尔的权威。哈兹拉特想让自己的幼子当上新的纳瓦布，只对德里的老国王巴哈杜尔·沙效忠。全城已经接近无政府状态。有个贵族，属于旧日勒克瑙上层精英，他描述了城市的恐怖景象，街道上到处游荡着武装团伙：

他们随便地走到富户门口，威胁富户，勒索钱财……他们从商店里拿走糕点、果泥、糖果。对所有人都恶语相向。他们从烟花工匠那里强买黑火药与各种爆炸物，给的钱又不够。他们在学校的住宅区花园里堆上一堆干草，点起火来，这样做出一堆堆篝火，照亮了全城。他们把住在帕卡·普尔（Pakka Pul）的米尔·巴卡尔·阿里（Mir Baqar Ali）抓来，在巴拉·伊芒巴拉（Bara Imambara）的门口用刀砍成了碎片。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干出这种天理难容的事……他们拿着出鞘的刀剑，横冲直撞。

从总督府的展望台上看去，勒克瑙全城似乎都笼罩在浓烟、喧哗、恐怖中。总督府里面的条件迅速恶化。凯瑟琳和博比跟一群妇女住在之前的女

眷房“夫人院落”。此处夏日酷热难忍，偶然一场暴雨会打断酷热，反而让情况更加恶劣。厕所满溢着粪尿，令人作呕。干草和饮水奇缺，牛和战马在总督府周围蹒跚而行，焦渴难忍，终于倒地身亡。到处都是牲畜的尸骸，是成千上万巨蝇的温床。总督府里面不得不选派人手，把尸骸从小嘴乌鸦和鸢的包围中抢出来埋掉。不论什么食物，哪怕是让凯瑟琳·巴特拉姆极度反胃的黑油木豆只要一拿出来，也会立刻有一群激动的人，吵嚷着扑上去。总督府内有一名法国商人德普拉（Deprat），围城早期，他把自己储存的加有块菌的香肠罐头分给了大家。此外，有些人住在阿瓦德财政大臣马丁·格宾斯的宅邸，他们也比较走运，分到了苏特恩白葡萄酒（Sauterne，法国葡萄酒产地），甚至还有香槟、罐头鲑鱼、胡萝卜、大米布丁。然而，这一切都不见了。很快，香槟就专门留给截肢病人用了，不幸的病人几大口就喝光一瓶。男人们渴望抽烟，不惜当掉或者卖出自己的衣服，或者金表，来交换一根雪茄；人们拍卖死者的衣物和财产，买者云集。为节约粮食，宠物狗全部枪毙。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维多利亚人的尊严面具终于裂开。外伤、霍乱、痢疾、天花导致一天死亡达10人之多。常有人用瓶装的啤酒喝得大醉。有人决斗，有人自杀，不少人大喊大叫。人们再也不顾扮相和礼数，很多人脸上长了疖子和痈肿。一些身为妻子、母亲的人，脱下了紧身胸衣，散开了头发，到处走来走去。有些比较庄重的人看到这种场面，很是惊讶。众人为了不让暑热与恐怖逼疯，身上穿的衣服只要够放松、够凉快，一切都不顾了。看似矛盾的是，几个月这种生活过去，被困的人却对打来的枪弹、炮弹习以为常了。直接中弹而亡，毕竟是上帝的安排，无可避免；而因为某种传染病而缓慢死去，却要糟糕得多。有一个英国商人L.E.里斯（L.E.Rees），来自加尔各答，参加了总督府的守城。他说：“炮弹擦过我们的头发，我们却对此不发一语，继续聊天；子弹在头顶上空掠过，我们却从来不提。九死一生的事情太过寻常，就连妇女儿童都不再注意这些事了。”里斯未必是在吹嘘！更可怕的是，敌人可能会在总督府地下挖掘地道，在死寂的黑夜中，总督府也许会突然“活过来”，充满了从地下冒出来的士兵。凯瑟琳当初的旅伴克拉克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当天，正好有一名士兵试图闯入总督府。很快，克拉克与新生的婴儿都奄奄一息了。她对凯瑟琳说自己将要远行，请凯瑟琳为自己准备行装。此时，凯瑟琳自己的孩子博比也感染了霍乱，凯瑟琳却还是在克拉克死前，将一切行李都准备好，放在了她的面前。克拉克的女儿很快也死了，过了两个星期，比女儿大一些的孩子也死了。

后来终于有两支小规模的援军，联合起来，用刀枪杀出一条血路，抵达勒克瑙。这两支援军，一支由阿瓦德新任行政长官詹姆士·乌特勒姆（James Outram）爵士带队，一支由少将亨利·哈夫洛克（Henry Havelock）带队。哈夫洛克从坎普尔来，坎普尔的叛乱分子之前对整个英国人聚居区进

行了一次野蛮的虐杀。坎普尔的英国人聚居区曾经被围困，敌军首领是纳纳·萨希布（Nana Sahib）——马拉塔政权的佩什瓦（总理），此外，纳纳还是起义的政治和战略领袖。他的副手是战地指挥官坦提亚·托比（Tantia Topi）。他们承诺让英国人沿着水路撤退。英国人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他们上船之后，却遭到枪击，被乱刃分尸。英国人还有大约200名幸存者，被押回坎普尔关押起来，之后全部遇害，尸体被扔进了一口井。之后，哈夫洛克重新占领坎普尔。坎普尔落到了英军上校詹姆士·尼尔（James Neill）手中。尼尔怒不可遏，下令处死一切被俘的士兵，有些士兵被大炮炸成碎片。尼尔又派人将那口井填平，改建成纪念碑，献给阿尔比恩（Albion，英国旧称）的第一批“殉难者”。哈夫洛克继续向勒克瑙进军，却正好要穿过士兵占领的地区，死伤惨重。后来凯瑟琳才知道，她的丈夫，军医罗伯特就在这时死掉了。他在总督府攻防战初期，要去救助一个伤员，被人击中头部身亡。

然而，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势头已经被遏制了。这种不稳定的局势，要么继续发展，冲破遏制，要么就只能衰落。而最终，起义也没有超出阿瓦德中心地区、北方各邦和拉贾斯坦北部一带。尽管这个地区本身很庞大，英军直到1858年才剿灭义军，到1860年才彻底安定局势，然而英军走运之处在于，东面的孟加拉东部（特别是加尔各答）和西面刚占领不久的旁遮普都效忠英国，没有参与叛乱。1857年9月，英军以较快速度收复德里，这场胜利具有重要意义，说服了摇摆不定的农民和城镇居民保持中立。此外，还有一些本地军人，实际上希望与叛军作战；他们除了尼泊尔的廓尔喀人（Gurkha）之外，还有锡克教徒。锡克教徒在1845—1846年、1848—1849年的锡克战争当中，曾经受到阿瓦德士兵的虐待，如今正渴望着报复。巴哈杜尔·沙一直小心翼翼维护着印度教士兵和穆斯林士兵的关系，于是二者关系相对比较好。然而，还是有些种族和地区原因导致的世仇太过强烈，没有办法让所有原住民形成哪怕初级的反殖民、仅印度的联合局面。

勒克瑙西南部有一座城市叫贝拿勒斯（Benares），是一座宗教圣城。詹姆士·尼尔到达坎普尔之前，曾经从加尔各答火速赶往贝拿勒斯，试图预先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尼尔采取了残酷的报复手段，焚烧村庄，大规模处决那些有勾结叛军嫌疑的平民。这一招果然奏效，贝拿勒斯周围的农村地区十分害怕，再也不闹事了。英军占领贝拿勒斯后，将其用作前哨站，预备向阿拉哈巴德和坎普尔进军。当初叛乱爆发的时候，英军忽视了那些毛拉、当地邮差、市场占卜师的不满言论，以及各种谣言，更没有用电报传递这些很重要的情报。因此电报在“倾听不满呼声”的任务上表现很差。然而，此时的电报却发挥了阻止破坏的作用。坎宁总督电告母国，自己缺乏人手。电报的速度，使得巴麦尊能够及时把计划派往中国的一个团调回印度。那个团本来是为了报复清朝海防军人侮辱英国国旗。

9月，英军占领德里。老国王巴哈杜尔·沙成了可怜的逃犯。之后，英军骑兵将领威廉·霍德森少校（Major William Hodson）在距离德里市中心16英里的胡马雍陵墓（Hummayyun）——国王祖先的陵墓抓到了国王，还有国王的两个儿子、一个孙子。虽然国王几乎不可能是真正的元凶，但英国人显然没有忘掉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一切。在接下来的监狱生涯中，他很快变成了一个可悲的老朽，被人围观、拍照、取笑。

总督府的被困者盼来了亨利·哈夫洛克与詹姆士·乌特勒姆爵士率领的援军，欣喜若狂。然而，这种喜悦十分短暂。士兵很快再次围了上来，于是这次解围并非真正解放，而变成了监禁的新阶段。有一次，大毛拉阿赫马杜拉进攻总督府大门——贝利门，险些成功。11月，科林·坎贝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领兵第二次解围，他的宣传手段是让风笛手吹奏一首苏格兰咏叹调《坎贝尔家族要来了》（*The Campbells Are Coming*）。坎贝尔终于开辟了一条撤退路径，顶住进攻，撤离了平民。在经历六个月的严重物资短缺之后，400名幸存妇女、儿童、男性平民终于离开了总督府，其中就有凯瑟琳和博比·巴特拉姆；此外还有1000名生病或受伤的英军。然而在冬季，“塔鲁克达尔”贵族势力动员的叛军再次包围总督府，阿赫马杜拉指挥叛军攻城，一系列攻势从12月持续到第二年2月。直到1858年3月，坎贝尔爵士带来25000人的大军，才终于收复勒克瑙，解救了总督府余下的人员。1858年6月15日，阿赫马杜拉战死，后来被砍了头，骨灰被扔进河里去了。后来英军占领了恒河沿岸所有大城市，但仍有一些叛乱的王公坚守在戒备森严的小型要塞，有些实际上从未真正投降。有一名叛乱贵族，名叫拉贾·本尼·马德荷（Raja Beni Madho），手下非正规军的骑兵游击队，针对英军孤立的前哨站进行了多次袭扰。谣言称，1859年11月，马德荷与坎普尔大屠杀的策划者纳纳·萨希布一起，在尼泊尔与廓尔喀人作战，双双毙命。詹西女王拉克希米·芭伊当时已经成了传奇人物。据说，1858年6月，女王在休息马匹、喝着冰果子露的时候遭遇偷袭。她嘴里咬着缰绳，双手各持一把刀，冲向战场，背后中枪，受了致命伤。[注]临死的女王在一座芒果园里，将自己从瓜廖尔大君那里拿来的金脚镯送给了部下，而后与世长辞。

凯瑟琳·巴特拉姆在加尔各答准备乘船回英国，儿子博比却得了重病。医生安慰她说，经过四个月的海上旅行，一切都会好的。启程的前一天，博比在“喜马拉雅号”（Himalaya）上去世了。凯瑟琳一个人回国，再婚，又生了三个孩子，1866年死于肺结核。

起义逐渐平息了，一场争论却逐渐升温：应当怎样对待叛乱的印度各邦，以及整个印度呢？此前，一些战地记者，如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等人，已经把德里、坎普尔、勒克瑙的惨剧传回了英国。然而，这些报道后来却加上了“虐待狂与受虐狂”风格的修饰，好让出

版商制造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英国人有一段时间大都相信，有些百合般纯洁的维多利亚女性，人称“阿尔比恩的天使”，被叛军强奸，又以性暴力的方式被肢解了。然而，从来没有证据证明发生过这种暴行。1858年，英国皇家艺术院举行了一次作品展，展品中有一幅油画，作者是约瑟夫·诺尔·佩顿爵士（Sir Joseph Noel Paton），标题是《纪念》（*In Memoriam*），画了一群勒克瑙的女人和婴儿，全都苍白虚弱，眼睛通红，痛苦不堪，但除此以外，身体倒十分健康；还有一群“嗜血的疯狂士兵”想要冲破这些妇女儿童的庇护所。有些评论家认为，这幅画实在太过低俗，不适合公开展出。还有些评论家认为，这幅画非常优秀，是现代精神的象征，值得为它专门建一座纪念教堂。不过，佩顿爵士为了回应指责，修改了作品，把原先色调暗淡的袭击城堡的士兵，换成了穿着格呢裙的苏格兰高地援军。

此外，摄影师也很快行动了起来。罗伯特·泰特勒与哈丽雅特·泰特勒夫妇，两人都会摄影。他们拍了一些勒克瑙周围的景象，后来用这些照片，当作哈丽雅特回忆录的插图。但是，商业上最为精明的摄影记者，还要数意大利人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比托在战事还没有平息的时候，就赶到德里，拍了60张照片；然后又回到勒克瑙，跟随科林·坎贝尔爵士攻城，又拍了60张照片，其中有一些是19世纪50年代最出名的蛋白银版（albumen silver prints）摄影作品。他选的摄影地点，都是加尔各答和英国那些关注兵变的读者最熟悉的地方：德里的克什米尔门、坎普尔殉难者的井、亨利·劳伦斯爵士被炸成重伤时所在的房间废墟、勒克瑙总督府弹痕累累的墙壁。最惊人的是，比托专门花了很大力气，再现了勒克瑙一座神话般宏伟的西坎达花园庭院的场景。西坎达花园周边有着围墙，在坎贝尔第一次攻打勒克瑙的时候，花园中曾有2000名士兵被杀。为拍摄这样的照片，比托专门把一些尸骨挖了出来，在庭院里扔得到处都是，但有一些尸骨看上去似乎是牛马的，而不是人的。《圣经》中耶稣前往刑场的路名叫“苦路”（Via Dolorosa），而这些记录兵变的照片，也就好像西方的耶稣受难剧中的“苦路”一般。勒克瑙印度人聚居区的大片地方，包括旧日的花园、宫殿、清真寺，都被野蛮地付之一炬，用来建设规模巨大的林荫道（主要是为了军队调动方便）。然而残损的总督府却保留了下来，成为留给帝国后裔的纪念品。米字旗在残破而焦黑的废墟上空一直飘扬到1947年8月14日印度彻底独立为止。

这些画面全都激发了英国人的复仇怒火。屈维廉的儿子乔治·奥托（George Otto）在剑桥联合会听见一名大学生演讲，反对实施宽容政策，演讲是这么说的：“只有从喜马拉雅到科摩罗（Comorin）的叛乱全部被粉碎，每一座绞架都被血染红，每一把刺刀都在可怕的负担之下吱嘎作响，每一门大炮前面的土地都洒满了破布、血肉、碎骨，然后仁慈的话语才能听见。现在还不是时候！”学生们全都热烈鼓掌。第一波英军将士本来准备好了，

想要满足这个复仇的愿望，将士兵绑在炮口轰成碎片，不留一个俘虏。然而，这样虐待狂式的野蛮处决却没有进一步扩大。考虑到反对“可恶的黑鬼”的种族仇恨情绪如此高涨，以及坎普尔、德里、勒克瑙等地确实发生了针对英国人的极为残忍的暴行，这一结局确实很不寻常。主要原因是坎宁总督下了坚定的决心，要遏制住无差别复仇的本能情绪。例如，英军将领威廉·霍德森手下有一支锡克骑兵的非正规军，他杀掉了老国王巴哈杜尔·沙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而且是在这些人投降英军之后。坎宁总督听说此事，大为惊恐。他下令本地军官，停止胡乱杀戮和集体处决，禁止焚烧村庄。虽然他因此在加尔各答和伦敦都被人嘲讽为“慈悲坎宁”，但他还是相信，这样的反应，无论在实际上还是道义上都是正确的。整个悲剧的过程中，坎宁都躲在文件柜垒成的防护墙后面，痛苦地思索着：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否有些事情没有做到？如果做到了这些事，就能避免这场残杀了！杀戮开始后，坎宁着力把起义限制在恒河河谷一带，并且成功了。如今，他绝不想让全印度感到疏离，从而危害帝国的稳定。坎宁也用了一些严厉手段，例如宣布阿瓦德全境为“没收土地”。但只有这样做，他才能向“塔鲁克达尔”们承诺：及时向当局俯首称臣，就能在将来重新取回自己的土地、头衔、城镇的各个行政区。先有惩罚，才能有安抚与恢复。坎宁实施的政策，得到了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夫妇俩写信给坎宁说：“坎宁会很容易相信，他感觉到的悲哀和义愤，女王也同样感觉到了。呜呼！在英国，公众仇视所有印度人和士兵，不加区分。这是严重的反基督教精神，女王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1858年11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发表文告，宣布东印度公司停止运营，英属印度直接由女王为首的当地政府统治，设立副王（vinceroy）、顾问委员会（council）、印度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还特别承诺，将会尊重印度的宗教和传统。坎宁对文告极端重视，专门在整个次大陆上做了一次远行，有大量军人随行，声势浩大。队伍在各地举行豪华的宫廷集会，高搭天棚，把“印度之星”勋章颁发给当地名流。坎宁又采取一切能力所及的措施，在副王和土邦主、尼扎姆（nizam）（一种君主称号）、大君之间，建立个人的联系。坎宁还有一项改革更加重要：当地贵族若没有子嗣，可以重新收养继承人，也就是恢复了最初的传统。坎宁还坚持让迈索尔城（Mysore）的大君们马上开始这样做。

于是，兵变就使得英国统治者对于印度这块最重要的殖民地彻底改变了态度。统治者不再坚持西化的梦想，而是采取了更加明显的保守主义原则，承认印度在未来一两代人之内，将不会实现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此外，政府最优先的义务，在于让自身的社会与机构保持健康，而且尤其不能受到暴乱的损害。这种思想转变，乍一看十分惊人，令人怀疑英国人有些精神分裂；实际上并非如此。1859年，屈维廉回到印度，任马德拉斯地方长官。当时新的中央政府企图征收所得税，屈维廉马上提出抗议，为此

还惹了不少麻烦。他在抗议之前，已经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印度文官机构的岗位，可以公开竞争，不歧视任何种族。当然，实际的情况是，印度本地人无论怎样试图让自己成为麦考利幻想的那种“棕色皮肤英国人”，无论怎样熟读弥尔顿、莎士比亚等英国文学经典，都从来没有在司法、警察、财政机构，获得任何一个明显高于仆人的岗位任命。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代人。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其主张是“所有人只要教育得当，都可以变得十分相似”。如今，这样的主张已经被另一个冷酷的“科学”事实代替了，认为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分别；19世纪90年代，时任印度副王的埃尔金伯爵（Earl of Elgin）抱怨，“生活在低级种族之间是多么可怕的事”，可以作为这种态度一种直白的代表言论。

19世纪下半叶，英属印度的繁荣事迹，大都集中在城市。然而，除了自由主义者，担任副王的里蓬侯爵（Lord Ripon）之外，英国统治者上至一系列其他副王，下至县税收长，都有一种普遍的态度，认为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这样的城市，充满了文员、商人、医生，以及读书过度、工作屈才的学者，已经变成了“混血之地”，不属于英国文化，也不属于印度文化。另一方面，“真正”的印度，则要到乡村有水牛的地方去找。统治者认为，印度城市已经开始赶着钟点运转了。这个印度滴答作响，孟买、加尔各答等大城市都蒸汽滚滚、热汗淋淋、忙忙碌碌，因季风的降水而泥泞不堪，充满了那些“小矮子”（英国老爷总是管本地人叫“小矮子”），戴着眼镜、怀表，撑着雨伞，因为时间表、邮政、火车、渡船而着急不停，而且总是迟到。文员的衣领沾满污垢；医生治疗一些名人，凭着特权了解一些名人内幕；“小矮子”记者们聒噪不停，拿着妄自尊大的三手信息，鹦鹉学舌般讲着自由主义的观点；自大的书呆子律师们在法庭上惹得地方法官非常头痛。而在城市的“外面”“乡下”“山里”，还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印度（当然，印度唯一从来不存在的属性就是“永恒”）。统治者认为，这个乡下印度是原生态的，“雄伟”而“壮美”；这些词也经常带着相仿的热情，用来形容某大君的小胡子，或者从西姆拉（印度北部城市名）（Simla）远眺的喜马拉雅山。

此时，印度职业摄影师的商机，并非记录兵变中遭到炮弹毁坏的城市废墟，而是自己用镜头创造的“印度画卷”。著名摄影师塞缪尔·伯恩（Samuel Bourne），“伯恩与牧羊人摄影工作室”的创始人，就是这样做的。这情况与18世纪晚期，英国旅行家发现边远地区“高贵民族的孑遗”十分相似。这幅热带画卷的地形，就宛如苏格兰的赫布里底群岛和英格兰北部的峰区：壮丽的瀑布，侵蚀的古老悬崖，丛林里用废弃修道院改建的寺庙。这些风景一般经过编辑，排除了当地的真正居民，因为英国人觉得这些小瘦子不符合浪漫主义的理想化精神。只有在为了说明物体比例的时候，才偶尔把他们包括进来，当作参考。

英国人曾经把印度的“野蛮”种族视为教化、传教的对象，但如今，人种志学者却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们，认为这种原始而民智未开的珍贵宝藏必须留存；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ers）上有一种原住居民，经常半裸，英国人也好奇这种情况，经常来参观他们，造成了很坏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开始拍摄原始部落女性的赤裸胸部。这些猎奇行动当中，规模最大的还要数印度贵族肖像画的研究；很多研究的展开还颇有戏剧性。研究的肖像，画的是戴着宝石头巾的小王子；皮肤黝黑的拉杰普特武士；喷了香水的丰满贵妇，身子外面罩着奢华的丝绸衣服。这些贵族，很多人都夸耀自己的“印度之星”勋章，这是女王和他们订立的契约，他们用对女王的绝对忠诚，换来了留在身上的华丽服饰。一两代人之前，英国改革家所极力反对的，正是这些特征。改革家声称要从“懈怠”和“懒惰”中唤起印度人。可是，在兵变的能量过后，少许懒惰似乎也不是坏事了。如今，英国人觉得：就让印度用自己的节奏，大象一般迈着慢悠悠的步子发展吧。忙乱的事，我们英国人来办就可以了。

过了一个半世纪之后，回顾当初，很容易看到：英国老爷们转而热捧这种新的封建异国情调，其实带着一种不寻常的自欺欺人。这种热捧发生以前，英国已经创造了一个由大型港口城市组成的世界体系。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其实对这个体系的依赖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英国也更加依赖阿萨姆（Assam）邦和缅甸的种植园经济。这种体制残酷地剥削当地人，给英国提供柚木、红木、茶叶，还有靛青染料。这染料看似诱人，实际上质量很少过硬（当时人们喜欢给染料添加各种化学成分，于是，这种劣质染料就比天然的染料褪色更快了）。英国还更加依赖一张关系网，这张网将印度企业家同英国银行家、船运商、保险商连在了一起。这些英国商业巨头，让进出口贸易的时钟滴答作响，永不停息。印度城市涌现了一些“暴发户”，当地名称是“印度先生”和“孟加拉绅士”。英国老爷们觉得这些暴发户自负虚荣，好像漫画一般，因此十分讨厌他们。然而，这虚荣的人们，却正好是英国出口业务蓬勃发展将要依赖的客户。

不过，另一方面，这种自欺欺人，也同样是维多利亚后期的英国（或者此时的英国一些最强大的声音）对自身的工业社会做出的反应。从经济上说，印度殖民帝国原本是作为整个大英帝国经济体一部分而规划的；然而，从文化上说，现在的英国人却把印度看作与英国工业社会相对立的事物。更不寻常的是，这种态度发生的时候，也正是英国在印度巨大投资开始有了回报的时候。这种“经济现实”与“社会评价”的脱离，是现代英国主要的不寻常现象之一。那些殖民帝国的高官，特别是新的印度统治者，已经不再是加尔各答威廉堡、黑利伯瑞学院走出来的那些最早的东方学专家和“知识技术员”了。他们是一些拥有“男子气概”（manly，这个词经常用来形容帝国精英）、“骑士风度”的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著名教育家，拉格比公学（Rugby）校长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的学派。这

一学派主张现代的利他主义（altruism），学员们发誓忠于坚定的正义，忠于军人般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一学派怀疑、贬斥“过度的理智主义”（Over-intellectualism），不论是在殖民者当中，还是在被统治的各民族当中。他们的集体精神特质，就是类似父亲、校长那样的严格坚定。

英国政治家里面，有一个人对维持“现代英国”的幻想愿景（不是现实愿景）贡献最大。此人就是先前多次提到的本杰明·迪斯雷利，虽然他的风格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校长。很多人觉得迪斯雷利是个愤世嫉俗的人。然而，即使他愤世嫉俗，他也是愤世嫉俗者当中最强大的一类，对自己操纵的各种幻想，至少有一半相信。你若是看一眼迪斯雷利位于白金汉郡的乡间别墅——休斯登宅邸，见到它格外豪华的装饰，可与怀特岛上的奥斯本宫相匹敌，若是想象宅邸的各个露台，上面布满了孔雀，那么就能更自然地认为，迪斯雷利正是这里的大巫师，或曰“魔术师”；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喜欢这么叫他。迪斯雷利的对手威廉·格莱斯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攻击他，其中最恶毒的语言是说，迪斯雷利是“亚洲人”（Asiatic）。背后的潜台词是：迪斯雷利本质上不负责任，不讲道德，而且无耻地沉溺于享乐、放纵、浮华矫饰。然而，迪斯雷利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人场合表现的性格，都有一种真正的“魔术师”威力，那就是能把这些人类的小缺点、不足之处，变成“眼睛凹陷的英国人”的象征，而非“外国人”的象征。在印度人眼中，他这种“洋鬼子”的刻板形象，很容易表演过火。迪斯雷利的父亲名叫艾萨克，一辈子是个乡村绅士，追求文学梦想；迪斯雷利还有个兄弟，是个农场绅士。迪斯雷利喜欢城市生活，但他也同样喜欢在休斯登的田野跟花园中漫步，欣赏奇尔特思（Chilterns，伦敦附近风景区）的风景。迪先生用煽情的渲染，回报了这片土地。他这么做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自己作为“贵族宠爱的犹太人”的聪明和幽默感。他确实相信，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的残骸”（wreck of nations），贵族政治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那些努力“遵守英国社会法则——追求和超越”的人，始终有途径进入贵族阶层。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迪斯雷利有两个身份：一是“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兼乡村贵族和英格兰教会领袖”；二是“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兼浪漫主义小说家，《坦克雷德》（*Tancred*）的作者”。是否第二个身份比第一个身份更不寻常呢？然而，第二个身份却正是迪斯雷利成功的关键。19世纪40年代，迪斯雷利是一个托利党小集团“青年英国”的年轻成员，这是一个不同政见者的集团。他在参加“青年英国”的时候，以及在1870年出版长篇小说作品集的时候，在前言里都表达了同一个理念：英国政府有必要重视“想象力”，这一品质的重要性不亚于“理性”。然而，想象力只在“否定”的定义方面才有意义。比如，功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只是一架感知机器，想象力就反对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有一个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的核心，想象力就反对自由主义；平均主义单调地强调绝对公平，想象力就反对平均主义；有些自由主

义的高尚人士大谈应当发起道德和公民的自我改进运动，想象力就反对这种运动。迪斯雷利没有“开创”什么，但他挖掘了英国人生活中一条丰盈而顽固的情感血脉；维多利亚女王也深受这血脉的影响。“想象力”反对以上一切，而重视历史记忆，重视过往岁月的鲜明感性，还力图为将来而重新利用这种感性里的某些成分。例如，哥特复兴式教堂的外观；某些仪式、典礼的保留和修饰……迪斯雷利的价值观，把英国的乡村生活、乡绅和佃农之间旧日的采邑制度，都理想化了。这些旧事物，在全球市场的压力面前迅速蒸发。迪斯雷利还非常推崇手工作坊和大学合唱团。奠定他事业基础的，是埃德蒙·伯克的浪漫主义雄辩学；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那些大红大紫的历史小说；是那些充满怀旧之情，号称“吟游诗人”风格的历史绘画作品，例如法国画家保罗·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简·格雷的处刑》（*Lady Jane Grey*）注；是建筑师普金为上议院设计的华丽内部装饰；是前拉斐尔派画家们“新骑士风格”（neo-chivalric）的画布；是往日桂冠诗人华兹华斯的、基督教精神的家长制主义；是现任桂冠诗人丁尼生以亚瑟王题材创作的国王叙事诗。迪斯雷利的人格，就相当于托马斯·卡莱尔加上微笑；相当于查尔斯·狄更斯戴着白色的丝绸手帕，跟这两个人只有略微的不同。

19世纪40年代，迪斯雷利曾担任什鲁斯伯里议员。迪斯雷利激烈抨击皮尔，迫使皮尔辞职，因而名声大振。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皮尔设想，英国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工业化就像一艘大船，托利党就像一艘小船，只要托利党紧跟着自由工业化前进，就能够消除阻力，顺利发展。迪斯雷利对皮尔毫不留情地发起猛攻，主张托利党的未来绝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让自己同辉格党宗旨或者自由主义完全一致，而是应该相反，要信仰跟自由主义完全对立的那一套价值观：王权、教会、国家；后来，他还加上了第四个要素——帝国。皮尔认为托利党的领袖应该为现行体制感到惭愧，需要谢罪；迪斯雷利却认为，托利党领袖们绝不该这么做，而是应该夸耀现行体制，这么做，首先是为了英国本身的“岛国”利益。“青年英国”的宗旨，却是拥抱“老旧英国”。

这种立场，乍一看，纯属堂吉诃德式的无用功，然而结果却变成了一种天才的策略。社会上大规模的自我否定，却变成了政治上有价值的事物。这样的政治行动理论，几乎让19世纪其他一切理论陷入困惑，不仅包括密尔、麦考利的理论，也包括马克思的理论。出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局面：公民权扩大之后，受益的劳工阶层竟然更少关注政治上的平等主义，而更多关注了社会改良；不去在自由主义者当中挑选解放者，组成政治联盟，而要求干净的水源，卫生条件改善的贫民窟［这一点被格莱斯顿错误地嘲讽为“阴沟政治”（the politics of sewage）］，追求“煽动性的英帝国主义”。有谁能想象这样的情况呢？然而，迪斯雷利却说，他一开始就料到了这一点。1867年，迪斯雷利在担任下议院领袖的时候，倡导通过了《第

二次改革法案》（Second Reform Act），进一步扩大了选民范围，在自由主义者自己的游戏中，出了王牌，打败了他们。迪斯雷利说，劳工阶层一旦能自己投票，就不会变成发起革命的“特洛伊木马”，而会走向反面，变成“最纯粹、最清高的保守派”，以这种身份，他们会“为祖国而骄傲，希望保持祖国的伟大之处；因自己身为伟大帝国的一分子而自豪，并竭尽所能让帝国延续；相信大英帝国的伟大，完全要归功于这个国家的古老体制”。

不论迪斯雷利的直觉是否属于愤世嫉俗的类型，都至少有一点正确：有一次，格莱斯顿在私人场合用公开会议上的口气对女王说话，女王提出了抗议。迪斯雷利认为，女王说出了成千上万臣民的不满，从农场主到酒店老板都有这种情绪。格莱斯顿属于“自由主义宗教”的完美化身，他要求英国人每天都要进步，努力拼搏，纯洁自己的生活。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在街上搜寻失足妇女来救助；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心思，从早上睁眼一直忙碌到晚上闭眼。格莱斯顿和迪斯雷利，这两个维多利亚时期的政治巨人，其人格形成了鲜明对比。看一看他们闲暇的时候怎样打发时间，就明白了。格莱斯顿平时不是忙于对付公文箱，就是忙于翻译荷马的作品；等他允许自己闲下来，就会挽起袖子，在佛林特郡哈瓦登（Hawarden）的宅邸砍伐树木。时至今日，在哈瓦登的图书馆，还保存着一组他用过的斧子。图书馆是他的“和平神庙”。而迪斯雷利则会在比较合适的时间——早上七点半起床，看报纸，做一点政府工作，然后可能会在露台上养的一群孔雀之间散散步（孔雀是迪斯雷利最喜欢的鸟类），再去图书馆发呆，发呆的间隙认真阅读几份文件。他说，在图书馆，“我喜欢阳光洒在图书的装订线上”。而对于格莱斯顿，装订线的唯一作用是把有用的东西——图书内容——固定在一起。

用政策发出紧急道德命令，是迪斯雷利所怀疑的做法。尽管如此，他在政治上却一点也不懒惰。1874年选举的预备阶段，格莱斯顿努力为自己的改革派政府的记录辩护；而迪斯雷利则直接把战争打到了敌人心脏地区。迪斯雷利发出各种声明，表示劳工阶层对教会、王权、帝国的传统充满热情，而且比起政治平等，要更加关注社会改良。这些声明，实际上是现代托利党思想的生存方针。为了效果，他还特别选在自由主义的神殿——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和伦敦水晶宫，就此发表了多次活泼感人的演讲。这些建筑，很久以来一直被视为国际和平主义、各民族和谐相处的象征，视为创业拼搏精神的标志。如今，却被迪斯雷利的雄辩赋予了新的意义，变成了英国自我肯定的精神支柱。接下来的选举，完全证实了迪斯雷利的乐观主义。保守党在选举中获得了绝大多数的席位，仅在英格兰就获得了110个席位。上台的政府采取措施，实现了至少一部分承诺。英国担任内政大臣的是理查德·克洛斯，到那时为止还默默无闻。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让城市劳工阶层的生活，有了明显而具体的改善。这些措施包括，

对食品、药品更好的监管；立法治理河水污染，提高了水的质量；首次立法规范贫民窟的清拆（然而，却几乎没有地方政府遵照执行）；扩大了行业工会行动的合法性。

迪斯雷利已经发了面包，现在该用上马戏了。注 因为迪斯雷利承诺给民众供应“想象力”，对此的重视程度不亚于让民众填饱肚子，可能还有过之无不及。他还清楚，要想重新获得民众的关注，必须从顶层开始，从君主开始。阿尔伯特病故之后，维多利亚始终把自己裹在悲伤的蚕茧中，拒绝跟外界交流。迪斯雷利1868年第一次担任首相，然后立即开始对女王示好，要说服她重新参与公众活动。他的行动经过认真策划，大胆放肆。这也是他长期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确保君主制的未来安全稳妥。维多利亚长期不露面，使得19世纪60年代末到19世纪70年代初的共和主义发展到了最高峰。迪斯雷利认为，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女王自己似乎并不愿意被别人打扰，那么别人又为什么要关心女王呢？迪斯雷利之所以成功说服女王从自闭状态走了出来，是因为他真正被女王感动了。这个矮小结实的女家长，深受感情困扰，行为越来越古怪，难以驾驭。迪斯雷利的勇敢行为，或许只是一种手段，然而这手段却是带着如假包换的温暖和感情才起了作用。维多利亚在一次早会上见过迪斯雷利之后，写道：“他非常特别……但也非常聪明，善解人意。”迪斯雷利的策略是两种态度的混合，既有侠义的关心，又有厚颜的亲密。这是一场豪赌，然而却很快产生了奇迹。当然，这是因为迪斯雷利让她想起了少女时代陪伴她身边的墨尔本勋爵。勋爵早在1848年就去世了。迪斯雷利像墨尔本勋爵一样，经常给女王写一些古怪而充满花边新闻的信，告诉她政治家们的各种活动，以及他们办的蠢事。他也像墨尔本勋爵一样，鼓励女王对自己的王权，采取非常坚定自信的看法，乃至坚定到了不现实的地步。而这最后一点，是非常虚伪的，因为迪斯雷利之前一直反感阿尔伯特的野心。阿尔伯特想让英国政府的运作更多受到王室的影响，迪斯雷利则坚决反对。据前首相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所说，迪斯雷利认为王夫阿尔伯特的死，将会是“新时代的开端”。迪斯雷利一方面成功说服女王，让女王相信，自己正在倡导阿尔伯特的行事方式；一方面实际做的事情完全相反。这一点就显示了他的机敏所在。女王也给了迪斯雷利回报——两人亲密得不同寻常。他会跟女王坐在一起，跟她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同时向女王眨眼示意。1866年2月，维多利亚自从阿尔伯特去世以后第一次主持召开国会，距离上一次过去了将近5年。然而，女王召开国会的时候却闷闷不乐，抱怨这种例行公事，而且直接拒绝穿上礼服。不过，女王毕竟全心全意信任首相，因此也做好了准备，适当参加一些公开活动。迪斯雷利曾经赋予自己的党派一个新的身份，开创了现代事业。此时，他又如法炮制，指点了君主制的方向，安排了君主在人前重新露面的日程，扮演了有如剧院经理的角色。

这一切当中，有一个核心元素——王室的排场。女王尽管对自己的职务多

有不满，然而，“当上女皇”的前景，成功刺激了维多利亚对华丽庄严的欲望。当时土耳其驻埃及总督，称号是“乞迪夫”（Khedive），打算低价卖掉苏伊士运河股票来渡过难关。1876年，迪斯雷利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下，成功买下了运河股票，从而获得了欧洲前往印度的海路控制权，极大改变了英属印度的战略、经济前景。不过，这权力背后的操纵机制，却必须辅以王权的展示。前面说过，迪斯雷利认为，英国大部分民众不希望统治者催促他们无休止地做好事，提升道德水平；而希望统治者为他们做好事。这一理念，也符合兵变之后印度殖民政府的家长式统治作风。坎宁卸任之后，继续担任英属印度副王的是埃尔金勋爵。埃尔金之前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一切东方人都是小娃娃，只要给他们表面上的华丽服饰、典礼、头衔，就能让他们欢乐、感恩；并且只要允许他们享受虚假的尊严，他们就情愿放弃真正的尊严。”

自从坎宁在印度乡村获得各种进步以来，印度的历任副王就一直忙着给地方贵族举行名为“杜巴”（durbar）的接见典礼，发表演说，把“虚假的”维多利亚尊严，赐予印度王公。这一政策，恰好是达尔豪西主张的、残忍的“权利丧失兼并主义”的反面，也就是迪斯雷利风格的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在热带地区的投射：凯思内斯郡（Caithness）和剑桥郡的那些有封地的地主贵族，换成了印度巴罗达（Baroda）的“盖克沃尔”（Gaekwar，统治者称号）和斋浦尔（Jaipur）的土邦主。莫卧儿王朝时期，杜巴接见典礼一直是这样一种仪式：地方领袖对皇帝表示一种个人的、形式化的效忠，从而换取皇帝对地方领袖的保护。这种交换的象征是“互换礼物，赐予头衔和职位”。然而，英国人对仪式却有着实用得多的看法。他们把杜巴接见典礼变成了自己理解，而且擅长的仪式：为了彰显社会等级，好孩子擢升，坏孩子降级或者遭到忽视；此外，还会颁发一些小玩意儿——奖章、绶带、徽章。莫卧儿时代的仪式重视个人交流，而英国人主导的仪式则比较喧闹、浮华、冷漠。不过，英国举行这样的仪式，有着不容置疑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大起义之前，印军和英军的比例是6：1，起义之后，殖民当局小心翼翼地把这一比例调整到了4：1。在军事力量支持下，杜巴典礼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大君们排成一队，等着英国人颁发奖章。

女王自己虽然不能参加杜巴典礼，但她很乐意让孩子们去印度，传播自己的帝王气概。女王的儿子爱丁堡公爵（Duke of Edinburgh）阿尔弗雷德（Alfred），1869年访问了印度，见识了各种新鲜事物：老虎、大君、马球，还有带有雉堞（用于军事目的）的火车站。1876年，威尔士亲王伯蒂也访问了印度。除了以上那些元素之外，还安排了铜管军乐队、定制的银质象轿，还有忠实的包头巾的军人的检阅仪式。这些都是为了符合当局所宣称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头衔有了变化，从女王升级到了女皇”。从此，维多利亚不仅是英国女王，还是全印度的女皇（India-Kaiser-i-Hind）。这

个头衔，是一位学者戈特利布·威廉·莱特纳（Gottlieb Wilhelm Leitner）制定的。莱特纳是位于拉合尔（Lahore）的旁遮普大学学院（Punjab University College）的东方语言教授，出生在匈牙利。他相信，欧洲语言和亚洲语言都来自“印度–雅利安”（Indo-Aryan）语言的主干，后来很遗憾地分了家。英国有一位贵族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是未来的第一代利顿伯爵。迪斯雷利想让一位副王召开一次奢华的杜巴典礼，正式宣布维多利亚头衔升为“女皇”。他认为，利顿就是这位副王的最佳人选。

这一年，利顿44岁。这一职务选择他，可以说是极好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极坏的选择，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利顿的父亲，老爱德华·布尔沃–利顿，是一位大红大紫的小说家，专门写各种外国历史小说，代表作是《庞贝城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他跟迪斯雷利一样，深受古代浪漫文学的影响，可以算是同类。虽然老利顿是小利顿的父亲，但亲情却一点没有阻止父亲责骂儿子。老利顿认为小利顿拥有剽窃的天分。小利顿用笔名“欧文·梅雷迪思”（Owen Meredith）写了一些质量很低的诗（但女王显然非常喜欢）。他长相英俊，当过英国驻葡萄牙大使，过着总体上很孤傲的生活，也自知孤傲，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从政当官。在候选人的排名当中，他原本从来没有超过第四位。不过，利顿家族的宅邸，是位于赫特福德郡的纳贝沃斯庄园（Knebworth House），就在印度国务大臣的家旁边；而且迪斯雷利对利顿的“想象力”潜质，有一种用错了地方的自信，于是利顿的排名就大大上升了。只要有人要求，利顿无疑是能够摆出文雅姿态的。然而，他还是被人称作“经常被拍照的贵族懒汉，总是向右边歪斜”。之所以出现这种姿势，很可能主要是因为他患有慢性痔疮，或者因为他想要对付痔疮而染上了鸦片毒瘾，而不是因为他爱好新罗马式的矫揉造作，要像罗马人一样慵懒地歪向右边。利顿接到政府的邀请，大吃一惊。利顿完全不确定自己想要走马上任，尤其是因为他“对印度一切情况与问题都一无所知”。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让利顿这样相貌堂堂的二流诗人来主持典礼，大概也是装点门面的最佳选择。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康纳汀（David Cannadine）就是这么认为的。1876年4月，利顿来到印度。之后，他的注意力差不多都集中在完成迪斯雷利的梦想——华丽的杜巴典礼上了。典礼的会场也经过仔细选择，不是加尔各答会场宽阔的草坪，而是德里西北一英里半的高地——德里岭。印度兵变大屠杀的幸存者曾经撤退到这里，坚守了四个月。这种象征“英国烈士精神”的地方，跟坎普尔、勒克瑙总督府一样，成了殖民当局新来的官员必须“参拜”的圣地。现在，当局可以用盛大的场面，来驱逐英国人遭到屠杀、羞辱的可怕记忆。利顿全力投入了“让那些幼稚的东方人深感敬畏、惶恐顺服”这一任务当中。他认为，要想让全部臣民感觉到最高权威，其方式不是通过少数殖民当局的官员，而

是通过印度自己的王公和一切“上流人士”。这种态度，可以称为“新封建主义”。殖民当局的全能和伟大，将会说服那些印度王公，对英国无条件效忠；土邦主们又会转而影响千万臣民，将殖民当局视为真正的印度政府。利顿就此写过不止一篇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文章，这是他自己的特色。其中有一篇写道：“从政治上说，印度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即使前进，也一定是在服从支配下的前进；不只是服从英国的供养人，也是服从自己的王公贵族，不论这些王公贵族有多么专制。”

1877年，女王加冕为女皇的杜巴典礼隆重举行。评论界认为，这次典礼是一种针对麦考利罪行的忏悔。麦考利的罪行在于盲目信仰自由主义，从而创建了一个受到西式教育的印度人阶层。利顿如此描述这个阶层：“我们教会了这些印度先生，在本地报纸上写出了很多近乎煽动造反的文章。这些印度先生只代表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极不正常。”所以，殖民当局的法令文官机构再也不会雇用这些西化而富有煽动性的印度人，而是会雇用另外一个群体——王侯家族的年轻人。然而，现实当中，王侯家族的年轻人其实不会有兴趣接触利顿的下层官僚系统。于是出现了一个矛盾的情况：这次杜巴典礼实质乃是一种剧场式的幻想，但表面上却显示为古代印度的“真实情况”，那种王公、贫农、兵士、婆罗门系统的真实情况。供印度贵族们住宿的“印度营”（Indian camp）里，聚集了地位最高的贵族——300名精心挑选的印度名流，以及他们的家仆；每人都在营地里分到了一小块“土地”，各自土地上有各自的旗帜（加尔各答一个纹章学机构设计的）、盛装打扮的马匹、披着彩缎的大象。土邦主和大君们，按照家谱的悠久程度与所谓“独立等级”的不同，被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这个过程很是痛苦。值得一提的是，之前，在伦敦白厅的国务大臣办公室，这种等级礼仪就已经成了国务中的正式规定。办公室装有两套房门，以便同一等级的两位王公可以同时来访！1877年杜巴典礼，参与者的等级，先要看礼炮放多少响；礼炮数目又决定随从多少。因此，17响礼炮的王公［真正的贵族，例如巴罗达的“盖克沃尔”和海德拉巴（Hyderabad）］的“尼扎姆”可以带有500名随从；而11响礼炮的王公就只能带300名随从。虽然单个队伍看来不算庞大，然而合在一起，人数就很可观了。光是“印度营”的总人口就超过了50000人。还有一个“帝国营”，也就是白人的营地，也多达10000人，拥有自己的邮局、电报站、警察局。再加上14000名参加阅兵式的军人和其他人员，参加杜巴典礼的总人数达到了84000人，这已经是一个有规模的城镇人口了。负责维持秩序的是弗雷德里克·罗伯茨少将（Major-General Frederick Roberts）。1878年，罗伯茨少将就要为利顿去参加第二次阿富汗战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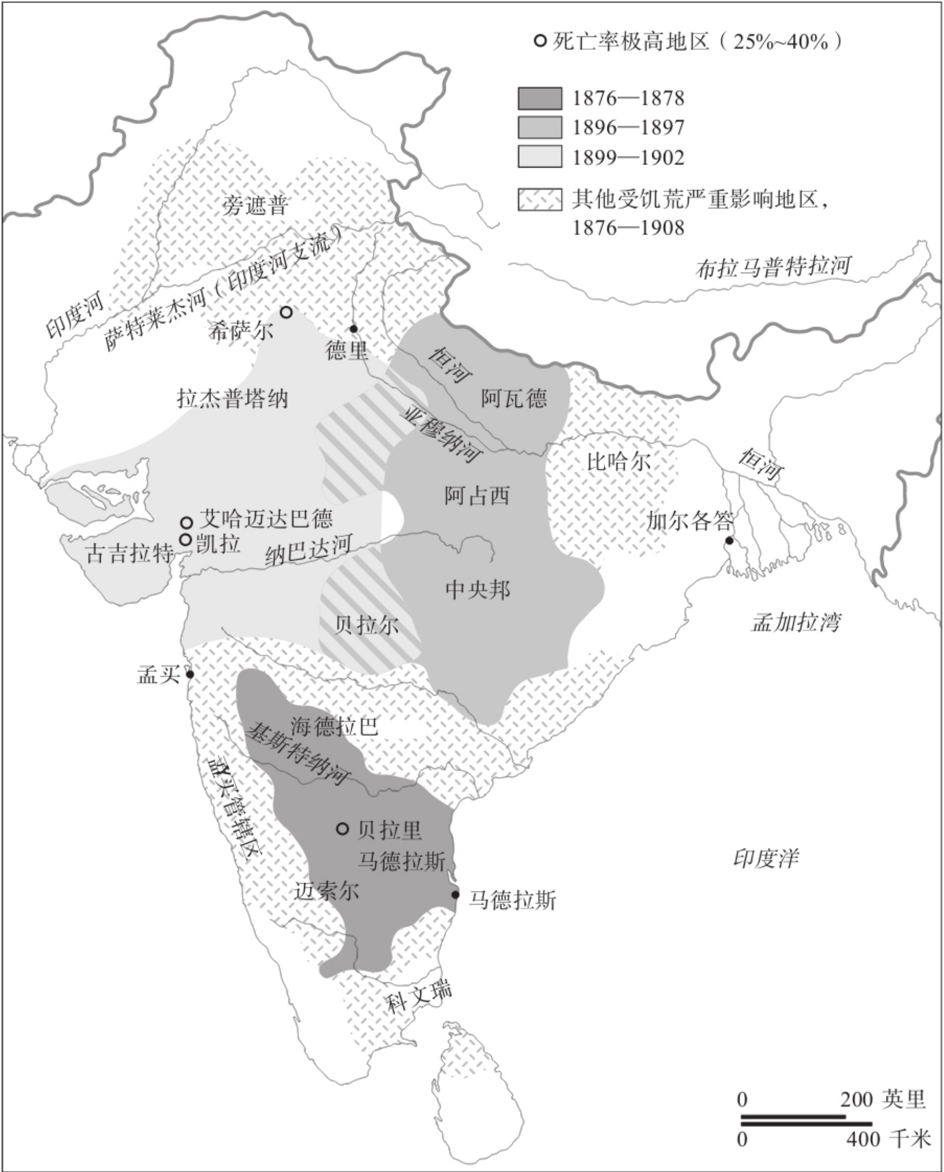
典礼上充斥着封建式的恭维话，绝大多数一点也不真心。还有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各种家族徽章；5英尺见方的横幅，非常笨重，扛起来十分困难；热衷纹章学的英国人专门铸造的各种饰物。这一切乃是19世纪哥特复

兴式艺术当中，对东方艺术的一种诡异而造作的总结；此外，也是“印度–撒拉森”（Indo-Saracenic，萨拉森是中世纪欧洲对穆斯林的称呼之一）的建筑风格，当时流行一时，象征着一种“普遍传统”的复活。因为英国人把旁遮普视为印度各邦中最“男子气概、英武作风”的地方，所以这次典礼——这次虚假的东西混血仪式，有很大一部分是旁遮普的元素。英国有一位著名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经长期在印度居住，写了不少印度题材的作品。他的父亲名叫洛克伍德·吉卜林（Lockwood Kipling），是拉合尔的梅奥艺术学院院长。老吉卜林接受了一个艰难的任务，为220英尺见方的副王讲台布置装饰。瓦尔·普林塞普（Val Prinsep），是一位艺术家，深受前拉斐尔派的影响。瓦尔受命绘制杜巴典礼，却因为非常厌恶典礼而不愿从命，尽管最后还是照办了。他说：“真可怕！我要画的是什么东西？这东西的丑恶，超过了水晶宫……副王的讲台，是一座深红色的神庙，足有80英尺高。从没有过这样廉价俗气的装饰品……庞大的尺寸，就好像一个巨型马戏团。”

对此，利顿则没有这么挑剔。典礼之前一周，利顿偕夫人坐着当初为了威尔士亲王制作的银质象轿，从德里走了三个小时，到了“印度营”。副王利顿深受痔疮之苦，这次旅程想必很不舒服吧。1877年元旦中午12点，伴随着德国音乐家瓦格纳（Wagner）的歌剧《唐怀瑟》（*Tannhäuser*）中的进行曲，利顿进入会场。吹奏进行曲的是一队小号手，穿着中世纪的制服。国歌奏响，之后是101响礼炮，响动极为惊人，有些大象吓得四处逃窜，踩死了不少观众。利顿高倨在80英尺的讲台上，宛如神仙一般。他镇定自若，以女王兼女皇的名义发言，声称莫卧儿帝国行将就木，上帝已经选择了英国来继承大统。利顿感谢了印度文官机构的“史上空前的社会公德与献身精神”，感谢了王公和部落首领的忠心，最后还说，印度人民终于受到了直截了当的教育，明白“帝国的永恒利益，需要英国官员组成的政府的权威监管和指导”。这演讲充满了专制气息，唯一对自由主义做出让步的方面是，本地人也可能允许参与政府事务，但他们应该晓得，必须有一个位置留给“天然的领袖”，也就是集合在帐篷里的那些贵族王公。最后，利顿宣读了新女皇送来的一封信，一如既往地承诺，她将会通过自由，以正义治理印度，并且促进“繁荣，以及先进的福利”。

1877年第一个星期，至少有一位英国高官很不愿前来德里参加仪式，那就是马德拉斯省长，白金汉和钱多斯公爵（Duke of Buckingham and Chandos）理查德·格伦威尔爵士（Richard Grenville）。印度东南大部地区，季风降雨不足，此时，这一地区已经被饥荒笼罩了。情况紧急，省长在仪式前报告副王，询问可否能不参加仪式。然而，利顿无视了省长的意见，回答说，他必须前来参加，因为长远来看，杜巴典礼的不足，对印度的损害将超过季风降雨的不足。于是公爵如约而至。就在这第一个星期，根据一名英国记者的报道，在迈索尔和马德拉斯约有10万人死于饥饿与霍

乱。



印度饥荒主要灾区：1876—1908年

兵变之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与当地人达成了默契：当地人效忠英国，英国设法改善当地生活。然而，每一个10年当中，还是会在某地爆发灾难

性的饥荒。1860年，旁遮普有200万人死亡。1868年，阿杰梅尔（Ajmere）四分之一居民死亡。1877—1878年，利顿治下进行了认真统计，历次饥荒夺去了超过700万人的生命。有一位早期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愤怒地警告英国人：1845—1849年的爱尔兰饥荒，夺走了八分之一爱尔兰人口，对此，人们确实有些痛心疾首的情绪；然而，1877—1878年，印度的死亡人数，却相当于整个爱尔兰的人口。

殖民当局对这场灾难没有无动于衷，然而大部分殖民官员，就如同在爱尔兰一样，因为“不干涉主义”的信条，而认为这是“自然”或“天意”，政府无力救济。但是，政府当然有能力救济，哪怕是用减税等消极方面的措施救济。例如，政府的官员自身，经常建议暂时停止征收土地税，或者暂时推迟征收土地税。1866年，官员们建议对奥里萨邦采取这种措施。然而，建议却被加尔各答的税收局否决了。税收局提出的建议，却与爱尔兰1846—1849年的措施惊人的相似：“不要让民众失望……要设法让民众自救……在奥里萨邦这样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乃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当初，殖民政府曾经有组织地破坏奥里萨邦的食盐生产。并不是用惩罚性的关税设法消灭食盐生产，而是直接立法禁止了。这就等于专门取消了本地人的收入，无法让穷人自救了。特别是有些年份，物资短缺导致价格飞涨，穷人就更不可能自救。如今，政府开始考虑让民众自救，这倒是慷慨了很多嘛！政府当然是可以进口谷物的；至少能够平抑物价上涨。也是在1866年，官员们再次建议进口缅甸大米。2月，收到了回信：“来信收悉……政府拒绝进口大米……如市场支持，则进口大米必然会流入普里，无经政府干预；否则只会带来损害。”

有一位殖民当局官员理查德·坦普尔爵士（Sir Richard Temple），深感孟加拉和比哈尔邦受到严重的饥荒威胁，担心将来会有灾难（不幸言中），在1873—1874年从缅甸买了大米，免费发放给最急需的人群当作口粮。然而，那些跟屈维廉思想一脉相承的人，却认为这是对自由市场的粗暴干涉，猛烈攻击坦普尔爵士。这些人就包括利顿。利顿发现坦普尔太用心赈灾了，需要对错误做出弥补；于是利顿任命坦普尔为赈灾代表，把他派到了南方的马德拉斯和迈索尔。这一次，坦普尔对赈灾没有那么用心了，于是，这两地的省长在公共赈灾和私人慈善事业方面，都变得十分“慷慨”，浪费了很多粮食。殖民当局通过了《反慈善捐赠法》（Anti-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Act），专门用来防止英国和印度城市救济灾区，据说，如果这样救济，就会延缓“软弱的”印度人自立的必然性。一般认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慈善事业无处不在；而我们看到这部《反慈善捐赠法》，或许就要改变主意了。坦普尔实施的救济体制，遭到了白金汉公爵，以及孟买长官——地位与坦普尔相当的菲利普·伍德豪斯爵士（Sir Philip Wodehouse）的强烈反对。而这种救济体制，其实较之爱尔兰19世纪40年代的体制更加残酷。这种体制提供的苦工，有的跟爱尔兰一样，又是砸石

头铺路；有的则是铺设铁轨。这些惩罚性的苦工换来的，是每日1.2磅的大米，加上一点木豆。利顿觉得，坦普尔的制度还是太仁慈了。于是，利顿从名册中删去了数百万人，禁止向有劳动力的成人提供救济，而且决定，劳动营方圆10英里之内的居民禁止接受救济。于是，极度营养不良的灾民不得不走上很远，才能获得很残忍的重体力劳动；而且坦普尔修改了制度，每天的大米减少到了1磅，豆子也没有了。

结局可想而知。有一名官员描述孟买德干的筑路工作类似“一个战场，路边到处是死者、濒死者，还有刚刚受到袭击的人”。一贫如洗，饥饿难耐的纺织工人恳求警察逮捕自己，因为听说进了监狱就肯定能吃上饭。实际也的确这样。与此同时，马德拉斯、孟买的粮食仓库却装满了进口大米，由军队和警察严密看守，防止偷窃和骚乱。有一些记者揭露：饥民就在储粮的栅栏前面倒下死去了。这些记者代表之一是威廉·迪格比（William Digby），他曾专门为印度饥荒出版了一套两卷的历史。到了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悲惨而荒唐的现象：印度那些铁路最多、经济上最发达的地区，却显然受饥荒的损害最严重，因为这些地区可以更容易将谷物运到各个市场，囤积起来，让粮食涨价，以追求最高利润。

1877年8月，印度南部和中南部大多数地区都已经沦为地狱。副王原本在西姆拉纳凉，这时终于屈尊，由白金汉公爵陪同，花了几天时间到马德拉斯灾情最重的地方走了走。关于救济营的问题，利顿副王在行宫给夫人写信说：“你从未见过这样的‘大众野餐’。救济营里的人什么工作也不做，脂肪要把身体撑爆了……白金汉公爵视察这些救济营，就好像白金汉郡的乡绅视察自己的模范农场，对饲养得最好的牛、猪越来越肥的样子极感兴趣。”然而，传教士和惊骇不已的当地官员、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霍乱病人爬向公墓，在墓穴之间躺下，成群的乌鸦、鸢在头顶上盘旋；无数饥民大军绝望地跋涉出英属印度，来到独立的海德拉巴等地方；这里的尼扎姆做好了准备，要散发免费的救命粮。有一位传教士写道：“最近，有个女人的尸体被挂在一根杆子上，像牲畜一般，被人沿着道路抬走了，脸有一块被狗吃掉了。又有一天，有个疯女人饿坏了，把一只狗的尸体搬走吃掉了，就在我们的平房边上。”女王–女皇治下的印度，这种景象是很常见的。英国政治家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当时很年轻，还是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印度的一切惨景，并未阻止他自信膨胀。他在同一年写下了充满救世主风格的论文，热烈赞扬新帝国主义：“我们占领的地方越多，就对人类越有好处！”

并非人人都像他这么想。这时，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已经是全英国除了女王之外声望最高的女性了。她读了迪格比等传教士、记者的报告，说：“这是人类苦难与毁灭的恐怖纪录，是全世界从未见过的。”然而，除了为数百万牺牲者哀悼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来避免未来出现同样规模的灾难

呢？利顿先前曾经削减过水库预算，而且还嘲笑一些主张修建水利的人，称他们为“水利狂”。如今，利顿终于表现出支持他们的样子了。利顿还采取措施建立了一项赈灾基金，出钱的人当然是贫困的农村居民，这一点跟爱尔兰一样。利顿的农业秘书名叫艾伦·屋大维·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父亲是苏格兰政治家约瑟夫·休姆（Joseph Hume），曾发起成立改革党（Radical party）。艾伦·休姆强烈呼吁政府征收累进所得税，这样一来，交税最多的人，对赈灾基金的贡献也越多。利顿否决了这项提议，反而主张增收那些本来已经很重的税赋，例如盐税。艾伦·休姆愤然辞职。之后，他成了批评家，最猛烈地抨击英国在印度的经济政策，最后竟然当上了印度议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的创始人！实际上，有许多印度议会的早期支持者和领导人（既有英国人，也有印度人），已经不再理睬这个“好心”帝国了，原因正是英国的救灾政策似乎总是让位于军事力量和赤裸裸的经济私利。威廉·迪格比写下的历史，留下了印度饥荒最为确凿的罪证。当时英国人有一种陈词滥调，所谓“印度之手”，说亚洲人天生不适合自治，需要别人统治。迪格比就创建了报纸《印度报》（*India*），来对抗这种言论。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家达达拜·瑙罗吉博士（Dadabhai Naoroji）是一位孟买的“印度拜火教徒”。1892年，他当上了英国第一位亚洲国会议员，代表芬斯伯雷中央区（Finsbury Central）。他也曾三次被选为印度议会主席。他出过一本经典著作《印度的贫穷与非英国人统治》（*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1901），阐述了他苦涩的幻灭思想。

瑙罗吉博士同其他很多人都意识到，印度的问题在于收入，而不在于粮食供应。这一点，当代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教授（Amartya Sen）指出，在当今全球饥荒案例中，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争论的焦点在于，应当怎样采取措施，才能让印度的生活水平提升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使在荒年也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辩论的双方，一方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为英国的事迹辩护。他们坚持说，传统的经济体制，也即市场本身，与市场对印度的刺激作用，将会最终奏效。另一方则是休姆、瑙罗吉这样的反对者，他们指出，英国的政策表面是自由贸易政策，实则是无耻的干涉主义政策。殖民当局肆无忌惮地操纵关税，方便英国进口，让印度本地产品处于不利地位；1877—1878年，有数百万吨粮食从印度进口到英国，以稳定英国本土粮价。与此同时，当局却放任印度孟买、马德拉斯的物价飞涨，涨到了足以饿死人的地步。就在古吉拉特邦纺织工人的苦难，超过印度大多数城市人口的时候，利顿甚至出台政策，降低了印度进口英国棉花的关税。而且，还有人老调重弹，提起自古以来的那种假装虔诚的万能药：“让他们自己站起来！”

此时，原先主张能带来互惠互利的自由主义公理，已经开始彻底崩溃。英国本土的繁荣，其代价似乎是印度财富的匮乏。殖民经济政策的不平等，

由来已久，而且用法律手段固定下来。绝大部分印度人都成了受害者，只有那些与这种经济政策合作的人，例如谷物航运商、纺织品进口商，才获得了应得的奖励。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三种特殊的情况，让这一局面很难改变。第一种情况：英国本身已经陷入了经济低迷，不可能牺牲自己复原的机会去接济印度，也不可能提升物价，与此同时加大英国劳工阶层闹事的风险。第二种情况：英国本土经济正在面临美国，以及德国等多个欧陆竞争对手的压力，出口缩减；这同样导致英国不大可能牺牲各个垄断帝国市场，让经济达到一种长远的成熟状态。（到19世纪末，印度已明显成为英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占到了英国出口总额的整整10%。其中绝大部分是兰开郡用机器加工的棉布，这种产品对印度纺织业的破坏，超过了一切别的产品。）有许多事实能够破除英帝国主义“良性发展”的说法，而低价输入的棉布，或许是最不容置疑的丑恶反证。最后，第三种情况：有一些基础设施投资的收入，实际上能够为印度的贫民生产者带来好处（而不是为进出口商人带来好处）；然而，这些收入却必须同另一种利益竞争，那就是英国要在印度西北前线进行战略军事扩张，以防俄国哥萨克骑兵从开伯尔山口一拥而入。在利顿等几位副王看来，这军事利益至高无上，其他一切利益都要为它让步。这是英国的战略妄想，为它全额埋单的，则是印度的纳税人。

更糟糕的是，这种妄想经常会直接导致英国的惨败，然后又会出现新一轮的惩罚性税收。利顿从当上副王开始，就一直在筹划军事占领阿富汗。1878年，利顿终于成功挑起了第二次阿富汗战争。英军如往常一样入侵了阿富汗。接下来是一次同样名垂青史的阿富汗叛乱，英国代表团全体被杀。于是照例需要第二次惩罚性作战。结果，“惩罚”这一次落到了英国人的头上，既损失了人马，又损失了金钱。英军在阿富汗赢得了一场惨胜，然而战争却暴露了丑闻——辛辛苦苦设立的赈灾基金被挪用当作军费了。于是，这场胜利也无法带来喜悦了。

首相迪斯雷利从一开始就反对利顿的阿富汗战略，只是因为克兰伯鲁克勋爵（Lord Cranbrook）的游说，才不得不违心地支持。克兰伯鲁克勋爵是新任的印度国务大臣，利顿的忠实信徒。损失惨重的灾难消息传到了首相耳朵里。首相大惊失色，但努力装出勇敢的样子。同一年，即1879年，英国与南非祖鲁王国（Zulu）爆发了祖鲁战争。祖鲁国王塞奇瓦约（Cetawayo）在伊桑德尔瓦纳（Isandhlwana）全歼了一支英军。等到南非局势稳定下来，500万英镑已经付之东流。非洲正常运转的国家本来没有多少，这一次，英国又打着“带来和平与安宁”的旗号，毁灭了一个非洲国家，就如同英国经常在印度所做的一般。1876年，迪斯雷利被封为比肯斯菲尔德勋爵（Lord Beaconsfield）。有一次他在上议院演讲，说“有上百万人，因军事影响（military sway，即‘强制措施’的委婉说法）而归附了我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为了秩序和正义，而受到了军事影响的恩

惠”。然而格莱斯顿却越来越感到必须发言反驳了：什么“秩序”？什么“正义”？他还为所谓“自由”的伪善言辞而十分恼火。他嘲讽迪斯雷利说：“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也许会说‘自由是我们的，帝国是余下世界的！’”格莱斯顿对于帝国的肆意扩张越来越反感、蔑视，这一点，标志着自由主义政治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当然，自由主义者当中一直有着一派思潮，尤其是政治家约翰·布莱特、理查德·科布登，他们坚持正统的自由贸易，怀疑现实中昂贵的帝国冒险主义会带来什么好处。不过，直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才掀起了一场有着清醒意识、长期坚定的反沙文主义斗争；其中最善于雄辩的斗士，乃是格莱斯顿本人。迪斯雷利在参议院地位大不如前，而格莱斯顿，则有片刻取得了一场道德层面的表演机会，尽管他只是反对党的议员，而且并非反对党的党魁。1876—1880年选举期间，格莱斯顿抓住机会，上演了一场维多利亚政治史上最为精彩的独角戏。

格莱斯顿发起的历次政治斗争，其力量来源，不仅来自道德热情，也来自痛苦的自我审视，以及大量的阅读和反思。1869年，格莱斯顿刚开始担任首相，就阅读了印度殖民当局官员乔治·坎贝尔关于爱尔兰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爱尔兰有一个独立组织，名叫芬尼亚兄弟会（Fenian），主张共和主义。坎贝尔在爱尔兰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候访问了爱尔兰。他震惊地发现，爱尔兰佃农问题与他见过的印度多个地方的问题十分相似。爱尔兰的贫农，如不能出示有效的英式法律合同，证明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则会被定为随时可以解除契约的佃农，遭遇各种提高租金的情况，而且一旦违约就会被驱逐。正常情况下，农民如果翻修或者扩建房舍，当局会有材料或劳务的补贴；而这一类佃农这样做，当局却没有任何补贴。于是，在同一片土地上劳动了几代人的耕种者，就被赶走，沦为了既没有钱，又没有土地的劳动者。英国对印度的土地制度越来越熟悉，也逐渐意识到，印度大部分地区都有这样的传统，一旦某个家族连续几代拥有土地，就相当于一种“道德上的联合所有权”，保护贫农不至于沦为随时可以解除契约的佃农。坎贝尔感觉，爱尔兰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同样感觉到这一点的还有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的著作表达的观点和坎贝尔基本一样）。尽管坎贝尔接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屈维廉“放任不管”的学派，然而坎贝尔却相信，政府应该担任保护者，保护那些无力自护的人。政府这样做了，就是对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尊敬，而不是违反。而政府不这样做，就会产生更多的可怕的暴力循环。

格莱斯顿在哈瓦登的宅邸——他的“和平神庙”阅读文献的时候，开始感觉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对他、对英国自由主义的历史都至关重要：大英帝国的某些地方，例如印度、爱尔兰，很可能还有那些工业化的煤烟城市，那种旧式的“自力更生”的福音宣传，已经化为陈词滥调，而且破产了。格莱斯顿意识到这一点，但并没有因此成为激进的干涉主义者。他第一任首相任期之内，爱尔兰主要的改革措施，还是废除各种国家制度，而非建设

国家制度；特别是废除了爱尔兰教会。然而，即使以实用主义者（而非激进派）的身份，格莱斯顿还是开始明白，有一位伯明翰自由主义活动家的意见十分有力。这位活动家名叫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张伯伦认为，在英国工业化城市中，一个好的政府，经常需要大力确保公权力能够满足市民的基本社会需要。例如，足够的住房、便利的交通、医疗福利等。因此，现代英国“正确自由主义”的准则，就不能仅仅是贸易自由和财产自由；或者说，这些自由如果要生存，必须关注社会正义。坎贝尔说过，人们一旦感觉社会正义被剥夺了，就会被迫转向愤怒和暴力。无论是印度德干的救济营中、英国的造船厂中，还是爱尔兰西部的农村，都是如此，而尤以爱尔兰西部的农村最为重要。有一次，格莱斯顿在下议院演讲，介绍一项土地法案。这法案采取了一点措施，想要保护佃农免遭驱逐，主张只有在逾期未交租金的情况下，地主才能合法驱逐佃农。格莱斯顿用的是他一贯的预言式口气：“爱尔兰就在你们的门口。天意已经把它放到了这里，法律和立法机关在你们之间订立了契约，你们必须面对这些义务。”

格莱斯顿漫长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从各种启示的瞬间来寻找“正路”，特别是从敌人的启示那里。人们经常把他比作对抗埃及法老的以色列先知摩西，而他的敌人，就是埃及法老的化身，他被召唤来狠狠打击这些敌人。（有时候，这个敌人还是格莱斯顿自己；而且，他早在牛津的时候，见过很多道德比较堕落的妇女，认为自己必须救赎这些妇女；此时，他就为自己被妇女们引诱而感到有罪，要把罪恶从体内鞭打出去。）政治与神学上的敌人们，则只是遭遇了他口头或写作的鞭笞而已。敌人分成几批：第一批敌人，是所谓的“理性基督徒”——唯一神论者，以及与唯一神论者相似的人，还有1832年推动《改革法案》的那些恶毒的改革派。格莱斯顿当时属于高教会派（High Church），年纪还轻，不苟言笑，他相信，这些人，以及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都在把英国引向一条“快活之路”，也就是不敬上帝的平等主义之路。但格莱斯顿在19世纪60年代却变成了改革派，支持普选权，于是他当初反对1832年《改革法案》的立场就显得十分尴尬。后来他解释说，当时反对改革，完全是因为年轻人的热情过于旺盛，以及“错误的妄想”。第二批敌人，则是那些打倒首相皮尔的人，因为格莱斯顿十分敬重皮尔，把皮尔当作圣人看待。这些人的罪魁当然是迪斯雷利。格莱斯顿认为，他一开始就看清了迪斯雷利是一个自我美化的机会主义者。格莱斯顿的背景是制造业，在他看来，皮尔行事坦率，这一点非常明智；皮尔正直诚实，这一点也不言自明；皮尔着力追求真理，相信真理高于个人权力，甚至高于政党利益，为此甘愿忍受艰难困苦，这一点也是政治美德的象征。而那些打倒皮尔的人，一边做坏事，一边还声称代表地主的“传统”利益。比如，迪斯雷利就这样声称过。格莱斯顿认为迪斯雷利这种说法十分荒唐，觉得他们这样伪装，不仅愚蠢而且邪恶，是有罪的。

最让格莱斯顿如鲠在喉的是，迪斯雷利一帮人竟然妄称自己代表的是真正的英国，代表英国起伏的广阔土地，也代表真正的宗教。格莱斯顿认为，迪斯雷利除了狡猾地装模作样之外，从未真正跪在上帝面前，更别说接受忏悔的精神鞭笞了。这种人怎么配谈真正的宗教呢？格莱斯顿还认为，迪斯雷利有一种最恶劣的本能，就是“好斗的虚荣心”，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如同丢脸的巴麦尊曾经做的一样；这时，迪斯雷利又有什么资格，以英国劳动人民真正的朋友和保护者的身份，对人民发出呼吁呢？我格莱斯顿，以及真正的上帝的战士们，例如理查德·科布登（自由贸易派）、约翰·布莱特（激进派政治家）这样的人，才可以代表真正道德的英国嘛！格莱斯顿认为，自己在成长时期和训练时期，把真正的英国的“纤维”编织了起来——这些纤维，就是苏格兰、兰开郡、牛津；是工厂和神学院，是大学和织布机。他感觉，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负责任的。第一，他没有欺骗劳工阶层，让他们期待立刻实现完全民主制，而是建议他们要有耐心，一步一步来。第二，他筛选那些借助工业、教育、辛苦挣来的财产而发达的人，赋予他们公民权，作为奖赏。这些人理应得到公民权，而且将来也会聪明而节制地使用公民权。

如今，在1876年，他的老对手迪斯雷利——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已经被擢升到了“比肯斯菲尔德主义”的境界；但是作为首相，迪斯雷利依然能够图谋不轨，办出坏事。格莱斯顿觉得自己又一次负起了神圣的使命，需要让公众清醒，不受迪斯雷利各种“犹太人的”伎俩欺骗。迪斯雷利有一种政策，想要建立一个“亚洲帝国”，包括支持土耳其人；购买埃及苏伊士运河；让利顿这种声名狼藉的鸦片烟鬼操控印度帝国的命运——而这一切异国风情的东西，竟然会值得用基督教英国的伟大来交换？此外，鲁米利亚东部爆发了一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起义遭到镇压，奥军大肆虐杀平民，犯下了种种暴行——焚烧村庄、强奸、鸡奸、把妇女儿童分尸等。1876年春，英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些暴行，舆论哗然，猛烈抨击迪斯雷利“支持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全国各地召开了数百场集会。从制度上说，格莱斯顿本来应该对两名辉格党领袖言听计从。这两位领袖，一位是第二代格兰维尔伯爵，另一位是哈丁顿侯爵（Marquis of Hartington）。然而，格莱斯顿并未立刻行动，而是一直等到1876年年底。然而，对政治而言，实现“充满激情的美德”这样的机会，太过诱人，无法让人继续忍耐了。格莱斯顿在“和平神庙”——自己家的图书馆中，写下了一本小册子，名叫《保加利亚恐怖事件》（*Bulgarian Horrors*），一出版立刻畅销。几天之后，格莱斯顿又开始做巡回演说，一次，伦敦郊区的布莱克希思（Blackheath）有暴风雨，格莱斯顿竟然在暴风雨中对着忠实听众们布道，做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讲演。不论这次讲演是否能够影响英国的政治，那些在场的人，例如激进派记者威廉·托马斯·斯戴德，都把它作为一个“格莱斯顿成功转化听众”的时刻来铭记。

然而，格莱斯顿作为耀眼的先知重新出现，大出风头，这种情况却可能让他冲昏头脑，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了，哪怕哈丁顿、格兰维尔等人发出咳嗽声提醒，他也置之不理。于是，他果然犯了大错。俄土战争注过后，格莱斯顿攻击迪斯雷利，说俄国与土耳其开战，迪斯雷利却把英国带到了与俄国发生冲突的边缘。这次攻击严重误判了英国舆论，因为当时英国舆论已经被迪斯雷利大肆煽动，变得非常激动，鼓吹武力外交政策，拥护战争。1878年，迪斯雷利前往柏林，在柏林议会参加和平谈判，争得了俄国与土耳其两国的让步。回到国内之后，舆论完全没有谴责他，而是为他热烈欢呼。然而，到1879年年底，英国在南非的祖鲁和亚洲的阿富汗军事行动受挫，花费极大。舆论再次转向，开始反对战争。格莱斯顿愤怒地高呼：英国人和当地人的无辜之血都白白流掉了，仅仅是为了毫无意义的冒险主义！他说，“阿富汗山村生活是神圣的”，就好像每一个英国人在英国本土的生活一样，“在全能的上帝眼中不可侵犯”。

而在英国本土，此时，自由党又得到了一份天赐的政治礼物：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格莱斯顿暗示说，保守党的领袖们是邪恶的，而那些沉醉于这种邪恶带来的奢侈享受的人，如今遭到了上帝的惩罚。英国背负上了现代社会的种种瘟疫：破产、失业率飙高、粮价暴跌、贸易停工；爱尔兰西南部甚至又发生了马铃薯枯萎病。迪斯雷利原本还被当作功臣，舆论说他带来了“光荣的和平”，为此沾沾自喜。而且，自由党分裂了，迪斯雷利也十分高兴，觉得格莱斯顿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怪人，完全不必用心对付。可是，迪斯雷利没有料到，老对手格莱斯顿好像突然爆发了一种惊人的能量，几乎让他成了救世主一般，将自己的雄辩术发挥到了极致。迪斯雷利也没有料到，格莱斯顿采用了各种崭新的方式，到处传播自己针对“比肯斯菲尔德主义”奢侈腐化而发起的攻击。1879年11月24日，格莱斯顿偕夫人凯瑟琳，在他的政治心脏之一利物浦登上了一列火车，前往另一处政治心脏——低地苏格兰。格莱斯顿穿过威根（Wigan）、圣海伦（St Helen’s）、卡莱尔（Carlisle）、加拉希尔斯（Galashiels），来到了爱丁堡。这个老顽童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政治火车头，他那宏大的自我肯定的精神，就好像火车头的活塞，不停打气。这位演说家在一个个站台上高声呐喊，从一扇扇车窗向外挥手，让兴高采烈的人群护送到旅馆，又在旅馆的阳台上演说。格莱斯顿在格拉斯哥大学被任命为教区牧师，进行了上任演说，又观看了特别为他举行的火炬游行，就好像他是福音派复兴运动的先知一般。两个星期之内，他在各地演讲15次，听众约有85000人。中洛锡安郡（Midlothian）竞选运动是英国有史以来发生的最为“美国化”的竞选运动，而且是无可置疑的胜利。

迪斯雷利在1880年3月举行大选。此时，他估计保守党再次取得多数不会有问题。然而，他的估计大错特错了。自由党获得的国会议员席位，比起托利党多了100多个，重新上台。格莱斯顿欢欣鼓舞地写道：“比肯斯菲尔

德主义，就像意大利浪漫主义故事里面一座华丽庄严的城堡，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大利的浪漫主义并非这位元老所欣赏的东西。

然而，1880年的议会当中，除了自由党351人、托利党239人，还有爱尔兰自治派国会议员65人。他们有了一位新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把他们团结到了一起。帕内尔的前任是爱尔兰托利党人物艾萨克·巴特（Isaac Butt）。如今，爱尔兰自治议员的队伍虽然还没有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但也不可小视。即使他们的人数没有65人这么多，格莱斯顿也不大可能在爱尔兰问题上袖手旁观，毕竟这是一个政治的“伤口”。1879年，爱尔兰再次发生歉收。有一个保护佃农利益的“土地联盟”，发起了一场反对驱逐佃农的运动。这场运动似乎让爱尔兰，特别是西部，逐渐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土地联盟”的创始人，是一位杰出的爱尔兰活动家，名叫迈克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梅奥郡人。1798年，爱尔兰曾经发生起义，梅奥正是支持法军入侵的地方。大饥荒时期，梅奥郡又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达维特来到兰开郡找工作，11岁那年在一次工厂事故中失去了一条手臂，后来又因为走私军火而蹲过监狱。出狱之后，他来到美国筹款，发起宣传，号召人们设法改变爱尔兰贫民的生活，改变爱尔兰这个国家的命运。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和一些激进的同志们在西部成立了“梅奥郡土地联盟”（Mayo Land League），这是“爱尔兰土地联盟”（Land League of Ireland）的扩展，发展迅速，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土地联盟宣称，自己的敌人就是“地主土地所有制”（landlordism），自己的目标是减租（如有必要，还会采用威胁手段）以及反抗驱逐佃农。实际上，爱尔兰驱逐佃农的行动，在19世纪50年代曾经十分激烈，彻底剥夺了佃农的财产；但是，这时候已经明显放缓了。查尔斯·屈维廉之前设想，现代化爱尔兰农业，其主导力量，应该是“致力于经商的大农场主”，西部是牧场主，东部则是农耕的农场主。这种设想，此时已经在稳步实现。然而，资本主义农业在社会公平方面却经常显得十分丑恶。爱尔兰农业的盈利越多，盈利的分配就越不公平。此外，到19世纪70年代末，农业又发生了萧条。那些依赖农业挣得工资的人，当然首当其冲；而那些靠小块农田吃饭的人，又首先遭到了租金上涨的压迫。换句话说，有很多人适合加入一支愤怒的社会大军了。

土地联盟的基本战术，是一种强硬而不合作的方法——对那些经常集体驱逐佃农的地主们，采取社会排斥的惩罚。至少，土地联盟的正式声明是这么说的。有一名英格兰农场主卡普敦·查尔斯·杯葛（Captain Charles Boycott），从一名爱尔兰“在外地主”厄恩利勋爵（Lord Ernle）那里租了土地，却既为他自己收租，也为他的地主收租。于是，他不幸被选中，成了社会排斥战术的靶子，以儆效尤，谁也不为他工作了。厄恩利勋爵则被人谋杀了。而且，尽管土地联盟反复为自己辩护，声明自己清白无辜，却还是发生了各种骚扰和破坏：有的家畜被肢解了，有的干草堆被焚烧了，

还有些人向一些住宅里打冷枪，说这是“警告”，更有个别的暗杀事件。面对这种持续的无政府状态，英国内阁中，有很多格莱斯顿自己的同僚们，支持发起一次同等激烈的对抗运动，借以恢复“秩序”。这些人的代表，是新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威廉·爱德华·福斯特（William Edward Forster）。这些强硬派认为，如有必要，还可以对某些人选择性地暂停《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并且不经审判就将其逮捕。他们也十分怀疑帕内尔，相信他纵容了这些暴力，虽然帕内尔假装谴责暴力。

格莱斯顿认为，事情不那么简单，并非只有“无所作为”和“强行镇压”两个选项。尽管他与帕内尔并无个人关系，他还是明白，土地联盟并不仅仅是受了损害的佃农发起的。帕内尔有一半美国血统，在剑桥上过学，表面上是新教徒，实际上是疑神论者。他也是一名乡绅地主，来自爱尔兰威克洛郡（County Wicklow）的山区。威克洛郡的立场保守，以马术表演、黄瓜三明治、各种联欢会而著称。帕内尔这么一号人物的出名，显然就是一个证据，证明迈克尔·达维特已经成功吸引了各行各业的爱尔兰人：教师、店主、政治家、医生、律师,在他们心目中，变成了改善爱尔兰政治社会的有力声音。另外一名土地联盟的成员蒂姆·希利（Tim Healy）评论说：“我们造就了帕内尔，帕内尔造就了我们。”这个说法有些炫耀成分，但其实非常准确。

格莱斯顿早在自己正式投入爱尔兰自治运动（Home Rule）之前很多年，就已经明白，逐步加深的爱尔兰危机，让全英国的历史来到了岔路口：这是一场考验，英国的联盟国体能否经受考验而生存下来，在此一举。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爱尔兰必须进行土地改革；二是爱尔兰应得的、更加独立的地方政府。之前自由派有好几代人，例如查尔斯·屈维廉这样的人，他们设想，不论过去的历史怎样悲惨，只要能够成为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的一部分，就是最大的幸福。然而，屈维廉的儿子乔治·奥托却不这么想。奥托是历史学家，也是政治家。他现在是格莱斯顿政府的一员，他和首相都清楚地看到，要想让爱尔兰不闹独立，留在英国版图之内，就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土地改革。1870年，格莱斯顿向议会试探性地提出了一个议案。提议说，只要那些被驱逐的佃农改善了土地质量，就可以得到补偿。然而，牛津大学爱尔兰史教授罗伊·福斯特（Roy Foster）指出，那些真有条件改善土地质量的农民，本身就是最不可能遭到驱逐的农民。无论如何，这个较为保守的提议在下议院通过了，却在上议院被否决了。上议院认为，这属于对私人财产权的无理干涉。格莱斯顿遭到这次战术上的失败，大吃一惊，开始更加认真地听取内阁同僚的意见。此时，农村暴力事件越来越多，同僚们坚持说，必须把强制措施放在土地改革前面。1881年1月，《保护人身和财产议案》（Protection of Persons and Property Bill）提交给了下议院，提议批准“预防性拘留”措施（preventive detention）。爱尔兰议员阵营大为恼怒，开始蓄意阻挠议事，发表冗长的

演说，不让议案通过；阻挠行动持续了整晚。议院的工作彻底瘫痪，不得不在2月3日通过决议，“撤销”常规的议事步骤。愤怒的爱尔兰议员们，包括帕内尔，被强行驱赶出了议会。

“大棒”之后就是“胡萝卜”。议会通过了《高压法》（*Coercion Act*）限制了激进派的行动。到了4月，格莱斯顿觉得应该可以提出土地议案，而不必担心反对派攻击他“在压力之下做出各种让步”了。议案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个术语概括：合理租金（fair rent）、自由买卖（free sale）、居住权不变（fixity of tenure），三个术语第一个字母都是F，因此简称3F。这三个条件全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格莱斯顿自己非常不安，担心它们是否符合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然而，最重要的需求，还是要让爱尔兰的佃农小农场主感到一些正义，从而防止土地联盟激进派闹事。按照议案的规定，佃农只要付清租金，则不会遭到驱逐；驱逐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小块土地合并成大块地产。还有更为激进的措施：政府会指定成立一个土地法庭、一个土地委员会，裁定这些租金是否“合理”。格莱斯顿在议会的整整58次会议上发了言，这才让议案通过，成为法律。

格莱斯顿以为这个议案能让土地联盟满意，结果却不得不改变了看法。帕内尔虽然支持议案，却继续进攻，要求减租，要求取消逾期欠款。更加不祥的是，他还开始议论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好像要准备分裂了。格莱斯顿接受了帕内尔的挑战，充满威胁地回应说，任何想要分裂英国和爱尔兰的企图都将受到政府最严厉的处置。10月，格莱斯顿进一步采取措施，逮捕了帕内尔和“土地联盟”的其他成员，关在都柏林郊外的凯勒梅堡监狱（Kilmainham gaol）。

内阁与自由党的强硬派一片欢呼。他们觉得，至少格莱斯顿这“元老”明白，为了在爱尔兰执行《高压法》，需要什么样的行动。《高压法》里面的规定，与利顿在1878年在印度通过的《本地语言新闻法》（Vernacular Press Act）如出一辙，后者禁止了自以为是的、煽动性的印度媒体发声。格莱斯顿还在一次餐会上开玩笑说，他对高压政策习惯了，“就好像一个人会在私下说，他痛苦地发现自己必须杀掉母亲一样”。这当然是反话，他实际上对强力统治怀有深深的忧虑，而且一直认为，用强力回答爱尔兰的痛苦和愤怒，必须是短暂的方法。早在19世纪50年代，格莱斯顿曾经在那不勒斯旅行，访问了波旁王朝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监狱。当时波旁王朝的专制君主残酷迫害政治犯，格莱斯顿十分厌恶，写文章说，这样的政权违反了人类的自然权利，也违反了上帝的法令。格莱斯顿相信，真正的合法政府，必须有人民的“情感”作基础，才能维持统治。自由主义的核心也必须是这一点，不论自由主义在当今这个“炮舰与加特林机枪”主导的时代还有什么其他意义。

于是，首相开始通过一个叫凯瑟琳·奥谢（Katherine O’Shea）的女人同帕

内尔开始秘密谈判。凯瑟琳是另外一名爱尔兰议员的富人，但也是帕内尔的情妇，还给他生了不止一个孩子。格莱斯顿和帕内尔堪称有史以来最奇怪的“一对”，两人彼此需要；或者至少在1882年认为两人彼此需要。格莱斯顿需要帕内尔来管理那些民族主义暴力的拥护者，来说服爱尔兰国会议员们相信，在联合王国内部可以扩大自治权。帕内尔也需要格莱斯顿来实施更激进的土地改革（特别是对“收取欠款”进行限制），来废除《高压法》，或者至少减轻《高压法》的力度。双方达成了秘密的“凯勒梅堡协议”（Kilmainham Treaty）。按照协议，帕内尔获释后，更好地限制激进派；格莱斯顿则在议会提出关于逾期欠款的议案。然而，之前帕内尔进了监狱，让激进派不仅没有冷静下来，反而更加暴躁了。1882年5月，政府同意释放帕内尔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人；主张对爱尔兰强硬的爱尔兰事务大臣威廉·爱德华·福斯特辞职，接替他的是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Lord Frederick Cavendish）。5月6日，刚刚上任的勋爵，和他的常任副大臣托马斯·伯克（Thomas Burke）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散步，突然被五名决意搞暗杀的恐怖分子杀死了。这个恐怖集团的成员自称“无敌者”（Invincibles）。格莱斯顿闻听此事，惊骇万分。两人都被长长的外科手术刀割断了咽喉，伤口从一边耳朵延伸到另一边耳朵。伯克的脑袋还几乎被砍了下来。卡文迪什不仅是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是格莱斯顿妻子的侄子，爱称是弗雷迪（Freddie），经常来哈瓦登的首相宅邸做客。暗杀事件不仅严重干扰了格莱斯顿的计划，而且让他失去了一位亲人，对他造成了双重打击。帕内尔当时刚刚达成协议被放出来。他也十分惶恐，提出辞去爱尔兰党领袖的职务。然而，格莱斯顿有一种“基督教式宽宏大量”的本能；恰恰是在这样的场合，这种本能充分发挥了作用。格莱斯顿不仅拒绝了帕内尔“谢罪”的姿态，还承诺会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承诺继续处理逾期欠款问题。此时距离两起谋杀刚刚过去一周。格莱斯顿的同事们原本就觉得这老头子发了疯，现在更加确信他发疯了。凤凰公园谋杀案发生之后，当局紧急通过了第二部《高压法》，扩展了警方搜查、逮捕、拘留的权力，而且设立了一系列特别法庭，可以不用爱尔兰陪审团在场就进行审判，免得受到陪审团的干扰。全凭着第二部《高压法》的预先措施，一场爱尔兰人的叛乱才得以避免。

尽管帕内尔与格莱斯顿达成协议的措施都无法执行了，但两人的地下合作并没有中断。凯瑟琳·奥谢继续传递信息，也继续生孩子，生了不止一个。格莱斯顿就算之前不知道凯瑟琳跟帕内尔什么关系，这时候也肯定知道了。首相认为，还有一条出路，就是成立地方政府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约瑟夫·张伯伦负责的小项目，张伯伦负责市政改造，尤其是煤气管道和水管改造，因此得了个外号“煤气和水先生”。格莱斯顿设想，地方政府委员会可以让爱尔兰人直接选举，前提是不破坏统一君主制国家的立国原则。然而，这个方案还规定在都柏林要有一个中央政府委员会，处理不涉外的爱尔兰本族事务，官员由英国政府任命。爱尔兰政界有些人觉得，地方政

府委员会获得的权力下放，只是未来获利的冰山一角，以后会有大得多的利益。而这个中央委员会，就是欺骗这些爱尔兰人的蝇头小利，实际上不会给他们太大权力。可是，保守党和统一党人（Unionists）却把这个意图彻底理解反了，以为中央委员会一设立，就是走向真正自治政府的开始。于是，他们把这个措施当成危险信号，而措施本身也就无法实行了。

帕内尔从来没有完全相信格莱斯顿真的尽力推动了措施的实行。就算格莱斯顿真的尽了力，他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手腕让措施成为现实；更不要说帕内尔期盼的，真正的自治体制了。此时“元老”经常生病，最严重的一次，他还在雪地上摔了一跤，头部严重割伤，严重到他自称感觉有颅内出血了。谁知道呢？或许他真的受了重伤，总之，格莱斯顿似乎已经不是下议院当家人了。辉格党和改革党正在斗得死去活来，两边都怀疑首相对他们不忠。张伯伦原本坚定支持权力下放，但随着一年年过去，他的支持似乎也不那么有力了。此时，他正在幕后等着夺权，等得不耐烦了。格莱斯顿原先一直激烈反对帝国主义者。然而却发生了南非和埃及的战争，人们发现，他也跟自负的迪斯雷利——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有着同样的偏见，支持炮舰外交，支持历次冲动的军事远征。1881年，埃及发生了一次反对“乞迪夫”的兵变。背景是土耳其驻埃及总督“乞迪夫”挥霍无度，在向英国出售苏伊士运河之后，再次负债累累，乃至于尽管埃及只是个徒有虚名的主权国家，还是不得不宣布进入破产管理。至于管理者，当然是西方强国——英法两国。英法控制了埃及的各类收入，以确保管理债务能得到及时偿还。这个局面，几乎是18世纪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非洲翻版：当地出现了混乱局面，主要是欧洲殖民者造成的。然后殖民者坚持介入，收拾自己制造的烂摊子。

埃及兵变既是军队的反抗，也是穆斯林群体的反抗。兵变一开始，英法就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抽身而退，避免损失；要么入侵埃及，用杀戮来平息局面。法国人还根本没有考虑入侵的高昂代价，就在这第一个道义选择面前退缩了。而格莱斯顿却悍然下令进军，令许多人大吃一惊。英国皇家海军对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进行了猛烈炮击。英国又派出一支陆军，只花了40天就以闪电般的速度抵达埃及，将叛军彻底歼灭。格莱斯顿这个反帝国主义者，下令全国各地点燃了庆祝胜利的篝火。很多格莱斯顿的老朋友都对他的变节十分惊骇，尤其是因为格莱斯顿一直在发表演说，说这次远征只是为了保护“和平”与“稳定”，并非要在埃及建立殖民地。他说：天哪，绝没有这回事！我们只是要恢复“乞迪夫”的“合法”统治！格莱斯顿这种态度，非常接近其他的殖民总督，而且同迪斯雷利如出一辙。当然他会需要一些英国兵，在可预见的未来维持这种“合法统治”，并且收集钱款，偿还巴林家族等人。

格莱斯顿突然转向帝国主义，对此最为痛苦的人，莫过于他的老战友约翰·

布莱特。布莱特认为，迪斯雷利虽然也拥护帝国主义，但起码他自己这个立场是开诚布公的。而格莱斯顿则似乎受了蒙蔽，错了还不自知，令人同情。布莱特写道："某事在我看来大错特错，而他（格莱斯顿）似乎有能力说服自己相信这件事显然正确。尽管（战争打起来）将会死掉一群人，他为此感到遗憾，但他几乎把死人的事当成一种偶然事件，不应受到谴责；因为他觉得死亡是一种政策执行中发生的事件，他希望这种政策能够带来更好的秩序。"结果，埃及并没有出现"更好的秩序"。更糟糕的是，在苏丹首都喀土穆，格莱斯顿却给戈登将军带来了灾难。注 公平来说，戈登被杀其实不是格莱斯顿的责任。当时，起义军领袖马赫迪（Mahdi，意为"蒙受真主引导的人"）率领圣战军（jihadi army）从南苏丹席卷而来。戈登受命尽快疏散喀土穆，但他却留守城中，要当烈士。格莱斯顿对戈登极为恼火，甚至自己打算满足戈登愿望，把他杀掉；但这种事情在政治上当然是不可能的。格莱斯顿命令沃尔斯利勋爵（Lord Wolseley）率领援军沿着尼罗河进发，终于在1885年1月到达白尼罗河与青尼罗河的交叉点——喀土穆，仅仅来迟了几天。戈登死后，英国舆论猛烈抨击格莱斯顿，说他"牺牲了"这位英雄，尤以女王最为愤怒，憎恨起了有关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一切，从而让声讨格莱斯顿的浪潮更加高涨。

这一系列麻烦让帕内尔相信格莱斯顿的权势在衰退，必须到别处去寻找支持了，至少为了实现短期目标而必须如此。尽管回顾起来，帕内尔这一战术转向，看起来有悖常理，但实际上，他却受到了托利党巨头——卡那封勋爵（Lord Carnarvon）的大力拉拢，而且是不负责任的拉拢。力度太大，乃至于帕内尔相信，倘若爱尔兰阵营从自由党一边叛逃出去，他们就能够联合格莱斯顿自己阵营里的异议分子，让政府垮台。帕内尔向索尔兹伯里勋爵提出的要求是通过土地法案，并废除一个犯罪法案。这两件事，格莱斯顿之前一直没有做到。结果这一次，帕内尔竟然如愿以偿了。1885年6月，举行了国会投票，大批自由党议员弃权，加上爱尔兰阵营的反对，自由党政府垮台了。然而，帕内尔阵营和托利党组成的联盟实在太过奇怪，无法持续长久；特别是帕内尔在公开追求彻底的自治，要求爱尔兰议会全权处理外交政策之外的一切事务。

这一步就太过分了，不仅索尔兹伯里这么认为，很多自由党议员也这么认为，其中就包括约瑟夫·张伯伦。张伯伦的立场越来越接近帝国主义，在他看来，只要一鼓吹爱尔兰自治，就等于鼓吹分裂，联盟的末日也就到了。然而，格莱斯顿却又一次发生了启示性的转变。他此时又埋头在自家图书馆——"和平神庙"中苦读。他研究了大量历史著作之后，开始相信：大多数爱尔兰人质疑联盟带来的结果，他们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爱尔兰已经遭遇了很多不平等、不公正的事情。格莱斯顿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英国，强制措施不可能永远持续。因此，可选的两个选项，不应当是"强力镇压"或"爱尔兰自治"，而应当是"爱尔兰自治"或"爱尔兰和英国彻底分

裂”。如果现在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将来某个时候也一定要做出。同意爱尔兰自治，乃是一种最好的预先防范措施，让未来不会发生激烈得多的分裂。格莱斯顿一拿定主意，就试图说服女王成立爱尔兰自治政府，说这是如假包换的保守措施（说服女王是很艰难的事）。他还通过凯瑟琳·奥谢，跟帕内尔达成共识，推动成立爱尔兰议会。这一切完成之后，格莱斯顿才把计划告知自己的政党，并通知在哈瓦登的德比勋爵说，联盟是“一个错误；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将爱尔兰的国家身份抢走”。

格莱斯顿拉拢自己政党成员的战术，从最善意的角度说，也是非常专横的。1885年12月中旬，选举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要按照格莱斯顿的计划执行爱尔兰自治的法则。这文章的内容是格莱斯顿的儿子在哈瓦登透露给记者的。因为英国把媒体透露出来试探舆论的报道称为“探测气球”或者“放风筝”，这篇报道就叫哈瓦登风筝。格莱斯顿立刻否认报道，坚持他计划的只不过是一个爱尔兰地方政府。然而，报道还是让自由党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造成了严重破坏。辉格党和约瑟夫·张伯伦这样的帝国主义激进派都非常惊骇：格莱斯顿竟然既不跟他们商量，也未经他们同意，就要强迫他们执行一项政策！于是，他们开始准备辞职了。更加严重的是，张伯伦开始向激进派的友人和同事表示，“国内的社会改革”与“爱尔兰自治”这两个目标，是互不相容的。张伯伦还表示，改善“英格兰局势”本来是必要的，然而这些改善措施却被绑架了，用来实现一个老人（格莱斯顿）的迷梦；而老人则被一个爱尔兰的准叛徒（帕内尔）用魔法蛊惑了。

这次选举，选出了86名爱尔兰国会议员，刚好在两大党之间实现了数量上的平衡。格莱斯顿表示，如果托利党政府提出爱尔兰自治方案，他就会支持。然而，托利党还有一些年轻的著名人物：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 Churchill）、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等人，却带头反对自治方案。这一次大选之后，北爱尔兰新教徒大都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担心爱尔兰获得半独立地位之后，变成“无知的”天主教国家；这样，天主教徒就会惩罚新教徒，让新教徒为自己长期的优势地位付出代价了。年轻的托利党政治家们，充分利用了阿尔斯特新教徒的恐慌情绪。注阿瑟·贝尔福把顾虑抛到一边，告诉统一派：爱尔兰自治以后，统一派将会“被人数众多的派别掌控，这些人数量上比你们多，但政治知识和经验却毫无疑问不如你们——你们拥有爱尔兰的财富、秩序、工业，拥有富于开拓精神的地方，你们会资助那些局势不稳定、工业落后，人们也不那么守法的地方！”贝尔福是牛津毕业的哲学家、学者。他精妙地阐述了真正的北爱尔兰红手注旗统一主义。

托利党毫无悬念地拥护强制措施。此刻，格莱斯顿迎难而上，匆匆准备了一份议案，主张爱尔兰要在大英帝国内部成立议会。这和当初格莱斯顿与

帕内尔达成的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很快，又提出了另一项土地议案，这议案实际上是为了证实密尔和坎贝尔的观点：爱尔兰土地的承租带来了虚拟的所有权。原先把土地卖给佃农的地主，现在从一项政府资金而获得了一个补偿的机会。这或许是格莱斯顿以自己名义做得最富有革命性的事了。

1886年5月27日，议会来宾席早就坐满了人，院内挤满了议员们，参加《自治法案》的议会二读。格莱斯顿采取了戏剧性的姿态，对自己党内的异议者让了步。他提议，投票应当只用来决定是否实行自治的原则注；而且自治法案如果通过二读，则应再次选举之后才进行三读。然后格莱斯顿做了一生最精彩的演说，讲了三个半小时——这是他生平做的最高贵，也是最惨痛的事。格莱斯顿告诉议院，这是“我们历史上黄金一样宝贵的时刻之一；这样的机会，可能来临，也可能失去，但很少去而复返。”注如今，经历了其后发生的一切，我们悲哀地回顾往昔的时候，谁还能说他不对呢？格莱斯顿的演讲术上升到了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高度，就好像他仅仅凭着雄辩就能战胜强大的敌手——游说团体。他的事迹，恰好符合了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的定义：真正的演说家，就是精于言辞的好人。那一天，格莱斯顿确实精于言辞。在他漫长而重要的职业生涯中，确实有过很多伪善，很多令人恼火的自相矛盾，很多冲动和不宽容。但是，或许在那一天，这一切负面的东西全都消失不见，他身上只留下了深刻的真理和发言的善意。格莱斯顿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通晓历史的首相（除了丘吉尔之外），而那一天他却请求议会能够忘记一次英国的历史！最紧急、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此了。格莱斯顿说，爱尔兰请求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我将它视为对过去的遗忘，被赐福的遗忘。爱尔兰还请求一种未来的恩典，这恩典……将会让我们被爱尔兰尊敬，因此成为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繁荣、幸福、和平上的所得，同爱尔兰一样多。这恩典就是她（爱尔兰）的祈祷”。格莱斯顿最后恳求道：“我祈求大家在否决这项法案之前，一定要思考，认真思考，睿智思考；不为这一刻，而要为了将来很多年而思考！”

结果，祈祷并没有获得回应。下议院二读341票反对，311票赞成。格莱斯顿自己的党派有91人投了反对票，哪怕是首相最悲观的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这么多；其中还包括张伯伦和约翰·布莱特——“自由主义良心”的老战马。忠实的自由党员们朝着张伯伦怒吼：“犹大！”六个月之后第二次选举，用格莱斯顿诚实的话——“一败涂地”。自由党只获得了191席；保守党316席，帕内尔派85席。

格莱斯顿要再过六年才能重掌大权，也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掌权。这时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又获得了一次机会，把自治法案递交给国家。然而，一切都已经变了，特别是爱尔兰党派和领导人的命运更是发生了剧变。1889年，卡普敦·奥谢（Captain O’Shea），也就是凯瑟琳的丈夫，提起了离婚

诉讼，理由是妻子与帕内尔通奸。自由党人，包括格莱斯顿，都公开表示震惊。天主教会原先是帕内尔自治政策的关键支持者，如今公开指责帕内尔犯下了邪恶的私通罪行。帕内尔在爱尔兰的广泛群众基础也崩塌了，只剩下一小部分铁杆，聚集在都柏林一地。基尔肯尼（Kilkenny）的人们朝帕内尔扔泥巴。两年后，1891年10月6日，帕内尔在布莱顿（Brighton）死在了凯瑟琳的怀里，年仅45岁。这时候，两个人已经结成了合法夫妻。然而，到1893年，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不只有张伯伦（此时是保守党员）一人。因为他的这种身份，他也不太可能赞同分裂大英帝国，把大不列颠缩减成“小英格兰”。张伯伦说：“整个欧洲都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与此同时，我们的利益却是普遍的；太阳照耀的每一片土地，几乎都有我们的荣誉。这种条件下，弱者就会引来别人进攻，不列颠有必要保持强大。”而且，张伯伦认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对英国忠心耿耿，英国倘若在冲动之下，对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讹诈让了步，岂不是牺牲了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吗？此外，这样做也同样会损害伦敦人、曼彻斯特人的利益，还有加拿大人、新西兰人的利益。张伯伦认为，自治派只不过是伪装的恐怖分子，不管欺骗得了谁，也不能欺骗得了他；而且，张伯伦还愤怒地宣称，现在大家已经都知道，帕内尔自始至终，都是凤凰公园暗杀事件的幕后黑手。张伯伦宣称，自治法案的失败证明“英国绝大多数人民都……为光荣而统一的大英帝国而骄傲”。很多格莱斯顿自己政党中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例如，外交大臣罗斯伯里勋爵（Foreign Secretary Lord Rosebery），也跟张伯伦一样，狂热拥护帝国主义。[注]然而，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依然把这个打过马朱巴山战役、打过埃及战役的格莱斯顿，当作自己的“先驱”。帝国主义者认为，允许爱尔兰自治法案三读，只不过是迁就格莱斯顿这位元老，因为自治法案肯定会在上议院被否决；三读之后，格莱斯顿很快失去了领袖地位，很快又在1898年进了坟墓。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准备好，要让格莱斯顿安安静静地离去。张伯伦此时的身份，是“托利–统一党人”（Tory–Unionist）。他激烈反对格莱斯顿，对他进行了十分恶毒的人身攻击。攻击实在太恶毒，乃至爱尔兰政治家托马斯·波厄·奥康纳（Thomas Power O’Connor）认为，这攻击好像来自地狱中“迷失的灵魂”。张伯伦是这样挖苦首相的：“首相说某个东西‘黑’，人们说‘很好’；首相说某个东西‘白’，人们说‘更好’。首相的声音永远是神的声音。从《圣经》里的希律王（Herod）以来，再没有过如此奴颜婢膝的谄媚了。”

或许格莱斯顿并不是神，却是一个预言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准确的预言。英国史上，在联合王国内部实现爱尔兰自治政府的机会，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切近；此后，1911年和1917年各有过一次拼命的努力，但也都归于失败。共和、分离主义的死硬派和统一主义的死硬派相互冲突，把爱尔兰夹在中间，让爱尔兰的希望更加渺茫。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因为当初错失了那次机会，而承受着各种消极的结果。那些既关心爱尔兰，也关心英国的人，大概有资格暂时沉浸在伤感中一阵吧！

自治法案的失败，实际上不只是爱尔兰历史的转折点，也不只是英国历史的转折点。这场失败，还标志了一个古老得多的自由主义理念——“渐进自治”彻底终结了。这理念是半个世纪之前麦考利极为严肃真诚地提出供人讨论的。约瑟夫·张伯伦愿意相信，在爱尔兰自治这头“圣牛”被宰杀、冰冻，锁起来之后，帝国实际上将会变得更加强盛。从长远来说，张伯伦大错特错了。爱尔兰的温和民族主义者试图在帝国内部找到发声途径的时候，印度的温和民族主义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1885—1886年，不仅是爱尔兰自治的关键时刻，也是印度议会的元年。印度议会的创始人，就是之前提到的艾伦·休姆。他曾经在利顿政府中任职，因为饥荒而成了异议人士。此前，休姆终于认定，帝国应该是以“好心”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而今在炫耀武力的时候，还继续把“好心”拿出来为武力辩护；然而，这些“好心”却永远不可能真正实现，至少不可能在大家自愿的情况下实现。

显然，不论是在印度还是爱尔兰，自由党人都无法兑现自治、经济、社会正义的承诺，而保守党人则不愿意兑现这些承诺。英帝国主义，特别是身在殖民地（Men on the Spot）的帝国主义者，宣称自己拥有更高贵也更坚定的智慧，要超过那些远在伦敦的理想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并没有让殖民地知识分子阶层为自己的司法系统和政府担起责任，而是下了前所未有的决心，绝不能让本地人参政。格莱斯顿手下，真正信仰自由主义的印度副王里蓬侯爵，或许是印度有史以来最体面的一位副王。里蓬试图通过一项伊尔伯特法案（Ilbert Bill），允许印度地方法官审判欧洲人。结果，从加尔各答到马德拉斯，白人立刻发出了愤怒的呼声。殖民当局受到压力，不得不收回成命，撤回了这一“放肆”的法案。1864年，乔治·奥托·屈维廉出版了一本著作《竞争者》（*The Competition Wallah*），素描式地勾画了印度兵变之后在印度的英国人的礼仪和习俗。他谴责道：“英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赞同的盎格鲁–撒克逊精神。这种精神虽然在本土休眠了，然而在各大洲粗野的英国人身上却十分明显，令人非常不快；在印度，这种精神也十分猖獗。”印度的英国老爷们，行为势利，种族主义思想严重，而且伪善。乔治·奥托·屈维廉对此非常厌恶。他看得很清楚，父亲在19世纪30年代那些孤高的理想，此时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一次，索纳普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赛马大会。这个集会，原本是印度人净化、除罪的仪式，后来被英国人改成了赛马会。在这个地方，波格里坡法官（Judge of Boglipore）的妻子，盼了好几个月，要见到自己的姐妹，这个姐妹的称号是“甲日山的女收藏家”。会上，乔治·奥托·屈维廉在槌球游戏和打赌的人群之间，看到了一个“个子很高、颌骨突出的野人”（英国人）冲向一群衣着考究的印度富人，用一根带有两根皮条的猎鞭抽打那些富人，打得他们跑出了场地。屈维廉愤怒地说：“只有一两个英国平民彼此议论说这是‘耻辱’，却没有一个人显得吃惊、恐惧；没有人干涉，没有人追究，没有人在晚餐时拒绝跟这个无赖会面。”19世纪晚期，在英属印度，和英属印度文学当中，这样的场面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自治的渐进主义，沦为一种空

口的应酬话，英国人还发表了很多说教文章，论述印度本地人如何“没有做好准备”，还无法担起作为公民的责任。更糟糕的是，英国还明确表达了一些最为露骨的种族偏见。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的日子里，最为耻辱的事情，或许就是：那些激进派，例如查尔斯·迪尔克爵士（Sir Charles Dilke）和张伯伦这样的人，为英国社会底层发声最多，但也同样最坚信“白人具有明显的优等地位”和“大英帝国具有显而易见的利他主义”这些傲慢观念。

于是，到了世纪之交，两种观念之间出现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一边是六十周年庆典的花言巧语，关于“泛不列颠尼亚”的观念——狂妄的自以为是、充满威严感觉的建筑、用马克沁机枪装备的军队；另一边是英国统治的各个民族愤愤不平的幻灭。布尔战争后的张伯伦，“一战”后的寇松，面对着英国忠实子民的累累坟墓，或许会假装（甚至可能真的相信）大英帝国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然而，他们俩都上了大当。20世纪前20年中，想要兑现麦考利、迪斯雷利、寇松那些承诺的努力，全都归于失败；而且失败的方式，也是这些政治家绝不会想到的。印度和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从英国国体的历史出发，采用自由主义的经典语言来推动自己的计划，而是彻底否定了这本历史书，转向了自己的传统；即使传统已经消失了，他们也仍然设法重建了传统来使用。19世纪末开始，爱尔兰也掀起了一场宣传民族语言盖尔语的“盖尔语运动”，给爱尔兰民族主义斗争涂上了新的色彩。这一运动的文学、政治领导人，以帕德里克·皮尔斯（Padraig Pearse）为代表。他们创造了一种农村神秘主义宗教性质的团体，它的行事风格，故意尽量不同于那种温文有礼、注重理性、一说话就说“亲爱的乡亲们”的自由主义。此外还有一件事就很不美妙了。他们还组建了一个暴力团伙，崇尚鲜血带来的牺牲。1916年，这个团伙掀起了复活节起义，这是他们古怪行动的高峰。起义死伤多人，最后起义军无条件投降。皮尔斯是众多牺牲者之一。

接着，同样的编年史，在印度也重演了一次。印度议会原先有两派领导人，一派较为西化，强调宪政，例如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e）、浦那的婆罗门政治家戈帕尔·克里希那·戈卡尔（Gopal Krishna Gokhale）。这一派输给了另一派，也就是富有个人魅力的新传统主义者，例如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他也是基特帕文婆罗门[注]政治家，但更加关注马拉塔反抗英属印度统治的历史。这位马拉塔王公提拉克，生于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他组织了宗教团体“希瓦吉”[注]。组织过程中，他可能百般美化了希瓦吉的真正历史，然而他也是在把印度从另一种同样荒谬的英国历史神话中拯救出来。英国史观认为，印度是黑暗、贫穷、混乱的所在，直到热爱和平的英国人罗伯特·克莱武、理查德·韦尔斯利出现，才发生了改观。马拉塔王公提拉克并没有援引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完全应用了

印度教文化的元素。这些元素，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在政治上非常幼稚可笑。提拉克用传统的“群主”（Ganpati）节日来动员群众跟随自己。他没有使用英国牛津剑桥系统的学术英语，而是操纵了当地白话语言的报纸，操纵技术炉火纯青，好像弹奏锡塔尔琴（sitar，印度一种弦乐器）那样熟练。他没有“改进”西方艺术，而是沉醉于象头神（Ganesh，印度的财神和智慧之神的本名）和迦梨女神的象征主义艺术作品。当年，本廷克勋爵曾经反对童婚。而提拉克却有一次抗拒了殖民政府提高最低结婚年龄的善意企图。本廷克倘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气得在棺材里翻身的。

最重要的是，提拉克非常清楚怎么攻击殖民当局的最大弱点——财政收入。爱尔兰革命家埃蒙·德·瓦勒拉（Eamon de Valera）并没有主张彻底脱离英国，而主张接受英国统治，实现自治。与此相仿，印度的提拉克也成立了一个自治同盟“斯瓦拉杰”（swaraj）。这个自治同盟与爱尔兰新芬党（Sinn Fein，爱尔兰语意为“我们自己”或“只有我们”）非常类似，也主张印度自治。他们斗争的最聪明的方式，就是抵制英国货运动（swadesh），这一手段与爱尔兰的“杯葛”如出一辙。实际上，“一战”前的印度议会里有些最敏感的人士，担心使用“杯葛”一词带有爱尔兰的恐吓色彩，不赞成使用！抵制运动包括罢市（针对1906年10月16日寇松分割孟加拉一事）；大规模罢工；还有最重要的措施——禁止购买英国货。因为英国本土在同印度贸易中占据了不平等的商业优势，所以禁令沉重打击了英国商业；此外，还沉重打击了所谓“互惠互利”的极端虚伪的言辞，张伯伦等人依然在鼓吹这种言辞。抵制还包括手工纺线织布的运动。19世纪整整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印度本地人一直在嘲笑西化的士绅，这些士绅穿着西方的男式鞋罩、浆洗过的领子。如今，嘲笑起了作用，士绅终于重新开始穿民族服装了。印度开国总理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其父名叫莫狄拉尔（Motilal）。莫狄拉尔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也基本是一个西化的自由派，后来把儿子尼赫鲁送到了伦敦哈罗公学和剑桥上学。莫狄拉尔将短上衣、领带换成了传统的长袍和印度帽子。这么做并不是他觉得传统衣服穿起来舒适，而是知道传统衣服代表着民族主义者的正统性。

这种对新传统主义的拥护，用反抗英国统治的方式表达出来。殖民当局的创始人，倘若知道了这样的拥护，一定会大吃一惊吧！然而还有一件事，会让这些创始人更加不安、更加困惑，那就是英国激进派。英国的女激进派，竟然在接受东方智慧，而不是西方智慧，来作为国民事业的前进方向。如今，殖民当局要面对的，不是那些恭顺的西化印度人——“棕色皮肤英国人”，而是爱找麻烦的白人印度教徒、白人佛教徒，还有其他的白人神秘主义者。

之前提到的女权活动家安妮·贝赞特，在1877年因为在劳工阶层中提倡避

孕，而与查尔斯·布拉德劳一起被告上法庭。布拉德劳也热烈支持印度议会。1888年，贝赞特又组织了著名的“火柴女孩罢工”。此时，她怀着复仇的思想，转向了东方学的研究。先前，她信仰了俄国神秘学家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夫人创立的神智学（Theosophy）。1893年，安妮来到印度，此时她依然是一名虔诚的神智学信徒。然而，她却以大得多的热情，投入了印度宗教和政治的研究，在贝拿勒斯建立了一所印度教的学院，于此终结了当年本廷克、麦考利的行动轨迹——本廷克等人关闭了印度学院，认为学院只不过是无用的老朽之物。此外，1916年，有些最为激进的人呼吁加快推进自治行动，贝赞特也是其中之一。她成立了印度自治联盟，1917年当上了国民大会党主席。

还有一些更加出乎意料的结果。第四章结尾提到过，已故伯爵副王利顿（利顿在1893年去世）有一个女儿，女权主义者康斯坦斯。康斯坦斯的姐妹艾米丽·利顿（Emily Lytton），也是激进的妇女参政权论者。1896年，有个27岁的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Edwin Lutyens），志向远大，在肯辛顿向艾米丽求婚。埃德温给艾米丽写了不止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有一封，附上了一幅自画像，把自己画成一个骑士，用一种帝国风范，想要征服他所负责的“世界”。埃德温果真短暂地征服了艾米丽，然而两人的婚姻却是一场灾难。婚姻让艾米丽对性爱十分厌恶，她在印度学者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的指导下，开始继续研究神智学。埃德温继续建设新德里，一直建设到30年代初。1947年印度独立，于是这座埃德温建好的城市，就成了一个垂死帝国崩塌的“震中”。

“一战”造成了历次大屠杀，1918年流感瘟疫又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虽然帝国的纪念碑、烈士的坟墓都很庄严，然而这些悲剧却完全无助于保护帝国的纽带。“一战”期间，澳新兵团（ANZAC）的军人们曾经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中九死一生；加拿大军人曾经在法国维米岭（Vimy Ridge）战役的血肉横飞中爬出战场。在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对抗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英军里的印度人因向土耳其人投降而遭到斥责。这些幸存者，当然没有将自己的军事经验，视为英国高级军官睿智超凡、绝无过失的证据！“一战”期间，至少150万名非洲人应征入伍，担任劳工、搬运工等工种，把真正对付德国人的“大人做的工作”留给了白人。当时的英王乔治五世行事的手段实在不很高明。他感谢了非洲人担任那些低贱而必要的支持工作，从而向德国鬼子们“投去了长枪”。在爱尔兰，“英国的劣势”被视为民族主义者的机会。1914年，数十万名爱尔兰人自愿入伍。然而，惨重的伤亡使得大量统一党爱国者停止了争论，新芬党则吸纳了数以万计的更多成员，目的是切断与帝国的联系，而不是保留与帝国的联系。在印度，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君主素丹宣布加冕为哈里发（Khalifa），自称为一切穆斯林的保护者。这个举动获得了穆斯林群体的强烈支持。“一战”前后，英国政府想要动员英属印度的人力、财政、军事资源，终于在政治上

做了让步：建立了各种地方政府，这些政府均由印度选民选举，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重视保护穆斯林。

然而，这举措力度远远不够，而且也太迟了。我们还不清楚英国政府这么做，是否在期盼印度人能报以忠诚与感激。英国政府倘若真的在期盼，则要大失所望了。1918年，印度自治运动已经如火如荼，罢工、抵制英货、罢市抗议的不合作运动普遍兴起；这些运动，不仅有商店职员、工厂工人参与，而且还有大量公务员参与。缺了这些公务员，印度的一切部门，从邮局到重兵把守的火车站，都无法运行。于是，这些人合力让“全能的”殖民当局几乎无法再统治下去了。不满情绪还经常造成流血事件，最悲惨的一次是1919年印度北部旁遮普地区的阿姆利则（Amritsar）惨案。4月13日，阿姆利则的札连瓦拉园（Jallianwala Bagh）举行反对英国的群众集会，局势比较混乱，但群众并未武装。旁遮普省督迈克尔·奥德怀尔（Michael O’Dwyer）是爱尔兰人，英国政府的忠实拥趸者。在他授意之下，雷金纳德·戴尔将军（General Reginald Dyer）下令军队向没有武器的民众开枪，打死379人。

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Gandhi）富有人格魅力，他睿智地做出决定：不仅怜悯受害者，也怜悯加害者，为了加害者盲目的、野兽一般的残忍而怜悯他们。作为回应，甘地没有提倡暴力反抗，而是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英国宣扬一个神话，就是“印度因西化而实现自我进步”。这神话持续了100年，如今，它在圣雄甘地的影响之下达到了终点，由崇高突然变得滑稽。甘地毕竟有过一段时间，变成过麦考利设想的“棕色皮肤的英国人”。他是印度教吠舍种姓出身，经过努力学习，当上了伦敦内殿律师学院的出庭律师。但是，他的质变也就到此为止了。甘地早年在南非参加民权运动，1914年回到印度，成为对立的角色，当上了印度教的圣人，只穿着手工纺织的缠腰布；他号召人们回到乡村，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他追求的印度自由，不仅是政治转变、社会转变，更是道德转变。甘地希望，这一转变不仅发生在印度人身上，还要扩展到愚昧的帝国主义“主子”身上。这些帝国主义者除了蛮力和敛财，好像一无所知。所以，甘地经过精心策划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公开抵抗西方的权力体制。他认为，帝国权威在仪式上的表达，就是杜巴游行，这种仪式狂热地关注各种烦琐的礼节，光芒闪耀的浮夸，充满珠宝、盛宴的狂欢。甘地的回应是绝食抗议。此外，印度教四大种姓之外有一种贱民，又叫“不可接触的人”（Untouchables）在社会上地位最低，甘地就专门去拥抱这些人。为了抗议政府垄断食盐，甘地半裸着身子，徒步从德里走到海边，数以百万计各行各业的人混成一片，跟着他参加了这次缓慢的游行。殖民当局传递的最后信息是：我们为印度带来了“西方文明”。有人问甘地，他对这种文明怎么看？甘地做了一个著名的讽刺回答：“我觉得，是个好主意。”可以说，就在印度争得自由的同时，甘地被自己的同胞杀害了。此后，还会有

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印度和爱尔兰的教派冲突，直到今天。新传统主义应用的结果证明，它更容易创造并持续差异，而不太容易消除差异。很久以来，英语都是帝国主义权威的语言。那么，英语——至少是美国英语（Ameringlish）——能否摆脱这个角色，在未来成功消除教派冲突呢？不论是在孟买还是在布拉德福德，它能否成为一座中介桥梁，给印度带来现代化，却不带来殖民统治呢？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麦考利曾向工业自治市利兹的选区选民发表热情演说，表示他很希望在“东方”看到英国工业的产物。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绝不可能是说在利兹市东部出现的印度莎丽。然而，这也是大英帝国的命运，无可阻拦！

---

1. 这是一种杂耍的把戏，也是显示自己“神圣”的手段。——译者注

2. 此处指第三代格雷伯爵亨利·乔治·格雷，1835—1839年任英国陆军大臣，1846—1852年任英国陆军和殖民大臣，促进了本土与殖民地之间的自由贸易。与更加出名的前首相、第二代格雷伯爵查尔斯·格雷不是同一人。——译者注

3. 信德地区（Sind），今巴基斯坦一省，首府卡拉奇。——译者注

4. 极为轰动的比比加尔大屠杀（Bibighar massacre），导致了英国人的疯狂报复。——译者注

5. 有争议。据维基百科条目，女王是在正面作战中受了致命伤，且有枪伤、刀伤两种说法。——译者注

6. 简·格雷（1537—1554）是古代英国王室贵族，因政治、宗教等原因短暂登上王位，后来被逮捕并秘密处决，年仅16岁。德拉罗什的作品极力突出了简·格雷的纯洁可怜，渲染了悲剧气氛，展出后曾轰动一时。——译者注

7. 古罗马皇帝曾经为了安抚民众，发放钱粮，并举办娱乐活动，后来被总结成西方典故“面包和马戏”。——译者注

8. 土耳其政府镇压保加利亚1876年4月起义之后，俄国借口土耳其在镇压中迫害南方斯拉夫诸国，发动了1877年的俄土战争，土军大败。土耳其政府为挑动英国与俄国作战，与俄国签订合约，同意俄国单独吞并土耳其。迪斯雷利果然不能容忍，下令英国海军前往土耳其，英俄大战一触即发。经过德国首相俾斯麦调解，列强制订了共同宰割土耳其的计划，从此土耳其地位一落千丈。——译者注

9. 即之前第四章提到的戈登在苏丹反英起义中被杀的事件。当时苏丹受埃及统治，英国也借此和埃及一起压迫苏丹民众，导致了反对埃及和英国

的马赫迪起义。——译者注

10. 历史上，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省曾经搬来很多苏格兰、英格兰移民，这些人信仰新教，曾与当地天主教教徒发生激烈冲突，最后新教教徒胜利，在社会上长期占据优势地位。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爱尔兰自治运动的发展，天主教教徒普遍拥护自治，属于民族派，阿尔斯特新教教徒则普遍亲近英国中央政府，拥护统一，属于统一派。——译者注

11. 红手是北爱尔兰新教教徒统一派的象征。——译者注

12. 而非决定任何自治细节，也就是先决定是否自治，然后再商议如何自治。——译者注

13. 格莱斯顿两次提出的爱尔兰自治法案均告失败，但此后爱尔兰和英国一直冲突不断，并最终导致了1919—1921年的爱尔兰独立战争。结果是爱尔兰成为自由邦，接近独立，1949年完全独立成共和国。北爱尔兰则留在英国版图之内，但冲突依然延续到20世纪末。——译者注

14. 此前，南非的祖鲁王国和布尔人相互敌对。1879年，英国战胜祖鲁，消灭了布尔人的威胁，布尔人很快起兵反对英国，爆发了1880—1881年的第一次布尔战争。1881年，英军在马朱巴山（Majuba Hill）战败，格莱斯顿内阁宣布辞职。——译者注

15. 基特帕文婆罗门（Chitpavan Brahmin），一个婆罗门种姓下面的次种姓。——译者注

16. 希瓦吉（Sivaji），通用拼写为Shivaji，马拉塔历史上一位民族英雄。——译者注

第七章　最后的布莱兹欧弗注

正是在班加罗尔（Bangalore），温斯顿·丘吉尔开始崭露头角。“在那些漫长又闪亮”的午后，当他的同事们在油腻的午餐和轻松的马球赛之间，打着鼾打发了那些百无聊赖的光阴的时候，而他（丘吉尔），则带着吉本的著作一起考察了晚期罗马帝国绚烂的历史遗迹，或是乘着1688年威廉三世的新教之风，遨游在麦考利的文字之中。他于1896年来到印度，作为女皇第4轻骑兵团的初级官员，渴望着行动。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此刻在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对当代的确知，正如西利教授在1883年所承诺的，他认为大英帝国是不同的，“摆脱了大多数帝国的弱点，不只是一个由外来民族所组成的机械性‘强制联盟’（forced union）”。这位纤瘦的、沙色头发、面色红润的22岁少年从未料想过，此刻他正准备着，事实上有些迫不及待地，跟随着骑兵部队将马克沁机枪对准那些“野蛮的帕坦人”（unruly Pathans），或者代表帝国的名义，去往任何一处他将被派遣的地方，而这个帝国的整体性存在关乎整个“强制联盟”的成败。

强制力？如此不合乎英式作风的词语着实让人倒抽一口冷气。权力，如今已是另一回事。权力，已不再是暴力强制，大英帝国的诱人之处在于那些由帝国所带来的、不证自明的种种福祉：和平、安全、自由、繁荣。（那是1897年，在班加罗尔兵站芬芳玫瑰园的不远处，还有黑鸢正挑拣着尸体。）就拿丘吉尔自己所在的骑兵团来说，这些驻兵的到来是为了对海德拉巴邦的大君发号执政施令的吗？不是。带着大君的祝福，确切地说是受邀而来“维护和平”，正如其他军团被分遣到各个独立的印度土邦去维护它们所谓的独立一样。如果西北边境，或尼日利亚北部、埃及南部需要部队增援，那都是为了确保这些地区不至于陷落到一种无政府状态，不至于被其他虎视眈眈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如俄国人、德尔维希的伊斯兰宗教领袖等，总而言之就是与进步的英国人相比不太文明友善的那些人。丘吉尔从未质疑帝国的使命，“为战火中的部落带来和平，驱赶暴力，主持正义，使奴隶挣脱枷锁，在蛮荒之地播下商业和文明的种子……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并且激励着人类为之奋斗的想法呢”？

然而，这些伟大的愿景尚未实现，这期间的等待被大量地耗在了俱乐部里。一切都如此美好，在班加罗尔，丘吉尔和他的两位部队同僚合住一所粉白双色的西式平房，并受到了悉心照料。每个月他都会骑马回到那里，将一袋银子甩给男管家，“你只需将身上的制服和衣物交给负责更衣的男仆，将马匹交给马倌照料，将钱付给管家，然后就无须再烦恼了……这一点微薄的薪酬，在他们看来已经是没什么不能做的了。他们的有限世界只剩下你的平凡衣物……摆脱了漫长的时间，再没有辛劳困苦，王子也不会

比我们活得更好”。然而对于广袤的次大陆来说，这个由小马和潘趣酒大酒杯所组成的世界是何等逼仄。躁动不安的青年丘吉尔还做了一些在他的军官身份之外的事情，他追逐艳丽的蝴蝶，收集肉质的兰花，并熟悉班加罗尔的玫瑰150个品种，而这些爱好将伴随他的一生。然而要使他满足，这些事物还远远不够。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青年丘吉尔一贯有些鲁莽，并且经常会为此付出代价，如今他可以沉下心来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得体，曾几何时在他父亲眼中这都大大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在游廊的低矮屋檐下，或是室内，伴随着来回帆动的蒲葵扇、一杯淡威士忌和苏打水（这些事物都是印度教化他欣赏的），丘吉尔开始为自己补课，他反复阅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当·斯密的作品，以及更具挑战的叔本华哲学。然而，真正令他着迷并来回翻阅的是历史书，并非作为罗曼蒂克的消遣，也不是清教徒般对过往史料进行刻苦研读，而是为了追寻一则信条。对他来说，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兵营生活相比，特别是与那些在印式午餐桌上被来回传颂的使有色人种感恩戴德的无知灵药相比，这信条，远远高于它们。

因此，他开始回归到亨利·哈勒姆，回归到他1827年那本义正词严的《英国宪政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特别是回归到麦考利，这位已逝30年的贵族，长眠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如今的牛津学者们驳斥他的著作是具有强烈倾向性、自我陶醉的辉格党主义作品。虽然丘吉尔本人后来痛斥麦考利污蔑自己的祖先马尔伯勒公爵，而在1897年，他那套多卷的专著《英国史》（1849—1862），以及更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其他文章，都宣告了麦考利标准的历史学者形象：一位公民，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无疑是一位畅销书作家。阅读麦考利的文字如同诵读演讲，比如对无礼地出版其回忆录的前雅各宾党人伯特兰·拜雅（Bertrand Barère），麦考利声明道：“凡是虚假的事物，凡是不诚的事物，凡是不公正、不纯洁的事物；凡是可恨的事物，邪恶的报道，任何恶习、恶行，所有这些不堪都体现在拜雅的文字当中。”丘吉尔喜欢这样澎湃、激越、具有强大控诉能量的反复句式，并牢记在心。书中麦考利的灵魂，实际上成了这位口齿不清，甚至有点口吃的年轻贵族的第一位演讲导师。但麦考利的《英国史》不只是一个关于公共演说风格、文学和修辞的教程，它也使丘吉尔强烈地意识到在这个大局势之下自己所处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认清了自己。在阅读麦考利的作品时，那些英国独有的历史观点在他看来已经不再是一种松散、自负的夸夸其谈，他的导师无疑是正确的，19世纪的英国，没有遭受独裁和革命内战双重罪恶的侵袭，这一点的确在欧洲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当欧洲大陆的每一寸疆土，从莫斯科到里斯本，已然成为上演血腥和毁灭性战争的剧场，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敌对的标准，反而是收获，我们的司法行政是纯洁的……每个人都满怀信心，相信这个国家会保障自己勤勉克己所积攒的财富产业，如此良性影响下，和

平自由科学才得以繁盛”。诸如此类的言论。在那个时代，麦考利的这一观点不容置疑，如此的良性状态确保新教英国摆脱了天主教冠的影响，也促其向君主立宪完成神奇蜕变。随之而来的一切，包括将自由的帝国扩展到世界各个偏远角落的愿景，也只不过是对这最初的伟大理念的维系和自然发展罢了。

通过为英国人书写现代历史，麦考利也赋予了他们国籍，以及一个确保共同效忠的理由，一个当英国需要的时候所为之奋战的理由，比如在白沙瓦或者槟城。从这个意义上看，麦考利曾两次创造历史。他的文字感召了士兵、官员、工程师，甚至船务人员和火车站长，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亦将激发更多的历史创作。丘吉尔肯定意识到了，你可以书写帝国，与此同时，帝国也将由你书写。毕竟，修昔底德并非与世隔绝的档案管理员，而是一位演绎自己作品的戏剧演员——一位战士、一位思想家、一位演说家、民众的鼓动者。他投身事物的沉浸状态不会减少其作品的影响力，反而使他的作品更加经久不衰。

诚然，麦考利的巨著是关于英格兰的历史。但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同样也驻扎在营房，出入于法院大楼；他们同样也参与铺设铁路，指挥挖掘灌溉水渠；他们的羊群和牛群在澳大利亚的内陆啃食牧草，他们在阿萨姆邦的茶叶种植生意欣欣向荣；他们参与议会，也拥有银行、保险和船运公司：所有这些都证明，大英帝国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国家。麦考利自己，更不用说卡莱尔，不也是苏格兰后裔嘛……西利甚至使用了“凯尔特人”做类比，虽然他们所说的语言在英格兰人听来是“难以理解的”，但也认定自己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大英帝国包容明显多样族群可能性的先例，例如荷兰波尔人、“卡菲尔人”（Kaffirs）、“科萨人”，组成了一个真正经久不衰“没有强制”的皇家联盟。

如麦考利一样，丘吉尔当然也相信这个国家和帝国的形成是一个平行且相互强化的自然过程，并非自我建构的结果。依此类推，临时联盟（provisional unions）以持续繁荣为基础，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过程也将自然发生。帝国解体可能导致国家的覆灭，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当然也有过令人遗憾的强制政策，例如保卫新教自由之路上的卡洛登战役，以及1688年的光荣革命。团结一旦形成，这一联系就由共同的理想和利益维护。好比英俊王子查理的女保护人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到底还是成了北卡罗来纳州最热心的汉诺威忠诚支持者之一。

换个角度，大英帝国的强盛确实感召着丘吉尔，至少是在他的晚年，认为这是整个帝国长治久安的基础。也许这就是为何他会在捍卫这个国家的时候表现得如此顽强不屈的原因；甚至是1942年，在他还没有成为首相的时候，在联盟将要分崩离析之际主持政局大声疾呼（尽管，他为了与美国结

盟确立初级合作伙伴关系所接受的条款也注定了崩离趋势）。到了1965年，当他去世时（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一直处于政坛的边缘），丘吉尔一定料到，大英帝国的历史，如果不是结束的话，也差不多到了收尾的阶段。1956年，仅在丘吉尔再三拖延终将权力移交给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一年之后，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法对埃及的入侵，绝对是一场惨败：一场拙劣的攻击，紧接着就是从苏伊士羞辱性的撤离。伊登之后，是两个“哈罗德”——麦克米伦（Macmillan）和威尔逊，更加断然地将自己投身于这场消逝的事业之中。曾经的印度如今是苏联的盟友。象征德里往昔辉煌的雕塑与半身像从基座上被拆下，放置在杜巴场接见厅的围栏之内，见证着现代人的伤亡历史，成了幽灵一般的露天监狱。此时帝国包括直布罗陀、英属洪都拉斯、安圭拉和香港地区，孤立散落的日落之岛。英联邦如今是一块投降的遮羞布，更强健地存在于板球比赛里，而不是在政治团体的任何集结中出现。

1965年1月下旬那个寒冷的一周，当成千上万民众目送丘吉尔的棺木，以及更多的街道上排着队的人群，看着它从威斯敏斯特大厅被运往圣保罗教堂再到达泰晤士河的过程，英国（不仅仅是英格兰）的历史似乎重新集结在了一场巨大的悼念与记忆之中。所有这些，犹如一场忠诚的操演。在那时以及往后的日子里，人们不难察觉到这场哀悼仪式不仅仅是为丘吉尔举办的，也是对他所代表的英国性公理意识的一次告别，对一个历史定义的英国的告别。奇怪的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隐在圣保罗的会众中，对丘吉尔定义的英国发表了一通言不由衷的恭维话，而两年前，他曾否决了麦克米伦政府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申请，理由就是英国仅仅是一个“孤立”海洋岛国，其传统与个性是与正宗的欧洲性相背离的。许多出席了葬礼的人，如同对不证自明的英国性做了最后一次欢呼，就像这是理查德·迪布尔比（Richard Dimbleby）的最后一次广播。而林登·B.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总统以及他的政府要员在葬礼上的缺席，更是锐化了这种感觉。这个诞生于皇室战争中的国家、由殖民帝国利润来维系的国家，现已经步入美国接管阶段，而丘吉尔关于独立国家独断专行的幻想，同他的普罗米修斯一般的老身体一起被埋进了坟墓。

这是否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英国历史（书面制定的）已不再可能，是否它那令人感伤的长寿已远远超越了任何类似于诚实的自我认同之类的事物，是否丘吉尔这样的历史领导者就是延续其幻觉的主导因素之一呢？如今，随着老族长最终离世，也许正是国家成长的时候，面对现实，踢掉王权岛屿盛宴的拐杖，认真看待哈罗德·威尔逊1963年提出的挑战，严肃面对第二次工业科技革命的“白热化”结果。如此就一劳永逸地给予英国指引了吗？

或许已经出现过——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事物？或许尚还有一个英

国，伟大的，以其他的方式存在？它会去珍惜历史，而不是向历史低头？

温斯顿·丘吉尔没有机会逃脱历史的离合器。他出生在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那座威风凛凛的巴洛克式建筑，建于18世纪早期，由一位剧作家出身的建筑师约翰·万布鲁恩爵士（Sir John Vonbrugh）设计，作为安妮女王和国家馈赠给挟胜而归的马尔伯勒公爵的感激之礼。为它花去整整30万英镑，感恩与经费一同被耗尽，对此公爵夫人感到强烈的不满，她后来抱怨这个地方极不宜居。比起作为住所来说，这无疑是更像是一个建筑的宣言：石灰岩制的宣言，彰显着英国作为主导帝国取代绝对主义法兰西的意图。在布伦海姆，这则宣言的表达是赤裸的。在建筑外围，正面礼仪台阶的底部，置有石炮、石球、鼓和旗帜；厨房上方的凯旋门顶部，一只由格里林·吉本斯（Grinling Gibbons）雕刻的尖牙英国雄狮，正享用他的午餐——一只法国雄鸡。马尔伯勒公爵的要敌路易十四神气活现的胸像，被公爵从占领的堡城图尔奈（Tournai，比利时西南部城市）搬至此地，从正南面屋顶线上突显出来，犹如一名普通罪犯被叉于尖钉之上的头颅，作为谴责和警告示众。对凡尔赛宫的拙劣模仿意图更是继续延伸至室内，大礼堂里展示着缴来的各种法国旗帜，大客厅里，墙上的油画展示着幻想出的情节：凡尔赛宫的大使阶梯在路易斯·拉格雷尔（Louis Laguerre）拟人化的四大洲里复现，低头看着马尔伯勒的辉煌和战利品。

1874年11月30日，温斯顿在布伦海姆出生，这是一个双散弹事件。他的降生来得突然且过早，在他的父母——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和他20岁年轻貌美的黑发美国新娘珍妮特（珍妮）·杰罗姆［Jeanette（Jennie）Jerome］婚后仅七个半月的时间内。虽然挺着大肚子，在布伦海姆，珍妮不只是受了一枪。紧随着这一枪，她又跌倒了。轻便小马车颠簸着将她送回住所，同时也导致她产前宫缩的提前出现，在八个小时的艰苦生产之后，温斯顿诞生了。作为第七世公爵的孙子，他不会在布伦海姆宫成长，但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地方，怀着忧郁、得意或绝望的心情。在20世纪30年代，在他政治生涯中与权力隔绝的寒冬，丘吉尔会通过为马尔伯勒辩护所写的四卷传记巨著（1933—1938年），来维护受损的声誉。

对于温斯顿·丘吉尔，历史总是唾手可得。他的第一段记忆是在都柏林凤凰公园附近的“小旅馆”，他的父亲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作为爱尔兰总督的公爵秘书。父母双亲都是疏离且绝有魅力的人。伦道夫有着闪亮的突出的眼睛，大络腮胡下面藏着一张小而紧绷的脸，使他看起来像一只顽强的微型雪纳瑞。而他“亲爱的妈妈”则是另一幅景象，儿子温斯顿回想起她穿着一件骑士夹克，那夹克紧贴着她的身体，如同第二层皮肤，“身上溅满泥浆美丽动人”；或别上一枚钻石胸针，秀发乌黑。任何形式的孝顺渴

望，在丘吉尔权力和名声上升过程中，他都没有印象。与其他同一阶层的男孩们一样，温斯顿被托付给了一名奶妈，伊丽莎白·埃弗里斯特（Elizabeth Everest），她被起了一个绰号叫“伍莫妮”（Woom，不具任何讽刺性自我意识）。正是从奶妈埃弗里斯特那里温斯顿开始学到了一些东西，尽管不多，隐约感觉到了超越此地之外的英格兰，如布伦海姆或班斯特德庄园（Banstead Manor），以及伦道夫在他血统马利的时期所买下的纽马基特（Newmarket）附近的房子。在“伍莫妮”的概念里，英国的精髓位于肯特郡——“英格兰花园”，长满了草莓、樱桃和李子的丰裕之角。在怀特岛的文特诺，奶妈埃弗里斯特带着小男孩看望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妹夫是位退休狱警，以可怕的故事款待他：如监狱暴动是如何在女王的名义下被制止的。在奥斯本不远处的维多利亚式宅子里，温斯顿和保姆、家人一起生活，追逐兔子，攀过悬崖。

上层阶级的仪式围绕着古老的计划和习俗进行。在八岁时，温斯顿被剥夺了他的1000只强大并不断扩张的玩具士兵军队、游戏堡，以及一个真正的蒸汽机，这之后，他被送往阿斯科特的一所预备学校（在当时，甚至是今天看来都有些残忍），在那儿，他听到校长的桦条在小男孩身上的15下鞭打，以及男孩的尖叫声。1910—1911年阿斯奎斯自由党政府期间，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负责监狱改革，他声称自己对囚犯的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私立和公立学校”里的经历。珍妮心疼自己受了惊吓且体弱多病的儿子，仁慈地将他转学到布莱顿的一所由汤普森姐妹经营的学校。1888年春，他进入哈罗公学，这比麦考利的侄孙、查尔斯·屈维廉的孙子——乔治·麦考利·屈维廉早了两年，而那位是20世纪为数不多受欢迎程度可与丘吉尔相提并论的历史学家之一。吊诡的是，哈罗公学的同学们将少年温斯顿当成傻瓜看待（当然他并不是），作为未来的政治预言家，当时他对经典是无头绪的。当得知格莱斯顿先生将阅读荷马当成乐趣时，丘吉尔“认为这是他应当做的”。尽管如此，他从一位良师乔治·汤森·华纳（George Townsend Warner）那里学习了历史（就像屈维廉一样），并且由罗伯特·萨默维尔（Robert Somervell）为他教授语文，使温斯顿感觉到“英文语句的基本结构深入了我的骨髓——这是一件高尚的事情”。

相对于保守党的伊顿公学来说，哈罗是一座辉格学园，而伦道夫曾就读于伊顿。无论如何，到1888年，议员伦道夫·丘吉尔爵士与托利党不再合作。对于拥有土地的贵族们来说，伦道夫是具有煽动性的，狡诈、愚蠢，更别提口齿不清，一向值得怀疑。贵族们花了一些时间去习惯本杰明·迪斯雷利，他自己可疑的民粹主义至少被对教会、王权和贵族的崇敬之情所平衡了。另外，伦道夫·丘吉尔已经想象出了一个他称之为“托利民主”的东西，这似乎完全自相矛盾，无论是对他自身来说，还是对党的利益；尽管如此，他们也必须承认它似乎在中部和北部的工业选区运作得不错。虽然伍德斯托克的马尔伯勒口袋选区已经收入囊中，伦道夫还是一心想通过制

造更多的声音，来为自己赢取名声。1885年大选中，他相当高明地选择了年逾八旬的自由党元老约翰·布赖特作为他的竞争对手。在伯明翰，在败选之前，他很好地利用了当地的古典激进自由主义的冗余，以及承诺过的抑制托利党的社会福利。群众拥戴他，甚至是他不清晰的口齿。党内元老们嘴里哼哼哈哈，紧张地把起了他们的胡须。在一个充满周到的担忧人士的政党里面——索尔兹伯里勋爵、斯塔福德·诺斯科特爵士、迈克尔·希克斯贝克爵士（Sir Michael HicksBeach），30多岁的伦道夫，看起来像是一个危险的我行我素之人。他猛攻了由党内改革派约翰·戈斯特（John Gorst）为迪斯雷利提出的保守党组织系统，甚至更无耻地在爱尔兰打起了阿尔斯特牌。这一场场尖锐的戏剧性事件之中，有一条警句像一颗手榴弹一样落下，没有什么能比这造成更长远的附带损害——“阿尔斯特将战斗，阿尔斯特将是对的”。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因为他对强制性“犯罪议案”的姑息态度，伦道夫试图与帕内尔保持良好的关系，同样还有与贝尔法斯特工会主义者的关系，甚至帮助爱尔兰国会议员推翻格莱斯顿的政府（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案例）。1886年7月，在地方自治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保守党政府，索尔兹伯里意料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与伦道夫·丘吉尔分享权力（可能在睁眼说瞎话）。此时37岁的他成了下议院领袖和财政大臣，但他的胃口也随之增大。丘吉尔开始严厉打击外交政策，以及被普遍认可的首相权力。与索尔兹伯里在陆军与海军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斗争。最终未能如愿，还致命地高估了自己的不可或缺性，伦道夫受到了辞职的威胁，嘘声四起，他在财政大臣这个职务上只停留了短短四个月。我们可以想象索尔兹伯里和诺斯科特私下里举起酒杯如释重负的样子。

伦道夫爵士的政治生涯已经过去，对大多数政客来说才刚开始。比远离政坛更糟糕的是，他准确地把握自己将永远回不去了。他陷入了一场凶猛、痛苦且沉默的阴郁之中，这阴霾笼罩着整个丘吉尔–马尔伯勒家族，如同积覆了一层尘埃。温斯顿寄来给“亲爱的妈妈”的信件显得更加可怜迫切，而这时他的母亲已有了外遇，开始缺席家长见面日。布伦海姆的夏日开始由年迈的公爵夫人范妮主持，在她身边围着一群谄媚的穿拖鞋的男仆，拖着脚步从摇曳的烛光下走过，相当严峻的景象。父子之间的会面是罕见的，因为温斯顿外表平平、谈吐结巴，以至于伦道夫认为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傻瓜，对脾气暴躁的父亲来说也成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刺激：“如果你在学校期间、往后不能改掉自己闲散无益的生活方式的话，我确信，你将成为一个社会败家子，公立学校出来的众多废物里的其中一个，你会堕落成为一个卑劣、闷闷不乐的没出息的人。”受到了斥责的惊吓，温斯顿还是如父亲所料，犯下了小罪行。在哈罗，他仍然孤独，意识到自己的笨拙（从三轮车摔下造成脑震荡），将自己隔离，认为出生和阶层是一种不幸的负担。“我宁愿被当作一个砖瓦匠的学徒”，他后来写道，“或者一个跑腿

送信的男孩，或者在杂货铺的前窗帮父亲穿衣的男孩。这本该是真实的，这本该是自然的，它会教会我更多，我会做得更好。此外，我还会更多地去了解我的父亲，这对我来说本该是一种快乐。”

后来，温斯顿写道，在他的一生中，与伦道夫仅有过不超过三次或许四次的长谈。然而，其中之一，改变了他的人生。发现温斯顿正编组他日益庞大的玩具兵军队，甚至还带着精明的战术眼神，伦道夫问他是否愿意去参军。当然，父亲认为，对成为像律师或教士这样可靠的职业来说，自己的儿子温斯顿是有些顽固不化的，更甭提政客了。但儿子终将听到历史辩护的号角。他挑起了父亲的断剑，刺向敌人，证明自己并非等闲之辈。

哈罗的“陆军班”（不是之后的格莱斯顿）被桑赫斯特所取代（在三次入学考试之后）。在那里，温斯顿不协调的能量终于找到了一些出口。他变得更合群，感叹着将领和战役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做着成为龙骑兵的美梦。他希望能加入一个骑兵团，但伦道夫犹豫要不要为他在马匹上投资，他认为温斯顿会从马上摔下来。无可奈何，在母亲的帮助下，还是从当地的车马出租所租了来用，他开始经常骑马飞奔，追赶狐狸。难免也出现过一些事故，激怒了伦道夫。伦道夫现已身患绝症，似乎不是一般宣传所说的梅毒，而是某种神经性疾病。父亲送给温斯顿的一块金表在与一名军校同学的碰撞中破损，温斯顿偷偷修复了它。但两周之后，这只表还是注定从温斯顿的表袋里落出，掉进了大池塘的支流里。温斯顿吓坏了，做了一个丘吉尔能做的最好的事：他动员了一支由23名步兵组成的小部队及一辆消防车，前去泵塘，最终手表被发现覆盖在泥土之中，毁损已无法弥补。父亲听闻了这事故，而儿子已经无可辩护，只好坦白：“我知道自己在手表这件事上显得非常愚蠢，您完全应该把它带走。非常抱歉，一直这么笨拙粗心，但我希望您不会生我气……再说一遍，我很抱歉让您生气，我永远是爱你的儿子……请不要以手表这件事来评判我。”但是这位19岁的年轻人对他父亲的哭诉是徒劳的。他还是受到了父亲的谴责，说他不负责任和百无一用（不像他的弟弟杰克那样更加值得信赖且成熟，为什么要理会，诸如此类）。

1894年11月，将从桑赫斯特毕业之际，温斯顿首次作为公众人物出现。但他和朋友示威的目标差不多是胡闹的性质，丘吉尔假装认定高级宪法原则受到了威胁。为了抗议剧场酒吧道德败坏的景象，“净化联盟”（the Purity League）的劳拉·奥米斯顿·钱特夫人（Mrs Laura Ormiston Chant）在莱斯特广场步行道支起一张帆布屏风，意图将善良与丑恶隔离开来——一次清教徒的干涉行动。为了申诉英国人天赋的自由权益，丘吉尔撰写了一篇演讲稿，引用了约翰·汉普登的事例（由于偏好妓女而不太出名），但没能站在被拆毁的屏风前发表。在废墟之上，温斯顿做了平生第一次演讲：“我抛开了关于制定章程的论点，直接煽动了听众的情绪甚至是激

情，最后总结道：‘今晚你们看到我们拆毁了屏风，在不久的大选中，你们也要推翻对此事负责的人。’”迎来了不少欢呼声。温斯顿在莱斯特广场慷慨激昂，还提到攻占巴士底狱的情景。净化联盟闹事本来就如一次少年人的郊游，比起其政治意味更像是一场恶作剧。错过了回桑赫斯特的最后一班列车，热血的年轻人们沉浸在欢乐与香槟酒，以及许多午夜的嬉笑声和敲门声中（“老伙计，给我们你的圈套！”）——挑起伦道夫的严词指责。但除了斥责，伦道夫早已到了病情的最后阶段。讽刺的是，他离开（和珍妮一起环游世界）之前的最后几个月是自己与战战兢兢的大儿子一起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这个男孩似乎已经聪明了一些，伦道夫这样想，他意在赞扬而不是指温斯顿所继承的纨绔性格。无论如何，温斯顿已经足够聪明到可以被介绍给托利政治家阿瑟·贝尔福和自由党帝国主义者罗斯伯里勋爵，并认识到政治竞争对手也可以是超级俱乐部里的朋友。

然而，要弥补失去的机会为时已晚。伦道夫被匆匆送回伦敦的时候，几近瘫痪的状态，最终于1895年1月去世，享年45岁。奶妈“伍莫妮”埃弗里斯特（温斯顿喜欢与她一起沿着哈罗街的大街散步）也在随之而来的7月死去。现在只剩下他的弟弟杰克，温斯顿与他有一个随和关系，但都不是很亲密。当然还有妈妈，仍只有40岁，依然甜美、可获取，依旧不可抗拒。这只纽约交际圈的母虎重新现身，修整自己的皮毛和爪子，如今她手头的工作就是为她的男孩子们敞开大门。对于温斯顿而言，将他的父亲作为一段回忆来对付似乎更容易些。从这种责备的眼神中解脱出来，他大可全心全意为父亲平反，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竞选演说坛上，成为伦道夫永远没有料想过的继承人。温斯顿的回报尽孝之旅到1905年达到顶峰，在一本几乎理想化了的传记中，为他那被误解受虐待的天才父亲辩护。

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职业生涯已经成为可能。第4骑兵团的指挥官爱尔兰贵族约翰·布拉巴松上校（Colonel John Brabazon）——温斯顿记得他的贵族气派的发音障碍，无法发出“r”这个音［“去伦敦的火车在哪儿？（train念成twain）”“已经开走了，上校。”“开走了？叫下一辆来！（bring念成bwing）”］。注意到温斯顿在桑赫斯特和奥尔德肖的背景，表示了肯定态度。但即使是21岁的年纪，在班加罗尔因吉本和麦考利而顿悟之前，温斯顿知道他需要从餐室和阅兵场中开拓出一种全新的人生。还不能完全笃定，但他已向母亲坦白，军事专长对他来说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他在举剑的同时提起笔，同时制造两种不同的帝国历史，这将大不相同。

伦道夫夫人使出浑身解数来达到埃弗兰·沃的格兰德夫人（Evelyn Waugh’s Lady Metroland）的期许，任务适时施行；她开始引荐温斯顿，尤其是在纽约。在那里，温斯顿听取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政治家威廉·伯克·科克伦（William Bourke Cockran）的演讲——头戴帽子的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钱权操纵者——并认为他的口才不过如此。古巴、西

班牙统治者正展开一场游击战争——他在《每日图报》（*Daily Graphic*）发回了他的第一篇战争报告。他们展示出一种洞察力或天赋，一种战火中的新闻冒险主义精神，一种新型的报纸报道，在战火纷飞的时刻蓬勃发展，也是如今电视记者现场报道的先驱："我们骑着马，身穿制服，左轮手枪已经上膛。在黄昏的暗光下，一长串武装和负载的人们正向敌人推进。他可能非常接近，也许正在一英里之外等着。我们还不得而知。"

第一次，温斯顿感受到了子弹的威胁。他身后的一匹马被撕裂，死去。后来回想，子弹离他只有几英尺的距离。幸存下来的险境使他肾上腺素激增，激发了一连串保卫帝国的冒险行动。这种早期的无畏感（永远不会迷失），使他成了一名横冲直撞的士兵、一位才华横溢的战争记者，凭着直觉，他意识到创造历史需要写作和战斗。温斯顿走到了帝王行动最显耀的位置上。

在印度西北边境——那里的战斗将继续，断断续续地，从另一个世纪进入我们的时代——他在宾顿·布拉德爵士（Sir Bindon Blood）麾下服役［当然，他注意到，这位将军是布拉德上校（Thomas Blood）的直系后裔，他的祖先试图从伦敦塔窃取查尔斯二世的皇冠珠宝，却因蛮勇而受到奖励，被赐予了爱尔兰的一个庄园，而不是被有雅量的国王斩首］。温斯顿评价，如此的贵族偷盗家族史使宾顿爵士对敌人怀有一种健康的同情心，无论是对帕坦人或是对阿富汗边境的普什图（Pashtoun）部落。

小规模冲突变成了文章的素材。文章变成书的手稿，母亲珍妮将手稿送到朗文（Longmans），它曾经出版过麦考利的作品。这一宣传打开了一些门，也闭上了一些。他父亲的老仇家索尔兹伯里勋爵，事实上还召唤了这位《马拉坎德野战军纪事》（*The Story of the Malakand Field Force*，1898）的年轻作者，送给他祝福，假装不曾有过恶意。但是，基奇纳少校——在苏丹开展行动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马赫迪·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ahdi Muhammad Ahmed），几乎抵抗到了最后——认为丘吉尔是胡搅蛮缠（这猜疑将一直持续到1915年他们在加里波利共同制造的灾难）。温斯顿在1898年参加了恩图曼（Omdurman）战役——此外，还有他想象中的最史诗般的人物形象——作为深蓝色英国皇家第21枪骑兵团的一员，这支英国军事史上最后的伟大而徒劳的厚重骑兵军团，他们与"托钵僧"的军队相撞，如同"两堵墙活生生地撞在一起"。这些经验为丘吉尔的文字叙述提供了完美的素材，一项日益精进的技能，甚至戏剧性地抓住了每一场冒险："无人骑乘的马疾驰着跨越平原。男人，紧紧地抱住了马鞍，无奈地跌倒，身上覆盖着从十几个伤口里喷涌而出的血液。战马与他们的骑手一起交错倒下，血从巨大的伤口里淌出。仅120秒内，5名军官、66名士兵和119匹马……已死亡或受伤。"

即使在1899年他迅速出版了《河上的战争：苏丹的再征服历史》（*The*

River War: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Reconquest of the Sudan）的时候，丘吉尔知道同情自己殷勤堕落的敌人是成功绝妙故事的关键因素。但是，追随吉本著名的同情甚至英雄般的穆罕默德肖像以及伊斯兰教诞生的叙述，丘吉尔同样也攻击了一系列邪恶人物，“贪婪的交易者、不合时宜的传教士、野心勃勃的士兵和谎话连篇的投机者”，他们亵渎了理想，尤其是在苏丹的英–埃共管政府。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似乎并不像帝国漫画里的“疯狂的毛拉”，他实际上是严肃的清教徒式的改革者，他对叛乱的呼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使丘吉尔（再次娴熟地以伪吉本形式写作）哀叹道“爱国宗教叛乱慷慨的鲜血凝结成一个个军事帝国的暗血块”。但他还为“德尔维希”军队里残废的骑兵和步兵奋笔疾书，并为传闻表示震惊，基奇纳曾允许践踏马赫迪的坟墓，将圣战士的颅骨当作普通会议的谈资。

虽然他对将军怀有疑虑，却也没有针对他们的战斗成果。一个委婉的题目“盎格鲁–埃及的苏丹”，反过来又使一个连续性的纽带成为可能，通过铁路将英属非洲从开普敦到开罗连接在了一起。丘吉尔接受英属非洲地区的防御性合理化——它已经发生了，先发制人，否则将不得不接受埃及，以及到印度的生命线的不稳定性，面临赫迪夫的挥霍无度、法国军事扩张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三重威胁。当然，不必担心，正是这样故意含混的意图和目的，使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在印度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领土帝国。同样也不必担心，印度殖民地综合征已经重演，通过“保持动作”的军事和政府成本，推动帝国管制去往更多的冒险之地，从而得到完美的富矿（西非棕榈油、南非黄金），这样一来也将忽视其欧洲的竞争对手，首先是法国人，但总有一天历史会平衡。大英帝国的贪婪是财政上的，也是地理制图上的强权。

在南非，名利与财富捆绑在一起。伦道夫投资的兰德矿业股份公司，从它们的原始面值上涨了50倍；不幸的是对珍妮和温斯顿来说，这笔财富由于其已故的主人同样巨大的债务欠债而被消耗殆尽。但丘吉尔也受到了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和帝国制造者塞西尔·罗德斯的斥责，大英帝国的力量受制于一群顽固的荷兰农民的赎金，这决定了英国定居者能否享有在德兰士瓦[注]的政治权力。布尔战争是军事文学冒险的又一次好机会，温斯顿打下了他的烙印。通过对他母亲更多的无耻哄骗，他辞去骑兵的军职，担任起《晨报》（*Morning Post*）的首席战地记者。他与统帅雷德弗斯·布勒爵士（Sir Redvers Buller）一起出征，最终在防御布尔进攻的装甲列车时被俘虏，此后从比勒陀利亚（Pretoria）的军事监狱逃脱（留下两名应该与他同逃的同志），藏在煤货车里，随后步行了数百英里，并及时回到南非轻骑兵团正常工作，在莱迪史密斯（Ladysmith）如释重负。这次逃狱经历神奇到令人难以置信，也使温斯顿从一个针头线脑的前线故事售卖者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形象。他书写自己在布尔战争中的经历并像幻灯片授课一样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大肆宣讲（惊人的是，

在美国纽约，是马克·吐温介绍了他），将10000英镑收入囊中。同样重要的是，它让这位贵族青年体验到了将大批人群握于掌中的实际感受。那时，他只有20多岁。

1900年，丘吉尔将这一切的忙碌大胆获得的财富转变成政治上的成功，开始了从政生涯。对此他的父亲曾绝望地认为他不够资格，作为保守党工会成员的候选人，在奥尔丹，他赢得了席位。这是他的第二次尝试。在1899年，他曾有过一次实际机会——拥有两名保守党议员的同一工业选区的选举机会（他父亲心目中工薪阶级保守主义的一个实例），但被击败。在竞选期间，温斯顿发现自己遗传了丘吉尔家族的口齿不清甚至偶尔的口吃现象，其演讲导师努力纠正但也作用不大，其实远不止一项不利因素。它实际上可以被戏剧性地管控，达到惊人的效果——酝酿停顿，然后调皮地妙语。他的辩论口才更是绝妙，无论是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工会模拟的下议院辩论中，还是在公共汽车上、剧院里，或市政厅内。

但在战后咔叽大选注期间，在奥尔丹，坐在四轮马车里游行并被工厂女孩团团围住，这就意味着丘吉尔比布拉巴松上校或者宾登·布拉德爵士这类人更懂得真正的英国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Clementine）说——仁慈但也准确——认识温斯顿你不得不了解他一生中从未坐过公交车。虽然这可能是为了将丘吉尔的贵族优越感与英国人民的生活区别开来所做的夸张处理。寇松是一个贵族脾气和贵族出生的典型例子，他不得不打起精神才能与平常百姓接触。而丘吉尔可以走向他们，并沉醉于他们的骚动。他的父亲发明了“托利民主”，以此作为增加选票的神通，他的儿子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下来。

尽管如此，回到布伦海姆宫，丘吉尔对自己的阶级实际上是矛盾的，可以预见在下议院他成了一个不顺从自己政党的后座议员。约瑟夫·张伯伦对帝国关税的痴迷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拒绝令他心寒，逐渐地，他内心的政治实用主义使他意识到一场权力运动正在酝酿，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王公贵族们越来越远，而是趋向于那些拥有商业、职业技能或工业财富，以及独特才能的人，比如利物浦律师F.E.史密斯和威尔士律师大卫·劳合·乔治。

虽然直到1905年自由党上台，多数内阁成员仍然是由特权阶级组成，但几乎由他们垄断的政府却开始动摇，不仅仅是因为平等民主的进步，还因为长期陡峭的农业萧条。实际上，1870—1910年，由于无法与殖民地和美国的进口产品竞争，英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农业生产国。300万英亩农田被闲置。到1911年，45万英国人口中仅8%的人靠自己土地的收入维持生计。英国农业收入同期下降了25%。租金其次，以至于它们往往不足为乡村别墅周末、城里的假期、储备精良的马厩和地窖、时尚的桌子和衣柜，以及日益昂贵的养育女儿费用提供抵押贷款。当遗产税的压力（于

1894年推出，随后于1907年以更加惩罚性的方式施加）增加，销售（抛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似乎没有迹象表明土地价值将恢复，销售宜早不宜迟，该过程吞噬自身，同时也演变成了雪崩。大卫·康纳汀肯定，几乎有四分之一的英国私有土地，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被挂上市。这些田宅的多数——他称之为“贵族伤亡”——被新富阶层购买［他们的财富是从工业、航运、矿业、保险或出版业积累的，正如报纸大亨伯维尔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的父亲一样］于自治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口音出现在了越野赛马和松鸡射击赛上，旧贵族的遗老们试着让自己不畏缩。丘吉尔的表弟——第九任马尔伯勒公爵［永远不会宽恕温斯顿在1909年的“人民预算案”（People's Budget）一事上对贵族言辞攻击］哀叹道“旧秩序注定是要完了”。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特别是布伦海姆不会就此触礁。但某种生活方式确实是在沉没——下沉而不是突然消失，不管怎么说都在坠落。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活跃的费边社成员，威尔斯——一位专业板球运动员、保龄球教练、布鲁姆利（Bromley）小镇高街玻璃和瓷器店老板的儿子——在1909年出版了他的杰作《托诺–邦盖》。他回望了一段并非很久远的年代，位于威尔斯笔下肯特的“布莱兹欧弗山庄”，在那个年代它显然还是英国社会宇宙中不变的中心。威尔斯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因为他父亲就是从天恩之中坠落的人，或者说他在修剪葡萄树的时候摔断了一条腿，毁了他的运动员生涯，并迫使男孩的母亲莎拉成为汉普郡一座“大山庄”阿帕克（Uppark）的仆人。威尔斯记得，并敏锐地感到，它的无限分级的阶层假设，了解到宅子下方的地下隧道网，仆人们像莫洛克人注一样，听从着自己主人的使唤。但埃洛伊人注仍然居于顶层：

这个广阔的猎苑，这个巨大美丽的山庄，以它那俯视教堂、村庄和乡野的雄姿，不可避免地向人们表示：他们代表着世界上至关重要的东西，而其他一切只有在和他们发生关系时才有一定的意义。他们代表着绅士、贵族，正是由于依赖他们，通过他们，为了他们，世界上的其余人——种地、做工的人，阿什博罗的买卖人，田庄的上等仆人、下等仆人和户外仆人才得以呼吸、生活。

到1909年，这样的确定性已经消失。虽然乡村的外观是一样的——大山庄依然耸立在猎苑里，村舍毕恭毕敬地簇拥在猎苑的边缘，显示出一副攀龙附凤的媚态……这就好比明媚十月的一个清晨，变化之手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按上它的身体……突然一场霜冻，一切面目就会变得光秃，联系崩断，耐心用尽，我们那漂亮的青枝绿叶的门面装潢就会飘在泥潭中闪光。

所以，威尔斯展望，尽管有些过早。毕竟，他明确地知道“过去”英国在未来的负重。作为一位科学家——伟大的达尔文主义者T.H.赫胥黎

（T.H.Huxley）的学生——威尔斯多次表明，未来才是他以及我们其他人应该感兴趣的事物。国家和国家的历史都是部落般的时代错乱产物。真实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不是荒谬的专制领地和语言区隔。拯救未来需要一个行星的视野。

这种观点随着他1919年的巨著《历史的概要》（*Outline of History*）一起到来，这部作品与丘吉尔的岛上史诗或者任何人想象中的历史都不相同。不过目前威尔斯的未来以及他未来的历史，仍然只是科幻小说。阿帕克/布莱兹欧弗体系的主人及其亲属还在继续界定英国性，即使支付给园丁的支票簿现在是在商业账户上显示的。［可以预见，威尔斯让吕本·利希滕斯坦爵士（Sir Reuben Lichtenstein）最终买下了布莱兹欧弗。］社会民主并没有就这样发生在费边主义的地平线上。那些在屋檐下存活下来的人更只是专属的精英团体：到191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面积的一半只从属于4500名业主。

但并不是所有的富豪都会选择同遗老们一样将自己的钱财投入到公园、马厩和松鸡沼泽中，他们中有许多人，如约瑟夫·张伯伦，螺丝制造商，曾犯过在作为伯明翰议员宣誓就职时戴着帽子的错误（一次不可饶恕的失礼行为），而现在他是英国新的贵族，并在郊区建起了自己的庄园。张伯伦的豪宅叫海布里（Highbury），坐落在伦敦以北地区，他在那里度过了青年时期，最初是由18英亩的田地包围，而不是几千座的典型老式贵族房屋。这所豪宅由另一位张伯伦设计［约翰·亨利·张伯伦（John Henry Chamberlain），作为伯明翰学校、城市建筑和市政喷泉的建筑师而名扬在外］。宅院由带有石头装饰的坚实橙色工业砖砌成，选材是典型意大利工业风格。室内，一切都显得昏暗但有光泽。“没有书本，没有工作，没有音乐”，贵族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嘲笑说，“为了缓解了锦缎家具带来的丰盛压迫感”。室外，有槌球场、网球场和维多利亚晚期如画的风景——灯芯草的沼泽、山谷、溪流和未风化的桥梁。也经常可以看到张伯伦本人在自己的兰花、杜鹃花和仙客来丛中进行考察之旅——自然，每一个物种都拥有自己的温室。

海布里不太远处（当时市区以南4英里）建有贵格会教徒可可和巧克力大王乔治·吉百利（George Cadbury）的豪宅——伍德布鲁克（Woodbrooke），同样建有标准的网球场、槌球场和一个最新的标准配置——七洞的高尔夫球场。但吉百利对他的庄园怀有更加雄心勃勃的社会愿景，不仅仅是俗气财阀的自我庆典。当时的社会评论家如约翰·拉斯金与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对此做出了回应，某种程度上说，工厂工业主义意味着对社区的破坏，吉百利将宅子建在伯恩维尔（Bournville）一个新老村庄上，而工人们本可将半木结构的小屋安置在这里，在一片绿地上聚集。复活的家长式“可爱的英格兰”将是可怕的贫民区大杂院的解

药，而那大杂院，吉百利从张伯伦在伯明翰推行社会改革之前就记得，仍然陷于最肮脏的贫困水槽之中，好比伦敦的东区，被形象地记录在了查尔斯·布斯的作品《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里。到1900年，吉百利（模拟中世纪）的工人住宅共有140座，为了达到效果，他买了两个老宅子，13世纪的明沃斯格瑞夫（Minworth Greaves）和都铎塞利（Tudor Selly）庄园，被他搬至伯恩维尔，精心修复。这种重新创建想象中的“有机”社区——卡莱尔、普金和拉斯金声称在过去的中世纪已经存在——的尝试是与汉诺威的消除政策完全对立的，处境尴尬的村庄被新富从视线中移除。在伯恩维尔，吉百利甚至重新发明了古老的庄园盛宴传统，组织祝宴和戏剧演出，以及为伯明翰地区的其他工作人员提供一日游活动，让他们看看在这位新的工业男爵领导下生活将是什么样的。

在利物浦附近的默西塞河畔的阳光港，出生于博尔顿、通过加工殖民地原料产品发了财（他的情况是棕榈油）的威廉·赫斯凯斯·列夫（William Hesketh Lever）为他肥皂厂的工人们也做了同样的事。约30名建筑师受他委托创建一个完整的“花园”村，并又无可置辩地称其为“老英式”风格——大量带有詹姆士–佛兰芒风格的山墙，许多装饰性的石膏灰涂料，当然，还有无处不在暴露在外的木材和铅玻璃。为了通过“肥皂精神”完成老英格兰重生的效果，还专门建了两座农舍式小别墅，都是对安妮·哈瑟维的小屋(注)的“精确”复制。港口阳光别墅的出租状况是：基本的“厨房”型或者更豪华的“客厅”型，但两者和伯恩维尔一样，都配备有自来水和室内卫生间，租金被仁慈地设在大约每周22先令——平均工资的1/5。由于英国工业界的批评家们认为传统的家庭生活已经被工厂的工作破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厂方为阳光港的500名孩童办起了学校，为女孩和工作的妻子和母亲提供了烹饪、制衣和速记的特殊课程。直到1909年，共有700座小屋，音乐厅和剧院，图书馆，体育馆和露天游泳池被陆续建起。

伯恩维尔和阳光港的工业村民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几乎没有如典型的40%的英国人的状况一样，在20世纪之交，居住在超过10万名居民的城市里。维多利亚时期的贫民窟调查报告，如布斯的伦敦东区研究或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1901年在纽约的贫困研究，给社会批评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生活工作在大型城市一定如人间地狱。在这些肮脏的过度拥挤的贫民区中，可能没有比世纪之交的格拉斯哥情况更糟，那里的非技术工人仍然住单人间，或者甚至两人同挤一个出租单元。这样狭小的空间将解决一个家庭的睡眠、吃饭、沐浴等问题。即使到了1911年，格拉斯哥住宿的85%仅包含三间房或者更少。

但真正的贫民窟居民人口也许不超过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10%。在国际贸易时代，不安全和不可预测的就业环境可能不利于传统意义上以英国出口为主的行业，如煤炭业、纺织业、重工业，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生

活条件——饮食、健康、住房、犯罪率——自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或1887年的女王登基庆典以来就已经改变了。其他城市如加的夫（Cardiff），有128000名居民在南威尔士煤炭出口热潮的浪尖上，自19世纪中叶以来已经增长了7倍。在像曼彻斯特或谢菲尔德这样的老工业城市，最嘈杂的物业单位已经被取消，并被上下各两层、每层各四房甚至五房的排屋所取代（在中部和东南部甚至是六间），由砖砌成，常由小石块或灰泥饰面，装饰出英格兰和威尔士工业城镇的经典外观。为防止过度拥挤，政府会制定章程，启发他们的时间观，为街道的宽度或天花板的高度制定条例。在今天，当然这些街道看起来像是一个消失的工业帝国中更为令人沮丧的遗迹（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中有许多被塔楼取代，但至少比塔楼更好地经受住了英国20世纪历史的风霜）。

与欧洲和美国几乎所有工业世界的住房不同，英式排屋以核心家庭为单位基础，也许是更大的家族，如叔叔、阿姨和祖母，以及邻居，他们会聚集在后院，有时在街上、当地的商店、教堂和酒吧里。房间按功能区分——厨房、客厅、卧室，在更富裕或更加富有野心的房子里会设有一间客厅，除特殊场合外很少使用，用来展示家庭珍品，如钢琴和餐具柜。和燃气被用于照明和烹饪一样，水现在也由市政供应，并通过水龙头直接进入水槽，而不是通过室外泵取得。马桶正迅速取代土厕，通过城市下水道清除粪堆和粪便，即使厕所几乎总是建在户外。在埃克塞特（Exeter），从1896年开始，镇议会花了巨额的88,000英镑建造了当地的污水处理系统，成功地宣扬了他们带给城镇带来的转变，尤其是减少了伤寒、斑疹伤寒和霍乱等传染病的风险和发病率。拉斯金对此发表了观点："通畅的下水道，比人们最敬仰的圣母玛利亚画像，更高贵、更圣洁……"

虽然嵌入式浴缸仍是一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奢侈品，发生于世纪之交的市政澡堂革命，意味着英国的劳动人民，即使那些没有拥有昂贵的锡制状浴缸（采矿家庭的必需品）的人，现在也可以定期洗浴。从1892年至1893年，在伦敦东部的堡区（Bow）澡堂运作的第一年，就有73000的使用人数。1897年，伦敦南部的兰贝斯（Lambeth）建有一幢壮观的澡堂，内设有3个游泳池和97个浴缸。在1912年的伦敦，正如安东尼·沃尔（Anthony Wohl）所记载的那样，公共浴室的访问量达500多万次，其中不乏一些华丽，甚至具有异国情调的设计，地板和墙壁上铺有闪亮的瓷砖。再加上公共洗衣店的使用，大众卫生时代的到来（还使阳光港仁慈的独裁者赚取了更多的钱），在社会机构中是一次伟大的转变，即将到来的投票是为了政治。

同样，饮食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变得更好。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加工过的和廉价的食物，如人造黄油、黄芥末和商业生产的果酱，带上了人们的餐桌。农业的萧条导致了农村的陷落，也成为城市消费

者的机会，主食价格——茶叶、培根、面粉、面包、猪油和糖，其中绝大多数产自殖民地或爱尔兰——的价格在1870年至1914年下降了1/4~1/3。随着冷藏肉类的进口，穷人食用“slink”（早产的小牛）或“broxy”（病羊）的市场仁慈地收缩了，虽然很少有家庭会放弃牛肚（牛的胃黏膜）。

这些都不代表着英国的社会民主已指日可待。帝国财富对减少巨大的财富差距几乎没起到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根据社会历史学家何塞·哈里斯（JoséHarris）的说法，英国10%的人口占了92%的财富。另一方面，多达90%的死者没有留下任何有记录的资产或财物。虽然，在爱德华时代空前多的人可能认为自己是相对较富裕的，英国在新世纪的经济前景将会使持有这些收益变得更难，而不是更容易。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行业——煤炭业、冶金业和纺织品行业——压力不断堆积。曾经从英国进口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现在成了竞争对手，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自己的关税保护。例如，全部威尔士马口铁的3/4，已经出口到美国。然而，1890年开始施加麦金莱关税（McKinley tariff）后（旨在培育美国国内工业），这些出口的价值在短短七年之内就几乎减少了2/3。马口铁的案例同样也反映在煤炭、生铁和机车轨道上。

两种不一定相斥的方案可用于阻止英国工业霸主地位衰退之初的这些不祥迹象。英国可以做出回应，正如约瑟夫·张伯伦所想，通过自己的皇家关税制度，建立一个经济的“不列颠堡垒”，在海关壁垒的背后，殖民地将被保留为原材料和制成品市场的专有储备所。（从长远角度来看，殖民地是否从中获益，最好留待将来讨论。）即使在他上台之前，拖着一个不情愿并已分裂的保守党在他身后，张伯伦为这个前景感到兴奋，并向温斯顿·丘吉尔吐露——他的选区奥尔丹是一个严重依赖于纺织品命运的城镇——这将是未来的重大政治问题。在1905年的竞选中，他将通过这个问题来攻破保守党，正如20年前在爱尔兰攻破自由党一样。

还有一种选择：实业家本身正在呼吁等待立法保护形式的帮助——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这可以通过投资节省劳力的机器来实现，从而降低劳动力的规模；削减现有劳动力的工资成本；为他们的财富赢取更多的时间和产品。或者以上三者的结合。他们一致尝试推动这些改变的后果就是导致了一些痛苦的劳资纠纷事件——包括停工、罢工，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由于合理化节约的管理趋势与工会背道而驰，它们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足够可以动员劳动力，不仅是为了争取一个职位，更是为了争取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特别是为矿工），为“非正常”工作或危险的工作争取特殊补贴（还是在采矿业）。虽然最大的工会成功招募到绝大多数的工人加入它，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对抗结果是复杂的。当工程师联合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在1897年决定抵制引入新

的“自行动”机器时——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降低所需技能和工人数量，从而降低工资——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着停工的威胁。7个月后，工人最终屈服于工业家条款，回归工作岗位。更糟糕的是，1901年法院裁定，为了维护“塔夫谷铁路”（Taff Vale Railway）起诉铁路工人对罢工期间产生的收入损失进行赔偿（这次是巨额的23000英镑）。

由于这似乎不大可能完成，特别是在托利党至高无上的年代，议会将永远无法撤销这样的决定，工会拥有自己代表权的需求变得迫切。1889年伟大的伦敦码头大罢工的老将——离岸员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成为议员，带着一个照顾工人利益的议程与自由党结盟。但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的极化氛围中，伯恩斯被怀疑是戴金表、穿背心、鞋履锃亮、头戴圆顶帽的“老”工会会员的典型形象，在为工人阶级赢取尊重的同时，也动员工业行动。例如，在1893年进行过一次罢工的南威尔士矿工，更倾向于为自己寻找一位不从属于任何主要党派的政治家。在上一年，苏格兰社会主义人士詹姆士·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成了第一位独立的工党议员，在西汉姆南占得议席；在1895年失去席位后，他又于1900年被选为梅瑟蒂德菲尔选区的议员。“独立”宣告了哈迪对妥协工会代表后果的拒绝。1900年，劳工参政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成立，6年后，更名为工党。1906年的议会中，工党议员只占了29个席位。在同一年，在帝国的另一端——孟买和加尔各答，印度民族主义者同时否决了自由党对自治的承诺以及保守党对仁慈的公司管理制度的承诺。

一开始，工党在三个团体之中展开了一场灵魂争论（事实上是组织上的），都自称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真实代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一些理由认为自己创建了政党的工会成员；以及费边社的非革命的知识分子。对于H.M.海德曼（H.M.Hyndman）社会民主联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英国分部成了仅次于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的强大力量。社会民主联盟实际上在英国非英语的工业区势力最强大，特别是在大格拉斯哥，以及欧洲移民和政治难民的聚集区，如伦敦的东区。工会成员的确可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自助旧传统的一分子，那可以回溯到宪章运动者，甚至是内战中的激进分子身上。（苏格兰的罢工分子，不止一次，将1637年的“国民誓约”改写为工人阶级团结的呼声。）而费边社也一样，声称自己来源于米尔顿、约翰·利本（John Lilburne）、托马斯·潘恩、科贝特和卡莱尔的血统，所有这些人物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掌握了对抗性的修辞方式。自从1883年创建之初，费边社首先就将自己当成一种呼声而存在。

其原有的魅力创始人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一位苏格兰牧羊人的私生子——是一名巡回演讲者、神秘主义和社会主义者。1881年，他通过自己关于工业社会困境的一通长篇大论，完全征服了激进的伦

敦。两年后，空想家与社会主义者分裂（自然的事情），后者组成了昆塔斯·费边·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俱乐部，晦涩难懂的名字，这位罗马将军“耐心等待”着，在风暴来临之前选择他攻破汉尼拔的时机。费边主义者致力于回避半生不熟的思想革命，支持长期的运动，对政治精英和工人阶级进行再教育。对前者，给予一个有关自己的社会责任的全新认识，后者则是一个关于他们合法社会权益的新意识。在这之间，他们还诉求一个现代化的、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工业社会——没有暴力，没有对自由的牺牲。在现代，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意识形态。

但是，很少有过更耀眼的宣传员。早在1884年，爱尔兰年轻的新闻记者乔治·萧伯纳已经开始定期撰写大量的费边体散文，谴责有权地主和有权阶级的掉以轻心。萧伯纳也是一位不知疲惫的公众演说家，仅在1887年就发表了67场演讲，隔着他火红色的胡子滔滔不绝，几乎总是在男子俱乐部、公园、市政厅、酒吧和街角上当场发挥，而内容总是类似。除非政客和财阀意识到农奴制正经由他们邪恶的制度延续，农奴总有一天会来反抗他们，然后只剩下两个选择：一个集权国家，或反对有产阶级的血腥起义。之后萧伯纳终于厌倦了演说，并将其描述为“恶习”，他为威廉·斯戴德的《蓓尔梅尔街公报》撰写的文章，没有留下任何神圣的维多利亚母牛作为活口，其中就包括那只最大最神圣的母牛。关于理想化的女王统治禧年历史，萧伯纳写道：

我们知道，她一直是最好的妻子、最优秀的母亲、最忠实的寡妇。我们经常看到她，尽管她高高在上，被饥荒、煤矿爆炸、沉船事故、铁路事故所感动……我们都记得她是如何废除谷物法，发明了蒸汽机车……设计出一便士邮政制……总之，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昔日的任何君王都没这样梦想过的。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本名为《维多利亚女王：一个不喜欢她的人的个人印象》（*Queen Victoria:by a Personal Acquaintance who dislikes her*）的书。

当萧伯纳与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会面时，费边社的文章正传得火热。比阿特丽斯出生于一个商人和自由党政治家家庭。她的父亲理查德·波特（Richard Potter）曾担任大西部铁路公司董事，并从巴里码头的发展中获利，这是南威尔士煤炭出口的主要出口地。而她的祖父，也叫理查德·波特，是边沁主义的改革者、“改革法案”活动家以及威根的第一位议员。比阿特丽斯继承了激进的家庭传统，以查尔斯·布斯的研究员身份寻找工作，伪装成——有些不太可能——一位东区犹太女孩的形象，这样她就能在血汗工厂里进行报道。从对约瑟夫·张伯伦激烈但又注定的反弹中，她遇到了他的直接对立面，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物——矮小而圆润的前贸易商和公务员西德尼·韦伯，他的头脑与他的身体相当不成比例。他拿社会正义激动人心的话语追求她，但是当他做了一件错事，将

一张显示有比阿特丽斯恐惧畏缩形象的全长照片赠送给她时，这提醒了西德尼他们之前的婚约可能只是自己一厢情愿。

韦伯夫妇的策略（萧伯纳和威尔斯偶尔会被嘲笑）就是“渗透”，而他们想要渗透的人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爱德华时代的伟人和好人。费边文章售出量由最早的几十增长到后来的数十万，旨在是说服中产阶级——从文员和图书馆员到律师和医生——关注现代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国家纠正它们的责任。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也举办了密集的晚宴活动，渗透费边教义伟大而美好的政治生活。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聚集了：萧伯纳或威尔斯（虽然两人经常争吵），同时还有同情的自由党人，如理查德·哈尔丹（Richard Haldane）、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甚至那些托利党人，尽管显出怀疑和高傲，但似乎至少是准备听讲，包括首相“王子”阿瑟·贝尔福。

最重要的是，他们将布斯和朗特里的令人生畏的书卷转变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反思争论，事实上，颠覆了比阿特丽斯从同等地位的富裕阶层者口中所听到的对于穷人的看法。确凿的证据显示，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所坚持的那样，城镇极端贫困的问题很少与道德品质的问题相关。身强力壮之人也可能成为无可救药的荒淫者、酗酒者或犯罪者（虽然韦伯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慈善事业最令人生厌的一个方面——耗散而拒绝为老年酗酒者提供慈善帮助）。但是，贫困的群体由受到商业周期变动伤害的人们组成：季节性就业极度波动；越来越多的残酷现实（例如在码头），利用流动的移民劳工来降低工资。生活必需品或低于生活水平的工资，使这些人必须长期过长时间地工作；睡在过度拥挤的宿舍单元；将这些地方变成感染的繁殖地；或者如果失去了这些工作机会，他们就会走上街头谋生，轻度犯罪或卖淫，甚至两者兼具。韦伯斯和其他费边社员［如悉尼·奥利维尔（Sydney Olivier）和格拉汉姆·瓦拉斯（Graham Wallas）］认为这种苦难不会消失。事实上，由于裁缝业或制靴业或袜业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在不受管制的条件下对不安全计件的依赖可能会增加。提供给委员会的关于国民体质下降的资料也表明：低薪（而不是任何其他缺陷）成为导致穷人肮脏和疾病的生活以及生育出（不适宜保卫帝国的）“发育不良”孩童的主要因素。现在是政府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在这种贫困的情况下承担维护体面劳动阶级的责任；帮助他们度过多年里无法越过的难关；考虑引入失业保险、劳动力交换和养老金。费边主义者认为，这（激怒了威尔斯，他认为整个方法是一个拐弯抹角不愿直面的社会主义版本）不是革命的高速路。相反，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将是最好办法。

其中一位韦伯夫妇的听众（相比比阿特丽斯对他自负自私的反动派形象的判断，他是更仔细地听了）就是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的确，丘吉尔并没有畏首畏尾。他似乎已经认真考虑他自己的观察，生命就像一次骑兵的冲锋——“只要你平安无事，牢牢地坐在你的马鞍上，缰绳在你的手上，

装备精良，多数敌人会对你敬而远之。”当有疑问时，温斯顿自然装上火药。阿奎斯蒂的女儿维奥莱·巴恩·卡特（Violet Bonham Carter）记得“从微微拱起的肩膀上，他的头突然向前一伸，像一把上了膛的枪，准备开火”。但是在1903年前后，敌人更可能是来自下议院的自己人，而不是反对派议席上的自由党人。他毫不讳言自己对张伯伦帝国保护政策的反对，一条在他所在的奥尔丹选区行不通的路线，陷入困境的纺织品制造商们都站在他的一边。因为怀疑对军费和海军的夸大估计，他在议会中攻击了自己的前排要员。但更重要的是，他从另一边的H.G.威尔斯那里感受到了一种智性的精神、思想的能量，而不是在费边社会主义者那边。后来，威尔斯在丘吉尔的“其他俱乐部”晚宴中，两人结交为朋友，并将成为常客，尽管威尔斯以无畏的态度蔑视了温斯顿对麦考利史诗历史的过度依附。正是历史——威尔斯坚称——拖累了英国。不应该被过去的历史所束缚，更迫切需要是思考未来，特别是英国如何能成为技术–科学的社会，仅此一项就可以掌握未来。在丘吉尔慢条斯理地撰写为自己父亲申辩的历史的时候，威尔斯写出了《对于人类生活与思想上的机械和科学进步的反应的期望》（*Anticipation of the Reaction of Mechanical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upon Human Life and Thought*，1902）。

但是威尔斯脑海中的无阶级英国永不朽的乌托邦——其记忆抹去了所有拥挤荒谬的过去——永远不会改变温斯顿·丘吉尔对党的忠诚。1904年5月，他终于加入了自由党，遵循了它的悠久传统：1832年由辉格党体现出的先发制人的革命性改革；迪斯雷利所支持的1867年的改革法案；正如他想象的那样，以及他的父亲重新定义的“托利民主”。为了确保自己的孝心举动无一遗漏，他坐上了反对方长凳上自己父亲伦道夫的老位置。正如他在曼彻斯特第一次作为自由党人参与竞选期间告诉观众的一样，他现在正致力于“流行事业”。

自由党中没有人有任何理由怀疑丘吉尔有过动摇或可疑的忠心，即使他对保守党的仇恨使他过度频繁地发表了抗议。他在1904年5月告诉曼彻斯特的民众，他们（托利党人）是“大型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强大的联盟聚集在一起，在国内腐败，他们的侵略覆盖在海外……为百万大众提供可怜的食物，为百万富翁提供廉价劳力”。在1906年的选举之后，保守党从权力中缩水，他们在下议院的人数减少到137人，丘吉尔享用了他们的毁灭，并给新政府更激进的议员，如大卫·劳合·乔治带来了鲜明的印象，如果贝尔福威胁要在上议院利用巨大的托利党人数来阻碍立法，那么布伦海姆的孩子就会站在反攻的前列。作为一个新来的男孩，他有幸获得一个政府职务，即使只是在前印度总督埃尔金勋爵手下负责的殖民地副秘书。这个职位使丘吉尔能够将激进的姿态与帝国的侵略结合起来，两者间看不到任何矛盾。这也让他与埃尔金一起加入了一次非洲之旅，在那里他拜访了恩图曼的战场，装回了一头犀牛，为他的收藏网回了蝴蝶，并像河马一样长时

间地沐浴，为《河滨杂志》（*Strand Magazine*）撰写了备忘录和文章。“游猎真好”（“Sofari sogoody”）是他的著名判决。对他作为政府大臣的启动同样也可以这么说。

但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前奏，真正的事业尽在眼前。当首相亨利·坎贝尔–班恩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于1908年春天去世，他的位置被阿斯奎斯接替（丘吉尔一直与他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虽然，像其他人一样，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丘吉尔真正的观点。劳合·乔治接替了阿斯奎斯的职位，当上了财政大臣，丘吉尔晋升到了劳合·乔治先前在贸易委员会的位置。他进入内阁时的年纪是33岁，比他的父亲加入索尔兹伯里政府的时候更年轻。阿斯奎斯的内阁人才济济，但也是自由主义的历史的全面肖像画廊，新老交杂，其中包括格莱斯顿的传记作家，枯瘦、高傲的约翰·莫利（John Morley），一直坚持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修养教规；以及约翰·伯恩斯，除了他的1889年罢工领导人形象，他是“尊重”劳动的化身。但据丘吉尔观察，包括阿斯奎斯本人在内的，整个内阁都被大卫·劳合·乔治的光芒所遮蔽。丘吉尔不太可能遇到任何像这位威尔士的兰尼斯都村（Llanystumdwy）前律师一样的人物——这个背景被认为是不可能产生剃刀般尖锐的智慧、政治上的凶狠和雄辩的演讲，充满危险、狡猾的笑话，而这些都是这位“巫师”可以开启的，似乎就在一瞬之间。这两个男人的背景不同，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彼此志趣相投：两者都燃烧着个人的野心，都奔波采取行动对付敌人。在议会战术和公开演讲中，劳合·乔治更是老师，而丘吉尔只是学生。温斯顿有一种嘟囔和咆哮的倾向；劳合·乔治则使人自我毁灭。丘吉尔在下议院会抬高语调；劳合·乔治确保软化它，显示其合理性。但作为一个政治双簧他们是无与伦比的：一把锤子和一把匕首。

1908年，两人对帝国防御需求的主张都是一致的。劳合·乔治（与坎贝尔–班恩曼一起）曾是布尔战争的反对者，而丘吉尔一直是支持者。但现在两人都认识到，这场战争使历届政府负担了沉重的债务问题；皇家海军保持与其主要对手德意志帝国的竞争优势的昂贵支出使问题复杂化。但这个时候，捍卫帝国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费边社员争辩说，帝国的长治久安取决于英国社会的健康，这与无敌战舰有同样的重要性。毕竟德国几乎不算社会主义国家，但政府却接受了劳动交换和失业保险的需求。对于具有现代头脑的大臣以及贸易委员会主席来说，德国似乎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的典范，而英国是习惯和偏见的混合体。他们关心的是引入类似的改革以及养老金措施，与社会公正一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防御。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钱从哪来，可以同时供给养老金和战舰资金。保守党的答案一直是间接征税，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大宗商品。但除了这些税收本质上的退化性质外，要知道1907—1908年是经济衰退时期，特别是在最困难的行业，如采煤业。这当然不是通过对最负担不起的人征税来解决支付

养老金问题的时候。

在这些提案中，出现了英国政治史上最具史诗意义的对峙之一：将1628—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与1832年的改革法案结合在一起辩论。而且可以说，1908—1911年的危机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危如累卵：国家的合法经营假设的双重革命已经转型，而且上议院的权力正在被剥夺。

提出支付养老金预算方案在1909年被劳合·乔治放弃，并提高剩余的1600万英镑额外的年度收入，以便将紧迫的社会改革放在首位，遗产税急剧上升。他提倡在5000英镑的收入基础上引进6便士的英镑附加税。对旧贵族而言最具爆炸性的消息是，对土地价值中不劳而获的上升价值征收20%的税，无论是出售、遗产或转让的地产都需支付。在不发达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引进半便士的英镑附加税，酒精的增税也相当陡峭。旧统治阶级留下来的惨案是如此明显，甚至让内阁中最热心的议员都略显得喘不过气；看着手中的文件，约翰·伯恩斯恩斯说，“就像19个拾荒者挑拣一堆垃圾”，还能做什么，对英国土地进行全面调查。

调查由贝尔福编组，上议院一直蓄意阻挠，但并不是为了钱。而这一次是不同的。他们被劳合·乔治的鱼竿拽起，如同鱼钩上的鳟鱼。另一端上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后者现在是预算联盟的主席（为反对预算抗议联盟而建立），做着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蹂躏闷人。1909年5月，丘吉尔看到了他的《劳动交易法案》在下议院通过，现在他觉得自己终于有资格表现出人民冠军的样子。更重要的是，还有谁能比布伦海姆的宝贝更好地判断历史，而不是去赋予贵族权力？在7月的诺威克，他宣布上议院是“一个对时代精神和整个社会运作都绝对陌生的机构”，听起来一半像是埃德蒙·伯克，一半像潘恩。一个如此依赖传统的国家去维持“有头衔的人士的封建集体”，这是绝对自然的，但是这样的形式还能维持多久。上议院满足于装饰性的地位身份，他们本可迎来一个温柔的黄昏：“年复一年，这（议会）将会消失在它所属的地方，直到就像五朔节的跳舞者和木偶剧中的潘趣与朱迪，以一个独特且恰当的记忆形式留存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坚持要抵制人民的意愿。他们发起了一场阶级战争。结果却是在自己的头上。12月，在伯恩利（Burnley）的维多利亚歌剧院，丘吉尔从中得到了不少乐趣。寇松在附近的奥尔丹声称：血统和传统的“优越”使我们继承了“统治子女”的权利。这位贵族说了什么？“所有伟大的文明一直是贵族的杰作。”在奥尔丹的其他人喜欢听这样的话（回报以笑声）……为什么，如果他说对贵族的维护一直是所有文明艰苦努力的事业可能更为真实（欢呼声和叫喊声四起，“再说一遍”）。

然而，这场人民财政预算案的路演中，温斯顿仅仅是热身暖场的人物，劳合·乔治才是真正的明星。伟大的催眠师、时而邪恶的喜剧演员、半幻术杂耍家及（结束时杀死观众）悲剧歌剧大师，在他威尔士的老家广为称颂。

在1908年10月的斯旺西，他对失业保险的需求做出了妥善的处理：

什么是贫穷？你感觉到贫穷了吗？如果没有，应该感谢上帝让你幸免于它的痛苦和诱惑……我所说的贫穷是真正意义上的贫穷，不是削减你的企业，也不是限制你的奢侈品。我指的是，那个不知道自己在屋檐下还能坚持多久的穷人，思考着转身去哪儿寻找下一顿饭，饥饿的小孩望着他寻求寄托和保护。这就是失业的滋味。

他在伦敦的码头地区的莱姆豪斯（Limehouse）所发表的演讲更为激烈。他半开玩笑地比较了一位公爵和一艘无敌战舰的成本，然后将他的观众带到丘吉尔所不能的地方：矿下。

我们陷入半英里深的矿坑之中。然后走向山底……地球似乎使劲地——在我们周围和上方——试图将我们压得粉碎。你可以看到坑道的弯曲、扭动、变道，他们的纤维为了挣破压力而开裂。有时，他们让路；有时，就是残害和死亡。通常，一个火花的点燃，整个矿坑就会被熊熊大火淹没，烈焰使数百个乳房哺育的生命被烧成焦炭。而当首相和我去敲这些大矿主的大门，对他们说："在那儿，你要知道，这些可怜的家伙一直在冒着生命危险挖掘你们的宝藏。他们中的一些是老人……破产之人，永远不可能再去赚钱了。你不能施舍点东西让他们走出救济院吗？"矿主反驳道："你这个盗贼！然后放狗驱赶我们……如果这就是这些伟大矿主所指涉的观点，那我可以说，清算他们的日子就在眼前。"

丘吉尔的老朋友休·塞西尔勋爵（Lord Hugh Cecil）将莱姆豪斯的劳合·乔治比作一个小男孩，故意掉到一个水坑里弄脏自己的裤子。但是，这对演讲本身和演说家来说都是不公正的。虽是出于操纵，它仍然是整个英国政治史上最伟大的演讲之一：一部完整的独幕剧。这正是丘吉尔和阿斯奎斯希望看到的结果——它推动了贵族的抵抗直至最后的挣扎。他们以300票对75票的投票赞成预算下调。政府辞职，并于1910年1月开始新一次选举，尽管——或因为——煽动行为，严重得适得其反，摧毁他们中的绝对多数。自由党现在依赖于爱尔兰自治论者，而工党成员在帮助他们通过立法程序。这一天的第一道命令是使贵族们为他们的鲁莽付出代价。阿斯奎斯提出了议会法案，威胁要彻底废除现有上议院，并通过选举的方式替换他们，但是等待这个审判日，还要先解决一系列小问题：上议院的钱法案否决权被废除，连续三次通过下议院的法案可能不再受上议院阻碍。上议院可以吞下这颗药，或者为立即增加的大量同等地位的群体而感到兴奋，也许600人——已经足够了。无论如何，这将淹没他们的反对派。爱德华七世一直对以这种方式创造具有皇室特权的新贵族而感到不安，但他在1910年痛苦地离世，他的继任者乔治五世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有同意。不过战斗还在继续。阿斯奎斯被托利党后排议员不停地攻击，贝尔福却在长椅上懒洋洋地伸直四肢，盯着自己的指甲。在上议院辩论中，较为温和

的“骑墙派”（Hedgers），如兰斯多恩侯爵（Marquis of Lansdowne）发言对阵“斗争到底者”（Ditchers）——如威洛比·德·布罗克（Willoughby de Broke）勋爵和哈斯沃兹（Halsworth）勋爵，他们决定身着盔甲抗争至死。最终骑墙派以少数票胜出，议会法案通过，成为法律，英国贵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代一去不返。

这是温斯顿·丘吉尔真正喜欢的那种战斗之一，他认为这符合英国历史上最优良的传统：一场原则之战，进步的胜利力量，并且是一场没有流血的胜利。丘吉尔作为1910年大选后的政府的内政部长，在他手上握有两种非常不同的战斗武器，它们都有可能变得丑陋，但是，就他看来也是革命性的。毕竟，他没有成为推动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更别说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相反地，先发制人，及时推进人性化合理的改革。他认为，政府一直保持对工会的信心，并在1906年，通过议会指导《贸易纠纷法案》（Trade Disputes Act），扭转了塔夫谷决定，将罢工财务负债从工会解除。那么工会（特别是南威尔士和兰开郡等最激进的地区）有没有安抚自己的民众来回报政府呢？没有。1910年夏，在朗达（Rhondda，英国国会选区），一位政府友好人士D.A.托马斯（D.A.Thomas）领导矿主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行动。原因一直以来并在将来都是相同的，就像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阿瑟·斯加吉尔（Arthur Scargill）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之间的最后摊牌一样。业主，面临着正在消失的出口需求，要求紧缩；工人诉求的是最低工资和“非正常工作”的特殊奖励。事实正是：劳合·乔治坚持利用了这种状况，推动人民财政预算案，引导工会认为业主们会承受压力，或者，在未履行义务的情况下，立法将会通过。当这些都没有发生，激进的武装分子以及他们的出版物《庶民》（*Pleb*）开始为逐渐走向温和的工会制造阻碍。格拉摩根郡警察局长意识到势态已经严重到必须派遣警队去保卫矿坑；当势态要往暴动发展时，他向丘吉尔提出部队支援的请求。丘吉尔谨慎的回应是将伦敦警察发往托尼帕蒂（Tonypandy）支援。这足以引发进一步的挑衅，但不足以抑制或镇压它。11月8日，一场激烈的骚乱爆发，导致了一名矿工死亡、60间商店被洗劫一空。

在骚乱之后，由于丘吉尔下令出兵托尼帕蒂，从而也确保了他开始在劳动运动的恶魔黑名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虽然他有喜欢在紧急情况下乱开枪的名声，也尽管耐心从来不是他的强项，1910年秋天至1911年，这些煤田的事态发展其实是相当具有煽动性的。一个由诺厄·布莱特（Noah Ablett）领导的强大无政府主义和革命的核心团体，毫不掩饰其对传统工会策略的蔑视，更是在上议会游说，同时也公开地利用了工人对薪酬和条件的不满情绪，进一步促成了激进革命。1911年夏，加的夫和特雷德加（Tredegar）爆发了更多由铁路工人引发的骚乱，两场暴乱都出现了丑陋的种族主义转向。在加的夫，罢工的船员袭击了华人社区的店主；在特雷

德加，爆发了针对小犹太社区的屠杀。正是在拉内利（Llanelli）而不是托尼帕蒂，警队向罢工者（铁路员工）开枪，造成两人死亡，并引发另一场暴动，摧毁了96辆卡车，最终导致了爆炸事件和另外4人的死亡。

处理这样的局面对一位内政部长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特别是妇女参政运动跟进之际［由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她的女儿克丽丝塔贝尔（Christabel）领导］，这对于武装部队来说并没有使情况变得更容易。与对待矿工一样，丘吉尔原则上一直是温和地同情妇女权益的，尤其是他的妻子克莱门蒂娜也是一位热心的妇女权益支持者。由于阿斯奎斯的摇摆与拖延促生了一个《和解法案》（*Conciliation Bill*），旨在给予女性选举权，但这项立法随后遭到了程序上的延误，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WSPU）］的耐心被耗尽。曾在下议院大肆游说的内政部长现在遭到了纠缠和骚扰。1910年7月，在被女权运动者特丽萨·加勒特（Theresa Garnett）攻击一年后，丘吉尔本人在议会宣布，他将不再支持赋予妇女权利。

面对议会广场面前的群众游行，丘吉尔指示警方不准逮捕示威者，但另外，也不允许他们进入议会。意图虽谨慎，处理群众问题的方针实际上确保了灾难的发生。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她们的男性支持者们，组织良好地拼尽全力对付警察。当然，头盔被打掉；粗鲁的骂声一片；人们聚集窃笑。这不是警察该做的。在1910年11月18日的“血腥星期五”，推搡的事态演变成六小时的奋战，警方开始处理并殴打尽可能多的妇女参政权论者（同时也吃到了抓伤和脚踢的苦头，这次是轮到自己）。虽然下令零逮捕，最终还是有280人被逮捕。

这样的情况只会推波助澜。霍洛威监狱内，在潘克赫斯特夫人和埃米琳·佩西克–劳伦斯夫人（Mrs Emmeline Pethick-Lawrence）的领导下，被捕的囚犯开始绝食抗争。作为回应，她们被残酷地强行喂食，那些金属夹、橡胶管和恶心流体通常会令她们再次呕吐。冰水通过水管冲刷到她们的牢房6英寸之深处。监牢之外，妇女社会政治联盟运动显然针对性地瞄准了那些有关男性对女性行为的刻板印象的事物。女人们喜爱购物不是吗？商店的大玻璃被砸碎［如玛莎&斯奈格夫（Marshall&Snelgrove）、斯威&威尔斯（Swears&Wells）、利宝百货公司（Liberty）］，伦敦更加华丽的街区（政府机关所在的白厅、俱乐部区所在蓓尔梅尔街）成了碎玻璃地毯。英国生活方式的其他避难所也未幸免于难。“妇女选举权”的口号被鼓吹者们用酸性物质燃烧在高尔夫球场的绿地上，其中就包括巴尔莫勒尔的球场。

女权运动中最激进的一位就是艾米丽·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不断提出新的战术，将女性的游击战争带入了上层阶级的核心地带。首先，她被发现在议会广场上，手拿石蜡浸泡的亚麻布，意图点燃邮箱。在短暂的牢狱之灾之后，她组织袭击了劳合·乔治在萨里的沃尔顿

山（Walton-on-the-Hill）上买下的新房子，成功地摧毁了一半，尽管没有被当场逮捕。最后也是其中最著名的（殉道）事件，艾米丽终于实现她的愿望，在1913年的德比皇家赛马会中，在马匹奔出的那一刹那，她冲向了赛道，惨死于马蹄之下，魂断赛马场。巧合的是，在她冲进赛道的那一刻，正是国王的马正处于领先的位置。

1913年，英国复兴的自由纲领连同其自身权力基础似乎正在分崩离析，以至于这段时期的经典叙述，如乔治·丹杰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的《自由英国的奇异之亡》（*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1936），将这视为一场自我毁灭运动中的一段耐力训练。尤其是，丹杰菲尔德意识到自由党企图将自己与约翰·雷德蒙德（John Redmond）的爱尔兰地方自治集团捆绑在一起，这也成了他未来悲哀的缘由。但如果这是为了保卫权力的战术必要，那么，对自由党人来说，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丘吉尔记得他父亲在阿尔斯特抵抗运动这件事上的强硬态度，不知何故，希望自己也以同样热忱来平息抵抗，看到一个帝国内部的爱尔兰议会。如果这个目标最终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伟大的改革行政部门的收益并不是昙花一现。就像他的政治生涯早期许多政策一样，它们已经被诊断为概念上轻率、承诺上虚假、结果上短视。但所有这些判断都是从社会主义英国这个角度出发而提出的，而这本身已经开始与致力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老”工党一起消失。吊诡的是，正是乔治·丹杰菲尔德（在纽约《名利场》中的许多出色的作品）认为的正在做垂死挣扎的自由主义（具有社会良知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超越了福利国家的正统，更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个世纪以来，新工党看起来就像是新自由主义的子孙。

如果劳合·乔治到德国考察过失业问题，丘吉尔作为德国皇帝的客人，直接目睹过一场军事演习，那么，他应该理解威慑作用，足以知道德国方面显示武力是为了防止战争而不是加速它，特别是为了阻止紧密的英法联盟以及它们与俄罗斯在1907年签署的三国协约。但是，这一策略并没有拆散它们，反而使得联盟变得更为紧密，尤其是1911年夏天当德国政府决定展示势力之后。一艘炮舰——“豹”号被派往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港口城市阿加迪尔（Agadir），意图提醒法国，如果要强加一个保护国，那么就不能忽视德国的海军力量。阿加迪尔事件也有助于促进英国政府维持对德国良性海军优势的决心。在这样一个典型的紧急关头（红布时刻，斗牛用的红布）丘吉尔曾拿“豪华的”来描述德国舰队，也就是说德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而英国只有海军作为帝国国防的重要手段。这并没有减缓竞争性军备的速度。

所以，当丘吉尔在1911年秋天成为海军大臣时候，他带着刑具刮板指向皇家海军的组织。从理论上讲，这可以被看作是从内政部降职的行为，但是

这并不是阿斯奎斯或者丘吉尔本人对这份工作的看法。首相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方式来利用丘吉尔活塞驱动机器般的能量，尽管有时在内务上表现得过于火热，但还是可以被建设性地使用的。而对于丘吉尔，尽管他偏执地认为皇家海军不过是“朗姆酒、鸡奸与鞭笞”，这是他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实现。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快就席卷了海军。前任海军大臣——约翰·杰基·费希尔爵士（Sir John Jacky Fisher），虽然已经年逾七十，他还是被召回海军提供咨询（内阁有些出乎意料），丘吉尔着手实施一些费希尔最关键的调整计划。重炮将被安装在快船上，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些舰队现在将通过石油而不是煤炭来驱动，更高效但也增加了更多的成本。回想起这一个决策，一项对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所做出的承诺——看起来显然是无辜的，或者至少是纯粹合乎逻辑的（所以在大多数的丘吉尔传记里轻易被掩盖）——这是一次对大英帝国的命运有着更深刻的影响的决策，更不用说世界的历史了，几乎比其他任何丘吉尔决策都重要，直到1940年的5月。这让大英帝国以中东作为存在条件，成了印度和埃及之间的中间环节。反过来，这将使在1921年还是殖民地大臣的丘吉尔成为英国在巴勒斯坦事物的坚定支持者，并在伊拉克（前美索不达米亚）和约旦担当保护者的作用。这将招致苏伊士，而苏伊士招致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于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丘吉尔在1914年确保了英国政府获得其中51%的控股权），将导致伊朗成为英美石油的共同利益争端，将导致中情局（CIA）推翻摩萨德民主（Mossadeq democracy）和恢复帕拉维尼王朝（Pahlavi dynasty），也将导致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出现。而这段时间，正是英国的煤矿转向末端冗余的时期。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战舰已经万事俱备，严阵以待。然而，内阁却为何时，以及是否需要舰队而产生分歧。

丘吉尔为其壮观的海军估计吃了不少记闷棍，特别是从劳合·乔治那里。劳合·乔治想知道，他还真的还是一个自由党人吗？但尽管占少数，丘吉尔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一样确信，如果一场战争将在巴尔干地区爆发的话，德国将与奥地利、匈牙利结盟，而且更可能以向西攻打法国作为回应，比利时具有均等的可能性。他还认为，阻止这种情况的最好方式，在于一个真实的与法国肩并肩结盟的承诺，而不是纸面上的，并且坚决将对比利时的袭击视为英国的直接威胁。当然，他回想起小威廉·皮特在1793年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尽管恐怕会被指责为闲散和不合时宜的历史主义者，他也从内心坚信，除了任何意识形态的反共和主义，关于革命法国无法控制的扩张主义，皮特和他的同事亨利·邓达斯显然是正确的。所以，事实上，在不了解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同时在战场上开辟东西两条战线），或者更为激进的德国政策（于1916年提出正式）的情况下，他已经感觉到德意志帝国会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将西欧的部分地区变成更大的德意志帝国的附庸国（例如荷兰）。

1914年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似乎更有可能爆发在爱尔兰，而不是在波斯尼亚（Bosnia）。阿尔斯特工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分别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阵营，丘吉尔于1912年前往贝尔法斯特进行温和呼吁，希望（反对希望，并反对概率）地方自治条例的第三次尝试会取得成功。但在阿尔斯特，面临直接的新教徒反抗的威胁，最终它还是破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就会完结地方自治的最后可能性。

正是在这些时刻，历史站到了温斯顿·丘吉尔一边。在1914年8月上旬，它给这位大臣发出了复杂的信号。在敌对爆发的边缘，他去往波特兰海角看舰队出航。当伟大的灯塔从薄雾中涌现，丘吉尔浪漫的想象力也一路航行，“暴风雨中，船只组成了一条遥远的航线……站在拿破仑和他统治的世界之间”。但丘吉尔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学者，并已经目睹过足够多的杀戮，幸福感里掺杂不祥的预感。毕竟，他已不再是一位骑士长矛小兵了。他有妻子和小孩，还有一个高级办公室。1914年7月28日，他写信给妻子克莱门蒂娜：

我亲爱的唯一、美丽的夫人：

一切都正在走向灾难和崩溃。我感到兴奋，这使我斗志昂扬且高兴。这样想难道不可怕吗？准备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诱惑。我祈求上帝原谅我如此可怕的轻率情绪。然而，我会尽我所能为和平努力，同时，没有什么会促使我不正当地发动进攻。我不觉得我们这个岛屿在任何程度上需要对这场席卷基督教思想的疯狂浪潮负责。没有人可以衡量后果。我想知道是否这些愚蠢的国王和皇帝会聚集在一起，将这个国家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复兴王权。但我们所有人都飘忽在一种沉闷恍惚的催眠状态里。好像这是他人的事物！

圣詹姆士公园湖上的两只黑天鹅产下了一只可爱的小天鹅——灰色、蓬松、珍贵、独特……帮我亲吻那些小猫们（他们的孩子），永远爱你。

不断实质化的战争折磨着丘吉尔的耐心，以及他完全体面地制止被拖延的愿望。和许多其他待命的人一样，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军队官兵，他以一种奇怪的幸福感来迎接战斗的到来，但同时对他的反应感到羞愧（“这不可怕”）。随着战争陷入可怕的僵局，丘吉尔开始变得绝望，除了“杀人铁丝网”的战略之外。正是这种行动的冲动促使他在1914年10月，与外交大臣格雷以及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协商后，去往安特卫普。他在那里指挥防御，甚至提出，如果政府认为他的才能会更好地用于军事而不是政治指挥，那（令人惊讶）他将提出辞职。

法兰德斯（Flanders）让他了解到西方阵线的关键重要性，这也是部队将军和基奇纳一直在内阁辩论的议题。但是丘吉尔关于突破的悲观主义思想

（后被证实完全合理），激励着他推进一个完全不同的策略。为什么不进攻德国联盟最弱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呢？

丘吉尔的计划，由费希尔借调，是“攻占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隔在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一条狭窄的海峡，并且攻占君士坦丁堡。这将有双重优势，保护埃及（更不用说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油田）免遭德国的攻击，并说服巴尔干国家（如一直保持中立的罗马尼亚）更加坚定地加入盟国的一边。

情况没有按计划进行。最优策略是联合海陆行动，在陆面登陆一支大型远征部队之前，军舰应先削弱土耳其的堡垒。但是，基奇纳对于部队的承诺不屑一顾，所以1915年2月19日，丘吉尔进行了一次独立的海军突袭。没有一个目标得到实现。扫雷舰未能充分扫荡；战舰炮未能攻下土耳其炮兵要塞；三艘军舰，包括法国战舰，被击沉。当基奇纳终于给了他的授权，试图联合一支由70000人组成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英国部队（其中包括温斯顿的弟弟杰克），在一个名叫加里波利的岩石半岛上展开战斗，但最终数千人被土耳其保卫阵地的炮兵部队摧毁。一个滩头和山顶被占领，沙滩和浅滩上躺着的尸体成了一景。

1915年年初，加里波利的屠杀几近摧毁了丘吉尔的职业生涯。它无助于杰基·费希尔的辞职，并否认战斗一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突袭负有责任。必须有人承担责任。没有强大的政党基础，那个人不可避免地成了丘吉尔。1915年5月阿斯奎斯已与保守党一起形成一个联合政府，他们的清单上的其中一项就是驱逐那些在1904年背叛过他们的人。是谁曾经通过人民财政预案如此欢喜地蹂躏过他们。丘吉尔被正式贬为兰开斯特郡大臣，在战时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工作。对一个不顾一切渴望付出一些积极的战时服务的人来说，这是足够坏的了。但是同年8月的另一次在土耳其的陆军登陆企图失败了之后，运动被放弃，内线军事行动委员会也被清盘。

失去权力，且无计可施，丘吉尔陷入了一段被他称为“黑狗”的抑郁时期。有段时间，出于一些原因，克莱门蒂娜开始为他的神智担心。徘徊在他哥哥的花园里，断断续续处于痛苦之中，他撞见了自己嫂子“谷妮”画的水彩画。她把画笔放到他手里。这拯救了他的心灵，把他从自我消逝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更重要的是，给予了他一场必赢的战役：“病态的压抑感离我远去。我抓住了最大的一支画笔，狂暴愤怒地落在我的敌人身上。”但绘画似乎还是无法使他从负罪感中摆脱出来，也没有摆脱消耗他的无奈感，他已经被剥夺了利用过人的精力来见证快速取胜结局的机会。

只剩下一条挽回方式——主动服务（现役），温斯顿把握住了机会。那时他已40岁出头，但继续坚持认为自己是一名士兵。当然不是老兵，但他更希望自己可以作为一名准将，领导一个团。这目标有点高，特别是对于一

名前内阁大臣来说。所以丘吉尔咆哮，（最终）不得不和上校做一样的事情，指挥一个皇家苏格兰燧发枪营。这项服役的时间不是很长——总共6个月——其中还不算上回家日以及员工在总部的时间。1916年1月，他到达普洛斯塔（Ploegsteert）火枪团分配的位置，收到的命令是守住它，而不是开始对德国战线发动正面进攻。真正的服役都是一样的。温斯顿开始体验壕沟，这在1915—1916年冬天到达了一个适当的剂量。他跺着脚踩过遮泥板小路、半冻的污泥；当炸弹呼啸过来时与其余的人一起下蹲；悲哀地看着半埋的尸体；甚至错误地在“无人区”逗留，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往日在壕沟中的位置受到了一次直接的袭击。在所有这些不适和恐怖之中，丘吉尔保持了他一贯的兴奋情绪和轻微不协调的激情，以及频繁表现出无视个人安全的态度。当然，这也助使他像对待福特纳姆和玛森百货（Fortnum&Mason）一样摆布克莱门蒂娜。1915年11月，在布德维尔（Bout-de-Ville），他写信给他的妻子：

亲爱的：

我们已经完成了在战壕里的头一个48小时……早晨被我花在厕所里和一个热水浴……设计得有一些糟糕……沟渠线……沿着从德国人夺取的其他旧战线的废墟而建。污物和垃圾随处可见，坟墓被散乱地建于防御之内，脚和衣服上到处都是土、水、淤泥；呼啸的子弹越过头顶。在这一幕幕不断的伴奏中……在炫目的月光下，巨大的蝙蝠部队滑过……你能每周定期给我寄一小盒食物作为补充口粮吗？沙丁鱼、巧克力、罐装肉……尽快开始……你知道做一个重要人物是什么感觉吗？在这个伟大的军队里每100人中有99人必须对我触帽行礼。有了这个鼓舞人心，让我签自己的名字……替我亲吻伦道夫、戴安娜和那金色的萨拉。

当他确实得到了他的上校军衔以及他的苏格兰燧发枪营的时候，丘吉尔立刻意识到了士兵们受到严重的挫伤，因为卢斯战役的惨痛经历而士气低落。只有两个星期再次准备投入战斗，去往被派遣的地方——法兰德斯的普洛斯塔战线。下级军官，尤其是军士并没有不自然地怨恨这位强加于他们的中年有些笨拙的大吼大叫的人物，他们为他的非正统的检阅和演练方式感到惊讶，通常就是那种不同于常人的热情的混乱场面。但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温斯顿真的准备好了与他们分担危险和艰辛（虽然不是沙丁鱼），真正忠于他的手下，以及不应该让自己的队伍遭受不必要的人员伤亡的决心。而他们收到的命令只是保持自己所在的位置，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去过海格元帅致命的“大举推进”的那些战场，丘吉尔所在营的死伤率是远低于平均值的。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克莱门蒂娜为自己丈夫的命运而担心致病，或许，他已达成自己意愿的事实也没能缓解她的焦虑。

如果克莱门蒂娜曾担心他的离开，那么在1916年3月，她更是吃惊看到他这么快就回来。他可能尝试做一个坚定的好战士，但在丘吉尔的血液里并

没有完全放弃从政的打算。炫耀起自己的服役，好像自1914年以来一直这样，他突然反常且不太明智地出现在下议院里，攻击了战争中的海军行为，由于自己的离职，他呼吁古板且极反复无常的杰基·费希尔的回归，结果引来一片惊愕和怀疑之声。演讲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这没有阻止丘吉尔为竞选而战（呼喊“达达尼尔海峡如何？”），也没有阻止新首相劳合·乔治全心全意听从了他的意见，最终在1917年7月将他命名为新的军需大臣（保守党咬牙切齿）。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绝妙的选择。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做的很多事情就是他在1916—1918年的工作预期：解决多年以来的“炮弹短缺”问题；在政府任何人之前坦率地接受征兵，也证明了他足够勇敢或足够现实地看到了它的不可避免性；并倡导一种可能打破僵局的全新武器——陆地装甲舰（Land Ironclad）或坦克，丘吉尔承认这一想法是从自己的朋友H.G.威尔斯的预言里得来的。可以预料到，基奇纳驳斥了坦克的提议，认为这只不过是“机械玩具”（引起了威尔斯和丘吉尔的厌恶），并确信这一新的杀戮机器最初只是作为一个防御性的新奇事物，而不是一个新型的骑兵力量。但事实是，当作为突击车使用时它们如虎添翼，在1917年11月的康布雷（Cambrai）战役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一些地区将英军防线向外部推有5英里。

约800万名战斗人员死亡，以及随后2500万人的额外死亡后，战争结束。1918年11月11日，停战纪念日，威尔斯描述了军用卡车行驶在伦敦的街道上可以载上任何人去往任何地方，而这“庞大的闲置人群”主要由学生、儿童、中老年人、后方士兵组成，街道上的景象令人窒息：“每个人都漫无目的，有着一股紧张又疼痛的释然感。”搜获的德军炮车成了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篝火。但至少威尔斯感觉到了疲惫和悲伤压倒了欣喜：“人们想笑，想要哭泣——可都不能做到。”从牛津大学辍学成为一名护士的薇拉·布里坦（Vera Brittain），注意到男人和女人怀疑地看着对方，没有喜极而泣说“我们赢了”，他们只是说“战争结束了”。即使这样的释然也被寒冷的阴霾所取代，几乎她所有最好的男性朋友都死去了：战争结束，新时代来临，但故人亡去，永不再来。

尽管往常情绪激昂，丘吉尔仍然理解这一陌生的复杂情绪。作为“战争与空军”新官员（一个渴望训练的飞行员，直到一次失事使克莱门蒂娜禁止温斯顿再进入驾驶舱），他负责处理复员事项，而这件事在他上任之前，对所有那些从炼狱中幸存下来的人来说，已经成了巨大的愤怒和痛苦的根源。根据工业和经济优先事项，他们理应被复员，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缓慢。由于察觉到这一不人道现象，丘吉尔加快了复员速度，伤员情况、年纪和服役时间是他考虑的优先级条件。

这至少是他能办到的事。在大战中，至少有70万名英国军人身亡，150万人受伤。另有15万人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中失去了生命。将近30万

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整整一代年轻人中有十分之一消失，其中就包括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独子，悲痛使伟大的帝国传统转身走向更深的忧郁。在他于1916年出版的《布利特林先生看穿一切》（*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一书中，威尔斯想象“英国小子”（虽然他自己的儿子还太年轻不能服役）在同样的苦难中与一名德国父亲一起失去亲人：“人来了，挣扎着，受伤又受罪，在时代不断笼罩的黑暗之中，这将会再次粉碎并耗尽他们。”一个可预测的人类的完美反应就是“折腾完余生”，在此沉浸于“切斯特顿欢愉、事物冲突。让人类从泥浆和血液之中摆脱出来，就像之前的失蹄一样”。但是对于威尔斯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作家，如萧伯纳和阿诺德·贝内特来说，这必须也是普遍性大屠杀发生的条件被解除的一刻（也许是最后一次），同时应该除掉的还有荒谬的帝国与君主，以及对教会和领土的部落式幻想。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国际自由联盟，而坚持这个主张的就有萧伯纳、贝内特、哲学家和平主义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个虚拟的国际政府，通过科学而组成，受到对普遍人类命运无私维护理想的激励，必须开创一个新的历史，否则数百万人的牺牲将会变成徒劳，犹如咧着嘴笑嘻嘻的人讲的拙劣玩笑。所有这些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The Modern Utopia*，1905）中所称的“新武士”，都对《凡尔赛条约》的报复性条款深感失望——将战争的责任和代价归咎于德国。威尔斯也为给予国际联盟的有限权力而感到沮丧，由于美国国会的条约否定而更为削弱了。

对于这个新时代——普通人的命运将真正成为他们的统治者所关注的事物——在国内也出现了误导迹象，或许这时代真的到来了。在1920年的停战日那天，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中殿为战争中的无名烈士举办了葬礼，这至少象征性地看起来，像是在预示着一个受节制的民主政权。这个想法已经被大卫·雷尔顿（David Railton）提出，一位来自肯特马盖特的牧师，之前曾在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担任军队牧师，并致信给威斯敏斯特院长。战场遍布着无标记的临时性坟墓，而这将成为普通士兵衣冠冢，由勒琴斯设计的战死者纪念碑在白厅被建立起来。国王对此表示反对，以及对寇松勋爵的任命，没有注意到他对普通人的同情或认识，作为委员会主席没有好好表现。但劳合·乔治，负责主持联合政府（绝大多数），看到了它的宣传价值，并故意煽动宣传来推进该计划。六队人马被分别派遣到法兰德斯的6个公墓挖掘尸体，对匿名士兵的选择则通过蒙蔽最终做决策的军官完成。英文橡木棺木已经准备好了并刻上了铭文，就像西敏寺修道院的黑色比利时大理石上的斑块一样，以最简洁且沉重的方式描述道：“1914—1918年在大战中为国王与国家牺牲的英国士兵”。六艘驱逐舰护送棺木穿过海峡，受到了来自多佛城堡礼炮致敬；然后送至伦敦的维多利亚火车站，从11月11日起，它被扛上了首都的街道，国王步行跟随其后。三名领队是三名军队总参谋长，海军元帅黑格、海军上将贝蒂（Beatty）和空军元帅特伦查德（Trenchard）。坟墓被埋葬于那些在著名大人物的雕像脚

下，与这些士兵一起埋葬还有来自这场战争的每一个伟大战场的100袋沙土。在安葬的第一周，超过100万人前来瞻仰，在新建纪念碑周围放置了十万个花圈。

战后的英国会像劳合·乔治所应许的那样，成为一个“英雄的国度”吗？无论如何，它将是一个由2700万名民众组成的民主政权。在1918年终于给予30岁以上的妇女选举权，而21岁的男性则被视为成人，这都足以行使它，将不会存在链式特权。至少，战后短时间强劲的经济复苏证实了政府的一部分承诺。复兴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生（Christopher Addison），主持监督了20万户家庭的重建，实际上也是英国议会建设的开始；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教育委员会主席H.A.L.费希尔（H.A.L.Fisher）将离校年龄提高到14岁，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小举措。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工资和薪资，养老金增加了一倍，失业保险几乎覆盖了英国的整个劳动人口。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重建”是欺诈行为。但是，最明显的是重工业经济的变化，“战争社会主义”确实如劳合·乔治所料想的一样消失，与此同时，至少在劳动运动中，一个积极的政府应该要采取一些举措来减轻旧工业制度的不平等现象。毕竟，经营政府的都是维多利亚时代过来的人，他们毫不犹豫地决定尽快彻底解除国家对原材料、制造业、通信行业、工资、租金的控制。而且即使劳合·乔治任首相，政府的政治色彩是强烈泛蓝的，毕竟多数人完全依赖于与占主导地位的保守党人、北爱尔兰统一党人的联盟。

任何关于国有化煤炭工业、码头或铁路的言论都不被鼓励，尤其是在工会之中。而在1920—1921年，当繁荣转向低迷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人民——斯坦利·鲍德温称之为“那些看起来在战争以外做了好些事的铁石心肠的人”——重新拾回他们在20世纪头十年里所采取的强硬战术：减薪和停工。

在任何情况下，劳合·乔治并不需要由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尔·劳（Andrew Bonar Law），或政府的其他极右翼人物如F.E.史密斯（F.E.Smith）和寇松勋爵为他提供说法，“战争社会主义”的终止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恢复货币正统是英国“重建”的必要条件。如果有人指出他已经明确关于什么是“重建”会有两个完全矛盾的解读：一个是社会的民主；另一个则是保守党的传统主义，首相只会令人不安地转身，直到天真又模糊地意识到“分而治之”是重要的。要么你得到它，要么就没有；如果你没有，那就会被抛弃在劳合·乔治的小圈子之外。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他可以通过纯粹的魅力来治理国家，并通过强硬的政治手腕加强。在他为自己制造的“赢得战争的人”的形象（在他自己的脑海里和许多其他人的脑海里）基础上，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领导政党的政治家，而更像是位不可或缺的“政治活动家”。随着政治权威的蒸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

尔逊（Woodrow Wilson），以及他的同胞、战后的和平缔造者法国短暂的战时总理乔治·克莱门索（Georges Clemenceau），正是劳合·乔治填补了真空，作为一个欧洲（也就是说世界）的仲裁者。这个趋势越是变得明显，他越欢喜，昂首阔步，闪烁着邪恶的笑容，对于恳切的媒体，他就像一位彬彬有礼的情妇，他无可置辩地享受这一切。联盟在议会中几乎没有面临任何威胁，这之中是由59名工党成员组成的主要反对党以及“纯粹”自由党的枯萎的余孽，表面上由酗酒、头发稀疏的H.H.阿斯奎斯（H.H.Asquith）所领导，在1916年，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被废黜劳合·乔治的指令。没有受到太多挑战，首相很少屈尊在下议院现身，而在唐宁街主持一个华丽的政权。通过晚宴来统治，其武器包括巧妙的有针对性的谣言、谨慎的商业好处、时不时半玩笑式地威胁戳一下肋骨。荣誉待价而沽，商业的内部操作也如期而至。当劳合·乔治越来越像一名流氓黑社会首相的时候，他和他的唯一明显的政敌丘吉尔之间的甜蜜期也越来越短。

一切都在往坏处发展。苏格兰的罢工和骚乱，爱尔兰的野蛮战争，抵制，罢工，印度的屠杀——寇松勋爵在1918年鼓吹的全能帝国国家，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裂缝在外围被撕裂得更大，在那里有彻底的叛乱。在爱尔兰，志愿者们受到不只是工会会员，还有由约翰·雷德蒙领导的地方自治鼓吹者的煽动，他们在法兰德斯忠诚服务的美德也使其自寻灭亡。当他们正变成帕斯真戴尔（Passchendaele）和梅嫩（Menin）路的幽灵的时候，其致命的对手爱尔兰共和军（IRA）——在1914年还是个微不足道组武装力量——壮大到了一个真正的军队的水准。调和剂或者说是权宜之计，带来了最肆无忌惮且好战的工会成员——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他进入联合政府，触发的不仅仅是1916年的都柏林复活节起义，更可怕的是，英国政府绝不会允许爱尔兰有独立的意识，除非受到强迫。在1918年的选举中，地方自治鼓吹者的余部被致力于即时自由的共和国的新芬党所取缔。

此外，还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苏格兰地方自治运动，推动这场运动的部分原因是惊人的不成比例的苏格兰战争伤亡人数：557,000个苏格兰人的26.4%失去了生命，而对英国其他军队而言这个比例为11.8%。讽刺的是，作为帝国军队的支柱长期以来一直是苏格兰传统，从美国独立战争到印度兵变，而这也导致了他们被置于最危险的阵地，或者做了一些疯狂的自杀式行为的排头兵，被海格或元帅亨利·威尔逊爵士这类人所摆布。但在格拉斯哥，八分之一的人口仍然住在单间住宿里面，该地区的经济由于紧缩的造船业而变得脆弱不堪。士兵复员，失业率也随之上升。作为回应，工会提出了缩短工作周的要求，使可用资金广泛流动成为可能，并保留工资和租金管制。当他们得不到政府响应，一场40小时的大罢工被号召起来，最终在乔治广场集结了10万人的示威活动。一面红旗在广场飞舞，政府警方如公牛一般被激怒。这次示威首先被政府宣布是一场骚乱，然后被

定性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起义。都柏林已是措手不及，在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的时候，政府派出了12000名士兵和6辆坦克来占领红色格拉斯哥。

尽管寇松心怀自满，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一切情况都不是特别好。或者说，有两个帝国，就如两个来自不同地区的英国人，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经受着古典工业经济的老化所带来的阵痛。来自帝国的近15万名白色人种的本土军人在战争中丧生。英属白人自治领所做出的巨大牺牲——维米岭（Vimy Ridge）战场的加拿大人、加里波利的澳新军团、戴维尔·伍德（Delville Wood）战场上的南非人——可能使遭受个人损失的家庭为他们战死的儿子感到自豪，但这也不能与他们对帝国的情感相混淆，那个派遣他们上战场的帝国。可以理解的是，1915年在加里波利战败之后，热情的志愿服务在澳大利亚大幅度下滑，并有强烈的反征兵趋势。这些国家集体将自己为帝国所提供的服务看成通往皇权与母国的认同之路上的“激励时刻”，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加拿大的非英人口，尤其是南非的布尔人，他们的支持并不那么热心。魁北克就发生过招募骚乱。1915年南非的选举显示，尽管还有扬·史末资[注]忠诚的努力，一半以上的布尔人不愿参加那场与德国的战争，一个支持他们的南非白人民族主义的友国。

麦考利关于有教养和自治的联盟的愿景正在成为现实，但是是由白人、讲英语的农民、银行家和种植园主组成的联盟。在非白人的帝国其他领地，这种互惠的感激和共享的利益就更不明显了。有近100万名印度军人在役，无论是在亚洲的“东方兵营”，还是在西方阵线，在战争期间，1916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尔特阿马拉（Kut el Amara）最终灾难性的一役中，被围困的由查尔斯·汤森爵士（Sir Charles Townsend）领导的军队最终投降了土耳其人。官方估计的印度死亡人数为54000人，另有60000人受伤。至少有40000名黑人非洲人在法国战场的英国军队里担任了搬运工和劳工。除此之外还有殖民地非洲战区更多的战斗力量，虽然他们的伤亡率不可能确定，但很有可能已经相当高。

无论如何，非洲近东帝国的战后忠诚度比之前更加摇摆不定。1918年，部分地被后哈里发穆斯林民族主义积累的势头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的形势所驱动，一个由埃及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组成的代表团瓦夫德党（Wafd），要求英国当局为终止自1914年以来的摄政政体而设定时间。在埃及的政府高级专员，如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Sir Reginald Wingate）没有遣散他们，但他对此并不乐观。即便是合作已经发展到了这样势态，伦敦一方如寇松等人还是不予理会，认为这是相当不明智的。在得知了拒绝的消息之后，埃及政府辞职，随而来还有罢工和骚乱，与此同时，印度也同样发生了示威活动，并且结局更加惨痛。在英国军队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这场两个多月的战斗中，约有1500名埃及人遇害。而在伊拉克，基于埃及连同苏伊士运河将由英国军队“保护”这样的基础上，一个反瓦夫德便捷君主制政

权建立了起来，从这令人失望和愤怒的一刻起，无数的邪恶蔓延开来。

1921年2月，丘吉尔成为殖民地大臣，此前他就已经在攻击任何与瓦夫德党妥协的人都是没有脊梁骨的懦夫，他明确地认为那些人是戴着土耳其帽的爱尔兰共和军。而丘吉尔——这个下巴高高扬起捶着桌子的好斗的帝国保卫者，这个不停歇的战争贩子，黑人以及爱尔兰黄褐色原住民的暴行保护者，这个着了魔地反共产主义的妄想狂说起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国际传染病——往往被说成是“真实的”贵族反动派丘吉尔，在短暂反常地玩过一阵社会改革之后恢复原状。据说联邦主义在他的血脉里如父亲的血液一样流动着，他号召把俄罗斯革命扼杀在摇篮里，是出于对俄罗斯贵族及沙皇阶级联盟的深厚情谊。

然而，这些关于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丘吉尔真实性说法貌似被20世纪剩余时间的苦涩而不容置疑的事实证明都错了。从2002年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丘吉尔的观点，关于俄罗斯、爱尔兰、中东，甚至是德国战争赔偿和贝尔福推出后同意实行的封锁——看起来都有先见之明或者是乐观的。他经常是突然从强硬派转向走柔性路线，可是这些改变是从开始时反思要改掉好斗本能，接着深思熟虑后的宽宏大度。竭力扫除劳合·乔治派因子，要德国付出高昂代价的赔偿，他呼吁（大家）要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宽大仁慈，反对禁运。丘吉尔与新芬党领袖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阿瑟·格里菲思（Arthur Griffith）谈判，出乎意料，丘吉尔与后者还建立了友谊。谈判结果是一个爱尔兰南部省份和一个以清教徒为主的北方爱尔兰地区保留在联合王国里面。如果爱尔兰自治邦不是以地方自治的管辖状态留在不列颠王国里，至少它代表了某种联系的延续性。1922年爱尔兰天主教内部之间发生的爱尔兰内战才打破了这一联系，断送了希望，而且正因为这才要了迈克尔·柯林斯的命。

也许丘吉尔确实是无所顾忌又不知疲倦地号召人们投入人力钱财支持亲沙皇的白军（White Army）尝试推翻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假如说他故意唠叨有关布尔什维克是专制阴谋的话，招惹了英国社会主义者，时至今日，1917年10月发生的事到后来的结果已经说明这一诊断完全正确；已经有充分理由为自由在新苏维埃的命运感到悲哀。到1919年，任何人都能看清在俄罗斯不只是制宪议会已经被毁，还有任何多党派民主的假象也不复存在，虽然说是持续的战争给了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一个绝好的借口来制度化他的警察国家。

1921年3月，这时的殖民地大臣丘吉尔和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东方学家格尔楚德·贝尔（Gertrude Bell）一起到埃及骑骆驼去了。然而在3月的中东会议上，也许他被一个海市蜃楼迷惑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肩并肩地齐头并进发展。国际联盟已经授权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他说，这包括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正如1917年11月《贝尔福声明》里承诺的那样，

一个月后的1917年12月英军中东总司令埃德蒙·艾伦比将军（General Edmund Allenby）的部队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取耶路撒冷。但是丘吉尔也许是幼稚了，他强调这不是强加给阿拉伯人群的（1921年3月在加沙，他看到一群巴勒斯坦人高呼支持英国，但没人给他翻译同样热烈地喊出的口号如“犹太人去死吧”）。丘吉尔真心希望到时候阿拉伯人也许能认识到犹太人定居可以作为整个地区现代化转型的胚芽。丘吉尔毫无疑问是一个锡安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应对仇恨反犹太主义的出路（到头来）就是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它的唯一合法地方就是这个给予犹太人及其宗教（双重）身份地方。他希望通过在伊拉克和外约旦建立君主制，重建某种事实上的伙伴关系，或者起码是默认关系，类似于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君主邦国孟加拉和孟买那样，由英国直接统治的现代中心关系。

当然，这一谋划在印度本身就落空了。当他和费希尔让英国军舰从煤改用油的时候，丘吉尔是打开了第二个巨大的潘多拉盒子（第一个是格莱斯顿在1882年占领埃及的决定）。那么这时候有太多理由要在中东抓紧，牢牢把握住——石油投资、苏伊士运河的战略保护，在运河边建造一个巨大的新军事基地，小心对付奥斯曼帝国之后的各个阿拉伯君主国，要保证他们不落入民族主义者之手，那会毁了印度的生命线，或者进而支持那里的“不满者”；还有，也许要和劳合·乔治一样粗鲁顽固地坚持，因为英国已经赢得巴勒斯坦“有征服权”，那就有权利继续待下去，托管权确认了这一点，但是英国40年的管理最后变得既不让人开心也不是特别光彩。

1922年，长久以来外缘磨损后的联合终于散架了。那年11月的选举，自由党——特别是劳合·乔治那一派——实际上消失了。丘吉尔自己在邓迪以少于对方1万票而落选。丘吉尔强颜欢笑，和妻子一起去了里维埃拉（Riviera），他手里拿着4.2万英镑的回忆录预付款，在戛纳（Cannes）附近租下一个叫维多尔（Rêve d’Or）的别墅，要住6个月。他在这里到处转悠，看看地中海，画画，还有写作《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1923）。没有政治盟友可以叙说，没有政党基础，也没有真正的支持者，但是在金松树下，在金色的梦里，生活，哪怕是威斯敏斯特之外的生活也还是很惬意的。

威尔斯这时候正在探索另一片不同的领域，写着他完全不同的历史。1918年，人们经常在埃塞克斯郡滨海利（Leigh-on-Sea）的海滨大道看见他走在路上，这是他为他的作家情人丽贝卡·威斯特（Rebecca West）和他们的孩子安东尼找到的乐园。威尔斯也喜欢在岸边漫步，然而这里是泰晤士河入海口地区，河水浑浊带着海腥味，这里潮汐引起的水波里富含狸藻和浮渣，退潮后露出铁锈般褐色的泥。威尔斯热爱这种水，以及它融入其中的冷灰色海平面，然而他的思想和他的历史都超越大不列颠的边缘走向一个空间和时间都更为广阔的区域了，这时候他认为值得书写的历史只有这个

星球上的人类种群历史了。他在1919年出版《历史的概要》的系列部分，后来合成一个单卷，被译成各种语言，成了20世纪最畅销的历史书，销量仅次于《圣经》和《古兰经》。到1921年年末，这本充满了细节的1300页的书在英国就卖出了15万册，美国是50万册。到1922年年末，当丘吉尔在埋头写回忆录时，威尔斯已经卖掉了用其他语言出版的100万册，包括斯洛文尼亚语和日语。

《历史的概要》一书使得它的作者富裕了，更重要的是它让他成了一个全球知名的人。威尔斯一定对这一点很满意，他想要自己的《历史的概要》讲述的世界历史作为传教士布道一样传播。一开头，不是说英吉利海峡上迷雾散去向恺撒的船队露出白色悬崖的轮廓，威尔斯是从一个虽然小小的、明显是无足轻重的物质圆球在太空深处旋转开讲的。他要重写历史，从生物学、地质学和考古学角度写，但不像麦考利和丘吉尔那样认定的——一直以来发展延续的人类文明往世界其他地方散播福祉的进程。相反，那些原则在这本书中消失了，化为一个更宏大的种群、文化，以及帝国的出现和消亡。地质学和考古学讲的是埋藏在岩基地层或流沙下面的不朽故事的幻觉之一。对于科学家威尔斯来说——他喜欢思考，直接通过他的老师赫胥黎——生存，或者至少是在战争的大灾难之后，人统治的延续，关键在于历史提供了一种惩罚的限制感。通过鲜明地描绘当时的欧洲–大西洋场景，又以同样深入地考察赫梯人和蒙古人，玛雅人和奥斯曼人，威尔斯希望在还不是太晚的时候传递一种共享命运的感受："如果没有共同的历史观，就不会共享和平与繁荣。"因此在这种全球观之下，书里用了整整30页讲穆罕默德和他的继承者的故事，而在麦考利书里占了好几卷的1688年光荣革命，在辉格党人传统里那可是至关重要并决定了英国人的身份目的，被缩减成了短短的枯燥的一段。

威尔斯认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一个基于科学的、普遍认可的常识知识库，这将超越狭隘且沾沾自喜的关于国王、国家和民族的神话历史。有了这样崭新的通用百科全书（因为人们似乎需要它），还需要一个广义上的宗教信仰支撑："宗教本身是纯洁的……天国、兄弟般的友谊、创造性的服务、忘我精神。"这个真正的普世宗教能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宣称单一真理的信仰当中的残酷和野蛮变得多余，那些残酷和野蛮使得他们彼此吃尽了苦头。"人们的想法和行为将会围绕教育、实例，以及人类自身的各种思想运转，从自我痴迷中摆脱出来，从而热衷服务于人类的认识、人类的力量和人类团结。"这些议定的原则会来自一个新的世界政府，不是由蓄积的权力所强加的，而是由那些发誓要抵制它们的人所建立：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知识分子阶层（像他一样），威尔斯故意且不太妥当地将他们称为"新武士"（new Samurai）。他的《历史的概要》这样收尾：

战争是可怕的事物，恐惧将不断升级，所以除非结束它，否则它就会结束人类社会……似乎也有人幻想一个世界秩序和一个普遍的正义法则终将结束人类的冒险。将会，但怎样开始呢……迄今为止，人类一直住在一个贫民窟之中，充满了争吵、报复、虚荣、羞耻、无耻、热烈的欲望和紧迫的胃口。他几乎没有品尝过一口由科学为他开启的伟大自由世界里的甜美空气。

还有哪一个英国人会有如此令人欢欣鼓舞的国际主义的思想呢？在威尔斯先生的新世界秩序中，他父亲的乡村板球和绿地将变成什么样呢？至少年轻人没在意。他的费边主义老战友格拉汉姆·瓦拉斯讲出了他最乐意听到的恭维话，如果现在威尔斯“如我60多年前一样，还是一名六年级的男孩的话，那么这个人将为我改变整个世界”。

至少有一位伊顿的六年级男孩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ir）——也就是未来的乔治·奥威尔，尽其所能阅读了所有威尔斯的作品，在那时，他对乡村绿地上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趣。

---

1. 布莱兹欧弗（Bladesover），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小说《托诺–邦盖》中，主人翁乔治·庞德雷沃成长于等级制度森严的布莱兹欧弗山庄，威尔斯将“布莱兹欧弗体系”作为剖析英国社会的一个运作模型，借以揭露19世纪末英国严重的社会弊端。——译者注

2. 德兰士瓦（Transvaal），丘吉尔曾被派往南非的德兰士瓦报道布尔战争。——译者注

3. 咔叽大选（khaki election），战争时期或战后选举。——译者注

4. 莫洛克人（Morlocks），威尔斯小说《时间机器》里的生活在地下的人类。——译者注

5. 埃洛伊人（Eloi），源自小说《时间机器》，一种过度文明的人种。——译者注

6. 安妮·哈瑟维的小屋（Anne Hathaway’s house），莎士比亚妻子故居。——译者注

7. 扬·史末资（Jan Smuts），南非政治人物、律师、将领。——译者注

第八章　忍耐

乔治·奥威尔的历史轨迹永远不会与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但他的历史老师却可能是。在圣塞浦里安（St Cyprian’s）伊斯特本（Eastbourne）的一所预科学校，为期五年的学习生涯的最后一年，他赢得了经典奖（the Classics Prize）并荣获哈罗历史奖的亚军。那位不同时期出现在圣塞浦里安的历史教师也是丘吉尔和G.M.屈维廉的老师——乔治·汤森·华纳（George Townsend Warner）。华纳先生于1916年去世，也就是那一年，年轻的奥威尔——埃里克·布莱尔获奖，但毫无疑问，埃里克曾多次见到这位老先生分发书籍，并高盛阔谈，认为帝国的命运取决于它的男孩们是否熟悉其历史。

当时的埃里克没有多想。多年以后在他的作品《如此欢乐的童年》（*Such,Such Were the Joys*，1947—1948）中，奥威尔对幼时的学校体制进行了反击，认为历史课和所有圣塞浦里安的其他课程一样，仅仅只是帮助男孩们准备公立学校入学考试并赚取声誉和金钱的死记硬背填鸭式课程。英伦岛屿的史诗在当时的奥威尔看来也“不失为一种乐趣”，但在圣塞浦里安学校它被简化成了“熟记年代日期的小窍门，年代问答操练的热烈场面，热心的孩子在他们的座位上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抢着回答正确的答案，但同时对他们所答的神秘事件的历史意义一点儿也没放在心上”。在布莱尔脑海中留下的仅仅只是任意互耦的名称和短语、名称与日期——迪斯雷利利用荣誉取得了和平，克莱武对他的节制大为惊异——没有丝毫试图去解释它们真正意义的意愿。历史仅仅只是助记符号的叠加，例如，借助“这黑女人是我的姨妈，她的家在谷仓后边”的首字母，来拼写出玫瑰战争中主要战役的名字。

埃里克在圣塞浦里安真正的历史老师并不是一位如华纳一般博闻强识的老先生，而是一位女教师，当朝那些畏缩着的捣蛋鬼们走来时，可以看到她那下垂的乳房上下弹跳，因此有了“傅丽普”（Flip，意为跳跃）这样的绰号。在奥威尔伤痕累累的童年回忆中，“傅丽普”无疑是学校里的首席施虐狂，将这名年仅八岁尿床的小孩派遣到其丈夫（也是学校校长）桑保（Sambo）处，狠狠揍了一顿，一边揍一边配合着节奏训话“你——这——脏——小子”，同时也引发了另一次“犯罪”的焦虑感。在《如此欢乐的童年》里，奥威尔这样描述当时被吓坏的自己，“我一夜又一夜地祈祷，当时祈祷的虔诚程度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哦，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尿床！哦，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尿床！一夜又一夜，但是这一点也没起到作用。”对这名小男孩来说，这是一场无助的循环——尿床、挨揍、尿床、挨揍——一切都证明他落于一个梦魇世界里，“不可能得到挽救”。

在《如此欢乐的童年》里，奥威尔的回忆和诚实描述受到了他当年同学的抨击，认为强大但又不失母性的“傅丽普”以及圣塞浦里安的教育管理风格被奥威尔不公正地讽刺夸大了。无论夸张与否，如果这个人每天被迫跳入一个黏糊糊、冷冰冰的公共浴池，从锡碗中稀里呼噜舀一口又稠又黏的疙瘩粥，这锡碗的边缘是昨天的圣粥和今天的混合结成的嘎巴，以及不可辨认的毛茸茸、硬邦邦的异物，那么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埃里克·布莱尔乐意去描写的。阴霾之中总有一些如点点光斑闪耀着的愉悦时刻，当他独自去往英国的田园乡村，特别是最为斑斓绚丽的苏塞克斯，他会收集蝶螈和蝴蝶，就如丘吉尔一样，这成了他倾注终身的爱好。对英国，事实上对英国的历史，奥威尔始终紧跟这个时代的脉搏。11岁，幼小的他已经是一位爱国者，还写了一首战时招募诗《觉醒吧！英国的青年人》（*Awake!Young Men of England*，1914），发表在泰晤士河畔亨利当地的报纸上。然而圣塞浦里安代表了另一个英国，一个让孩童脱离家庭、被关押于“非理性的恐惧与疯狂的误解”之中的地方。即便是在那些穿着短裤的少年时代，伪善的统治阶级理想——基督教、板球和文明人——与被胁迫的现实之间构成的鸿沟成为他最为关心的话题。可以说就是这些地方，帝国的统治者们提供了作为白种本国人的生存权利，也成了整个体制的接收终端的样本，善良与邪恶被无望地混淆在了一起。

实际上，埃里克·布莱尔于1903年出生于孟加拉的莫蒂哈里（Motihari），大英帝国的毒品贸易产地。其父理查德·布莱尔，一个大企业里的无名小卒：鸦片部门的助理副代理，三等员工，其工作围绕着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毒品交易需求而展开。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英国通过鸦片出口获利颇丰，平均每年4000吨，总计650万英镑，或占印度殖民政府的总收入的六分之一。可以说，如若没有贩毒贸易，寇松是无法建造维多利亚纪念碑的。理查德·布莱尔的工作就是看管罂粟田，以保证作物的产量和纯正品质，最后确保这些货品被正确发往各个海运仓库。由于该行业的未来前景堪忧，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质疑，为了尽其所能创造更多的利润，给布莱尔及其所在部门带来了巨大压力。他必须勤恳工作，如同照管阿萨姆红或巴特那大米一样。

1904年，由于将被派遣到偏远的内陆地区，布莱尔决定将自己的妻子，艾达（Ida，拥有一半法国血统），连同他们的女儿玛乔丽（Marjorie），以及有着金色的乱发、胖嘟嘟脸蛋的婴儿埃里克·阿瑟（Eric Arthur）送回英国。他会像这个帝国其他的数不胜数的工蜂一样，独自在一个山间驻地服役，消磨掉自己的时间，才能踏上返乡之路。布莱尔一家并不富裕。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中，奥威尔对自己的家庭做了精准的描述，“穷摆架子的”“低上层中产阶级”，每年的收入不到一千英镑。这为他们提供了上流社会生活的知识和品位：如何在餐厅订餐，如何刀和叉使用，同时没有办法享用它。在圣塞浦里安，“傅丽

普”和桑保不断提醒他，不同于其他幸运儿，他不具备奢侈浪费的“宝贵机会”。

在奥威尔的小说杰作《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1939）中，“家”就在维卡拉奇路（Vicarage Road），在泰晤士河畔亨利，在永恒的英格兰。有杨柳垂悬于河面，有欧芹生长于小径，有天鹅戏水，有红砖砌成的啤酒厂，竞舟赛，奶油茶点，悬空球，“青翠的草地环绕着整个小镇”。艾达在维卡拉奇路上的房子装点着象牙和来自东方的挂毯宣示着它的异域风情和与众不同的背景。在位于施普蕾克车站路的玫瑰坪，布莱尔一家收购了一小块约莫一英亩大小的花园，埃里克和他的姐姐短暂地领略到了真正乡村生活的快乐。但即便是在理查德·布莱尔最终晋升为正式的三等副代理之后，还是入不敷出。

迫于谴责的压力，大英帝国的鸦片业务正悄然接近尾声，于1913年与中国签订条约，终止了鸦片贸易。1912年，理查德接受了一年400英镑退休金提前退休，而从来没能满足整个家庭的开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由于艾达的公共服务工作，布莱尔一家开始在西伦敦克伦威尔法院的伯爵宫附近定居。此时的丘吉尔则居住在克伦威尔路上，听起来相差无几，但实际的社会阶级差异是巨大的。

但是丘吉尔并没能像埃里克一样，去往其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老学校伊顿公学就学。当然，埃里克得到了伊顿的奖学金，尽管遭到了大龄学长仪式性的殴打，对他来说，伊顿的生活远远比圣塞浦里安愉快得多。他承认，在伊顿期间，战后英国的愤怒情绪令他感染了一种沉默的叛逆风格，使他变成一名势利眼和叛逆者。在那儿时常有关于萧伯纳和威尔斯作品的社会主义倾向的辩论，也有青年团的嬉笑打闹，当一个由17个男孩组成的班级被问及他们的英雄的时候，有15位选择了列宁。当布莱尔离校时，他为学校图书馆提供了一本戏剧集，其中就包括萧伯纳的剧本《不伦不类》（*Misalliance*），其序言“父母和孩子”对英国的学校进行了强烈的攻击，将它形容成关押年轻人的监狱；更严重的是，事实上对他们的身心都造成了折磨。

可能是由于埃里克沉默寡言且傲慢的学习态度，欺骗了他的老师，他们认为这沉默是其智力低下的体现。至少，当时的文学老师“高尔奶奶”这样告诉他父亲，这孩子没有丝毫赢得牛津或剑桥大学奖学金的机会，而这通常被看作通往统治阶层的阶梯。理查德的退休金完全不能支付奥威尔入学“梦想之巅”所需的教育费用，因此伊顿人所唱的《陆军、海军、教会和法律》梅石游戏并没有成为现实。最实际的选择就是跟随父亲的脚步，在殖民地谋得一职，尽管没人会指使一位有梅石背景的“警官”。

当衰老的男高音仍然在伦敦音乐厅高唱着《在去往曼德雷的路上》（*On*

the Road to Mandalay）的时候，在1922年的11月，埃里克发现自己实际上正在通往曼德雷的路上，正要去往印度皇家警察训练学校。而缅甸警察被认为是大英帝国最糟糕殖民地的最吃力不讨好的职务。缅甸是殖民掠夺的典范，有着历史悠久的柚木和茶叶种植园，以及红宝石矿产，如今还富有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宝藏——伊洛瓦底江三角洲（Irrawaddy delta）的石油。资源如此珍贵，佛教徒坚持抵抗、老缅王室的不合作也带来了不少麻烦。1885年，常规的解决方案是：一场最终吞噬整个国家的军事行动。但是，13万缅甸本地民众与英国管理人员的比例，都比任何其他英属亚洲殖民地来得少，这也使警察部队成了维护秩序的关键武器。很可能当布莱尔初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还保留了些许官方的理想主义想法，认为警察是好的，来这里维护和平，帮助毫无防备的村庄围捕草寇，诸如此类事务。但在英属缅甸“令人窒息且单调乏味的世界”的这五年，全然推翻了他先前的理想主义想法。

乔治·奥威尔以讽刺姿态回顾了曾经作为缅甸警察的年月，因为正是在那儿，这个殖民帝国的高压政治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眼前。他的作品《猎象记》（*Shooting an Elephant*，1936）揭露了其在英属殖民地缅甸当殖民警察这一经历。在文章的开篇，他讽刺道：“在下缅甸的毛淡棉（Moulmein），我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在我一生之中，我居然这么引起重视，也就仅此一遭而已。”起初，这位头戴遮阳帽、身着卡其布短裤的年轻军官对这份职务虽不热心，但也试图体面地做好他的本分工作，围捕小罪犯，在他们被殴打的时候寻找逃脱的办法。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明白，所有这些关于“不列颠治世”的高谈阔论——在仰光的妓院中被更为准确地称为“不列颠痘疮”（Pox Britannica），他不过只是一名大型利益集团所雇用的打手。在伊洛瓦底河上的港口城市沙廉（Syriam，缅甸南部港市），他负责监管缅甸储油罐。在缅甸内陆小城杰沙（Katha），在一个柚木种植国的心脏地带，他并没有为权力感到振奋，而是在种植园主的种族主义咆哮与缅甸人阴沉的敌意之间，局促不安地摇摆着。

俱乐部里英国同胞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抱怨使他心生厌倦，这被忠实地记录在了他早期的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1934）里：“整天都是些可怕的改革，还有他们从报纸上学来的蛮横无理，我们如今好像都管不了这些原住民了……不多久之前，甚至就是在大战之前，他们还老实巴交、毕恭毕敬的呢！那时候在路上看到我们经过，他们那行礼的样子，多讨人喜欢啊。我还记得我们一个月只付给我们的管家十二卢比，他就会像条狗一样热爱我们，真的。”正是在他作为一个老伊顿人被同伴嘲笑的时候，埃里克才真正认识到这一代日不落帝国主义者的偏执，他们对落魄到真正穷酸阶级所怀有恐惧感，而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那个社会阶层。对他们来说，这个帝国的存在就是为了给自己提供马匹和仆人的机会，这些是在老家英国根本负担不起的。甘地、“布党”记者以及佛教僧

侣无声的挑衅，诸如此类才是他们真正所面临的挑战与威胁，因为这将带走廉租的男仆们。

埃里克鄙视这些如小说家E.M.福斯特所称的“粉灰”阶级，同样，他也发现自己正被缅甸人疏离。即便如此，理智上他还是认为这些被视为罪犯的人群更应被当作外来者侵略与占领的受害者。使他惊恐的是，有时候他发现自己也开始如对待劣等民族一样对待当地人，踢他们，用棍棒抽他们。这种恶心情绪不断加剧：“那些蹲在恶臭的上了锁的笼子里的囚徒，那些长期被恐吓得面色灰暗的罪犯，那些男人们被鞭笞的血肉模糊的臀部，那些女人和孩子们在他们的顶梁柱被逮捕时的哀号。这样的事情在你直接的权责之下，已经超越了可以忍耐的极限。”。他目睹了一次绞刑，作为人类同胞，令他震惊不已的是，当这名囚犯被架往绞刑台的时候，他竟可以若无其事本能地躲开路上的一个水坑。“这让我有些讶异，直到这一刻我才认识到毁灭一个健康的、有意识的人意味着什么……他的眼中还看得见黄色的沙砾和灰色的院墙；他的大脑还有记忆力、预见力和支配力，比如支配他躲开路上的水坑。他和我们同样是人类，我们走在一起，我们看到、听到、感受到，以及理解的是同一个世界；但是要不了两分钟，也就突然‘啪’的一下，我们中间的一个就撒手人寰了。”

为了避免陷入自我厌恶，埃里克开始塑造一个古怪的局外人的样子，在乡村的路上骑着哈雷摩托车；在杰沙的屋里屋外饲养鸡、山羊和猪；偶尔光顾仰光海滨的妓院。但强烈的内疚感折磨着他。前一秒钟他想朝着这些英国先生狂暴愤怒的脸上抡一拳头，下一秒钟他又想把拳头对准那些黄种人、棕种人、黑人，那些令他的工作无比艰辛的人。最令他憎恨的是，作为英国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他失去了自由意志。他已然变成了一名小暴君，不料，却也成不了这个体系的主人；他成了这个体系的奴隶，如同最微不足道的苦力一样——无人问津。

一次猎象的经历以最令人痛苦的方式让他完全领悟到了自己牢狱般的前景，他被派遣去射杀一头杀死了一名黑皮肤德拉维苦力的大象。如果场面更加令人惊恐的话，朝狂暴的猎物射上一枪原本应是件容易事。而这头大象仅是立在那儿，专注地往自己的嘴里甩着草束和竹子。显然，对布莱尔来说他并没有杀死这头野兽的理由，而周围围观的人群却期待着看好戏：

我突然明白了，我非得射杀那头大象不可。大家都这么期待着我，我非这么做不可；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两千个人的意志在不可抗拒地把我推向前。就在我手中握着那支步枪站在那儿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白人在东方的统治的空虚和无用。我这个手中握着枪的白人，站在没有任何武装的本地群众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一出戏的主角；但实际上我不过是身后这些黄脸的意志所推来推去的一个可笑的傀儡。我这时看到，一旦白人开始变成暴君，他就毁了自己的自由。

布莱尔开枪了。

我扣动扳机时，没有听到枪响，也没有感到后坐力——开枪的时候你总是不会感到的——但是我听到了群众顿时爆发出高兴的欢叫声。此刻——真是太快了，你会觉得子弹怎么会这么快就飞到了那里！那头象一下子变了样，神秘而又可怕地变了样。它没有动，也没有倒下，但是它身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变了模样。

大象不肯瘫倒，这令他感到惶恐不安，他再次开枪，终于，大象倒下，他将枪膛里最后的几颗子弹射到了它的喉咙和心脏部位，“我终于再也无法忍受了，就离开了那里。后来听说它过了半个小时才死掉……我常常在想，别人知不知道我射死那头象只是为了不想在大家面前显得像个傻瓜而已”。

他后来写，痛恨帝国主义，必须先是它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诚实一点，那么置身其中显而易见的是，即便是医生、护士和森林护员的任何善意善举都不足以弥补外来统治所犯下的罪孽。他时常怀疑，在整个腐朽衰败、岌岌可危的帝国里会有不少同他想法一致的人，同时也一样被困在了这个沉默的阴谋中。有一晚他坐火车，由于酷热难眠，开始与同车厢的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陌生人攀谈起来，甚至没能交换名字，他们都相互坦言对自己这份工作的厌恶，“之后数个小时，火车在漆黑如墨的夜晚颠簸着，我们抱着啤酒瓶，坐在我们的铺位上破口大骂大英帝国——发自内心而又机智透彻。这让我们两个都感觉很好，但是我们聊的都是些禁闭之言。憔悴的晨光中，火车缓缓驶入曼德雷，我们好像偷情的情侣那样愧疚地彼此作别”。

经过五年的服役，1927年，布莱尔休假返往英国，令他深信“那个邪恶的专制”是一日也待不下去了。曾经以强凌弱，曾经的他站在欺辱无望之人的恶棍的一边，今后再也不会了。1921年，他的父母已从亨利镇搬到了离萨福克海傍的绍思沃尔德——原本是个渔村，到20世纪20年代，这里建满了休假小屋，它们的主人多数是拥有印度殖民地背景的，从而也被称为“海边的西姆拉”。在那儿，母亲玩桥牌度日，妹妹艾芙瑞尔（Avril）开了一间茶室，他的父亲则无所事事凝望着大海。当憔悴不堪、蓄着胡子的埃里克·布莱尔宣布自己将放弃660英镑的年薪，义无反顾地离开警局成为一名作家的时候，料到老理查德·布莱尔的怀疑和沮丧。更糟的是，埃里克竟决定将自己从休假日到有效离职日期间的工资返还给警局。在他看来，那是黑心钱。

在缅甸，某种程度上说，他默认了自己的失败，如今，他是有意决心失败了。与许多像他父亲一样的人背道而驰，这样的失败如今似乎是唯一的成功可能。与他的缅甸时期所勾连的压迫统治仅仅只是整个社会控制之中的

一个症结，于英国于帝国都是有害无益的。若要动笔，他将开始为无家可归之人和失业者而写作，在20年代中期，这些人比整个20世纪的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困扰着英国经济的深层结构问题被短暂的战时繁荣所掩盖，但在20世纪20年代，大衰退以一种惩罚性的规模返来。一如既往，问题症结在于需求的萎缩。国内人口数量已在4000万上下，而英联邦的其他领土，即便是在印度被迫自行消费制成品的情况下，也都开始了自己的产业。20代末的纺织品出口仅处于战前的一半水平，1913年，英国出口了7300万吨煤炭，到1921年，已下降到了2500万吨，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萎缩，就像在剩余的20世纪里一样。当英国的制造业产出下降的时候，美国和日本的输出则在显著加速。矿主、造船厂和制造商开始通过减薪或延长工时保持竞争力，而不是考虑怎样提高的生产力，而且由于失业率迅速上升——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个数值从未低于10%——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足够满足他们对廉价劳力的需求。接踵而至的战前和战后时期使封锁与罢工变得越来越频繁，愈演愈烈。

1925年，温斯顿·丘吉尔直捣蜂窝，出任保守党的财政大臣，时年50岁。工业化时代英国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并没有缓和他一如既往火爆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此外，他所著的《世界危机》也没有抑制自己的这一看法，认为社会主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共谋，将破坏民主，毁灭整个帝国。这一痴迷使他陷入荒谬的境地。1927年在罗马，他高度赞扬了墨索里尼为反布尔什维克威胁所做出的激烈抵抗；在本国，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位“独立反社会主义人士”。当自由党于1924年1月宣布在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领导下，筹组第一届工党政府的时候，丘吉尔意识到自由党势力已经开始衰微，与他们为伍是自毁前程。还是有微小的迹象表明，一些重要又理智的人物——包括查尔斯·屈维廉，即自由主义泰斗人物第一任屈维廉爵士的孙子，以及时任帕斯菲尔德勋爵（Lord Passfield）和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西德尼·韦伯——宣誓就职，跻身政要，即将在英国发动一场布尔什维克革命。然而，正如他在1945年再次重申的那样，1924年，丘吉尔警告说，“工党政府的执政将为这个国家带来不幸，好比一场惨败将使一个伟大的国家招致陷落一样”。作为独立人士，在又一次竞选失利之后——这次竞选中，新任的保守党领袖斯坦利·鲍德温试图保他，却还是以43票之差落败——最终，丘吉尔接受了艾平（Epping）选区稳当的议席。他激动地抨击拉姆齐·麦克唐纳对苏联的贷款建议，“将我们的面包施舍给布尔什维克毒蛇猛兽，为所有异邦的外国人提供我们的援助，对世界各地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表达我们的善意，但对于那些横过洋跨过海，维系着英伦岛屿和国家未来的子女国，竟只是报以漠视、嫌恶和疏忽的冰冷石子”。

1924年10月，在保守党以压倒性优势胜出之后——尽管还保留了151名工党席位——在阔别20年之后，丘吉尔终于宣布再次投入了保守党的怀抱。在正式宣布之前，鲍德温就任命他为财政大臣，这令不少多年的忠实的保守党党员惊讶不已。他的父亲曾任职四个月，丘吉尔则是四年，然而，这却是杯毒酒。尽管重回保守主义阵营，丘吉尔还是想为自己一贯提倡的资本主义社会责任做出贡献。事实上他的第一笔预算是提议将退休年龄降至65岁、为寡妇提供退休金，并为纳税人口中的最低收入者降低10%的所得税税率。但他带领英国恢复自1914年就已停滞的金本位制的决策遭到了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反对，其在《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1925）一文中指出，这样的政策势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造成货币灾难，实际收入将不可避免地缩减。丘吉尔并未听从他的意见，仍然根据金价来确定英镑兑换其他货币的价值，仅仅只是按照工党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的决策行事。他果然照做了，同时，还为了迎合裁军的正统观念，压缩了军费开支！而事实上，丘吉尔的初衷是为了推翻斯诺登对金本位制所做出的承诺，他甚至还招募了凯恩斯为他的论点输送炮弹。尽管如此，最终还是被英国央行的聪明人和首相占了上风，对央行来说，金本位制将巩固国库的权力，而鲍德温则听从央行的意见。虽然剑桥经济学家休伯特·亨德森（Hubert Henderson）直截了当地警告过：“在今年恢复到金本位制对英国经济来说会是雪上加霜，贸易萧条将再次出现，还会严重加剧失业问题。”鲍德温告诉丘吉尔，这是政府决策。在这个节骨眼上，留给温斯顿·丘吉尔的选择是，要么转变态度，要么循着父亲的老路，返回老家，消失荒野。也许正是那些悲伤的回忆——（父亲）挫败的泪眼以及密匝匝蓄起的胡须——促使丘吉尔最终站到了鲍德温和央行那一边。

有不少鼓吹的溢美之词还展望了英镑坚实伟大的复兴，认为英国经济将挣脱桎梏走向现实。但超越帝国对英镑的迷恋，现实——正如亨德森和凯恩斯所预测的一样——令人震惊。将1英镑的价值高估到4.86美元的后果是，它导致劳动最密集产业所输出的商品与服务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更加衰微。物价和失业人数，不断冲高，而工资则在下降。在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如造船业，失业率已经接近30%；在巴罗因弗内斯，这个数值甚至高达49%。矿主应对不断深化的危机的策略仅是要求减薪并延长工作时间，而事实上更为糟糕的是，德国的煤田又恢复了生产；另外，工会在要求加薪并贴现煤炭价格。

出于对出现总罢工的可能性的担忧，斯坦利·鲍德温对产业主态度暧昧，拿政府津贴收买他们，以延缓暴动，直至皇家委员会开始调查煤炭工业的问题。休战协议达成，但1926年3月塞缪尔委员会报告的第一项建议竟是削减工资。工会对此的回应，如矿工领袖A.J.库克（A.J.Cook）所呼吁一

样，“一分钱也不能少，一分钟都不能多”。形势严峻。时任伯肯海德勋爵（Lord Birkenhead）的丘吉尔的老友F.E.史密斯，以其惯有的机智表示，在遇到矿业主之前，自己曾以为矿工领袖是他见过的最为愚蠢之人。此话得到了印证，1926年5月1日，矿业主宣布同盟歇业，英国工会联盟（Trades Union Congress，TUC）呼吁发动第三次全国大罢工。达勒姆主教（The Bishop of Durham）先是绞着双手，而后挥舞着拳头，宣称“英国已不再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正在向着无产阶级专政迈进”。

罢工只持续了九天。约有150万工人——90%是矿工——出来响应英国工会联盟。尽管人们见到的景象是牛津剑桥本科生开始驾驶公共汽车，但现实是，大多数罢工破坏者同罢工者一样，都来自工人阶级。最终，工会联盟还是做出了妥协，显而易见，愤愤不平的矿工们遭到了冷落。在这次“五月的九天”的罢工中，丘吉尔如指挥战斗一样调兵遣将，由部队输送食品供给；并创办了《英国公报》（*British Gazette*），将其当作政府的宣传喉舌运作，更多的士兵被调遣去维护政府宣传。有时甚至由坦克护送食物供给和保障《英国公报》投递工作，他还试图迫使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由里思勋爵（Lord Reith）创立于1922年——协助宣传播报政府公告和意见，然而遭到了公然抵制，这也是该机构在战斗中真正走向政治独立的一个转折点，而这，并不归功于丘吉尔。

直至5月12日，官方的罢工可能已经结束，但更为恼人的是已然存在的阶级极化问题。矿工们试图继续孤军奋战，但最终还是被迫按业主的规定重新返工。当帝国化学工业集团（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主席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Sir Alfred Mond）召集举办工会和资方之间的圆桌会谈，假模假样地送上茶水和三明治，并宣称富有良知与常识的人们终将达成共识的时候，强硬派采取了实质性动作。1927年颁布的《工业纷争与工会法》将所有旨在危害政府的罢工行为定为非法，如今，想要支持工党的联盟成员不得不“履行合约”，而非退约。法案一出，该党瞬间失去一大部分营业收入。在泰晤士河堤上，埃里克·布莱尔遇到了波佐（Bozo），一位从事温和政治漫画创作的“告地状者”，其中一幅就是关于温斯顿·丘吉尔的。“当财政预算上调时，我就画这幅丘吉尔试图推动大象的漫画，那头大象上写着‘负债’（Debt），在画面下方我写了句‘他真会预算这吗？’（Will he budge it?）你瞧见了吧？”埃里克看到了。波佐继续说道，自己不能画任何支持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是警方所无法容忍的。他曾画过一幅漫画，一条注有“资本”（Capital）巨蟒正在吞噬了一只注有“工人”（Labour）的兔子，警察见了朝他呵斥：“赶紧抹掉它！注意了！”波佐不得不抹掉，若不照做，很可能会被当作无业游民而受到驱赶或者关押。

1927年冬，埃里克·布莱尔混迹于社会底层，后来他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中写道，为自己在缅甸的五年帝国警察经历而赎罪的行为。他在破烂不堪的诺丁山，邻着一家手工作坊，租下一间廉价的一室户小公寓，开始了作家的新生活。在严寒的条件下，当双手被冻得麻木无法写作时，他只能将手指置于蜡烛上方取暖。这样的生活还算是优裕的，除此之外，每月30先令这样的悲惨经历在他看来才真正完成自己身份的转变，当然，在他面前，每日目之所及都是更深的深渊。在伊顿时，他就读过杰克·伦敦（Jack London）描写伦敦东区人民生活的纪事作品《深渊居民》（*People of the Abyss*，1905），最新读到的作品——新版的《前进黑暗伦敦》（*In Darkest London*，1926）——令他深受触动。此书是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的嫂子、《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记者阿达·伊丽莎白·切斯特顿（Ada Elizabeth Chesterton）送给他看的。皮卡迪利售卖火柴，每个认出她的朋友都惊骇不已；甚至花三个小时来打磨同一把门把手，仅仅是为了获得在收容站里睡觉的权利。在那里，她观察到，妇女只能饮用男士泡过的茶叶残渣，甚至是在那已经被浸泡过一小时或更长时间之后。因为只被允许在收容站住一晚，而且地点被有意安排得相隔甚远，切斯特顿太太步行了好一段路程，从尤斯顿（Euston）走到哈克尼（Hackney），关于这艰辛的一晚，她写道："我想我有点生气了。我觉得伦敦应该被烧毁。"

奥威尔跟随（几乎是复制了）杰克·伦敦和阿达·切斯特顿的脚步。在兰贝斯，他以1先令卖掉了自己的衣服，还换到了一套流浪汉的服装。"它们不仅又脏又没形"，还"因污垢的日积月累，透出一股铜绿色，都不能仅仅用破旧来形容了"。这对他来说是方济会灰衣修士般的时刻，剥去了他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的外衣，拥抱贫困，为其赎罪。一旦他觉得自己肮脏得面目全非，完全认不出是一位绅士，他就知道，自己已经上道了。在大街上，我的新衣服也让我遇到许多新鲜事，每个人与我说话的方式好似彻底变了样。有一次，我帮一位小贩收拾他倒翻的手推车，他咧嘴笑道："谢谢，伙计（mate）！"以前从来没有人叫过我"伙计……"

当晚，他在滑铁卢路的一家小客店过了夜，他与另外六个人共处一室，房间里透着一股"鸦片味以及肮脏亚麻布透出的腐味"，床单更是因为汗味而酸臭难闻，每隔20分钟就会有老人发出咳嗽声，"这咳嗽里夹杂着泡沫和干呕，仿佛这人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清晨的光线下，这场面更加不堪入目，奥威尔看到每三周才能洗上一次的被单，已经变成了"生赭色"，洗脸盆上尽是"又黑又黏的污垢，而且跟靴子一般黑"。他从普通的住宅公寓搬至收容站，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更脏。一度这令他乐此不疲，反之，很难想象会有另一个伟大的英国作家如此讲究干净，并拥有狗一般灵敏的嗅觉，能精确地辨认出这个肮脏的宇宙中所弥漫的可怕恶臭。这种体验越是令人厌恶，那他身上的帝国罪恶就会被清洗地更干净，

就像圣凯瑟琳喝下一碗脓水，以证明无人在她之下。

终于，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地方，这位收容站的圣方济领悟到了真谛：

这是一幅令人作呕的景象，那间浴室。每个人内衣上所有的不雅秘密都在此展露无遗，污垢，裂缝和补丁，代替纽扣缠绕着的线团，层层叠叠破碎不堪的衣物，有些简直就是由污垢和破洞粘连出来的破衣烂衫。热气腾腾的裸体，在室内挤作一团，流浪汉身上的汗臭味与收容站固有的粪臭味交织在一起。他们中的一些人拒绝冲洗身体，只是刷洗自己的“趾布”——那些浸着油污、难闻的破布条，流浪汉们的裹脚布。

两年来，布莱尔如库克般历经贫困之旅，包括在巴黎做了三个月的洗碗工，也流浪于伦敦及其周边地区。偶尔，他也会在伦敦的朋友家住上一两晚，甚至令人仓皇失措地出现在绍思沃尔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狰狞、憔悴。他与流动的散工们一起采摘酒花，直至双手被撕裂；用啤酒和威士忌将自己灌个烂醉，好让自己被逮捕，以满足在监狱里度过圣诞节的心愿；学习流浪汉的俚语；在伦敦的各处选择各种过夜方式，从泰晤士河堤旁的长凳（通常要在八点之前到达那里），到“两便士一晚”的长椅、四便士一晚被称为“棺材”的木箱子，再到最为奢侈的罗顿之家（Rowton houses）以及救世军旅舍（Salvation Army lodgings）。一日清早，他与一位名叫“帕蒂”的爱尔兰流浪汉一起，沿着老肯特路向南，朝着布鲁姆利走去。在一片草坪上——从那些烂报纸、生锈的铁罐以及疲惫的杂草可以看出，那是“标准流浪汉驿馆”——奥威尔在一丛艾菊花旁坐下，它们触鼻的芳香与流浪汉身上的恶臭格格不入。他看着两列小马队小跑而过，听着男人们谈论起他们的行程：牛津是“乞讨”的好地方，肯特郡则相当吃紧。闲话的内容从自杀的逸闻延伸到了各种历史碎片，真真假假掺和着，从“大起义”侃到“谷物法”，这一路闲话与他们相伴，如同拿来装旧烟头的罐头。

抛开关于体面的陈词滥调不说，奥威尔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甚至没有多少）流浪汉是酗酒者，更别说罪犯了。若不是政府禁止超过一晚的住宿硬性规定，他们甚至都不肯挪步。始于英国现代开端时期对漫游的浪漫崇拜与流浪汉的生活格格不入，而这一风潮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开始复苏。但对于像奥维尔这样的伪流浪汉，或者弗兰克·詹宁斯（Frank Jennings）、“流浪汉牧师”，更重要的是对真正贫困的回忆录作家来说，如特伦斯·霍斯利（Terence Horsley）——帕斯真戴尔战役的受伤老兵、电工，曾经从格拉斯哥跋涉至伦敦寻找散工，又败兴而归——漫步不是一项高尚的经历，采摘酒花也并非享用啤酒和调情的愉快乡村假期。流浪是对生活无情的碾压，那些身体力行的赎罪者们在身心上都被拖垮了。

1933年，当他的作品《巴黎伦敦落魂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第一次在伦敦出版的时候，署名不是埃里克·布莱尔，而是乔治·奥威尔。他也曾考虑其他笔名，如“H.刘易斯·阿尔维斯”，但由于奥威尔也是绍思沃尔德不远处萨福克的一条河流，很可能布莱尔——出于对英国乡村一贯的热爱——希望自己的笔名也能体现这英伦岛国的自然本性。此刻在他脑海里出现的人物不仅仅是杰克·伦敦，肯定还有威廉·华兹华斯，正是他通过独自漫步，途中邂逅各种穷困之人，来寻求与英格兰真正的秉性相生相融。所以，奥威尔的这些非虚构作品几乎全是与旅程相关的，这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兴起的一股巨大的出版风潮，但没有人会将他的经历与推动这股“旅程”风尚的其他作家相混淆——如H.V.莫顿。

莫顿的作品《寻找英国》（*In Search of England*）出版于1927年，也就是那年，奥威尔变卖自己的衣物，改头换面重新生活。这部作品的缘起，如文章第一句话中所述，是为了记录一次“环绕英国的汽车之旅”。因为汽车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均匀（剑桥郡每千人中有27人拥有汽车，达勒姆郡则是5人），事实上，这意味着显贵们开始驱车检阅骑自行车和架马车的人们。与束着裹脚布、穿着开了裂的靴子的徒步之旅不同的是，莫顿的游历是透过他汽车的挡风玻璃完成的。他会驱车游历英格兰（更确切地说，英国，因为之后相继推出1929年的苏格兰之旅、1930年的爱尔兰之旅和1932年的威尔士之旅），提出警告，城镇的粗野风气正在使乡村走向堕落，而这期间填充了他油箱的廉价汽油，则来自盎格鲁–波斯或缅甸地区。

他的书如同一曲关于“英国应许之地”的挽歌，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在拉贡达轿车里感叹：“我加速驶入一条林荫小道，英格兰就在前方，空气清新如美酒，嫩叶绿得如同音乐一般。”乡村令人震撼的美景时常会将莫顿引入一种宗教式的狂喜之中，他试图将自己变成有车一族里的拉斯金：“低云是靛蓝色的，如同风暴，高处的云朵则是柔软的粉杏色。西方闪耀着金光，乌云的边缘如同被蚀刻过一样，留下一条火一样的细线。景象变幻万千……阳光下的河面是一片沉闷的银色，一只乌黑的鸭子无声地游过；一只天鹅将颈部潜入水下，如同黑纸上的剪影，微风拂过水面，将几朵苍白的花蕾吹进草地。”真的，为那只鸭子感到惋惜。

尽管是在“寻找英国”，他的旅程并不涉及一些事物，比如工厂或受到污染的工业运河，更别说是收容站和七便士的流浪汉客栈了。莫顿所偏爱的地方一直是大教堂城镇（坎特伯雷、林肯、诺威治、约克、伊利、埃克塞特），或者集镇，最好两者兼是，如威尔斯——“我怎样才能向你描述水流过水槽的轻声细语呢，踩着老房子的台阶叮叮作响？”——在温馨的酒吧里，他的灵魂得到了缓解，锡器“光泽闪耀得如同平静水面上的月光”，和水龙头流淌出“红木酿造”的酒，最好的是那些拥有苔藓般记忆的地方，有幽灵穿废墟，游荡。在博利厄修道院（Beaulieu Abbey），他遇到了柴

郡小姐，她竟在这僧侣宿舍的废墟上，“独自生活了七百年”。在温彻斯特他看到：“透过时间长长的隧道，威塞克斯国王策马而过，那时英格兰还没诞生。”事实上，他不断看到并听到的事物，好似整个英国都已变成露天的杜莎夫人蜡像馆。一英里又一英里，在田间的天启般的时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田边休憩的时候，莫顿将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这怀旧之情。

当然，嫩芽里也包藏着蛀虫：在令人不快的20世纪，两类野蛮人不断壮大糟蹋了老天堂：美国佬和小混混。在莫顿的作品中，田园牧歌带来的狂喜与令人蹙眉的厌恶感交替出现，美国人正败坏景致，他们显得庸俗而扎眼，在德文郡的克利夫利，为了避免听到一位亚拉巴马州女大学生的惊呼（一切都“可爱得简直无以言表”），莫顿甚至想捂住耳朵。莫顿笔下的美国人讲着一种奇怪的语言，破碎的、不堪入耳的电影语言，被“老天”“当然”等词装填过度，油腻而冗长。他坚信（虽然牵强）“没有人比我更尊重这些美国游客”，言之凿凿，就如他的同时代人狡辩自己的一些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一样。别急！这些高嗓门的、滑稽的原住民还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历史。埃德加国王和亨利八世的幽灵以及朝圣者们（那时尚未成为美国人）受到这个地方圣灵的感召，聚集而来，美国游客对这一切的过去肃然起敬，迫使他们承认，尽管无视，他们最终还是真正地爱上了传统。

然而，对于破坏本国田园诗般美景的敌人，“大工业城市来的大型派对游览车”，名叫杰克、贝莉尔、道格、莫琳的这些人——他不抱希望。令人惋惜的是，乡村还是没能抵挡住这些不洁、无礼之人的入侵。“旧秩序如负了重税般奄奄一息”，销售的崩落，受到劳力费用和外国竞争的影响玉米种植成为不可能［成立于1926年的英格兰农业保护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Rural England），会将这曲挽歌转化为战斗的号角］。作为一个对于乡村如此关注的人，莫顿对农业劳动者的可怜处境只字不提：即便是能够找到工作，他们的平均工资从每周42先令减到了30先令；无数的农场被遗弃，谷仓倒坍；荒废的灌木篱无人打理，长成了杂树林；田间地头到处杂草丛生。至少大规模的失业率可能无意间带来了些许好处，确保他们待在自己嘈杂的小胡同和茅屋里，站在一旁等待领取救济金。但莫顿还是不能完全摆脱这些工业敌人。他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穿梭，“右边的天空被一层不祥的灰色阴霾笼罩，意味着曼彻斯特到了”，在这黑色的国度里，有那么一片刻，他为这浓烟滚滚而感到兴奋。在兰开郡，他所见到的英国人像阿拉伯人那样蜷伏着，煤矿工人们和他们的小灵犬，随后他看到了路标指示“威根”，有谁能够抵挡这一瞥“威根”？

当然，他也只是一瞥而过。作为案例，莫顿转述了一则已经不再时兴的音乐厅笑话：“威根码头，足以让观众大笑着咆哮。”它的罗马名

字，“Coccium”，激起了莫顿的兴趣，但事实证明，威根并不完全如他听闻的地狱之穴，并承认自己渴望将它记录下来。他看到半木结构的仿–都铎式建筑，这使他开始相信在今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威根可能会发展成一个（对制造业城镇来说）像模像样的地方。当他发现该地区在内战期间一直是坚定的保皇派支持者，这使他转变了看法，原来这不仅仅只是一个上帝所赐的煤田，令人惊讶的是，莫顿承认自己“不介意在威根度过一个假期——短假”。

九年之后，于1936年1月，乔治·奥威尔前往威根，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发现它不只是一个笑话。他记录了威根的运河堤岸：“混合着煤渣和冰冻的泥土，被无数木屐踩踏出纵横交错的脚印。四下，但凡有渣堆的地方就有‘反光’，那是陈年旧坑形成的死水潭……在这个世界里全然不见植被的踪影，除了浓烟、页岩、冰雪、泥浆、灰尘和脏水，别无他物。”

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魂记》还算小有成绩，（大约在英国售出3000本），矛盾的是，他意识到，这本关于英格兰弃儿的书只是记录了很小的一部分人口——数万人——而不是中部和北部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阶级，萧条的经济已经使那儿变成了真正的“悲惨世界”，这是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和斯坦利·鲍德温所统治的英国。鲍德温喜欢将自己表现得像行路手杖一样平实亲切（就像科贝特和艾姆公爵）。他对猪怀有强烈爱好，还写过一首模仿霍斯曼的抒情诗《关于英国》（*On England*），描写了耕地、从山上下来的农忙队，司空见惯的意象。但这正是这个时期，如果农民（与劳工一起计算，现不超过总工作人口的5%）想要维系生活，他们应是驾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山坡上种植的不应该是金色英国小麦的秧苗，而是甜菜——20世纪30年代为数不多的万无一失的赚钱手段。

莫顿曾表达过他的恐惧，认为麦田已沦落为煤田。穿过诺森伯兰，他希望装作这从未发生过，工业城镇“在历史和绿色无垠的田园的强大背景下，仅仅只剩黑色的斑斑点点，这就是真正的英国北部”。

另一方面，也有社会主义作家——如来自羊毛制造镇的布拉德福德的J.B.普利斯特里——开始直面工业时代英国社会所面临的灾难，书写“真实”。普利斯特里于1933年发表的《英国之旅》（*English Journey*）就是另一剂针对莫顿式乡村感伤主义的解药。事实上对英国来说，工业社会是“唯一”的真实，对于所有工厂车间和梯形街道显而易见的严峻形势，也不是一件坏事。从伦敦西大道白色锃亮的、由瓦片和玻璃建成的“新”工厂出发，普利斯特里开始了他的旅程，体验到了长途公车的舒适奇迹，竟然可以制造出这样东西。那是“弯铁和铆钢”，这才是“真实”，人类的工作。

在英格兰北部，普利斯特里感受到了可怕的沉寂氛围：“它可能是冷酷和丑陋的，然而，如果这河畔（泰恩河）是黑色的，并与浓烟与成千上万名

工人的喧嚣声一起沸腾，为了英联邦，为了体面舒适的生活和自尊，这于我来说，将会是欢欣鼓舞……”

他想将贾罗（Jarrow）旅游指南的描述，“一座繁忙的城镇（共计35,590居民）”，炼铁业和造船业兴盛，改为“一座空荡荡的废城（共计35,590居民，不知将何去何从）”。普利斯特里记得这里应该是圣毕德尊者的修道院城，那时，这是英国历史自我意识萌发的摇篮。现在似乎成了历史的坟墓。“整个镇子看起来好像已经山穷水尽，进入一场惨淡、永久的安息弥撒”，成千上万的人只是干站着，无所事事。在附近的赫伯本，他攀上一座废弃的船厂（鲁莽投机带来的后果），如今是一个“梦幻般的荒野，夹杂着腐烂的棚子，奇怪的土堆和凹坑，生锈的铁皮，旧混凝土和新草”。当普利斯特里到达河岸时，他能看到一列列闲置的船舶，腐烂成一堆生锈的废铁。在布莱克本，他曾经历一个棉花厂的拍卖会——当然，最终无人问津——他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奄奄一息的工业帝国等死的病床上。在西布罗姆维奇，他听到男孩们朝仓库投掷石块的声音，他感叹，“他们投石子，即便这石块砸碎了所有的玻璃窗格，我也不能责怪他们”。这声音如同临终前的喉鸣。

奥威尔对普利斯特里不太在意，曾经并不客观地奚落过他的作品，仅仅只是一个个感伤情绪的叠加，充满了平庸的逸事和舒适的家常。在奥威尔看来社会主义应该坚持直面工业英国的严峻问题——在南部——并大声疾呼：“做点事！”整体失业人数已从1932年250万人的高位下降到了四年后的150万，但它的分布惊人得不均：米德尔赛克斯占4%，巴罗（Barrow）或贾罗占30%～50%。正如普利斯特里所说，实际如今有三个英格兰（他完全可以轻松地说成“英国”）：老工业中心地带腐朽的残骸；然后是莫顿–阿尔比恩旷野的村落，所有石灰岩村庄偎依在天鹅绒般的山谷之中（一贯如此），百灵鸟遨游甜蜜的苍穹；当然还有新的英格兰——口红和汽车装配线，班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音乐家），光滑的丝袜和周五晚上的电影。

不知何故，英国的所有人同在一艘船上的象征性共识，在奥威尔看来是不够的。最具象征意味的姿态来自英国皇室，威尔士亲王被派至矿村，慰问险情，这一公关举动一出，药到病除，富有魔力。1935年年底，乔治五世的统治庆典被精心安排来体现民主君主制精神，人们拥戴的国王和女王坐在一辆敞篷的电动四轮马车上游览伦敦的东区。民众的热情令乔治五世感到震惊，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位朝臣曾斩钉截铁地同他确认过。同时还有他用低沉的男中音做了第一次皇家无线电广播，帝王的慈父形象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在另一个精心策划的皇室亲民举措中，乔治五世试图与英国的儿童做交流：“孩子们，此刻，你们的国王正在跟你们说话。”这容易引起他们注意，并坐起来乖乖听话。在临终

前的数个月内，平日里粗暴且沉默寡言的君王开始愉快地不断发表演说。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念着由G.M.屈维廉为他撰写的演讲稿——大英帝国是一个大“家庭”，伟大、光荣、不成文的古老英国宪政的最终后裔。

然而，就奥威尔而言，这古老的宪政并没为现今的兰开郡带来多少好处。所以，当他的出版商维克多·戈兰奇（Victor Gollancz），建议他去北方，写下他在威根的所见所闻，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揭露一个真实的英国与欢庆的庆典场面天差地别，他将这次经历书写成一次旅程，绝非随随便便的风俗之旅。《通往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为他带来了成功，招致了左右两派不少人的仇恨。保守派自然会驳斥它是布尔什维克宣传手册，而工会成员、汉普斯特德社会主义者们，甚至一些曾与奥威尔一同生活、工作和经营过书店的人，也认为此书过于凄凉、悲观，没有顾及塑造工人阶级英雄形象。

但是，对奥威尔来说，威根码头是他所要书写的文学样式的第一次示范：激烈坦率的政治书写，不像费边主义文章或工党立场文件那样枯燥，也不像神秘的、兴奋过度和天马行空的D.H.劳伦斯。最重要的是，他的写作是为了向坐在伊舍（或绍思沃尔德）的扶手椅上的读者呈现一个陌生的世界，那些“攀缘者”争先恐后地在炉渣堆里翻捡卵石大小的煤块；气味（特别在奥威尔闻起来）弥漫在运河上的黄色烟雾里；以及声音，在每个清晨黎明前的威根，当他躲在一家牛肚店上方的小床上，有木屐的铮铮声，将他惊醒。狄更斯在《荒凉山庄》的开头所描写了伦敦大雾，而奥威尔描写的则是覆盖在矿镇的一切人和物件上的烟尘与污垢：他的房东的手指按在待切割的白色早餐面包上，在柔软的白色表面留下一道黑色的指纹；在黄白色牛下水上爬行的黑色甲虫（对于配茶的佐餐来说太具有商业价值了）；当他下矿坑后，厚厚的烟灰覆在他身上像第二层皮肤，温水也冲洗不掉（当然，没有热水）。

一旦下了矿坑，奥威尔意识到，如果在威根失业代表着地狱的话，那么受雇用就是炼狱。每日唤醒白班的时间是凌晨3时45分，跟随着矿工，他弯下腰，或者说是半裸着爬行，通过4英尺高的通道下往煤层，有时会是几英里——一日他曾计算过，就好比从伦敦桥到牛津广场的距离——而这一天的工作实际上才刚开始。第一天，身高6英尺3英寸的奥威尔在他下坑的路上，被坑柱猛撞了下头，当他终于到达工作层时已经筋疲力尽，平日里一向坚韧的他，昏倒过去。

当矿工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已是下午2时30分，他们会回到排房，那在奥威尔看来应该已经报废多年。水槽里总是堆满肮脏的菜盘。罐头鱼、土豆、面包、果酱，还有奥威尔顾虑的人造黄油，这些被送上了桌，桌子上盖着一块肮脏的油布，这块布落在一张被老伍斯特郡酱染色的报纸经年累

月破旧不堪的表层上，脆得如同这油腻茶点上落下的面包屑。然而，矿工所经受的这一切使奥威尔感到恐惧，同时也更加钦佩他们，工人阶级家庭设法建设真正的家园，而这基石就是工作，他被威根真诚的慷慨和包容所感动，这包容甚至延伸至像他一样怪异又窥探的陌生人："有趣的是，不是现代工业的辉煌胜利，不是收音机、放映机、每年出版的五千部小说，也不是阿斯科特赛马场的人群，或者伊顿和哈罗公学的比赛，而是对工人阶级的记忆——尤其是在战前我童年时代，英国依旧昌盛之时——才令我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毕竟不算太糟。"

奥威尔《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的使命是迫使不同阶级的英格兰人能够互相直面产生碰撞。然而，由于出版该书的是维克多·戈兰茨奇的左翼图书俱乐部，要想让那些穿着费尔岛毛衣、驾驶小车、阅读莫顿的人与他一起去往威根那些被烟尘涂覆、培根浸腻的厨房，或许他的愿望终会落空。但是，对"老英格兰"的有权阶级（市政厅、议会、法院），更不用说"新英格兰"的有钱人（报业人士、郊区走班族、车库主和百货商场的销售人员），他想让这些人认识到：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不然，一贯以来对于神圣英国宪政和不可侵犯的自由帝国的一厢情愿终将何去何从？是自由选择接受一份削减的救济金，还是撵走一名老妇人（经济情况调查人员会告诉你她只是无业游民，尽管可怜，但就是他们拖累了你每月的津贴）？

最令奥威尔关切的是这怨声载道背后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英国。1929年拉姆齐·麦克唐纳组建的第二个工党政府，由斯诺登再次出任财政大臣，工会领导人J.H.托马斯出任掌玺大臣，不合实际得渴望着回归到维多利亚时代所有的经济规范：黄金本位、通缩、平衡预算和公共节俭。当英镑不可避免地出现贬值，政府宣布财政赤字，麦克唐纳和斯诺登政府一直坚持J.H.托马斯等人所提出的预算削减作为贷款的条件。1931年8月，他们准备结束劳工政府，加入以鲍德温为首的保守党与自由党，组成三党"国家行政"。只有一位劳工部长，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能够有魄力地来支持凯恩斯提出的解决方案，使用大量的赤字融资，降低失业率，并投于基础设施建设。但他未能找到出路，1930年5月，由于在下议院受到攻击并被驱逐，他辞去政府职务，成立了他的"新党"（New Party）。

1936年3月，在约克郡采矿小镇巴恩斯利（Barnsley），奥威尔去听了莫斯利的一次演讲。此时，"新党"已经成了英国的法西斯主义黑衫党。莫斯利，被100个黑衫党人簇拥着，而这些人将一名质问者揍得奄奄一息。他仍坚持支持凯恩斯主义的公共开支政策，也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赞不绝口，因为这两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对"神秘的国际犹太人帮派"恶言恶语，认为他们是造成萧条的罪魁祸首，如今还为工党提供资金，对工人来

说是双重背叛。令奥威尔感到沮丧的是台下群众的反应，从一开始嘘声四起，结束时他们却一起为莫斯利鼓掌。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奥威尔——拥有几乎与丘吉尔一样孤立无援的历史直觉——意识到一场不可避免的战斗即将到来。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与自由理想，另一方面则是法西斯主义。它们迟早会交锋。鲍德温政府面对英国穷人的苦难时所采取的鸵鸟政策使一切都显得如此紧迫，它是在对即将到来的更严峻的危机的拒绝。1936年12月，在独立工党的支持下，奥威尔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民兵（POUM anarchist militia）的军官去西班牙支援西班牙内战，他想证明自己是一位战士，而不是一个作家。他与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社会主义者截然不同，对他而言，这些人只不过是道貌岸然的空谈家，毫无行动力。终于，当他开始参加共和军预备役士兵训练时，他那值得炫耀的历史背景——伊顿公学青年团和缅甸警察学院——令他左右逢源。反常地戴上了改良过的巴拉克拉瓦帽以及几乎是他见过的最长的羊毛围巾，由于身材高挑，非常显眼。最终，在韦斯卡（Huesca）郊外，奥威尔的颈部中了一枪，这颗子弹奇迹般地偏过了他的颈动脉和脊椎，而这种伤口的死亡率（考虑到当时的基本医疗护理环境）几乎是80%。尽管这次受伤对他的声带造成了伤害，使得他很难再大声叫喊，但奥威尔幸存了下来。他对社会主义团结的信念，特别是当伪装成“人民阵线”时，并没有存活下来。在巴塞罗那，他目睹了左翼激烈的内部斗争对共和军造成的破坏。共产主义者，受到莫斯科指令的驱动，似乎更热衷于追捕如无政府主义者之类的异端分子，而不是对抗弗朗哥将军领导下的法西斯主义者。

回到国内，他对官方左翼的狂想曲感到厌恶，对苏联的厌恶感更甚。当他试图描写真相，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如大多数人所看到的那样，而是有更多的共同点，其实共产主义不过是站在了“右翼的最右边”，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左翼台柱刊物的拒绝，例如《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共产主义作家、批评家如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以及共产党的总书记，破口大骂，训斥奥威尔为“中产阶级小男孩”，曾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短途游历过，出来时回到了帝国主义的那一方。当奥威尔的作品《致敬加泰罗尼亚》（*Homage to Catalonia*）出现于1938年的时候，它被视为射向左翼阵营之间相互残杀的内战的一发子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奥威尔已经开始盘算如何以一种通俗易懂受欢迎的方式来宣示同样的警告。“我从西班牙回来之后，就想通过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它要能够被几乎每个人所容易理解……然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个故事的实际细节一直没有能够在我的脑海中成形。后来终于有一天，在我当时居住生活的一个小村庄里，我看到一位小男孩，10岁左右，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从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过，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这不禁让我联想起，如果这些牲口能够确知自己的能力，我们就无法驯服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如同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动物庄园》（*Animal Farm*，1945）那时已经开始在

奥威尔的脑海里萌芽，在赫特福德郡鲍多克（Baldock）的一座叫沃林顿（Wallington）的村子里，他与妻子艾琳（Eileen）在一个冰冷的农舍里定居下来，在他的小农场踱着步，而咳嗽，是他一直无法摆脱的，那是他后来得肺结核病的开端。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可能也无济于事，但他仍然可以在信件里这样开场：“亲爱的杰弗里，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很高兴你在丹麦过得很好，但我必须承认，这是为数不多的我从来没想过要去的国家。”在1937年8月针对《新政治家与国家》上的一篇军事回忆录的评论中这样写道：“克罗齐耶将军（General Crozier）是一名职业军人，正如他所演出的一样，在1899—1921年，不断地屠杀自己的同胞。然而作为和平主义者，他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在一次救世军大会上，表现得如同一名从良的窃贼。”

当奥威尔在村子里养山羊和鸡并且试图让人们了解战争的徒劳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在自己位于肯特郡无比昂贵的乡间别墅附近狩猎，可能只是略微会为帝国建设的政治无能而沉思。靠近韦斯特勒姆（Westerham）附近的查特韦尔（Chartwell）庄园被丘吉尔匆匆买下，当时的价格还算划算，而他的《世界危机》也有了不错的进展。他找来了建筑师菲利普·蒂尔登（Philip Tilden）让房子增添了几分新詹姆士一世时期风格的外观（这意味着更大），并充分利用庄园周围的迷人景色进行改造，使大餐厅朝南可以看到肯特起伏的乡村景致。当它完工的时候，查特韦尔庄园已经足够大到可以充当丘吉尔替代政治法庭，如之前他设想的一样——9间接待室、18间卧室、8间浴室；接着，在温斯顿寻求征服的阶段，建起了一个户外游泳池；还有一个养着观赏鲤鱼的精美池塘，每天他戴着小礼帽仪式性地亲自喂养它们，发出奇怪的声音；尤其是花园露台角落的一个小亭子，他曾在里面画过画，有点孩子气的关于伟大的马尔堡战役的画面。

这个亭子对于温斯顿来说定是一个重要场所，他可以坐下来酝酿他的过去和未来，或两者之间的困难且重要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被他称为自己的“荒野岁月”，他的“流亡”时期。虽然在议会中作为艾平议员他还保有议席，但自从1929年工党政府上台后，他开始了为期10年的离职生涯，直到1939年9月3日，“二战”爆发前夕，他才被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传唤回海军部。十年固然漫长，但这期间丘吉尔并不空闲也没有特别孤独，尽管他同保守党的权利与直接影响力是隔绝的。这一时期一直有丘吉尔忠实的朋友和追随者光顾查特韦尔庄，被丘吉尔称为“教授”的牛津哲学家弗雷德里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依靠他提供的统计数据来辨认可怕的时事动向；他的助手、年轻的记者、律师兼保守党国会议员布伦丹·布拉肯（Brendan Bracken），报业巨头伯维尔布鲁克勋爵，居住在附近的国防部工业情报主任德斯德蒙·莫顿（Desmond Morton），以及其他一些为他的武装反攻运动输送了更多弹药的人。

除了这些人还有其他人受到了丘吉尔的热情款待：源源不断的香槟、一桶桶红葡萄酒、丰盛的午餐、咆哮的对谈、半搞笑的脾气。如果在查特韦尔度过的是他的流放时期，那这些年也是一个相当交际昂贵的年份，这一点使丘吉尔夫人克莱门蒂娜长期经受折磨。庄园养着9个室内仆人、3个园丁、2个保姆、司机，更别提帮助丘吉尔写作的私人秘书与研究助理了，这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服侍这位命运之子也不是总是愉快的。丘吉尔时而粗暴且蛮不讲理，时而贪心时而侮辱人，有时两种情形同时出现。他的作息对那些不习惯的人来说简直一场噩梦：早晨长时间躺在床上，裹着他金绿颜色的中国晨衣，报纸周围夹杂着果酱和甜瓜；每日9根“哈瓦那”雪茄里的头一支；在早餐和午餐之间计划决定剩下的时间做什么（另一支雪茄；许多威士忌和水里的头一杯）；相当油腻的午餐；随后一到两小时强制性的午睡；之后起床，面色红润，在地面漫步，兴致勃勃地像杜尔利特医生（Dr Doolittle）一样跟他的许多宠物交谈——猪、两只狮子狗、黑天鹅和鱼；抬着游客参观最新的进展；或在马尔堡亭俯瞰山毛榉、奶牛和朦胧的天际，沉思；然后是每日两次沐浴的第二次；晚饭前更衣；晚餐喝更多的香槟和红葡萄酒；之后，以一种令大多数人咋舌的方式，丘吉尔将进入一个晚上真正工作，在凌晨两三点结束。就是这样的作息贯穿了他的整个30年代，以及他的战争岁月。

几乎所有的时间，他用来进行历史写作：《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1930），一本关于过去的政治领导人的文集；关于马尔伯勒公爵的四卷传记；到了1939年，在牛津毕业的研究助理如比尔·迪金（Bill Deakin）等人的帮助下，完成了50万字的《英语国家史略》（*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1951—1956）。尽管肯定需要钱以避免破产，但为了维持他华丽的生活作风，他拒绝紧缩开支，拒绝开除身边的随从，历史在30年代对丘吉尔来说比收入更为重要。历史给了他精神寄托，以及挥之不去的疏离感。朋友和敌人都为丘吉尔在一段时间的自我调控惊叹不已，毕竟每天的新闻似乎都在宣示着不好的消息，就像地毯从脚底被拉出一样。任何在政治上头脑清醒的人，都会在这个不稳定的局面里谨慎行事，在做出任何举措之前非常仔细地计算得失。此时，丘吉尔和其他政治家一样有着同样的倾向，权衡利弊，当然他也不乐意摆脱权力的中心。时间不是他的朋友。在他当时这个年龄，只有查特韦尔更多的池塘，等待着他挖掘。

但他的历史写作，有时被误解作为政治无能的万能药，恰恰相反：是驱动他的勃勃雄心以及政治确定感的引擎。回顾“岛国”和帝国的悠久历史，丘吉尔没有迷失在浪漫幻想里，他的脑子是清醒的，给他提供了掌控力与明确的方向，未来将需要做什么。他写的一篇关于罗斯伯里的文章，更适合应用到他自己身上：“往昔唾手可得，那是他最信赖的顾问，学习与历史一直伴随着他，运筹帷幄，为时事带来了一股古老威严的氛围。”

《马尔伯勒》的片段“被非洲阳光晒成古铜色”可能是他最纯粹的自传：“在马尔伯勒看来，将他的家庭升至第一等级的重要性仅次于英国成为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重要性，没有理由证明这两个过程不能结合在一起。他不懈的勤勉和努力，他深刻的洞察力和算计，他随时准备投入——不仅是他的生活，还有他所有的声誉和财富——到战争的危难时刻，精心备战，随时效忠他的国家。”

然而，退后一步观察英国历史的伟大走线，尤其是联盟和帝国的历史都开始萌发的安妮女王时代，为丘吉尔提出一个严重的悖论。海岛帝国的命运及它与欧洲的牵连——特别是在他所诞生的维多利亚世纪往往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但丘吉尔的历史告诉他，实际上历史从来不是这样，事实恰恰相反。英格兰以及之后的英国能够最多参与欧洲事务的时候，才是这个帝国曾经最辉煌的时刻：马尔堡战役；老威廉·皮特与法国的全球竞争；以及他儿子小威廉抵抗法兰西共和国扩张主义的决心；即使是在迪斯雷利跃入狡诈的东方外交的19世纪70年代。英格兰本土主义意味着皇室的自我消解、帝国的削弱。丘吉尔深信，“大英帝国”的“大”（Great）可能也会从这个字眼里消失，联合王国，到最终，也许注定会崩解。

正是这种历史得出的信念使丘吉尔在20世纪30年代重返政坛，乍看来，这时的情势是矛盾或者至少说是不切实际的：考虑到军备调整、皇室对印度的过度自信。他对帝国反动好战的态度破坏了他作为欧洲未来权威人物的信誉。但是，在丘吉尔的思想中，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者密不可分。不知是否因为麦考利在克莱武和黑斯廷斯的文章中浸泡了太久，抑或由于沉溺在自己关于宾顿·布拉德和马拉坎德战争的回忆里，丘吉尔对国会民族主义兴起的反应是过时且不自制的。劳工政府试图承认印度国会武装，并暗示了其最终的自治领地位（即帝国内的自治），这受到了丘吉尔反击，认为是面对叛乱做出的极其可悲的投降行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国家的联邦联盟，共同履行效忠君主的承诺，在他看来只有在真正的纽带形成时才能成立：共同的民族血统和语言，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换句话说，就是同为帝国的白种后代。

英国权力（或许该称之为“强制力”）可以以某种方式演变得更为亲和的想法——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强大到足以构成真正的共同效忠——在丘吉尔内心深处感到不以为然，这与他知道的一切人类本性相悖。但当然，这正是麦考利在1833年的演讲中所提出的伟大承诺：在一个合适的时机，这种语言、法律和文学的纽带终将实现并促成这一转变。事实上，麦考利曾更进一步设想，这样的关系将最终将比刀剑更加强大。这正是当下这个21世纪所赎回的承诺——虽然与麦考利预料的方式相去甚远——写在了伟大的印度英语文学的每一页上。但是，文化纽带也可取代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丘吉尔无法想象的。这可能不仅仅是帝国也可能是英国自身的最终结

局。他在1930年说："失掉印度，将标志并促成大英帝国的毁灭，这个伟大的有机体将会像得了中风一样瞬间土崩瓦解，成为历史，这是一场灾难性的毁灭，没有回天之力。"丘吉尔，一个如此相信文字力量的人，竟是这样的文化失败主义者，这是他最悲哀的失败之一。

1931年，时任印度总督，欧文男爵——当年曾在丘吉尔手下任职的爱德华·伍德，也是后来的哈利法克斯子爵——从监狱释放了甘地以及其他30名国会领导人，使他们能够参与关于印度未来的谈判，丘吉尔怒火中烧。他关于甘地的著名侮辱性言论从未被印度遗忘并原谅："这是一个令人震惊且感到恶心的场景，看到甘地先生，一位参与煽动的中殿律师，如今假模假样地扮起了东方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身体迈着大步登上总督宫的台阶……与帝皇的代表谈判起了平等地位。"

虽然在班加罗尔他曾阅读麦考利，但丘吉尔显然没有读过（或者忘记读）麦氏1833年的演讲，大英帝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刻，同时也应该是其负责任进行自我清算的一天。他似乎也已忘记了自己的言论，发表于1920年，在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之后，以及自己对戴尔将军进行的调查，那时他认为英国不能也不应该希望单靠武力来统治印度："这对大英帝国来说是致命的，如果我们只是尝试在它之上立足。英国的做事方式……一贯意味着或暗指与该国的人民建立密切有效的合作关系。"事实上，丘吉尔仍然信奉维多利亚时代的真理，认为广大印度的人民群众对英国的统治是满意的，并且认为他们被一个非典型的"煽动者"团体可耻地误导了。要消灭他们，必要的话拘留他们，这些挑衅的百姓很快就会消失。当然，这也是他针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看法，但丘吉尔最终还是接受了自己理论的空洞，达成和解。

如果他像普利斯特里一样去过布莱克本，并听过工厂工人对"都胡提棉花"注印度市场消失的感叹，丘吉尔还有可能对甘地强大的大众动员力量表示更多的尊重。他或许也会明白为什么甘地象征性"半裸"。他抵制进口布，呼吁用手工纺织的土布替代运动宣传。伴随着其他印度制成品不可阻挡的增长趋势，彻底、不可逆转地改变了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于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不平等条款。这同样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教训，但却不知何故被丘吉尔遗漏了：在英国人来到次大陆之前，印度已经开始生产印花布了。事实上，英国人最初去印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购买那些印度棉布。只是英国权力成了对经济必然恢复的阻碍了。

像许多曾经在拉贾短暂服役过的人一样，丘吉尔也可能高估了英国的政府、警方、军事实力，尤其是在面对像甘地这样真正的群众运动的时候。虽然他在口头上承认英国的"合作"模式，可能他脑子里浮现的是"应负责任的"英国皇室以及大资本家，而不是数以百万计的办事员、税务人员和邮

政人员，受议会感召离开他们的办公室，拥有可以几乎在一夜之间关停印度政府的能力。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将任何形式的选举权限制在不超过10%的人口手中，英国政府实际上促成了这个政治国家在官方渠道之外寻求表达的趋势。经济歧视助长了皇权，同样也发动了怨声载道的引擎。如果1930—1931年丘吉尔在印度，那么他就会目睹甘地为了打破英国对盐的垄断而发起的伟大的甘地海边大游行；甚至，如果他知道盐的问题成了这一不平等的殖民帝国关系之间的核心问题的话，那么也许他会改变自己对甘地的看法，就像他对待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一样。但是盐，除了出现在他的午餐鹿肉上之外，很少在他的脑海里得到重视，相反，在威斯敏斯特，他对国家政府，更甚乎远在印度的欧文男爵，对处理挑衅者问题表现出的软弱态度进行了抨击："英国雄狮，往日是如此凶猛而英勇，在面对大决战的创痛时，无所畏惧且战无不胜，如今却在自己的昔日辉煌的领地与森林中被兔子追着跑。我们自己的力量并没受到严重削弱，症结在于，我们正遭受一种意志疾病，我们是一次神经崩溃的受害者。"

丘吉尔竭尽全力反对英国政府在1935年的印度法案里做出的印度省级自治承诺，这也将他推向了强硬右派的阵营，这些人向来对他们"亲爱的教区牧师"——斯坦利·鲍德温持怀疑态度，认为他无论是在面对工会还是印度反政府武装的时候，都是一名软弱妥协者。当该法案由多数的400对84投票通过立法院的二读之后，丘吉尔表现出了他平常的宽容，以及一种务实的自我保护态度，并有意识地宣布放弃这个问题。但他的儿子伦道夫仍然以反印度法案候选人的形象参与了一场选举，最终落败。温斯顿长期激烈的密集公开反对主张也致使他对英国承诺印度自治本身的诚意提出严重怀疑，毕竟，如果丘吉尔有一天能重掌政权的话，甚至可能会担任外交大臣？

当然，温斯顿斗牛犬一般铮铮有词的反政府言论并没有提高他在绝大多数保守党心目中的地位。他现年60多岁，大多数把他看作一个过了气的政治人物，太爱炫耀，太大声，过度沉溺在里维埃拉美好生活和负担不起乡村奢华里，最糟糕的是，对他自己的声音太过迷恋。鲍德温的描述不无道理，总结了许多人对丘吉尔的看法："当温斯顿出生时，很多仙女从他的摇篮上俯冲下来，为他带来了礼物（天赋）——想象力、口才、勤奋、能力，接着，一位仙女对他说'没人有权利得到这么多的礼物'，于是把他抱起，又摇又晃，以至于在所有这些天赋中，他被剥夺了判断力和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乐意在下议院听他发表演说，却不愿接受他提出的建议的原因。"

丘吉尔关于帝国命运的尖锐的危言耸听也意味着当他发出对德国威胁的声音的时候，大部分下议院的议员都只是调低音量不以为然。这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议员都对第三帝国的野蛮属性无动于衷。早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震惊且反感，如英国驻柏林大使霍勒斯·隆堡爵士（Sir Horace Rumbold），他立即意识到，新政权不只是另一个普通意义上无足轻重的独裁政权。隆堡此时已经读过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1924），并相信它。他告诉政府，很可能，希特勒打算从德国驱逐全部犹太人口。他退休前（这也许是绥靖政策兴起的看不见的转折点之一）试图以一个外交部官员所允许的最强烈的态度告诉白厅（英国政府），德国是由一群不完全“正常”的人所管理的：“我们中许多人确实有一种感觉，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异想天开的流氓和怪人已经占了上风。”

但对于许多执政阶层来说，包括《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Geoffrey Dawson）认为希特勒只不过一小块难以消化的肉，是绝对正常的，或许他的国家得到妥善处置他就会变得正常。撰写过官方欧洲历史的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士（Sir John Wheeler-Bennett），坚持认为这位大臣是讲道理的，“公正地渴望使德国再次受到国际尊重，并且他自己也渴望获得承认”。与其他更多的“古怪”人物相比，如社会宣传家朱利叶斯·斯特雷谢尔（Julius Streicher），或花花公子赫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希特勒无疑是“他的党内最温和的成员”。而且，若他果真崛起了，那也是在国内的公共消费方面，况且，难道德国崛起就没有合理性吗？它肩负着大战的罪责；因为在欧洲和非洲剥削领土而经受惩罚；一直背负着巨额赔款，这造成了经济崩溃与普通的德国国民无尽苦难；被剥夺了主权国家拥有武装力量的基本权利。更何况，围绕在它周围的都是军事硬件林立的国家，也难怪它感觉到“被包围”。1933年，当德国同时退出裁军谈判会议和国际联盟，该行动只被视为一个国家可以被理解的政策，经受多年的屈辱，希望恢复其应有的主权。1936年3月，德国直接违反《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重新占领了莱茵兰，这也被简单地看作是恢复全部领土的主权的做法，无可辩驳的古老的日耳曼领土。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英国人的反应不尽相同（也有些许例外），有人耸耸肩表示漠不关心，有些人则彻底对德国的政策表示同情。牛津大学希腊语钦定讲座教授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尽管后来成为一名反绥靖者——让人们了解：“经验告诉我，从某种特殊的程度上说，他们是在任何西方国家里存在的一种危害性元素……我完全理解德国对这些人的态度，并充分表示赞成。”

希特勒本人就是富有魅力甚至令人着迷的人物，远超过人们对他的反感。有一大批访客络绎不绝涌向柏林或者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回来时对他所创造的奇迹表现出极大热情，他曾为德国锻造出高速公路、大众汽车、清洁的城市。最令人沮丧的是大卫·劳合·乔治宣称他为“在世的最伟大德国人”，并对《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的读者滔滔不

绝："（希特勒是位）天生的领袖……引人注目充满活力的人物……神秘和富有远见的混合……超然物外追求灵性升华的人物"，是英国需要发展的亲英派盟友，对大英帝国表现出尽可能的友好。劳合·乔治唯一的遗憾是英国没有像他一样有才干的领导人。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当时认为希特勒与圣雄甘地难分伯仲，两者都是滴酒不沾、素食主义、向往和平的人；报纸大亨罗瑟米尔勋爵（Lord Rothermere），信誓旦旦将他称为一个"完美的绅士"；当德国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告诉内阁秘书托马斯·琼斯，他们的元首真的就像鲍德温先生一样，是一位腼腆谦逊的人，一位温和的艺术家，琼斯没有放声大笑，而是信以为然。甚至丘吉尔——在整个30年代一直是墨索里尼的温和崇拜者——赞扬了这位领袖的"温和而简单的举止、冷静的作风、超然的风度"，看到历史上的许多强权人物正是通过强权手段上台，在1932年，他认为也许希特勒也终将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位，一位德国爱国者的优秀典范。1932年为写马尔伯勒传记，丘吉尔在巴伐利亚进行研究之旅，差点有机会在慕尼黑与希特勒会面。反而是希特勒，由于被告知丘吉尔的亲犹太人的立场，认为这次会面是一个坏主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对大英帝国的钦佩是完全合格的。他曾告诉哈利法克斯说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傲世军魂》（*The Lives of a Bengal Lancer*，1935），因为电影里刻画了一小群的白人男子将海湾以及整个次大陆成群的有色人种掌控在自己的刀剑之下。萨维尔街（Savile Row）游行队般的景象——衣着讲究的绅士们招摇地穿过住宅，引得人羡慕，没有理由不导致希特勒相信，在英国政府和第三帝国之间确实可以达成共识，毕竟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不冲突的。正如冯·里宾特洛甫告诉哈利法克斯的一样，德国希望在东欧能有一只自己的"自由之手"，同时允许英国保护并促进其在亚洲和非洲的发展。还有什么比这更整洁或更和谐的呢？在伦敦，冯·里宾特洛甫像一位演奏家一样声张自己的论调，发掘着在他看来英国政府处理得过于心肠仁厚的问题。在1938年吞并奥地利之前，许多政界和党派人士为法国与小东欧国家结盟的判断失利表示遗憾，在德国领导下所出现的东欧"重组"既是不可避免也是无害的。毕竟在欧洲东部，一个强大德国的存在将是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缓冲，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应知道，那才是自由真正的威胁。

德国在东部的战略计划，不管是什么，当然不值得英国人再冒一次泛欧战争的风险。在这一点上，鲍德温和张伯伦的政府的确是符合绝大多数英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主张的。最后一场"一战"的记忆仍然是血淋淋的创伤。如果在身体上留下物理性伤口，那么心理创伤经证明更难愈合。经历过战壕的恐怖的人，如今是最热心和平呼吁者，不惜任何代价。事实上，其中一些退伍军人，如《水獭塔卡》（*Tarka the Otter,*1927）和《鲑鱼萨拉》（*Salar the Salmon*，1935）的作者亨利·威廉森（Henry

Williamson），对此坚信不疑，以至于他们之后成了法西斯主义者。但对和平的热切渴望没有被左右两派政权权力垄断。周到的人，如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和H.G.威尔斯对普遍裁军（如果可能的话国际性裁军）深信不疑，将冲突政策留给国际联盟领导下的国际安全部监管。

虽然被贴了标签（特别是被希特勒），当然，丘吉尔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战争贩子。他也在近战中目睹过战争的残暴，理解其造成伤亡的规模和本性，和哈利法克斯或张伯伦一样，也想阻止另一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深深地感到悲伤，正如他一再重申的一样（尤其是在他的回忆录中），欧洲历史上所有的战争中，这场可能是最容易被制止的。但早在1933年他就领悟了纳粹政权的本质——也许是因为他的女婿邓肯·桑迪斯（曾担任霍勒斯·隆堡爵士的助理）所提供的报告——它肯定不会被政府出于内疚而做出的逢迎政策而阻止。英国若能够与德国进行正式谈判，那不如真正从实力上进行比拼。

丘吉尔坚持不懈的大肆鼓吹，一直持续到军备重整。从第三帝国的早期开始，他就决心揭露其残酷的本性，特别是对那些假装这是一个会服从基本国家惯例政权的人，尽管招人厌恶。丘吉尔的寻求异议言语是戏剧性的，他的观众们翻着白眼，在背后嘟囔“老温斯顿又来了”。丘吉尔讲道：“自从那些野蛮的日子以来，嗜血的哲学……以一种空前的方式注入了他们的青。”并不夸张。他的语言也相当忠实地呼应了纳粹党人自己的语言崇拜，尤其是在面对青年运动和精英民兵时。盖世太保的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自称为博学的人种考古学家。纳粹领导下德国人只不过是在寻回民族自尊心，这样的观点在丘吉尔看来是可怜且天真的：“所有这些强健的条顿青年团体，游行于德国的大街小巷，欲望之光在他们眼中闪烁，报效国家……他们不是在诉求身份地位。他们正在寻找武器。”在犹太人问题上——另一个在下议院看来有点不礼貌且无关紧要的话题，丘吉尔同样也态度坚决，关于对犹太人的“可怕、冷酷、科学的迫害”，他说道，“从富裕到毁灭，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被剥夺了赚取每日面包的机会，在穷困潦倒困苦的寒冬被剥夺了救济金，他们的孩子在学校被嘲笑……他们的血液与种族被玷污且诅咒，浓缩于人类身上每一种形式的丑恶被投射在这些人身上，通过压倒性的权力，通过卑鄙的暴政”。

当然也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如工党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以及（最重要的是）外交部常任副秘书长万斯塔特勋爵（Lord Vansittart），与丘吉尔持有相同的意见，有时候会直言不讳。但越是接近任何形式的权力，他们就迫不得已越要守口如瓶，毕竟国家采取的是绥靖政策。丘吉尔的道德谴责也收效甚微，他不断要求国家严肃考虑重整军备武装，维护国家利益，而这个利益首要的一点就在于基本的自我

防御。在他的亲密伙伴“教授”林德曼的影响下，丘吉尔开始相信下一场战争迫在眉睫，并且对平民的大规模空中轰炸在所难免。（考虑到德国空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空中实验，如对格尔尼卡的轰炸，没有什么可以打消他的顾虑。）在林德曼的指导下，他想象纳粹对伦敦进行持续性空袭轰炸的景象，将会是世界末日般的。60天的袭击将造成至少6万人伤亡（这也是整个战争期间的平民死亡总数），并致使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数百万人可能会混乱地涌向乡村。丘吉尔自己的飞行经验——短暂，无疑加重了这些场景的戏剧性想象。而正是他们在德累斯顿、东京和广岛的盟军，将会回以如此规模的烈火风暴。

丘吉尔认为避免这种可能性的最佳举措就是跟上德国飞机生产的步伐，他知道的这个数量已经快速超过了皇家空军。他估计德国人生产的飞机总量是英国的2.5倍，这与实际数值是相当接近的。可能他在外交部或中央情报机构的良好信息来源，为他提供了一些这样的信息，也许是德斯蒙德·莫顿，此人也深深反对绥靖政策。鲍德温自己实际上也是致力于军备重整的，但只想以一种平静的方式展开，他不想留给希特勒任何加速军事化的借口，而这可能导致情势无休止的升级。另外，丘吉尔其实想让潜在的敌人注意到英国官方军备调整的态度，以及普通和平时期与实际战争之间过渡的事态。他认为，政治拖延与否认的政策特征是致命的。他在下议院的一次讲话，或许为这一悖论添了把火，他认为政府只是“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下决心时优柔寡断，该坚决时摇摆不定，团结时如一团散沙，强大到无能为力。我们准备着迎接更多珍贵的、或许对英国至关重要年与月，来为蝗虫们提供口粮”。丘吉尔接收着由自己的线人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一些来自英国皇家空军内部的消息——如皇家空军中队长C.F.安德森，他不断使鲍德温丑态百出，致使他调整了自己之前对飞机数量差距过于乐观的预判。在1935年11月的大选后，鲍德温的防御政策迎来了最低点，这位首相以一种用他自己的话说“令人震惊的坦率”的口气（不无道理），告诉下议院，如果他去全国各地，并告诉他们德国正迅速重整军备，“这太平洋民主联盟”将永不会允许他上任，那么所有人将何去何从？当他一结束演说，丘吉尔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告诫了他，自己一向认为决定首相政策的应该是对国家的领导能力，而不是选举时机。

在1936年德国人重新占领莱茵兰之后，没有反对意见，似乎丘吉尔的观点逐步获得更多的势力，如鲍德温所推测的一样，即使国家尚未准备好撞下舱口做好准备拉响空袭警报器。是年秋天，阿尔伯特音乐厅举办了一场大型的重组武装集会。张伯伦、塞缪尔·霍雷爵士（Sir Samuel Hoare）和安东尼·伊登，分别时任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采取了守势。但就在这改革的关键点上，丘吉尔犯了一个非常严重不可饶恕的错误。乔治五世在当年早些时候去世，温斯顿如今张扬地支持爱德华七世赢取辛普森夫人（Mrs Simpson），并且保持王位。对于温斯顿的反绥靖的朋友和盟友

来说，这不仅仅是中心事件的一个奇怪的插曲，还相当难堪尴尬。但是，丘吉尔一贯对君主制抱有浪漫的依恋感，况且与爱德华八世是长期的老相识，这都促使他赶往救援。当然，他自己也是半个美国人，虽然大部分时间会为富人和名人的打情骂俏感到不解，他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关注一个国王和一位离婚者之间的结合（当然在他们相好的初期并没有离婚），认为此事自相矛盾。最后，丘吉尔比爱德华自己更为热心于国王的事业。这场危机给了鲍德温收回他所有的财富的时机，他感激地欣然接受，表现出冷静的政治家形象，出现在宪政危机之中，在一个国王到另一个国王之间谨慎得管理着主权归属的痛苦道路，相反，丘吉尔不过只是一个荒谬和不连贯的口出狂言的家伙。当他起身痛斥鲍德温对国王的明确替代方法时（与辛普森夫人离婚或者放弃王位），他几十年来的第一次淹没在反对声里。

1937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取代了此时已经精疲力竭的“亲爱的教区牧师”（斯坦利·鲍德温）出任首相，丘吉尔准确地预感到张伯伦是一位比鲍德温更加热衷且有原则的绥靖主义者，他又来劲了。在鲍德温、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一个标准的保守党人形象，或可以称之为一种英国特色，丘吉尔对此是熟悉甚至是喜欢的（虽然在张伯伦这儿被拉伸了一点）。鲍德温就是一个稍微让人昏昏欲睡英伦乡村美德的化身：坚实、聪明、宽容、大方，不仅不易怒，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发怒的。像他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继续为1914—1918年那场战争所造成的灾难而痛心疾首，并向自己和他的国家承诺，这些罪恶永远不会重复。“它的记忆，”他说，“使我们厌恶。”这是因为英国并不为异端的增长提供沃土，它必须受到保护，以避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击，如此，英国的差异性、国家“财产”，才会传至子孙后代。

哈利法克斯，高大、消瘦、英国国教教徒，强烈忠于约克郡，莱特尔顿狩猎好手，著名的骑手——尽管有一只枯萎的手臂，相当精明，这点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一致认同。他花了一辈子从事这样或那样的公职，为自己不讲任何废话而自豪，修辞的废话背后审时度势，确切地知道该在怎样的时机如何为权力的车轮添油。在印度，他认定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事实确实如此，极力避免使自己失去勒琴斯辉煌的总督府，他是第一个占领那里的人，总是准备采取一切措施来保持与皇室的联系，现代人将它称为“英联邦”。而另一方面，张伯伦，代表了帝国的中产阶级商业与市政的美德，尽管他父亲的豪宅——海布里，距从一开始助其上台的螺丝制造业、天然气和自来水业的市政激进主义相距甚远。多年来，似乎他那位更贵族化的弟弟奥斯汀看起来更像一位合适的保守党领袖，特别是外务和帝国贸易一向是他的专长。此外，内维尔仍然保持了这样的形象（认为这是忠于他的根基的）：首要的任务是改善地方政府，特别是教育，对大街上的绅士、律师或银行经理所希望看到的一个保守党首相所要作的决策拥有强大

的直觉。这对张伯伦来说（鲍德温也一样），就是维护和平。

虽然不完全出于自己的个人经验，丘吉尔当然了解这个英国，这个马术比赛、村落学院、小镇教堂、铜管乐队里的英国。但是与其他政客不同的是，丘吉尔坚持认为，若继续迁就霸权独善其身的话，这样的英国绝不会存活太久。就像他的门生保守党议员杜夫·库珀（Duff Cooper）所说的，就是将拥有250年历史的英国与一权统治下的欧洲相对立。丘吉尔在1934年11月的BBC广播中对此更加生动地进行了表达："有人让我们忽视欧洲大陆。让他们自己继续仇恨并备战，让他们炖自己的血，继续他们的争吵，判令其自身的灭亡……，只有当我们可以让英伦岛屿远离他们岩石地基，可以将他们横跨大西洋拖至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时……或许这还算是个好计划……"

然而张伯伦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孤独主义者，反倒是一个很热心的人要指点希特勒使他理智起来，给他推销欧洲的和平"安排"。1937年年末哈利法克斯已经去过德国，戈林在柏林举办盛大的狩猎展览会，哈利法克斯作为政府的猎狐者履行了他的职能。不列颠已经赢得了所有海外奖杯的战利品——所有的捻角羚和羚羊。冯·里宾特洛甫也提到了这点，一定是它激起了哈利法克斯相信，如果和德国做个交易让它在欧洲想干嘛干嘛，而让英国也在帝国范围内为所欲为恐怕是要受到牵连的。1938年3月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了，德军坦克在兴高采烈的人群面前驶过维也纳的大街，这种订交似乎变得越加急迫，特别是希特勒又在叫嚷说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北部苏台德（Sudetenland）地区约300万德意志人处境艰难。当这种叫嚷变成了要求用武力把苏台德地区合并到德国里面去的时候，张伯伦开始了一连串的穿梭飞行，想要平息这个危机。张伯伦工作的核心是说服捷克放弃该地区而不做其他任何抉择，虽然这个合并要求有辱他们的主权；又说服法国人接受这个计划，本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时候，法国人是这个国家主权的共同担保人之一；张伯伦还要说服希特勒本人相信他可以不诉诸军事行动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最后一项当然是不难推销的买卖。

1938年9月，在贝希特斯加登两人相互说了一些无意义的玩笑话之后，张伯伦和希特勒好像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在莱茵兰地区的拜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第二次会面期间，希特勒突然开始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和波兰人聚居地应该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里分封出来。张伯伦虽然觉得不快，事实上相当的恼怒，却还是迁就了希特勒；特别是英国驻柏林的新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害怕惹恼希特勒，警告说不要做任何事以免挑起、搅乱或激怒这个为一点小事就会大发雷霆的元首。但是有一个时刻，常识占了上风，加上鼓起了勇气，哈利法克斯觉得事情闹够了决定这样做足以引起内阁反抗张伯伦，坚持要让希

特勒信守贝希特斯加登协议的内容实质，并且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军事袭击的情况下，英国和法国要考虑这就是针对他们的攻击。

1938年9月末的一个星期，希特勒的马刀挥得霍霍作响，一点也没有减弱的样子，看起来要开战了。大规模疏散的临时计划加快进行。27日，张伯伦向全国做了一个广播，传达了不愉快的消息，但也没有要大家打起精神预备战争："真是可怕、不可想象、难以置信，"他缓慢庄重地说道，"因为一个远方国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们之间在吵嘴，所以我们要开始挖战壕，试试戴防毒面具了。"乔赛亚·韦奇伍德上校（Colonel Josiah Wedgwood），曾经是工党议员，好斗的反绥靖主义者说张伯伦不过是在吓唬老太太，这样当他和魔鬼做了交易回来，大家能把他当作沉默的强人英雄向他致敬。"会打仗吗，亲爱的？"在电影《效忠祖国》（*In Which We Serve*，1942）里，西莉亚·约翰逊（Celia Johnson）问驱逐舰船长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我想八成会打吧，"他回答说，"还没到跟前的事儿不用愁，等到了跟前就愁不起来了，真的。"

当然，28日张伯伦给下议院报告情况的时候，接到塞缪尔·霍雷的一张便条，就中断了他自己的讲话（或者据说是），宣布他接受了希特勒的邀请要去慕尼黑。有人在后排议席上吼叫："谢天谢地我们有首相！"很多人欢呼，挥舞着议事日程表。下议院、工党、保守党的议员都站起来给张伯伦热烈鼓掌，惹人注目的是除了丘吉尔、他的朋友利奥·艾默里和安东尼·伊登，后者在几个月时间里都在狙击自己的同僚，之后就辞职了。然而，后来丘吉尔的确走到张伯伦面前祝他走运。张伯伦去了德国，不必惊奇，他在那里真的说服了希特勒——他不必做任何不愉快的事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虽然（张伯伦）又是取得了一个非凡的外交成就而凯旋受到公众瞩目致意，这可不像打牙祭了。10月1日，捷克人被告知他们要向不可避免的情况低头，从苏台德地区撤回他们的边防军，这样德国军力可以长驱直入。当然，他接着说，如果捷克人"够疯狂"要抵抗的话，他完全理解元首就别无选择只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方了；但是他能在乎一下不去轰炸布拉格吗？哦，希特勒说，我总是尽我所能避免伤到平民的——又加了一句说他最恨小孩被毒气弹炸死。就是啊，就是啊。然后张伯伦掏出一张令人难忘的伪善无用的神圣的绥靖主义临时凭证，上面写着英国和德国彼此永远不会开战，还保证用协商解决所有任何困难。希特勒伸手去拿笔的时候也许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见。

张伯伦回到国内，被当成了欧洲和平的救星。他在黑斯敦机场（Heston aerodrome）欢呼，手里挥舞着工党政治家休·道尔顿（Hugh Dalton）说的"《我的奋斗》上撕下来的一片纸"。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张伯伦左右分别站着国王和王后，下面的大群人唱着《因为他是个快乐的好伙计》（*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在唐宁街10号门外，也是同样情形。张

伯伦从楼上的窗口露出脸来，露出一次不冷漠的微笑，他问随员他应该向欢呼的人群说什么话，得到的建议是讲1878年迪斯雷利从柏林回来时候说的话。“我的好朋友们，历史上第二次，”张伯伦宣布，“一个英国首相从德国光荣地带回来了和平，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接着他告诉大家回去“睡个安宁的好觉”。在法国，对于这一死缓刑期，绝大部分公众舆论同样欢欣鼓舞；为了感谢他使这个国家免遭战火涂炭，《巴黎晚报》（*Paris-Soir*）为他提供法国境内一条里面有许多鳟鱼的溪流；在《星期天图摘》（*Sunday Graphic*），贝佛利·巴克斯特（Beverly Baxter）写道“因为内维尔·张伯伦，我儿子生活的世界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个时代我们将不会看到欧洲再武装起来像野蛮的熊一样厮打”。

在这一片狂欢中，有几个孤独的例外，尤其在伦敦外围：司考特的《曼彻斯特卫报》和《格拉斯哥预言报》（*The Glasgow Herald*），把慕尼黑（协议）叫作“强制执行的勒令”。海军大臣杜夫·库珀辞职了，因为他要求重新开展军备被拒绝了，他写文章说，张伯伦相信希特勒可以用甜言蜜语去应付，他却认为带锁子甲的拳头是更好的策略。历史学家泰勒写信给库珀说感谢他证明了“在这个全国受侮辱的时刻，还是有一个英格兰人不负气节坚持原则，以及我们从前伟大的名声”。另一方面，屈维廉一直仰慕鲍德温（特别是对鲍德温的乡村情怀），这时候全心全意地在背后支持张伯伦及慕尼黑（协议），对这种“战争呼声”表示痛惜，相信为了“波西米亚”而要牺牲英格兰是疯了。

在下议院辩论的最后一天，10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不设防的残缺国家，丘吉尔做了一场带着不朽的悲剧力量、到那时为止他的职业生涯里最打动人的演讲。丘吉尔奚落张伯伦，声称他使得希特勒在拜德哥德斯堡发布“撤回”的声明，讽刺说“顶着手枪要一英镑，拿到手后再顶着手枪要二英镑。最后独裁者满意地拿了一英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其他的折合成一个对未来的善意承诺”。（当然）他是援引了《盎格鲁–萨克森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里埃塞尔雷德国王尝试买通丹麦入侵者的悲伤故事，然后说出了令人不愉快的真相：“我们现在身处一级强度灾难中。”法国赖以生存的东欧联盟系统已被扫除。张伯伦想要英国和德国人民之间的和平，这个目的没错。

然而，英国人的民主和纳粹强权不共戴天……纳粹宣扬侵略和征服，从迫害中夺取力量，享受邪恶的乐趣。我们都已经看到它无情的残暴，利用谋杀来威胁。我发现不可忍受的是这种感受：我们国家在强权面前堕落进纳粹德国的圈套和影响之下，我们的存在变成要仰他们的鼻息。

他说，为了预防他已经尝试过敦促及时重新武装起来。可是“无济于事”。丘吉尔反对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坚持德国现在已经“满意了”不会再提出领土要求，他预言短短几个月后政府会被索取更多领土、更多自由。接着他

变得更像预示世界末日，说承认那些就意味着在英国要开始审查制度，因为没有人会被允许反对这类决定。

到那时候有什么解决办法？唯一的依靠就是通过取得他一直在要求的优先制空权“重新夺回我们旧岛的独立”。丘吉尔注意到，这时候已经是勋爵的鲍德温说过他愿意“明天”就组织生产；他没有放过这位前首相，那当然很好，“但是我想如果鲍德温勋爵在两年半前说这话就更好了”。英国“勇敢的人”在看起来延迟到来的灾难面前如释重负还庆幸窃喜，他也没有对他们感到不满。只是，丘吉尔在自己的结语里说，他们应该知道真相：

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没有开战，却已经吃了一个败仗，它的后果会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伴随我们很长时间，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经过了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整个欧洲的均衡被打破了，当时反对西方民主制的可怕言语说出来了：“你已经被称过了，发现你分量不足。”还有，不要以为这是完结了，这只是清算的开始。这只是第一口，这将是一年年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杯，除非我们能重新崛起，绝对恢复道义健康和军事活力，然后像古时候那样立场坚定地争取自由。

1938年，张伯伦政府的圣诞贺卡上是一张首相飞机在云层上飞去慕尼黑的照片。3个月后，1939年3月14日，简直就像验证丘吉尔的可怕预言一样，德军坦克开进了不设防的布拉格。一开始，张伯伦还在谈论和平，可是当他觉察到托利党后排议席突然强烈抵制，又在《每日电讯报》上读到了严厉的攻击，最后他决定要站出来说话了。3月17日，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讲中，他表示自己非常震惊和沮丧。31日，他向下议院宣布英国和法国政府正在给予波兰保证。波兰是希特勒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他表面上说要但泽克港口（Danzig），现在叫格但斯克（Gdansk，否则通过所谓的波兰通道Polish Corridor，拿到港口就从陆地上封锁了波兰去波罗的海的通道，这个通道是分开德意志主体和东普鲁士的，在“一战”后设立）。假如波兰受到攻击，英法将要支援。这个援助在物流上是不可能抵达洛兹（Lodz）或华沙（Warsaw）的，这就意味着在西欧开战。但张伯伦表面上转向采取坚定的联盟政策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他相信这个承诺发布后就足以阻止希特勒了，那么这个保证永远也不需要付诸实施。

8月23日宣布的纳粹和苏联互不侵犯协议是晴空霹雳，把这一设想化为青烟。没有苏联配合，英法的保证好像是一纸空文，没有威慑力。希特勒认为它是虚张声势，而且（判定）真的要践行这一纸承诺的时候，英法两国都不会真的和他开战。1939年9月1日，借口在格莱维茨（Gleiwitz）的一个德国电台受到攻击，德军对波兰同时在地面和空中发起残暴打击。英国驻德大使向柏林政府相应地递交了一个“照会”，说如果德军不马上撤回的话，英国和法国将会按照承诺做。第二天，下议院气氛凝重又意志坚决，大家盼望听到宣战的消息。相反，他们迎来的是张伯伦的拖延，他建议如

果通过意大利调解，德国撤回军队，可以维持9月1日的原状，召集法国、波兰、意大利、英国、德国代表会谈。大家一片惊愕。这其实当然也是希特勒的主意，在最初的愤怒爆发后，他想着再开一次慕尼黑会议，他又能不用开战就得到他想要的。工党和一些托利党人都不胜惊骇。保守党议员利奥·艾默里冲着工党领袖阿瑟·格林沃德（Arthur Greenwood）喊出来一句要命的话："你快替英格兰说话！"格林沃德开口了，群情激愤。他讲完的时候，响起一片欢呼声。像往常一样，只有自己人发出威胁性的抗议了才终于使得张伯伦打消了要妥协的最后尝试，那天晚上后来他同意把一个要在9月3日上午11点作废的最后通牒"条子"交出去。然而他最大的反应是自己丢人了，他回复下议院说这是"可悲的一天，对我来说更可悲"。当天11点过几分钟后，张伯伦像一个发布某个老处女姑奶奶去世的消息那样在无线电里向全国通告。"没有接到任何诸如此类的承诺，因此我们就是和德国宣战了，"他不自禁地又加了一句，"大家可以想象这对于我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在电影《效忠祖国》里，海军水手肖迪·布莱克（Shortie Blake）听到这个广播后说："这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银行放假的消息。"

几乎紧接着这个广播就响起了空袭警报：2分钟的哀号。然而当警报解除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改变。天上没有掉下炸弹；也没有大的响动，不像1914年那样一片捶胸顿足和爱国主义的叫嚷吵闹。歌曲《英格兰将永存》在秋天流行，罗斯·帕克作曲的这首歌听起来好像逆来顺受，还不如啦啦队来劲；一切都那么压抑，笼罩在阴影里。灯火管制命令下达了，电影院和剧场都关闭了（当然除了敢于公然表示轻蔑的淘气包温德米尔，这里的姑娘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为英国摇旗呐喊）。拦截气球——银色的、金色的，甚至有诡异的紫罗兰色——晃晃悠悠地升到空中去了，好像是一个没人愿意参加的派对广告。然后小男孩女孩们以及不那么小的男孩女孩们成千上万的——有些穿着自己最好的法兰绒短裤，有些从斯特普尼、索尔福德和斯旺西的斜坡街道上来，有的流着鼻涕也有一点脏兮兮的，还有的住家主人们发现也很顽劣——在火车站和公交站排队，被送到不受空袭威胁的乡村去。

超过300万英国人——不只是孩子们被列入特别优先清单的，包括一些医院的病人、重要的政府官员，还有BBC的综艺演播，甚至比林斯盖特海鲜市场重新安排到乡下了。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代表了普利斯特里说的不列颠三个特点的大融合——古老乡村、现代电动的和过度工业化——那么1939年的疏散是这种民族重新认识活动的第一个行动。随着富丽堂皇的家宅向公众开放，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紧张。埃弗兰·沃在他关于这场令人烦恼的战争的绝妙讽刺小说《伸出更多旗帜》（*Put Out More Flags*，1942）里描述了窘困的伦敦人礼节。贸易部主席奥利弗·利特尔顿承认自己不知道工人阶级好像这么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愤怒的格拉斯哥母亲冲着小女孩嚷嚷说不要在贵妇人的漂亮沙发上坐而要按照人家告诉她的靠墙站着，这个

故事成了一个大家爱打趣的逸闻。而那些幸运地遇到了良心发现的有产阶级的孩子们发现自己挺喜欢这样。一个14岁的孩子在剑桥写信回家，说“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食物，如鹿肉、野鸡肉和野兔肉，还有其他我们买不起的奢侈品”。然而当时间从1939年年底进入1940年的时候——这个冬天非常冷，泰晤士河都结冰了——还没有空袭，也没有入侵，约31.6万人被送回家去了，政府下令说只有等空袭真的发生以后才会再次进行疏散。

尽管在虚假战争的不真实的这几个月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发生，很多英国人还是希望能制止它。9月3日以后的5个星期里，张伯伦收到了1860封来信敦促他这么做。他自己也这么觉得“我是多么地痛恨厌恶这场战争，我从来就不是被任命来做战争首相的”。其他人更悲观，但决心也更坚定，其中有一个就是乔治·奥威尔，他有点吃惊地发现自己又成了一个爱国者。

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宣布的前一夜，乔治·奥威尔梦到战争已经开打了（这个梦，或者说噩梦，也许是很多想象力不如奥威尔的英国人都会做的）。自从西班牙回来后，他已经花了好几年时间谴责即将到来的战争，即使他知道战争或多或少已经不可避免。1939年6月他的《上来透口气》出版了，但很少人读过，里面有一个反英雄保险推销员乔治·鲍林（George Bowling），矮胖秃头的大战退伍兵，渴望摆脱沉闷的生活，回到自己长大的乡村市镇“下宾菲尔德”去——一个有现烤馅儿饼、河中水草深处藏着大黑鱼的地方。鲍林说：“钓鱼和战争是相反的。”不用说，他发现下宾菲尔德几乎真的已经彻底面目全非：一个到处是廉价咖啡馆、加油站、连锁店和塑料的俗气地狱。这是奥威尔最老套的田园情调，他在哀叹早先英格兰的消失，他的语气和英格兰乡村保护协会的创立人克拉夫·威廉–埃利斯在《不列颠和野兽》（*Britain and the Beast*，1937）一书里叹息的口吻一致，那本书的编辑有威廉·埃利斯，还包括屈维廉、E.M.福斯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些人全都同样刻板的、对高压电线塔林立的现代社会场景表示了沮丧。

然后，突然，奥威尔转向了不同的航向。大约在慕尼黑的那段时间开始了一个左翼读书俱乐部会议，一个年轻的理想化的反绥靖主义者站起来，做了一个丘吉尔式的反抗演讲，鲍林告诉他，“小子，听着，你错了。1914年我们以为会是一场光荣的战事，可是，它不是什么荣耀，它就是血腥混乱。如果又要打仗，你别卷进去，你干吗要全身插满铅？留着你的好身板给女孩子用吧。你以为战争全是英雄主义，我告诉你它不是那样的，你知道的那就是三天没得睡，你就和臭鼬一样了，你屁滚尿流，双手冷得握不住来复枪”。但是后来鲍林听到一个傲慢的绥靖主义者说的话：“希特勒？那个德国人？我的伙计，我根本不去想他这回事。”他感到恶心从沉默的怒火中爆发：“这真是令人作呕，差不多每个体面的人谁都不想拿个扳手

把人脸敲碎，不会保卫自己，不会反对直冲过来的东西，因为他们甚至就连自己眼皮子底下是什么也看不清。他们以为英格兰永远不会改变，以为英格兰就是全世界，他们就是不懂英格兰只是炸弹还没有炸到的被人遗忘的地方，一个小小角落。”

但那是慕尼黑之前，是布拉格被占领之前，是在奥威尔做梦的第二天吃早餐读到纳粹和苏联的互不侵犯协议之前。这时候，正如他在1940年写的《我的国家向右还是向左》（*My Country Right or Left*）里承认的，他发现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一个爱国者，虽然他又急着说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没什么关系，“同时忠于张伯伦的英格兰和忠于明天的英格兰（他的社会主义英格兰）好像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一个日常现象的话”。直到这一天，他承认，“它让我觉得有一点点负罪感，因为我在唱《上帝保佑国王》的时候没有站起来致敬。当然这是幼稚的，可是我很快就有了这种教养，和左翼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见识太高超了，不能理解这些最平常的情感”。因此虽然有很多原因——他的肺，他的伤——好像没有人要他去战斗，但等到战争来了的时候，乔治·奥威尔毕竟也准备好了，尽其所能地抵抗希特勒。

当然丘吉尔没有这样的犹豫疑虑需要克服，在德国人占据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后院后，以及张伯伦变心后，丘吉尔尽全力支持首相，以为可以赶快着手军事准备了。后来春季在查特维尔，反绥靖主义者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发现他已经行动了，地图堆起来有膝盖那么高，秘书，紧急电话，战略草稿：当别人都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只有他一个好像在挂帅了。丘吉尔会如愿得到行动指令的。宣战那天，张伯伦为了向公众舆论和非绥靖主义报纸特别是顽固的托利派《每日电讯报》发起的运动表示妥协，给丘吉尔提供了海军部海军大臣的职位。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海军部给舰队发电报说：“温斯顿回来了！”

当然这也可能是那些政府里对丘吉尔冷眼相看的人希望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在海军部自断后路，而且事实上他们这么想也没有错得太离谱。因为当丘吉尔又戴上大檐帽的时候达达尼尔海峡的记忆又回来了——但再也不是惩罚性的教训，而是作为一个可能发生什么的困扰人的碎碎念例子。“如果只有”在丘吉尔的脑海里盘旋，就像“只要我那时候在城堡里有恰当的后备军力援助海军的攻击”。事实上，他从来也没有放弃在敌人最薄弱而不是最强环节袭击对方的基本战略原则；而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寻找轴心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北非、希腊、西西里——结果各有不同，却都是决定性的。他的第一个直觉，简单地说就是封锁挪威水域，不让德国得到他们军火生产所需的瑞典磁铁矿。这意味着冒犯瑞典和挪威的中立地位，他才不管呢。

假如当初这个行动成功了，这一事实也许会被略过。但是在令人害怕地重

犯了1915年同样的一些错误之后，事情没有如计划般起作用。在很多次延误之后，1940年4月实施了这次远征，但是并没有把德军遏制在海湾里，倒是正好给了希特勒一个借口，希特勒早有防备，英军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丘吉尔要飞去巴黎说服法国人也协同进行这个计划，在挪威海域布雷的事被耽搁了，这延误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使得一小股德军到4月7日站稳了脚跟，然后令人难堪地挫败了英军登陆。结果显示，丘吉尔计算失误了，战列巡洋舰的暴露给了空中打击的机会。整个行动搞砸了，到了6月，英军在纳尔维克（Narvik）的唯一的实质性的桥头堡也被放弃了。

作为海军大臣，丘吉尔也许该受指责，可是不知怎么，他逃脱了责备。也许这起码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已经开始在无线电上做广播演讲，已经稳固地塑造了一些个人形象特质——诚实、坚定、专注——正是这些在后面的战争期间提高了公众的士气。但是在下议院托利党绝大多数还不喜欢他，在工党议员中喜爱他的就更少了，因为工党很多人还对远到大罢工甚至托尼帕蒂的事记忆犹新。他在下议院的有些演讲，即使在他的支持者如哈罗德·尼科尔森听来好像也是在踩高跷还是笨手笨脚的，需要给出明确信息的时候他却在用干巴巴的雄辩术回避。在民间，丘吉尔和张伯伦的对比却是越来越鲜明，特别是因为张伯伦（开始经受痛苦后来知道是胃癌）在战争中退缩了，可是好像从来也没有从个人失败的阴影里恢复过来。另外，丘吉尔已经争辩要武装反抗第三帝国，他已经为自己平反了。

等到5月7日在议会辩论挪威惨败的时候，工党不满占了上风，远不只是反对立场被不满搅怒了，“这不只是挪威，”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在辩论中说，“挪威是很多不满的顶点，人民在问为什么那些对指挥事情负主要责任的人几乎没有中断他们失败的职业生涯。”越来越多的托利党人（虽然还只是一小批）也明白了，在寻求方法看看工党是否愿意接受全国团结的主张。丘吉尔个人还是顽固地忠于政府，听任别人利用他，像劳合·乔治不怀好意地说丘吉尔“好像一个空袭掩体使得炮弹碎片炸不到同僚身上”。但是他（丘吉尔）的老伙计们已经按捺不住。利奥·艾默里，正常情况下是一个沉默的反绥靖主义者，通过引用奥利弗·克伦威尔打发残缺议会的著名讲话终结了众人对张伯伦的战争领导控诉：“你们在这里坐得太长久了，你们什么用处也没有。离开吧，我说，让我们和你们玩儿完吧！看在上帝分上，走！”辩论中还有其他出乎意料的事，最吓人的是海军元帅罗杰·凯耶斯爵士身穿全套元帅制服进来了，好像在说（僵硬的上嘴唇使得大家听不清他的话）海军被命令在挪威不要发挥作用，因为他们被告知陆军正在建立奇功。

突然，一个略显沉闷的议会宣言（张伯伦固执暴躁地以为他不需要这样做）变成了政府玩忽职守的军事法庭。工党前排议员决定分裂下议院，简单地说是动议休会，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回忆，当他们进入对方投票厅登记

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和穿着制服的年轻保守党成员们混在一起了，接着又有41个托利党人弃权了。清点投票结果的时候发现政府多数派只剩下81票了，张伯伦离开下议院的时候“滚滚滚”的声音一路跟随着他。一个托利党议员开始大声地唱起“统治吧！不列颠”。

面对张伯伦的试探性询问，阿瑟·格林沃德和工党领导层明确表示要他们在战时联合政府机构里服务的前提是不能由他领导。只有两位严肃的候选人可以（当此大任）了——哈利法克斯和丘吉尔，但工党没有提出他们倾向于哪一个。丘吉尔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个很可疑的人，还有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因为托利党里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工党以为这个活儿是要派给哈利法克斯了。那他们也不介意。5月9日张伯伦召集了一个著名的会议，就是这次会议改变了英国历史，出席者是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温斯顿。张伯伦解释了自己没有能力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他就问他俩在自己辞职后，该向国王推举谁。哈利法克斯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做出来自己一生中的最佳决定，说自己爵位在身，不可能接受首相这个职位。他意思是他要从上议院统领自己的党或者作为一个贵族来领导政府是很困难的，但这是不诚实的：如果真的这个成为反对的理由，在下议院给他找一个议席是很容易的事。哈利法克斯内心里某种特质成了他自己的拦路石。也许他不想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工党和托利党反水者赶下台的人。也许他在想，西欧即将沦陷，接受任命会等于政治自杀。张伯伦代挪威人当替罪羊的经历已经表明他无论何种情势下都会是个“荣誉议员”，而看起来丘吉尔不负实责也是在掌控战争局面。那最好是丘吉尔负责去面对肯定马上就要降临的灾难。那么，也许哈利法克斯会参与进来，收拾残局，帮助明智者争取合理的和平。

这样当张伯伦到白金汉宫去，乔治六世问他提名谁的时候，国王也许会吃惊地听到不是老好人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是国王和王后都喜欢的靠谱的人，他们常常邀请勋爵到巴尔莫勒尔庄园打猎的。5月10日的傍晚，丘吉尔接受了首相一职，这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当天早些时候，德国已经入侵了荷兰与比利时。一个怂一点的人，或者没有像丘吉尔这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可能会退缩了。但是正如他在回忆录写的：“我很清醒，感到如释重负。最终命运把我带到了这里，我过去的全部生命就是为这一刻这次尝试预备的。”5月13日的圣灵降临节，荷兰女王威尔敏娜（Queen Wilhelmina）和乔治国王个人联系请求援助（而且，如果必要的话，为她的流亡政府提供庇护），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沉着真挚冷静，大义凛然以及睥睨一切的乐观，众人为之震惊：

正如我曾对参加本届政府的成员所说的那样，我要向下议院说：“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为痛苦的严

峻的考验。在我们面前，有许多漫长的斗争和苦难的岁月。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要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全部能力，用上帝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从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然而，欢呼声排山倒海般从工党议席上传来。事情到这时候有了点意义——克莱蒙特·艾德礼进入了战事小内阁，还有格林沃德、赫伯特·莫里森这个独眼警察的儿子，以及最关键的，欧内斯特·贝文主管劳工部——丘吉尔当他们的头。因为之前没有赢得信任不能组成联合政府，张伯伦受到伤害，但是贝文和莫里森都被给予了重要权力，这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实际上，这真的是实现了最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联合，这使得联合主义者贝文的热情被激发了出来，真正的联合经营合作达成了。战争把这两个不列颠人带回到一起来了。

而且无论托利党人对丘吉尔怎么看，5月的演讲，在无线电广播中重复的下议院演讲，以及5月19日几乎同样异乎寻常的首相广播。他在5月19日的演讲里宣布德国人三天前进了法国，这是个不讨好的活，让大家众志成城，准备“为全英国而战，为英国所代表的一切而战”，这使得大家对他的看法全改变了，后来也没有动摇过对他的信任。1941年有一次简单的舆论民调发现被问到的人78%同意他的领导，这种支持程度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后来从没有大幅度地降低。

多年以后，克莱蒙特·艾德礼写道，如果有人问他，到底温斯顿做了什么才赢得了战争，我会说“他谈论战争”。美国新闻记者埃德·莫罗写到丘吉尔的语言组织能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他的演讲对英国人的士气鼓舞是不可估量的——意思就是，虽然早期的意见有很多夸大之处，但实际上从来也无法真正地确实测算。但是任何一个我这一代的人（“二战”后出生的）和我们的父辈某个人说话的话，都知道，打趣般描述这些演讲毫不夸张地具有改变形势的作用。每当首相发表广播讲话的时候，全国约有70%的人在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场不真实的战争中正在发生的事（似乎更合理说，有待深化理解：与正在发生中的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场假想的战争），他的话把议会和各政党高层与底层人士都紧紧地团结在战时政府周围，也抓住了。这也是他说话的用意——美国政治家与人民的注意力，还有任何其他说英语地区的拥有收音机的人。它们狠狠地刺痛了纳粹，据说也正是这些演讲使得希特勒恶意地把轰炸英国机场的战略决定改为轰炸居民中心。但是，最主要的是它们使得整个不列颠——不仅仅是英格兰——又变成了全国一条心。甚至奥威尔，不用说他对煽动群众很不

安，但是在1940年5月也长吁了一口气放下了心，说这个国家终于由一个懂得“战争是打赢的”人来领导了。

当然，自从1894年11月他站上莱斯特广场的帝国剧院奥米斯顿·钱特夫人的屏幕开始，丘吉尔一辈子都沉迷于雄辩术，当然也因为他以荣誉生身份从以语言暴力著称的“劳合·乔治学校”毕业。偶尔或者说很多时候，他为自己无羞耻地哗众取宠而感到愧疚；有时候引用莎士比亚式的用词和抑扬顿挫走得太远了，效果就是空洞的大话。但是这一切在1940年5月全改变了，丘吉尔感到自己受祖国历史的支配。这种感觉给了他力量和真诚，他要让以百万计的不列颠人通过倾听他讲的话也感受到这些，他们也许以前没有这样的时刻，但现在他们已经变成了不列颠人意志的载体，要在自由中忍耐（痛苦）。不管是不是贵族出身，丘吉尔自己有一双非凡的耳朵，知道公众需要听到什么。这一点在一个社会分歧首先是以口音和说话方式为标志的国家里绝对不是什么可以小看的成就。但是丘吉尔的语句，不管如何浪漫高调，从上流社会人士一声声鼻腔发音的角度来看，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更不是那种精致入微的冷静的牛津剑桥人的发音。他的声音是如此独特——他轮流着用低吼、低缓地持续、低声浅笑、突然大声，有时候突发大声呼喊——这使他脱离了任何阶级，取而代之的是，如果不确定地说，他的声音是全国人民的声音，他的演讲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既宏大又亲切，既高贵又民主。丘吉尔做的一切都是测算的，表现老练世故、老江湖式的大言不惭——特别是那个著名的用“V”代表胜利手势，它是对另一个著名的亵渎神灵手势的反转，因此它表面上又是一个清洁版，这是刻意设计要保留一些原创的绅士式反抗的意味。

很多伟大的演讲都遵循了一个固定的结构模式，重复了很多次以后效果也没有减弱：开头是诉说自己崇高的出发点，如果不算语气沉重也是坦白诚恳（比如“今晚我必须和你们说”，以及“形势非常危急”等）；然后缓慢地在庄重的主题下精心地展开详情；随后如灵光乍现一般轻松地拿希特勒和那帮“纳粹分子”插科打诨（比如说他们是“一些懦夫，一群不要脸的家伙”）；最后是一段华丽的结尾，睥睨一切的雄心、战友般牢不可破的顽强，还有，以自豪的语气仿佛不假思索一般声音低沉地说出豪迈的解决方式。比如“但是，向西，看吧（声音提高），这片土地是（声音降下）光明的”。

这个超凡的忠诚动员工具并不是自我完善的。每次丘吉尔演讲都要准备六到八个小时，他不懈地反复操练直到他觉得每个句子的语气语调时机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才停下。对他和任何其他伟大的演说家都一样重要的是，他必须在重建绅士风度（这可远比让读者的眼睛在书上印刷的文字扫过要更加意味深远）和呼唤英雄气概之间定好步调。在国会和BBC做《我们将要在海滩上和他们搏斗》（*We shall fight them in the hills*）这个演讲的时

候，实际上他是非常轻柔地吐出这个不断反复的反抗到底的决心真言的，几乎就像传教士布道一般的，带着一个知道自己是在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样，因此“我们将会在山区和他们搏斗”这个话不是什么号召，而仅仅是一句英国人自信事实的表述。

当然，这是极大地恭维了不列颠人——大家绝大部分当然毫无疑问地绝不希望在山区或海滩上和敌人作战。那么，丘吉尔是对1940年英国的人们充满了崇敬，不论他们是从自己城市冒着青烟的废墟上向他挥手，还是在“飓风”战斗机的座舱里激动地挥手，或者是站在村子里手扶老式的长枪，他毫无保留、满怀激情地热爱英国，这种激情之饱满是英国人前所未见的，对政界来说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激起他内心要做一些政治上从未有过的尝试，这就是对公众道出实情，当然不是讲出全部事实（这不是在讲什么童话故事），但已经是非常令人吃惊地开诚布公了。1940年丘吉尔做的5次伟大演讲几乎都没有什么好消息给大家，除了英国已经幸存下来这一严酷事实，而且，在敦刻尔克之后的演讲里，好像有一些事能相对使人开心，丘吉尔非常机敏地反对这种不成熟的自满情绪苗头。“战争不是能用撤离赢来的。”1940年6月4日，他这样说道。他小心地列举着大约损失了3万人，在法国又丢下了多少多少武器。另一方面，他不把英国人民当成小孩子那样需要以撒谎宣传来安慰。丘吉尔没有粉饰严峻的情势，也不向悲观失败主义者让步，这样就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而当他终于能报告好消息的时候，大家也相信他没有沉溺在虚妄的希望里。

特别是，丘吉尔和他的政府给不列颠人民指派了活儿。1939年10月，他提议应该组织一个50万人的国民军（Home Guard），以减轻军方的日常放哨和巡视工作负担。5月14日做了《鲜血、辛劳、泪水和汗水》这个演讲后，安东尼·伊登宣布组建一支由15岁到65岁（虽然在实际中这个年龄上限并没有严格执行）男性组成的“本地防卫志愿军”（Local Defence Volunteer Force，后来叫国民军）。24小时之内，25万人挺身而出。到1943年中，国民军拥有175万人，共组成1100个营。1940年，他们戴着圆礼帽和前进帽，手握老式猎枪或者从印度叛变后带回来的李–恩菲尔德步枪进行操练，三年后，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整齐划一起来了，还配备了不说是最新式的但也是可以使用的武器了。

然而，不管是国民军还是丘吉尔的演讲都不会自动打赢战争。到1940年5月的第三个星期，在战争内阁的某些人特别是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看来，就是英国没有什么能赢得战争。法国东边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算守住了，问题是德国人直接绕过了它。绝望了的法国总理雷诺请求丘吉尔给他更多的英国皇家空军支援，因为德国人好像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法国领空来去自如，但是，丘吉尔被两个念头撕扯着——支助欧洲盟友，或者优先考虑英国本土防务——不太情愿冒这个风险，因为不列颠自己的空军防卫能

力还是比较薄弱，不足以跨过英吉利海峡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法国人特别是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也一直觉得如此谨慎行事，如果法国真的倒下了，那就是丘吉尔和空军上将道丁（Dowding）一起做的孽。不列颠和法国这两个老冤家对头缔结“联合”的声明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这是由马尔伯勒的后人做出的非常惊人的象征性姿态，到头来，也就不过如此。

坏消息接踵而至。丘吉尔曾经请求富兰克林·罗斯福允许一条英国航空母舰进入美国的一个港口装载在美国采购的飞机，但是美国总统拒绝了，借口是这样做有违于美国的中立立场。对于哈利法克斯来说，在不久前例行通报中说法国陆军崩溃了，尤其是丘吉尔自己也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单就一件事来说，当时大约30万英国远征军正在撤向英吉利海峡最后一批还没有被德军拦截的港口之一——敦刻尔克，这意味着他们肯定要被围堵了。荷兰已经被征服，比利时眼看着也要沦陷了。据认为纳粹德国空军拥有的飞机比皇家空军多得多了，英吉利海峡一时间看上去变得非常狭窄了。哈利法克斯回想起1937年自己与冯·里宾特洛甫的会谈，当时柏林提出的条件是希特勒对不列颠及其帝国有好感，德国会放过大英帝国，就请英国在德国侵略东方时不要在背后做小动作。假设这时候这样的提议，或者和这个差不多的动议还能放到谈判桌上来，这一回是英国接受不管西欧怎样，以及不管德国在那样“偏远的”国家要干什么，德国还能放过英国吗？关键是意大利，直到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与英国或法国宣战。哈利法克斯相信，也许可以通过墨索里尼达成某个英法联合的试探性措施，这样来看看保全英国独立的可能性的条件是怎么样的。他满心希望丘吉尔反对这个方法，可是，即使是哈利法克斯也知道，丘吉尔的演讲有时候能使一般老百姓心里安定一些，那些处在关键位置的人可没有被蒙住，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情况万分危急，他们是军人、政府官员、他在保守党内部的盟友，后者听到温斯顿又一次自诩是阿金考特“一战”前的亨利五世，都嗤之以鼻。哈利法克斯大咧咧地告诉朋友说，丘吉尔是在谈论“最可怕的连续惨败”，还有他不知道自己能有多长时间继续和丘吉尔共事。可是，这可能是英国从灾难中挽回一些损失同时预防灾难性入侵的最后机会。6月，哈利法克斯回到家乡约克山谷，看着乡间壮美的景色，下定决心不许“普鲁士军靴”践踏自己的家乡，如果说这意味着要从一场打不赢的战场上撤退，好吧，我们这就撤。

哈利法克斯在约克山谷的顿悟是20世纪30年代英格兰乡村文化崇拜演变的一部分，这种崇拜成为一种迷信。那时候由正直者和穿惠灵顿长筒靴的普通人紧密团结，将游览车和电缆塔挡在外面。那么这时候他们将把残暴的德国佬挡在外面。家乡终将无虞。历史将在羊群、牛群、茅草顶的酒屋和架着磨坊的溪流面前一如既往地延续。H.V.莫顿的柴郡小姐安眠于博利厄修道院的宿舍之上。一切都会好。

但丘吉尔知道，如果英国摆脱战败国的法国，毕恭毕敬去与德国交好，不管是否通过墨索里尼，一切都不会是好的。事实上，他没有兴趣拯救约克的河谷、肯特的旷野，或是英国，从仅仅只是一片风景优美的地理环境的意义上考虑。他宁愿看到它们葬送于火焰，而不是去束手就擒。风景可以在一年或两年内恢复，一个奴隶英国不会。他致力于拯救的是英国的思想，一个理念，而且，那不仅仅是空谈的理论，不正是当今的学者都喜欢说的“文化建设”或是一项发明，这是一个活着的人类社区，而且他认为这是大英帝国留给子孙后代甚至是世界的伟大礼物：一个自由且由法治治理的政治社会。他可能是头脑简单才会去相信这一点。他可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辉格”历史学家才会相信这一点。但相信这一点他并没错。事实上，如果英国去装扮成一个“和平”的样子，它将不会幸免于难。如果英国的自由是经纳粹霸权许可而存在的，那么在约克郡漫游还有何意义？在一个傀儡的国度骑马打猎又有何意义？

修正历史学家曾经想过，鉴于英国在1940年以后对美国的依赖以及帝国的加速衰弱的趋势，是否——因为丘吉尔曾频密地说过这样的话——他是想拯救帝国，他不应该在1940年的5月采用任何交易吗？但与希特勒共存不会拯救帝国，会由于其自身独立的和内部的原因而分崩离析。维希法国的后续经验几乎推翻了给予附庸国的有限自主权会使它受到尊重的可能性，特别当涉及移交犹太人的问题时，仅仅是因为阿道夫·希特勒。丘吉尔从心里意识到，正如他多次所说的那样，与无耻的暴政不可能有共存。

5月27日，在日益增加的压力之下，丘吉尔有点动摇了，在考虑到东欧现状的基础上不排除接受任何德国的提议——大概意味着德国撤出西面被占领的国家。但这在他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二天，他不得不报告，比利时的投降使在法国的英军势力陷入更危险的困境。当天下午就哈利法克斯提出的试图寻求与意大利调解的建议（“只要我们能确保我们的独立性”），丘吉尔对他的小团体战时内阁的五名成员表明了态度，坚定了自己的立场。他说，这是停止战斗的最坏的时刻。战败的国家可以再起，但那些温顺地投降国已经完了。战时内阁的工党成员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在首相提到的继续战斗理由的基础上补充说，退缩可能会对工业城镇劳动人民的士气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是他们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爱国事业。有趣的是，张伯伦沉默不语。

就在那一个时刻，5月28日的下午晚些时候，一些重大变化的发生改变了英国历史。虽然曾被描述为丘吉尔的“政变”，但这是心理战而不是政治上的。而且仅仅是委员会协议的影响。五点左右，看到讨论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坚决反对他的态势，丘吉尔休停了内阁会议。重要人物离开了唐宁街10号，丘吉尔由于为反抗辩论而筋疲力尽，他为内阁带来了可以找到的最多的成员，约25人，进入了房间。还没有多少工党成员对他非常了解。但

是，这个更大的团体的存在突然刺激了丘吉尔，挣破了紧张的大坝，他被一种意识淹没，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更重要的是，打开了金话匣，他悲伤坦率地开场，就像他在广播里一样。法国会失败，希特勒将占领巴黎，意大利人将提供条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拒绝。任何利用美国的想法——正如哈利法克斯所说——做一个“卑躬屈节的姿态”，都是绝不可能的。据刚出任经济战争大臣的工党政治家休·道尔顿说，丘吉尔变得“伟大”，开始为倔强的决心发表演讲，他说，即使10万人可以从敦刻尔克撤退，这也将是“美好的”，没有人会想象英国会在一刹那就完结。还有后备部队，还有整个帝国。然后他接着说道：

近些天我已经仔细想过这是否是我责任的一部分——考虑与那个男人谈判。但是，这样考虑将是无意义的，如果我们现在试图寻求和解，我们会比选择投入战斗得到更好的条件……德国人将要求得到我们的舰队……以及其他的东西。我们将成为一个奴隶国，虽然还是一个英国政府，希特勒的傀儡政权将成立——在莫斯利或者这样那样的人接管下……而且我相信，如果我有一秒钟的时间来考虑和谈或投降的话，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站起来，将我从这个位置上拖下来。如果我们这个岛国的历史终将完结，就让它结束在我们每个人都倒在自己脚下的血泊中的那一刻。

内阁毫无疑问为这个老男孩诚挚的坚决所感动，道尔顿回忆道：“全场支持的欢呼声四起。”没有再多说什么。在他们离开之前，道尔顿上去拍了拍正在壁炉前陷入沉思的丘吉尔的背部，说道：“讲得好！首相！您应该得到洛的卡通画，上面画着我们所有人为您卷起袖子跟随您的场面，您要装裱它，把它挂在这个地方。”他咧嘴笑着回答：“是啊，这是很好的建议，不是嘛……”

更好的是，它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取胜的第一场战役，不是通过飓风战斗机和喷火战斗机，而是用言语、激情和历史。丘吉尔突然意识到，显然他是完全正确的，那25名大臣的本能反应也是这个国家的反应。在7点钟小型战时内阁重新召集的时候，他告诉他们，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见过一群身居高位的人如此断然地表达自己。这一次，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没能反驳他。出于某种原因，在他的回忆录中，丘吉尔——也许是出于慷慨——选择隐瞒当天在战时内阁真正发生的事情，宁愿去写一道“崇高的白光，动人心魄地从我们岛屿的一端穿到另一端”。说得客气一点，这是（过于）乐观的看法。但事实是，1940年5月28日，是每个在校的学生都应该知道的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在著名的我们绝不投降的演讲之后，不会再有英国维希政府的任何可能性。英国犹太人不会在温布利（Wembley）球场被围捕送往奥斯威辛。这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

经过如此神勇的表现，丘吉尔收到了一个连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的神奇回

报。结果不是政府所估计的5万敦刻尔克生还人数，而是由800多艘船只组成的船队救援了33万名士兵，其中有20万人是英国人。有把握地说，从来没有在以往任何一场大战中看到如此的景象：海滩游船、捕虾船、渔舟；渡轮和拖船；任何可以浮动的东西，其中一些，如格雷西菲尔兹（Gracie Fields）号渡船，毁于斯图卡战机的俯冲轰炸之下，付出了代价。但它可想而知是最明显的证据：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个如鲍德温所描述的“太平洋民主”（1935年他并没说错）国家，再一次成了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体。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这种新发现的团结与互相忠诚体现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不明智地认为已经完全和外界隔绝而孤军奋战的英国将是一个软柿子，却得到了正好相反的效果。丘吉尔祭出“岛国民族”修辞俘获了全不列颠人民的心，不分阶级，除了极少数例外分子，全都响应他。当然，战争中共6万人战死，有30万军人参战（在“一战”中阵亡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一半），伦敦大轰炸和战争末尾V1和V2导弹造成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这种团结忠诚并不是说他们最接近和最相亲相爱的人之中就没有了苦涩和间隔，也不是说一切阶级分歧都消融化成了爱国主义欣喜。据哈罗德·尼科尔森的记载，国王和王后第一次走访斯特普尼的时候，有人向他们发出嘘声，这才是为什么9月14日白金汉宫第一次被炸到了以后，伊丽莎白王后说自己“看得到伦敦东部了”，正是这样这句话才意义深长。

虽然有这么多疑虑，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分裂严重，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又变得高度一致，真是不可不令人为之震撼。一个习惯了做他们被告知做的事的民族此时接受了配给制这个当然的事，这是一回事；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曾经彼此苦苦争斗的协会和雇主们为了要给国家提供武器而共同协调工作，这是另一码事。当然，贝文和伯维尔布鲁克（后者负责飞机生产）在同一届政府里工作很有帮助，在任何其他时候这俩都绝不会走到一起，还有赫伯特·莫里森担任重要的供应大臣角色。但是根本不需要高压就能让工厂一天24小时一星期七天开工，当然很多厂里全是妇女在干活。集体合力使得军火特别是战斗机生产完全大变样，反过来战斗机又改变了1940年夏天不列颠空战的输赢。因为错误地受到德军飞机数量优势的鼓舞，戈林的纳粹空军一直想要置皇家空军于死地，但是结果只是使得喷火式和飓风战斗机从灰烬里升起去嘲笑他们没来由的自高自大。

那个“这么少的人”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少数。8月中旬，不列颠空战开始白热化的时候，皇家空军拥有1032架战斗机，而纳粹空军是1011架。甚至在9月第一个周末，德国人以为他们已经消灭了大部分，皇家空军应该只剩100架左右的战斗机了，皇家空军还有736架，而另外256架在装配中。德国人在其他方面的劣势使得他们吃了苦头。单就飞机一架一架地单打独斗来说，纳粹空军没有什么能打败装备8挺机枪的英军喷火式战机的，在

速度、机动性和活力集中方面都是喷火式更胜一筹，至少在2万英尺及以下的空中［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说如果不列颠空战是在3万英尺高空进行的，英国会输］。因为必须为轰炸机护航，德军战斗机无法自由飞行就失去了技术灵活性，到大本营的距离决定了战机的作战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尽管不一定总是能预报准确，在内陆使用也不多，雷达——总共3万男男女女的地面观察队的配合下——对德军空袭发出早期警报，掉在英国地面上被打下和损坏的战机都被找到又修复，皇家空军飞行员在跳伞后可以在当天就又飞上天了，德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很快就被抓住了。全国上下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响应空军战士做出的特别牺牲：地勤人员全天维护战机，普通民众给喷火战机基金贡献自愿捐款在1940年达到每个月100万英镑，用来建造更多的战机，到秋天几乎英国每个城市都拥有用自己城市命名的喷火式战机，当伯维尔布鲁克勋爵呼吁大家捐出铝的时候，平底奶锅和圆底锅都被送去熔化重新做成了飞机部件，英国人的厨房空了。

在8月12日到9月6日之间，德军对英国飞机场进行了53次轰炸。仅13日一天，林姆尼（Lympne）遭到400颗炸弹袭击，飞机跑道被炸毁。8月15日，纳粹空军投入空战的最大力量，但还是被皇家空军遏制住了：75架德军飞机被击落，英军损失34架战机。18日的战绩与此相似。20日，丘吉尔告诉下议院“在人类战争中，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据安格斯·卡尔达[注]记载，有个空军战士听了这句话后说，“这肯定是说花费太大了”。

这场无情的空战人力代价惨重，8月飞行员死亡率是惊人的22%，9月初不少于133名飞行员死了，虽然不是戈林吹嘘的177个，这已经使得全英空军飞行员被打下的多达600名。9月8日，当丘吉尔问空军副元帅帕克：“我们还有别的储备吗？”他得到的答复是他不想听到的——“没有了”。

9月7日，用来指代德军入侵的暗号“克伦威尔”启用，据报告英吉利海峡和荷兰鹿特丹港口里集中了很多驳船和其他平底船。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国防部（国民军南部战区总指挥），这个来自爱尔兰阿尔斯特的清教徒对于英军防守本土的能力非常悲观，因为他相信入侵终极发生，因为那时候80个师都没有防得住法国的战线；而英国只有22个师，其中只有一半能机动作战，防守英国长长的海岸线需要机动作战。

幸运的是，德国海军对自己的登陆入侵部队的机会同样悲观，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少于英国海军，还没有空中优势。德军元帅和将领们明显在埋头阅读恺撒、塔西佗和诺曼底征服的历史来进行自己的速成培训。

德军怀疑海狮行动（Operation Sealion）的可行性一点儿也没有减轻空中

打击的影响，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纳粹空军加大了空袭力度，因为希特勒相信有必要在跨过英吉利海峡之前不是通过海上而是从空中吓倒英国人，早在不列颠空战开始前，德军对英格兰西南部的居民中心就已经进行了投弹轰炸。更别说8月底皇家空军对柏林也进行了轰炸，不可否认，这种狂傲可没有使希特勒脾气好一些。6月下旬利物浦、纽卡斯尔和南安普顿都遭到了轰炸。7月末是英格兰的西南。8月28日到29日，伦敦市郊——从圣潘克拉斯到亨顿（Hendon，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飞机场）、芬奇利（Finchley）和温布利——都被炸了。9月2日轮到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伯明翰，到7日规模升级，纳粹空军出动350架飞机，集中轰炸了伦敦的港口区。伍尔维奇兵工厂与皇家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码头还有东印度和素里商业码头都被炸了。一个巨大的滚动的火球升起，烧毁了萨瑟克、罗瑟希德的街道和房屋，作家A.P.赫伯特此时是泰晤士河辅助巡逻队的一个低级官员，他乘船往河上游驶去，在莱姆豪斯拐弯的地方，看到“一幅地狱景象，到处漂浮着平底驳船，我们听得到爆燃的呼呼声和嘶嘶声，巨响，可是我们看不到它，因为烟雾太浓重了”。第二夜，轰炸目标扩大到伦敦西边。在一个小时之内，布鲁克将军看见60枚没有被防空炮火炸裂的不带锡盖的炮弹倾泻在同一个区域。杜莎夫人蜡像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发电厂医院都被炸了。这次大轰炸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首相去视察损失情况，走在油污、玻璃碴、碎木头和憔悴的消防队员们当中，他沿一条最令人震惊的路线行走着，在手杖上旋转着帽子，咆哮着：“我们郁闷了吗？”回应他的是同样惊人的怒吼（虽然他会说已经预见到了）：“不！”伦敦人随机应变，在铁路桥下入睡，低声吟唱着著名的二重唱弗拉纳根和阿伦（Flanagan and Allen）的音乐厅摇篮曲。到9月15日，当158架德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冲破喷火式和飓风战斗机组成的防线后，轰炸了伦敦，15万人在地铁站里过夜。10月15日，一颗炸弹掉在财政部，炸死了3个人，唐宁街的政府大员们侥幸地躲过了，仅仅是因为丘吉尔下令他们躲进一个陆军部的防空洞里了。结果是大家恳求首相本人离开唐宁街10号，因为这里的掩体既不深也不结实，他搬进了大大加固了的地下战时内阁办公室，这里只是在德军入侵波兰前一周才完工。在一个特地为他和克莱蒙特修建的附属掩体建好之前，丘吉尔在这里只待了三个夜晚，还是照常回到唐宁街10号去睡觉，甚至爬到屋顶去观望大火。

奥威尔的爱国主义高涨，特别在“克伦威尔期”的9月初到10月中旬，之后随着冬天来临，希特勒实质上取消了入侵英国的最后希望，奥威尔到这时候已经变得好斗了。他同左翼和平主义者关于西班牙内战和《苏德互不侵犯协议》都产生了严重分歧——流亡的许多诗人和有良知的反对派，这些可以付任何代价也不要战争的大堆人辩称自己是真正的反法西斯者——奥威尔1942年在《和平主义与战争》（*Pacifism and theWar*）7月号上发表的《争论》（*A Controversy*），提到这些人的态度的时候，他保留了自己最羞愧的蔑视，“如果（他们）想象某人可以躺着就能赢了德国军队，让

他们去想吧，可是也让他们偶尔想想从安保角度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幻想，这幻想是不是太费钱了，还有它是不是根本就无视了真正发生的实情”。他写道，他知道英格兰是唯一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国籍感到羞愧的伟大国家。

很明显，奥威尔没有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交换成某个思想僵化者。在他的嗉囊里卡着左翼精英主义者，他们就是很好很精致很宝贵，不能接受爱国主义，他们拒绝理解这是所有情绪中民粹主义色彩最浓的一种，他们要把精英主义灌输到真正生活中的人类社区里。他反对把爱国主义和保守主义混淆起来。在他的思想里，国民自卫军不是一群奇怪的退休老太太装扮成士兵没完没了地在瓦伊普斯和曼宁路那边走来走去；国民军是人民军队的第一道防线，特别是如果布莱尔与之有什么关系的话，也许还是社会革命的先锋。奥威尔关于如何训练这支（国民军）老爹部队（Dad’s Army）的主张就是给他们集中培训巷斗。

他和丘吉尔的观点不同，虽然不是完全互斥，但英国历史和国家团体对自己和国家的解释是为什么英国要战斗到底。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一书展示再现了自由的历史场景，意思是议会政府在民主联邦制里面是最圆满的，“二战”后他马上接着写它。奥威尔也对联邦共同体的概念感兴趣，然而他的版本更多地源自克伦威尔、平等主义者，以及从农民起义到宪章派的传统。丘吉尔认为1942年纳粹空军执意开始“贝德克尔行动”要毁灭中世纪和乔治王时期英格兰最伟大的建筑：坎特伯雷、诺威克、约克、埃克塞特和巴斯，纳粹是来轰炸他们的死对头——英国历史的。他把自己置身于英国深受爱戴的国王与英雄的传统中，随时预备保卫“岛国民族”反抗入侵的暴君：这就是1937年亚历山大·柯达摄制的相同戏码，这是雷蒙德·梅塞扮演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这个恶魔，弗洛拉·罗伯森扮演身披铠甲的童贞女王的《英伦战火》（*Fire over England*）。当丘吉尔在斯特普尼遭受重创的普利茅斯和曼彻斯特踩在瓦砾堆里查看的时候，正如劳伦斯·奥利弗在1994年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电影《亨利五世》展现的“晚上哈利的一下触碰”，在军营里昂首走过，倾听普通士兵们的抱怨，尝试和他们解释在为什么而战，以及为什么虽然痛苦和恐惧他们也应该战斗下去。

奥威尔认识到——实际上是大度地——这是丘吉尔特别擅长的，他能和那些与他没什么社会共同点的人建立某种联系。而奥威尔看看自己周边，看到大批面目模糊、不加修饰的英雄——在六个星期的伦敦大轰炸后，一百万伦敦人中四分之一无家可归（随后又去轰炸了其他工业中心如考文垂和伯明翰，在12月又掉头回来轰炸伦敦城，然后在5月的第一、二周扔下了比“二战”中任何时候都多的爆炸药，击中下议院、威斯敏斯寺、伦敦塔和皇家造币厂，造成约76000人无家可归）。奥威尔看着被空袭的伦敦监狱和妇女志愿者服务处，更别提600万穿制服的普通男女，他想如果说这“整

场”战争是他们在打，那也应该是为了他们而战，“也许滑铁卢之战是在伊顿的球场上赢的，”他在1941年这样写他的散文《英国，您的英国》，“可是，所有接下来战争的开场战役全都输了。”布里斯托尔和克莱德班克人口的80%都被炸死了，这些地方的工人吃了纳粹空军的败仗可不是为了让圣塞浦里安的男孩子们为了乡间别墅里那些人的安全。所有这整个令人心碎、毁灭和痛苦只有在以后建立起一个能使威根的矿工们有和他们一样的千千万万普通人过上体面生活才算值得——住的房子不能是到处是臭虫的贫民窟，让他们吃上有营养的食物，不是吃了生病的东西，让他们的孩子上学，有适当的医疗，可以照顾老弱病残。

奥威尔在同一篇文章里写到，参战的这个英国，好像一个一本正经的维多利亚时期家庭，有“一群要人给他们磕头的富亲戚，和一堆被人压得抬不起头的穷亲戚，这家里的年轻人都被压制着，绝大部分权力都被不负责任的叔叔和卧床的阿姨抓在手里，错误成员掌管大权的家庭”。然而，另一个播音员拥有几乎和丘吉尔一样多听众的播音员吉·比·普利斯特里却评论说这个国家在被轰炸被焚烧中产生了民主，到1942年，英国拥有了搞经济的工党大臣包括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奥威尔不这样想——肯定不是自愿的——他们应该是不情愿地弃权了。他在1941年的文章《英国革命》（*The English Revolution*）中描绘的蓝图是新的社会主义英国需要包括主要工业——煤矿、铁路、银行、公用事业的国有化，创建一个民主的不分阶级的教育系统（除掉圣塞浦里安！），限制收入，让印度马上自治，在战争结束后还它全部主权。上议院作为一个过时的怪物应该废掉，但是王室也许应该保留，因为奥威尔无意抹去英国历史，相反，他认为它能够“展示一种吸收同化过去的力量，会令外国观察家们震惊，有时候会怀疑到底有没有发生过革命”。

政府里很多人至少怀有和奥威尔一样的改革狂热，也已经在盼望战后英国不会像1918年那样滑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个人主义的不公正不平等。1942年12月，《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出版了，表面上是着眼全民社会保险和就业，但是允诺战后政府会致力于使“每个人享有免于贫困的自由、保障大家的最低生存收入”，换言之，就是英国国家要把公民从生到死都包了，这些还不是少数人的福利。《贝弗里奇报告》卖出了63.5万册，作为一个政府白皮书这个销量无疑是创纪录的。一些托利党人“改革派”包括安东尼·伊登、哈罗德·麦克米兰和R.A.巴特勒嗅出了国内公众舆论的一大变化，怕失去战后的选举，发誓要进行“一场社会大变革”。

然而在实现这些之前，还要先打赢这场战争。也正是如何最终打赢这一战才给新的20世纪的英国前景造成了麻烦，这是尝试用福利国家的责任调和岛国历史走投无路的浪漫。不是说每个人都迷恋贝弗里奇。雇主联合会感到有必要指出打仗不是为了建立社会保险而是保障英国免于被德国暴君奴

役的自由，甚至丘吉尔也大声质疑贝弗里奇改革的代价多么高，特别是英国的外汇储备已经全部没有了：“这个问题要掂量掂量，我们是不是没有让4500万人民去做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肩负他们能力之外的重担。”只是大敌当前，这一切矛盾都可以暂时被搁置。一旦忍受（战争苦难）不再是一个问题，建成阿尔比恩–耶路撒冷的困难，尤其是谁来负担财政重担的事就凸显出来了。

从这种奇怪的感觉来说，1940年既是“二战”中最艰难又是最轻松的年份，因为重生的民族大同已经无可争辩。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了珍珠港，丘吉尔向罗斯福表达了哀悼和诚挚的同情，私心里却是在窃喜，因为他太清楚胜利在望了。“这样我们到底是赢了，”他在回忆录里写着，“我们不会被抹去，我国历史还没有终结。”但是如果说他说“英格兰会活下来”是对的——那么他能预见“不列颠能存活”也是对的——丘吉尔还对“英联邦共同体和大英帝国（对他来说二者是可以互换的）”同样抱着信心，这却是错的。因为正当丘吉尔考虑不列颠的未来要依靠帝国的复活，罗斯福相信的正好相反。

当然，筹建大西洋联盟的时候，他对此一无所知。1941年8月，当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布雷森莎湾（Placentia Bay）的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相遇，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士兵们站在一起唱着丘吉尔选的歌曲的时候，看起来一个真正的大西洋民主合作的梦想，丘吉尔在骨子里想要的伙伴关系似乎就在眼前了。然而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梦而已。1942年6月他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事情就明朗了，罗斯福请丘吉尔从18世纪大英帝国发生了什么的角度来考虑英国和印度的关系，意思就是英国应该让印度独立，不要等到印度要起来为独立而战的时候再让它独立。丘吉尔一下子大怒起来，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愤怒发作。他鲁莽地宣布说自己被选出来做了国王的首相可不是要主持解散大不列颠帝国的，这么说的时候他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一年的伦敦市长晚宴的事。而罗斯福心里想的是立即让印度自治，可以预防沙布哈斯·昌德拉·鲍斯[注]倾向于做轴心国的志愿者孟加拉老虎，以免引发类似1857年但比它更大范围的大叛乱。不用说，这个话丘吉尔无疑是听不进去的。

可是，帝国瓦解当然正在发生之中，随着香港地区陷落，接着1942年更大的灾难是新加坡沦陷，丘吉尔很诡异地给亚洲东南总司令阿奇博尔德·威法尔[注]下命令他带领军队在这座港口城市的废墟上战斗到底。然而实际上，日本人俘虏了8.5万人，后来其中5.7万人都死了。两巨头曾经聚首的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被派去威吓日本人，它绕了地球大半圈，最后却只是可耻地沉没在中国南海了。不管丘吉尔怎么想，从太平洋战争中产生的共同体绝不是1940年存在的这一个。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对丘吉尔和英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这片土地上，最著名的反布尔什维克的人发现自己与一个苏联领导人结盟，他确实体现了丘吉尔对邪恶的共产主义阶级的残暴的刻板印象。然而，关于斯大林他这么说，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他愿意和魔鬼本人交朋友。虽然巴巴罗萨将是第三帝国的复仇女神，1943年11月在德黑兰，1944年在雅尔塔斯大林和罗斯福亲密无间，这使得丘吉尔痛苦地意识到在全局中英国突然没落的地位。因为德国在俄罗斯前线的兵力被拖住了，英军开始拿下北非，先是从意大利人然后（经过一开始在托布鲁克惨败在隆美尔手下，此役3万联军被俘）也从德军手里夺取地盘。1942年11月有一个短时间里，丘吉尔让英国人庆祝艾尔阿拉曼大捷（El Alamein），以及1943年1月他和布鲁克从开罗去土耳其的路上在锡瓦绿洲的棕榈树下吃着椰枣，啜吸薄荷茶，听着当地酋长谢赫抱怨意大利人吃了他们的驴子，这时候看起来大英帝国的这个棕榈树和松树下的帝国一切都很好。

但是1942年一直都不好：香港地区、新加坡、托布鲁克先后沦陷，到艾尔阿拉曼一役后情况才开始好转。在下议院，丘吉尔不再是看起来的那么无懈可击了。社会主义者安奈林·贝文（注）说首相是一次次赢了议会辩论却输了一场场战事。“国人都在说他在辩论的时候像打仗，打仗的时候像辩论。”他经历的唯一一次对他的领袖地位的挑战——可能（事后看很奇怪）被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取代。虽然他尽责地履行外交的差事，以近70岁的高龄搭乘各种非常规的交通方式飞行超长距离，从华盛顿飞往莫斯科再到开罗接着又去波斯，战争局势胜利在望，他却看起来越来越不开心了。正如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最近在他的传记里指出的，这些会面里只见到丘吉尔老是在出访。“二战”后期当盟军开始部署反攻欧洲大陆的时候，得知英国要听从美军的指挥调遣，丘吉尔非常难受，在战略讨论中常常同他的陆军元帅们奥金莱克、蒙哥马利和布鲁克争吵。虽然丘吉尔反对在1943年登陆法国的诺曼底登陆，说这是为时过早，当然他是对的；他对另一个选项在意大利的火炬行动（Operation Torch）很感兴趣（与达达尼尔海峡综合征反其道而行之），又总是强调罗斯福和美军将领们从不认为这是次要的。

1944年，很明显他已经不能轻松地领导内阁。他身边最接近的人都感到他酒喝得太多而想得太少，丘吉尔不再是布鲁克眼里那个在几千英里的夜航飞行后喝下两份早餐前威士忌、两支雪茄和两大杯白葡萄酒然后就“神采焕发”的人，他的肺炎发作太过频繁。那年的5月，布鲁克觉得他看上去“又老又累”，他说罗斯福身体不太好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他说这话对他自己也适用。他说自己还是睡得香吃得下，也还是很能喝酒，但是早上起床没有以前感觉那么好了，好像更愿意整天都窝在床上。在内阁开会的时候，他更多的是吹牛，嘴里含着雪茄咕哝着，莫名其妙地揪住无关主要任

务的细节不放，把会议拖得很长。丘吉尔常常好像不能让内阁成员们住嘴，因此有时候每个人都在说话。做决定的时候，大家不得不逼着他拿主意，特别是军事决定。布鲁克对他这样不理解事情感到震惊，得出结论认为丘吉尔对基本策略一无所知，布鲁克几乎要辞职。丘吉尔根本就不知道需要他读的那些文件内容，艾德礼对此感到沮丧，1944年，他给丘吉尔写了一篇严厉的批评备忘录，好像一个校长惩治懒惰的学生。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的演讲好像也危险地降格为纯粹的空话加大话，两党联合开始经受磨损，工党和保守党大臣们的差异变得更明显了。联合政府还没有散架也许是因为贝文和莫里森在心里都恨透了彼此，比他们俩讨厌丘吉尔更厉害。还有，在可悲的老工业中心地带南威尔士和约克郡又开始罢工了。

当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终于到来，以及随后英勇战斗的时候，士气提振，加上1944年夏天到1945年3月突然重新出现的德国无人飞弹VI接V2火箭袭击英国东南（杀死了近9千人，伤者更多）暂时消弭了裂隙，忽然又让丘吉尔这个战争首脑变得重要了。5月8日，欧洲胜利日（VE Day）那天，他和国王王后一起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完成了历史给予少数人的重任，他可以满足于此了——他不仅拯救了自己的祖国，而且可以说拯救了欧洲民主的存在，因为假如英国没有在1940年进行抵抗的话，欧洲的民主就被独裁颠覆了。

但是接下来在7月的选举运动教训了丘吉尔，叫他不要把发自内心的赞扬当成选票。他好斗自负，虽然在伦敦东北的沃尔瑟姆斯托（Walthamstow）听到了一些人对他喝倒彩，丘吉尔发起诋毁反对工党要建成福利国家的运动，6月4日他在一次广播演讲中说道（奇怪地预测到了几个奥威尔《1984》书里的主旨），要实施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府计划必须卷入“某种盖世太保形式，毫无疑问这第一个例子的指向就很人性化，并且这会把舆论扼杀在萌芽中……它会把一切权力集中到这个最高的党及其领导人手里，他们会像壮观的尖峰高高在上，底下是庞大的公务员官僚群体，却再也不是公仆也不再彬彬有礼……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社会主义者的政策和不列颠的自由观念是不符合的……一个自由的议会——对社会主义者的教条来说是可恨的”。这样尝试妖魔化社会主义把它作为不列颠历史非主流是超常地回转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极端思想，虽然在战时政府里合作并且一部分保守党人已经接受了《贝弗里奇报告》里的很多社会改革。那时候克莱蒙特·艾德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很陌生，他以一种低调然而有力的嘲讽回应，告诉全国人民他意识到丘吉尔歪曲工党政策的目的是“他要选民们理解温斯顿·丘吉尔这个伟大的战时团结民族的领导人和作为保守党领袖的丘吉尔先生之间的区别是何等巨大，他害怕那些接受了他在战争中领导的人会因为感激而继续追随他，我很感谢他如此彻底地使大家觉醒”。

丘吉尔对选举结果很有信心，7月15日就去了波茨坦同斯大林、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进行首脑会晤，一边等着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点票员们统计选举结果，他感到有把握这些会改变局面，虽然有个流传很广却是虚构的故事说他寻问空军副元帅帕克，他认为飞行员们会投谁的票，得到的回答是80%的人会投工党。回到英国后，就是7月25日拂晓，丘吉尔从睡梦中醒来感到“一阵剧烈刺痛”，他相信自己输了。他的预感真是准确。当所有选票清点完毕——结果是高达73%——很明显工党赢得了空前胜利，这个结果甚至也大大出乎工党领袖们意料，他们拿到了393个议席，而保守党是213席。传统托利党人的选区的选民——坎伯兰——全都没有投保守党。丘吉尔尽力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虽然克莱蒙特在选举结果揭晓那天的午餐时说也许一个失败是伪装的福佑，温斯顿怒不可遏地低声回答：“如果这是个福佑，它还真是伪装得很好啊。”当搬离首相乡间别墅契克斯的时候，全家人在来访者登记本上签名，温斯顿最后一个签名，他在自己的名字后加了拉丁文的“终止”（Finis）。

当然这既不是丘吉尔最后的下场，也不是他自己认可的祖国的末日。他在竞选活动中判断失误乱发脾气造成灾难性后果，实际是基于三个设想：第一，感激（尽管他从来没有对此表现自满）也许可以帮助他重掌权力；第二，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英国不可能还保留英国本来面目；第三，在某种意义和形式上，英国继续存在要依赖帝国的存在。他在这方面的想法都错了。事实上是丘吉尔自己的战时政府做出的福利国家蓝图，这才使得公众开始期盼它，也是它给了工党大臣们信心和经验（不像之前1924—1929年的工党执政）要来实行它。1945年夏，大部分选民因为丘吉尔要背离大家以为他曾经和他们共享的更美好的生活而惩罚了他，伊登不是谈论过一个社会改革的计划吗？

可是，他们听到的是说什么共产主义是特洛伊木马的噪声，有些人起码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就有这话了，还有，在接下来的冷战最严酷的日子里，这么说好像没什么意义。无论托利党人多么努力，他们也无法把克莱蒙特·艾德礼抹黑成一个英国的斯大林。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工党政府都艰苦地把他们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打扮成爱国的合法行动，他们把经济总量的20%变成公共持股叫作“国有化”，同样提议中的新公共企业都被给予了爱国的公司身份：英国钢铁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英国铁路公司。这个努力的意思是要重塑做一个英国人就是做一个共享所有权的社团成员，共同承担责任，也将利益均沾：大英合作社。因为工党在威尔士、苏格兰、英格兰遭受社会重创的工业区域拥有巨大群众基础，最终就会建成一个富裕的英格兰，富裕的英格兰南部并没有凌驾于贫困地区之上。这个时候，用奥威尔的话来说，那是正确的家庭成员掌权了。

至少，1945年这个思想带着理想的能量启动的时候是这样的。之前的几代

人都被教育说大不列颠帝国会永存，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福利国家中，又被教导说这个新的不列颠社会仁慈帝国也将永续。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保守党政府继任的时候，这个信念更加深入人心，这也包括1951—1955年丘吉尔自己领导的政府，以及1957—1963年他的忠实门徒哈罗德·麦克米兰（他描述英国矿工的话是“社会中坚分子”，1938年就曾经出版一本小书《中间道路》，鼓吹的一系列事务中包括废除伦敦股票交易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都决定反对逆转这个新不列颠最核心的社会慈善事业：1948年贝文创建的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国有控股的铁路、钢厂和煤矿；还特别承诺建造公共廉租房。站在1970年的视角来看，这是个可以重建不列颠的好赌注，会延续到20世纪末。

然而结果不列颠福利国家是短暂的——也许延续了两代人时间——比它的缔造者和导师如伦敦政经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想得要短，事情为什么是这样的，也不仅仅是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从一开始，工党就无法避免20世纪不列颠政府长期头痛和紧急事务——货币流动性、工业产能过剩，特别是大英帝国或者说后帝国时的全球防务。奇怪的是没有迹象表明需要将它从这些约束中解脱出来。毕竟，它根本就没有选择余地，不是吗？唯一的办法，除了叹叹气扛起这些负担，尽他们所能地处理好新耶路撒冷的事务，就是一头扎进走得更远的集体化进程、凯恩斯式的赤字亏损财政、裁军和全球紧缩，这些就是拉斯基打心眼里推崇的。可是，这些牌从来没有摸到过，因为工党成员们和1906年的自由派管理层一样，都不是冷血的社会革命家；他们也不是像列宁那样的布莱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Brest–Litovsk）签订者，敢把选民都直接抹去。这可是不列颠，其记忆、传统、机构，特别是（立宪）君主制，都是艾德礼、欧内斯特·贝文、赫伯特·莫里森他们从心理和思想两方面都承诺要保留而不是漠视。他们就是奥威尔说的忠实支持者《狮子和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1941）。

欧内斯特·贝文是萨默塞特郡农场工人的儿子，一直做到外交大臣，最后却变得几乎和丘吉尔一样的帝国主义者，而且起码是醉心于要不列颠军事独立的幻想。要保持独立的核威慑，在亚洲（通过香港地区）维持不列颠力量，甚至更重要的在中东保持军力，代价是高昂的：35亿美元，确切地说，正好是美国贷款的总额。

据估算，打这一仗，不列颠在这个领域的损失是70亿英镑或者说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现在，防务费用上升到了GDP的整10%——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高——这样美国的援助就是必须的了。因此，贝文要独立于美国的目标正好达到了在长期条件下加深依赖美国的实际效果。但是资本注入，被克里普斯等人认为是能促使经济腾飞，而且可以为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埋单，之后经济起飞成长就足以支付债务负担了。其中最理想化的概念是公

众拥有经济要害部门，用国有化企业取代注重利润的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曾经在1948年，后来在1950年，由出口带动的小刺激，看上去这些项目不像他们本身那么反人类，好像不是一个不真实的诊治方案；可惜，时间一长，就现了原形。同时不列颠还得益于和1918年类似的战争后反弹需求；实际上出口萎缩的现实只是被推迟了，结构性的需求并没有反转增长。

美国贷款和它对英镑的支持——这是保存伦敦继续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统治地位不可或缺的条件——是随着钢索一起来的。它的条件是不列颠应该继续发挥在大西洋联盟中的主导（也就是说非常昂贵的）作用，还要承担在旧帝国昔日的地盘上反共产主义威胁或者看起来像共产主义威胁的民族主义威胁的重任。因此，参加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及20世纪50年代在马来半岛抗击共产主义暴乱，还有最重要的，在中东保持活跃，因为英美在中东已经成为剥削石油的合作伙伴。丘吉尔1914年让英国皇家空军放弃煤炭改用石油做燃料的关键改变这时候结出了苦涩的果实。

无论如何，贝文和他之后的安东尼·伊登后来都变成了美国国务卿丁·阿奇森（Dean Acheson）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打冷战的热心搭档，都拒绝从中东收兵。看看中东的石油地图和迪斯雷利在地中海和印度之间搞的战略联结版图几乎重合，贝文又如何热情地要保持这片地图红色或者至少粉红属性，这简直是神秘莫测。沿着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建立了很多基地，从伊拉克直到亚丁（Aden）。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到1948年，巴勒斯坦还在不列颠管辖之下，尽管欧洲犹太人和难民营幸存者身上发生了很多事，贝文使尽全力要反转丘吉尔对犹太人说要给他们一个祖国作为加强和阿拉伯世界石油国际战略联系的承诺，他甚至提出将意大利在利比亚和索马里的旧殖民地纳入不列颠托管，作为这些地区扩大影响的一种方法。而艾德礼的政府创建了波斯湾委员会来作为对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Muhammad Mossadeq）要把主要是英国拥有的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的对策。美国人受到鼓励，采用某种防守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两年后的1953年，中央情报局策划了一场政变，把巴列维（Pahlavi）“帝国”立宪君主重新扶上去。

所以，即使在1947年8月，工党政府的确尽责地把新德里的总督府旗杆上的不列颠国旗降了下来，好像把一个麦考利式的救赎梦想向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交出了勒琴斯和赫伯特·贝克爵士设计建筑的议会及秘书处的全套建筑，不列颠作为福利国家还是深陷于用新帝国取代旧帝国的责任之中。当然，贝文的庞大帝国的名字叫作海外食品公司（Overseas Food Corporation）和殖民地发展部（Colon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目的是用和它们那些19世纪的前身差不多的方式来给不列颠经济输血。重要原材料包括各种油料——西非的棕榈油，东非的花生油，海湾和伊朗的

石油，保证用莫利斯迈诺斯轿车（Morris Minors），桑德斯牌（Sanderson）的墙纸，利伯特风格的软装，英镑账户，劳斯莱斯引擎轰鸣的空军编队、机身上可以喷涂着他们国旗的颜色来交换，为酋长们预备的是同样劳斯莱斯引擎的宾利轿车。耶赫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去举办一场小提琴音乐会，这是不列颠国会的礼节待遇，还有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上的好座位。查尔斯·屈维廉能毫无困难地辨认这一点。

随着维持伪大国气派和福利国家的费用日益上涨，对支撑这个武装的新耶路撒冷的财政前提的怀疑和不安也与日俱增。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曾经是最热衷于集体主义的人，在1949年以后，变成了一个最坚定的混合经济模式的鼓吹者。强势英镑是内战时期的另一个稳定因素，就这样在1951年决定不再贬值，这种思想成了正统。下一任工党领袖休·盖茨凯尔（工党议员财政大臣）决定反对国有化，哈罗德·威尔森从贝文鼓吹单边裁军改为坚决反对是个实质性的转变，二者加在一起使得不再倒退回到1945—1948年的社会主义理想老路上去。这也意味着每当“关键利益区”（间于不列颠和20世纪现实之间的缓冲区）受到威胁的时候，后帝国焦虑的门槛骤然降低。

对于保守党来说，要重回慕尼黑挑衅后的伟大日子的冲动非常强烈，每当要面对一个刺儿头的民族主义者威胁着要遣送掉帝国资产如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就更变得不可抗拒。埃及总统贾马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Colonel Gamal Abdel Nasser）就这样被描绘成了黎凡特的墨索里尼，他撕毁了条约，“控制”了运河，如果英国不允许中东自由的火炬熄灭的话，就必须不惜代价反对他。结果就是荒诞的1882年格莱斯顿事件的翻版，伪帝国最耻辱的灾难，以民族主义者发起的“无政府状态”威胁到自由贸易和文明的名义，英国对埃及实行军事占领。1956年，这种欺诈尤其卑劣，因为由英法两国事先计划好的，红色贝雷帽空降兵“分隔”开前线好斗的以色列与埃及部队。这一事件是如此的惊世骇俗，以至于艾森豪威尔的美国共和党政府也惊呆了，感到这个事件显示了英国面对美国主导发起的联合国最后通牒也敢于装模作样地表现老牌帝国主义的威风犹存。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两位名字都叫哈罗德的，麦克米兰和威尔森争相把后帝国的遗存打烂，除了香港地区——英国被迫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面对帝国颜面扫地、资产损失，不再神气活现。偶尔能使人高兴的事件，比如1966年英格兰队获得足球世界杯、皇室纪念庆典和皇家婚礼，甚至1982年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事，玛格丽特·撒切尔把它当成“自由民主”对阿根廷独裁的胜利代表性事件，都没有能真正地提振国威。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讽刺文化把悲观的国运衰退转变成了一个庆幸而不是悲伤的理由；箍在肩上的胳膊变成了肋骨间的玩闹取乐。随之而来的是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带动下流行起来的上细下圆的络腮胡子、下垂式髭须、新维多利亚式的钢框眼镜，以及绣花繁多、色彩绚烂的“尼赫

鲁衫”，它是半帝国军团半印度教导师斯瓦米式的，正好就是大众在帝国失落后的拒不承认心理转为欢喜接受的时刻。

那么事实上的确有一个帝国保存了下来：作为世界金融统治中心地位的不列颠无可争议地幸存下来了。可是，要保卫英镑就逼使接连几届英国政府特别是威尔森政府只得接受一些令人屈辱的条件，不管它们是来自美国的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通常都是要求大幅削减支出的，金融中心这个优点也变成了一个负债。然后，一项旨在阻止主权萎缩的政策恰恰产生了累积起来导致减弱主权的后果，这种事又一次发生了。这种情况后来一再出现——随着一次次地为了争夺一直在缩小的经济蛋糕份额，在联邦和管理层之间，或者在联邦与政府之间展开越来越多的野蛮战事——只要是大家要追随1945年后工党既要不列颠保持军事实力又加上全面福利国家的理念，这种斗争就一直在进行。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探讨和试行过的所有选项都遇到了麻烦。工党和保守党都把依赖美国提供核保护当成该诅咒的事而不予考虑：二者都把这看成是帝王逊位那样，不仅是自动退出大国地位，根本就是堕落到没落地位，等同于越大西洋的反向殖民。另一个欧洲选项，就是成为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1963年和1967年两次被戴高乐将军否决，他的说辞是英国死不悔改的岛国狭隘思想和后帝国情绪。在戴高乐第二次坚定否决的时候尤其具有讽刺性，因为那正好是哈罗德·麦克米兰下定决心要摒弃上述两种思绪的时候。1967年——巴黎暴动，人们把鸡蛋扔在他脸上的一年以前——戴高乐自豪地指示“这个伟大的民族”进行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转变，如此才配得上真正成为欧洲一部分，而不是美国的卫星国。

1970年，当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取得绝对优势后（尽管希思自己对此五味杂陈），由自由派反集体主义的托利党人如安东尼·巴贝、爱德华·杜·康（Edward du Cann）、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在塞尔斯顿公园（Selsdon Park）大会上率先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尝试清理当年福利国家理念的残存做了铺垫。宣传说要回归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理念，实际上并不是复兴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也不是巴麦尊的反欧陆观，派遣炮艇正面重击对手，这第三条道路有时候也夸张地表现得像它。或者说，1979年当选的撒切尔政府是把时光拨转到了20世纪20年代，那时候帝国面临困难，战争社会主义被狠狠地砸烂了，让幸存的企业艰难地维持着薄利，那些维持不了的就陷入绝望。和20世纪20年代一样，通过要么偿付工钱要么削减工作岗位来关闭或出售不盈利的企业，这样简单粗暴的重组遇到了剧烈的反抗，最厉害的是1984—1985年撒切尔和全英矿工工会主席阿瑟·斯卡吉尔之间的交锋——然而，这一役是铁娘子全面击溃了煤之王。

60年前这个政策曾经施行过，这时候伪装成创新的复古资本主义，它的问

题在于这场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竞争中的弱势品种不仅贫乏而且虚脱潦倒了。威尔士南部、兰开郡、西莱丁（West Riding）、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莱德塞德正巧是作为从前大英帝国工业所在地而上升到极其繁荣的部分。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要像在甩卖处理资产那样勾销，告诉他们说要把他们放倒。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对公司剩余部分还有什么兴趣吗？（假如不是联合派给予临时爱尔兰共和军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应该继续高举联合王国大旗的话，在贝尔法斯特的船坞和倒闭的麻纺织厂也会是这个情况）。撒切尔和她的党连续赢得三届大选当然使人感到高兴，但是掩盖了其代价就是这些胜利大部分建立在英国社会地图上已经产生了深深的裂隙这一事实。自从13世纪爱德华一世以后，英格兰还没有如此骄狂地在不列颠的其他民族身上强力推行自己的统治。

撒切尔的选民绝大部分来自英格兰南部家境优裕的中产阶级和职业阶层，然而贫穷北部荒废的工厂、矿坑、港口和朽坏的斜坡街道就任其自生自灭。如果说撒切尔政府还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话，那也是等着让就业市场和善意的旧式格莱斯顿式的自救原则起作用。居住在大批累赘的倒闭工业区域里的人们只需要在未来的新兴工业里就业接受“再培训”；还有如果必要的话，移到这些机会很多的米尔敦凯恩斯、贝辛斯托克或剑桥去。可是，很奇怪的是公共资助的再培训方法基本对这个从前的电焊工们排着队去学习如何使用电脑的前景没有帮助。还有，即使能够接受培训，到最后也不是说就能保证他们就业。工业领域的计算机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是节省而不是扩大使用人力的。撒切尔反潮流革命的回弹最后导致了一个既不是她的责任也不是她的过错的后果：《加冕街》综合征。几百万在旧的不列颠工业经济里的人们对自己地方的根深蒂固的忠诚，他们在这里长大、上学、结婚育儿，留恋这里的酒吧、公园，热爱本地的足球队。至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贝弗里奇——工党组的社会革命以及背后的自由派，劳合·乔治革命——他们创建的那些城市都是真正的居民社区，无论它们如何起伏经历贫穷和痛苦。很少有人能愿意放弃利物浦和利兹、诺丁汉和德比这些地方，而转去遵循所谓就业机会和铁娘子要求的那些纯粹法则。

然而撒切尔政府所做的也不是每一件事都不符合社会现实的，廉租房出售后创造了一个居者有其屋的阶层，这是相应英国人长期以来渴望当自己小城堡里的帝王王后的热潮，在机会主义气候下，国有化企业显然表现不佳。另一方面，出售国有企业股份是基于大家渴望成为股份拥有者的设想，这并不是英国人的习惯思维，接下来这些股份混合的财富也没有对改变这些习惯有什么帮助。最不对头的是给房屋和公寓拥有者加抽名为社区费的人头税的决定（这个新房产是拥有者们要吞下的苦药）。因为撒切尔政府已经专门清理了大城市的地方包括伦敦的政府，尤其是那些工党主导的机构，几乎没有人能上这个伪装成城市热（civic enthusiasm）的倒退税种的当。最后，撒切尔政府跟着也和前面的英国“二战”后政府一样搬起石

头砸了自己的脚。中产阶级、激烈反对贵族的托利党领导人，如格兰瑟姆小杂货店主的女儿和爱好园艺的售货员儿子约翰·梅杰领导的政府（俩人恰好都很为自己的出身骄傲），忠于“家庭观念”，在梅杰的著名配方里，还要做到经济上自给自足，最后却以雪崩般的性丑闻和财政错误压倒（有时候还是同一批人）而收场。

到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身份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是君主制看起来摇摇欲坠，甚至也许就要倒塌。这压力既是礼仪性的也是家族的制度，从爱德华八世退位以来，对这个工作岗位的期望被认为要高于20世纪晚期普通的个人行为标准，这时候看起来要求太高了。正如1981年威尔斯亲王与戴安娜·斯潘塞夫人的浪漫婚礼电视直播在全世界有超过8亿观众而为皇室赢来了一些东西，同样这几样东西的结合失败后又失去了这些。1992年，女王声音喑哑地说出她“流年不利”，不仅查尔斯和戴安娜分居了，11月温莎城堡还经历了一场大火。当苏格兰大臣（基于某些原因）宣布女王只愿意支付皇室私家收藏物品的更换和修补费用，要用公众税收支付修复建筑构造费用的时候，引发了一场关于皇家财政的严肃讨论。民调中被问到的人中百分之八十说女王应该按她的收入交税，而此前都是受豁免的。一年后，白金汉宫向公众旅游者开放，女王也同意交税。1994年，女王在全球的浮动象征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正式停止使用。

但是最困难的时刻还没有来临。1997年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中死去，皇室被批评作风僵化（按惯例女王不在宫里的时候禁止挂旗），没有满足十分悲伤的公众想看到降半旗的需要，王室在这些象征性时刻面临生死考验（在这些时刻需要做出他们应有的象征性表示，否则就面临存亡危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公众表达的强烈感情看起来好像要压倒他们对女王本人及其家庭相对保守的忠诚，或者说以比较明显的方式表示了不同。女王自己做了一次演讲，随和得令人印象深刻又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她个人诚挚的哀伤，这样才安度危机。席卷全国上下的情绪思潮验证了公众仍然需要凝结在同一个清晰的感情社群团体里，需要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民族这样做。

那么有上面这样需要的国家应该是不列颠还是英格兰？占优势的托利党相对来说漠视陷入困境的工业化的苏格兰和威尔士，这已经框住了苏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党派的视野。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党派的选民以前只是中产阶级、偏远郊区的人和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大举进入保守党原来的选区了（1997年的大选中托利党人在这些老选区被彻底清除出去了）；甚至侵入了工党的核心选区地带，但是尽管如此，连续三届工党领袖分别是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之后还是苏格兰人。在1992年苏格兰的一次民调中，接受调查的人百分之五十说他们赞成在欧盟里保持独立。20世纪90年代末托尼·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政府承诺地方分权和任命

在选举中占绝对优势，看起来确实在民族主义者狂热中取得了一些动力，但是很明显代价是点燃了英格兰民族主义的愤怒之火，他们憎恨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议员在英格兰的议会里还有在威斯敏斯特当他们的代表。分权的逻辑搞到最后是也要弄一个独立的英格兰议会。那么放在哪里？约克？巴斯？还是就在米尔敦凯恩斯郡正中央？

毫无疑问，现代英国历史不会赞成反而要埋葬这个观点，因为这是分解不列颠，像乌克兰一样解体，会促使不列颠分化成以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这就是要告诉阿尔斯特的爱尔兰人，他们自己需要融入爱尔兰变成单独的属于欧盟的爱尔兰，或者他们得去另外找一个地方了——例如搬到马恩岛上去）之名这样有立宪权的欧洲国籍。假设帝国的庞大资产允许不列颠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以真正的民族社群存在，由威尔士人、爱尔兰人、（惊人频繁地）苏格兰人在唐宁街和帝国的偏远角落里统治，理论上来说，大英帝国的终结也应该是意味着大不列颠股份公司体面而有序的清算。根据推理，这个旧的大英帝国一统的概念从来就不算什么，仅仅是个虚假的发明，其设计目的是削弱凯尔特人，使他们吞下英格兰人的主宰，这主宰从前是通过高压达成的，还有一个目的是说服英格兰人自己他们这样能在特罗萨克斯（Trossachs）的松鸡荒野里受到和在威尔德（Weald）苹果园里一样的尊敬。从大不列颠帝国的余威里衰落，必须加入欧盟只是为了避免跟在美国后面混，这个特点是它迫使这些“群岛”面对这个事实：他们是多个民族，而不是一个。

然而，到底是几个民族？为什么伪不列颠民族意识觉醒减弱到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真正的”身份要以那些自我决定的行为停止呢？毕竟，每个亚民族的概念也只是和大不列颠一样的发明，除了这些发明在时间上更早，还有就术语来说，“重新发现”凯尔特人和盖尔人身份又是后来的事。一个独立的苏格兰有什么理由能拒绝不认为自己是苏格兰人的奥克尼奥卡岱人要回归他们挪威祖先的根基然后申请和挪威复合的权利？为什么南威尔士山野里讲英语的威尔士人感到他们和讲威尔士语的格温内思山区威尔士人更有共同之处，而不是和格洛斯特或者布里斯托尔讲英语的人有共同之处？为什么康沃尔人应该满足于自己是在一个国家里和别的文化共处的唯一凯尔特文化，而其他的凯尔特人都已经退回到他们的民族语言学中心地带去了呢？为什么后帝国时代的不列颠不应该模仿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南斯拉夫变成快乐的民族拼布？当然是因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南斯拉夫那床不幸福的拼缝被。或者更有甚者，后帝国时代的不列颠坚持走自己的路正是因为拒绝冷酷的欧洲民族主义的纯白种人主义。请设想，如果不是因为残酷而公正的帝国命运是一开始启动的分解英国的惩罚，那么它经历了这一程序而幸存的回报实际上是在关于帝国的记忆里得到了一些积极因素，是从中获得了一个新的英国；从那些或好或坏地被旧帝国观念感动了的不列颠各民族中诞生了一个新的英国？再请想一想，没有听从以诺·鲍威尔

（Enoch Powell）的狂妄预言说一个多种族的英国会和罗马那样以“血流台伯河”而告终，这个多种族的英国真的在为考林·麦克因内斯（Colin MacInnes）的话而自豪，这个20世纪50年代“反叛”的作家那个时候说的话是“混血的荣耀”？

当然，“二战”后英国接收非白人种族的故事并不是没有痛苦乃至于悲剧的时刻。它是从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西印度群岛移民满怀希望地抵达英国开始的，他们受到1948年议会承认英联邦共同体居民也是英国公民并给予了他们自由进入权的法令刺激。这个法令很慷慨，但也是自利的。工党和保守党双方都把这些移民看作无技术低工资劳工短缺的补充。20世纪50年代是我的生长年代，他们出现在伦敦最早的多元文化社区之一戈尔德斯格林，还只是一些低调的异国来客。牙买加人和特立尼大人在索尔福德叫什么“兰开郡联盟”里打职业板球是在干什么呢？当他们的人数增加进入原来爱尔兰人为主的吉尔伯恩（Kilburn）和诺丁山，还有泰晤士河南岸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和东北的托特汉姆（Tottenham），结果就是火爆的摩擦冲突。1962年，通过了《英联邦移民法》（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通过技能以及与英国本土出生者的血缘关系远近来严格分类限制联邦公民进入英国，20世纪50年代欢迎移民劳工的理由这时候成了拒绝他们的原因。

宣布这些即将到来的限制的效果就是移民潮大增，因此到1961年的时候每年从西印度群岛还有更多从亚洲过来了约10万人。种族主义政治开始预热，虽然工党政府通过种族关系法案要遏制因仇恨和煽动暴力的罪行，但1958年在诺丁山就已经有暴乱了，1981年在布里克斯顿又发生了暴乱。可是诺丁山嘉年华也是从1959年开始的；41年后，1999年的新年前夕，倒霉的也是盛极一时的千禧年穹顶庆典的嘉年华舞蹈者们在女王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这个值得记忆的混乱夜晚是少数几个真正预示了21世纪英国未来的时刻。

这是真的，虽然今天英国一半的英国加勒比混血人口和三分之一英国亚洲混血人口都出生在英国本土，他们在总人口里占的比例还是很低。1993年黑人少年斯蒂芬·劳伦斯在伦敦被谋杀是一个种族主义导致的灾难，任何诚实的人在清算后帝国账本时都必须面对它；同时穆斯林社区发自分隔主义者的极端主义呼吁；还有，2002年英格兰板球队队长是一个英印混血儿后代，而英格兰足球队里有黑人球员，他们的教练是一个维京人后裔。这些也都是事实。对于一个多种族英国的未来更重要的是，在1997年一次民调中发现百分之五十出生在英国的加勒比人和百分之二十的出生在英国的亚裔拥有或曾经拥有白人伴侣。2000年，雅思明·阿里布海–布朗（Yasmin Alibhai-Brown）发现在民调中88%的18～30岁的英国白人不反对不同种族之间通婚，84%的西印度人后裔和50%有印度、巴基斯坦或孟加拉背景

的东亚亚裔也是同样的态度。

英国的多种族现象揭示了分裂衰退者的论调是苍白无助的。英国历史不是什么残忍地犯错误或阴谋要用纯英格兰人碾压少数民族。它一直是把各族人民从他们的根子上剥离开。有一次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根”的宣传表示不以为然，告诉我说“树有根，犹太人长脚”。对于曾经共同经历了大英帝国命运的英国人来说，不管是在孟买还是在博尔顿的街上、客厅里、厨房里甚至卧室里相遇过的，这话也适用。苏格兰人如詹姆士·鲍斯韦尔、托马斯·卡莱尔、查尔斯·肯尼迪都曾经在伦敦立足扬万，威尔士人像大卫·劳合·乔治也在这里干得不比前面那几个差，正像爱尔兰人清教徒乔治·萧伯纳也是这样，萧伯纳和很多爱尔兰人都醉心于一个事实即自己本来是约克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来来自遥远的土耳其伊兹密尔和罗马尼亚博托沙尼（Botosany）的犹太人比如我的父亲戴着平顶硬草帽，穿着带某俱乐部标注的夹克，带着他9岁的儿子在泰晤士河上泛舟，在达切特（Datchet）附近当噗噗作响的发动机坏了的时候，他在树下背诵着《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1908）和《三人同舟》（*Three Men in a Boat*，1889）里的段落，我的情况也是一个证明。

随着他出生长大［因为他自己出生在怀特恰普尔（Whitechapel），而不是博托沙尼］而来的概念，做英国人就是做欧洲人，同时又还有其他一点别的什么。这点儿别的什么不一定是会把英国的版图观点往西扩展深入到大西洋，或者更远地散发到全世界；（反正）那时候就不是什么需要防守的思想，即使帝国已经消失；现在也不应该是。是的，我作为一个跨大西洋生活的不列颠人这么讲，但是，当年戴高乐将军强逼着我们在欧洲身份和欧洲外身份之间做选择的态势在今天更加严重，好像使得我们的文化也枯萎了。实际上我国历史的这种游离态的、不稳定、复杂的、迁徙的特性应该被看成是我们对欧洲的贡献。毕竟，我国的过去在欧洲历史上非常独特，它混合了渴望社会公正的激情和执着于就要对着干的自由的倔强，我们的过去是专门颠覆而不是加强全球官僚政治和市政当局调整简化了的权威。我国在欧洲餐桌上的位置应该可以为这个特点争取生存空间，否则我们就不用出席赴宴了。如果为了布鲁塞尔那个经济美容院，徒然地拱手交出这一点而去忍受它的怪癖，连同缺点瑕疵一起放弃英国历史的优良传统，这将是一大损失。然而，只要打理得恰到好处，我们当然能在这个白人餐厅就餐者和别墅租住者眼睛只会朝内部看的俱乐部里得到金卡优惠。这个俱乐部成员是由一个想象的老练文化观念捆绑在一起的，他们假装不去注意厨房里的洗碗工碰巧来自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和斯里兰卡。大不列颠也不应该冲向一个重新标牌的未来，那样是以可耻地抵赖过去为前提了。因为我国历史不是我们民族前途的囚徒，相反，它是我们民族成熟的条件。

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两个作家忙于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对过去进行涂涂写写，他们深谙此道。温斯顿·丘吉尔从落选的失意中振作起来，在他的里维埃拉椅子上继续写作《英语人民的历史》。虽然手头有很便利的条件可以进行探索，丘吉尔不太愿意面对自己早年生活的19世纪末之后的英国历史。因此，他的历史最后一卷（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巨人像是亚伯拉罕·林肯，丘吉尔很恰当地推崇林肯是跨大西洋社区共同的高尚的英雄。同时虽然大家都知道丘吉尔的最后一届政府很像战后联合会，他的末次十字军行动——反对可能毁灭人类文明的核武器军备竞赛——指向却是未来。可是，正如他一生中那样——在19世纪90年代的帝国时期，反绥靖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以及那时——丘吉尔的历史写作如他理解的这一回是现代民主的史诗，使得他的答辩更显得紧急，他从热核毁灭那里背离了，写下了更痛切的告别词："这一天会破晓的"，1955年3月在最后一次演讲时他告诉下议院，介绍了防务白皮书，"总有一天，公平游戏、热爱人类同胞、尊敬公正和自由会让经受磨难的世代从我们不得不苟且的丑陋时代朝着（走向）光明和胜利前进"。与此同时，"我们要永不退缩，永不厌倦，永不绝望"。

五年前，1950年1月21日，乔治·奥威尔死于伦敦的大学学院医院。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对丘吉尔回忆录《他们最好的时刻》（*Their Finest Hour*）的评论。读者也许觉得奥威尔在自我评判的时候目光如炬，非常警惕伤感的回忆，也许他会对这本书及其作者同样小心留神。可是，一点也没有。他对丘吉尔大加赞赏给予最高评价，写道虽然该书一部分取自作者的竞选演讲，回忆录读起来"更像是一个普通人说的话而不是一个公共人物"。还有，他认为，"有一点大气和蔼"，这使得丘吉尔能恰如其分地受到普通人鼓舞，还有广为流传的关于丘吉尔的故事——比如他在"我们将在海滩上与他们搏斗"这句话后面加上了"我们要把酒瓶子扔向那些杂种，这就是现在我们能做的事"——证明了人民爱戴他。毫无疑问，奥威尔有点欣赏丘吉尔身上不做作的勇士气质，这是老人从英国历史吸收来而几乎不自觉地内化在他骨髓里了。这也许不一定是奥威尔自己的那个过往，可是依然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迪斯雷利旁边给瓦特·泰勒、克伦威尔、科贝特保留了一席之地。而奥威尔是一个想着应该把历史无愧地编织进社会带给英国未来的人，正如他写的，他认为狮子和独角兽应该依旧出现在军装的纽扣上。

奥威尔感到，虽然丘吉尔坚持贵族式的托利派主张（而且很多年里奥威尔说他是"一个托利党独裁者"），丘吉尔还是有一点普通人的人情味儿，因此奥威尔决定把他的"欧洲最后一人"叫作温斯顿·斯密斯。小说《1984》在1949年出版，是奥威尔的巨著，通常被认为是对模棱两可的未来世界噩梦般的展望，在书里老大哥独裁统治着一个无情均质化的国家，在那里奉行战争即和平、谎言即真理。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是奥威尔丧妻后在朱拉岛上

报业大王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借给他的小农舍里写的，那里正是在赫布里底群岛外围：岛上大约300人，每周来一次邮件，也许没有电话、没有电。后来要了他命的肺结核在那段时间里日益恶化，但他不管不顾地写作，有时候他把打字机搁在腿上，他让他的养子理查德和妹妹艾芙瑞尔和他住在一起，妹妹在保姆走后同时照料这父子俩。虽然巴恩希尔农舍是个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奥威尔却不孤独。朋友们只要愿意不怕奔波可以来来去去。奥威尔只是要躲开政坛上的那些僵硬的日常纷扰，还有伦敦的文人圈生活，以便集中思想创作，对付自己最重要的：在超级强权和超级合作年代里自由的命运，在老大哥的政体里杂交成为残暴的巨无霸，那就是政党。

读者阅读这本英语小说，而不把它当成一篇超长的指控权力滥用的演讲，就能轻易地看出奥威尔在远方的朱拉岛上，在老鹰、马鹿和海獭中，用笔写下了最慷慨激昂的辩护，论述历史的必要性。历史和回忆不是自由意志的对立面，而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当大骗子奥布莱恩说服温斯顿·斯密斯相信他在领导一个抵抗组织的时候，提议为他的征兵决定举杯庆祝未来，温斯顿举起自己的酒杯，却说“为历史”，“历史更重要”。奥布莱恩一脸严肃地表示同意。当然，也是因为历史是暴君的敌人，遗忘则是暴君最大的帮凶，通过鼓励健忘，党就能随心所欲地给不幸的臣民灌输它自己选择的历史版本，温斯顿的爱人茱莉亚对“60年代早期之前的任何事物没有记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温斯顿的意识里记忆没有被完全抹去。除了说他是因为觉得以前事情就不是当时那个样子，要不然怎么解释他强烈的厌恶感？然后过去慢慢地开始回来了，有个上了岁数的无产阶级回想起来了，这是非法的记忆，从前的啤酒更好喝。在一家废品店里，他买了一个起码一个世纪前的玻璃镇纸，里面封存着一段珊瑚；他把它放在口袋里，这就触发了他的整个回忆，也是自由想象的护身符。时间治愈了他，带给他欢欣，他大胆地指责革命和党销毁了所有档案：“历史停滞了，不存在任何事物，只有无尽的现在和一个永远正确的党。”

乔治·奥威尔坚持想要拥有未来，一个无论如何都自由的未来，前提就是忠于历史；没有比这更体现不列颠精神的了——好吧，更多的是英格兰精神——除了历史，只有另一样东西对他来说更重要，那就是自然。温斯顿·斯密斯没有时间也没有来源接触能允许他想象过去如何能孕育另一种结局的档案，但是他的确梦想着，他的梦想也和从前的某些激进分子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梦想的相差无几，“一个金色国度”。在他的梦想里，“是一块古老的、兔子啃咬的田园，一条小路蜿蜒其中，各处点缀着鼹鼠丘。对面山石嶙峋的山脊上，榆树的枝条在风中微微摇曳着，它们叶子繁复好像妇女的头发一样飘扬，就在近旁，虽然眼睛看不到，却有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地流过，有鲦鱼在它柳树下的小水潭里游动”。然后，当然，还有自然、爱、自由和历史，在奥威尔的逃亡者金色国度里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在

他之前的一些人，曾经把这样充满希望和福佑的地方叫作“耶路撒冷”，而我们有些人呢，就顽固地认为我们还可以叫它不列颠。

---

1. 都胡提棉花（dhootie），用于印度腰带和宽松的裤子粗灰色织物。——译者注
2. 安格斯·卡尔达（Angus Calder），苏格兰学者、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其关于“二战”的作品享有盛名。——译者注
3. A.P.赫伯特（A.P.Herbert），英国幽默作家、剧作家。——译者注
4. 布哈斯·昌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印度国大党主席。——译者注
5. 阿奇博尔德·威法尔（Archibald Wavell），英军高级将领。——译者注
6. 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英国政治家，左翼工党在国会的领袖。——译者注

致谢

随着英国史这一项目进入第四个年头，我越发意识到自己对所有这些同事、合作者与朋友们所欠下的更多人情。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BBC Worldwide），我很荣幸能与萨莉·波特（Sally Potter）、贝琳达·威尔金森（Belinda Wilkinson）和克莱尔·斯科特（Claire Scott）一起合作，同时也要感谢琳达·布莱克莫尔（Linda Blakemore）、埃丝特·贾格尔（Esther Jagger），以及奥利弗·皮尔逊（Olive Pearson）、凡妮莎·弗莱彻（Vanessa Fletcher）、约翰·帕克（John Parker）。

在BBC电视台，我非常荣幸地成了《英国史》杰出的制作团队中的一员，这个在广播史上特殊的项目成了我们每个参与者生命中的一部分：特别是马丁·戴维森（Martin Davidson）、丽兹·哈特福德（Liz Hartford）和克莱尔·比万（Clare Beavan），如果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会取得现今这般进展，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感谢拍摄了维多利亚时期节目的导演杰米·缪尔（Jamie Muir）和玛蒂娜·霍尔（Martina Hall）；感谢我们坚毅、冷静、无可匹敌的天才摄影师卢克·卡迪夫（Luke Cardiff）；我们剧组的常客帕特里克·艾贡（Patrick Acum）、帕特里克·刘易斯（Patrick Lewis）和迈克·萨拉（Mike Sarah）；还有我们的制片助理海伦·尼克松（Helen Nixon）、本·莱登（Ben Ledden）、亚当·华纳（Adam Warner）、瓦尼塔·辛格·华纳（Venita Singh Warner）、马克·沃尔登–米尔斯（Mark Walden-Mills）、乔治亚·莫斯利（Georgia Moseley）和达尼·巴里（Dani Barry）。感谢他们帮我度过了跌宕起落的拍摄期。感谢BBC纪实（BBC Factual）的苏珊·哈维（Susan Harvey）对该节目宣传推广的热心投入，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格林温·本森（Glenwyn Benson）和简·鲁特（Jane Root）一直以来都是这一项目的热忱斗士。我希望节目的播出和书籍的出版能够对他们付出的热情和信念有所回报。艾伦·杨图（Alan Yentob）自始至终都是这一项目热心的支持者、共谋者和鼓吹者；格雷格·戴克（Greg Dyke）之子（如他所说）和贾尼丝·哈德洛（Janice Hadlow）都喜欢这套节目，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还有我们的作曲家约翰·哈尔（John Harle）向来都是一位极好的伙伴、才华横溢的同事，如果没有他的配乐，这些节目将丧失一个完整的维度。

我很感谢那些阅读过本书章节草稿并提出意见、有益的批评，甚至是提出命令式反对建议的人，特别是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吉尔·斯洛托夫（Jill Slotover）、P.J.马歇尔（P.J.Marshall）和约翰·斯泰尔斯（John Styles），同时还有彼得·戴维森（Peter Davison）、大卫·海科克（David Haycock）、苏珊娜·法根斯·库珀（Suzanne Fagence Cooper）和彼得·克

劳斯（Peter Claus）。我的经纪人和亲爱的朋友们，迈克尔·西森斯（Michael Sissons）和罗斯玛丽·斯库拉（Rosemary Scoular）、詹姆士·吉尔（James Gill）、苏菲·罗里摩尔（Sophie Laurimore），他们不得不忍受我在创作期间的歇斯底里、分裂、暴怒的状态，从不畏缩地帮助我重新走上正轨，并且劝说我这一切似乎都是值得的。我希望它现在仍然值得。特里·皮库奇（Terry Picucci）简直将我从失衡的边缘解救回来，艾利西亚·哈尔（Alicia Hall）英勇地战胜了我那如龙卷风席卷过后地狱般的办公室。我还要感谢这些朋友们帮助我保持冷静，特别是安德鲁·阿伦兹（Andrew Arends），通过他我成了一名hon.Crescit，莉莉·布雷特（Lily Brett）、蒂娜·布朗（Tina Brown）、大卫·兰金（David Rankin）、明迪·恩格尔·弗里德曼（Mindy Engel Friedman）、埃里奥特·弗里德曼（Eliot Friedman）、乔纳森·吉利和菲莉达·吉利（Jonathan and Phyllida Gili）、艾莉森·多米尼次（Alison Dominitz）、杰拉尔丁·约翰逊（Geraldine Johnson）、尼克·乔斯（Nick Jose）、克莱尔·罗伯茨（Claire Roberts）、珍妮特·马斯林（Janet Maslin）、斯特拉·蒂利亚德（Stella Tillyard）、利昂·维斯迪耶（Leon Wieseltier），一直都在那里，支持着我。

最亲近之人的忍耐和支持往往会得到仪式性的感谢，但是没有任何家庭能够忍受一位丈夫或父亲这种两处同时进行的谵妄状态——电视和文学——这就意味着“长期的受罪”。金尼、克洛伊和加布里埃尔（Ginny,Chloe and Gabriel）忍受着这一切，却一直给予我毫无理由的爱，我将全心全意回报她们。

还有一位需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朋友罗伊·波特（Roy Porter），不幸的是他已不能阅读此书并提出宝贵且非常慷慨的意见。若要将这书在叙事技巧与人性关怀上的贡献归功于谁的话那就当属罗伊，他的缺席于我是莫大的遗憾，谨以此书献于他，是为念。

参考文献

缩略词：BM Press – British Museum Press; CUP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UP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CL –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P – University Press

已出版基本文献

Bagehot, Walter,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Chapman & Hall 1867, OUP 2001)

Bamford, Samuel, *Passages in the Life of a Radical*, 2 vols (Simpkin, Marshall & Co. 1844)

Bartrum, Katherine, *A Widow's Reminiscences of the Siege of Lucknow* (J. Nisbet 1858)

Beeton, Mrs Isabella, *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S. O. Beeton 1861)

Bewick, Thomas, *A Memoir of Thomas Bewick, Written by Himself* (Jane Bewick and Longman & Co. 1862)

Booth, Charles,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10 vols (Macmillan & Co. 1982–7)

Brittain, Vera, *Testament of Youth: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of the Years 1900–1925* (Gollancz 1933)

Burke, 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and on the Proceedings in Certain Societies in London Relative to that Event* (J. Dodsley 1790)

Campbell, George, *The Irish Land* (Trubner & Co. 1869)

Carlyle, Thomas, *Past and Present* (Chapman & Hall 1843)

Carlyle, Thomas, *Signs of the Times* (William Paterson 1882)

Churchill, Winston S., *Great Contemporaries*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8)

Churchill, Winston S., *My Early Life: A Roving Commissi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0)

Churchill, Winston S., *The Second World War*, 6 vols (Cassell 1948–54)

Churchill, Winston S., *The World Crisis, 1911–18*, 2 vols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3, 1927)

Cobbett, William, *Rural Rides in the Counties of Surrey, Kent, Sussex – with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Matters Applicable to, and Illustrated by, the State of those Counties Respectively* (William Cobbett 1830)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and Wordsworth, William, *Lyrical Ballads, With a Few Other Poems* (Biggs & Cottle and T. N. Longman 1798)

Eden, Emily, '*Up the Country': Letters Written to her Sister from the Upper Provinces of India*, 2 vols (1866)

Elphinstone, Mountstuart, *The History of India*, 2 vols (Murray 1841)

Gaskell, Elizabeth, *Mary Barton: A Tale of Manchester Life*, 2 vols (Chapman & Hall 1848)

Gubbins, Martin Richard, *An Account of the Mutinies in Oudh, and of the Siege of the Lucknow Residency* (Richard Bentley 1858)

Keith, A. B. (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Indian Policy, 1750–1921*, 2 vols (OUP 1922)

Kay-Shuttleworth, Sir James Phillips, *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Manchester* (James Ridgway 1832)

Macaulay, Thomas Babbington, *Macaulay's Essays on Lord Clive and Warren Hastings* (Ginn 1931)

Mill, James, *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3 vols (1817)

Mill, John Stuart, *Autobiography* (Longmans, Green, Reader & Dyer 1873)

Mill, John Stuart, *On Liberty* (Longmans, Green, Reader & Dyer 1859)

Mill, John Stuar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2 vols (John W. Parker 1848)

Mill, John Stuart,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Longmans, Green, Reader & Dyer 1869)

More, Hannah, *Village Politics. Addressed to all the Mechanics, Journeymen, and Day Labourers, in Great Britain. By Will Chip, a Country Carpenter* (Simmons, Kirkby & Jones 1793)

Moritz, Carl Philipp, *Travels, Chiefly on Foot, Through Several Parts of England …* (G. G. and J. Robinson 1795)

Morton, H.V., *In Search of England* (Methuen 1927)

Orwell, George, *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rge Orwell*, 20 vols (Secker & Warburg 1998)

Paine, Thomas, *Rights of Man: Being an Answer to Mr Burke's Attac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J. Johnson 1791)

Paine, Thomas, *Rights of Man. Part the Second. Combining Principle and Practice* (J. S. Jordan 1792)

Pennant, Thomas, *A Tour in Scotland, and Voyage to the Hebrides* (B. White 1772)

Pennant, Thomas, *A Tour in Wales, 1773* (1773, H. Hughes 1778–9)

Priestley, J. B., *English Journey … during the Autumn of the Year 1933* (Gollancz 1934)

Pugin, 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Contrasts …* (1836)

Pugin, 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The True Principles of Pointed or Christian Architecture* (John Weale 1841)

Price, Richard,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Delivered on Nov. 4 1789, at the Meeting-House in Old Jewry, to the Society for Commemorating the R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T. Cadell 1789)

Rees, L. E.,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Lucknow, from its Commencement to its Relief by Sir Colin Campbell*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 Roberts 1858)

Rousseau, Jean-Jacques, *The Confessions of J. J. Rousseau; with the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 2 vols (1782, J. Bews 1783)

Ruskin, John, *Sesame and Lilies* (Smith Elder 1865)

Smiles, Samuel, *Self-Help: With Illustrations of Character and Conduct* (Murray 1859)

Smith, Barbara Leigh, *A Brief Summary in Plain Languag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ws Concerning Women* (1854, Trubner & Co. 1869)

Strachey, Lytton, *Eminent Victorians* (Chatto & Windus 1918)

Strachey, Lytton, *Queen Victoria* (Chatto & Windus 1921)

Thale, Mary (ed.), *Selections from the Papers of 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1792–9 (CUP 1983)

Thelwall, John, *The Peripatetic; or, Sketches of the Heart, of Nature and Society, in a Series of Politico-Sentimental Journals, in Verse and Prose, of the Eccentric Excursions of Sylvanus Theophrastus*, 3 vols (1793)

Trevelyan, Charles Edward, *The Irish Crisis;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Measures for the Relief of the Distress Caused by the Great Irish Famine of 1846–7 …* (Macmillan & Co. 1880)

Tytler, Harriet, *An Englishwoman in India: The Memoirs of Harriet Tytler, 1828–58*, edited by Anthony Sattin (OUP 1986)

Wells, H. G., *The Outline of History: Being 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 (George Newnes 1919)

West, Thomas, *A Guide to the Lakes, in Cumberland, Westmorland, and Lancashire,* (Richardson & Urquhart 1780)

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in 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Occasioned by Hi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J. Johnson 1790)

Wollstonecraft, Mar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 (J. Johnson 1792)

Wordsworth, William, *The Prelud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 An Autobiographical Poem* (1798–9, Edward Moxon 1850)

Young, Arthur, *A Six Months Tour Through the North of England: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Agriculture, Manufactures and Population, in Several Counties of this Kingdom* (W. Strahan 1770)

概览与一般性文献

Bayly, C. A.,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1780–1830* (Longman 1989)

Brewer, John,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rperCollins 1997)

Brown, Judith and Louis, Wm. Roger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4: The Twentieth Century* (OUP 1999)

Cain, P. J., and Hopkins, A. G., *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 2 vols (Longman 1993)

Cain, P. J.,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British Overseas Expansi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0)

Cannadine, David, *Class in Britain* (Yale UP 1998)

Cannadine, David, *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 (Allen Lane/ Penguin Press 2001)

Corbett, David Peters, *et al* (eds), *The Geographies of Englishness: Landscape and the National Past, 1880–1940* (Yale UP 2002)

Fieldhouse, D. K., *Economics and Empire, 1880–1914*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3)

Foster, R. F., *Modern Ireland, 1600–1971* (Allen Lane/Penguin Press 1988)

Groenewegen, Peter (ed.),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England* (Elgar Publishing 1994)

Hobsbawm, Eric, and Ranger, Terence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UP 1983)

Hyam, Ronald, *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Palgrave Macmillan 1993)

James, Lawrenc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ittle, Brown & Co. 1994)

Kiernan, V. G.,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Europ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Imperial Ag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Lee, J., *The Modernization of Irish Society* (Gill & Macmillan 1973)

Mansergh, Nicholas, *The Irish Question* (Allen & Unwin 1975)

Porter, Roy,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enguin 1982)

Porter, Andrew, and Low, Alaine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II: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UP 1999)

Prochaska, F. K., *The Republic of Britain, 1760–2000* (Allen Lane 2000)

Purvis, June, and Holton, Sandra Stanley (eds), *Votes for Women* (Routledge 2000)

Schama, Simon, 'The Domestication of Majesty: Royal Family Portraiture 1500–1850' in *Art and History*, pp. 155–85, edited by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CUP 1988)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Gollancz 1963, Penguin 1968)

Wright, Patrick, *On Living in an Old Country: The National Past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Verso 1985)

次要文献

第一章和第二章

Andrews, Malcolm, *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 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Tourism in Britain, 1760–1800* (Stanford 1989)

Ayling, Stanley, *Edmund Burke* (Murray 1988)

Bannet, Eve Tavor, *The Domestic Revolution: Enlightenment Feminisms and the Novel* (Johns Hopkins UP 2000)

Barker-Benfield, G. J., *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 Sex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Barrell, John, *Imagining the King's Death: Figurative Treason, Fantasies of Regicide* (OUP 2000)

Bate, Jonathan, *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Tradition* (Routledge 1991)

Bate, Jonathan, *The Song of the Earth* (Picador 2000)

Behrendt, Stephen C., *Romanticism, Radicalism and the Press* (Wayne State UP 1997)

Blakemore, Steven, *Burke and the Fall of Language* (Brown UP 1988)

Briggs, Asa, *William Cobbett* (OUP 1967)

Bromwich, David, *Hazlitt: The Mind of a Critic* (OUP 1983)

Chard, Chloe, and Langdon, Helen (eds), *Transports: Travel, Pleasure and Imaginative Geography, 1600–1830* (Yale UP 1996)

Claeys, Gregory (ed.),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Jacobinism: Writings of John Thelwall* (Pennsylvania State UP 1995)

Clark, J. C. D., *English Society 1688–1832* (CUP 1985)

Cookson, J. E., *The British Armed Nation, 1793–1815* (Clarendon Press 1997)

Cookson, J. E., *The Friends of Peace: Anti-War Liberalism in England, 1793–1815* (CUP 1982)

Crossley, Ceri, and Small, Ian (ed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British Culture* (OUP 1989)

Davis, Michael T., *Radicalism and Revolution in Britain, 1775–1848: Essays in Honour of Malcolm I. Thomis* (St Martin's Press 2000)

Deane, Seamu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1789–1832* (Harvard UP 1988)

Duff, Gerald, *William Cobbett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Edwin Mellen Press 1972)

Dyck, Ian, *William Cobbett and Rural Popular Culture* (CUP 1992)

Elliott, Marianne, *Partners in Revolution: The United Irishmen and France* (Yale UP 1982)

Elliott, Marianne, *Wolfe Tone: Prophet of Irish Independence* (Yale UP 1989)

Emsley, Clive, *British Society and the French Wars, 1793–1815* (Macmillan 1979)

Everett, Nigel, *The Tory View of Landscape* (Yale UP 1994)

Gaull, Marilyn, *English Romanticism: The Human Context* (W. W. Norton 1988)

Grayling, A. C., *The Quarrel of the Age: The Life and Times of William Hazlitt* (Phoenix 2001)
Hobsbawm, E. J., and Rudé, George, *Captain Swing* (Lawrence & Wishart 1969)
Holmes, Richard, *Coleridge: Early Visions* (Hodder & Stoughton 1989)
Holmes, Richard, *Coleridge: Darker Reflections* (HarperCollins 1998)
Jacobs, Diane, *Her Own Woman: The Life of Mary Wollstonecraft* (Abacus 2001)
Jarrett, Derek, *The Begetters of Revolution: England's Involvement with France, 1759–89* (Longman 1973)
Jarvis, Robin, *Romantic Writing and Pedestrian Travel* (Macmillan 1997)
Keane, John, *Tom Paine* (Little, Brown & Co. 1995)
Knight, Frida, *University Rebel: The Life of William Frend, 1757–1841* (Gollancz 1971)
Kramnick, Isaac, *The Rage of Edmund Burke: Portrait of an Ambivalent Conservative* (Basic Books 1977)
Kritz, Kay Dian, *The Idea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Painter: Genius as Alibi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Yale UP 1997)
Newman, Gerald,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A Cultural History 1740–1830* (St Martin's Press 1997)
O'Brien, Conor Cruise, *The Great Melody: A Thematic Biography and Commented Anthology of Edmund Burke* (Sinclair Stevenson 1992)
O'Brien, P., *Debate Aborted: Burke, Priestley, Paine and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9–91* (Scotforth 1996)
Paulin, Tom, *The Day Star of Liberty: William Hazlitt and Radical Style* (Faber 1998)
Porter, Roy, *The Enlightenment: 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Penguin 2000)
Robinson, Jeffrey C., *The Walk: Notes on a Romantic Imag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9)
Royle, Edward, *Revolutionary Britannia? Reflections on the Threat of Revolution in Britain, 1789–1848* (Manchester UP 2000)
Schweizer, Karl W., and Osborne, John (eds), *Cobbett in His Times* (Leicester UP 1990)
Solnit, Rebecca, *Wanderlust: A History of Walking* (Viking 2000)
Thomis, Malcolm I., and Holt, Peter, *Threats of Revolution in Britain, 1789–1848* (Macmillan 1977)
Tillyard, Stella, *Citizen Lord: Edward Fitzgerald, 1763–98* (Chatto & Windus 1997)
Todd, Janet, *Mary Wollstonecraft: A Revolutionary Life*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0)
Tomalin, Clai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Mary Wollstonecraft*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4, Penguin 1985)
Tyson, Gerald. P., *Joseph Johnson: A Liberal Publisher*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79)
Wallace, Anne D., *Walking, Literature and English Culture: The Origins and Uses of Peripatetic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UP 1993)
Wells, Roger, *Wretched Faces: Famine in Wartime England* (Sutton 1988)
Williams, Raymond,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Penguin 1973)
Worthen, John, *The Gang: Coleridge, the Hutchinsons and the Wordsworths in 1802* (Yale UP 2001)

第三章和第四章

Altick, Richard D., *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 (W. W. Norton 1973)
Ashton, O., Fyson, R., and Roberts, S. (eds), *The Chartist Legacy* (Merlin Press 1999)

Auerbach, Jeffrey A.,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A Nation on Display* (Yale UP 1999)
Bolster, Evelyn, *Sisters of Mercy in the Crimea* (Cork 1964)
Briggs, Asa, *Victorian Cities* (Odhams 1963)
Briggs, Asa, *Victorian People* (Penguin 1965)
Briggs, Asa, *Victorian Things* (Batsford 1988)
Cannadine, David *et al,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History, Art and Architecture* (Merrell 2000)
Cecil, David, *Melbourne* (Constable 1965)
Curl, James Stevens, *The Victorian Celebration of Death* (Sutton 2000)
Davis, John R., *The Great Exhibition* (Sutton 1999)
Davidoff, Leonore, and Hall, Catherine,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Hutchinson 1987)
Edsall, N. C., *The Anti-Poor Law Movement, 1834–44* (Manchester UP 1971)
Epstein, James, *The Lion of Freedom: Feargus O'Connor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 1832–42* (Croom Helm 1982)
Freeman, Michael, *Railways and the Victorian Imagination* (Yale UP 1999)
Gernsheim, Helmut, and Alison, *Queen Victoria: A Biography in Word and Picture* (Longman 1959)
Goldie, Sue M. (ed.), *Florence Nightingale,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Mandolin 1996)
Greenall, R. L., *The Making of Victorian Salford* (Carnegie Publishing 2000)
Hardie, Frank,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Queen Victoria, 1861–1901* (Frank Cass 1963)
Harrison, J. F. C.,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1832–51* (Fontana 1988)
Hawarden, Lady Clementina, *Studies in Life, 1859–64* (V&A Publications 1999)
Hibbert, Christopher, *Queen Victoria: A Personal History* (Da Capo Press 2001)
Hibbert, Christopher, *Queen Victoria in Her Letters and Journals* (John Murray 1984)
Homans, Margaret, *Royal Representations: Queen Victoria and British Culture, 1837–76*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Jones, David J.V., *The Last Rising: The Newport Insurrection of 1839* (Clarendon Press 1985)
Kaplan, Fred, *Thomas Carlyle* (Cornell UP 1983)
Kohlmaier, Georg, and Sartory, Barna von, *Houses of Glass: A Nineteenth-century Building Type* (MIT Press 1986)
Langland, Elizabeth, *Nobody's Angels: Middle-Class Women and Domestic Ideology in Victorian Culture* (Cornell UP 1995)
Levine, Philippa, *Victorian Feminism, 1850–1900* (Hutchinson Education 1987)
Longford, Elizabeth, *Victoria, RI*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64)
Munich, Adrienne, *Queen Victoria's Secrets* (Columbia UP 1996)
Nevill, Barry St-John (ed.), *Life at the Court of Queen Victoria* (Webb & Bower 1984)
Perkin, Joan, *Victorian Women* (John Murray 1993)
Pevsner, Nikolaus, *Studies in Art,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Vol II: Victorian and After* (Princeton 1968, Thames & Hudson 1982)
Port, M. H. (ed.),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Yale UP 1976)
Rose, Phyllis, *Parallel Lives: Five Victorian Marriages* (Chatto & Windus 1984)
Schwarzkopf, Jutta, *Women in the Chartist Movement*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Seacole, Mary,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 in Many Lands* (Falling Walls Press 1984, OUP 1990)
Smith, F. B., *Florence Nightingale: Reputation and Power* (Croom Helm 1982)

Stone, Lawrence, *Road to Divorce: England, 1530–1987* (OUP 1990)
Thompson, Dorothy, *Queen Victoria: Gender and Power* (Virago 1990)
Thompson, F. M. L.,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Stone, Lawrence, *Road to Divorce: England, 1530–1987* (OUP 1990)
Thompson, Dorothy, *Queen Victoria: Gender and Power* (Virago 1990)
Thompson, F. M. L.,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 (Fontana 1988, Harvard UP 1989)
Vallone, Lynn, *Becoming Victoria* (Yale UP 2001)
Vicinus, Martha, *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 (Virago 1985)
Vicinus, Martha, *A Widening Sphere: Changing Roles of Victorian Women* (Indiana UP 1977, Methuen 1980)
Weaver, Mike (ed.), *British Phot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Fine Art Tradition* (CUP 1989)
Weaver, Mike, *Julia Margaret Cameron, 1815–79* (Herbert 1984)
Weintraub, Stanley, *Victoria: Biography of a Queen* (Allen & Unwin 1987)
Young, G. M., *Victorian England: Portrait of an Age* (OUP 1936)
Ziegler, Philip, *Melbourne: A Biography of William Lamb, 2nd Viscount Melbourne* (Collins 1976)

第五章和第六章

Arnold, David, *Colonizing the Body: 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Arnold, David, and Hardiman, David (eds), *Subaltern Studies, Vol. VIII: Essays in Honour of Ranajit Guha* (OUP 1993)
Bayly, C. A.,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UP 1996)
Bayly, C. A., *Indian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CUP 1988)
Bayly, C. A., *Rulers, Townsmen and Bazaars: North Indian Society in the Age of British Expansion, 1770–1870* (CUP 1983)
Bayly, C. A., *The Raj: India and the British, 1600–1947*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1990)
Bayly, Susan, *Cast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ndia from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Modern Age* (CUP 1999)
Blake, Robert, *Disraeli* (Eyre & Spottiswoode 1966)
Clive, John, *Macaulay: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an* (Random House 1973)
Codell, Julie F. and Macleod, Dianne Sachko (eds), *Orientalism Transposed: The Impact of the Colonies on British Culture* (Ashgate Publishing 1998)
Cohn, Bernard S.,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Princeton UP 1996)
Crosby, Travis L., *The Two Mr Gladstones: A Study in Psychology and History* (Yale UP 1997)
Davis, Mike,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Verso 2001)
Davis, Richard, *Disraeli* (Little, Brown & Co. 1976)
Donnelly, James S. Jr., *The Great Irish Potato Famine* (Sutton 2001)
Edney, Matthew H.,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Edwardes, Michael, *A Season in Hell: The Defence of the Lucknow Residency* (Taplinger Publishing 1973)
Foster, R. F., *Charles Stewart Parnell: The Man and His Family* (Harvester Press 1976)

Gribben, Arthur (ed.), *The Great Famine and the Irish Diaspora in America* (Massachusetts UP 1999)
Guha, Ranajit, and Spivak, Gayatry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OUP 1988)
Hamer, D. A., *Liberal Politics in the Age of Gladstone and Rosebery: A Study in Leadership and Policy* (OUP 1972)
Hibbert, Christopher, *The Great Mutiny: India 1857* (Allen Lane/Penguin Press 1978)
Hoppen, K. Theodore, *Election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Ireland 1832–85* (Clarendon Press 1984)
Jenkins, Roy, *Gladstone* (Macmillan 1995)
Jordan, Donald, *Land and Popular Politics in Ireland* (CUP 1994)
Kinealy, Christine, *The Great Irish Famine: Impact, Ideology, Rebell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Kissane, Noel, *The Irish Famine: A Documentary History*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 1995, Syracuse UP 1996)
Lyons, F. S. L., *Ireland Since the Famin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1)
Marsh, Peter, *Joseph Chamberlain: Entrepreneur in Politics* (Yale UP 1994)
Matthew, H. C. G., *Gladstone, 1809–74* (Clarendon Press 1986)
Matthew, H. C. G., *Gladstone, 1875–98* (Clarendon Press 1995)
Matthew, H. C. G., *The Gladstone Diaries,* vols 5–14 (Clarendon Press 1978–94)
Matthew, H. C. G., *The Liberal Imperialists* (Clarendon Press 1972)
McLaren, Martha, *British India and British Scotland, 1780–1830: Career-Building, Empire-Building and a Scottish School of Thought on Indian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2001)
Metcalf, T. R., *Ideologies of the Raj* (CUP 1995)
Metcalf, T. R., *Land, Landlords and the British Ra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Morash, Chris and Hayes, Richard (eds), *'Fearful Realitie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amine* (Irish Academic Press 1996)
Morris, James, *Farewell the Trumpets: An Imperial Retreat* (Faber 1978)
Morris, James, *Heaven's Command: An Imperial Progress* (Faber 1973)
Morris, James, *Pax Britannica: The Climax of an Empire* (Faber 1968)
Mukherjee, Rudrangshu, *Awadh in Revolt, 1857–8: A Study in Popular Resistance* (OUP 1985)
O'Cathoir, Brendan (ed.), *Famine Diary* (Irish Academic Press 1997)
O'Gráda, Cormac, *Black '47 and Beyond: The Great Irish Famine in History, Economy and Memory* (Princeton UP 1999)
Oldenburg, Veena Talwa, *The Making of Colonial Lucknow, 1856–77* (Princeton UP 1984)
Parry, J. P., *Democracy and Religion: Gladstone and the Liberal Party, 1867–75* (CUP 1986)
Roberts, Andrew, *Salisbury: Victorian Tita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9)
Sen, Amartya,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UP 1981)
Shannon, Richard T., *The Age of Disraeli and the Rise of Tory Democracy* (Longman 1992)
Shannon, Richard T., *Gladstone*, 2 vols (Penguin 1999–2000)
Shannon, Richard T., *Gladstone and the Bulgarian Agitation*, 1876 (Nelson 1963)
Stokes, E. T.,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UP 1963)
Stokes, E. T., *The Peasant and the Raj: Studies in Agrarian Society and Peasant Rebellion in Colonial India* (CUP 1978)

Stokes, E. T., and Bayly, C. A. (eds), *The Peasant Armed: The Indian Rebellion of 1857* (OUP 1986)

Townshend, Charles, *Political Violence in Ireland: Government and Resistance since 1848* (Clarendon Press 1983)

Veer, Peter van der, *Imperial Encounters: Religion and Modernity in India and Britain* (Princeton UP 2001)

第七章和第八章

Addison, Paul, *Churchill on the Home Front, 1900–55* (Cape 1992)

Addison, Paul, *The Road to 1945: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Cape 1975)

Alibhai-Brown, Yasmin, *Who Do We Think We Are? Imagining the New Britain* (Allen Lane 2000)

Barnett, Corelli, *The Audit of War: The Illusion and the Reality of Britain as a Great Power* (Macmillan 1986)

Beckett, Francis, *Clem Attlee* (Richard Cohen 1997)

Benson, John (ed.),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75–1914* (Croom Helm 1985)

Best, Geoffrey, *Churchill: A Study in Greatness* (Hambledon & London Ltd 2001)

Blake, Robert, *The Conservative Party from Peel to Thatcher* (Methuen 1985)

Blake, Robert, and Louis, Wm. Roger (eds), *Churchill* (OUP 1993)

Blythe, Ronald, *The Age of Illusion: England in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OUP 1983)

Bogdanor, Vernon, *Devolu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OUP 1999)

Calder, Angus, *The People's War: Britain 1939–45* (Cape 1969, Pimlico 1992)

Cairncross, Alec, *The British Economy Since 1945*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Cannadine, David, *Aspects of Aristocracy* (Yale UP 1994)

Cannadine, David (ed.), *Blood, Tears, Toil and Sweat: The Speeches of Winston Churchill*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9)

Cannadine, Davi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 (Yale UP 1990)

Chamberlin, Russell, *The Idea of England* (Thames & Hudson 1986)

Charmley, John, *Chamberlain and the Lost Peace* (Hodder & Stoughton 1989)

Charmley, John, *Churchill: An End of Glory: A Political Biography* (Hodder & Stoughton 1993)

Churchill, Randolph S., and Gilbert, Martin S., *Winston S. Churchill*, 21 vols (Heinemann, 1966–88)

Clark, Alan, *The Tories: Conservatism and the Nation State, 1922–97*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8)

Clarke, Peter, *Hope and Glory Britain, 1900–1990* (Allen Lane 1996)

Clarke, Peter,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 (Edward Elgar 1998)

Clarke, Peter, *Lancashire and the New Liberalism* (CUP 1971)

Collini, Stefan, *English Pas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OUP 1999)

Crick, Bernard, *George Orwell: A Life* (Secker & Warburg 1980)

Danchev, Alex, and Todman, Daniel (eds), *Field Marshal Lord Alanbrooke: War Diaries, 193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Dangerfield, George, *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 (Constable 1936; Serif 1997)

Darby, Wendy *Joy, Landscape and Identity: Geographies of Nation and Class in England* (Berg 2000)

Dell, Edmund, *A Strange Eventful History: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Britain* (HarperCollins 2000)

Devine, T. M., and Finlay, R. J. (eds), *Scot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nburgh UP 1996)
Ferguson, Niall, *The Pity of War* (Allen Lane/Penguin Press 1998)
Gilbert, Martin, *Churchill: A Life* (Heinemann 1991)
Gilbert, Martin, and Gott, Richard, *The Appeasers*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Grigg, John, *Lloyd George: From Peace to War, 1912–16* (Methuen 1985)
Grigg, John, *Lloyd George: The People's Champion, 1902–11* (Eyre Methuen 1978)
Harris, José, *Private Lives, Public Spirit: Britain, 1870–1914* (OUP 1993)
Harris, José, *William Beveridge: A Biography* (Clarendon Press 1997)
Harrisson, Tom, *Living through the Blitz* (Penguin 1990)
Hennessy, Peter, *Never Again: Britain, 1945–51* (Cape 1992)
Hiro, Dilip, *Black British, White British* (Eyre & Spottiswoode 1971)
Hitchens, Christopher, *Orwell's Victory* (Allen Lane/Penguin Press 2002)
Holton, Sandra, *Feminism and Democracy: Women's Suffrage and Reform Politics in Britain, 1900–1918* (CUP 1986)
Howkins, Alun, *Reshaping Rural England, 1850–1925: A Social History* (HarperCollins 1991)
James, Robert Rhodes, *The British Revolution, 1880–1939* (Hamish Hamilton 1976)
James, Robert Rhodes, *Churchill: A Study in Failur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0)
James, Robert Rhodes (ed.), *Winston S. Churchill: His Complete Speeches, 1897–1963*, 8 vols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74)
Jenkins, Roy, *Asquith* (HarperCollins 1986)
Jenkins, Roy, *Churchill: A Biography* (Macmillan 2001)
Jones, Gareth Stedman, *Outcast Lond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 (Clarendon Press 1971)
Joyce, Patrick, *Visions of the People: Industrial England and the Question of Class, 1848–1914* (CUP 1991)
Lukacs, John, *The Duel: Hitler* v. *Churchill, 10 May – 31 July 1940* (Bodley Head 1990)
Lukacs, John, *Five Days in London, May 1940* (Yale UP 1999)
Mandler, Peter,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Stately Home* (Yale UP 1997)
Mandler, Peter, *History and National Life* (Profile Books 2002)
Marsh, Peter J., *Joseph Chamberlain: Entrepreneur in Politics* (Yale UP 1994)
Marwick, Arthur, *Britain in the Century of Total War* (Bodley Head 1968)
Marwick, Arthur, *The Home Front: The Britis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Thames & Hudson 1976)
McKibbin, Ross, *Classes and Cultures: England, 1918–51* (OUP 1998)
Meyers, Jeffrey, *Orwell: 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 (W. W. Norton 2000)
Morgan, Kenneth O., *Britain Since 1945: The People's Peace* (OUP 1990)
Morgan, Kenneth O., *Labour in Power, 1945–51* (Clarendon Press 1984)
Morgan, Kenneth O., *Rebirth of a Nation: Wales 1880–1980* (Clarendon Press 1981)
Parker, R. A. C.,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British Policy and the Com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Macmillan 1993)
Parker, R. A. C., *Churchill and Appeasement* (Macmillan 2000)
Paxman, Jeremy, *The English: A Portrait of a People* (Michael Joseph 1998)
Pedersen, Susan, and Mandler, Peter (eds), *After the Victorians: Private Conscience and Public Duty in Modern Britain* (Routledge 1994)
Pugh, Martin, *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ish Politics, 1867–1939* (Basil Blackwell 1982)
Pugh, Martin, *The Tories and the People, 1880–1935* (Basil Blackwell 1985)

Ramadin, Ron, *Re-imagining Britain: 500 Years of Black and Asian History* (Pluto Press 1999)

Roberts, Andrew, *Eminent Churchillians* (Simon & Schuster 1994)

Roberts, Andrew, *The 'Holy Fox': A Biography of Lord Halifax*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1)

Roberts, Andrew, *Salisbury: Victorian Tita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9)

Rose, Norman, *Churchill: An Unruly Life* (Simon & Schuster 1994)

Samuel, Raphael, *Theatres of Memory, Vol. II: Island Stories: Unravelling Britain* (Verso 1998)

Shelden, Michael, *Orwell: The Authorised Biography* (Heinemann 1991)

Skidelsky, Robert, *The Politicians and the Slump: The Labour Government of 1929–31* (Macmillan 1967)

Spencer, Ian R. G., *British Immigration Policy since 1939: The Making of Multi-Racial Britain* (Routledge 1997)

Stansky, Peter, and Abrahams, William, *The Unknown Orwell* (Constable 1972)

Stewart, Graham, *Burying Caesar: Churchill, Chamberlai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Tory Party*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9)

Taylor, A. J. P., *et al., Churchill: Four Faces and the Man* (Allen Lane/Penguin Press 1969)

Taylor, A. J. P.,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OUP 1965)

Thompson, F. M. L., *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 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 (Fontana Press 1988)

Tiratsoo, Nick (ed.), *From Blitz to Blair: A New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939*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7)

Waller, P. J., *Town, City and Nation: England 1850–1914* (OUP 1983)

Weight, Richard, *Patriots: National Identity in Britain, 1940–2000* (Macmillan 2002)

Young, Hugo, *This Blessed Plot: Britain and Europe from Churchill to Blair* (Overlook Press 1998)